中法战争史

ZHONG FA ZHAN ZHENG SHI

廖宗麟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世华

封面设计：刘莅舒

中法战争史

ZHONG FA ZHAN ZHENG SHI

ISBN 7-80504-868-1
K·243 定价:38.00元

中法战争史

ZHONGFAZHANZHENGSHI

廖宗麟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法战争史/廖宗麟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3

ISBN 7-80504-868-1

Ⅰ.中... Ⅱ.廖... Ⅲ.中法战争(1884~1885)
Ⅳ.K2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5371 号

中法战争史

廖宗麟/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市宝坻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125 插页 2 字数 557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80504-868-1

K·243 定价:38.00 元

自　序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既然如此，历史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却限于各人的文化修养、认识水平、掌握资料、观察角度不同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各人心目中的历史事实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表述出来更是千人千貌，众说纷纭。在封建社会里，历史被说成是帝王将相史，在历史舞台上只看见帝王将相的活动，却很少看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影子；在帝国主义猖獗的时代，历史又成了西方带来文明的时代，好像中华五千年文明都不行，需要从西方重新输进文明；到了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历史又成了阶级斗争史，似乎整个社会都只有两大阶级在斗生斗死，其他人只有当看客的份。所以，有个哲人便将历史称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显然，他在这里所说任人打扮的历史并不是客观的历史，而是同一历史事实被不同的人所作出的不同认识和表述。不过，只要历史学家不是存心欺骗读者，而是力图反映历史事实的话，那么，不管这个历史学家的水平如何，都将一点点地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从而让后人得以正确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并用以指导今天的生活。

从 1840 年至 1919 年的八十年中，是外敌不断入侵、中国日渐衰弱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对外抗争的时代。发生

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就是近代中国五次反抗外侵战争中的一次，除了它是中国近代惟一一次不以中国战败，没有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战争，因而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外，在时间上由于它恰巧发生在五次对外战争的中间，因而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引起中国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思想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影响。虽然它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但这段历史的真正情况究竟如何，至今还是人言人殊，未能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特别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中法战争史当然也就成为一部阶级斗争史了，成为爱国者与卖国者的斗争史，而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则被忽视了。更由于中法战争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恶谥，因而长期以来被看成是一场中国打得“窝囊”的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十大课题中，中法战争研究的进展可能是最缓慢的，至今还没有与这个课题相称的学术专著，甚至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不是很多，以致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都对中法战争史感到陌生，他们在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其他问题时可能都是出色的专家，但在附带涉及到中法战争史的问题时，却常常举笔茫然，力不从心，勉强谈及，往往捉襟见肘，下笔辄错，这不能不使关心这方面研究的人们感到焦虑。

我关心中法战争史研究工作的进展，并尽自己微薄的能力，试图促进这方面研究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坚持不懈地努力，撰写有关中法战争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就是我研究心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我治史重考证，也不忌惮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即使与传统看法不一致也不惧。我以为连史料还未搞清楚，是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如果适应潮流，也许会行时一时，但终究会贻笑后人的。我尽量搜集史料，

从而给我发挥自己的研究特长提供了条件。由于掌握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使得我可以轻易地发现前人一些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比如对民族英雄刘永福的研究,百余年来不绝于书,但有几人真正掌握和研究过刘永福的资料呢?结果是出的成果越多,以讹传讹,则谬种越是流行;又如唐景崧所撰《请缨日记》,既冠名"日记",自然让人认为可信程度较高,而据我考证,此书其实是一本回忆录,其中的记载,大多经过撰述者的增删改纂,非经缜密考证,不可轻易使用;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淮系头子李鸿章被看成是卖国贼,淮系诸将也因而蒙受牵连,于是人们根据一两条不甚可靠的资料,就将广西巡抚潘鼎新说成是镇南关大捷的逃兵,但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资料,考证潘鼎新参加了组织和指挥镇南关大捷的全过程,评定他是抗法爱国英雄;等等。这样的见解和看法,在本书是很多的,由于我的学养不足,有些看法还不成熟,尚祈高明者批评指教。

我根据自己对于史料的掌握和史实的了解,按照自己的研究结论和理论体系,撰成这本《中法战争史》。我认为中法战争并不是一场使中国丢脸的"窝囊"战争,而相反是值得我们自豪的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高成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以一种兴奋向上的激动心情叙述这场战争的过程,希望它能发人深省,激人奋进。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反映了这段史实的全部真实情况,我能够说的只是已尽力反映客观事实,总结历史经验,为读者贡献一部更接近事实的著作而已。为了说明我所研究内容的一些背景,我在书中广泛地参考和引用了一些学者的著作,如赵和曼、王士录等人编著的越南资料、陈碧笙、连横、卡诺等人研究台湾的著作、姚永森的《刘铭传传》、俞政的《何如璋传》等,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楔　子

法国对越南的殖民侵略和中法战争

世界近代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掠夺和剥削殖民地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大幅度的提高，产品越来越丰富，国内市场就显得越来越狭窄，需要开拓海外市场，这种海外市场的相当部分也要通过占有海外殖民地的办法来解决。英、法、美、西、葡等国对美洲，英、法、荷、德对非洲，英国对印度、缅甸，英、法、俄、德、日本以及八国联军对中国，荷兰对印尼，西班牙、美国对非律宾，法国对印支三国的殖民侵略等，写下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黑暗篇章。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侵占野心，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后期。

18世纪70年代，越南爆发了西山起义，严重威胁越南政府的统治。当时，法国传教士百多禄主教正往来于柬埔寨和越南传教，曾与越南政府有所接触。越王阮福映遂派人召来百多禄，请他代向法国政府请援，并以太子为质，与百多禄一同前往法国。当时法国正与英国长期对峙和战争，百多禄回到法国后，向法王路易十六上奏议，认为如果能在越南建立一个法国殖民地，充分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和地理位置，则无论是在平时抑或战

时，法国都将获得最大的利益。法国政府深为百多禄的说辞所打动，1787 年，法越两国政府签订了《法越凡尔赛条约》，约定法国派兵帮助越南政府平定西山起义，越南政府须割让海岛给法国，并给法国商民在越南经商和居住的种种特权。如果实现了这些条款，将为法国侵略越南提供条件。但是，由于 1789 年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朝不保夕的法国封建王朝没能履行其对越南政府的承诺，百多禄主教只得到几条船和招募一些法国军官便回到了越南，他利用这些人和船在阮氏王朝的复国过程中起了一些作用。1802 年，越南政府终于平定了西山起义，阮福映称嘉隆帝。这个越南君主也愿意看到法国政府不能履行《法越凡尔赛条约》，以免越南要割让土地给法国。

到了 19 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法国的资本主义急剧发展，迫切需要扩大国外市场，对越南的侵略也日益加紧。1847 年 2 月，两艘法国军舰停泊在越南的砚港，并向越南政府递交已译成中文的国书一件。3 月，这两艘法国军舰突然向越南挑衅，越南政府派兵防备，法舰无理袭击砚港，开炮轰击越南船只。1851 年，野心勃勃的拿破仑第三称帝。为了满足法国大资产阶级开辟亚洲市场的要求，他在策划伙同英国组织英法联军、向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和筹备侵略越南的战争。1856 年，一艘法国军舰来泊砚港，向越南政府呈递国书，要求准许法国与越南通商，越南政府调兵防备，法国悍然炮轰砚港台垒。1858 年，法国出动 12 艘军舰驶入越南，开炮轰击越南沿海沿江大小城镇，多次打败前来抵御的越南官军。战争一直延续到 1862 年，屡遭败挫、损兵折将的越南政府派出廷臣与法国谈判，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法越柴棍条约》，越南将南圻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割让给法国，并赔款 400 万元（约合银 280 万

两),还允许法国商民在越南设立教堂传教、开店、通商。1867年,法国又蛮横地出兵攻占越南的永隆、安江、河仙三省,在这六省地方建立起法国的殖民统治,称为"交趾支那",设总督管辖。从此,法国侵略势力打开了越南的国门。1873年,法国殖民势力曾经北犯,但被黑旗军挫败。1882年,经过充分准备的法国殖民势力再次向越南北圻发动进攻。越南是中国的亲密邻国,山水交接,疆界相连,在越南有众多的华侨居住和生活,两国维持着长期的封建宗藩关系。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危及华侨的生命和财产,威胁了中国的边境安全,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警惕和戒备。中国支持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抗法,作为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也对法交涉,中国一步步地卷入法越矛盾之中,最终导致法越战争演变成中法战争。

第一章

中法战前的中越关系

一　山水相连的地域关系

在中法战前，中国东起广东省的钦州，迤西至广西省的南宁、太平、镇安三府，再至云南省的临安、广南、开化三府，都与越南的边境毗连。

关于广东钦州与越南的交界情况，光绪十一至十二年（1885—1886）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因中越两国划界的需要，奉旨派员查阅“史馆官书、部案、公牍、刊本、省、府、县志、知州学官册档印契、越南国王印文、峒长世传有印分单”等档案资料，并密勘沿边形势后，多次奏报清政府，其中尤以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初七日（10月4日）的《辨认钦州老界绘图列证请旨饬办折》为最详尽。大意谓：

广东所属的钦州接壤越南处，有三都八峒地方，曰如昔都、时罗都、贴浪都、如昔峒、时罗峒、贴浪峒、思勒峒、河洲峒、罗浮峒、澌凛峒、古森峒，是三都统八峒，故有称都而不称峒者，要皆历向中国纳赋听讼应试之地。其境北起十万大山，南循丈二河两岸直抵大海，西迄新安州，皆在八峒之内。

但是，由于越南为中国属藩，中外界限稍为浑涵，未经确认，加以地方荒远，地方官未能抚驭周密。故自宋明

以来，思勒、罗浮、河洲、澌凛、古森五峒地方不设关卡，半为安南侵蚀，以致中越地势华离参错，民夷杂处。有既入越界后行数十里复得华界者，有前后皆华界，中间斗入一线名为越界者，有衙署里社尚存华名档案可据者，有钱粮赋税输缴本州列名学册者，有田宅庐墓全属华人并无越民者。其中有十处在中法战争前与越南交界：

分茅岭。在州西南三百六十里，属贴浪都古森峒地，为汉将军马援、唐节度使马总立铜柱之所，铜柱在新安州外。相传山上生茅，南北异向，乃中国与越南分界处。

三不要地。在分茅岭北，连接十万大山，有三村曰白鸡、白鸽、白滩，土名北仑，与越南之河口接壤。

十万大山。在州西北，南循丈二河两岸抵新安州，滨临大海，皆为中国界。

新安江口。在州西南，土人称为先安。其江发源于十万大山，沿丈二河而下入于海。

思舆水西岸潭下、河桧、六虎村一带。均在州西南，思舆水之西，新安河口之东。潭下又名大潭，河桧又名下街，六虎村又名驼六村，属贴浪都，今越人私称为万宁州。其地士子多入钦州学籍及保奖、捐输、议叙职员，累世庐墓在此。

古森港海口。在州西南，距东兴十余里。明嘉靖二十一年，与越南划定疆界，思勒以潭鳞河为界，河洲以芒溪江为界，澌凛以三歧江为界，古森河为界。

澌凛峒三歧海口。在州西南，明嘉靖间收回侵地，澌凛峒以三歧江为界。

芒街。在州西南，与东兴仅隔一小溪，近年越人私称

为海宁州，为萧梁时海宁郡旧址。芒街之北有山名长山，山下有村名长山村，村属罗浮峒，地与松柏隘相接。

江平、黄竹。在州西南，距思勒十里，距防城三十余里，去州城约一日程。江平为钦州安良社地，今犹名安良街。

海面筷子笼、青梅头以南至九头山附近诸岛。在州西南，为大洋中越相接之处。①

广西与越南交界地方，素有"三关百隘"之称。清同光年间，广西军队应邀助剿败退入越的广西农民军，清政府有旨令广西当局绘制广西与越南交界关隘及道路地图呈报。曾任太平知府的徐延旭可能参预其事，事后，他根据图籍记载和亲身勘测，撰写《中越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等文，具体而微地记载了广西边界各个隘卡与越南边界连接的情况。文中指出：当时广西南宁府属之土忠州迁隆峒巡检司；太平府属之土思州、土思陵州、宁明州、明江州、凭祥土州、上下冻土州、龙州厅上龙土巡检、安平土州、龙英土州；镇安府属之下雷土州、归顺州、镇安厅，都有隘卡与越南接壤。具体为：

南宁府迁隆峒有二隘与越南交界。它们是：

剥马隘、柏心隘。按雍正十二年查勘，迁隆峒与越南万宁州，以十万大山下小河南北分界，以渠那隘归越南，而于迁隆添设剥马、柏心二隘。

太平府土思州有四隘十一卡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州东一百二十里的念涕隘，在州东南一百里的驮膺隘及汪巷卡、岜浪卡、上店卡、尴户卡、四风卡，在州东

①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卷一八，第18～19页。

南一百五十里的尴夏卡，在州东南一百七十里的那先卡，在州东南一百九十里的九特卡，在州东南二百里的板吞卡，在州西南一百里的那曾隘，在州西南一百五十里的权相隘，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的同户卡，在州西南一百七里的那雷卡等。

思陵土州有十四隘四卡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州北三十里的隘店隘，在州东二十五里的那支隘，在州东南八十五里的弄丁卡，在州东南一百七十里的辨强隘，在州南二十五里的那当隘，在州南三十里的那河隘，在州南三十里的那窝隘，在州南三十里的那蓬隘，在州南四十五里的亭寨隘，在州南五十里的派衣隘，在州南五十八里的板兰隘，在州南七十七里的板达隘和恭敬卡、板痕卡、康欢卡，在州南九十三里的板邦隘，在州北九十里的叫荒隘，在州西北的峒夏村隘等。

宁明州有十二隘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州南六十里的那肖隘，在州南七十里的板立隘，在州南七十里的板宙隘，在州南七十里的板兰隘，在州西南八十里的板增隘，在州西南八十里的板隙隘，在州西南的东门隘，在州西八十里的罗隘，在州西南八十五里的扣山隘，在州西南八十五里的板龙隘，在州西南一百里的板得隘，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的板漂隘等。

在明江厅上石西土州有七隘一卡和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州东三十五里的新村卡，在州东南三十里的蒙村隘，在州南四十二里的闸门隘，在州西南四十五里的旧村隘，在州西南四十五里的那校隘，在州西三十里的由隘，

在州西六十里的馗门隘等。

在凭祥土州有七隘一关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州西南四十五里的镇南关，在州西南四十里的南关隘，在州南三十七里的坤隆隘，在州西南十里的岜口隘，在州西十五里的绢村隘，在州西三十里的亢英隘，在州北四十里的平公隘等。

在上下冻土州有三隘九卡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州东北三十里的布局隘，在州东北三十一里的陇委隘，在州北三十五里的陇鹤卡，在州北四十里的陇魔卡，在州西北三十二里的更花隘，在州西北三十五里的允怀卡，在州西三十七里的菊呐卡，在州西四十里的荷亮卡，在州西四十五里的界板卡，在州西三十八里的浍刀卡，在州西三十五里的枯城卡，在州西三十里的权里卡等。

在龙州厅有二关一峒十二隘二卡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厅西北九十五里的水口关，在厅西南九十五里的平而关，在厅西南七十里的陇厢隘，在厅西南七十五里的叫更隘，在厅西七十里的那曳隘，在厅西七十里的敢门隘，在厅西七十里的更宜隘，在厅西北九十里的俸村隘，在厅西北一百里的合石隘，在厅西北一百一十里的妙监隘，在厅西北一百三十里的斗奥隘，在厅北一百二十里的陇茗隘，在厅北一百五里的那河隘，在厅北一百十里的淹布隘，在厅西北一百二里的叫钦卡，在厅西北一百二十三里的胡棕卡，在厅西北的罗回峒等。

在上龙土巡检司有十二隘一卡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司西北七十里的陇久隘，在司西北七十五里的苛村

隘，在司南三十七里的那苗隘，在司西六十里的给村隘，在司西北九十里的更賨卡，在司北六十里的鹄村隘，在司北七十里的盎村隘，在司北六十五里的达零隘，在司北六十五里的武德隘，在司北六十五里的供村隘，在司北七十五里的把也隘，在司北八十里的暖寨隘，在司东北的更南隘等。

在安平土州有十隘二洲一峒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州西南三十四里的乙村隘，在州西南四十里的痛村隘、一名痛舍隘，在州西南三十二里的探考隘、一名贪槁隘，在州西南三十里的下淡隘，在州西南三十五里的上淡隘，在州西四十里的三村隘，在州西北四十三里的多烈隘，在州西北五十里的底耽隘，在州西北二十里的兔零隘、一名兔零峒；及在州北的古镫隘，在州西的那营峒、烟陳洲、化隆洲等。

镇安府属的下雷土州有五隘四卡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州东南四十里的下骨隘，在州东南三十五里的更隘及更旁卡，在州南二十五里的孛蒿隘、一名穿岩隘及本村卡，在州南二十里的连隘及陇里卡，在州西南二十五里的陇茈隘及审村卡。

在湖润寨巡检司有一隘三卡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司南二十五里的驮野隘及驮野卡、更费卡、更平卡等。

在归顺州有八隘九卡二汛二峒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州南八十六里的更怀隘及更汉卡、弄普卡、鼓架卡、屯军卡、布透卡，在州南六十里的频洞隘及笃村卡、

壬庄卡，在州南一百二十里的屯隘及打逻卡，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的上勾隘及龙邦汛，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的琴顿隘及琴汛，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的四邦隘及歌巴卡，在州西南一百五十里的荣劳隘，及在州西的禄峒，在州西北的计峒，在州东南八十五里的峨漕隘等。

在小镇安厅有七隘九卡与越南接壤。它们是：

在厅东南一百八十里的平孟隘及弄蓬卡、魁来卡、波利小卡，在厅南一百九十里的峒隆隘及坡脚卡，在厅西南一百八十里的剥念隘及上龙卡，在厅西南一百九十里的上下盖隘，一名勾匡隘及栏杆卡，在厅西南一百八十五里的剥堪隘，在厅西南一百八十五里的柏怀子隘，在厅西南一百九十里的柏怀大隘及那坡村、者赖村、者欣村、打面梁卡等。

综上所述，由南宁府迁隆峒至镇安府小镇安厅，广西入越要道共一百六十四处，袤长一千八百余里。[1]

而据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所奏，称广西南边绵亘2000余里，原设隘所109处，分卡66处，与越南之谅山、高平、宣光相接，又比徐延旭所述要稍多。

在徐延旭的上述著作中，本应谈及云南省隘卡与越南交界情形，但他或因不大了解云南的情况，或因是广西官员，不大关心云南的事情，所以只略略提及："云南临安府之阿迷州左能砦九长官司皆其近界，广南、开化二府亦有接壤处。"方国瑜先生所著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谈及"清季中法交涉界务"问题时称：中法勘界使臣将二千余里之滇越边

---

①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界，分作五段，其第一、二、三段在开化府边境，即从龙膊河入红河处至普梅河岸。划定自河口以东之新店起，经小赌咒河碑亭卡、小麻栗坡牛羊河至绿水河高马白，原来的边界包括有黄树皮、箐门、南丁、老寨、大年、孟康等处。在广南府的东南边，有郎海卡、麻娄卡接界越南保乐州；西边有南利卡、蔑弄卡等与越南接界；南边则有三蓬地之争，后法使将苗塘子、龙潭、龙膊、田蓬街、沙人寨五处划入滇界。结果开化府收复旧壤之南丹、猛峒，而临安府失去猛梭、猛赖、猛蚌一大片地①。

据王士录主编的《当代越南》一书第十章《云南与越南》可知，中越边境云南段中方一侧紧连边界的是文山州的富宁、麻栗坡和马关等县，红河州的河口、金平、绿春等县及思茅专区的江城县。越方一侧是文山州对面越南河江省的苗旺、同文、安明、官坝、渭川、黄树皮、箐门以及老街省的北河等县，红河州对面越南老街省的孟康、坝洒以及莱州省的封土、新河、孟谍等县（孟谍县部分与思茅地区的江城县交界）。其中，文山州富宁县田蓬乡到同文县城只有 13 公里的驮运路；麻栗坡县的八布到官坝 31 公里，该县的董干镇到同文县的隆花 10 公里，船头到越南的清水镇只不过五公里；马关县的都龙到黄树皮县城为 28 公里驮运路，该县的小坝子与新马街镇相距 20 公里，到孟康县的坝哈 16 公里；河口县城与老街市仅隔一条红河，桥上距离 1 公里；金平县金水河镇至莱州省巴南棍镇也只 1 公里②。

①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版，第 1300～1304 页。

② 王士录主编：《当代越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疆界相接既多，来往道路自然也就不少。除小路不计外，从广西往越南的大道有三条，它们是：一条从太平府凭祥土州人，由南关隘历越南的文渊州坡迭驿，又经脱朗州北，一日至谅山；一条由太平府思陵土州过辨强隘，一日至越南禄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到谅山；一条由龙州人，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越南七渊州。由广东省到越南多是海道，从东兴过河即为芒街；也可自钦州南大海扬帆，一日至西南岸潮阳镇；又可自廉州冠山前海发舟，北风顺利，一二日可抵海东府。从云南省到越南的大道有两条：一条由蒙自经莲花滩人程澜洞，循洮江右岸过水尾、文盘镇、安夏、华清波诸州县，凡27日至临洮府；另一条由河阳隘循洮江源左岸，过平源、福安、宣江、端雄诸府州县，凡23日至富良江。然皆山径，欹侧难行，若循洮江右岸人乃大道也①。

对于中越交界的隘卡，中国方面管理得较严。乾隆年间，两广总督马尔泰曾奏报管理广西边境隘卡的情况说：

> 广西省逼近交趾，所设关隘，或据险要，或扼总路，或于商民出入贸易之所设立。或令官弁兼同土勇防范巡查，即间隙散漫之处，已俱垒石建栅；或由各土司等自设隘目，带土勇巡查；应行捍蔽之所，木石堵塞，已为详慎。至建卡拨守尚未周密之处，应令各该地方官相其险易，及时增培，每年冬月沿边查勘一次，垒石坍塌者修之，建栅朽者补之，濠沟淤积者浚之。至于边民出入较多的隘口，则管理得更为严密。如由村一隘，原来题定封禁，后因交趾驱騾地方为货物聚集之所，距由隘不远，径

①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捷利倍，商贩多愿从由口出入；即明江五十三寨无业贫民挑担营生，亦借就近为商雇榷。由隘一开，诚属便商利民。查宁明州向置会馆，设立客长，以为由隘出入之公所，应令该州慎选老成殷实数人充当。凡客货出隘，许客长将客人姓名、住址，造册取结，给予印票，令在理土同知于该隘查明印票，给腰牌放行。有腰牌印票者，方许放入，其入关客人姓名、从何处卖货入内，令该同知注册，报宁明州查对。其平而、水口两关俱属河道，除设弁兵防守，还应设立铁练横江拦截，每月逢五逢十开放，夜则锁截。[1]

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光绪初年。光绪四年（1878 年）十月十五日，军机处交出两广总督刘坤一钞片称：内地商民前赴越南贸易，定例从广西省平而、水口两关水路出口，龙州同知查验给予腰牌；其由村隘旱路出口者，明江同知换给……凡由钦州前往越南界内之民人，应由钦州确切查明，印给牌票。[2]

至于越南方面，对中越交界关隘的管理则较松。虽然在纸面上，越南政府也强调："封疆之安，各有界限，从前典例已严……该国差官及商旅来往我境者，仍由我官吏盘查，确有路票、信牌方准放行，勿许非人阑入。事关边徼，慎勿如前疏忽取戾。"[3] 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中法战争结束后，因两国划界的需要，越南政府要了解中越疆界的交接情况，这才发现："从前应有限界确在何处，国史罕存，见闻亦寡。"即使悬赏征求，亦"未有应者"，以致叹道："夫封域山川亦为博物之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六，第 3～6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78 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第 5～6 页。

学，重洋万里，人思访求，矧在吾邦域而乃存而不论，而不辨想，非徒为人所深浅也。"[1]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越南政府于1886年九月命"为人沉潜，学亦稍博"的光禄寺卿领吏部侍郎黄有秤组织人力，调查边境关隘情况，撰修本国疆界汇编一书。十一月，黄有秤拟上是书凡例12条。又过了一年半，黄有秤于1888年奏报疆界汇编书成，凡七卷并图一幅。为此，黄有秤得实授吏部侍郎衔署左参知，寻准充国史馆纂修[2]。既然连疆界的情况都不甚了了，严格管理就更无从说起了。早在乾隆年间，清朝官吏就曾有奏指出："安南列在藩服，不敢设险自固。"这种情形到中法战争前夕仍无多大的改变。光绪年间，越南国王有函致清政府称："从前中外一家，人民往来居行相习，何曾防禁。"1871年秋九月，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等奏称："原前沿边关隘，各设屯堡，所以诘奸也。嗣以堡兵多病，而边陲无事，故量行撤减。"建议加强边境管理："于应听其往来者设立屯堡，就近来堡兵设堡目，量给月饷，使之长住更守，凡径过，不拘清土，须有引票方许通行。"[3] 但是，直到8年以后，这件事似乎还停留在书面讨论上。

中越边境这样山水相连，疆界交接，当法国侵略势力吞并全越后，势必危及我国西南边疆的安全，从而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警惕和戒备。

二　血缘相通的民族关系

由于山水相连，疆界交接，这就为中越两国边民的来往提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八，第5～6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五、第9页，卷六、第41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五，第12页。

供了便利。乾隆年间，广西官员奏称："粤西南境，地接交夷，土苗杂处，各边禁隘口，时有夷匪汉奸潜出窜入。屡经设法查禁，而奸民出人如故。盖因商民出口贸易，并庸工觅食，俱乐隘口出入近便，又多娶有夷妇，留恋往来，是以偷渡不能禁止。"① 虽然这封奏折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把往来的边民诬蔑为"奸民"，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越两国人民往来频繁的情况。

我们知道，宋代以前，越南是在中国版图之内，人民的来往自然没有什么阻禁。据戴可来、于向东主编的《越南》一书所载：占今天越南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岱依族，就和中国的壮族同源于古代百越中的西瓯、雒越，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越南的泰族是从中国西南地区迁来，与中国云南省的傣族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和共同的民族特点；越南的侬族，多是在 10 世纪前后由中国广西迁来，与中国左右江一带壮族的"布侬"是同一支系；越南的热依族原为布依族的一支，18 世纪中叶由中国云贵高原迁入；越南的卢族都来自中国的西双版纳；越南的布依族是在 10 世纪中叶，从中国贵州迁来；越南的赫蒙族的祖先最早居住在中国南方的洞庭湖地区，与中国苗族同源，17 世纪后陆续从中国贵州、广西、云南迁来；越南的瑶族与中国的瑶族同源，其祖先系从中国西南地区陆续迁过来，迁徙时间延续近千年；越南的巴天族来自中国；越南的哈尼族的祖先是从中国云南迁来的；越南的拉枯族祖籍也是中国云南省；越南的倮倮族原迁自中国云南，与中国彝族为同一民族；越南的艾族祖籍广西防城五洞；越南的山由族大约 17 世纪末才从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〇二，第 21 页。

中国迁入越南；越南的华族则从秦汉以来不断由中国迁人；越南的拉基族的龙姓是中国依人的后裔，王姓也是汉族后裔；越南的仡佬族起源于中国贵州省的仡佬族等①。越南于宋代独立建国后，就开始有中国人民移居越南的历史记载。促成这种移民的原因很多，有被迫而去的：如因两国发生边境纠纷或战争，而被越军掳掠回国；或被人贩子拐卖入越；或因中国国内政权更替、起义失败或逃避政治迫害而亡命越南；也有因征战不归而流落越南的。当然，也不乏自愿入越的，如庸工觅食、商贩居留、异国通婚以及少数民族迁徙等。在这些入越的移民中，不免会有盗匪窜扰，甚至一些强梁豪杰纠众入越称王称霸争抢地盘的。这种移民浪潮时断时续，时大时小，一直延续到中法战争前夕，又出现一次开始于同治五、六年（1867—1868年），广西近边各地数以万计的农民起义军，因为遭到清朝大军的围攻追剿，被迫追随吴亚终、黄崇英、刘永福等头领败退入越，迄止于光绪四年（1878年），清将李扬才纠众反叛入越的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浪潮的人数众多、涉及面广、时间漫长、规模也大，对于越南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些广西移民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入越后主动投靠越南政府，在越南平定内乱、抵御外侮中建功立业，如刘永福及其所率黑旗军等，因而为越南政府容留信用，甚至授予官职，划地屯军；一类是入越后，招降纳叛，攻城据地，成为对抗越南政府的异己力量，如吴亚终、黄崇英、李扬才之俦，从而遭受中越两国官军的追剿；再一类则是一般的起义群众、难

① 戴可来、于向东主编：《越南》。

民、游勇，他们或是在越南短期逗留，或是最终入籍越南，而其共同特征是并不威胁到越南政府的统治，因而越南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也比较宽容，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妥善的处理。前两类人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将在别的章节里给予详细的论述，这里主要谈谈第三类人的情况。

这第三类人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形势所迫，只是暂时亡命异邦，却无意长期在越南定居，一有机会就要设法返回中国；一种是入越后，找到了新的生活道路或生活方式，因而愿意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在越南安居乐业、入籍落户，从而融入越南社会中，成为其中的成员。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越南政府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理。

对于那些无意在越南长期定居的一般起义群众、难民和游勇，越南政府只要一有机会，都会千方百计地将他们遣返中国。1869年，广西提督冯子材应越南政府之邀率领桂军入越助剿吴亚终等部。越南政府便派员多次和他商议遣返一般的起义群众及难民事宜。越南史书记称："初，冯帅招降诸匪，帝命武仲平商说，回辕之日，必尽带以归，勿遗我边患。"[①] 这年八月，"山太诸匪党相率向清国营官军门投降，凡一万余人。令三次臣照据现情，会商紧办。复令武仲平商提督冯子材，遍饬诸降匪，尽还原掠我民人产。"[②] "邓志雄（即邓挽）与农雄硕相攻，命段寿、武仲平商提督冯子材尽遣回国。"[③] 逗留在越南陆岸一带的农民军头目黄筒、陈晚率领千余人向冯子材请降，越南国王谕地方官武仲平随宜处理，并商冯帅饬回免碍，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三，第4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一，第22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一，第26页。

其已降愿回贯者给米一方，钱二缗。九月，难民陈来纠合同帮多人向冯子材请求随军参战，冯子材给他们盐银，“饬从征剿”。武仲平奏请越南政府给这些人月粮，越南政府答应了，但要“事平即将该等回唐免碍”。十月，宣光省赞理陈廷肃、阮廷诗联名奏报越南政府，建议趁此机会将占据保胜的刘永福黑旗军遣返中国，以便收回保胜：“保胜财富可居之地，刘永福党伴类皆犷悍难制，去年径往兴辖与何均昌争居，邀征商税，只欲据此为巢穴。将来基址已成，谅亦难于禁遏。请由山次总统山督阮伯仪商与子材，早饬回唐，庶乎边务可舒而边民获蒙其福矣。”[①] 翌年十月，越南政府派贡使赴中国，机密院臣拟撰问答辞时，还特别提到此事：“广西提督冯大人遵旨赴越追剿，本国亦派师会办。吴亚终巨伙已剿绝，而该余党如黄文英、苏国汉、刘永福、邓挽等辈，尚尔反复不常。曾承冯提督说谓何日还师，并将该等尽数带回。又差官分往催说饬遣回，使无遗碍。”

越南政府虽然希望早日将上述广西移民遣返中国，但基本上是根据对方的自愿，而避免使用强迫的手段。因为清政府对待这些“回唐”群众是比较严厉的：“如果真心悔罪，自拔来归，即饬令交界地方各官妥为收抚，不准携带军器……并饬各本籍地方官严加管束，勿令滋生事端。”[②] 因此，如果对方不愿遣返，越南政府也就暂且放在一边，不作进一步的催促。如农民军头领张觐邦，入越之初曾向越南政府乞降，被安置在高平，但在1867年三月又跟随吴亚终重新起事。年底，他又靠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一，第27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三六六，第4页。

扰越南政府，“降匪张覲邦复回高平，省臣请许留居生理，令随宜处置，以免碍，许之”①，并给钱6000缗。第二年底，张覲邦遂乞率团回中国。对待刘永福也是如此，“团目刘永福回唐惧诛；请留保胜营生，寻复请从官军剿匪”②。越南政府也答应了他的要求，允许刘永福和黑旗军居留在保胜。

由于越南政府采取了这种宽容的容留政策，因此滞留在越南北圻的入越广西农民军余部和难民，除黑旗军外还有相当的数量，并且吸引了一些应邀入越助剿后被裁撤的士兵加入他们的行列，“原随冯提散遣卒无所依归，亦多附伙，实繁有徒”③。这些人的一般结局是在北圻游荡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寻找各种机会返回中国，在此期间，他们难免不会做出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来。越南国王在因李杨才之乱向中国请援的告急文书中，曾提到这点：“中国荒徼游民侵扰臣国，千百为群，所至残害，公私财产，荡然一空……游棍哨勇，惯熟路程，在者盘据难除，来者串通难遏。”④

等到光绪八年（1882年）清军入越筹备抗法时，其中部分人就应募投入清军营中。如，同年四月，桂军统领黄桂兰向广西巡抚倪文蔚禀称：陆续招募入越农军头目苏二、李逢春、李七即李春发、陈大即陈世华、黄大即黄大忠、玉三即玉锡品等，各率党与悔过归诚，综计共有五百余人，拟请准予编伍给饷。倪文蔚批准黄桂兰汰留精壮编为一营，附入左路防军。俟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七，第41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三，第5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三，第18页。
④ 《中法战争》(1)，第160～161页。

续次招抚农军降众，许再增置一营，由黄桂兰推诚抚用[①]。翌年底，又陆续有农民军余部来营投效。赵沃曾报告广西巡抚徐延旭：有赵二、覃志成之降众可有200名之间，又婆湾狗头山之李从等近千人，若辈均属亡命之徒，“待其来齐，点验成营，较胜于另招者多多矣”[②]。徐延旭批准从这些人中挑选一千余人入营；法人驱逐海口九头山党众，其头目李应光、李福良、李润、高岳嵩等率八九百人自拔来归。于是两统领饬李应光、李福良、李润、高岳嵩、陈世华、覃志成等，各挑募健勇200人，作为半营，分委该六弁管带，并准游击李群、王祚球等共募亲兵100人，于十二月成军[③]。

随着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流落各地的散兵游勇听闻消息后，也纷纷来营投效。在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赵沃就向徐延旭报称：有旧日营勇潘贵胜约700人，又陈天宋等约500人，汰去老弱可成两营。延至十月底，徐延旭才就此事奏称：光绪六年关外剿办苗匪叛匪，事竣裁撤勇营，有新秀营哨长六品军功陈天宋逗留关外，现携其丁口270余人到北宁行营候示，赵沃当即挑留200人，作为锐字半营[④]。这些人后来跟随清军作战，战后大部分随军撤退回国。

对于那些愿意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在越南安居乐业、入籍落户的一般起义群众、难民，以及商贩庸工、农民渔夫，越南政府则采取欢迎的态度，给予他们合法的居留权利，其中部分人在开垦荒地时还得到越南政府酌助生产资本。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392页。

② 《中法战争》(2)，第355页。

③ 《中法战争》(5)，第373～374页。

④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25～26页。

1867年，入越广西农民军头领邓志雄等向越南太原地方官乞降，省臣阮有恬请酌给钱粮，立条约，量分插，俟成基址，登籍受视，许之。另一农民军头目苏国汉率部千余人向谅平地方官乞降，抚臣郑履亨以其情辞恭顺，请宽免前罪，给散党银1200两遣回，愿留者给六月粮，量地分插。后来将愿留的400人，分别安插入北谅的陆岸、安博等地，帝许之。第二年春，太原次臣范芝香条奏区处降匪事宜，言周祥麟、邓挽等真心向首，请假以八品百户衔，给予资本，以便开矿垦田。帝曰：降党现在多丁（三百余名）须量行分插，勿使蚁聚，并明立条约，要他出力遏绝外匪。十一月，越南政府给北边诸降人公本银。降人赵福案、赵福桢、隆恩拔现数140人，给公本银500两；吴英、黎成美团丁共800人，给公本银2600两。同治十一年（1873年）春正月，北圻统督黄佐炎奏称：邓志雄归顺察属真心，请许职衔（从八品百户），并给散丁公本银（散丁1000两，公本4000两），插居九所（银山、野市、那宥、凭扣、福山、白通、通化、外铺）随便生理，许之。第二年春正月，越南政府指示地方官处理侨居广安海宁地分的钦州流民："良者许留雇度，不良逐回原籍。[①]"春三月，命通饬诸地方，嗣凡清国平民有愿留居者，多则由帮长记册给票，少则由里长认实别悬。以清人侨寓，额籍不明故也[②]。又因居住在广安海宁府辖潭河、河桧、马斯、大田等处的中国流民未有一齐就抚，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领督范富庶命李文进往，以利害晓谕之，流民各撤垒开棚受税"[③]。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六、第4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〇，第4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九，第19页。

甚至当攻剿入越广西农军不奏效，越南政府被迫改剿为抚时，对吴亚终、黄崇英等部也一度采取容留政策。如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黄崇英等乞降。“帝曰：该等乞降，虽未分真假，第察似异吴党，应从权酌给善用之，并与原降插苏四、邓挽、文山、永福等给抚之，令往剿吴党。”十二月，谅平军次段寿、钦差武仲平因屡剿不效，奏言吴亚终“现情拟应权抚”，越南政府表示可以考虑：“该匪前在清国，冯提督以数万甲兵，三四年间才收归顺。复失凭祥，今又于上雷滋扰。始次臣范芝香亲率六千兵勇助剿，又有清国营弁，而得一洛阳，又陷富庶（绣山）。盖彼虽奔溃，而徒党尚有万余，均系途穷恶战，况沿边一带，半步皆山，鼠伏狐潜，路径四出，纵有数万之师，其势亦难一网牵延。”于是，“原次臣范芝香引吴鲲抵军门谒首（谅城门外），谅次臣段寿、钦差臣武仲平等受之，给银一万两。匪团纳回芃封铺，率丁回高平候插。”越南政府为此指示边臣：“仍责令约束，得他使之，永遵法度，在我边疆相安无事。而该党亦不回本处扰掠，使清国无得执辞曲我。”[①]虽然，由于清兵的继续追剿和并非真心投降等原因，吴亚终、黄崇英等很快又重新起事，但也说明越南政府的容留政策还是比较宽大的。

显然，越南政府的上述政策，必将促使众多的中国移民或长或短地在越南北圻居留下来，其中部分还逐渐入籍落户，成为旅越华侨的组成部分。当法军侵犯越南北圻时，就必然会危及中国侨民的安危，引起中越民众的同仇敌忾，共同抗法。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九，第52～54页。

三　唇齿相依的宗藩关系

我们知道，越南原在中国版图之内，到宋朝才独立。在越南丁氏王朝立国之初，就向中国政府表示，愿为中国的藩属国，从此开始中越之间长达九百余年的封建宗藩关系。以后，虽然中越之间也有过矛盾甚至战争，但中越宗藩关系基本维持下来。在中越宗藩关系中，由于宗主国控制了藩属国的册封大权，还要对方定期朝贡、觐见，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在国与国关系中的反映。藩属国的统治者则需要得到宗主国的册封，才在臣民面前取得合法地位；当藩属国受到内部或外部的敌人侵扰时，宗主国有义务给予援救，所以，藩属国的君主也依靠宗主国来确立和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中越封建宗藩关系能够长期存在，与两国统治者的切身利益有关，并非靠暴力来维持。

1884 年 2 月 9 日的《申报》曾载文谈清政府与藩属国的关系称：

中国之待属国，于册封之礼极其郑重。嗣君初立，朝廷遣正副使二员赍册书以往，入境之后，国王恭迎跪受宣读，一切典礼皆极尊严。既而送使臣于客馆，筵宴犒赏悉如例以行。事毕而回，国王随又上表称谢。自是岁时贡献，皆遣其国大臣来，而国王并不亲朝；国家喜庆之事，亦概免其入京朝贺；此则大国字小之道，以道路行远，供亿烦费，故示体恤而不嫌其怠慢者也。至于贡献之期，亦非每岁皆有，或间岁而贡，或三年而贡，或五年七年十年而一贡，则又因其国小而弱，地瘠民贫，物力艰难，不宝远方之货也。观其踪迹，殊为疏阔，然名分既定，世世勿

渝，兢兢焉奉正朔，尊王制，无有二心。至其国中政事，则大国勿过问焉。盖风俗不同，且立国已久，相沿成习，不欲强以所难也。两国商民往来贸易，例所不禁，然接壤之处，岁定稽察之期，恐有两国奸民越界滋事，必由边境统兵大员，会同属国地方文武，巡哨一次，界划如此其严，两国人民所以相安无事。要之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以恩义诚意羁縻之而维系之而已。[①]

中越宗藩关系主要表现在册封和朝贡二事上。

所谓册封，即藩属国的每一位新君主即位，都需要得到宗主国的认可和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清朝取代明朝之始，越南黎氏王朝就主动送回明政府所赐敕印，要求清政府给予新的册封，由康熙帝改封为安南国王。乾隆年间，阮光平推翻黎氏王朝，建立旧阮王朝，仍须由清政府赐封为安南国王。嘉庆年间，阮福映建立新阮王朝，仍援旧例向清政府请封，嘉庆帝封他为越南国王，越南的得名自此起。以后历任越南国王都向中国请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在中法战争期间，虽然越南政府已经被法国殖民者所控制，但越南新王继位后仍循例向中国请求册封。

所谓朝贡，是藩属国还须定期向宗主国朝贡。在清初，越南对中国是三年一贡；乾隆五十一年后改为两年一贡，四年两贡；光绪初年又改为四年一贡。由于广西爆发近边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贡道堵塞，从 1853 年起，越南一度停贡，直到 1869 年才恢复向中国派遣贡使。到中法战争前夕，越南曾五次朝贡中国：1869 年的贡使团，以署清化布政使、实授翰林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申报》。

院直学士黎峻充正使，鸿胪寺少卿办理户部、升授鸿胪寺卿阮思僩充甲副使，兵部郎中改授侍读学士黄并充乙副使；1872年的贡使团，由署工部右侍郎兼管翰林院阮有立充正使，光禄寺少卿办理刑部事务范熙亮充甲副使，侍讲领按察使陈文准充乙副使；1875年的贡使团，由署广义布政使潘仕俶改署礼部右侍郎充正使，侍读领河静管道何文并升授侍讲学士、员外郎领户部郎中阮修改鸿胪寺少卿充甲乙副使；1877年的贡使团，以光禄寺卿充办阁务裴殷年加礼部右侍郎衔充正使，鸿胪寺卿林宏充甲副使、侍讲学士黎吉充乙副使；1881年的贡使团，以吏部右侍郎充办阁务阮述改授礼部衔充正使，侍读学士充史馆纂修陈庆洊改授鸿胪寺卿、兵部郎中阮欢改授侍读学士充甲乙副使。

按规定，越南贡使赴北京须取道广西，这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时代，算得上是一件惊官动府的大事。由于路途遥远，需时漫长，因此，在贡期的前一年，广西左江道就预详督抚，檄传越南国王问取贡使入关日期，国王乃遣使并通事赍夹板公文投递左江道衙门。届期使臣恭递贡物至坡迭驿，向龙凭关都司具报。左江道即移驻太平府示日开关，而新太副将先领官兵列队关上及把守隘口。左江道于启关前三日，率南宁、太平知府至宁明驻扎，次日至受降城，又次日至幕府营，由幕府营至关十里。是夜，四更后发号鼓三通，各土司兵马齐集，护卫龙亭前至昭德台，左江道委官祭关门土神。事毕，龙凭都司禀领钥匙，擂鼓放炮，唱开关，发皇令旗三面，出关唤领事引越使恭捧表文及贡物入关，叩谒龙亭，其关外越人并罗拜。事毕，左江道与各官送龙亭旋升昭德台，越使叩谒，乃开柜验明贡物，封讫。左江道以花币赏入京进贡越官，次赏护贡回国越

从，以牛酒犒赏越官越从与汉土官兵。凡进贡越官越从共 21 人，正使陪臣一人，赏镀金银花一对，重二两，大红云缎一端；副使陪臣二人，各赏镀金银花一对，重一两六钱，各大红云缎一端；通事官一人，赏银花一对，重一两二钱，大红云缎半端；行人四人，各赏银牌一面，重八钱，各红布一匹；从人 13 人，各赏银牌一面，重五钱，各红布半匹；其护贡之越官越从受赏出关，仍擂鼓放炮唱开关，龙凭关都司督守关门及各处隘口，三日后方撤。其贡使表文越官越从名数，申报督抚并檄押贡文武各人，由思明登舟，逐程交替至桂林，令广西巡抚填给勘合，再由湖广、江西、山东等处水路进京，途中可能需要四个月。至贡事已毕，贡使回国时，则由礼部题议差司宾序班伴送至广西，广西巡抚照例遣官伴送太平知府，启关验放。回国仪式仍照前接贡之例举行，文渊州越官具收领印结，通报督抚司道查考①。

越南贡使进京，沿途及到京后免不了和中国官员接触，这其中的情形又如何呢?

周一良先生在《关于王文韶的日记》一文中，谈到王文韶在任湖北布政使时，曾接待过路经武昌的越南贡使：

越南贡使到省……差内通事持红禀来拜，上书：越南

越南（?）国陪臣某某拜　　禀　天朝湖北承宣布政使司王大人阁下斗照：兹者天阊远叩，汉水初经，黄鹤楼高，不隔秦川之树；红莲幕启，愿依君子之风。向若非遥，登门为幸。共八行。向例使臣到岸，督抚以下均差人持帖出城慰劳，帖长一尺四五寸，中书天朝某某大夫某官

① 参看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六四，经政一四。

某人拜。

翌日，两院赐越南贡使宴，在南院设席，督抚正坐，司道府旁坐，再下设使臣座三，东一西二，均用矮座。督抚升堂后，导引官带同贡使自东角门进门。至则在头门外官厅少候，隶报门曰：越南贡使进。由东月台历阶至堂檐下，行一跪三叩首礼，督抚起立举手。礼毕，分两旁向上立，督抚传通事至前，令向使臣问国王好。通事传语，跪禀答讫。次问年岁好，次问一路辛苦否，均由通事传语，跪答。慰劳毕，即命入宴，仪门内演戏。通事持国帖具礼呈两院，均璧不受。戏三易，使臣起立谢宴，行一跪三叩首礼。导行官由两月台下带出仪门回外官厅，自使臣以上给赏有差。①

从以上情形看来，越南贡使路过各省所受接待，多为礼仪往来性质，而无甚实际内容。

贡使到北京后，自有一番逗留。期间，除了和礼部及有关接待官员接触外，大概也允许和其他一些官员及来贡国使臣来往。交际中免不了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有选择地进行通报和讨论。如 1872 年的贡使团启程前，越南国王就命机密院臣为贡使代拟与清政府的问答辞授之，内容包括广西官军入越援剿及法人动静等情况。

辞凡三条：

一、使臣过关后，凡途经诸省及抵燕京，省臣部臣如有问及我国处置洋人事宜，答云：本国与富浪沙言语文字不同，未曾通问。年前节次该国火船投来本国之广南省沱

① 《读书》，1993 年第 5 期，第 25～26 页。

瀼汛，投书声言愿得弛禁通商，而辞多欠雅，汛员不敢认受，遂执以为嫌，不行通说明白，遽将兵船前来惹事，本国不得以应之。富人退据嘉定、边和、定祥三省，以致三四年间，兵革不休。本国不忍兵民之苦，因该国曾遣人讲和，本国亦权与之定约，盖出于不得已。寻复请兼管以南永隆、安江、河仙三省，本国专守旧约，该用计袭取，本国不与兵争。现方寄书该国长申说疆事，未经答复清妥。昨接该国帅报叙，普鲁士现与该国交攻。又接报叙，普国兵多，该国与战，再三败北，该国长那铺离翁被擒，各座军民立一会同局共图治道，保守国家，普国人现谋攻该国都玻璃城等情，外间探访亦多略同。但本国前经与该国交好，今亦照常吊唁，不忍乘危使他自悔，以全邻谊。

一、使臣经过清国各府县道省及抵燕京，有问及我边事者，宜答云：本国沿边诸省辖，向前多有内地人民投来居住生理，十余年来，各有招引徒党，曾为小小劫掠，贻害边氓。近来，逆匪吴亚终挈党蔓逸滋扰，不肖之徒处处线起，沿边之广安、谅山、高平、太原、宣光、兴化等省辖土民，或被扰掠，罹锋镝，情形更加切害。嗣广西提督冯大人遵旨越境追剿，本国亦派师会办，吴亚终巨伙虽已剿绝，而该余党如黄文英、苏国汉、刘永福、邓挽等，尚尔反复不常。曾承冯提督说谓，何日还师，并将该等尽数带回。又差官分往催饬遣回，使无遗碍。乃冯提督以内地军务急于回轺，而差官不过徒说，无奈他何。致该匪等尚恋故巢，惯为匪逆，引党伺扰，边民苦之。原随冯提散遣卒无所依归，亦多附伙，实繁有徒。本国现方派兵分剿，并咨呈广东、广西督抚大人，饬下边吏善为防抚如何，俾

边氛一律靖帖，而下国边民赖得永安。或有问及冯提督此次越剿事状者，略答云：有心助剿，为德未终，大略而已。余宜以不得详知答之，庶为浑安。又如抵广西与燕京，应预草使臣禀文，尽述我边苦，说禀该抚，乞商与东督严办，禀部乞为之题达，俾得旨严饬诸边吏行，如何明正永帖。

一、在使馆，如遇高丽、日本、琉球使臣，初见宜以同文之谊往来谈叙，以探其情。如该各使臣果有厌洋真情，说及这款，宜历叙始末和款，以答清国官员者略同，仍申说云：西洋诸国专以合纵为计，侵轶我东方诸国，多被其毒。本国与诸贵国均系同评论，而地势远隔，其所以自强自治之策，请私与执事商之等，大意以观其言论如何，仍记之。另随宜答复，不可深言，免贻别碍。向上各款仿拟如此酬答，如无提及则止。就中话及洋事涉密者，倘何处有要写出言语，小简即宜收置，不可留遗片文只字，或致传播，以防别碍。余常事应随事善答，勿张勿屈是可，倘有不必答者，则曰不知，略而过之，以合使体。越南国王并谕使臣曰：专对之责，国体攸关，宜同心协虑，以济实事。[1]

1875年的贡使团出发前，越南国王记挂广西派兵助剿入越广西农民军一事，“兹因岁贡，以国书问明刘、冯实办何而，似该提抚有碍奏禀，不敢进不敢奏，则本国历陈交使达。乃命修北边疆事表文交仕俶等递奏清帝”[2]。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三，第19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八，第8页。

贡使返越后，越南君臣也会问及中国君相和一些督抚的情况。如1876年底，贡使团返回，越南国王召见潘仕俶，询问清国处置诸洋及同治政事、官吏得失如何、其势盛否？仕俶对曰：

清国之于洋人也，分地居之（汉阳镇外洋人所居，有立石碑，刻大英广隆地界），列铺聚之（所在各竖旗号为别）。湖北总督李瀚章为通商大臣，通其往来。正定府城有道堂在城内，燕京亦然，士夫不闻有横议。识者或有谓：今同治春秋未盛，兼以数十年来兵疲财绌，姑且曲为回护，近已敕下军机，修辑剿平方略。江苏又开巧局，诸省令习洋枪，各刻刻自励。至如处置该洋在军机处，臣等不得而闻也。同治亲政以来，政事则一遵成典，专用旧臣。官吏则自咸丰以来，仕途搀杂，贪冗多而民生日促，捐纳为之弊也。问之诸省督。则直隶之李鸿章、陕甘之左尊堂（宗棠），皆为儒将；湖广之李瀚章，则沉静有机略；广西巡抚刘长佑，则严重而知行阵；与兵部之单懋谦、礼部之万青藜，皆为名臣。又闻甘肃匪害经十余年，专由左尊堂（宗棠）筹办，去冬肃清。现下四方无事，且臣等行程一路观其大势，及在燕见诸日报，大略国用稍绌，而兵力尚强。至如大事在军机处，臣不得而闻也。①

1877年的贡使团回国后，越南国王召见裴殷年等，问曰：清国主少，又政出宫闱，不知所行如何，国内亦得安帖？裴殷年奏言：内有恭亲王和硕辅政，外则诸总督亦多能臣，国内安宁，盖由于此也。后来，越南国王还有批问多款，裴殷年另密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二，第33～35页。

片覆[①]。

又如广西籍的唐景崧，长期以吏部候补主事身份在京，他关心家乡，唯恐法军吞并全越会危及广西的安全，有意在联越抗法一事有所作为。当 1881 年越南贡使阮述进京时，他就设法接触阮述，了解越南抗法情形。后来，他上奏朝廷称："越南贡使到京，臣就询情势：谓澜沧一江，法人志在必得，为进规云南计。赖刘永福驻军保胜，而夷船不敢肆行。去岁法人屡胁越南撤刘永福入富春。越君臣穷守富春，意在乞和。而劫制过甚，势难遽从，即乞救天朝之章，亦不敢骤进，恐漏泄愈遭毒虐，惟仗刘永福一军遥峙声援，苟延旦夕。法人欲割其山西、兴化、宣光等省，则以地近云南、广西故也。奸民四出，密探内境，募诸不逞，集有千人；又招贼党陆之平、覃四棣等，幸皆拒之。此越南蒙难以后之情形也。"[②]

按规定，越南贡使往返途中必须从广西出入，接触最多的自然是广西的各级官员，相互之间共同关心的事情更多，沟通了解要较他省及至中央的官员更为便利和迫切。如同光年间曾任广西巡抚的刘长佑，闻知刘永福的抗法业绩后，"越使过广西时，长佑曾嘱其用永福以拒贼"[③]。光绪八年（1882 年）正月，越南贡使阮述在返程时路过广西，广西巡抚庆裕饬令暂为休息，并在接见待茶时，将阮述传进内署笔谈。庆裕向阮述通报法国侵越阴谋及中国援越抗法的部署，"告以法人诡谲性成，现接边报，无端添派兵船至越，居心叵测，不可不防。西省已饬统领边防各营黄提督酌派营勇出关，分布扼扎，为未雨绸缪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三，第 41 页。
② 《中法战争》(2)，第 42 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05 页。

之计。越国亦宜早图自强，勿堕法人术中，该使臣深以为然。奴才当令迅速回国，转达该国王，熟思审处，防患于未然，以保境土，尤宜诸臻慎密，勿露其机，致法人得以借口，遽生变故。该使臣领悟而去"①。

四　中国军队五次入越援剿

由于中国与越南有着上述特殊的关系，于是，就发生了中法战前中国军队五次入越援剿事。

同治六年（1867年），广西农民军首领吴亚终在清军的追剿下，率众败退入越，占踞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宣光等地，势力复张。越南政府虽然很快就派出官军前去追剿，但却是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次年二月，吴亚终等部袭破高平省城，执布政使阮文伟；三月，扰谅山，败领兵官阮文亥；六月，于诃护社毙北宁按察使尊室番、副管奇潘文延；七月，于谅山省结山屯杀署参知充参赞阮劢、领兵充副提督阮日成，虏统督范芝香。

被吴亚终等部的攻势弄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的越南政府，只得向清政府告急求援。关于此事，越南史书只写成是北圻地方官向广西官府请援：同治七年（1868年）春正月，"兵部请由北督兼知谅平范芝香量派太次弁兵往谅山截剿，仍咨广西提督夹攻，庶得一举清夷"。越南政府遂于二月指示范芝香："可邀清国官兵速会剿收复。"② 四月，仍谕令统督范芝香咨会清国官兵协剿。五月，"股匪扰谅山，命谅山省臣咨请广西太

① 《中法战争》（5），第101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4～12页。

平府会剿"[1]。但是，中国方面的记载，则认为出面向中国告急请援的是越南政府。如徐延旭在《越南世系沿革》一书中指出：同治七年春，越南国王"咨乞广西巡抚苏凤文代奏，请兵援救。上命提督冯子材率三十营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员名进攻"[2]。徐延旭在这里可能记错了时间，因为清政府迟至这年的十月，才有旨提及越南国王告急请援事："苏凤文奏，接据越南国王咨文，派兵协剿各等情。逆匪吴亚终勾结越南降匪谢静川等凭险抗拒，势甚披猖。前谕苏凤文等迅督官军会合夷兵夹剿，克期殄灭。兹览越南国王咨文，是其待援情形，实为迫切。该国久列藩封，恭顺有加，乃任内地匪党扰及边隅，何以副朝廷怀柔远人之意？……即著苏凤文、冯子材等添募劲旅，分道并进，越境疾攻，会同越南夷兵两面夹攻，迅歼丑类，以靖边疆，不得以越境险远，置之不问，为越南所笑。"[3] 考虑到从广西递折到京及清政府批复需要一定时间等原因，则越南国王的请援书可能是在八九月间发出，而非徐延旭所谓的春季。

其实，早在这年四月，清政府就在批复苏凤文、冯子材等关于追剿入越农民军的奏折时，指示他们可与越南官军合作，"知会谅山夷官两面夹击，迅扫边氛"[4]。广西遵旨派总兵谢继贵率兵入越，越南史书记称："清国会剿营弁（兵四千余）进至我谅山邱常处，命范芝香前往迎接，照清国体例摘赏。"[5]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21～24页。
② 《中法战争》(1)，第51页。
③ 《清穆宗实录》，卷二五四。
④ 《清穆宗实录》，卷二三〇，第9页。
⑤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28页。

可是，谢继贵所率士兵并没有越南记载所说的那么多，因为清政府曾有旨指示冯子材添兵前往："冯子材已派谢继贵等四营越境进攻那涯等处匪巢，恐兵力尚单，著即添拨劲旅，由龙州、凭祥继进，力图扫荡。"[1] 按桂军营制，一营兵多不过400人，谢继贵率四营兵入越，总兵力不到1500人，仅是越南记载所说4000人的三分之一强。至于冯子材率兵出关，则是要迟至前引清政府十月谕旨下达后的事。越南史书记称："先是，清地股匪吴鲲（一名亚终）窜入高谅滋扰，我国具文由广西抚臣递达清国大皇帝，乃命提督冯子材统率三十一营出关会剿。"[2] 然后又是一番调兵遣将的耽搁，等到冯子材正式出兵入越，已是同治八年（1869年）春的事了。越南史书记称：三月，"清国提督冯子材抵境，商将兵会剿"[3]。为了保证援越桂军的饷需，清政府还"著户部赶紧筹议，于广西附近省分有可协拨之处，指定实数，按月拨银二万两，如数解粤兑收，以济军用，不准推诿延宕。一俟越南军务告竣，即行停止"[4]。

冯子材率军入越后，转战北圻各省长达十五个月，先是在一次作战中打伤了吴亚终，吴亚终不久即伤重不治而死，部下纷纷投降。但是，由于太平知府徐延旭勒索降人等原因，已降并将返国的梁易（一名天锡）很快复叛入越，并与吴亚终部下的重要将领黄崇英部会合。于是，本来已经凯撤的援越桂军又复入越追剿，直到将梁易击灭，将黄崇英部击溃，才于同治九年（1870年）夏凯撤。这次作战，援越桂军付出了巨大的人

① 《清穆宗实录》，卷二五二。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〇，第12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〇，第12页。
④ 《清穆宗实录》，卷二四四。

力物力，越南史书记称：冯帅统三十一营，每营二三百人，数不满万，“计兵物故者十之二三”①。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应邀援越助剿的经过。

援越桂军刚刚撤回，黄崇英、苏国汉等部又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是年八月，太原按察使阮辉猷、领兵官阮克威进剿失利；九月，黄崇英等部大败宣光剿抚使枚贵，重占河阳、安边等地；邓志雄等部袭踞高平省城，掳杀按察使黄造；十月，苏国汉等部夜袭谅山，杀领兵官黎文池、统督段寿；闰十月，邓志雄等部大败来剿越南官军，掳太原布政使武范启、通化知府武辉班、领兵官武维征、副领兵官阮文立；十一月，越南官军于山西立石县战败，副提督邓文亥阵亡，副领兵官范文雾被掳；十二月，邓志雄在太原大败越官尊室说，毙领兵官阮有芳。到同治十年（1871 年），形势更趋严重。越南史书记称：“至是，复有浪匪自清地新来，与苏、邓之散伙合，处处蚊聚，北谅驿路不通，太原、海安诸地边报日至。”智穷力绌的北圻统督黄佐炎只得请求越南政府再次向中国告急请援，越南政府“乃命廷臣修书咨之”②。

而在此之前，冯子材已闻悉越南北圻复乱的情形，即统带防兵十六营驰赴龙州驻扎，准备出关援剿。这年二月，清政府有旨著冯子材知照越南派兵会剿。但是，当广西当局知照越南政府：“冯提督奉谕率兵十六营会我兵堵截边匪，已择期出关”时，越南政府却担心军费负担太重，“兹清兵之来至十六营之多，抬运实属劳费”。一度向广西当局提出：只派“冯帅道兵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二，第 25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四，第 9、11～12 页。

员弁二三员，兵勇二三千速来会剿"[1]。冯子材只得于三月先派将弁韦三帮助越南官军设计收复高平省城，调参将林日贵率兵两营驻扎谅山，后来逐渐增加援越士兵至十七营之多。可是，在作战过程中，冯子材发现越南官军协剿不力，于八月致书越南政府：贼一被剿，随意奔突，未见越兵拦头截击，虽有智者，亦难以善其后。并声明只办谅平股匪，若诸次逸匪由越军自办。于是，在转战一年多，取得一定的战绩后，根据清政府同治十一年（1872 年）二月的撤军指示，陆续撤军入关。

得知中国军队要班师回国的消息后，越南政府提出，要求桂军留兵驻扎越南，继续追剿："命统督黄佐炎商说清军刘玉成留太防剿。"广西当局满足了越南政府的要求，五月，"冯子材书言，现下遵谕回师，而北圻未尽宁帖，饬刘玉成统带六营仍留太原、谅山分行住截，俟我国戍兵接到乃撤还。特令复书，以酬好意"[2]。越南史书的这些记载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据冯子材于是年六月向清政府奏报留兵越境的原因得知，原来是越南一时无法派兵接防的缘故："转饬总兵刘玉成等督令镇柳，选建十营暂扎左鸾一带，一面照会越南接防。"但是，越南政府却无兵可派，反而继续"以太辖分防多歧，禀恳量留兵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同治十二年（1873 年）。三月，广西报称："迭次照催（越南）派兵接戍，迄今又数月矣，不但无兵接戍，犹须悉众分援。"[3] 到了闰六月，冯子材调整了留越兵力："随调挑留之镇柳中、左、右三营回扎关外驱骡、文渊、艽封等处，选字左右两营、捷字一营回扎关外索红、大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六，第 30～37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〇，第 2 页。
③ 《中法战争》(1)，第 63～64 页。

岭、通携等处，以备援应。”[1] 这是中国军队第二次应邀援越助剿并留兵越境的经过。

桂军班师回国后，黄崇英等部复又四出滋扰，越南政府在派贡使入京之时，再次向中国告急请援。这年十一月，清政府有旨：“据该国王奏称，河阳、兴化诸匪巢独力攻剿，顾此失彼，山、兴、宣三辖蔓匪仍复猖獗，请饬派兵会剿等语。越南边地被匪窜扰，前经谕令冯子材督饬官军出关剿办，嗣以兵勇不宜久驻外国，且虑有骚扰情事，是以迭准刘长佑等所奏，将各营陆续撤回。兹据该国王具疏吁请，朕眷顾藩封，殊深轸念。此时粤西官军如令出境剿匪，究于该国有无俾益，且不至别滋事端之处，著刘长佑、冯子材悉心妥筹，迅速具奏。并著礼部传令该国王知悉。”[2] 细审这道谕旨的口气，只是征询广西当局能否派兵入越援剿？并未作肯定的指示。而越南政府接奉此旨后，据此于同治十三年（1874 年）正月咨催广西及时派兵入越：“接大清公文，叙我使臣疏请饬派兵攻剿诸匪，经清帝谕令刘巡抚、冯提督妥筹速奏。至时递书刘、冯，祈为早料。”[3] 然而，当时越南北圻正发生安邺率兵攻占河内及黑旗军阵斩安邺等事，清政府惟恐卷入法越矛盾之中，所以一直迟疑不决，不敢贸然命令广西出兵入越。直到法越纠纷告一段落，而越南仍不断请援，清政府才于七月正式下令桂军入越援剿。

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广西太平、南宁、镇安三府的防军本有二十营八千人，原由记名提督刘玉成、候补道覃远琎分别统领。同治十二年（1873 年），冯子材由于遭到刘长佑的排

① 《刘武慎公（长佑）遗书》奏稿，卷一六，第 14 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三五九。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第 38～39 页。

挤，“遽思引疾”言归，楚军出身的刘长佑就想遴委出自楚营幕僚、正以盐运使衔尽先补用道资格署理镇安知府的赵沃接办边防。次年六月，覃远琎报丁父忧，刘长佑即改委候补道赵沃交卸镇安府事，就近接统其军。十月，刘长佑又将赵沃与记名提督刘玉成所统各营分为左右两军，俾专责成而资策应。以赵沃统领右军十营分防高平方向，刘玉成统左军十营分防谅山方向，作为入越援剿的准备。光绪元年（1875 年），因接越南国王来咨，仍述前奉谕旨，请速出师助剿。而该国统督黄佐炎又已派出领兵梁俊秀带练千人，愿充乡导，刘长佑这才决意出兵入越。二月初三日，赵沃率右路防军十营，由越南保乐州分两路向河阳剿进，稍后，刘玉成也率左路防军九营，在剿除邓志雄等股后，由高平分三路援应河阳一路。越南政府则给予刘永福“权充三宣副提督”的衔头，率领兴化、谅山、高平、宣光四省越军配合清军作战。经过四个月的作战，五月中旬，右军攻克了黄崇英的主要根据地安边和河阳，接着，又经过两个月的追捕，于七月下旬擒获黄崇英，就地寸磔处死，枭首传示。左军亦于七月上旬剿除周建新等部后，复与右军合队，各派四营共八营，竭两个月之力，于九月下旬攻克农民军另一头目陆之平所部的巢穴者岩。

奏捷后，刘长佑原拟“即饬两军次第入关，妥为布置，以固边防，仍量为撤留，以省军饷。其越南零星余匪，应由该国之兵自行搜捕，不致重劳我师”。实际上，只是“先后札调关外两军之勇共计十营分往各处，其余十营，因越南国王及宣光、太原官民苦留，尚在搜捕”[①]。这是中国军队第三次入越

① 《中法战争》(1)，第 83～86 页。

援剿及留兵越境的经过。

冯子材手下将领李扬才，合浦人。早年投军，在冯子材督守镇江时即已跟随作战，后又随来广西，积功至记名总兵提督衔。由于冯子材遭到排挤，李扬才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光绪二年（1876 年），李扬才得委署浔州协副将，一年半后去职。李扬才辗转于广东、广西两省设法求职，受尽“州县陵辱，抚道挟诈”之苦，却无法如愿以偿。李扬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光绪四年（1878 年）八月，将田产房屋变卖，招兵买马，反叛入越。在起事之始，李扬才就给自己的行动涂上一层与寻常农民军不同的政治色彩。他自称是越南李氏王朝的后裔，此次入越南，不是像其他农民军那样占地为王，各据一方，而是要向阮氏王朝索回祖业，重建李氏王朝的统治。入越后，李扬才还派人四出与散处北圻各地的广西农民军余部联络，争取他们的拥护，一时声势颇大。

李扬才的突然反叛入越，并宣称要夺取越南江山，这就给越南政府带来了极大的震荡。越南国王慌忙向中国告急求援，请求中国“特简忠勤才略大臣如李、左诸名公者，不辞远驾，速往夹接边疆驻节，大加经理一番”①。而在事发伊始，清政府就担心越南政府无法对付李扬才，十月，命广西巡抚杨重雅、广西提督冯子材迅即调派官兵跟踪追剿。等到接阅越南国王的告急文书后，又令广东、云南两省官军入越协剿。

由于李扬才称王太急，目标太大，所以清军的追剿也十分迅速。他在八月底入越，赵沃于九月初就挥师蹑后追剿，并在谅山、驱骡等地大败李扬才军，但在十一月的新街之战中，赵

① 《中法战争》(1)，第 161 页。

沃的部下却被李扬才部打得大败。十二月，冯子材从广西提督驻辕的柳州赶到龙州，接管了赵沃的部队，于次年正月出关追击李扬才。双方鏖战了四个月，李扬才当然不是冯子材的对手，不断败挫，根据地者岩也被攻破，李扬才只带心腹亲信十人逃脱。但冯子材紧追不舍，经过五个月的搜捕，终将李扬才活擒，解往广西省城正法，并传首越南地方，悬竿示众。这次作战十分艰苦。两广总督刘坤一曾有函告人称："此次冯军门所部染瘴病故以及手足溃烂者，实繁有徒。"[1] 广西巡抚张树声则奏称：此役"为时仅及一年，克巢垒不下百处，擒斩降散之贼不下万余，死于战、死于病之员弁兵勇亦不下千数百人。成功之速，伤亡之惨，皆前届所没有"[2]。

早在战事结束前，两广总督刘坤一就在这年二月，接到越南国王来咨，要求清军"紧办李逆匪党，及早清厘，即将向来窜逸诸股残匪尽数剿除，另为量留三五营驻防弹压"。李扬才被擒正法后，清政府本已下令关外各军陆续凯撤，以节饷需。但是在十月，刘坤一又接到越南国王的来咨，请求中国留兵越境援剿，"速为咨商提督冯大人，姑留清办"。"兹而提督冯大人如不可留，幸祈必照前咨，量留贵弁之陈以谟等四五营，足以探拿。悉清剿全局并办善后诸事，使可永帖，不至重劳增费"[3]。清政府允准，光绪六年（1880年），新任两广总督张树声挑留得力勇队十二营，分布太平、镇安各属沿边卡隘，并越南近边的高平、牧马一带。这是中国军队第四次应邀入越援剿并留军边境的情况。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9页。
② 《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卷五，第13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8～141页。

中国军队凯撤后，越南国内伏莽又起，越南官军东征西讨，疲于奔命。1880年五月，越南国王惊呼："北边自军兴，经数十年来，兵困于岚瘴，民疲于飞挽，冀获粗安，以解兵民之苦。不谓此贼未平，他贼又起。朕已虑其余烬复燃，先机指授，不知阃臣所办如何？据报则陆之平整居北沜，李总爷分屯联垒，其党李亚生、李七名、黄大才、赵三、苏二等蔓扰于北谅，覃四娣、潘如林、黄二、谢福善、潘六、李大等肆扰于宣辖，似此情形，殊可怪恨！"① 无奈，越南国王于同年吁请中国出兵入越讨叛靖藩。但清政府因"越南土匪出没靡常，中国官兵势难深入剿捕"，没有当即允准出兵。越南国王继续请求，清政府才于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指示两广督抚："其近边各处，仍著张树声、庆裕督饬防营，择要扼守。遇有匪踪窜扰，务当实力会剿，俾壮声援。该督抚即将此旨传谕该国王知悉。李亚生等各匪扑扰高平等处，经提督黄桂兰督兵截击，毙贼多名，仍著饬令该提督相度机宜，认真剿捕，以遏贼氛。"② 到年底，由于防法的需要，清政府逐渐增加入越兵力，于防法中仍著意剿匪。在后来的三年中先后击毙陆之平、杨大家伙、李亚生，招抚覃四娣等。这是中国军队第五次援越助剿及留兵越境的经过。

在中法战争前夕，中国与越南有着山水相连的地域关系、血缘相通的民族关系、唇齿相依的宗藩关系，以及中国军队五次应邀入越援剿和留兵越境等特殊关系，这就为日后中国出兵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页38～39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一二六。

助越抗法提供了基本条件。假若没有上述这些特殊的关系，也许中国的援越抗法就无从谈起。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无论从历史上或现实来看，近代中越关系还是比较松弛的，据编注阮述所撰《往津日记》一书的陈荆和先生的意见，在晚清中国的几个藩属国中，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据和田博德教授之调查，在阮朝成立的嘉隆元年（嘉庆七年，1802 年）以至太平天国事变发生的嗣德三年（道光三十年，1850 年）的 49 年间，越南来贡共 13 次；虽然贡期不同，但比于朝鲜之 49 次、琉球之 38 次、暹罗之 23 次显为疏远。和田教授认为朝贡关系如此疏远，原因是阮朝自主态度从中作梗。"① 1883 年 5 月 9 日的《申报》曾载文称："吾闻之，前者法人强与（越南）通商，越人未尝请命，西贡一隅，坐此而失。且越之大臣曾谓：（对中国）岁时虽通贡，中朝亦馈遣之，比自主之权仍自我操之，实非其属。此越人告法之词也，其处心积虑，不以中朝为上国，而弃同等弁，可知矣。"② 在资本主义已经崛起并逐渐称霸世界的情况下，中越之间长期存在的封建宗藩关系已经远远落在时代的后面，缺乏深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从政治上看，从前述贡使团出发及回国时，越南君臣所关心的事情看，都是一些较次要的事情，不足以联合应付类似抗法这样的大事变；当法军大举北犯时，越南政府曾应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要求，派了两名大臣范慎橘、阮述来中国联络抗法事宜，但中国只由权势虽大，却并非军机大臣的李鸿章出面接待。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双方仅只在天津晤谈了几

① 陈荆和编注、阮述：《往津日记》解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年初版。

② 《申报》影印本，第 23 册第 49 页。

次，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至于两国的经济往来，也同样受到都是落后的农业国的条件限制，往往只有一些价值低微的农矿产品交流。如刘永福所占据的以保胜为中心的红河两岸各关卡，是中越两国经济贸易往来的主要渠道，但每年只能收取税款银五万余两，只是海口税卡海阳左金年收税银 30 万两的六分之一，可见整个贸易额也很有限。所以，到中法战争前夕，中越宗藩关系变成只是维持中国宗主国体面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礼仪，是否保持这种宗藩关系，对于两国都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因此，两国之间的上述特殊关系，还不能成为中国甘冒重大的民族风险援越抗法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在法国侵越之初，曾吃过英法联军大亏的清政府采取的是装聋作哑、袖手旁观的态度。要使中国政府改变态度，在援越抗法问题上积极起来，还需要一些别的因素，如清政府认为有能力做这件事，以及事态的逐渐发展，使得中国慢慢卷进法越矛盾之中，援越抗法才成为可能。

第二章

刘永福的早期抗法斗争

一　刘永福创立黑旗军

刘永福，字渊亭，因为母亲是改嫁的寡妇，与刘父成亲时带来前夫所生儿子，故刘永福在家中排行第二，所以又称刘义或刘二。他的祖籍是广西博白县，1837 年 10 月 10 日生于钦州防城司古森峒的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8 岁时随家迁往上思，因家贫，刘永福 13 岁时便到滩艇上做小工，经风雨，见世面。两年后，年仅 15 岁就被船主雇为滩师，坐在船头指挥行船。每次行船回来，还在父亲的指点下，学习棍棒武术。但由于年成不好，刘永福一家终年辛劳，也难得温饱。刘永福也无法念书识字，以至一辈子都被人看成是“不学”和“不识字”的人，这就限制了刘永福日后的发展和施展才干。

刘永福天性纯孝，稚齿时就懂得孝顺父母，友爱兄长。1854 年，刘永福 17 岁。他的一家老小虽然累死累活地辛勤劳作，但家境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这年八月，刘母病死，“死后无以为殓，媪为人慈祥，为乡人所喜，因醵资致唁。（刘父）以来得资授族弟使买棺，惟族弟嗜博，一去不返。以来父子益悲恸，乃另市四合板草草薄葬。葬时，永福立坟场博膺而号，遂晕”[①]。同年十一月，刘父也在贫病交加中悲惨地去世，一贫如

① 李健儿：《刘永福传》，第 6～7 页。



黑旗军首领刘永福

洗的刘永福兄弟只得用家中仅有的几块床板拼成一副棺材，才勉强将父亲入土埋葬。永福偃立墓前号哭："天乎，我今更为无父之人矣！"[①] 十二月，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叔父刘以定也一病不起，这时，刘家穷得连床板也没有了，刘永福兄弟只得以木屑垫坑，草席裹尸将叔父掩埋。以后，刘永福处境好转，就惦记着为父母叔叔迁墓。晚年时，他与好友铁禅上人商议建刘氏家庙以祭奠父母。铁禅上人记载此事称："戊戌三月，余得因缘，皈依三宝，（刘永福）将军深韪余志，暇辄过寺聚谈。因谓余曰：佛言报恩回向，我戎马半生，未及立庙，妥诸先灵。今子出家，当具此感，倘有意乎，余与汝成之。余曰：善。岁己亥（1899 年），将军择地白云山麓，沙河之南，为建刘氏家庙。庚子（1900 年）落成，奉列祖列宗木主升座，将军即驻节是间。晨起，必具衣冠礼拜，寒暑弗辍。尝曰：余少也贱，风尘仆仆，子职亏缺，今即椎牛而祭，其如亲已不存何？言罢，泪盈于睫。左右咸感动，有相助泣下者。"[②]《刘永福传》的作者李健儿也记称："（刘永福）论其孝，自少小时即有血性。至老，营刘氏宗祠于沙河，偶诣祠宿，晨起，必具衣冠行礼于堂

① 李健儿：《刘永福传》，第 8 页。
② 李健儿：《刘永福传》，铁禅上人序。

下。遇父母生卒之日，前夜夜半，辄先正其官服，坐待天明以祭。或曰：将军老矣，何可甚劳瘁其躯？将军泣言：吾少贫贱，即失父母，未得尽其事亲之道。今富贵，虽牲牷肥腯，祭于家庙，父母而有灵，仅受献而不得享，吾安可不尽其诚耶！"[①] 这种对父母亲长的孝顺思想，以后发展开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会变成爱国家、爱民族的深厚感情，成为刘永福爱国思想的根源。

半年之内，家中接连死了三个长者，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兄弟俩。谁知丧事刚过，债主又追上门来讨债。无奈，刘永福兄弟只得将仅有的房屋家产变卖抵债。结果，两人除了一个光身子外，已别无他物，连个栖身的地方也没有，只好暂借邻乡高凤村陆二叔家的茅舍居住，依靠每日打鱼采樵换取衣食，一直到 20 岁。其间，刘永福"尝随友人赴安南，佣于芒街博舍"[②]。这段经历成了日后刘永福入越寻求出路的先声。

在这段时间里，外边的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并影响了刘永福日后的生活道路。首先当然是 1839 年林则徐的虎门焚烟，这是中国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的开始；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是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声，并在日后成了刘永福毕生从事的伟大事业；延续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给类似刘永福那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找到一条奋起抗争求生的道路；特别是吴凌云发动的反清起义，更是直接影响了刘永福的人生道路。1852 年，广西新宁州渠芦村（今广西扶绥县属）的附学生员吴凌云，因不堪贪官污吏的迫

---

① 李健儿：《刘永福传》，书后。
② 李健儿：《刘永福传》，第 23～24 页。

害，在新宁州属的东罗圩聚众揭竿而起，附近各处的会党组织纷纷响应，到东罗与吴凌云会合，势力很快就扩展到相邻的迁隆州、江州（今广西崇左县属）、养利州（今广西大新县属），纵横数百里。1853年又发展到南宁府、太平府（今广西崇左县属）等地。第二年又得到龙州农民军的归附，声势更大。1860年，吴凌云挥师攻占太平府，龙州、宁明等地望风投顺，至此，吴凌云义军的势力已发展到左右江流域的主要州县。1861年元月，吴凌云在太平府称“延陵王”，建立“延陵国”，印文曰“延陵印玺”，延陵国成为当时广西反清农民起义的重要地区之一。

知识贫乏、消息闭塞的刘永福，可能对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变毫无所知或是知之不多，但是，这些社会巨变却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影响了刘永福的生活，成为他由一个贫穷无知的苦孩子，成长为令外国侵略者闻名丧胆的反帝爱国民族英雄的契机，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据说，在刘永福20岁前，曾认识邻村一个叫王者佐的地主儿子。王者佐能文能武，见闻甚广。刘永福在和他的交往中，不但识字和学到了武艺，也多少知道一些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农民起义的情况，思想上对起义者产生了共鸣[①]。生活上的走投无路和思想上对古今农民英雄的朦胧向往相结合，使刘永福产生了外出寻找生路的念头，于是衍生出那段“黑虎出山”的传奇性的故事：一天，刘永福上山打柴，午后倦睡在一块石头上，迷糊中梦见一个长髯老人对他说：“黑虎将军耶？

① 杨万秀、吴志辉：《刘永福评传》，第12页。

尚在山林隐伏，曷不出山乎?”[1] 醒来才知是梦，但这梦却勾起他离乡出走，投身农民军，依靠一刀一枪另闯生活道路的想法。为此，年已 20 岁的刘永福首先寻找两块吉壤安顿父母的骸骨，然后与同母异父兄弟李保哥邀约几位乡人一同外出参加反清农民军。

有些论著在谈及刘永福参加反清农民军的思想动机时，常常想当然地加以人为的拔高，认为刘永福是由于受到农民革命的影响，而投身到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舞台。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当时刘永福的生活内容十分狭隘贫乏，他居住在偏僻落后的边远农村，每天为求果腹而奔波辛苦，既无文化，又少见识，很难培养出高尚的节操和远大的政治理想。那么，他投身农民军的思想动机是什么呢？弄清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正确地评价刘永福日后的一系列行为。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都不外是由以下三种原因引发的：一是起义的发起人具有推翻现政府，要求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如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他们在起义过程中，很快会建立起与旧政权相对抗的农民政权。二是由于统治阶级中的具体人物的具体罪恶而激发的起义，诸如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地主劣绅的豪夺强取、鱼肉乡民，百姓不堪压迫和剥削，被迫揭竿而起。这些起义者的斗争目标直指统治阶级的某个具体人物，却没有改朝换代的要求，“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过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史学

① 《中法战争》(1)，第 171 页。

界比较强调第一种模式的农民起义，似乎从秦王朝开始以迄清朝的二千年间，中国总共才发生过那么十几次要求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而由于《水浒传》的影响和义和团运动的存在，人们才多少提到第二种模式的农民起义，但已是贬多褒少了。对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大量存在，甚至可以说是农民起义主流的第三种模式的农民起义，我们的史学家往往视而不见，很少提及。在这种模式的农民起义中，无论是起义的发起者或参加者，都没有从思想上意识到封建剥削制度是造成他们一切苦难的根源，也没有受到统治阶级中某个成员施予的不堪忍受的压迫和剥削，而是由于水旱灾难造成的土地歉收，或因经营不善和家庭劳动力不足，以至依靠正当的劳动无法维持生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会合起来，组成农民武装，或是攻取官库，或是勒劫富户，得到银钱粮米来维持生活。这种模式的农民起义一般不会提出改朝换代的要求，没有与封建王朝抗争到底的决心；也不只是向统治阶级中的某个具体人物寻仇报复，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其成员一旦环境改善，或是稍积余资，或是年成大熟，就会洗手不干，重作良民；或向官府乞抚，图个一官半职。这样的起义，在旧史书上是数不胜数的，特别是在大动乱时期更是如此。不少人先干农军，后干官军，先当头领，后当将领的情况并不少见，其中个别人如五代的朱温、元末的朱元璋等，还可以尝尝当皇帝的滋味。这种模式的农民起义，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由于有“阶级异己”、“阶级背叛”的可疑，因而很少为人注意和研究。其实，即使在前两种模式的起义中，参加者也不乏第三种模式的成员。

从刘永福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来看，他投身农民军的原因，既不是由于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也不是由于不堪忍受统

治阶级中某个具体成员的迫害所致，而是由于年成不好，以至依靠正当的劳动无以为生，只好用参加农民起义的方式来寻找活路。刘永福在投入农民军前曾喟然叹道："大丈夫不能为数百万生灵造福，已觉可羞，况日夕啖稀粥以充饥，尚不能继，又焉可郁郁乎久居于此乎？吾当出而相机作事耳！"① 投军后，他曾对算命先生说："米无一筒，衣无两套，听人饭碗响而后可充饥。若得朝饔夕飧，一日两餐，借免饥寒，愿已足了，尚望什么福，讲什么禄，言什么寿耶？"② 由此可见，促使刘永福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只是十分简单而现实的生存意识，而并非什么抽象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理想。这样卑微的思想动机，就决定了刘永福在以后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行动方式：只要不危及他及黑旗军的生存条件，刘永福不在乎是和谁合作：是郑三那样的农民军小头目，抑或是吴凌云、吴亚终那样称王一方的大人物；是邓志雄那样的人越农民军余部，抑或是越南政府或清政府；甚至，在法越矛盾尚未激化到发生第一次纸桥之战时，刘永福对过往黑旗军根据地保胜等关卡的法国商人如堵布益等也并不过分为难。但是，一旦对方危及他和黑旗军的安危，那么，不管是称霸一方的盘文义或何均昌，还是人马成千上万的黄崇英，抑或是装备洋枪洋炮、船坚炮利的法国侵略者，刘永福都会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寡敌众，以弱斗强，拼个你死我活，并不轻易就范。在这上面，就很难简单地用抽象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等概念来说明。

有些论者，在谈到刘永福参加农民军的原因时，慷慨地奉

① 《中法战争》(1)，第171页。
② 《中法战争》(1)，第179页。

上一顶“参加农民革命”的桂冠；而一旦刘永福脱离农民军而独树一帜时，则贬之为“脱离农民革命”；当刘永福因为自身生存和抗法斗争的需要，而与中越两国官军联合作战，并接受中越两国封建政权授予的官职时，更被斥之为“背叛农民革命”。这些评论显然是没有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具体的分析，过于苛求历史人物了。

1857年，刘永福和同母异父的兄长李保哥在迁隆投入以钦州那良人郑三为头目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的小部队中，李保哥很快就病死了，刘永福却在那里呆了三年。期间并未和官军打过什么仗，倒是在一次农民军自己的火并中，刘永福受了重伤，差点送掉了性命。1860年，刘永福改投到农民军头目吴二的部下。在吴二手下，一开始待遇尚好，有粮饷发给，但很快就没有了。于是刘永福又改投到农民军头目王士林的部下，在那里呆了五年。等到没有粮饷可领后，又改投到农民军头目黄思宏军中，在那里只呆了年余，因为黄思宏弃军而去，群龙无首，刘永福便率领愿意追随他的二百余人，于同治五年（1866年）改投到吴凌云儿子吴亚终的部下。这时，吴凌云早已死去，所部农民军改由其子吴亚终统率。在那里，刘永福第一次受到了重用，吴亚终任命他为所率二百人的头目，这件事也成为黑旗军诞生的契机。“惟永福初任旗头时，以宜有旗帜为标识，询众应用何种形式与颜色，亦未能决。时安德土人庙中所奉神有水神，用七星黑旗植庙中。永福遂仿制一大纛，卜吉日悬之庙前，并盟诸兄弟。众皆大悦曰：此大旗我等应崇奉，义哥之信义如神明。永福适过前，闻言，因声称旗已悬立，今吾等聚义，当祭旗，用牲昭告天地，以志大家同心共德。众皆以为然。于是永福治牲醴，祭七星旗于庙前。当行礼

时，旗忽为风吹歪，众失色，以为不祥。适永福面旗下拜，旗在转瞬间，又为风吹正，植立不倒，如有人扶持之者，众又以为大吉祥，拍手欢呼，将旗稳植之。"[①] 黑旗军成立后，刘永福率领作战，屡立战功。吴亚终十分赏识刘永福，委他为"左翼先锋"，并准备将自己的妹子嫁给他[②]。

从1857年到1867年的十年间，刘永福辗转出入于各支农民军中，经受了初步的战争考验，也亲身经历了各支农民军的成败兴衰，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从而影响了他以后的成长道路。结合他入越以后的行事来看，刘永福这时可能已经本能地认识到：一、在他所接触过的众多农民军将领中，无论声势大小，人马多寡，地位高低，都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人才，可以跟随着做一番事业。因此，以后的生活道路只有靠自己去闯，而不能再胡乱地投靠他人；二、农民起义已经进入低潮，农民武装要继续存在下去，就需要尽可能地争取到合法的地位，否则，最终难逃被官府剿灭的命运；三、农民武装要长期坚持下去，就需要有一个能够保证源源不绝地供给充足粮饷的可靠根据地，没有这样的一个根据地，农民武装就像无本之木、无根之萍，一遇到风浪，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四、兵在精而不在多，一个兵要有一个兵的用处，不能因为要扩大声势，就随意增募兵员，以免白白耗费来之不易的粮饷。

二　兴化保胜防御使

刘永福投入吴亚终部下不久，形势就急剧变化。作为清政府心腹大患的太平天国运动已被镇压下去，清政府可以腾出军

① 李健儿：《刘永福传》，第23～24页。

② 《中法战争》(1)，第181～184页。

队来扑灭各地的小股农民起义。同治六年（1867年），广西官府以候补道覃远琎统领的楚军为主力，集中数万大军围攻吴亚终据守的归顺。吴亚终虽然明知不敌，但仍坚守归顺孤城，顽强抵抗，双方互有胜负。然而，随着吴亚终在一次作战中负伤，不能亲临前敌后，农民军的指挥大受削弱，士气逐渐低落，原来供给粮饷的百姓也改变了态度，情况就对农民军不利了。刘永福见势不妙，求生的本能又使他考虑要另觅出路，于是决定脱离吴亚终，率黑旗军退入越南，以避开清军追剿的锋芒。

这年，年已30岁的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将士300余人退入越南。他们入越的第一个落脚点是由原为广西农民军头目、后入越取得越南政府授予官职的邓志雄、梁俊秀等率领百余人据守的苏街大墟。当时，部下有人建议袭杀邓、梁，夺踞苏街大墟，但为刘永福所拒绝。原来，刘永福认为农民起义已走下坡路，必须另觅出路才能生存，于是产生了投靠越南政府的想法。他曾对部下说："刻下安南苗瑶造反，各霸一方，越国王家战则必败，无法以救百万生灵。弟此去一探情形，意在为越王攻击苗瑶。事可为则为之，事不可为又当见机而行耳。"[①]而袭杀邓、梁，将意味着与越南政府对抗，这正是刘永福所不愿做的事情。

刘永福这种不与为敌的态度，感动了邓志雄和梁俊秀，他们成了与刘永福和平相处的好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经过将近一年的徘徊和选择，同治七年（1868年）春，刘永福打着邓志雄等人帮助从越南政府那里弄来的民团名义，率领黑旗军

① 《中法战争》(1)，第188页。

进驻六安州。越南史书关于此事记称：春正月，“清地股匪盘文义、梁文利等挂白旗号，扰掠六安州（属宣光），省臣潘文述请责令权管阮文潘督新降头目刘永福等剿之（前经出首束为宣光团勇头目）”①。

六安州下辖六董，每董有三十余社。在刘永福到来以前，属于白旗军头目盘文义的势力范围。盘文义为人凶狠异常，所有受他控制的各府州县，遭其荼毒残害者，呼号无门，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无可奈何，只得任其鱼肉。越南政府多次派兵征剿，但都被盘文义打败，以至各乡受害者，只得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显然，这是一股与越南政府和人民为敌的恶霸势力。

黑旗军进驻六安州，这就激怒了盘文义，他对刘永福恨之入骨，多次起兵前来攻打，据说兵力最多时达到万余人。而黑旗军只有300余人，众寡对比悬殊。但刘永福依靠当地老百姓的帮助，巧布竹签阵，终于打败了盘文义的进攻。趁着盘文义部下因战败而军心动荡时，刘永福又施反间计，收买盘文义的部下刺杀了盘文义，除去了黑旗军入越后的第一个对手。接着，刘永福派出黑旗军将士，将六安州附近各处盘文义所设的各级伪官陆续捉获斩首，并将这些伪官的首级及盘文义的首级派人一同送给越南宣光巡抚。经宣光巡抚保奏，越南国王赏给刘永福等人官衔。据《刘永福历史草》（以下简称《历史草》）所载：“刘永福著赏七品千户。”② 这可能记错了。光绪九年(1883年)，唐景崧入越说刘抗法。两人会面前，为了表示诚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5页。

② 《中法战争》(1)，第196页。

意，刘永福向唐景崧呈递军册及自己人越后的履历。其中就提到因歼灭盘文义而获授越南的八品百户。越南史书记载此事则称：1868年夏四月，"刘永福率团勇从官军剿匪（苗匪），三次胜仗，宣光省臣潘文述以闻，赏九品百户"[①]。这两种记载无疑要比《历史草》较为准确，虽然其中还有"八品"和"九品"的区别，但都没有提到受封为"千户"事。可见，刘永福因歼灭盘文义获赏的只是百户。

当时，越南虽是个小国，但设官员却极多，越南国王曾叹道："本国地不广而设官吏多，一府县不及中国一乡，一省不及中国一县。"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中，百户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属于最起码的职衔，而且刘永福所获的还只是一个虚衔。当时，越南政府对于愿意归顺的入越广西农民军头目，如邓志雄、周祥麟等，都是赏授百户职衔的，可见纯属羁縻性质，但它却是越南政府开始接纳刘永福的标志。尽管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越南政府还对刘永福抱有很大的戒心，一些越南官员甚至还持敌对的态度。

几乎就在打败盘文义之后，抱负颇大的刘永福就嫌六安州的地盘太小，不利于黑旗军进一步的发展，便率领在六安州作战时招收的农民军头目黄胜利、许元彬等部，着手准备攻打保胜。越南史书记称：1868年五月，"刘永福、黄胜利与逸匪黄宾兴相合，图攻兴化保胜铺"。六月，"刘永福擅往兴化，与降匪何远芳等交攻"[②]。

越南的红河发源于我国云南省，上游叫沅江，蛮耗以下才

---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22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22页。

叫红河。红河从西北流向东南，和从东北流来的南溪河汇合，合口的地方北岸是云南的河口，南岸即是越南的保胜。因此，取道红河无论是越南商货进入云南，或是云南的货物输入越南，都要经过保胜。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为在保胜设关收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是，这个地方却被一个名叫何均昌的武装头目占据，到处设立关卡，强行征收过往客商的关税，越南政府却不能过问。刘永福决定起兵攻取保胜，“一则为越王出力，一则为自己栖身”①。这时，黑旗军已发展到六七百人，刘永福除留小部分人守六安州外，自己率领主力去攻打保胜。何均昌听说黑旗军来攻，急忙派兵迎敌，却哪里是黑旗军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归。何均昌派人到云南招来上方佬千余人和张来庆的数千人，帮助抵御黑旗军。双方鏖战了几个月，黑旗军人马精壮，以一当百，以少胜多，多次打败何均昌及其帮手。何均昌势穷力蹙，只得派人去河阳请黄崇英部前来助战。

黄崇英是广西农民军的重要头目，原为吴亚终手下的得力部将。吴建立的延凌国失败后，他率领部分农民军败退入越，占踞河阳地区。他手下有兵数千，他的几个兄弟也分别率领数千人占踞邻近的地方，他同时还不断招集和联络其他败退入越的农民军余部，形成一股与越南政府对抗的割据势力。黄崇英在吴亚终部下时地位就远远高于刘永福，入越后统率和联络的人马又是黑旗军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所以就很自然地以大头目自居。刘永福自知还不是黄崇英的对手，在强敌面前只好暂且低头，卑辞厚礼地与黄崇英周旋。他表面上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其实却是貌合神离，对黄崇英处处提防，时时戒备，暗

---

① 《中法战争》（一），第197页。

地里寻找机会与黄崇英摊牌，终至公开为敌，刀兵相见。一天夜晚，刘永福得知黄崇英部出动的消息，认为是来偷袭黑旗军，便先发制人，抢先向黄崇英部发动进攻。黄崇英猝不及防，被黑旗军杀得丢盔弃甲，死伤惨重。以后，双方又交手数次，互有胜负。最后，黄崇英坚持不住，狼狈地丢下辎重，带领残兵败将逃回河阳，前后约为一个月。越南史书记称：1869年五月，"黄崇英自高平遁往兴化保胜铺，刘永福击败之。英带伙二百余人下船图脱，诈遣五丁向副领兵武光宣乞降，遂奔宣光，捕弁追之，只获所弃船艘炮械"[①]。

在《历史草》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述与黄崇英的争斗过程，因为在刘永福看来，能否摆脱和战胜黄崇英，是黑旗军能否在越南立足和发展壮大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但是，刘永福所提出的关于黄崇英图谋他的证据，如许元彬之妻及黄崇英手下蒋六关于黄崇英企图偷袭黑旗军的密谋等说法，都是些间接的证据，并没有确切的证明；而刘永福在和黄崇英多次见面时，为防备对方的暗算，都作了应急准备，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②]。事实证明这是刘永福自己多疑而已，黄崇英并无偷袭黑旗军的意思。因此，刘永福先发制人，首先向黄崇英发动攻击，变友为敌，他要负主要的责任。其实，只要了解刘永福早就想脱离农民军的思想活动，就不会奇怪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和黄崇英翻脸成仇，是刘永福和农民军脱离关系的重要标志。

黄崇英虽然不是黑旗军的对手，但是与越南官军作战却得

---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〇，第41页。

② 《中法战争》(1)、第199～210页。

心应手，特别是在吴亚终战死后，他更成了中越两国政府追剿的主要敌人。

同治九年（1870年），冯子材应邀率兵入越追剿黄崇英。他得悉刘永福与黄崇英结仇的消息后，就派部将杨瑞山、冯月亮来保胜见刘永福，邀刘永福出兵助剿，答应事成后赏给刘永福蓝翎功牌。这是刘永福求之不得的好事。他马上从黑旗军中挑选精壮，编为福字两营，交部将农秀业率领前去和清军会剿。这两营黑旗军作战英勇，协助冯子材部攻下黄崇英的根据地河阳。后来，冯子材果然赏给刘永福五品蓝翎功牌[①]。虽然这些也不过是一些虚衔，却意味着刘永福开始和清政府搭上了关系。徐延旭所撰《越南世系沿革》一文就称：同治“九年，兴化省保胜首领刘永福”来降，表示承认刘永福已“改邪归正”[②]。这样一来，刘永福和黑旗军就不再是清军追剿的对象了，从而能够在中越两国官军对入越广西农民军的围剿中硕果仅存。到光绪元年（1875年），因协助云南滇军截剿大窝子匪巢出力，经署云贵总督岑毓英保奏，清政府赏给刘永福四品顶戴。光绪三年（1877年），刘永福在云南捐局由监生报捐游击衔，请以二品封职，与清政府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与此同时，刘永福自己也率领黑旗军主力，在兴化省一带与黄崇英作战。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刘永福在龙鲁将黄崇英打伤。三月，越南地方官为他向越南政府请功。此事虽然没有下文，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越南政府从下至上已对刘永福产生了好感，这也进一步巩固了黑旗军在越南的地位。此

① 《中法战争》(1)，第215页。
② 《中法战争》(1)，第52页。

后，随着黑旗军在保胜的站稳脚跟和不断战胜黄崇英，刘永福的声望大振，入越广西农民军的几支小部队，如杨著恩、吴凤典及黄守忠等部先后前来投奔，特别是黄守忠部的加入，一下子就带来了千余人，这就使原来只有几百人的黑旗军，很快就发展到二千余人，成为北圻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靠着这些人马，刘永福虽然还未能完全制服黄崇英，却可以改变以前坐待敌攻、被动挨打的态势，转而主动出击黄崇英了。

同治十二年（1873 年），黄崇英派部将陈亚水统兵攻取湖宁县，部将廖四统兵攻取立石县。越南官军前去争夺，却哪里是黄崇英的对手，被打得落花流水，节节败退。北圻统督黄佐炎无法可想，只得派人去请刘永福，要他出兵帮助越南官军收复这两座县城。刘永福遂率黑旗军前去与越南官军协同作战，屡战屡胜，很快就收复湖宁和立石两县。事后，黄佐炎于九月奏报越南政府，以刘永福协同官军作战有功，请擢升为防御使。越南政府开始并不同意，驳回了这一请求。可能是由于不久就发生安邺攻占河内城的事变，越南政府需要黑旗军出兵收复河内城，这才勉强给刘永福“权充兴化保胜防御使”的衔头。“权充”的意思是署理，还不是实授。后来，由于阵斩安邺的功劳，越南政府才赏给刘永福副领兵衔，仍充兴



抗法名将刘永福

化保胜防御使，这才是实授了。对于刘永福来说，无论是副领兵或是防御使，都不过是一些虚衔，黑旗军并未因此就增加了一兵一卒，或是扩大了地盘。但是，这两种职衔却是越南的三四品武职，比起八品百户是高了许多，这表明越南政府对待刘永福的态度，已从单纯的利用转变为逐渐信任。

同治十三年（1874 年）是越南政府进一步信任重用刘永福的一年。这一年，黑旗军先后在立石、夏和、镇河、保胜等地屡败黄崇英，越南政府将刘永福由副领兵提升为正领兵官。八月有旨："兴化之镇河据匪黄英负固有年，至是巡抚阮辉玘督刘团剿拔之。统督黄佐炎具折奏闻，帝嘉赏之。其得力之副领兵刘永福赏升领兵官。"同时还决定在红河弛禁通商，允许黑旗军在保胜设关收税，以补军用。越南史书记载此事称："初宣辖上游匪党滋扰，泸、洮诸江并行封禁，至是统督黄佐炎奏请弛禁通商，既已补给刘团，亦免病民。……帝曰：如果无碍，听依弛禁，俾永福得以抽丰之利，尽心办贼，而方民亦免受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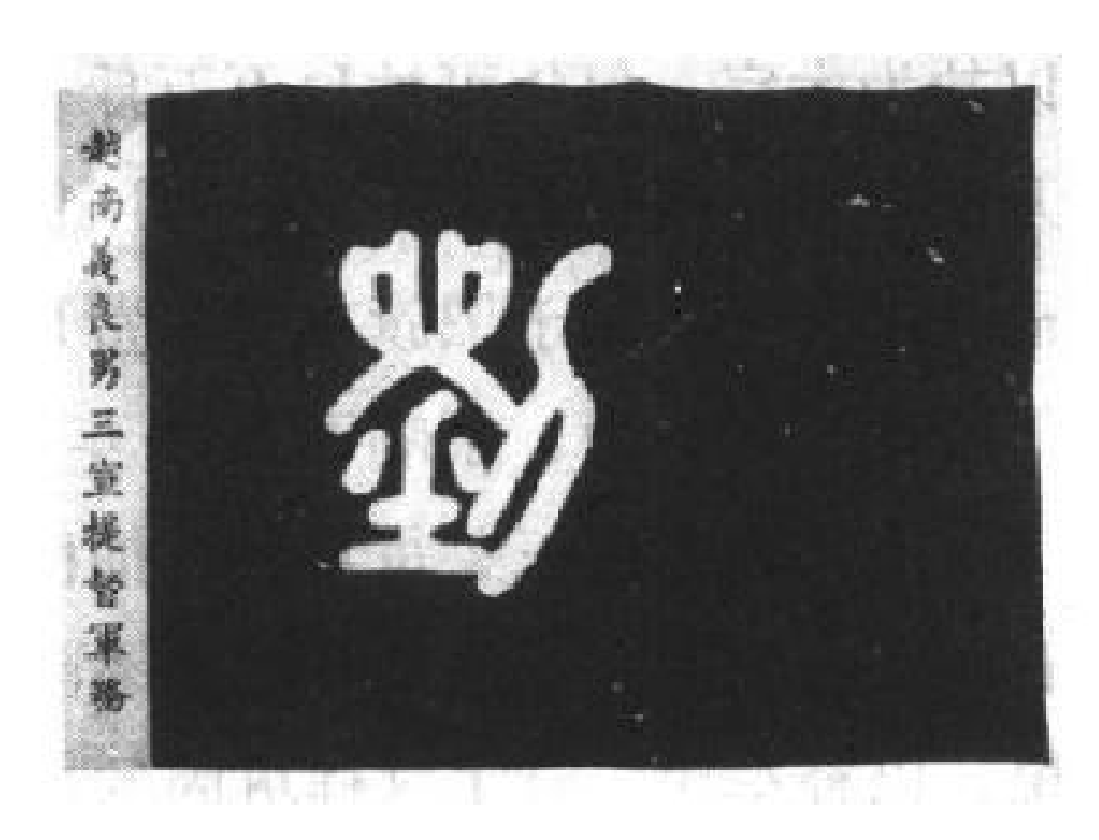
得到越南政府允许黑旗军在保胜设关收税后，刘永福遂大力经营保胜。保胜原来并无城池，现在刘永福建起一座周围约二里许的小城，城边修有五座高大坚固的炮楼，以拱卫全城。他除了在保胜设关卡由自己收税外，又在其下游保河、屯鹤、壮支等地设支关，在上游程舍、家喻等地设正关，由黑旗军的左右营管带吴凤典、杨著恩承办收税。当时进出这些关卡的商货，由云南而下的，除烟土照例不收税外，抽税商品以锡为大宗，以 2500 斤为一票，每年可抽 2000 余票；由河内而上者，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一，第 42～44 页。

以盐为大宗，每年可抽税百万斤。合计保胜关每年可抽税银五万两上下，商家如银不足，可用货物相抵，这些税银都由刘永福支配，主要用于黑旗军的军费开支。红河其余各关则收铜钱作税款，计程舍、家喻两关每年各可抽税钱十六七万贯，壮支、屯鹤、保河三关每年各可抽税钱六七万贯，这些钱则由左右两营分收使用。而黄守忠则率前营在河阳、宣光一带设卡收税，以补军用。有了这样巩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经济来源，这就为黑旗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884 年 7 月 22 日的《申报》报道了刘永福和黑旗军在保胜的生活情况：

> 刘爵帅系广西上思州人，生于道光十七年，今年四十八岁。形貌魁梧，和蔼近人，尚未留须，望之不过三十许人。夫人王氏生有一子二女，子年甫十二岁，又有寄子一人。所守在云南边外，地名安喜江，其总要口地名保胜。守此要口者，即系爵帅寄子。其军中老稚皆留于老界，专事耕种。成童皆编为猎户，平日打犀象麋鹿，取其皮角齿牙，以售诸粤东商人。壮丁则悉入兵籍，妇女司内事并管理买卖。其兵制则分作数营，一营分作数队，轮流供役，周而复始，无偏劳亦无怠随。就保胜筑城，极为坚固，其地在安喜江，迤逦直至红河，皆在滇越分界之地，故定其名为老界，即各报所称老开者是也。保胜城内为刘爵帅及其宅眷所居，并挑选二百名亲军以为护卫。粤商亦在城中，盖粤商运来烟、棉花、食盐等类以作贸易，然后载运铜铅鸦片烟等物以去，此种交易，每年可收捐银八万两。其军饷素由越王发给，每兵一名月给钱一千二百文，米三十斤，有眷口者倍之。其有无业兵民，皆以赌博为事，赌



刘永福越南三宣提督军旗

场亦有捐税。老界地方各样食物皆备，价亦不昂。惟食水最为费事，盖初至之时，恐有人投毒于水以害之，故不食河水，就山中有清泉处接以竹管，引入城中以汲用。其山则种竹成林，编以为垣，不令人得至其地，且以兵二十名常年驻守。[1]

黑旗军还形成了对法作战的一些独特作战方式，后来刘永福曾告人说：

其出奇在埋伏地雷，用木箱装药四五斤，埋于要路，或扎营之左右，用竹筒套火线，伏于长林丰草之处，睨敌过，即发，每发，则法人死伤无数。扎营，则先掘地深数尺，上用横木作盖，木柱作擎，留空仅数寸，作炮眼，四边可放炮瞭望。木盖上，用竹木钉密，加泥厚数尺，上叠草皮，别开门户出入。法人放枪，高不能中，低不能发，远不能见，近则为我所中。花子亦只炸在皮草上，不得伤人。我军有藏身之处，得以从容施放枪炮。[2]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因追剿黄崇英的需要，越南政府命刘永福权充三宣副提督。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因助剿李扬才有功，越南政府实授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刘永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申报》第25册，第127页。

② 肖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34页。

福和黑旗军被越南政府接纳，并有了一块根据地和相当稳定的粮饷来源，就为他们开展抗法斗争创造了条件。

三 黑旗军阵斩安邺

刘永福率黑旗军在保胜安顿下来后不久，就碰上法国殖民当局出兵侵略北圻的事件。原来，法国在此之前虽然已经侵占了越南的南圻六省，但并不满足，很快又把侵略魔爪伸向越南北圻。而充当这次侵略行动急先锋的，是法国商人堵布益和法军上尉安邺。

堵布益早在1861年就已来到中国的汉口做生意，以后又多次出入云南贸易。1871年，他怀着勘察红河航道的意图来到云南的蒙自、蛮耗等地，再从那里乘船循红河到达河内。途中经过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时，受到刘永福的礼遇。通过这次航行，堵布益了解到沿红河可以建立沟通云南和河内的航道。1872年，堵布益返回巴黎，向法国海军殖民部提出，允许他乘坐法国派驻交趾支那的海军分舰队的炮艇前往越都顺化，目的是要迫使越南政府同意法国借用其领土，以创设一条连接越南和云南的航路。海军殖民部表示支持他的计划，并指示交趾支那总督给予他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1873年3月底，堵布益带着四条船和一百五十余人，经由中国的云南省回到了河内。

开始，堵布益和河内的地方官员互致信函，企图搞好关系，后来，他了解到越南官员因怀疑他和黄崇英勾结而对他产生了恶感，并趁他外出之机，拘禁了他留在河内的一些同伙。老羞成怒的堵布益收起了伪善的假面具，气势汹汹地率领随员带着武器上街，向越南官员索回被拘禁的同伙，进而肆无忌惮地焚烧越南官方的告示，袭击越兵，囚禁越南官员。他还在前往中

国云南贸易的途中，狂妄地威胁越南地方官员："如你试欲拦路，我将用机枪尽杀你等，如你让我们经过，我们将会成为世上最好的朋友。"他下令开枪射击越军的工事，火烧沿江木筏以作示威。在通过黑旗军驻守的馆司关时，由于认为黑旗军在售给他粮食时要价过高，堵布益又准备和黑旗军翻脸为敌："如果你们试试和我捣乱，我将从老开至河内全区把你们歼灭净尽。"①

堵布益的倒行逆施激怒了河内官员，他们表示要阻止他的无理行为，并张贴告示要将堵布益驱逐出去。由于堵布益蛮横地反对越南官员的警告，没有半点收敛的意思，越南政府便派人去见交趾支那总督迪佩雷，要求他派军舰到河内，帮助驱逐堵布益。另方面，堵布益也向迪佩雷要求援助，以对抗越南政府不断增强的压力。迪佩雷对此事的反应是：一面写信给堵布益，叫他先离开河内以缓和双方的矛盾；另方面，则考虑要趁此机会派出军队深入到北圻，迪佩雷物色来率领这支军队的军官便是安邺上尉。迪佩雷给安邺的正式使命主要是：调查堵布益对抗河内当局的原因和河内当局对于堵布益的指控，同时了解河内的对外贸易情况。

但是，安邺在率领56名士兵和四艘小舰艇从西贡到达河内后，于11月5日张贴的布告中，却为自己此行的任务增加了驱逐海贼强盗的内容。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河内当局的反对，他们指出："安邺的唯一任务，乃在审判并驱逐堵布益，非以干预国家之事。"对此，11月15日，安邺又在河内张贴《告东京民众书》，声称除了解决堵布益事件外，"我的使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主要乃在于保护商务，在法兰西的保护下，把这

① 《中法战争》(1)，第406页。

个国家及其河流（指红河）向各国开放"。同时，安邺还向河内当局提出商约五款，并威胁说如不接受这些条款，则要对河内当局使用武力。河内当局对此的答复，是坚持安邺除了处理堵布益一事外，无权谈论其他事情。11月19日，安邺给河内当局致送了最后通牒，威胁对方，如果在天黑前不接受他的条件，他将要攻占河内，俘虏巡抚。11月20日，安邺在堵布益的武装人员的协助下，悍然率领百余人向河内城发动进攻。河内巡抚阮知方和儿子驸马林组织了抵抗。战斗中，在东南门城上押队督战的林死于法军的炮弹之下，阮知方也中弹负伤，守军一哄而散，法军轻易地攻占河内城，俘虏了阮知方。后来，阮知方愤而绝食殉国。

事发后，越南政府命商舶司以文书照会法国司令和在嘉定的使臣，要求和平解决双方的冲突，法方应令安邺退还河内省城。为此，法国殖民官员霍道生致函安邺，对他擅自发兵攻占河内的鲁莽行为表示不满：

你被遣派，乃在驱逐某冒险者，并试与安南官员取得谅解。而你反与此冒险者相结连，没有预先的警告，而以开花炮弹射击未曾攻打你而且是无防卫的人们。你曾否想到，倘人们将来知道这事，将使你和我们蒙受如何的耻辱。无论是从你个人或是从法国所欲达到的目的来说，这是一个不能补偿的损害……你的训令没有叫你这样做。①

但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安邺对此全然不顾，反而派遣属员向越南政府追问他提出的通商协议如何答复。越南政府迫于他的压力，将所有河内的地方官员，不问生者死者，悉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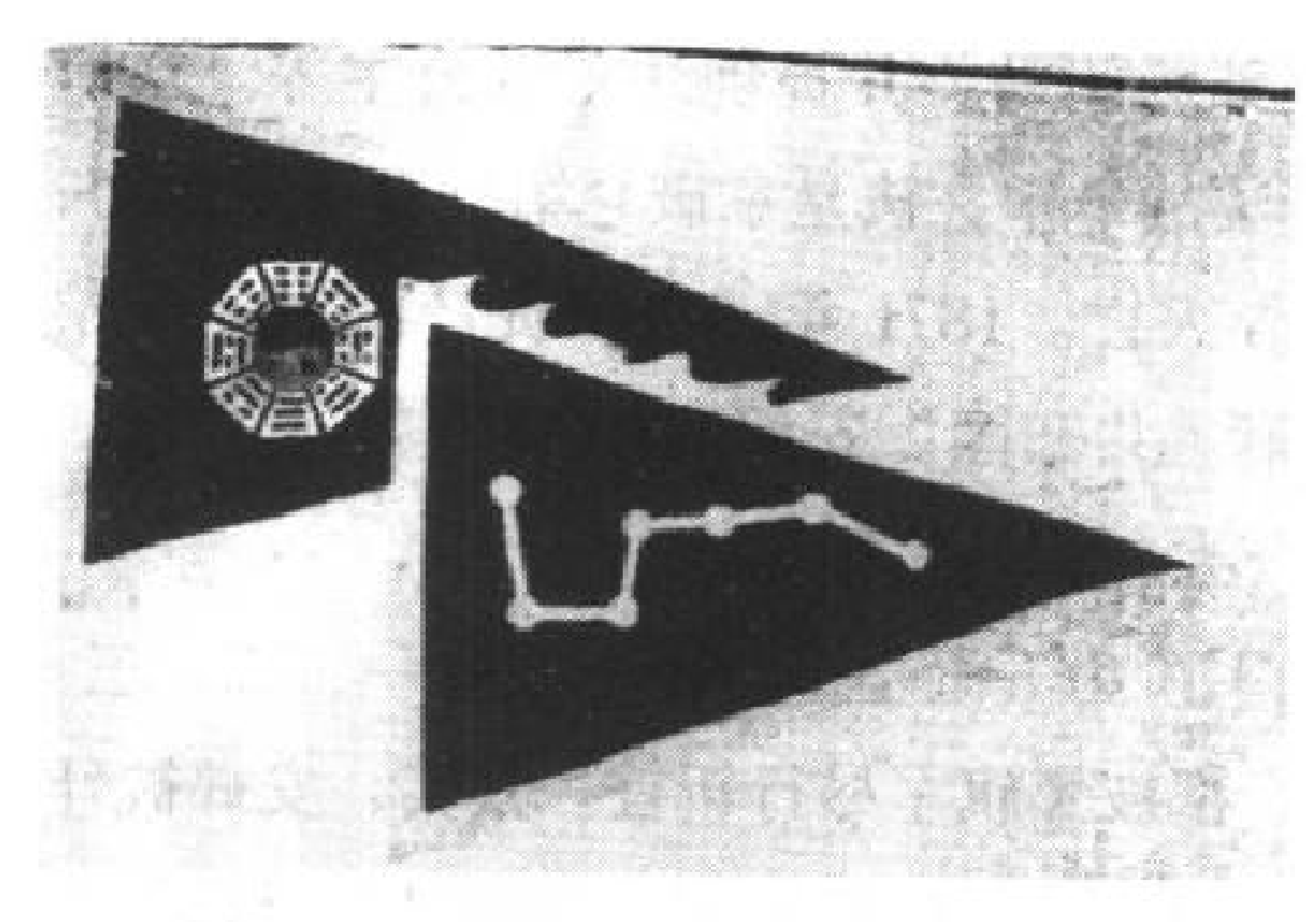
① 《中法战争》(1)，第435页。

职。另任陈廷肃为河宁总督，阮仲合为巡抚，张嘉会为布政使，带同部分地方官员，赶赴河内与安邺谈判。安邺并不就此罢手，他又传檄北圻诸省，设关津，拔江栅，揭商约三条。不久，安邺又出兵攻取海阳、宁平等四省，北圻岌岌可危了。

安邺肆意扩大侵略，使孱弱的越南政府慌了手脚，他们一面加派黎竣为全权代表，阮文祥副之，与法方代表霍道生一起赴河内，参加法越双方的谈判；一面命黄佐炎统督北圻军务，加强各地防务，等待双方的谈判结果。黄佐炎奉命统督北圻军务，刘永福就成了他的部下。在此之前，由于刘永福协助追剿黄崇英有功，黄佐炎曾多次向越南政府保荐刘永福，因而二人的关系较好。现在大敌当前，而越南官军又不是安邺的对手，黄佐炎遂调刘永福前来抵御安邺。这时，刘永福已经接受越南政府授予的兴化保胜防御使官职，并经营保胜作为黑旗军的根据地，因此，他知道自己及黑旗军的命运已与越南政府休戚相关，存亡与共，安邺侵犯北圻，将威胁到他和黑旗军的生存和安危，所以也愿意将法军赶出北圻。奉命后，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数百将士，赶到离河内城十里的罗城地方安营，黄佐炎及所部越南官军则在靠后二三里处扎寨。双方议定：由黑旗军作先锋杀敌，而所有后勤事务则由越南官军担任。黄佐炎还颁布了赏格：斩法兵首级一颗，赏银150两，一画（表示法军军官衔级的一种标志）加10两，二画加20两等。

关于黑旗军阵斩安邺、取得第一次纸桥之战胜利的经过，在《历史草》中有生动详细的描述：

> 公等军士，驻扎数日间，法大将驸马安邺，先带法兵向西门外出仗来攻。首先驸马五画全金，其余一、二、三、四画，概以数十计，先出到桥搦战。公即率队过桥，


黑旗军军旗

与渠交攻，互相射击。公喝令加奖花红，各军队伍奋勇向前，悉力攻敌，势极猛烈。少时，法兵大败，遂退向西城门而奔，安邺及各将官在后，压队退走。公下令赶追，随击随赶，赶到西门城外半里许，法各败将走得力尽筋疲，将到城时，聚作一团，概被公等部众上前，尽行斩首，并斩散兵数十人，大获胜仗，斩驸马者，系先锋吴凤典之功。是役也，枪毙法兵无算，计共斩得首级数百颗，夺获枪械数百枝。驸马所佩带公主所送金时表一个，值银数千两，——此表甚是异样，练是白金，值银千两，内有钻石三十六颗，又宝珠三颗。①

关于黑旗军在第一次纸桥之役中歼灭法军的数目，在《历史草》中还有几处提到："从前刘某在河内与法人对敌，斩首千数级，安邺驸马乃遭身首异处。""公之威震法人，闻声胆落望风披靡，由河内一仗，杀法人数千，安邺驸马一旦授首之所致也。""驸马安邺挂帅出征，率兵五千，河内一仗，被黑旗军几乎一网打尽。"②

其实，这些记载有许多讹误之处。

---

① 《中法战争》(1)，第231页。

② 《中法战争》(1)，第233、第234、第237页。

1. 文中多次称安邺为驸马，并提到法王、公主等。众所周知，在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中，法皇拿破仑第三被普军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遂宣告灭亡。1871 年，法国资产阶级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建立了第三共和国。安邺死于 1873 年底，当时法国不应再有法王、公主、驸马等称呼。

2. 文中称安邺的军阶为五画全金，手下并有一、二、三、四画军官概以数十计，都被黑旗军尽行斩首。其实，安邺被歼时的军阶为上尉，应只有三画，而非五画。越南史书记载此役黑旗军歼敌人数称："是月初二日，刘团就城下挑战。辰安邺方与陈廷肃住署会议，未及提说，忽报有兵来攻，即走回，率部属出城迎战。该团佯走，安邺策马追至纸桥，该团袭杀之。此次斩获五馘，三圈一，即安邺，并二圈一，一圈一，无圈二。"[①] 这与刘永福呈给唐景崧的履历关于此役的说法相一致："是年十月，法匪攻陷河内，奉调剿办。职员冒险当先，鏖战经日，斩获法国大臣三画首级一颗，二画首级二颗，一画首级一颗，及杀散党颇多。"据此，可知《历史草》称安邺为五画军官及杀一、二、三、四画军官概以数十计云云，是不准确的。

3.《历史草》所述此战歼敌人数夸大过甚。我们在前面说过，安邺从西贡出发赴河内时，所率士兵仅 50 余人。到河内后，得堵布益手下的武装协助，总兵力也不过 100 余人。所以，安邺在进攻河内前夜曾有函致人称："我在明天破晓要用百八十人攻击城内七千人。"[②] 而在攻下河内后的一个月内，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九，第 33 页。

② 《中法战争》(1)，第 434 页。

安邺未及得到兵力的补充，却还要分兵去攻打和占领海阳等地，留在河内的兵力就更少了。当黑旗军来挑战时，安邺正和陈廷肃谈判，闻报急忙出城迎敌。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大部分法兵休假，安邺只召集到20多个士兵，拖着一口山炮就出城了。开始，黑旗军佯败后撤，引诱安邺到自己设伏的地方。安邺在罗城坝上掉进坑里，打完手枪里的子弹后，被黑旗军砍了头。安邺的副手班尼带领十几人在另一条堤坝上搜索，也在纸桥附近中伏毙命，幸存者仓皇逃回河内城。《李维业远征记》称："1873年12月，安邺与巴尼各人仅带了十来人左右而被杀。"① 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刘永福与黄桂兰谈及此役，也说："同治十二年十月间，法人已得河内，仅止法兵百余人，香山勇百余，回子勇百余。永福来援之兵亦只数百。至离城数里，法人出城接仗，其队伍零星，数人一起，专以火器见长。自辰至酉，永福设伏，刀矛齐出，毙法官五人，真鬼兵十余人。永福只亡一队目并勇六人。败退入城，若非南官议和，可以尽数歼除。"② 据此可知，在第一次纸桥之战中，黑旗军歼灭的法军只有数人，最多也不过是十余人。而《历史草》却说成是数百、千余、数千、五千等，夸大了将近数百倍。

第一次纸桥之战的规模之小，还可以从事后越南政府对刘永福的赏赐授官中看出来。在唐景崧的《请缨日记》中，曾称刘永福因阵斩安邺而获授越南三宣副提督职务："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内，……渊亭乃率队裹粮，蓦越宣光大岭，绕驰河内，一战而斩安邺。……而授渊亭三宣副提督职，给敕印官

① 《中法战争》(3)，第342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343页。

服。"[①] 自此说一出，后人许多关于刘永福的文章和专著多沿循之。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原来，在开始时越南国王对于第一次纸桥之战胜利的评价并不高："刘团诱杀安邺，特出一辰之计，若堂堂正正与之角胜，想亦难于持久。"[②] 因此之故，给刘永福的赏赐不多，升官也不高。越南史书记称：同治十三年三月，"准刘永福拔授该次副领兵官。该团自管带以下赏升三秩，并普赏在行兵勇银两钱文（银三百四十五两，钱三千缗），录纸桥战功也。"[③] 刘永福履历也称：阵斩安邺后，"蒙统督保奏，奉国王旨，刘永福著赏副领兵衔，仍充保胜防御使"。保胜防御使是刘永福因助剿黄崇英而获授的，因此他这次所得的仅为一个副领兵的虚衔而已。而所谓的三宣副提督，是他日后参预助剿黄崇英和李扬才获授的。

第一次纸桥之战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对刘永福本人的命运及中、越、法三国的关系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刘永福个人而言，第一次纸桥之战前，他曾参加广西农民军十年，最后却弄得立足无地，求生不能。入越后，又与黄崇英等敌对势力鏖战六七年，也打下一块不小的地盘，并获授中越两国政府所赐予的各级大小官职，与以前已是大有不同。但是，他目睹越南国弱民穷，外患日迫，并非世外桃源。自己所得的两国职衔均为名义上的虚衔，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在两国政府眼里，自己仍是一个已经归顺的贼目，野性未驯，不可信用，地位并不巩固。一旦法军进攻，越南沦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自己又将存身无地。为此，他曾在光绪初年参

① 《中法战争》(2)，第 71～72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九，第 33 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〇、第 180 页。

预平定黄崇英后，向滇桂两省地方官员恳请允许回国谋生："宁为中朝千总把总，不愿作越南提镇大员。"但都遭到拒绝，黑旗军的前途仍是一片渺茫，不知是何归宿。第一次纸桥之战得胜后，刘永福由一个受人歧视的归顺贼目，一跃成为万人瞩目的抗法英雄，黑旗军的性质从而也发生了变化，从寻常的农民军变成抵抗法国侵略的主力。将个人的命运和抵抗法国侵略的伟大事业联系一起，成为中越两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的抗法中坚，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对于越南而言，自从 1847 年法国派军舰前来挑衅以来，出于维护本国领土和主权的要求，越南政府也不甘心坐视法军的猖獗侵略，曾组织过防御和抵抗。怎奈将帅无能，军队腐败，攻而不摧，守而不固。虽然是在本土作战，占有地利，但手持土枪土炮的数千越南官军，不敌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数百法军，闻枪响即惊，被炮轰即溃，任由法军长驱直入，先占南圻六省，继侵北圻，全越的沦亡，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黑旗军出而一击，敌酋授首，失地全复，凶焰顿遏。越南军民从中看到了抗法斗争的希望，找到了抗法的中坚力量，增强了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

对于清政府来说，第一次纸桥之战的胜利，也使它找到了援越抗法的契机。中越两国存在着长达九百多年的封建宗藩关系，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安危与共，当然也不愿意法国吞并全越。但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当法军吞并越南南圻六省时，正是清政府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受英法联军的打击，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时候；接着，清政府又忙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一时无力顾及越南，越南政府也未向中国请援。等到

清政府好不容易喘过口气，法国侵占越南南圻已成定局。1870年，清政府曾有旨询问广西官员："安南国沿边膏腴，如胥江等处，在安南为三省地方，其广不过中国一郡，该国谓之东京。近年闻为法国所占据，有驻扎重兵并设提督等官情事。"要求广西派出官员前往确访一切情形，据实奏闻。广西巡抚遵派知府徐延旭赴谅山一带密查后，报告法国占据南圻六省情形。但奏上后，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①。1872年，广西出兵入越援剿，法国殖民当局居然以越南政府的太上皇身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广西巡抚刘长佑称："法人不悦（桂军援越），讦告通商衙门，谓臣包藏祸心，有意败盟。"② 1873年，当安邺肆虐河内时，援越桂军正在太原等地作战，兵力远较法军为大，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止法军的猖獗。但清政府却严厉禁止援越桂军卷入法越矛盾之中："粤军于边关内外堵剿越南各匪，与法国绝不相涉，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臣转饬遵照，勿令别滋事端。"③ 后来闻知黑旗军阵斩安邺，清政府又有旨："粤西防军向扎越南高平、谅山二省，已由瑞麟等知照法国领事，勿得进兵侵犯。该处粤军亦不向河内境前进，免至互启猜疑，有伤和好。"④ 这些事例，说明当时的清政府自认为无力与法国抗争，阻止法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只得装聋作哑，置身事外。然而，清政府采取这种态度是出于无奈的，对于这种严重损害宗主国威望并危及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甘心。所以，当刘永福阵斩安邺、遏止法军侵

① 《清穆宗实录》，卷二八七。
② 《中法战争》（1），第88页。
③ 《清穆宗实录》，卷三六二。
④ 《清穆宗实录》，卷三六二。

略势头的消息传播后，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使他们逐渐产生和形成通过助刘抗法的方式来达到援越抗法的目的。

对于法国而言，自从1847年首次向越南挑衅以来，二十多年间，法军只要出动有限的几艘军舰和数百军队，就可以任意骚扰越南沿江沿海各地，打得对方丢盔弃甲，无法抵抗，被迫俯首求和，割地赔款。甚至堵布益在河内蔑视官府，凌辱百姓，横行霸道，肆意妄为，靠的也就是手下的百把武装。而安邺则更嚣张，率兵数十即敢横行北圻。这种情况如果能够继续下去的话，法国不需花费多大力气，就可以侵占全越。但是，黑旗军的阵斩安邺，却似晴天的霹雳一样，打破了法国侵略者的如意美梦，使他们认识到，不出动相当的人力物力，法国侵略军是无法战胜越南军民的抵抗而轻易吞并全越的。

1870—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虽然这笔赔款法国在1873年即以向法国人民广泛借公债的方式付清，却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法国政府每年要为这些新的公债支付高达3.4亿法郎的利息，加上战争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开支，每年为7.3亿法郎，占了国家正常支出预算的40%。政治上，这时的



刘永福部黑旗军士兵（画）

法国正进行着王党与共和派之争，各派政见纷歧，勾心斗角，严重削弱了法国政府的决策能力和行政能力。这表明，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法国都还是一个相当虚弱的国家，根本无力派出更多的兵力前往侵略越南北圻，反而要收敛它的侵略野心。“故法人寝谋不敢遂吞越南者，将逾一纪”[1]。

如果黑旗军在第一次纸桥之战战败的话，历史的发展就会简单得多，也许既不会有中法战争，也不会有后来的民族英雄刘永福。但是，刘永福战胜了，可这只是小胜，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侵越问题，于是，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四　1874 年法越条约

第一次纸桥之战获胜后，越南的抗法形势大好，但是腐败无能的越南政府却不懂得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反而在法国殖民当局的引诱和欺骗下，于 1874 年 3 月 15 日与法国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又称为《1874 年法越条约》）。条约有如下条款：

第二条：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阁下，面对一切外国，不论哪一个外国，承认安南王的主权和他的完全独立，答应给他帮助及救援，并约定在他要求时，将无偿地给予必要的支持，以维持他国内的秩序与安宁，以防卫他对抗一切攻击，并以消灭蹂躏〔安南〕王国一部分海岸的海贼活动。

第三条：为对此保护表示感谢，安南王陛下约定使他的对外政策适应法国的对外政策，并且丝毫不变更他现有

---

① 《中法战争》(1)，第 1 页。

的外交关系。

第五条：安南王陛下承认法国在它现在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有充分的、完全的主权。

第十一条：安南政府约定开放〔如下〕诸埠口通商：平定省的施耐汛、海阳省的宁海汛与河内市，以及由海至云南经由珥河的通道。

第十三条：在每个开放的通商口岸，法国将任命领事或代理人〔驻扎〕，并派足量军队随伴，以保障其安全，使其权威受尊重，并在外国人间行使警察职务。这种军队的人数不得超过一百人。

第十五条：如果有法国旅行者应以学者资格周游国内，也应将此事实〔向当局〕宣告。在此名义下，他们将享有政府的保护。[①]

此外，还规定法国在越南享有领事裁判权等。

对于这个条约，中、越、法三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法国看来，签订了这个条约，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越南北圻建立了保护制。1875 年 4 月 19 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蒙塔那克致函外交部长德加斯，谈及有关这个条约说："我们目前的介入是为保护国制度作准备，以后保护国制度一定要明确地建立起来并得到公认。……安南王国今日已经孱弱不堪，它也承认自己已无力使其臣民对它俯首听命，因此它不得不接受一个大国的保护。我们在交趾支那所取得的权利，不允许听从除了我们之外的其他势力来对嗣德帝施加影响。……我们为在这个国家奠定法国统治的基础已经付出很多代价，因此，我们

① 《中法战争》(1)，第 380～385 页。

应当继续我们的事业，要做到既不冒进又永不偏离目标，尤其是我们不能走回头路致使前功尽弃。”① 但是，这只是法国的一厢情愿罢了。

在刘永福和越南政府看来，事情并非如此。1873 年 12 月 24 日，风闻越南政府已与法国签订和约的刘永福，在给法国轮船“红河”号船长乔治的一封信中，就严厉地谴责了法军侵略越南北圻的无耻行径，表达了他毫不妥协地反对法国侵略者企图通过保胜的坚决态度：“我得对你说，既然现在法国与安南王已有一项条约，你们就能把你们买到的货物托付给中国人，他们可以自由地沿河到保胜，只是我不同意欧洲人的轮船和外国人到那里。假若中国商人偶然在途中遭到抢劫，我将负责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是，我还要重复一遍，如果欧洲船或欧洲人要来保胜的话，我声明我将以武力阻止他们，我们要看看谁能压倒谁。”② 在法越两国签订和批准交换了新的商务条约后，为了了解红河两岸的贸易情况，1876 年 10 月，交趾支那总督迪佩雷指示驻河内领事可加拉德克前往保胜与刘永福会晤。但是，刘永福坚持自己的抗法立场，使对方铩羽而归。

据说，越南政府对这个条约也不以为然，认为是上当受骗了。光绪九年（1883 年）初，唐景崧到越都顺化与越南执政官员阮文祥会谈，特别提到有关保护制的问题。

景崧：闻彼族有借保护为监国之谋，不敏确有所闻，贵国独不知乎？

阮文祥：他蓄此心已久，但小国不受耳。下职察知他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 101～102 页。

② 法国外交部档案 C. P. C 中国，第二章。

以为保护巧谋，经奏闻国王不准。

景崧：是保护之语彼族现有明言，贵国早知此即改约中之名目也。贵国亦将保护之利害反复详思，知有万不可从之势乎？抑将游移两可乎？

阮文祥：保护之款是他狡处，于嘉定时已有此语，但下职不肯。

唐景崧又与陈叔讱会谈。

景崧语：现彼族所要约者究系何款？其大款在保护一节。

陈叔讱：至其要以保护一款，下国实不敢从。

景崧：贵国与法立约，其第二款有并非遵服何国之语。在贵廷之意，以为如此措辞，则系自主之国，可与彼族平行。然措辞失当，遂使彼族得以借口。嗣后于此等语言文字，诸宜审慎。我皇帝天容地涵，未加责问。但恐贵国授人以矛，陷己之盾矣。

陈叔讱曰：此是立约之辰为他所赚，国王久已谴责。惟天朝包涵之量，不屑责问，而下国已自心愧矣。但已错过。……事已错过，知悔则已晚矣，惟祈怜之恕之。[①]

既然有此想法，越南政府在执行条约时，就不能完全履行其中的条款了。早在1875年，交趾支那总督及其属员就不断地向法国政府报告，当他们按照条约的规定着手在海阳、河内等地建立领事馆和派驻100名军队时，却发现越南政府并不希望法国侵略势力进入河内、海阳和东京地区，他们不断制造困难，阻止法方实施条约上的有关条款；1876年，越南政府公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292～298页。

开派出使团向中国朝贡，当法驻河内领事询问使团，到北京后要不要去见法国驻华公使时，得到的答复是：使团曾得到越南政府的指示，待朝贡结束后，应该去拜访法国驻华公使，但是，这只能在得到负责接待的中国官员同意后才能进行。后来，这个朝贡使团并未去见法国驻华公使。尤其使法国殖民当局恼火的是，在贡表上，越南国王仍以中国的藩属自居，而这恰恰是1874年法越条约特别加以否认的。而在1878年，由于清将李扬才反叛入越，越南政府向中国请援，在请援文表上，再次重申了中越之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1879年，越南国王向交趾支那总督提出归还南圻六省的要求。由于越南政府或明或暗地抵制和反对1874年法越条约，使交趾支那总督迪佩雷感到难以实施1874年条约的有关条款。为了暂时缓和越南政府的反法情绪，1876年他致函海军殖民部长傅里松，建议法国从1874年条约上后退。这些建议包括：法国政府向越南政府保证不怀有任何征服的想法；撤销在河内和海阳保卫领事的驻军；废除不准安南政府改变它目前对外国的外交关系的条款；法国只能保持以下几点：在交趾支那六省的主权；对东京诸港口开放对外贸易；优惠基督教徒。稍后，迪佩雷还主张法国不去干预越南按照惯例向中国朝贡，虽然这是违反1874年条约的。迪佩雷提出这样的公式让法国政府选择：要么是征服东京，要么是放弃东京。

但是，法国政府驳回了迪佩雷的建议。1877年9月17日，外交部长德加斯在致海军殖民部长图斯的信中指出：尽管就法国目前实力而言，还无法去管理一个比交趾支那大二三倍的地方，因而再设法扩大法国在东京的势力的策略是不值得考虑的。但是，他也不同意从1874年条约上后退，而主张保持

现状，维护既得利益，不作任何放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国政府决定撤换迪佩雷，代之以罗丰为交趾支那总督。法国政府给罗丰的训令，就是要求他保持 1874 年条约的既得利益，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罗丰到任后，于 1878 年 3 月 21 日向法国政府报告，表示要执行法国政府的上述方针。

至于清政府对待 1874 年条约的态度，就更是微妙而令人寻味的。早在 1875 年 2 月 27 日和 4 月 28 日，德斯加两次指示法国驻华代办罗淑亚，向清政府通报 1874 年法越条约的签订，并要求中国撤回应邀入越的中国军队和开放红河通商。虽然德加斯在信中援引法越条约的第二款后指出："面对如此明朗的形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总理衙门今后一定会放弃派兵去干涉安南各省领土的任何企图。因为，只有我们有权在这些省份恢复秩序和保卫居民安全，决不承认其他人有这种权利。"[1] 这就意味着否认中越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封建宗藩关系，但却没有明确强调越南已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根据德斯加的指示，1875 年 5 月 24 日（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一日），罗淑亚致函执政的恭亲王奕䜣："本国执政与交趾国大皇帝于去年正月二十七日议准一个和约。现经本国公会堂允准，订于本年二月初七日在交都之交州府交换此和约之底，本大臣抄录一纸送贵亲王查阅。交趾国嗣后得保无虞侵凌，且得自主，皆资法国之职分所顾。"[2] 在递交此函后三天，罗淑亚致函德斯加，提到在致恭亲王奕䜣的信中，未能明确地指出法越两国的保护国关系实质的苦衷：即法国政府和交趾支那总督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 96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3 页。

一致，他深怕卷入一个难以解决的争论中去，所以略而不谈这个问题。

虽然罗淑亚想以含糊的词句略过法越两国的保护国关系的实质，但清政府仍从中敏感到事情的要害所在。只是由于当时清政府正与英国交涉英国翻译官马嘉里带队窜入云南遇害一案，英国趁机大起风波，提出许多清政府难以接受的无理要求，甚至出动军舰以战争相要挟。清政府不愿在这种时候再与法国纠缠不清，以免英法两国再次联合对付中国。所以，在恭亲王奕䜣6月19日（五月十二日）给罗淑亚的复函中，指出中越两国之间存在着封建宗藩关系，但为了避免因此而引起同法国的冲突，在措辞上对此含糊其词谓："至交趾即越南，本系中国属国。"[①] 这句话是在重申中越之间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呢？抑或是把这种关系看成是已属过去的往事呢？不同的人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

在罗淑亚1875年6月19日致德斯加的函中，他把恭亲王奕䜣的这句话解释为中越宗藩关系已属过去，清政府默认法越关系的现状："这次恭亲王写来的回信，要比我所期望的好得多，因为，亲王只是以过去的方式来谈安南对中国的附庸地位，这是对新地位的默认。"[②] 交趾支那总督迪佩雷在这个问题上也与罗淑亚有同感。1876年10月18日，他就越南政府派使团前往北京朝贡一事，致函法国驻华公使白罗尼称："法国先占领了3个，然后是占领6省，1862年同顺化朝廷签订了一个条约，1874年又缔结第二和第三个条约。可是中国政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2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107页。

府对这些占领和外交谈判都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也没有援引它对安南的宗主权。因此，安南对中国的藩属关系只不过是纯历史意义而已。"①

但是，外交部长德斯加却认为事情并不像罗淑亚等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当他考虑撤换迪佩雷，重新制订无论在北京或顺化都可以采取和遵循的行动准则之前，曾于 1877 年 5 月 30 日致函白罗尼，征求他对中越两国关系实质的看法。9 月 30 日，白罗尼复函德斯加，对中越两国关系的实质和恭亲王奕䜣复罗淑亚函中那句关键的话，提出与罗淑亚等人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恭亲王奕䜣那句话实际上是援引宗主权，强调中越两国一直存在着传统的宗藩关系。11 月 30 日，新任法国外交部长班纳维尔复函白罗尼，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在同中国政府的交往中，要它对安南王国完全独立的问题发表明确的声明是弊多利少的，目前还未到最后摊牌的时候，只好维持原状，不去作进一步的努力。

总之，法国在诱迫越南政府签订 1874 年条约后，认为已把越南北圻纳入法国的保护制中，但却遭到中越两国或明或暗的抵制和反对。法国在无力迫使中越两国进一步屈服的情况下，只得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妥协态度，容忍和掩盖矛盾，以待时机再作根本的解决，这就埋下日后三国矛盾和冲突的祸根。

---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 133 页。

第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　法国阴谋吞并越南北圻

法国容忍中越两国抵制1874年条约的时间并没有延续多久，1878年发生的清将李扬才反叛入越的事件，成了法国改变对中越政策的诱因。

在法国政府看来，在中越两国平定李扬才事件的过程中，有些事情是不能容忍的：一、越南政府在因李扬才入越扰乱而向中国请援时，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再次重申并强调了中越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二、中国军队应邀入越助剿并长期留驻越境。法国政府认为，上述种种情形的出现，都是严重违反1874年法越条约的。因为按照该条约规定，越南和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隶属关系，而当越南遭到外敌骚扰和入侵时，只能请法国出兵帮助。为了防止中越两国进一步密切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封建宗藩关系，阻止中国军队继续留驻越南，在1878年底，法国政府就策划以李扬才事件为借口，出兵北圻，武力吞并全越。1878年12月30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波多致函外交部长瓦定敦称："我认为，不管是安南要求我们进行武装干涉——因为它本身无法维持政权而要我们帮它维持；或者是叛乱者通过突然的暴力行动占领东京后同我们交涉，我们在安南的保护国制度都应该切实地建立起来。"他还认为，在北圻建立保护国制

度会给法国带来好处[1]。在得到外交部长的赞同后，1879 年 1 月 10 日，波多指示交趾支那总督罗丰："我授予您必要的权力，缔结一项新的条约，以便在东京确立我们的保护国制度。"[2]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相当的人力物力作后盾，交趾支那总督并没有这些力量，所以也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于是，法国政府又准备换马，在 1879 年 5 月以卢眉取代罗丰任交趾支那总督。这时，北圻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李扬才在中越两国军队的追剿下，已遭到致命的打击，全军覆没，只带着几个亲信逃脱，再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二是应越南政府之邀，中国军队仍留在北圻搜索李扬才。三是越南政府正式向法国殖民当局索回南圻六省。这些情况都使法国政府认为会威胁和危害到他们在北圻的利益和尊严，因此，新任交趾支那总督卢眉坚决要求法国政府拿出一个迅速有效的解决办法，结束那些不断发生的纠纷和麻烦。

1879 年，是法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企图复辟帝制的王党统治随着麦克马洪总统的下台而宣告结束，接着执政的是共和派的刚必达内阁和茹费理内阁。这是两届狂热鼓吹殖民扩张的政府，他们将海军殖民部长换成更富于侵略性的游列居伯利，这人履任不久，就决心将前任扩大侵略北圻的纸上计划变为实际的行动。1879 年 10 月 1 日，游列居伯利致函瓦定敦，提出侵略北圻的具体计划："这样一来，必须进行一次远征。而根据我得到的情报，这次远征不仅要征服东京，而且要在那里停留几年。3000 名海军陆战队或炮兵队，3000 名安南部队，12 艘炮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 187 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 192 页。

舰或通讯舰，有了这些行动手段，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①]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重大决策，不是海军殖民部和外交部所能决定的，于是他们将它交给法国议院讨论。但是，法国议院没有批准这一计划。

1880 年，中国军队继续应越南政府之邀，留驻中越边境地区援剿，而越南国王不顾法国殖民当局的劝阻，又准备派遣使团到北京朝贡。这使法国政府认为占领东京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情。7 月 26 日，外交部长法来西纳要游列居伯利再次制订侵犯越南北圻的计划，呈给法国议院。1881 年 7 月 22 日，法国议院通过决议，拨款 250 万法郎，作为法国侵略北圻的经费。

随着法国政府决定扩大侵略北圻，打着各种旗号深入到北圻各地侦察的法人逐渐增多，这种情况引起了越南政府的注意和警惕。年初，当法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出，要派所谓的科学家到北圻考察时，越南国王就敏感到其中必有文章，要求北圻地方官员防备：“他行非学博物，亦疑我经理山分，且寻路径，诱诳蛮民，皆有深意，不可视常。”[②] 令咨顺庆以北各省及山防营田典农诸衙密为防察。

第一次纸桥之战后，刘永福和黑旗军将士对法国侵略者充满着刻骨仇恨，平日在河内等地遇见法国人，都会拔刀相向，以至越南政府也知道：“刘之于富（即法国人），两素相仇，该团属负气者多。”因而指示黄佐炎转令刘永福“严禁团丁，嗣有惯横遗碍，惟该是问。”[③] 刘永福受到约束，只得对黑旗军将士强加控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 227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五，第 5 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九，第 17～18 页。

制。现在,既然越南政府已指示密为防察,刘永福和黑旗军将士就大着胆子去干了,给前来窥伺侦察的法国人以打击,于是就发生了下面的几件事:

越南史书称:1881 年九月,西商三名取路兴化前往云南,抵黑旗军驻防的陇鲁屯,与刘团相挑激而返,富领事以阻商咎我①。

法人因云南宝山最多,垂涎已久,屡由河内省之洮江经山西、兴化直达滇中,窥视铜锡各厂,因每次只一二人微服潜行,刘永福置之不问。一次突然驾船几艘,内载洋人二十余名,刘永福并未奉有行知,本不许过保胜,因护送委员言之再四,始许令前进,但戒不得窥探。逮该船过境,有数洋人直登船篷高处,用千里镜四面瞻眺,绘取地图。刘永福即督率在岸兵勇,施放排枪一轮,洋人惊惶回棹,致一船搁石破碎,船中两洋人跳水身死,余船狼狈而去。

又一次,有法员六画者,携越执照,往芒街察勘白铅山。刘永福以为法将图己,陈兵拒其人内,越官往解亦不听,法员乃折回。

刘永福在 1882 年曾对人说过:越南奸民吴源成,嘉定人,系夷妇所生,现在海阳开店,向为法人耳目。去年亲赴保胜求见,刘永福力拒三次,始令巡捕传话。据称法人命渠面恳刘永福按兵不动,任法国做事,倘能据有全越,必不相负云云。刘永福大怒,欲斩之,乃乞哀鼠窜而去②。

法国侵略者对于刘永福的反法抗法行为十分恼火,1881 年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六,第 18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96 页。

10月2日，交趾支那总督卢眉从巴黎返回西贡任所前，与海军殖民部长克路埃就今后在北圻的行动交换了意见，然后以克路埃给卢眉训令的形式确定了他们的共同看法："为了迫使越南政府履行1874年法越条约的条款，恢复法国政府的威望，保护欧洲人，交趾支那总督要以将所有的海军派往东京沿海地区，并以增加河内和海防的驻军的方式进行一次军事示威演习，但绝不能变成一次军事行动。"

计划既已确定，剩下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适当的借口去实施这一计划了，这样的借口很快就被找到了。11月10日，卢眉向法国政府报告在越南北圻的北黎附近发生的一次黑旗军拦阻法国旅游者的事件称：

> 我今天同时收到法国驻河内领事先生的两封信，有关两个法国人古丁先生和威列罗亚先生在红河上进行考察一事。他们持有领事馆签发的护照，原打算以学者身份前往云南。
>
> 没过多久，两位考察家就不得不中断旅行，因为10月8日在离开宝河时受到辱骂后，又在离老街约40里的小城堡处受到袭击，他们雇用的一个马来亚人大腿上中了一弹。
>
> 他们被迫又回到该省省会宁和，在中国人咄咄逼人的态度面前又不得不再向后退，一支几百人的中国队伍在黑旗军亲自指挥下刚刚到达此地。这两个法国人在没有了船夫，又没有安南当局的保护的情况下，毫无办法，只好一直退到黑水河汇合处。据最新消息说，他们准备再从另一河流逆水而上。①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440～441页。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为了考察东京海岸的煤矿，卢眉请法国政府派来一个矿务工程师考察团，成员为菲希教授和萨拉西工程师。他们于 12 月间考察了鸿基煤矿。当他们准备继续考察另一处海岸时，却发现那里已被黑旗军占领。黑旗军阻止他们登陆，考察团被迫撤离，考察计划也就流产了[①]。

法国殖民当局就上述事件于 1881 年底致函越南政府，胁迫越南政府驱逐刘永福和黑旗军，以保证法国人的安全。"书叙刘团违约阻商，祈由我国屏逐方妥，否则，请至西正月初一日，该国必有处置。"[②] 但却为信任和倚重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越南政府婉言拒绝。于是，卢眉决定由殖民当局派兵去完成这一工作。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新任交趾支那海军分舰队司令的李维业上校。

李维业生于 1827 年，1843 年进入法国海军学校，毕业后在法国海军服务，曾参加过远征墨西哥，但却在军事上毫无建树，只是凭年资晋级，50 多岁时获得上校军衔。他也知道自己的军事生涯快要结束，该准备退役了。在海军任职的同时，他还从事文学创作，出版了诗集，发表过许多篇小说，还上演过剧本。1881 年，李维业被任为交趾支那海军分舰队司令。这是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职位，它的职责，是警戒从新加坡直到海南海峡的印度支那海岸，以及交趾支那和柬埔寨之间的江河航行。这是相当乏味的工作，加上欧洲人又不大适应当地的气候，所以，在李维业之前曾先后有两个上校拒绝了这项任命，而李维业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于 1881 年底抵达西贡。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 456～458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七，第 7～8 页。

1882年1月17日,卢眉给李维业下达了进兵北圻的命令:

由于两名持有正式护照的法国旅游者古丁和威列罗亚遭受袭击,我不得不向安南政府提出抗议,要它将它豢养的名为黑旗军的中国雇佣兵驱逐出境。顺化朝廷没有拒绝我的要求,但它推说这些非正规军过去曾为它效劳,然而实际上是由于它的软弱无力,所以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它只是答复我,它将设法让他们离开该地。另一方面,我听说,刘永福前不久曾往中国,沿途受到军事首脑般的欢迎,他身上携带巨款,肯定是作为招募新兵之用。与此同时,海关扣押的东西中,可以证明他得到大量速射枪支和弹药的补给。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部队不受突然袭击。所以我决定把河内的驻军增加一倍。请您令"斗拉克"号在星期四下午载两连援兵启航东京,我希望您能主持此事。你知道共和国政府的意图,政府绝不要在远离法国4000公里处进行一场战争,因为这会把国家卷入严重的纠纷之中。我们必须以政治的和行政的方式来扩大和巩固我们在东京和安南的势力,因此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属于防卫性质的。因此,您只能在绝对必要时才使用武力。我信赖您一定会谨慎从事以避免发生意外,何况目前仍不太可能发生。……您绝不可与黑旗军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我们来说,这些人都是盗匪,如果您碰到他们,您也应该这样去对付他们。不过,因为我们要表现出爱惜人命,您不要枪毙他们,而是把他们押到西贡来,让我把他们关到昆仑岛上去。

如果您碰到中国军队——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您要注意避免同他们发生冲突。

……

我想不必要向您发出更详尽的指示，这只能给您带来不便，因为很可能会发生那些难以预料的事端和需要。但是我相信，您的爱国热忱和您的智慧不会使共和国政府走上一条它不愿意走的道路上去。

我的想法总的可以归纳为这样的一句话：避免开火，干戈只会给您带来烦恼。[1]

1月18日，卢眉将这道命令呈报法国海军殖民部批准，由于恰逢部长换人，于是延至3月4日，新任海军殖民部长游列居伯利答复卢眉，批准他的计划，但重申要李维业非因绝对需要，不要诉诸武力："我同意您在今年1月18日来信中向我呈报的对李维业司令发出的指示。您嘱咐这位校级军官在绝对必要时，不要诉诸武力，这点您是完全遵循我部的意图而作的。我希望李维业先生能够应付这个国家因被打着各种旗号的许多武装匪帮占领而在东京造成的这种棘手的局面。"

无论是卢眉给李维业的命令抑或是游列居伯利的答复，都反映了法国殖民当局既想扩大对北圻的侵略，但又显露出力不从心的窘态。他们打的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如意算盘。即用军事威胁的办法制服怯懦无能的北圻地方当局，以便兵不血刃地在北圻建立起法国的殖民统治，但又尽量避免与黑旗军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免得使法国卷进一场它不愿意进行的战争中去。"非到绝对必要不要诉诸武力"，说明法国是很不愿意动武的，但"绝对必要"的含义应该理解为用和平的威慑方式能否使北圻当局屈服就范，假若做不到这一点，那将不惜动用武力，

---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490～491页。

这又暴露了法国殖民当局不顾一切也要达到目的的冒险野心。

3月26日,李维业率领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配备两门山炮的15名炮兵以及15名安南狙击兵,乘坐"斗拉克"号和"巴斯瓦尔"号两艘舰艇启程北上,于4月1日到达海防,2日到达河内。4日,李维业与河内总督黄耀会晤,李维业首先向黄耀呈递了一封信,阐明他此行的目的:

总督先生:您要求我给您写信,告诉您我在拜访时要对您谈些什么,我非常愿意。交趾支那总督派我来东京是为了加强驻河内的部队,军队已经增加了一倍。法国政府和交趾支那总督有某些理由对安南政府提出指责。即使不谈古丁先生及威列罗亚先生和黎那先生家中仆人的往事,最近又发生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法国学者福希在黑旗军占领的芒街万宁没有能够下船登岸,刘永福用枪炮对准他乘坐的船只。这是对法国的一种侮辱,因为船上挂着法国国旗。这也是对法国的朋友和同盟者安南政府的一种侮辱,因为条约规定两国互相支援。然而,安南政府回答说,它不能反对黑旗军,由于黑旗军曾为它效劳,因此,它对黑旗军承担了义务。

因此,法国有义务保护它的国民和旅游者,给予它的同盟者所应有的行动手段,这就是河内驻军增加的原因。总督先生,至于我本人,我将尽一切努力,使我的士兵同黎民百姓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1]

但黄耀却不以为然,只是冷淡地回答:对黑旗军,他实在没有办法对付,因为这事不发生在他那里。结果,李维业毫无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21页。

所得而返。

这次会晤表明双方的立场和观点相差很远。对于李维业突然兵临城下的挑衅行动，越南政府采取了三条应付措施。

1. 派户部左侍郎阮诚意前往西贡，与交趾支那总督卢眉交涉，希望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避免发生冲突。1882 年 4 月 27 日，卢眉向游列居伯利报告了这次交涉的经过：

开始，卢眉即批评越南政府不能有力地制止黑旗军阻拦法国商人通过保胜。阮诚意力图说明：黑旗军是不伤害人的，我们对他们无可责备，卢眉收到的那些关于黑旗军的报告是不正确，而且言过其实。但他承认，他的政府感激黑旗军的效劳，因此不能把他们送回大清帝国。于是他向我建议，既然他们使我们感到不安，就让他们驻扎在山区远离我们的哨所。

卢眉不相信越南政府能够迁移黑旗军，并认为如果地方当局无力把刘永福赶走，那么它更无法制止他们到平原进行敲诈勒索，我有义务确保我们机构的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红河上游建立我们的哨所。

阮诚意反对说：条约没有规定建立新的机构，你们的要求将何时休止；如果到处都是法国的士兵，安南将不再是主权国家，法国增加驻军就违背了条约。

卢眉根本不理会阮诚意的反对，并得寸进尺地提出：河内政府集结了军队和进行明显的防御准备，有可能破坏当前的形势，法国驻军如发现它周围有大量的部队，就不得不驱散这些部队，大动干戈的时刻就会到来。

阮诚意显然是将卢眉的话意理解错了，回答说：没有什么可怕，安南部队不会进攻法国人。但他很快就会意过

来，卢眉担忧的是法军会进攻越南军队，于是表示要马上报告越南政府，要求政府解雇一部分军队，并使头脑发热的河内总督冷静下来。

卢眉同意阮诚意的做法，并希望越南政府能及时下达命令，以免双方发生冲突。最后，卢眉向游列居伯利指出：既然无法把黑旗军赶走，就要使它远离此地；在红河上设立我们所希望设立的哨所，自由通商，更全面地履行条约。①

法越双方的这次交涉表明，作为李维业的上级的交趾支那总督，也不希望与越南政府发生武装冲突。

2. 指示北圻统督黄佐炎、靖边副使张光enig、阮有度设法处置刘永福和黑旗军，以缓和法军的敌意。后又加派吏部尚书阮政充北圻经略使、户部参知兼管都察院裴殷年充副使，前往协助黄佐炎等办理此事。并指示他们，如法军与黑旗军发生冲突，越南军队应保持中立："若他（指法军）只自卫商则善处之，勿先构衅；或要与刘团报复，则由统督使远之。倘他恃强率往山西要争，则随宜妥办。在我只劝谏，务得公平，勿可偏为何人。幸而无事则已，万不获已，应征调者各应即办。"②

3. 为了以防万一，越南政府同时也密谕北圻各省备战以应变："富派欲谋北圻，特借刘团为名，深意实不可测，在我亦当先备。"据此，越南政府指示宁平、河内的南定、兴安、海阳、广安、山西、兴化、宣光、北宁、太原诸省督抚："凡事要须善办，勿可动有声迹。如能潜消默革固好，若他敢横到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517～519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七，第7～8页。

头，事不获已，准各随事当办，以尽守土之责。”根据越南政府的指示，河内、山西两省督抚黄耀、阮廷润、黄有秤等密陈预防之策称：“北圻形势，左边自宁平达于美德山兴，右边北太及海之东潮，均有山分险要可据，自我若能大加经理，壮上游以卫中州，彼便于水，不便于山，则亦知难而不敢动。”[①] 南定省则奏请捍筑江道，设垒置炮；黄佐炎则要求撤回正在清剿各处的越南官军，并调黑旗军前去助守河内。

对于越南的备战行动，急于在退休前立功扬名的李维业，在早就处心积虑想攻占河内的可加拉德克等人的怂恿和支持下，决定先发制人，趁对方尚未准备充分的时候攻占河内。为此，他匆忙从海防调来军舰“军乐”号和150名士兵，以增强自己的实力。4月25日，李维业派人给黄耀送去了最后通牒，限他们在三天之内将河内的工事和武装除去后交给法国人。在期限到达之前，黄耀及河内当局的主要官员要到领事馆作人质，否则，法军将在8点钟进攻。

河内当局没有答复法军的无理要求，于是，李维业到时便指挥法军攻城。河内军民也作了抵抗，但由于法军的炮弹击中了弹药库，守军惊溃，被法军乘势攻入城内，黄耀自杀殉国，法军又一次轻易地攻占了河内城。听说李维业用武力攻占了河内城，交趾支那总督卢眉先是一阵惊慌，连说：“糟了！糟了！”但很快就承认既成事实说：“很好，我很高兴。”并向法国政府报告：“五月一日，成为我们安全的威胁的河内城被我军攻略，即将加以拆毁，我们仍与安南保持关系。”[②] 完全认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七，第7页。

② 《中法战争》(3)，第366页。

可了李维业的行动。肩负北圻军事重任的黄佐炎等人，对于李维业杀官夺城的野蛮行径无比愤慨，上疏越南政府请战："富派此来兵船，倍违原约之数。河省问及，则以逐团为辞。逮守土者城内略防，即来攻城，随复交还，谁曲谁直，当已播于诸国。"认为法人阴谋是"不并北圻全辖不止"，主张"当一战而后和，庶可遏彼狼心"。表示"臣等仰荷威德，鼓率军民，守者悉力保国，战者分途合攻，务期大加剿洗，一雪前耻"①。黄佐炎并派人召回刘永福，要他率领黑旗军进驻离河内 50 里的山西省城，准备攻打河内，赶跑李维业一伙。

我们这才想起，交趾支那总督是趁刘永福不在北圻时才派李维业北犯的，李维业敢于肆虐河内，与没有受到刘永福的威慑也有关。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刘永福去哪里了呢？

二　刘永福回国请援

对于法国企图侵略北圻的阴谋，刘永福身受其害，可以说是经历最多，感受最深的。因为自从他阵斩安邺，挫败法国的侵略阴谋以后，他就成了法国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去之而后快。他们不断向腐败无能的越南政府施加压力，要驱逐刘永福和黑旗军出保胜和红河沿岸各关卡，从而严重地干扰和威胁着黑旗军的生存和发展。

早在法越双方签订 1874 年条约时，越南国王就曾担心：保胜乃通商门户，商政不日施行，如有梗阻，法人或有烦言如何？因而与群臣讨论了处置刘永福和黑旗军的事宜。但群臣认为当时还需要依靠黑旗军作主力去追剿黄崇英等部，应该暂时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七，第 19～20 页。

搁置此事。越南国王权衡轻重得失，只得同意了①。

等到黄崇英部被剿灭后，越南政府以为天下太平了，于是就以法国侵略者反对黑旗军驻扎保胜为由，急忙重提处置黑旗军的事情。光绪元年（1875 年）八月（黄崇英于七月被擒杀），统督黄佐炎疏言宣光省善后事宜时，就把处置刘团列入其中。九月，“河内、海阳富派又以刘团为虑，浮言闹惑”②。十月，海阳商政管理兼办海防阮有度上奏，其中谈及将来开办商政的困难，也把黑旗军驻扎红河商路作为重要的一条：“富派常向臣言开商溯上游诸省，达至云南，以通利路。臣每以路梗为辞。彼虽暂缓，而所求想不肯释。且上游利害尚未可知，而彼遽尔到此，则刘团在此，不免一番滋事。”③

这些情况，促使越南政府把如何处置刘永福和黑旗军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越南政府指示北圻统督黄佐炎、协督尊室说迅速剿清黄崇英余党并妥办善后事宜，其中提到要“择善地以处刘团”，即是将黑旗军迁离保胜和红河沿岸各关卡。当黄佐炎把越南政府的意思向刘永福提出后，刘永福虽然心里并不愿意，但迫于压力，只得在口头上姑且答应遵命迁往靠近中国边境的海宁。但是，黄佐炎和尊室说并无剿匪才能，以至黄崇英余部及其他入越广西农民军余部越剿越多，势力越大，越南官军则连连失利，损兵折将。越南政府虽然严厉督责甚至处分负责剿匪的将帅，但也无济于事。没有办法，越南政府只得再次请求刘永福率黑旗军助剿，于光绪二年（1876 年）九月，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二，第 28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四，第 18 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四，第 33 页。

命黄佐炎“善说刘团往太会剿”[1]。既有求于人，越南政府只得把处置刘团一事搁下了。

光绪三年（1877 年）三月，越南政府因为商政将行，又将迁移黑旗军以避商路一事重新提出来：“刘团现居保胜，而富人商路必由保胜达云南，故请移之。”越南国王以黄佐炎既能对刘永福结之于前，必能虑之于后，就命他提出办法。黄佐炎复奏，将刘永福愿意迁往海宁的要求提出。越南国王览奏后，认为海宁远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将黑旗军迁往后，一旦政府有事，就很难利用其出力，因而指示黄佐炎另想办法。黄佐炎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请求将此事发交廷议。当越南国王将此事发交廷议后，廷臣大都反对将黑旗军迁移到海宁，而主张迁往太原。越南国王采纳群臣的意见，决定将黑旗军迁往太原，命黄佐炎晓谕刘永福。

刘永福却不肯迁往太原：“谓该团至一千余，若处之于太，无以谋生，起矿则艺既不谙，又无资本，着手良难，反复再三，该一味坚以海宁为请。”黄佐炎为此复奏越南政府：“请加恩予（刘永福）以世袭海宁府，使之及早移住，庶可省事。”越南国王只答应可以考虑迁往海宁和太原的交界处，或者迁往兴化、海宁和清化的交界处，指示黄佐炎再与刘永福交涉。刘永福不愿改变主意：“不知何处可往，亦别无他想，请仍留保胜，勉供防御之役，以固边隅。”黄佐炎看到两下意思满拧，事情快要闹僵，只得再次奏请允许黑旗军迁往海宁。越南国王将黄佐炎的意见再下廷议，群臣坚持认为不能让黑旗军迁往海宁，也不能让留保胜，而要黑旗军迁往如莫边陀、北顺州等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六，第 11 页。

处。刘永福看到越南政府已经把话说到了尽头，也就亮出他的真实想法：即坚持留在保胜，一步不移："该团丁皆非农业，该系清人，如欲募民立邑，恐不信从。况该素无资产，幸蒙收录，寄寓保胜；招集商船往来，赖抽丰以资给养。今若弃此之他，千余人无以存活，请仍留此，永作臣仆，凛遵命令，富人如有往滇，听他来去自由，莫敢阻碍。"肩负北圻清剿重任的黄佐炎正需要刘永福助剿，不愿撕破脸皮逼他迁移，含混复奏越南政府："且听留保胜，俟后应助费移住如何，另随机酌办。"① 越南政府无奈，只得从之。

当然，事情并没有结束，只是暂时放下来。一年半以后，又旧事重提了。这又是由法国侵略者挑起的。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富派以刘永福住守保胜病商，请罢诸巡司"。对于法国侵略者干涉越南内政的无理要求，庸懦的北圻诸省督抚纷纷上奏，重新挑起将黑旗军迁离保胜之争。如海阳总督范富庶请严禁刘永福抽丰，由统督臣拟移他处，给费开矿；统督黄佐炎请改授刘永福为高谅提督，移住此边，仍以高平银山所在地赐为采地，又给本资生储之用。越南政府将这些意见发交廷臣阅议，由于当时李扬才之乱尚未完全平息，还需要黑旗军出力，所以廷臣也认为讨论迁移黑旗军的时机还未到，"俟何日边匪清夷，有应别局，注措如何，另奉随宜拟办"。越南政府将廷臣所拟录交黄佐炎。黄佐炎复奏称："保河、保胜仍听刘团领征。"② 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光绪七年（1881年）底，当法国侵略者决定北犯后，就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七，第24～28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二，第11～12页。

公开致函越南政府，胁迫越南政府驱逐黑旗军："书叙刘团违约阻商，祈由我国屏逐方妥，否则，至西正月初一日，该国必有处置。"越南政府害怕了，"想他终不肯休，若不早为之所，恐更遗碍"。遂敕令黄佐炎处置刘永福和黑旗军，"要使刘团移居三海或他处，亦不外谅平宣太地方，便即移居，免招口舌"[①]。但是，一则当时越南政府还需要以黑旗军为主力去清剿北圻的动乱；二则刘永福已奏准请假五个月回国扫墓，准备启程。于是事情又放了下来。

为什么越南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将刘永福及黑旗军撤离保胜呢？表面看来，似乎是要黑旗军让开商路，以免与法方发生冲突，挑起更大的事端。实际上，却暴露了腐败无能的越南政府在法国得寸进尺的侵略势头面前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只想以妥协退让来讨好法国侵略者，以延缓即将来临的亡国奇祸。他们自己不敢抗法，也不希望别人抗法。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将刘永福及黑旗军迁离抗法根据地，移到另一处人生地僻的边远地方去白手起家开矿垦荒，就是要在决战前夕削弱黑旗军的抗法力量，消磨他们的斗争意志，贬低他们的抗法中坚的作用。只是由于他们还要利用黑旗军，越南政府才不敢与刘永福决裂，不敢对黑旗军采取武力迫迁的手段。从越南政府内部是否要黑旗军迁离保胜及迁往何处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越南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大多畏法如虎，缺乏抵抗精神的，一心只想向法国侵略者妥协退让。以北圻统督黄佐炎为首的一些军事将帅，基本是站在刘永福一边，维护和偏袒黑旗军，敷衍越南政府，保护黑旗军继续驻扎保胜，这说明他们还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六，第31～32页。

是有一定的抗法要求。但是，由于受到越南政府的束缚，他们的抗法行动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像刘永福那样坚决和彻底。至于刘永福和黑旗军将士则与法国侵略者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是坚决反抗法国侵略者的。迫于越南政府的压力，刘永福在越南政府提出迁离保胜问题之初，曾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如请求允许迁往海宁等，其实，这是事情未到最后关头时用来敷衍越南政府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他在越南政府许以开矿、给资、世袭官职等利诱面前，"坚请留住保胜"，可见他是早已决心坚守保胜这个抗法堡垒，任何诱惑和压力都不能使之动摇，一次又一次地顶住迫迁的威胁。迁不迁离保胜之争，实质是敢不敢抗法之争。在这场关系到越南和黑旗军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争论中，越南政府及众多地方官的消极态度，使刘永福大为失望，对联合越南官军共同抗法失去了信心。

大敌当前，越南官军既不可靠，黑旗军又兵微将寡，饷匮械乏，难以持久，那么，出路何在？面对法国侵略者，是战？是逃？还是降？如果要坚持抗法，又靠什么来抗呢？虽然这时在思想上，刘永福仍把抗法只看成是越南一个国家的事情，并未认识到中国也有抗法要求。但是，近年来清政府一些官员如冯子材等的或明或暗的态度和表示，却使他本能地感到，必要时可以从中国那里争取到支持和帮助。因此，他觉得需要尽快和清政府联系，争取人力物力的支持，把抗法事业坚持下去。在追剿黄崇英、李扬才的过程中，黑旗军曾与清军联合作战，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但是，在这些合作中，刘永福只与清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如赵沃、党敏宣等直接打过交道，却从未与高级官员乃至清政府联系过，清政府是否愿意支持黑旗军抗法，这种支持是大是小，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都是未知数。

要了解清政府的意图必须自己前去联络。然而，清政府是否会接待自己？如果不接待自己又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刘永福想出利用回乡省扫焚黄以作掩护的办法。

刘永福从1867年投入农民军始，便离开了家乡，至1882年时已近15年了，期间，不管他是处于背运或是顺境，都不闻有回乡省扫焚黄之举。为何在法军即将大举北犯前夕，忽然想到要求回国省扫这一着呢？

事情要从光绪四年（1878年）时说起，这一年正逢越南国王五旬大庆，秋十月，越南国王特颁恩诏三十四条，其中之一是文职四品、武职三品以上官员的父母都可得照例封赠。当时，刘永福以领兵官权充三宣副提督，属武职三品以上官员，应该按例封赠父母，越南政府遂追赠刘父以来为侍读学士，但不知何故却没有将此事知会刘永福。光绪六年（1880年），又逢越南王太后的七旬大庆，越南政府封赠文武官员，刘父以来得赠中议大夫太仆寺卿，但此事仍未知会刘永福。

刘永福可能已从其他渠道得知这些事情，光绪六年九月，在追剿陆之平功败垂成的关键时刻，刘永福却称疾不前，继而从前敌撤兵回驻太原，自己则转回保胜。越南政府大惊，连忙派靖边副使张光憻前去了解原因。刘永福便借回国省墓焚扫为由，婉转提醒越南政府尚未照例封赠其父母："刘永福以节办艰劳，未蒙拟赏，疑外人有中伤，致品俸未预，团练衣裤未给，而其父母亦未预封。祈为代题，若不准归农，则候奉恩准以来冬假限省扫。"[①] 越南政府正在用人之际，这才翻出前两次的封赠知会刘永福。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四，第42页。

谁知，事情已弄假成真，刘永福也许觉得可以借此名义回国一次，以试探中国方面对抗法的态度。光绪七年三月，他再次请假回国省扫，越南政府则要求他把入越广西农民军余部都剿清才准假，而要想在短期内完成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等于是变相拒绝了。到了这年的十月，法国侵略者准备大举北犯的风声已经很紧，刘永福急于回国联络抗法事宜，但此事却不是能够摆上桌面的，就索性假戏真作，再次向越南政府乞假。越南政府见他去意坚决，阻拦不住，才准假五个月，让他回国省扫焚黄。省墓要求获准后，刘永福即令黑旗军将领黄守忠、吴凤典、杨著恩、邓遇霖等，各率所部分驻山西城外，等候他的归来。自己则挑选了亲兵200名，携带10余万两银子，于十月二十二日（12月13日）从兴化起程，经由广安，于十一月十三日（1882年1月2日）到达海宁，十五日（4日）从东兴过境。

当时，广西边军以剿匪为名，由记名提督黄桂兰率兵驻防越南近边地方，他根据广西巡抚庆裕关于联络刘永福的的指示，派出游击梁平章赴保胜。十月二十八日（12月19日），梁平章与刘永福在北宁相遇，刘永福告诉梁平章："法人意在河内、北宁、山西、南定、海阳五大省，现渠所部忠和团勇已分布河内、保胜驻防，一时断不能动。并谓法人欲得保胜者，图由云南、四川开修铁路，十日可达京师。"① 梁平章后来将此事报告黄桂兰，黄桂兰认为保胜的安危所关尤巨，赶饬部下派人催促刘永福赶紧折回保胜，以便设法筹备，届时再当相机暗助，使之决战，不令有回顾之忧。但刘永福已从东兴转赴那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42页。

良了，后又到扶隆，于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一日（3 月 10 日）来到上思县的平福新圩。

对于刘永福在离乡后十余年后，在法国侵略者即将大举北犯的严重时刻，却突然回国省墓扫祭焚黄的做法，引起了广西左江道周星誉的疑惑，认为其中必有重大原故："伏思近日法人方欲并吞全越，彼国自己早知，永福又作重臣，为一方保障，当此军情紧急之际，岂有反请假回籍之理，疑其中或有别情?"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2 月 13 日），委派与刘永福素来相识的守备谢润前去了解刘永福回国的真实意图。知道刘永福将到上思平福新圩后，周星誉改令宣化县典史王敬邦前往新圩会晤刘永福。

王敬邦是与刘永福同时到达平福新圩的，两人相晤畅谈，盘桓数日。在晤谈中，刘永福向王敬邦详尽地讲述了黑旗军、越南和法军的情况，并提出联合中国军队共同抗法的想法：

王敬邦：尔在越南日久，可曾谒见越南国王?

刘永福：未见。国王年老无子，有一侄，年甫十八岁，最所钟爱，意欲立以为嗣。将来法兵果至，必挟国王为质，使各省督抚不敢举兵拒敌。国王久被禁制，跬步难行，大约临时必遣王侄外出视师，以资号召。

王敬邦：中原幅员辽阔，始设十八行省，越南弹丸之地，闻说设省甚多，如何辖治?

刘永福：越南南北三千六百余里，东西一千七百余里，西北负山，东南滨海。越南之制，以一大省兼辖数小省，如南圻嘉定本名农耐，素称富庶，地介海滨，并兼辖安江等六省。北圻十六省，统归黄佐炎节制，永福现官三宣副提督，亦属北圻。

王敬邦：越南的赋役军兵各情如何？

刘永福：越南钱粮甚轻，厘金关税亦然，如北圻每年厘金关税，俱由商承办，每年约收黑钱二百余万贯，额缴钱七十万贯，计值中国制钱十四万贯。然徭役甚重，凡官员兵勇往来夫役粮食，俱由地方百姓应付，民不堪命。军兵如统督黄佐炎部兵数万，皆本国人三丁抽一应付，有事应敌，无事屯田，终岁未尝训练。平时剿办土匪，尚称得力，如与法人接仗，难保万全。

王敬邦：越南官军既然如此孱弱，无怪其国土匪遍地，屡剿不净。

刘永福：十州匪首叶成林业已招安，现在永福拨伊在宣光效力，其余覃四娣、陆之平、李亚生、杨大家伙各股约三四千人，业已四散入山，法人屡招为内应，然未有确信。覃四娣在各匪中较有智谋，故陆、李诸人俱听其调度。

王敬邦：法人侵越详情如何？

刘永福：法人于咸丰年间夺南圻之嘉定六省，设埠通商，改名西贡，自号为大富浪沙衣波儒。后又分据富春、河内、海阳等省，赋税亦大半为法人所得。北圻海阳左金地方厘卡归法国抽收，每年约税银三十余万两。据闻法人初入富春，即在城外筑一炮台，高数十丈，俯对王宫，又于对河遍造洋楼，几无隙地。各城门均添法兵把守稽查，凡有谕旨奏章以及各衙门公牍，俱先送法官过目，方许施行。国王坐困深宫，形如守府。近日法人常派人游历山西、北宁、兴化、宣光、太原、谅山各省，密探地势，居心叵测。南圻六省尽为法人所有，遍设夷官，正朔衣冠改

从夷俗。至海阳、富春、河内等省虽系法越分治，而一切皆受制于法。但就北圻一隅而论，从教者十居五六，东京失守时，本国教民先登旗台竖法国大纛，法兵始入（旗台在东京城内，高于城墙，上竖越南主帅大旗。破东京时，法兵仅数百，余皆教民内应，嗣永福率黑旗军至，教民遂散）。据悉法国领事涂普义，昔年随兵头安邺攻陷东京，旋因安邺被永福阵斩，普义失于救护，罪至褫职（安邺系法国驸马，阵亡后，其妻以普义坐视不救，控告法庭，是以得罪）。数年来普义在越南北圻各省游历，现在建议并吞全越，献策法廷愿效前驱，冀得立功开复。

王敬邦：尔在保胜，每年征税若干？有何用途？

刘永福：永福在保胜抽厘，每年约银五万，每年津贴部下兵勇口粮及添置军装冬衣等件，约用银三万余两。

王敬邦：粮饷如此微薄，倘法人大举北犯，尔部如何能挡大敌？可有良策克敌制胜否？

刘永福：本年正值法越换约之期，法兵此来必自立条约，勒令国王画押遵行。永福所部三千人，俱两粤精锐，虽骁勇敢战，而为数太少，攻克地方，不敷分守。至本国民兵望风即溃，断不足恃。如蒙天朝大宪施恩，令广西、广东、云南三省调勇二万人，分道出师，以壮下国声威。凡遇恢复城池，即请大兵驻扎，至先锋头敌之任，永福愿以一身挡之。

言谈之间，刘永福得知中国官员对他十分倚重，心里很高兴，不觉喜形于色，特托王敬邦捎书给中国当局，以表心迹：

福供职越南二十余载，松楸怅望，怆感莫名。去年乞假，蒙国王旨准五个月回籍省扫，遂即抵钦州那良、扶隆

等处，业经焚黄，兹由钦程于新正二十一日抵上思平福墟。适宪台所委王委员亦于是日同到，晤谈之下，仰见宪怀慈惠，垂怜小邦，于慎重洋务之中，仍寓维持弱国之意，曷胜钦佩！遵即将南国与滇粤毗连地界及法人占据地方，逐一商知，王委员旋回面禀，自归洞鉴，可勿渎禀。

惟南国孱弱不振，饷则取于赋，而赋出无多；兵则寓于农，而农未知战。法人果欲并吞疆土，福受恩深重，自当鞠躬尽瘁，率部下三千勇士，相与决战。北圻等省法人虽未必灭此朝食，而沿海各省欲办防堵，恐勇少难分。因念南国屡蒙中国三置之恩，一国同感，此万不得已之际，仍为依庭之请，务恳宪台详请发兵助援，南国之保全，即以彰中国之威声。

王敬邦告别刘永福回到南宁后，除将与刘永福晤谈的内容及来禀呈递给周星誉审阅外，还向周星誉密禀对刘永福及黑旗军各将领的看法：

永福为人气豪志锐，精悍绝伦，久在戎行，练于兵事。论及法人寻衅，词色愤然，但恃勇少谋，视敌太轻，恐乏坚忍之力。其幕客上思州人刘奇勋、刘奇谦、韩再生，宣化人李德才等，俱无远谋，各怀疑忌，左右尚未得人，大敌当前，似未能独当一面。又该国经政，寓兵于农，素不训练，以御外洋节制之师，亦恐不敌。

周星誉则将王敬邦所探情形禀报给两广总督张树声，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由张树声上奏清政府：

职道窃查刘永福仕孱弱之邦，处危疑之地，将兵数仅三千，筹饷年仅五万，前此之阵斩法将安邺即安都司，亦属偶然幸事。而永福狃于小胜，好作大言，似不屑措意

者。法人于永福则畏之如虎，如该国所恃惟伊一人，是以涂普义、吴源成辈，或阳饵甘言，或阴施毒计，必欲得而甘心。永福孤立无援，支持不易。即使扼据陆地要害，所向无前，而游匪李亚生、覃四娣等与之仇怨滋深，今又被我军夹击，穷蹙无归。万一纳款法人，为之先导，该匪等素娴陆战长技，亦与永福所部黑旗兵相等，若为法人所用，即足与永福为难。是越南专恃永福，而永福究似未可深恃也。若粮饷炮械之不逮法人，更无论矣。据永福来禀及告王典史之言，虽称鞠躬尽瘁等语，而察其隐衷，系情中国官职，蓄志来归，已非一日。每对人言：愿为中朝千把，不愿为越南提镇云云，似此情形，恐未必为彼国效死。若一旦不支，不北走滇，即东走粤，款关求附耳。其实永福为我用，不过授以偏裨，即充其量亦不过分统数营，效力边防。留之越南，则所系甚重。且北圻十六省为该国统督黄佐炎辖境，永福向受佐炎拔擢深恩，虽无必胜把握，亦不至一蹶不振，尽覆其巢。惟北圻地广途遥，专赖一人转战其间，不免疲于奔命。若但能固守宣光一带，则可为云南蒙自、开化作一外屏。如广南府及广西镇太各边，则隔保胜千有余里，伊兵力势不能兼顾也。至滇粤三省合力助兵二万之请，由永福不知我国目下边储，亦属力有未逮，而其不足深恃之处，已可概见矣。①

刘永福的这次回国与中国官方联系，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方面，他“将兵数仅三千，筹饷年仅五万”，却敢于力抗强法，不屈不挠，一腔反帝爱国热血，这就大大鼓舞了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92～298页。

清政府中的主战派如张佩纶等人，成了他们大声疾呼助越抗法的最好理由。同时也为清政府判断法国的军事力量，制定不肯轻易向法国的武力讹诈低头乃至出兵抵抗的决策提供了依据。这对于在整个斗争时期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影响了中法战争的整个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出于同一理由，却成了李鸿章、岑毓英、徐延旭乃至黄桂兰等人轻视刘永福的借口，他们因此而竭力贬低刘永福在抗法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且利用各种机会刁难和排挤刘永福，诸如在李宝会谈中企图出卖刘永福、在山西之战中拒绝及时援助黑旗军、克扣清政府明令拨给刘永福的饷银和军械、反对清政府授予刘永福官职等，给刘永福及黑旗军的抗法斗争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严重时差点毁了刘永福的抗法事业，使他的未来变得坎坷多舛。

三　曾纪泽对法交涉

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小峰县人，为清末洋务派头子曾国藩的长子，生于1839年12月7日。他自幼即在曾国藩的督促下读书、学习。青年时，曾随其父到军营历练，掌理机密文书和参赞机要，从而得与曾国藩的同僚、部下及幕府中人认识和交往，学识猛进，眼界开阔。但他屡试不第，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入都应荫生考试，才获授员外郎之职，签分户部陕西司。却因需陪侍疾病缠身的曾国藩，所以并未到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卒。两年后，其母欧阳夫人病逝。曾纪泽先后丁父母忧，丧服满后，始于光绪三年（1877年）入都以承袭侯爵的身份请觐。翌年得诏命以一等毅勇侯四五品候补京堂充出使英法钦差大臣。1880年，被命为出使俄

国大臣，同年因交涉修改崇厚所订《里瓦基亚条约》，争回部分权利，名声大振。曾纪泽曾著有《中国先睡后醒论》，提出当时中国在对外交涉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申明中国统属藩属之权。中国管辖藩属，法本妥善，乃近日西洲每垂涎亚洲，以至藩属之事，西国屡有违言，而中国已失外藩数国。今决欲鉴察藩国之所为，不任其私自专主，并且设法照顾保护，俾余国不被侵蚀。……后有侵夺该藩属土地或有干预其内政者，中国必视此国为欲与我弃玉帛而事干戈”①。这其中，就包含如依靠外交交涉不能维护中国的利益时，则不惜以军事行动来解决的思想。他竭力制止法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即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实践。



清驻法公使曾纪泽

曾纪泽于1878年底到法国首都巴黎就职，1879年底，他闻知法国欲大举进犯越南北圻，就到法国外交部，面向外交大臣佛来西尼声明，越南系中国属邦，一面询问法越两国有何矛盾？佛来西尼答复法越两国并无不和之事，中国不必疑虑。曾纪泽并没有让法方的几句空话骗住，他仍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于1880年6月致函总理衙门，建议清政府对此事早作决策，以防范未来的变故：“法人谋据安南，……惟蕴蓄久者其

①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180页。

发必烈，异日事端之起，必有突如其来之势，使人猝不及防。”[1] 可能总理衙门没有回答他。

光绪七年初，曾纪泽已取得修改俄约的成功，气概正盛，对待法越问题的态度有了不同，表示更加积极干预。当他得知“近来复有传闻贵国将欲发兵前赴越南，或谓业已发往”，于是照会法国外交部称：“本爵大臣不胜疑虑之至。不知此等传言是否有因，又不知自本爵大臣询明贵部以后，贵国之意有无变更之处。”并声明：“越南国王既受封于中朝，即为中国之籓屏，倘该国有关系紧要事件，中国岂能置若罔闻？”[2]

曾纪泽是到俄国修改《里瓦基亚条约》时，接到法国驻俄公使商犀递来法国外交部长桑迪里复照的。由于桑迪里认为曾纪泽的照会所提的是“一套我们绝不能接受的理论”，遂在这个复照中明确拒绝中国有过问越南问题的权利：

法兰西共和国与安南王国于1874年3月15日缔结的条约已确定了我国同东京的关系，您也很清楚，东京是安南王国的一个属地，根据上述庄严条约的第2款，法国承认越南王国对任何其他大国保持完全的独立，答应向他提供援助和支持，并保证给他一切必要的支援，以维持秩序和安定，抗击一切侵略行动，保卫安南国土。我应补充一点，该条约将欧洲各国在安南的利益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这个文件（上面我已向您陈述了其主要条款）已传达给有关的各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朝廷也收到了法国驻北京

① 《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四，第1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56页。

公使团递交的条约通知书。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安南以及其他省份的关系，从那时起就十分明确了。因而，我毫不怀疑，法来西讷先生在您所提到的友好的会晤中，向您作的解释，与这项确定了法国在安南的权利和义务的条约文本，一定是完全相符的。我毫无保留地向您保证，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愿遵循1874年条约的各项条款，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法国政府非常理解北京朝廷为何对维持与天朝毗邻的国家中的良好秩序问题如此关注，在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为此，法国政府将尽全力制止在法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由此而出现的任何困难或误会。[①]

接阅照会后，曾纪泽前往与商犀交涉此事：

曾云：此事（指法国有无派兵越南）关系甚重，而贵国外部并未恺切答复，所以本爵甚不放心也。

商云：按外部复文之意，似无发兵情事。惟本国与越南国王所定条约第二款内载：法国认越南国王为自主之君，许以助力镇守地方以及保护敌人之攻击等事，此外尚有西洋各国在越南有事业者，亦归法国保护照料。由此观之，本国在越南应办事件甚繁矣。

曾侯曰：法国与越南定约认为自主之国，不能于中国无干。缘三百年以前，越南尚隶中国版图，厥后封为属国，自理内政。法国虽与之定约，中国之权利尚在。法国欲保护该国固属好意，然中国亦操保护之权，不得谓后有保护之国，即将前此保护之者不复提及也。

商云：外部复文内既言条约业已行知中国，如中国有

---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388～389页。

拂意之处，想已询明该国矣。

曾侯曰：该国王并未报明中国，中国未便过问。然贵国认越南为自主一事，如该国报明中国，中国岂能答应？且中国接准贵国公文之时，虽欲申辩，而姑未言，其故有三：一因中国与贵国交情最厚，势无危急之状，未肯因保护属国之事遽然争执，恐伤睦谊；二因越南国王与贵国定约之事，该国并未报明中国，盖越南是主，贵国是宾，必俟主人出言，然后中国可得干预；三因贵国定约系为保护其国，非为伐灭其国，中国亦不必过于坚执也。乃近来本爵屡闻贵国与越南不甚和睦，且闻有发兵情事，深不放心。盖越南与中国连界甚广，无论越南系中国属邦，即以邻邦视之，中国亦当关切也。

商云：本国若照条约办事，中国似不必过问也。

在这次交涉中，曾纪泽反复说明自己的看法："贵国如欲保护越南，原无不可，倘欲占据，中国岂能无言。""我所以询问之，缘因中国于属邦关系甚重。越南地方与中国数省连界，尤关重要。倘贵国欲占其地，中国不预先申辩，将来必致有伤两国睦谊。且恐他国因此生心，推之于中国设官之属邦，亦恐他国觊觎，如英国之于西藏、俄国之于蒙古，皆难保其无事。以此观之，贵国于越南之事，中国安得不问？""我说一句痛快话，中国不愿邻近属邦改隶西洋之国。"①

这是曾纪泽交涉此事的详细记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坚决反对法国吞并越南的。但是，他也说了不少的糊涂话，如说"法国欲保护该国固属好意，中国亦不过于坚执。"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57～60页。

这就等于承认法国以前对于越南侵略的合理性。曾纪泽的这种表态，起码说明了几个问题：一、他的与法国交涉，只是个人的行为，并非清政府指示他做的。正如他在八月初一日（9月23日）致总理衙门函中所说的："纪泽未曾听到各省准主意、真消息，对法交涉，措辞总难得势。"[①] 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函称："纪泽刻下未奉复示，又不知越南之于我情意如何，筹划此事，殊多滞碍。"十一月底，他又有函询问清政府的对策："此事动静之机，与口舌争辩绝不相关，仍视吾华应付处置之方何如耳。若我备预周详，隐然示以不可犯之势，则法人语气虽硬，而侵伐之役仍当缩手。若实事未经布置，但与外部公使往复争辩，在我虽据理辩胜，仍恐无济于事。"[②] 二、应该和法国交涉些什么，曾纪泽一时还没有全盘计划。是仅仅询问法国打算如何对待越南，抑或强调中越宗藩关系以使法国有所顾忌，还是以武力对抗法国侵略势力？三、他积极过问法越冲突的行为，与清政府"置身事外"的对越国策并不合拍。他赖以与法国交涉的依据是旧式的封建宗藩关系，这在殖民主义势力汹涌东来的时候，显得何等的苍白无力！这种远远落后于世界形势的封建宗藩关系，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作支撑，因而是虚弱的不牢固的，无论是宗主国或是藩属国，都无意也无法为维护这种落后的国与国关系而作出重大的民族牺牲。一旦遭遇强大的压力，就会轻易瓦解。

通过这些交涉，曾纪泽发现，法国借以侵略越南北圻的根据，是1874年法越条约，而中国要制止法国的侵略，就要从

① 《中法战争》(4)，第257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30页。

根本上否认这一条约。回到巴黎后，他于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到法国外交部去见桑迪里。在会晤时，他向对方明确表示："贵国与越南所定之约，中国碍难认之，且越南国王并未奏明中国。如贵国在该处有何意思，务与中国先行商议，以免碍难之事。"[1]

几番交涉，曾纪泽察觉法方对他的敷衍拖宕，认识到单凭外交交涉可能难以解决问题。八月初一日，曾纪泽致函总理衙门，主张中国对法持强硬态度，"示形以慑敌"："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悔。法人内怯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似是一好机会"[2]。九月初二日又函称："此时法之魄力实不能远兴重兵，以求逞于吾华。"[3] 后来，他曾有函与人解释他提出这种"示形慑敌"主张的本意："法越一案，弟虽屡进曲突徙薪之策，然内审国势，外度敌情，实未敢徼幸生事，存孤注一掷之心。传闻异词，乃有李主和、曾主战之说。夫纪泽所谓备战者，特欲吾华实筹战备，示以形势，令彼族知难而退。即使终归无济，而法人办理此事，尚有寸寸节节阻难之势，则他国之生心于吾华属国、属地者，不至接踵而起，此区区之苦衷也。"[4] 他这种把外交交涉转变为军事对抗的建议，严重地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清政府终于决定援越抗法的原因是很多的，但过分相信刚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65页。
② 《中法战争》(4)，第257页。
③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62页。
④ 《中法战争》(4)，第265页。

刚取得修改俄约胜利的曾纪泽的看法，以为中国海军可以与法国侵越海军抗衡，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其实，这是过分乐观的看法。当时，虽然自同治年间清政府就开始筹建新式海军舰队，但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事情进展得很慢。至中法战前，北洋水师的主力只有"超勇"、"扬威"两快船，"镇东"等六炮船，新购的"定远"等舰尚未运回；南洋水师则有"靖远"、"开济"等大小舰船12艘，其余较大的"南瑞"、"南琛"、"保民"三舰尚未归队服役；至于广东水师就更差，早在光绪八年福建水师遵旨拨济其"济安"、"飞云"二舰，即已强过广东水师本身所有的舰只了。而拥有舰只最多、军力最强的福建水师，它的主力就是后来在马江之战被轰沉的诸舰。所以，即使将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集中起来，也还不是法国侵华海军的对手。因此，曾纪泽所谓中国出动海军军舰就能慑服法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清醒地看到中法海军力量的巨大差距，曾多次奏称：中国"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① 但总理衙门及张佩纶等一批清流派官员却为曾纪泽的说法所迷惑，极力鼓吹出动中国海军与法国海军对抗，这种意见并在当时成了主流观念，影响了清政府的军事战略决策。

主意拿定以后，八月初六日（9月28日），曾纪泽到法国外交部与桑迪里晤谈，口气就已不同，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概。

> 曾纪泽直告之曰：中国视安南较之琉球尤为紧要。……安南则边界毗接，痛痒相关，中国保护该国之心直

① 《中法战争》(5)，第198页。

与保护内地省份无异。中法和好多年，商务茂盛，彼此亲切，万不可因此事生出意见。

桑云：法国但愿越南遵守甲戌之约，并非多求进步。

纪泽答以：此等大事办至结局，往往有非始谋时所能逆料者。法国此时并非多求进步，中国亦能谅之，但恐日后为事势所迫，有不能不谋进步之一日。是以中国预为言明，法越甲戌之约，中国本不能认，若法国之志，仅欲与越南通商，不求进步，则越南私立之约，中国犹可勉强优容，不欲阻法国已有之权利，致损法国之颜面也。如法国得寸思尺，使中国为难，则是辜负中国保全友谊之苦心矣。

桑力言：法必格外留心，不与中国为难。数日后，即当具牍照覆申明此意。①

嗣后，曾纪泽与历任法国外长法来西讷、刚必达、沙梅拉库、茹费理交涉时，都坚持以不承认法越 1874 年条约为前提。如他在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日（1 月 9 日），就法国前任外长刚必达的照会，曲解当年恭亲王复照罗淑亚的关键辞，答复现任外长佛来希尼称："查本国王大臣文内声明越南系中国属邦，久列藩封，自系包括已往、现在而言，乃竟译为从前已往之古事，殊不可解。且该国克尽属国之道，至今照常未改，人所共知，何得谓为已往之古事乎？至法国与越南所定之约，比经本国王大臣将其中最要关键驳诘后，无须另具文牍逐条争辩。当初中国不认此约，已在贵大臣洞鉴之中。"②

① 《中法战争》(4)，第 258 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 102 页。

曾纪泽以及清流派等一些少壮官员，他们的青年时代及步入仕途期间，恰逢中国洋务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时期，亲眼目睹中国逐渐有了用洋枪洋炮装备的陆军和用新式军舰装备的海军，国防力量的增强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助长他们与侵略者对抗的愿望。对俄交涉争回部分权益的事实更增强他们的抗争信心，使得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改变对待法国侵略越南一事的消极态度。不过，他们激情有余，经验不足，对于法国的资本主义本质缺乏了解，对于资本主义开拓海外市场的迫切性、疯狂性和长期性没有充分的认识，把法国对于越南的侵略仅只看成是寻常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对于中法越三国的国情和力量对比并没有真正的了解，盲目贬低经过普法战争惨败后的法国国力，因而对有利的因素强调得多些，对不利的因素想得少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对方的力量，轻率地把外交斗争改变成军事对抗，以为只要中国作出兵姿态即可吓退法国侵略者，就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其结果是把局势推向后果严重的战争，这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负责态度，这说明他们只能敏锐地提出问题却还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

四　援越桂军初防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对于外国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受到时代的感召，也想改变以往的消极态度，重新制订对待法越关系的政策。但是，这种改变应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手段来实现，却是一个摆在清政府面前的新问题，需要听取群臣的意见才能决定。于是，接到曾纪泽的报告后，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12 月 6 日），总理衙门上奏清政府：“臣等查法人占越南境，久割膏腴，此次添船筹款，虽以捕盗为名，其叵测

已可概见。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认为此事关系中国大局，要求清政府拿出切实措施来助越抗法。同时肯定了曾纪泽提出的“示形慑敌”策：“所言俱不为无见”①。当天，清政府有旨，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云南巡抚杜瑞联及曾纪泽妥筹复奏。

诸臣复奏，可分成四种意见。

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仍主张传统做法，即置身法越矛盾之外（下节详述）。

比较激进的朝臣提出“取越抗法”的主张。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2月25日），翰林学士张佩纶上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建议清政府出兵攻取越南，以免落入法国之手：“夫我不取越，越终折而入于法，不如暂取而还封之，戍越裳即以固吾圉。”②

温和一点的朝臣，则主张“联越抗法”。他们包括总理衙门、丁日昌、曾纪泽、周德润、刘坤一、张树声、刘长佑等人，建议清政府在出兵入越的同时联越抗法：“与越王或亲信执政速商自强事宜，及联络外交之法”③。

第四种意见提出“助刘抗法”主张，即主张中国并不因法越矛盾而出面抗法，却只在暗中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广西巡抚庆裕的复奏就不同意“联越抗法”的主张：“至派员晤越南国王、大臣等，将自强事宜随机开导一层，易露痕迹，难于遣派。”却提出派驻在中越边境的桂军“助刘抗法”的建议。

---

① 《中法战争》(5)，第87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84页。

③ 《中法战争》(5)，第87页。

十一月初十日（12月30日），庆裕奏请加强援越桂军，并明谕刘永福，有警互相接应，内地已预筹精兵，多办军火粮饷，以备不虞。如此大张声势，法人有所顾忌，得弭衅端，实为厚幸。“倘仍遵其狡谋，一闻警报，奴才惟有将腹地防营，先其所急，酌量调往关外谅山等处布置严防。发文照会法人，以越南本系我之藩服，谅山等处又系用我兵力粮饷收复之地，为粤西边境屏障，断不能轻弃与人，慎勿相侵，以敦和好。一面密谕刘永福，预为决战地步”①。

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复奏中指出：黑旗军是抗法主力，它的胜负存亡关系着抗法大局，法人曾为之所创，必将调船征兵，寻隙于刘永福，除之而后已。刘永福既去，则越人无能抗其颜行者，累卵之势将益难支。因而主张除广西防营出关设防外，滇军也应出关与黑旗军联络：“其由保胜入滇之路并澜沧江上游与云南相近地方，当由滇省筹布兵备，相度设险，东与粤营联络声势，驾驭刘永福使为官军犄角”②。

十二月二十六日（2月14日），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联名上奏，提出助越抗法办法，其中之一，也是由中国资助刘永福抗法：“越南之副提督刘永福者，籍本广西，……今驻兵保胜州，与滇南接壤。倘朝廷密谕越南信用其人，而令其招抚贼豪覃四娣等，翕志同力，中国稍为资助，俾不穷溃，则越境西北可借为藩篱。悍贼不亡，即越不亡，法人之谋可不折而自沮矣”③。

从上可知，粤、桂、滇三省督抚都对刘永福抱有好感，愿

① 《中法战争》(5)，第96页。
② 《中法战争》(5)，第98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05页。

意资助刘永福抗法，他们的这种态度，为日后黑旗军与三省官军联合抗法创造了条件。

但是，一方面由于清政府仍对法国怀有畏惧之心，不愿对法显露敌意；另方面也由于法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还停留在计划阶段，尚未付诸实行，因此，清政府在这一阶段虽然采纳了“助刘抗法”的主张，也还是纸上谈兵，并未急于实施，对于助刘抗法还有许多限制。如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三日（2月1日），清政府批复庆裕的奏折，就对联络刘永福一节加以告诫：“其谕令刘永福有警互相援应一节，刘永福既恐未可深恃，且虑形迹太露，转致枝节横生，该抚尤当加意慎密，不可稍涉大意。总之，彼族觊觎越南已非一日，中国不能不设法防维，惟虚实缓急之间，措置最宜审慎。”①

既虑形迹太露，又诫最宜审慎，这就束缚了三省地方官员的手脚，使他们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如同年十二月下旬，越南官员通过张树声派往越南探听消息的招商局道员唐廷庚，请求广东当局给予刘永福购置军火的便利，饬令附近钦州各地方官为伊保护刘永福，俾得潜置军火。这本来是支持刘永福抗法的起码要求，但张树声也感到为难，奏报清政府：“查中国军火等项，例不准运往外夷，若许其由中国运往越南，是显与定例相违，碍难照准。”变通办法是，“若许该国自向香港购买军火，由海道运入白藤江而至广安，则不必经由中国内地，中国可以置不问”②。这样缩手缩脚，当然难以有效地支援刘永福抗法了。

① 《中法战争》(5)，第97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64页。

光绪八年正月，已决定采取“助刘抗法”方针的清政府因诸臣奏称庆裕“素不知兵”、“不习边事”，难膺艰巨，调其为漕运总督，改任倪文蔚为广西巡抚，以被誉为“知兵大员”的安襄郧荆道徐延旭为广西布政使，赋予领兵出关督师的重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显然是把曾纪泽的乐观设想从海上应用到陆地上来，以为出动陆军援越即可慑服法国不敢在北圻动兵。而率兵援越抗法的重任，首先落在统领广西边军的记名提督黄桂兰身上。

黄桂兰，字卉亭，安徽合肥人。早年投入淮军，先后为刘铭传、张树声等人的部将，参加镇压太平军及捻军，转战江、淮、皖、鄂、直、东、陕西各省，“险阻艰难，屡受重伤”，积功至记名提督。张树声出任广西巡抚时，他随来广西（《关外随营笔述》说他是张树声的儿女亲家）[1]，参预了入越追剿李扬才。光绪六年，冯子材因受张树声的排挤而卸统边军，张树声遂命黄桂兰接统。在办理边防的过程中，黄桂兰“频年劳苦，瘴疠侵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不满法军在越南北圻的猖獗，有与敌一战之心，曾有函称：“与之开仗，决其胜负，则提督等效力疆场，是其分也，誓不与彼族共地同生。”[2] 张树声称他：“平日颇明大义，尚非不能效死尽命者。”[3] 但他主要是依靠年资和裙带关系升职，自己并无突出的军事才能，清政府挑选他来担负抗法主将，这是第一个错误。

光绪七年十一月廿四日（12 月 24 日），正在关外督军剿匪的黄桂兰，接奉庆裕的密函并廷寄，要他严为戒备，妥办布

---

① 《中法战争》(3)，第 62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1311 页。

③ 《中法战争》(5)，第 370 页。

置防法事宜。受命后，黄桂兰着手采取了如下措施：

1. 补充军实，进扎要隘。广西是个偏僻穷省，桂军的武器装备素来较差，黄桂兰所率援越桂军各营也不例外。张树声曾奏称：援越桂军“粮饷本薄，军火枪械无新式精利之品，臣每念军士耐苦能战，而饷源艰窘，未能筹置利器，常引以为憾”。这样的装备，对付入越农民军残部的乌合之众是绰绰有余了，但要抗御用新式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法军，则相形见绌。于是，在受命伊始，黄桂兰就借口“通饬各营逐日操习洋枪，熟练步法，俾可履险如夷，随地皆可用武”。乘机向庆裕提出补充军械的要求：“惟查卑营现在洋枪洋火等项已无存储，拟恳宪台俯赐饬局酌发若干，迅即委员递解来龙，俾得早日练成劲旅，以利战事。”[①] 庆裕接到此报后，果然饬善后局发给洋枪洋药，星速解往备用。黄桂兰同时还试探性地提出“应否增添营勇”，但没有下文。至于派营进扎要隘，光绪七年间，黄桂兰在追剿途中视察了各处的地形后，认为：“谅山一省为中外之关键，亦南境之通衢，法如占据越南，须由北宁始达谅山，虽属贡道大路，而亦峻岭中横，非可长驱直入。外纵有小路可绕，要皆山径蒙深，林木丛杂，尤非行兵所宜。”于是在平嘉留驻黄忠立一营，那坑留驻宋先聘一营，驱驴驻有陈得贵一营，文渊州驻有陈朝纲哨勇，足以保卫谅山。光绪八年三月十四日（5月1日），因为得知刘永福准备派兵勇200名到北宁助防，黄桂兰又认为：“北宁为北圻各省门户，最关紧要。”“北宁为粮米聚积之地，北宁无事，谅山、高平各营随可驻扎。失北宁，则各营必须退扎关内，就粮内地。足见北宁为该国紧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43页。

要处所。”[1] 遂派出管带左军右营总兵陈得贵、前军右营帮带叶逢春，各带本部在北宁城外择要驻扎。又因为北宁后路谅江府地方有险可守，遂派左军统带提督陈朝纲带所部驻扎该处，以为后路声援。

援越桂军进扎北宁，是符合越南政府愿望的。因为这时越南政府也已获悉法军要进犯北圻的消息，曾多次向清政府求援："未闻此信之前，国王已饬使臣于进贡之日，亲向天朝求救……惟求垂念下国世守藩封，速赐解救。”"该国自度力不足以拒法，亦求中国发兵救之也。”援越桂军的进扎北宁，被看成是中国对越南伸出救援之手的标志。越南国王曾就此致函清政府称：当李维业侵袭河内时，中国"派出水陆各道官兵前往下国交界住扎，固以搜捕逸匪为正办，而遇事便为保援，实有深意在焉，其为下国虑者既备以周，不胜感戴。”[2] 同时这也符合北宁人民的利益，黄桂兰曾向倪文蔚报称："前北宁闻警，居民迁徙过半，谣言四起，今见我军云集，俱陆续撤回，办运各营粮米，照常源源而至。”[3]

2. 与刘永福黑旗军有了初步接触。援越桂军既要入越防法，就免不了要和越南的抗法中坚黑旗军相联系和接触。还在光绪七年十月，黄桂兰便已派出游击梁平章径赴保胜，与刘永福初步接触和联系。光绪八年三月，刘永福省扫焚黄后返回越南。路过谅山时，于初九日（4 月 26 日）带着同行的营官文案等员弁叩见黄桂兰。两人谈到联合抗法事宜，刘永福勇于自任，尚无怯意，意欲中国助其兵力，又虑洋枪药码不足，欲求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339～342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693 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335 页。

赏借。黄桂兰当经晓以大义，勉励刘永福“现虽服官越南，亦天朝藩服，尽忠本国，即如效力天朝”。使刘永福很受鼓舞。刘永福在离开谅山前，又借谅山巡抚梁辉懿来见黄桂兰，黄桂兰正式答应暗助黑旗军枪械军火，刘永福十分感激。十四日，刘永福函禀黄桂兰，“据称保胜一带有伊扼守，万不使法人得逞。况曾受天朝厚恩，仍想报效天朝，洋枪药码等物既蒙允给暗助，遇事无不尽心尽力。”黄桂兰则表示，如果法军进攻北宁黑旗军阵地的话，援越桂军将“概不用号衣旗帜，以观刘永福之兵如何抵敌，见机相时而动”[①]。

3．尝试联络越南官员。桂军入越防法，本来就与越南地方官员有联络，需要对方帮助解决粮草民夫等问题。受命防法以后，黄桂兰与越南官员接触时，常常有意把话题往抗法防法上引，以试探对方的态度。如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四日（1月23日），黄桂兰在驱驴会晤谅山巡抚梁辉懿，在笔谈时，黄桂兰“稍示以虑患之意”，但对方反应冷漠。后来，黄桂兰又借查办土匪为名，出示晓谕，以越南积匪频年扰攘，迄未荡平，近又闻其谋结他匪，图窥边关，知会越南各省之兵，分扼窜路，从而为越南地方官员备战提供借口，“如此联络固防，或可震慑法人，有所顾忌，而得弭患未萌。”但是，试探的结果使黄桂兰十分沮丧，因为“各南官亦觉漫不经意”。对于法国的侵略，“越官则讳不敢言，似恐贾祸”。

4．继续剿抚陆之平等股。当时，曾有这样的传言：法军为了对付刘永福，企图招致陆之平等股，以与黑旗军为敌。这使援越桂军认识到，如不及时剿清各股，抗法军力可能会因而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88～289页。

受到牵制，从而干扰了抗法大局。因此，继光绪七年十月在通陇大败陆之平等股后，援越桂军趁对方坚巢迭破，已溃败不成队伍，四散收山之机，加紧剿抚。十二月，援越桂军营务处副将周炳林传集山人土目为各营乡导，督饬弁勇实力穷剿，“如能远赖福威，渠魁就缚，则边防解严，少一顾虑，得以专力御法，实为厚幸”。到光绪八年三月，被击溃的各股或三五十，或十余人分匿荒山，已不能复聚为祸，清军又在各处张贴告示准许他们投诚。

然而，历史似乎要与清政府开个玩笑。光绪八年二月中旬，李维业率领几百法军兵临河内城下。三月初八日（4 月 25 日）并悍然攻取河内，一个星期后又将河内退还给越南政府。原来调兵遣将准备还击李维业的越南政府受其蒙蔽，而改变态度，决定与法国议和，并下令解散已动员调集的越南官员，迫令已在山西祭旗誓师准备出征的黑旗军撤回保胜。同时，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口口声声求援变成指责中国不该出兵援越和暗助刘永福抗法。兵力只有数百人的李维业如此旁若无人，予取予夺，根本无视越南政府的备战和中国政府的出兵援越，这就宣告曾纪泽和清政府奉行的“示形慑敌”策的失败。

越南局势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使得清政府和援越桂军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进军击退李维业吧，法越已经讲和，战事似乎已成过去，越南自己已无意打仗，中国就更没有理由越俎代庖；退兵回国吧，就不单是在咄咄逼人的法国侵略者面前示弱，默认他们的肆虐；而且中国军队这样劳师动众地无事而进，无功而退，也是一场笑话；继续留扎原地吧，那总要有一个堂皇的借口，可以遮羞壮胆。这样的借口终于被张树声找

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28日），张树声奏称："今日中国备边之策，惟有令滇、粤防军守于域外，仍以剿办土匪为名，借图进步，既为我军驻守之地，或免法军蚕食之虞。"清政府如获至宝，马上在四月十四日的上谕中认可了这一说法，并指示要拨械添军加强援越桂军，即当乘时合力经营，勿落后着，妥筹布置，借固藩篱，并添调关内防军出关进扎，联络声势[①]。

拨械加强援越桂军一事，由张树声与李鸿章商量解决。"李鸿章以该营现已逼近东京，军威不可不整，当于无可筹济之中，竭力商凑，由天津、江宁两处置存军械内提拨林明顿后膛洋枪三千枝，每杆配子五百颗；后膛过山洋炮十尊，炮子二千颗，发给黄桂兰各营领用，俾得认真练习，以壮军容而资备御"[②]。张树声将此事飞函知照广西当局，要广西即派员弁分赴津、沪将此项军械运解回桂，分发前敌各营，以资利用。张树声还为此去函广西当局，要他们好好使用这些枪械，"申威域外，备御异族，与内地军务不同。大率器械窳旧，壁垒草率者，虽能战亦足以召侮；枪炮精利，军容整肃者，虽不战亦可以屈人。……此项洋械，湘、淮诸将尚能讲求操练。原奏本系拨给卉亭防营，务须属其选用教习，分派各营，严督勤操，务期精熟"[③]。但是，首先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岔子，拨给广西的三千杆林明顿后膛枪变成"天津解粤之笨枪，药弹多不着火"。十尊后膛过山洋炮要么是没有送到，要么是换成了小炮。光绪九年十月，黄桂兰有函谈援越桂军装备的大炮的情形称："我军无大炮，攻之已自不易，……前蒙由金陵拨解来西之劈

① 《中法战争》(5)，第111～112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第26～27页。
③ 《中法战争》(2)，第532～533页。

山炮，虽已运至军前，终不能敌彼炮之大。"① 赵沃于十二月廿七日（1月24日）称："解到开花炮四尊，格林炮一尊。"②《关外随营笔述》记称："我军亦有开花炮，奈陆运之难，不如彼轮船载来之大，量度施放之艺又不如彼艺之精。"③ 因此，在北宁之役时，援越桂军"实乏大炮，无具攻人"。其次，即使对于好不容易运到的枪械，援越桂军也未加珍惜，更未认真操习，以致"委利器于无用之地"，没有很好发挥这些枪械的作用。

至于添调关内防军出关驻扎一事，由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共同解决。当时，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裕宽向清政府表示要资助援越桂军："如果兵力不敷，应即酌量添募营哨，以资控扼。或西省饷需短绌，奴才当督率司局力筹接济，以重边防。"④ 到年底，实际只"筹解协饷银一万两"⑤，资助也很有限。

既然上面玩的都是些花架子，下面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真东西。光绪八年四月廿七日（6月12日），倪文蔚向清政府奏报加强援越桂军的情况称：拟将黄桂兰现统之12营，分八营于左路，抽拨省防两营调归管辖共成十营，仍以黄桂兰统之，饬防水口、平而、硬隘、罗隘，办理越南之高平、通化、白通、谅山、芄封、长庆、谅江、太原、富平一带防务；分四营于右路，益以现驻太平府之平字勇一营，共成五营，以革职留营道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463页。
② 《中法战争》(2)，第374页。
③ 《中法战争》(3)，第67页。
④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347页。
⑤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976页。

员赵沃统之，饬防陇邦、回邦、平孟、剥淰、者河、柏怀等隘，办理越南之药街、襄安、保奖、乐同、文唐上一带防务，仍饬于旧扎勇营之文渊、谅山、芃封、牧马、归顺、小镇安等处体察情势，凡各路要隘僻径可达河内及水道可通近边之处，遴选得力将官率勇驻防。如此布置，“庶外侮可以潜消，内讧亦不敢窃发”[①]。后来还招抚入越广西农民军残部编为两营，从而使援越桂军由原来的 12 营不足 5000 人，增加到 17 营 6500 人。左路 12 营的管带分别为：提督陈朝纲，总兵陈得贵、韦和礼，副将冯兆金、周炳林，参将黄玉贤，游击李应章、张金泰，都司张锦荣，守备李定胜、叶逢春等；右路五营管带分别为：总兵陈德朝，副将黄忠立、蔡简宸，参将李石秀、覃东义等。

这个新任援越桂军右路统领赵沃是个什么人呢？赵沃，字庆池，广东人，原为楚军刘坤一的幕僚，跟随刘坤一入桂。刘坤一排挤广西提督冯子材后，让他参预帮同统领援越桂军，“自同治年间迭次统师出关剿办越匪，颇著威惠，于越南山川险要尤为熟悉。”因而为历任广西巡抚刘坤一、刘长佑、张凯嵩、涂宗瀛、张树声等赏识，誉为“朴诚廉洁，晓畅戎机，为西省道府中不可多得之员”。光绪五年，赵沃在追剿李扬才时，与部将党敏宣讳败为胜，被冯子材参劾去职。后因时为两广总督的刘坤一的偏袒，改为革职留营。光绪七年十二月清政府筹备防法时，已调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举荐边防将才时提到他。光绪八年三月，时任云贵总督的刘长佑奏调他赴云南军营差遣，并得清政府旨允。刘坤一和刘长佑这两位大员这种异乎

---

① 《中法战争》(5)，第 120～121 页。

寻常的举动，使得新任广西巡抚的倪文蔚也对赵沃另眼看待，以至因人设事地硬将援越桂军一分为二，让赵沃当上了右路防军统领。表面看来是加强了援越桂军的力量，实际上，由于赵沃并无指挥与洋人作战的近代战争知识和才能，且好大言惑众，争权夺利，因而成为援越桂军内部的消极因素，严重地削弱了援越桂军的战斗力。这是清政府继选择黄桂兰后的又一失策。

这时，受越南形势影响最大的是黄桂兰，迫使他不得不把原来的部署作了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是将进扎改为后退。当得悉越南政府准备与法国侵略者议和的消息后，四月初二日（5月18日），黄桂兰禀告倪文蔚：由于北宁逼近河内，“万一法酋径攻北宁，我军驻在其间，自难措手”。因而命令进扎北宁各营，退到离北宁30里的安勇县，并多次通饬各营人役“不准擅过北宁一步，以免彼族借口”[①]。而倪文蔚则走得更远，萌生了撤兵回国的念头。八月二十七日（10月8日），他致函广东学政吴廷芳称：“我军仍扎北宁境上，昨经飞饬各营先期筹夺，相机进止，勿启戎心。现幸陆之平授首，诸逆或可次第驱除，乘此班师，自固吾圉，未尝非计。”[②]

十月，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就中国出兵入越一事与中国交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与李鸿章议定协议三条，其中就规定中国从越南撤出军队。清政府同意了这些条款，指示广西等省撤兵。倪文蔚接到总理衙门的函咨后，即转饬援越桂军“酌量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604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536页。

移师”。黄桂兰遂饬将驻涌球之镇南前军右营守备叶逢春帮带弁勇两哨退扎安勇县，计离北宁省城 30 里；原扎安勇之镇南左军右营总兵陈得贵管带一营退扎谅江府，计离北宁 55 里；其原在安勇协防之镇南新正营一营，早于十月间调回任嘉驻防。这时，越南局势又复恶化，越南国王咨呈清政府挽留援越桂军：“现下事机未集，他族尚尔鳌居，其情叵测。而据诸省所报，则上国诸统领每谓下国曾无援书，致未奉督抚上宪列位谕示，意欲撤回。不惟下国人心将安赖以无恐，而临辰意外有虞，不肯应援，则事机阻误，恐至负上国封殖之意，且又劳列宪大人一番注措，下国深为忧惧。”要求清政府“仍饬诸营兵各留下国择地遥扎，搜匪卒功，遇彼横发何处，即协与下国出力剿除”[①]。但已于事无补了。

其次是停止助刘抗法。本来，黄桂兰曾答应暗助刘永福枪械弹药，但是，当看到法越议和，形势变化时，他就不打算兑现自己的允诺了。光绪八年三月底，他闻知刘永福准备攻打河内时，马上表示反对，“随即转嘱密致刘永福，现在法人已有议和消息，令其慎密布置，不可多事”[②]。又因为倪文蔚一直强调对于黑旗军“只能密为助援，仍不许稍露声色”。黄桂兰忠实执行这一指示。他在六月十五日（7 月 29 日）禀报倪文蔚：“卑军虽与永福时有往来，而于函牍一切，并不敢稍著痕迹。诚以目前情势又与先日不同，非仅恐授彼族争论之端，且须虑越谓我梗其和议。”[③] 如此畏首畏尾，当然就不能指望黄桂兰会在助刘抗法一事上有何实际行动了。尽管在八月十一日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693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369 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474 页。

(9 月 22 日）的上谕中，清政府已改变对刘永福的态度，在批复云南督抚的奏折时指示援越清军应助刘抗法："刘永福一军可为防军声援，亦应设法笼络，俾为我用。总期预杜外人窥伺，亦不致启衅端。如能保护北圻，即以固吾疆域。"[①] 而且云南巡抚唐炯也亲自在木厂会晤刘永福，一次就资助饷银万两，并答应以后继续助给军饷器械。但黄桂兰虽然在口头上还不时提到要暗助刘永福，却一直未见丝毫实际行动。

再次是避而不谈"联越抗法"。前面已经提到，尽管清政府再三明确指出不欲卷入法越矛盾之中，不会联越助越抗法。但清军既要援越防法，就免不了要和越南官员谈到这些问题。而在开始时，黄桂兰曾主动做这方面的事情，现在，黄桂兰改变了态度，不但不敢主动与越南官员联络，反而担心对方找上门来求援时怎么办？八月十六日（9 月 27 日），他曾就此事向倪文蔚请示：如果法军侵及北宁，我军现扎涌球、安勇一带，适当其锋，"倘或南兵力与抵敌，密求暗助，可否相机而动，未敢擅专，惟有仰恳密示机宜，俾得遵照筹备，庶免临事张皇。"但倪文蔚也不知如何处理，只有将矛盾上交，批复黄桂兰道："我军分扎北宁、谅山，实虑逼处，易于启衅，且恐轻信南官乞援，稍违节制，必致代越受兵。当已飞戒关外诸军，反复切谕，断不可喜功生患，贻误军机。即使越王咨乞援师，亦须奏请朝旨，钦遵办理。"[②] 九月九日（10 月 20 日），倪文蔚有奏向清政府请示办法："我军所驻北宁之安勇一带，实据膏腴，倘彼族意存攘取，或南官力乞救援，若闭营自固，是以

---

① 《中法战争》(2)，第 229～230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519～512 页。

拒请，失属国之心；将率尔兴戎，又虑失好，启连兵之隙。臣虽一面飞戒关外诸领将，仍旧扼要严扎，不许退驻失势，尤不许轻动生隙。然其间因应之难，有不得不详陈于圣主之前者。”[①] 可是，清政府对此并无批复，显然是回避就此问题作出决定。

黄桂兰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光绪九年初，越南政府得知李维业将要攻取南定，各省纷纷戒备，同时也吁请援越桂军进扎北宁，以壮越军声势。二月十二日（3月20日），谅山巡抚梁辉懿因外间纷传法军欲来攻取北宁，遂面见黄桂兰呈递北圻统督黄佐炎的求援书，文称：“越南国东阁大学士统督军务黄为飞呈事：昨据下国东、河二省咨报，西人增来兵船抵到河城，闯入河内省城居住等情，以若所为，想难以言折服。兹下职现调兵勇悉向河城，相机筹办，仍查北、太两次兵勇亦在调派数内，而北宁、太原二省兵勇颇少，不无意外之虞。辄将情飞呈，统祈贵大人审酌事势，或移节进扎北宁省城，旗帜扬威，兵民鼓气，为中外一大长城也。倘未便移节，祈派出最得力数营先往住扎，大辕另行继往，以资声势。希惟卓夺施行。春风怡荡，翘企回音。光绪九年二月初四日（3月12日）。”黄桂兰接阅来咨，虽然认为所谓法人要攻北宁的说法，无非虚声恫喝，挟制越方，但考虑到越方既有所请，自不能置若罔闻。于是一面复令梁辉懿转达黄佐炎，往调山西黑旗军即来北宁驻扎。一面扬言我军已调各路大队预备应援，俾越方得以安心[②]。后来，当法军攻打南定时，他亲历谅江各营，申严儆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509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785～786页。

备。又饬前次涌球、安勇退舍各营，仍行进扎原处；复添调先锋营奋勇回扎涌球；总兵韦和礼两哨劲勇同扎安勇，又调提督陈朝纲、副将周炳林各挑劲勇移驻谅江，皆距北宁省二三十里不等，并与北宁、山西各省越军呼吸相通，声威较壮。实际上是虚张声势，坐视法军攻陷南定。越南史料关于此事记称：光绪九年三月，清统领黄桂兰抵驻谅江府，调派管带陈得贵将兵进驻安勇，帮带叶逢春进驻搭球左岸，统带韦和礼进驻雄揽以为声应。北省次臣商与桂兰过江择地严驻。既而桂兰叙谓未接上国明文，未敢会办，仍照北辖地夹大河与他族老巢相逼。而省城前后二江（沾德、月德）正宜防范，应多募客勇备派，并派高谅勇一算驻近营军，如他有从月德往，另派营军换装助剿。至如慈山、嘉林各路，由我国自办。黄桂兰的这种推诿态度，使得越南政府十分失望。越王曾就此谕诸臣：清军不肯渡江“其意已见，毕竟我事我当正办”，勿专恃于人。

在这段时间中，援越桂军比较成功的，是基本完成剿除入越广西农民军余部的目标。先后生擒陆之平、击毙杨大家伙、李亚生等渠魁，招抚覃四娣等。为此，清政府奖赏各将：记名提督黄桂兰著赏穿黄马褂，后来并得实授广西提督之职；在事出力的已革道员赵沃，著开复原官原衔翎枝，陈德朝、陈朝纲、黄云高、周炳林、韦和礼、黄忠立、冯兆金等皆获赏。

五 李宝会谈及协议

1882年5月6日，曾纪泽获悉李维业攻占河内的消息，马上照会法国外交部长法来西讷，要求法国政府命令李维业退出河内。但是，法来西讷于31日复照，拒绝了曾纪泽的正当要求，说李维业攻占河内，“我们打算实施的行动所引起的后

果仅仅涉及上述两个缔约国，因此我方对中国政府没有作出任何解释的必要”①。

法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在中国政府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五日（6月10日），清政府有旨令群臣筹议办法：“越南孱弱已甚，如果法人意在并吞，该国万难自全。论藩属之义，中国即应派兵求援，而在我既鞭长莫及，在彼又弱不能支，揆度情形，势难筹议及此。惟越南北圻各省多与滇、粤毗连，若法人尽占北圻，则藩篱全撤，后患将无穷期。强弱安危，关系甚重，何可坐失时机，致成不可收拾之局？惟事体重大，应如何谋定后动，务策万全之处。”著有关诸臣通盘筹划，悉心妥议，迅速复奏，候旨施行②。

诸臣复奏，可分为主战和主和两大派。

主战派以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等清流派谏官和滇、粤、桂三省督抚为主，其中，各人的主张又微有差别。如张之洞、张树声、刘长佑、倪文蔚等都建议清政府出兵援越抗法，而张佩纶、陈宝琛、岑毓英、唐炯等则主张中国在出兵援越抗法的同时，要联络和支持刘永福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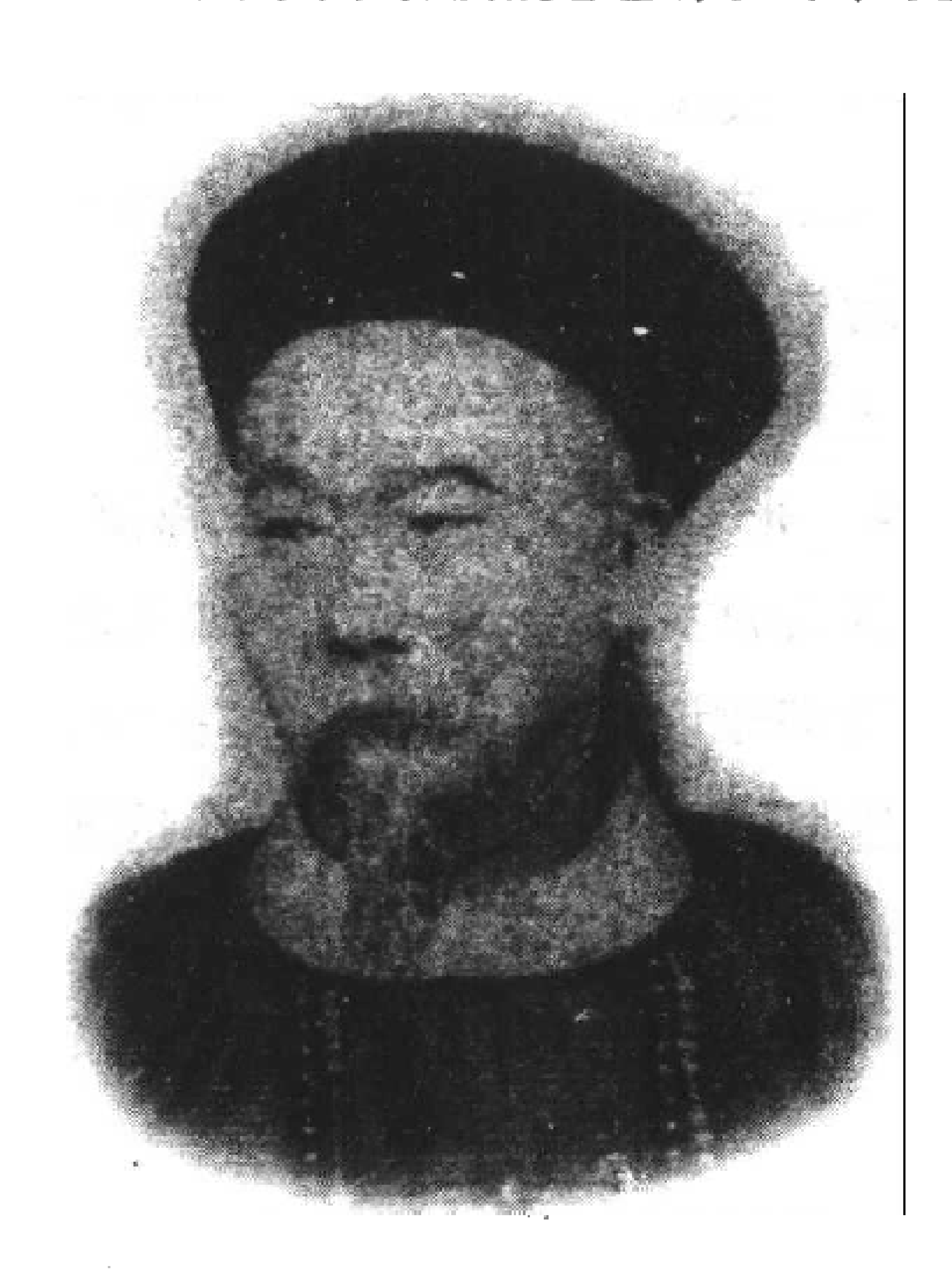
主和派则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署理两广总督裕宽。

裕宽本任广东巡抚，在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北洋大臣期间兼署两广总督。张树声派赴越南侦探的人员所禀情报都由他处理，因而对越南抗法情形有一定了解。五月十九日（7月4日），他上奏清政府，主张中国不要卷入法越矛盾之中：越南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568页。
② 《中法战争》(5)，第104～105页。

积弱已久，政令不修，此次法人之谋，越人初非不知，而竟不能预为之备。窃以为宜听越南自为之，中国不必预闻其事。他的这种主张显然不符合清政府的意图，当天有旨将他训诫了一通："至谓越南积弱，此时预闻其事，异日因应为难，将视同蛮触之争，无关大局。既失中国字小之仁，该国久隶藩封，借可捍卫吾圉，若意存膜视，自撤藩篱，使他族实逼处此，后患正不可胜计。"①

李鸿章则比裕宽老练。早在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接到妥筹办法的谕旨后，他便于二十七日（12 月 18 日）复奏，表示要派员赴越南探听实在情形后再酌办。现在已过去了半年，李鸿章掌握了许多情报，对中、法、越三国关系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他指出越南早就投靠法国，企图以此来摆脱对中国的藩属关系："越王当日见中国内地多事，颇欲依附法人，故两次定约，内多违碍中朝之语，不肯申报。迨中法国狡谋，处处受制，惧其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曾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

① 《中法战争》(5)，第 122 页。

鲸吞蚕食，力不能支，又不得不求上国援助。”① “法国于同治十三年与越南所定约款，越王并不先行奏闻，其受法所饵，乐为自主之国，不愿为中国统属，居心实不可问。”② 因此，李鸿章认为中国不值得为这样一个离心离德的邻国去火中取栗，而与法国为敌：“越已阴降于法，而我代为力征经营，径与法人决裂，则兵端既开，或致扰乱各国通商全局，似为不值。更恐一发难收，竟成兵连祸结之势。”③ 李鸿章把他的主张，集中体现在《李宝协议》中。

原来，法国政府虽然殖民野心很大，但却缺乏实现其并吞北圻所必需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例如，海军殖民部在1879年制订进犯北圻的计划时，就提出需要3000名法军和3000土著士兵才能达到目的。然而，在酝酿和筹备了将近五年时间后，直到1883年5月19日李维业被歼时，他手下也只有600人，仅为原计划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其窘困情形。依靠这些兵力，战胜腐败孱弱的越南政府是足够了，但要对付中越两国的联合抵抗，特别是面对经过20多年的洋务运动后，军事力量逐渐增强了的中国，法国还是有点力不从心的。因此，在筹划进犯北圻的同时，法国政府制订了力图避免中国注意和干涉法国侵略北圻行动的对策，而被挑选出来担当这一任务的是1880年5月到任的法国驻华公使宝海。

宝海来华前，曾长期在法国外交部处理交趾支那和中国事务，熟谙法国的远东殖民政策。他曾积极参与策划吞并北圻、染指中国的侵略计划，并有所建言。他到华履任之始，就于

① 《中法战争》(4)，第44页。
② 《中法战争》(5)，第159页。
③ 《中法战争》(5)，第197页。

1880年6月5日致函法国外交部长，建议尽快在越南采取行动："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与天朝毗邻的一个广阔的地区，继续扮演最近6年以来我们一直扮演着的怯懦和犹豫不决的角色。阁下知道我要谈的是东京问题。在这方面，……为了实现我荣幸地向阁下叙述过的计划，我们还是有必要事先在顺化河口搞一次大规模的示威行动，政府也赞同我们的计划。"[①] 以后，他一直都关注着法国的侵略进程，直到1883年5月16日，已被解职召回的宝海仍向法国政府表示，他拥护在越南"巩固我们的保护制度，使它明确化，并且使我们能够永久地在东京占领下去"。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3)，第343页。

第四章

黑旗军鏖战北圻

一 唐景崧入越说刘

就在李宝谈判协议、刘永福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唐景崧万里请缨，入越说刘抗法来了。

正当李维业攻占河内，越南北圻形势十分严重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在助越抗法抑或是与法划界而守的和战问题上仍举棋不定，决策不下。那时，清朝刚刚出兵援越抗法，又因李宝的三条协议而急忙撤兵，显得十分被动，出现了唐景崧指出的那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中国往援，既虑有碍，争以公法，亦决不从；而越南患难之来，中国与共，又未可听其存亡。"真是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光绪八年七月十九日（9月1日），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奏清政府，提出他对法越形势的看法和援越抗法的办法。

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人，1865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三年，散馆后授七品庶吉士。十五年后始晋升一阶，为吏部六品主事，还要候补，尚非实职。从他后来的作为来看，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见识、有魄力、有才干的能员，然而，沉浮宦海十几年，却一直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

当法国加快侵略越南的步伐，从而危及我国西南边疆时，

唐景崧挂念桑梓，深感事态严重。他多次对人指出："法人欲割其山西、兴化、宣光等省，则以地近云南、广西故也。"① "越南今日之难，非琉球可比；云南之通商，非各海口之通商可比，此所以不可苟且了事也。"② "窃维今日兵事为中外大局所关，外之高丽、缅甸，内之台湾、琼州，皆视越南一隅之存亡以为安危，诚不可不用全力以图挽救。"③



台湾巡抚唐景崧像

唐景崧很不满意清政府在严重的形势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他在上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清政府"于法氛未动之先，曾谕内外臣工详加揆度，合力图维，是朝廷固未尝置越南于度外也。本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筹备，复有敕疆臣因应之旨。疆臣建议，无外筹防，揆时度势，力止于斯，而终归于无救越南，有损中国，殊可叹已！"为了帮助清政府走出困境，唐景崧向清政府提出一条派员入越切实援助刘永福抗法的"救越南至便之计"。并自告奋勇，上书请缨入越去促成此事：

越南有将、有兵而不知用；君臣贪昧，政治不修，即无夷难，亦几无以自存。中国不与共安危则已，既与共安

① 《中法战争》(2)，第42页。
② 《中法战争》(2)，第295页。
③ 《中法战争》(2)，第108页。

危，则赖有人往提挈之也。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云贵督臣刘长佑已疏其名入告，当确有见闻也。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以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如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操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徼之干城也。或谓刘永福一武夫耳，岂能倚任大事？而臣则以为过论。前者河内之捷，海岛闻知，至今夷见黑旗，相率惊避。正宜奖成名誉，借生强敌畏惮之心；中国人士轻之，则彼族亦遂轻之矣。臣尝见今之言者，訾毁重臣，弹劾宿将，愚昧之见，窃叹未宜。盖四邻环伺之秋，与承平有间。重臣宿将，所借以御外侮者，亦赖威望有以镇慑之。必曰不可恃，诚恐长寇仇之玩志，而堕我长驾远驭之先声。夫刘永福诚何足道，然既驰声海峤，亟应奖励栽成。臣所以请遣使前往者，乃欲借国威灵，培彼名望，未尝非控制强邻之一术也。……

以上各节，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岂非至便？惟使臣难得其人。越南四境虎狼，强之以行，其气先馁。且非用一刘永福遂能资其靖寇也。是赖胸有成算者往

焉，用彼爪牙，为吾凭借，而后扩充以图事业之有成。昔汉陈汤为郎求使外国，傅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皆以卑官而怀大志，卒立奇勋。微臣慨念时艰，窃愿效陈、傅之请。刘永福所部皆属粤人，臣籍隶广西，谊属桑梓，则前往出于有因；寓越之粤人极多，情势易于联络，盖尝熟筹及之，非敢冒昧而请行者也。今者琉球固无望矣，朝鲜又生事矣，日本、俄罗斯皆睢盱而欲蠢动者也，民穷财尽，巨患日深，苟可以裨救万一，虽职系小臣，亦不得诿为分外之事。其济，国之灵也；不济，则虽绝脰夷庭，粉身蛮徼，均不必在顾计之中。臣不冀迁官，不支岁帑，抵越南后，毋庸援照洋使章程办理；惟乞假以朝命，俾观瞻肃而操纵有权。畚往之忱，矢诸夙夜；一得之虑，期报涓埃。[1]

对于唐景崧的上书，清政府的处理方式十分微妙。他们虽然认为唐景崧的建议很有见地，也很欣赏他万里请缨、勇赴国难的志气，但是又担心由政府明令派其前往越南，将来惹出事端后会有碍于对法交涉。因此，在私下的场合，掌权的军机大臣如恭亲王奕䜣、宝鋆、李鸿藻等人，都对唐景崧的建议表示赞同和支持，认为“于异域事筹划完密”[2]，但是，却不敢答应唐景崧“乞假以朝命”的要求，也没有对他的上书作何批复或指示，而只是在八月初五日（9月16日）下了一道意思含糊的谕旨：“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著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委用。”[3] 唐景崧认为这是让他入越说刘抗法的烟幕弹：

① 《中法战争》(2)，第42~44页。
② 《中法战争》(2)，第41页。
③ 《中法战争》(2)，第45页。

"余之疏请入越也，而敕下往滇，盖中旨谓滇、越毗连，刘在保胜，尤与滇近，其命入滇，未尝非暗寓用刘之意也。"[①] 如果唐景崧此行能入越说动越南政府和刘永福坚持抗法，保存北圻，则清政府有委派得人之功；反之，如惹出乱子，法国质问起来，则可以推说是唐景崧的个人擅自行动，从而诿卸责任。

清政府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没有动摇唐景崧的报国雄心，他依然满怀豪情地出都赴越。临行时，他的会试座师宝鋆赠言送别道："南城外窃尝议汝不守范围，然陈汤、傅介子之俦，岂拘守绳墨之士可同日语哉？此事极为出奇，出奇必求制胜，吾深望汝。"并赞曰："壮哉班定远也！"[②]

唐景崧赴越的第一站，是到越都顺化会见阮朝君臣，实地了解法越关系的真相，考察越南政府的抗法决心和实力，及它对清政府和刘永福的真实态度，从而掌握具体的第一手材料，取得在援越抗法问题上的发言权，以便作清政府决策定计时的参考，也是自己说刘抗法及联络越南其他抗法力量的依据。

但是，在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到达顺化后，由于没有清政府的朝命，结果，嗣德王拒绝接见他，只派协办大学士阮文祥、礼部侍郎陈叔讱等官员与唐景崧会谈。这些越南官员在关键要害问题上对唐景崧诸多敷衍，"保护一款，始亦不言，经余直揭道破，伊乃承认。盖此来固查看情形，而为越作说客，则在不逐刘永福，不从保护为要。故极力破其昏愚，怵以利害"[③]。经过实地调查，唐景崧认为阮氏朝廷没有抗法的决心和信心，在政治上倾向法国，对中国却是猜疑疏远，从而得出

---

① 《中法战争》(2)，第63页。
② 《中法战争》(2)，第45～46页。
③ 《中法战争》(2)，第53页。

结论：不能指望和依靠这样腐败庸懦的越南政府来进行抗法斗争。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6日），他报告清政府赴越调查的印象："查得该君臣昏愚委靡，战守绝无经营，即议和亦毫无条理。其国政令酷虐，民不聊生，自锢利源，穷蹙已甚，每岁所入，大概不及百万。法人又从而愚之。恬以甘言，则欣欣窃喜，而于中国转多疑忌之心，无可扶持，一言已决。"[①]

在与越南官员晤谈中，唐景崧反复询问了刘永福及黑旗军的情况，提醒越南政府正确对待和支持刘永福抗法。如他在十二月初五日（1月13日）与阮文祥笔谈是这样的：

唐景崧：（如法军进攻北圻）贵国尚有良将可与敌一战者否？

阮文祥：自揣势力难与彼族争锋，但自来彼辈横虐已甚，军士同仇，纵无良将，亦惟尽力。但当绸缪未雨，仰赖天朝处置得宜，方为两利。

唐景崧：刘永福何如？贵国如何驱策？

阮文祥：下国用永福亦为此计，奈彼族以其碍商欲逐之，下职亦再三争辩，而众见不同，不无抵牾。至今事势，舍永福固不可，而用永福亦难，总赖天朝措置耳。

唐景崧：彼族所以欲逐永福者，即有惧之之意，用敌之所忌而制之，此至便计也。如听所言，一为逐之，彼族岂果息兵？贵国岂遂安然无恙乎？特谲术以诱之耳。此等人当信用而扶植之，是在贵国王独断及足下重臣之赞襄，此人既为贵国官，则驾驭凭贵国为便。若或疑忌永福，岂不闻两害相权则取其轻，用永福未必有害，即有害亦轻于

① 《中法战争》(2)，第59页。

彼族。急难在前，以有用之才犹迟疑莫决，殊为失计。

阮文祥：下国待永福原无他意，始欲命其来顺化，因有彼族之事，遂止之。惟该员原系天朝居籍，如得列位一言，使之永矢一心，则下国之幸也。

唐景崧：不敏于七月具奏筹护藩邦一折，即有策励永福之请，此事可图任之。其所以筹护贵国者固不仅赖此人，但此亦因利乘便之一法。惟其兵力尚单，尚待扶持，又必贵国诚心任用，方不致其掣肘，是则凭贵国王一言与足下秉轴者实心协谋也。[1]

初六日唐景崧又与陈叔讱、阮述晤谈：

陈叔讱：贵书请助，亦不出力征、理论二者，然下国情形如此，力征恐非全利，当以理论为先。想中朝近来筹划于此二者，为下国计较，何利何害？能示知否？上官此来，于此二者主意何先？

阮述：万一出于兵事，又恐有远水之虞，乞以排难解纷为先。

唐景崧：理论自是平善之策，但全不仗兵力，徒以口舌争之，恐不肯休。中国筹护亦必二者兼之，此我军所以密布也，不然，劳师糜饷者何为？贵国之军惟刘永福一军差有声威，但其力甚单，恐不能远及，贵国可否继以粮饷，令其增兵，以壮声势？使彼有所慑，则易于转圜。天下无全材，当节取其所长，而又在我掌握之中，不至为患，此驾驭枭雄之法，亦即控制强邻之术也。

陈叔讱：现未了事，而为之继粮增兵，更启他疑。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675～676页。

若永福者，下国亦欲收用，以资其力，所以至此。近议迁之，非得已也，欲全之也，惟此甚关紧要。其继粮一节，自有朝廷金议，非下职所敢言也，黄统督（谓佐炎）亦曾有言（即继粮增兵之言），然未定如何，不敢妄说失信。

唐景崧：用兵自有密计，所谓继永福以粮饷者，其兵由彼自招，司度支者暗运接济而已，何贵国不达军情之甚也。鄙意欲扶永福者，非必即驱之使战也，声威克壮，则不战而屈人，是可以为口舌争者之一助，所谓贵国求自立者，此即一端。待贵廷金议自是实情，然贵君当有独断，此意亦望代达，俾知可否。若实难行，则筹他术。故谓彼此必须实情妥商，不至隔阂，方有条理。[1]

通过与越南官员的多次晤谈，唐景崧进一步了解越南政府对刘永福的猜忌疏远态度，以及刘永福在抗法斗争中的中坚地位和孤立无援的困境，从而更坚定了他说刘抗法的决心。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向清政府报告了刘永福的爱国热忱和抗法决心，催促清政府在决策、军火、人员、饷银等方面实实在在地援助刘永福：

刘永福所恃者险，惟力主分布散击之术，夷人时隐慑之。曾迭请于黄佐炎，以为非战不能议和；并谓兵连祸结，则乞降罪以谢法人，奈书累上而说不行。又致书于坐探委员，谓有搏虎驱狼之志，惜制于人。实则自备粮粮，越人无所掣肘。第虞一败则法越两不相容，中国又无退路，故亦隐忍图存。现在增兵造船，暗购军火，其下扑河内仅六七日程也。越南极仗此军支持全局，又迫于法人，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682~683页。

逡巡畏葸。臣尚未晤及永福，而就近访闻较确，此刘永福之情形也……臣亲履其境，目睹其形，伏思中外未肯失和，非用刘永福一军别无良术。至如何用之，及为永福如何布置之处，请缕晰而陈其计：

一、刘永福固宜暗用而不宜显用也。然虽不见明文，亦必密有确据，方能坦然效忠。相应请旨敕谕滇、粤督抚臣，如刘永福果能扼守红江，有功边圉，即行文广西上思州立案，准其日后回籍；传使闻知，坚其奋发。至接济军火，云南一省力或不足，势须两粤合力图之。疆臣必奉旨而后敢行，刘永福即迅移兵屯扎红江左右，胜于在天津以口舌之争也。

二、兵当以义动也。刘永福兵力尚单，固非法敌。然《春秋传》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尊周室而攘夷狄，齐桓、晋文所借以成霸业者也。宋室南渡一诏，论者谓其有助中兴，仗义执言，可以补甲兵之不足。宜有人入永福军而提携之，一檄传呼，申布大义，致书各国，请示公评。自外夷构难以来，神人共愤，一经震喝，必有奋袂而起、仗剑而前者，彼族断无闻之而不惊也。观去秋情形，已萌退志，势不肯以全力争此瘠区。中国再为调停，庶易转圜而退。……

以上各节，所以必用刘永福者，以其为越官而行越事，无虑外人之阻挠耳。果能先据红江，次扼北宁，则宣光、山西、兴化、太原、高平近边等省，已归囊括之中。据北而后图南，固圉之策，无逾于此。[1]

① 《中法战争》(2)，第60～62页。

从以后发生的事实来看，中国数省合力济助黑旗军军火和饷银的建议，清政府基本采纳并命滇、粤各省实行；而代刘永福草檄以传呼天下，则唐景崧自己身体力行，壮军心而寒敌胆，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顺化回到广东，唐景崧可能已经知道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于光绪八年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复奏清政府，认为唐景崧条陈越事未能尽合机宜，请仍令回京供职。因此，唐景崧请缨之举将面临徒劳无功的危险。为此，他决定走出一步险着：即入越说刘永福抗法。而在他之前，还未有清朝官员到过黑旗军驻地，刘永福将会如何对待来人，还不得而知。但他仍奏报清政府即赴山西会晤刘永福，临行前，他读到《李宝协议》，即有函指出其中窒碍难行之处，重申入越说刘抗法的主张：

> 崧现拟即赴山西迎会永福，属其仗义兴师，檄告天下，不必遽出于战，可先以理折之，示以力，扼保胜之势，散布下扑河内之言。现彼增兵，无非胁制会议，永福亦以兵胁之，且观其进退如何，再定办法。唯永福疑虑甚多，必许之以暗助，而后志坚力果。崧即在彼为质，或云为永福邀留，或云为华民牵住，或借不入滇之罪朝旨去官，所以杜彼族纠缠之口而中国推谢之方，则亦暗挫逆锋之一术也。①

就在唐景崧准备赴山西会晤刘永福的时候，越南北圻的局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维业仅率400人即已顺利占领河内，懦弱的越南政府不但不敢反抗，反而步步退让，将随时准备出击的黑旗军从山西前线撤回保胜；口口声声“保藩固圉”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779页。

的清政府也只是虚张声势，并无进一步的行动。这就使法国殖民当局受到鼓舞，决定加快并吞北圻的步伐，为此他们撤换了卢眉，以沁冲为交趾支那总督，去完成这一任务。

1883 年 3 月 21 日，沁冲向法国殖民部长提出了一个将越南北圻并入法国保护的行动计划：请立即用船载运由两艘舰艇护送的一千人到西贡，二三千人到海防，带足各种食物和军需品，同时叮嘱减少中途停靠站。李维业司令则奉命于 4 月 20 日左右，即在增援部队抵达前 10 天左右，占领东京三角洲地带的 5 至 6 个据点。然后，指挥刚刚登陆的部队占领其他主要据点及边境。沁冲考虑派遣“闪电”和“飓风”号舰艇以及从沁冲的 5 艘炮艇里拨派出 3 艘给他。沁冲将于同一天在 1200 名兵士陪同下前往顺化宣布东京事件，向安南政府或直接向国王提出谈判，如遭拒绝、有意拖延推诿或制造困难，就有必要给安南政府以致命打击，命令部队登陆夺取顺化，直到签约后才撤离。然后，沁冲到东京去，最终建立保护国。

根据这种部署，3 月 27 日，李维业率兵悍然进犯北圻另一重镇——南定。

越南政府得知李维业的阴谋后，指示各地出击法军。对越南政府这一做法，刘永福一时还摸不透。因为他在一年前的事发伊始时，便欲率黑旗军进攻河内，趁李维业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却因越南政府醉心和谈，多方阻挠，被迫撤军。后来，越南政府又为李维业诱骗，从而答应法方要求，要将黑旗军迁离保胜。越南政府这种认贼为友、助纣为虐的做法，激起刘永福的强烈反感，使他对越南政府抗法一事失去了信心。据说，他曾派黄守忠率兵以追剿入越广西农民军残部为名，进军十州探察情形，以防将来抗法事业失败，即将十州作为黑旗军

的退路。现在接到黄佐炎的快函，邀赴兴化商议军事，他对这种忽和忽战的做法感到厌烦，想推辞不去，曾有函给黄桂兰诉说苦衷：

于月十八日，再接奉越南统督黄、兴化巡抚阮飞咨，密饬职员率勇前赴省垣商筹军务。以法人占踞河城，乘此沙高水浅之时，彼轮船无甚生动，意在直捣，克复河城。惟越南微弱，而职员所部勇丁亦属鲜少，深可虑焉。矧数年承剿各处，未蒙统督黄奏保奖励一员，兹察之各勇，心稍倦然，诚恐难以劲敌。故修寸禀，叩乞钧示，以鼓勇丁踊跃之情。职员自去岁三月初抵山西，法匪势甚顽恶，只得饬提敝前、左、右三营齐集，方期进剿。而统督北边军务黄突迎旨谕，不许进剿，遂为阻。请战不决，请退不如，准严防御。嗣后未久，则有正钦差陈廷肃、副钦差阮有度由富春直抵山西，竟言以和为贵。复据彼族称云，欲坚和好，必须移团撤防，然后议和等因。统督黄以为实，即札派前营黄守忠如故堵守河阳，兼饬销勇数百名；左营吴凤典移扎不拔县，右营杨著恩调守太原，职员许旋保胜，毋得迟延等因，不已则从所调。讵意和剿两空，愈久愈淡，各营勇丁停居日久，未免疏心，且防饷甚薄，难度蟾国。职员囊皆空虚，愿分余润，无如所愿者情甚苦楚，私自逃避，未免有情。职员自揣越王既无厚饷，扪无言词，惟屡次进剿，悉臻荡平，亦无获邀上赏，万缕辛苦，付之东流，此皆难以为情。当兹军事紧急，营勇鲜乏，实难制胜，无以为之，仰盼天恩，惟抚膺长叹而已。[1]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857～858页。

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永福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越南君臣猜疑掣肘，急则用之，缓则远之；黑旗军饷乏械缺，军心松懈；法人则日渐猖獗，如果越南政府投靠法人，联合攻打黑旗军，局势将会十分严重。而清军口说暗资援助，实际却无甚行动，这是因为署云贵总督岑毓英对刘永福的看法并不乐观，曾于光绪八年十月十一日（11 月 21 日）上奏，认为中国出兵助刘抗法，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窃谓出境兴师甚非长算。现在通盘筹划，我军只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光绪九年正月初九日（2 月 16 日）又奏称：臣等前不欲显用此人、正虑彼借词寻衅。这些冷淡情况，自然会在与黑旗军的交往中显露出来，刘永福不会没有感觉。将来，难道要重新上山为寇，重走 15 年前走过的道路？显然，他又面临着人生一大转折关头，何去何从，颇费思索。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唐景崧奉清政府旨意，前来会晤刘永福筹商抗法大计的消息，这无异是一场及时雨，对于帮助刘永福解决何去何从的困惑，鼓舞黑旗军将士的斗志，实在是关系重大。刘永福十分兴奋，为了表示诚意，当唐景崧于二月十四日（4 月 1 日）到达山西后，刘永福先派得力部将吴凤典、杨著恩、黄守忠先后谒见唐景崧，并向唐景崧呈递自己的履历和所有弁勇军装清册。

他给唐景崧的禀报称：

捐纳游击衔、越南三宣副提督刘永福谨禀主政大人阁下：敬禀者，窃永福系广西南宁府上思州人，托身异域十有七载，辛苦备尝，未如鄙愿。虽越王亦推心置腹，迭降厚恩。然仰视中朝如在天上，自分犬马之劳未由报效，每

盼天恩，惟有抚膺长叹已矣。昨蒙贵随员先来保胜宣布大人保荐之力、朝廷宽大之恩，曷胜感泣。复闻大人先由越南河静、广平等省亲至越都，今又辱临北宁，虽身冒危险，悉出公忠体国之心，而所以曲全永福者，亦深且厚矣！兹特预布腹心，竭诚差人奉迎，伏望驾临保胜，俾永福亲聆教诲，甘捐顶踵，以报朝廷。

窃思永福昔年生意越南，熟悉该国情形，适越南之保胜等处为巨寇何均昌所据，糜烂不堪。越南总督北边军务黄佐炎，悬赏使永福招勇击剿，身经百战，悉臻荡平。越南即以保胜顿永福之军，积功授副提督之任。后吴亚忠、黄崇英败窜越南，法人安邺构难河内，永福击杀安邺，嗣后攻败吴、黄及陆之平、李扬才。随大军征剿，亦意在图报朝廷，幸蒙大人洞烛隐微，独先保荐。永福虽愚，万不至不辨顺逆之安危、中外之荣辱，其所以受越南官职者，正欲备中国之干城也。惟法越构难越久越烈，前次永福阵斩法逆首犯安邺，甚为仇恨，永福亦誓不共戴天。但以粗卤庸材，不谙谋略，诚恐为其钳制，厚负栽培。倘蒙文旌亲至，唯大人是教，唯朝命是趋，不胜感激瞻仰之至。除将军马器械等件先行注册移交贵随员广东补用直隶州判唐镜沅敬代呈缴外，肃具寸禀履历，叩迎台驾，恭请崇安，永福谨禀。

计呈履历：

二品封职、游击衔、越南三宣副提督刘永福谨禀呈。今开：职员年四十七岁，系广西南宁府上思州人。于同治六年，即越南嗣德二十年，客于越南宣光省，适蛮匪梗阻，奉宣光省布政使司邓札饬，带勇赴陆安州北坡剿办蛮

匪，著有微劳。蒙保奏，奉越南国王旨：刘永福著赏授八品百户。

同治九年，奉广西提督军门冯札委，招募福字前后两营，自备军粮，会剿河阳股匪出力，蒙赏给军功蓝翎四品顶戴，并给木质关防一颗。事竣，赴兴化省保胜庸防堵，适黄逆崇英股匪蔓延兴辖一带，洮河梗塞，职员战守兼筹。

同治十二年，即越南嗣德二十六年。绕道回兴省，是年九月会剿，克复扶宁县出力。蒙统督军务黄保奏，奉越南国王旨：刘永福著权充兴化保胜防御使。是年十月，法匪攻陷河内，奉调剿办。职员冒险当先，鏖战经日，斩获法国大臣三画首级一颗，二画首级二颗，一画首级一颗，及斩散党颇多，克复城池。蒙统督保奏，奉国王旨：刘永福著赏授副领兵衔，仍充保胜防御使。

同治十三年，即越南嗣德二十七年。正月，在立石县山球、香莓等社剿办黄逆窜匪出力。蒙统督保奏，奉国王旨：刘永福著赏四美金钱一枚。是年二月，在夏和县剿办黄逆窜匪，克复城池出力。蒙国王旨：刘永福著赏军功加一级。是年七月，剿拔镇河黄逆踞匪，擒渠斩馘数百，并克复文盘州出力。蒙统督保奏，奉国王旨：刘永福著授正领兵，仍充保胜防御使，并赏记功金磬一面，五福、三寿、四美金钱各一枚。是年八月，在保胜庸剿退蛮匪，并剿退黄逆，洮河畅通。蒙兴化巡抚阮保奏，奉国王旨：刘永福著权充三宣副提督军务，以一号令，督率兵勇剿办河阳黄逆。

光绪元年，即越南嗣德二十八年。二月，进剿克复宣辖六安州城池。蒙黄统督保奏，奉越南国王旨：刘永福著

赏军功加一级，并赏紫金牌一面。是年三月，剿克宣辖北睦黄逆踞匪。五月，克复永县安隆、托门、汪苗等处黄逆老巢，并擒获副逆，斩擒匪党数百。蒙黄统督保奏，奉国王旨：刘永福著赏军功加一级，并赏四美金牌一枚。旋带勇分途搜截，是年七月二十六日，在芳渡社地方生擒首逆黄崇英到案，经统领广西右路防军赵宪讯办枭示。嗣因滇省开属大窝子瑶匪扰乱，职员率勇截剿出力。蒙云贵总督部堂岑汇案保奏，于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军功刘永福著赏四品顶戴，均奉行知恭录在案。

光绪三年，六月初八日，在云南捐局由监生报捐游击衔，捐加二级，请从二品封职，祇领执照在案。

光绪四年，即越南嗣德三十一年。十月，李逆扬才率党犯途，职员奉调赴太原省遏剿，克复多处。

光绪五年，即越南嗣德三十二年。并奉广西提督军门冯批饬，分截李逆去路。职员转向宣辖等处兜剿，克复多处，擒获首逆郭五，击毙首匪赖有才，及杀散党最多，泸江一律畅通，旋奉调赴十州剿抚叶成林等出力。是年奉越南国王旨谕：兹当春韶布令，恩典覃敷，三宣副提督刘永福准实授副提督。

嗣德三十三年。复调往宣、太两辖剿办李亚生、陆之平、覃四娣、翁七，收复雹化州、从化府、白通州、安欣、东园等处踞匪，杀贼数百出力。蒙黄统督保奏，奉国王旨：刘永福著赏军功加一级，并紫金牌一面、飞龙大项、使民富庶中项、二胜金钱各一枚。

光绪七年，即越南嗣德三十四年。五月，攻破太辖陇威老巢，擒获蛮首匪黄复六，并擒斩最众。蒙黄统督保

奏，奉国王旨：刘永福著赏军功加二级，云龙契、四美金钱各一枚。是年九月，蒙越南国王准假五月，回籍省墓焚黄。职员曾经派勇堵守保胜防所，并派勇仍堵剿宣、太两省途务，理合注明，须至履历者。

计呈兵册：

刘永福谨将福字营将领弁勇并挑选精壮哨勇以及枪炮等件，会同随员广东补用州判唐镜沅查点，先将简明清册恭呈电察，须至册者。

管带前营黄守忠（广西下思州人，授越南七品千户、河阳防御使），精壮勇丁一千名（驻扎兴化省城）。

管带左营吴凤典（广西人），精壮勇丁四百名（扎山西省城）。

管带右营杨著仁（广东钦州人），精壮勇丁三百名（扎山西省城）。

管带后营刘成良（广西人），精壮勇丁三百名（扎保胜）。

管带亲兵刘文谦、帮带亲兵刘启亮（博白人），精壮勇丁一百二十名（扎保胜）。

管带前队叶成林（广东钦州人），精壮勇丁二百五十名（扎龙鲁）。

防堵河阳王玉枝，精壮勇丁二百名。防堵安隆邓遇霖，精壮勇丁一百五十名。

花旗枪二百枝，嗰枪四百枝，火绳枪四百五十枝，火筒炮六十三位。[1]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858～863页。

三月初八日（4月14日），刘永福赴山西与唐景崧相见。唐景崧在《请缨日记》中记下刘永福的相貌是“长身削立，高颧尖颏，状类獐猿”[①]。两人初次晤面，刘永福执礼卑谨，唐景崧则略示奖慰，未与深谈。初九日（15日），唐景崧回拜刘永福，两人携手入密室，细陈衷曲。关于二人会谈内容，《请缨日记》的记载称：

三月初九日，答拜渊亭，入密室，细陈衷曲。渊亭悒悒，为言黄佐炎。

余曰：足下膺越职，佐炎外，越人待足下何如？

渊亭曰：越王待我厚，京外诸臣独梁辉懿善遇我，其余碌碌，皆忌我者也。

余曰：保胜紧界云南，云南如何视足下？

渊亭曰：独唐莪生方伯厚我耳。

余曰：足下少年冒不韪之名，今处保胜弹丸之地，设一旦得罪于滇、越，进退无路，计将安出？况今且见逼于法兰西。

渊亭跪曰：谨受教。

余曰：万里来兹，专为足下策不朽之勋，创不世之业。古有不阶尺土，提一成一旅而成霸王者。夫今日越南乃法人刀砧之鱼脍也，狼藉不旋踵。足下诚能据保胜十州为老巢，守山西为门户，北宁、太原、谅山、高平、宣光、兴化，震以足下威名，不费兵力，传檄可定。足下诚能收关外之亡命，简越卒之精锐以为兵，就膏腴之地以为粮，榷七省之物税以为财，礼罗贤俊以为辅助，然后请命

① 《中法战争》(2)，第72页。

中国，假以名号，据北图南，事成则王，不成亦不失为捍卫华边之豪杰，功在中国，声施万世，此上策也。

渊亭瞠目久之。

余曰：虽然，有天命焉，请言其次。今者，法兰西欺我中国，剪我藩服，神人共愤。中国不肯因一隅而牵动天下。足下，越官也，诚能提全师击河内，战胜则声名崛起，粮饷军装必有助者；不胜，而忠义人犹荣之，四海九州知有刘永福，谁肯不容？立名保身，无逾于此，此中策也。夫以今日揆敌势而建义旗，天人之机，似不至败。

渊亭曰：唐方伯尝曰，汝其固守保胜，无妄动，敌至再战，不胜则卷旗入滇，吾能庇之。

余曰：噫！功名者，有功而后有名。足下坐视国难，则无功无名，孰重黑旗刘永福者？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且唐方伯又安能久官滇中而庇子也。株守保胜，此下策也。

渊亭曰：微力不足当上策，且越或因此降法而击我，将奈何？

余曰：法人已不容汝，为之，被击；不为，亦击；越急，亦必除汝以谢法，豪杰毋为人所算。

渊亭狐疑。

余曰：何如中策。

渊亭曰：中策勉为之。虽然，兵单军火绌，可守而不可战。

余曰：战必有助者。夫不可战，又焉能守？先发制人，足下毋怯！

渊亭曰：二者请筹诸杨著恩，再密复命。

三月十三日（19日），夜，访渊亭，坐密室短榻，询前所陈第一策有意否？

渊亭曰：倘中国问罪若何？

余曰：中国知越祀将绝，今日必不理蛮触之事，且足下以保残越固华边为号召，义正名顺，中国无与为难也。

渊亭曰：然则吾军且进屯丹凤，勿逆佐炎意，俾生疑。且请密商卉亭统领，如能助师数百人，假天兵之威，庶易举事。

余曰：善！

三月十六日（22日），渊亭命杨著恩谒商前策。

余曰：大事固不易为，而击虏为黑旗第一要义。①

《请缨日记》的记载可信吗？

现在，我们查到几份有关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辨别《请缨日记》记载的真伪。

其实，唐景崧曾删削了他和刘永福的谈话内容。唐景崧在四月中旬因病委托唐镜沅执笔，曾有禀函给曾国荃，报告与刘永福晤谈的内容，主要是筹划保卫山西及出击河内法军的准备，这恰好是他删掉与刘永福谈话的主要部分，函称：

崧到越后，本拟即日回粤转赴滇南，因南官再三挽留，未便恝然舍去。其时刘永福尚居保胜，南官竟不能檄至山西。窃见山西、北宁势成犄角，北宁虽有中国防军，然山西失则北宁孤立无辅，守山西即所以维北宁。该省独赖刘团，故崧留处山西，招之使至，欲诱其来守此土也。幸永福闻信遂行，而道路纡迟，三月初八日始晤于旅次。

① 《中法战争》（2），第72～75页。

维时越南大势已倾，河内、南定未能克复，恐终不可以立国，沿海各省已暗纳款于外人，富春又粮道梗阻，下游一带已任听法人驰骋。计惟力扼山西、北宁两剧省之未失者，再图恢复其已失者，不能剿而除之，且姑守而困之，已属万不得已之计。永福欣然愿守红江以卫省城；而南官不重设防，锐意攻坚；永福因意见参差，忿思一逞，崧为之调停。又商诸永福，及今红江未涨，速进兵河内之怀德府，多方挑战，诱之入陆，而后奋然决斗，倘邀一胜，则彼族不敢直前，此即以战为守之计。且查怀德府距河仅十余里，屯陆兼可防河，即所以护山西省。又嘱其步步稳扎，切勿因愤攻坚，损威挫锐，幸其一切听从，即将该团全军进屯河内之怀德府。

窃维法人深畏黑旗，越南转机或于此。南官疏于布置，而驾驭永福亦甚无方，尝为委曲调停，俾免愤兵之害。当时崧已鼓舞永福进兵，即抽身避入防营，既可释彼族之嫌疑，尚易通山西之声气。永福赖有乡人在侧，亦庶几胆壮心坚也。嗣据永福函称：四月初二、初三、初五等日连攻河内敌垒，彼族深匿不出，不过偶一交绥，无计决斗。涨发船利，彼族必大鸱张，永福拟招胡昆山散勇数百名以为之助。昆山广东人，其勇皆客民，曾募守南定者也，熟悉南定、海防路径。永福欲以昆山及所部员弁黄守忠下袭南定、海防，则河内敌军势必分救，庶怀德之兵可乘隙而进攻，计亦良是。惜军火不敷，乞崧设法，而胡军粮饷又与黄佐炎龃龉，复浼崧往为劝导。皇皇一身，焉能琐琐为解纷之事。……崧此次到越，人微言轻，无从着手，惟冀永福始终鼓舞，固守山西，进图恢复，则诚可为

北圻干城，不仅作滇中屏蔽。崧今虽去，犹切切戒之也。

唐景崧又因刘永福来函中微露战意不坚的情绪，又去函分析利害，嘱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法。函中说道：

去岁条陈揄扬伟烈，乃欲借域外豪杰扼我边疆，此公义非私情也。至于足下殷勤感激，具见天良，扩而充之为义士、为忠臣，皆本于此，鄙人愈礼之敬之，而所以厚望于足下者实不在此。

来书谓此次专为鄙人而至山西，不然则将违佐炎而潜保胜，闻鄙人将去，既骇且疑。斯言也，揆之公私两义，窃谓不宜。以公而论，虽南官待足下素薄，无一推心置腹之人，然据其地有年，食其禄有年，而足下又眷念越王不置，念其君而抗其臣，是何道理？且山西乃越王之土地也，急难之秋而不为守，何谓恋恋于越王？此以公义责足下所谓不宜者是也。山西乃保胜之门户，足下军粮仰给该省，此处为人所据，保胜岂能久存？世未有门户失而堂室无恙者也。山西不守，谁为给粮？彼以一艘横泊屯鹤，则商船不敢过保胜，税项又从何来？故守山西即守保胜，弃山西即弃保胜，足下即不为国计，而为己计，亦当力扼山西，此以私义劝足下所谓不宜者也。

来书云：保胜不守，则当退入十州。夫十州乃穷荒恶土，禽兽与居之地也。大丈夫当赫赫炎炎，焜耀天下，一隅雌伏，讵不为豪杰羞？且彼族与足下势不两立，既已全噬越南，岂难攻困十州？若曰有险可凭，则寇能往我亦能往，金城千里尚未不足为子孙世守之业，况前无进、后无退之绝壤乎！且中国所以重足下者，以能捍蔽滇疆故也，移居他处即与鼠窃无异，堕前勋而败大名，甚属可惜。以

今日足下而论，不得离山西一步，顾山西即所以维北宁，山、北固则北圻事犹可为，滇、粤赖有屏蔽，万不可以鄙人之去留为去留。如曰感恋私情，则足下果能存越南而捍边疆，其勋最伟。君之勋即我之勋也，君之名即我之名也，则所以报我者甚厚。将来到滇即投闲置散而去，而关外英雄曾为我杀敌致果，亦甚足以自豪，何必几席相亲而后快哉！鄙人此行已属非分，幸圣恩高厚，未奉严旨切责小臣。设为君勉强羁留，爱我恐适以误我。本拟赴军中面为劝导，诚虑交锋之际，或涉嫌疑。惟冀足下曲体苦衷，熟筹利害，勿因小忿而坏大事，勿忘末路而冀苟安。河内、南定非足下不能以恢复，所期于足下者甚大，若并山西弃而不守，则不独负万里来寻之意，且极为我粤人无用之羞，千万谆嘱，诸希自爱。

至招胡军下袭南定、海防，其策甚是，具征将略。军火已商之黄统领，迟日当有回音。前代北宁张总督乞统领备文来买噏枪，到时方可向张督拨用，已豫向张督言之。胡军粮饷一节，望自向贵统督善为酌夺，鄙人皇皇一身，焉能琐琐为解纷事，且亦未便有喧宾夺主之嫌。如实为难，则到龙州尚可致书贵统督也。总之，南官固不待足下以诚，而足下亦自有不是之处，事当自反，乃可平心。嗣后惟望凡百容忍，念一身、念子孙、念中国、念越南，诸念并为一念，无外杀敌而已。杀敌乃有进路，不杀敌并无退路，毋哓哓争闲气，自损英锐，凛之思之，倚装不尽所言。[1]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921～925 页。

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于光绪九年四月二十三日（5月29日），在广西巡抚倪文蔚的奏折后附片，向清政府报告唐景崧说刘永福的大概情况：

臣查刘永福原籍广西，流而为匪。自经越南招抚，积功擢至三宣副提督。其统领黄佐炎不善驾驭，转事苛求，刘永福积不相能，常存退志，故不敢擅离保胜，恐为人害。迨唐景崧亲见其人，知其可用，为之开诚劝勉，直以大义责之，谓越南臣服我朝，近居粤徼，能为该国出力，即与内地出力无异；如其思归故乡，未尝不可偿诸异日。刘永福因而感悟，誓不与敌俱生，于是发愤自雄，累战皆捷。非唐景崧之力不至此！①

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考知《请缨日记》有关记载有许多讹误：

首先，《请缨日记》遗漏了刘唐二人讨论进兵怀德的内容，而这些恰巧是唐景崧的报告中反复强调的东西："于是刘永福恍然奋发，愿效驰驱，计非力战不足以解危，现已饬其全军进逼河内之怀德府。属以黑旗当养威重，勿浪攻坚，多方挑战，以诱其来，步步稳入，可望克复河内。河内复，则越南之气苏，成败利钝在此一军。"② "又商诸永福，及今红江未涨，速进兵河内之怀德府，多方挑战，诱之入陆，而后奋然决斗，倘邀一胜，则彼族不敢直前，此即以战为守之计。且查怀德府距河仅十余里，屯陆兼可防河，即所以护山西省。又嘱其步步稳扎，切勿因愤攻坚，损威挫锐，幸其一切听从，即将该团进屯

① 《中法战争》(2)，第79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876页。

河内之怀德府。”“永福欲以昆山及所部员弁黄守忠下袭南定、海防，则河内敌军势必分救，庶怀德之兵可乘隙而进攻，计亦良是。惜军火不敷，乞崧设法，而胡军粮饷又与黄佐炎龃龉，复浼崧往为劝导。”这些筹划为黑旗军力歼李维业创造了条件。少了这些内容，就不能全面反映两人会晤的真实情形。

其次，对所谓下策的描述也不相同。在唐景崧的书面报告中，提到“永福又自以保胜为固巢，十州为退步”。为此，唐景崧多次开导他：“怵以山西不守，则保胜之门户撤，而粮饷无源，十州僻在一隅，势将坐毙。”“来书云，保胜不守，则当退入十州。”却只字未提及“败则退入滇境”。但《请缨日记》不但极力渲染此事，并就此大发议论，其实已将“败退十州”篡改为“败则退滇”了。

再次，唐景崧说刘永福“保越抗法”，是以“固守山西”为名的，“窃见山西关系滇粤甚重”。他鼓动刘永福进军怀德，为的也是保护山西，并从公私两义上反复强调：“山西乃保胜之门户，足下军粮仰给该省，此处为人所据，保胜岂能久存？世未有门户失而堂室无恙者也。山西不守，谁为给粮？彼以一艘横泊屯鹤，则商船不敢过保胜，税项又从何来？故守山西即守保胜，弃山西即弃保胜……以今日足下而论，不得离山西一步，顾山西即所以维北宁，山、北固则北圻事犹可为，滇、粤赖有屏蔽。”可是在《请缨日记》中谈及所谓的中策时，却不提守山西，这也与事实不符。

对于劝说刘永福代越为王的所谓上策，虽然《请缨日记》的记载言之确凿，但我仍怀疑它是否真实，因为无论从主观或客观方面来看，都不存在促使唐景崧提出这样主张的基础。

从客观方面来看，一、当时清政府的决策是助越抗法，保

藩固圉，却无意乘危攘夺越南国土的意思。后来，光绪十年时，中法因“观音桥事件”重新起衅。六月二十日（8月10日），彭玉麟、张之洞等联衔上奏，请求清政府“明旨封刘永福为越王，令复越”[①]。二十三日（8月13日），清政府有谕断然驳回此请：“刘永福可用，彭玉麟等请封为王，断不可行。朝廷百计助越，原为图存阮祀，今忽册封他姓，殊非字小之义。”[②] 广西边军统将黄桂兰等是一些谨小慎微的庸才，不会轶出清政府的上述范围；二、李维业虽然出兵侵占河内、南定等北圻重镇，并波及海阳等省，但仍停留在少数军人的自发行动上，法国政府决定全面侵占越南的严重局势尚未形成；三、统治越南三十余年的嗣德王还在位，他在臣民中有着一定的威信，越南政府在北圻还有数量众多的军队，黑旗军并不愿与之为敌；四、刘永福本人既没有代越为王的主观要求，也没有建立一个政权所必须的人力、军队和物力、财力等条件。总理衙门曾转奏唐景崧光绪九年元月的《详度边情条陈办法折》称：“刘永福念切还乡，所谓沐猴而冠，终不能任大事；而其左右谅亦无大略宏才，为之恢张奇绩，非有人倡导之不可。”[③] 这些因素都使唐景崧没有提出要刘永福“代越为王”建议的客观条件。

从主观方面看，一、唐景崧上书请缨入越，打的就是“筹护藩邦，绥藩固圉”的旗号，他这时仍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潦倒小官吏，大概还未有胆量假传圣旨，将“绥藩固圉”的国策擅自改为“代越为王”策。二、因为先前有过李扬才欲代越为王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135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144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第35页。

而遭追剿的例子，因而“代越为王”被刘永福看成是“僭逆”的事情，唐景崧初次会晤刘永福，交浅言深，还不至于冒冒失失地劝说刘永福做僭逆的事情。三、最重要的，是在唐景崧事后所作的报告中，并无劝说刘永福“代越为王”一事的记载，相反，倒是可以见到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刘永福忠于越南政府。如他致书刘永福称：“虽南官待足下素薄，无一推心置腹之人，然据其地有年，食其禄有年，而足下又眷念越王不置，念其君而抗其臣，是何道理？且山西乃越王之土地也，危难之秋而不为守，何谓恋恋于越王？足下果能存越南而捍边疆，其勋最伟。鄙后惟望凡百容忍，念一身、念子孙、念中国、念越南，诸念并为一念，无外杀敌而已。”徐延旭奏称：“追唐景崧亲见其人，知其可用，为之开诚劝勉，直以大义责之，谓越南臣服我朝，近居粤徼，能为该国出力，即与内地出力无异。”很难想象，唐景崧会一面大义凛然地劝说刘永福为越南出力，一面又居心叵测地怂恿他乘危“代越为王”，这样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能够说服和感动人吗？因此，我认为，唐景崧三月间劝说刘永福“代越为王”一事是不可能的。《请缨日记》所以误记此事，很有可能是将八月间唐景崧劝刘永福“代越为王”一事的部分内容前移了。

总之，关于刘永福与唐景崧初次会晤情况，《请缨日记》上的记载有误记改窜之处，并不完全可信，须要考证其真伪。

唐景崧的入越说刘，在刘永福人生道路的转折关头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 在思想上坚定了刘永福的抗法决心。光绪八年四月，杀敌心切的刘永福率黑旗军前赴山西，准备进攻占据河内的李维业，但为主和妥协的越南政府阻止，以至法舰从山西经过而

不能击，继则被迫从山西撤回保胜，最终被劝说退出保胜，迁移别处。这一切使得刘永福雄心顿失，斗志全无，眼看法军猖獗，却毫无作为，不要说杀敌立功，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固守保胜，如这点都做不到，就准备退往十州，最后是遁入云南，一副被动挨打、无可奈何的样子。现在，唐景崧以天朝使者的身份，鼓励他不顾越南政府的限制，大胆出击法军，并强调击法为有功，无论成败进退，都会得到中越两国军民的拥护和支持。否则，蜗守保胜，放任法人并吞全越，即为有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刘永福和黑旗军最终会落得个无地立足、无处安身的下场。经过这样一点拨，刘永福解除了思想负担，放下包袱，重新鼓起了抗法的信心和决心。

2. 帮助刘永福提高对抗法事业意义的认识。刘永福自1867年入越，到1883年与唐景崧会晤，相隔已有17年。期间，虽然他不忘故国，并多次要求滇、桂地方官员准许归国，而且一直保持中国的服装发型（即剃发留辫），但因始终未能回国，加之又接受越南官职，久而久之，也就把越南当做自己的家乡，休戚与共。他的抗法，主要是因为法国并吞越南将危及他和黑旗军的生存，抗法是为了存越，而无暇顾及其他。唐景崧的说辞，却使他认识到，黑旗军的抗法，不仅是为了存越，也是为了保卫中国，所谓"保残越固华边"、"欲借域外豪杰扼我边疆"、"存越南而捍边疆"。唐景崧并提醒他："念一身、念子孙、念中国、念越南，诸念并为一念，无外杀敌而已。"从而帮助刘永福了解自己身负中越两国安危的重任，更坚定了他抗法的意志，成为他在越南政府已投降法国，越南官兵已停止抵抗之后，也能坚持抗法斗争的重要原因。

3. 黑旗军与清军联合作战的联络员。在唐景崧入越之前，

刘永福虽然已和清政府及一些清军将领建立了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经常的固定的，而是偶然的松散的。刘永福虽然渴望得到清政府和清军的帮助，但由于清政府的决策未定，因此，清政府和清朝官吏都不能与刘永福建立紧密的联系。清朝官吏根据个人的水平和好恶的不同，或者如唐炯、唐景崧那样力主给刘永福以实质性的援助；或如岑毓英、刘长佑、黄桂兰等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不著形迹。更多的人如张树声、倪文蔚等则仅是口头说说而已。这些官员虽然也不时派人前往保胜与刘永福接触，但这些人都是一些见识不高的低级人员，除了传达上司的意图外，对刘永福的帮助并不大。刘永福虽然常有禀函向有关方面请示机宜，但有时得到答复，有时没有答复，这种情况更增加刘永福的疑惑和彷徨。

唐景崧入越后，情况就有了变化，虽然他官职不高，并无实权，但他的入越说刘，是得到内而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宝鋆、李鸿藻，外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曾国荃等有力人物的支持；他可以上折奏事，多次不理会命他迅即前往云南的谕旨，清政府也不怪罪他，倒是岑毓英拒绝他入滇却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因此，唐景崧虽然没有明发朝命，却俨然钦使身份，以至滇、粤、桂三省官吏都得看他面子，越南君臣亦曾咨呈广东代奏留边，影响还是很大的。

会晤刘永福后，清政府就允许唐景崧留在广西边军营中，特别是这年五月间倪文蔚和徐延旭先后奏请将其留营以资臂助后，唐景崧遂风尘仆仆，来往黑旗军和清军之间，信函使节频频传递双方信息，督促落实黑旗军的粮饷器械援助，并多次为刘永福作讨法寇檄文和战书，振军威，鼓士气，使黑旗军和清军的联系渐渐正常，有利于两军的联合作战。

唐景崧的入越说刘，提高了刘永福对抗法事业意义的认识，坚定了他抗法杀敌的信心和决心，并为黑旗军争取到滇、桂两省的饷银军火的实际支持，从而一扫刘永福的萎靡颓唐、无所作为的情绪，为黑旗军以后取得力歼李维业、两败波滑的胜利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唐景崧挽救了刘永福的抗法事业。无怪乎在力歼李维业后，刘永福马上写信向唐景崧报捷，并归功于唐景崧说："此役之胜，皆得公之在山西时指示筹划而行，是以得胜耳！"①

二 黑旗军力歼李维业

刘永福与唐景崧会晤后，大受鼓舞，解除了思想负担，坚定了抗法意志。三月十九日（4 月 25 日），他在山西祭旗出征，然后率领黑旗军进驻离河内十里的怀德府。

从四月初一日（5 月 7 日）起，连续三天，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各营进攻河内，但由于没有攻城利器如西洋大炮之类，所以都没有什么战果。而在这时，法国政府已决定向越南增派 2000 士兵，并批准法军攻占山西和北宁，交趾支那总督沁冲指示李维业固守待援，不要轻易出兵。李维业也比较谨慎，认为仅凭部下的四五百法兵，只宜坚守，不宜出击，因而决心固守待援。

刘永福知道黑旗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坚，因此早就和唐景崧商议："当养威重，勿浪攻坚，多方挑战，以诱其来。"必须将法军诱出野外，才能加以歼灭。为此，他想出计策，从两方面去激怒法军，诱其出击。

---

① 《中法战争》(1)，第 269 页。

一是向法军发出挑战书，于四月初三日（5月9日）派人贴在河内城的东南门上，全文如下：

雄威大将军兼署三宣提督刘，为悬示决战事。照尔法匪，素称巨寇，为国所耻。每到人国，假称传道，实则蛊惑村愚，淫欲纵横；借名通商，实则阴谋土地。行则譬如禽兽，心则竟似虎狼。自抵越南，陷城戕官，罪难了发，占关夺税，恶不胜诛。以致民不聊生，国几穷窘，神民共怒，天地难容。本将军奉命讨贼，三军云集，枪炮如林，直讨尔鬼巢，扫清丑类。第国家之大事，不忍以河内而作战场，唯恐波及于商民，为此先行悬示。尔法匪既称本领，率乌合之众，与我虎旅之师在怀德府属旷野之地以作战场，两军相对，以决雌雄。倘尔畏惧不来，即宜自斩尔等统辖之首递来献纳，退还各处城池，本将军好生之德，留尔蚊虫。倘若迟疑不决，一旦兵临城下，寸草不留，祸福尤关，死生在即，尔等熟思之。切切特示。①

二是频频出兵夜袭河内城外的教堂。早在法国传教士入越不久，即于嗣德三年在河内城外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居住教士教徒多人。李维业占据河内后，在教堂旁边修筑一座碉堡，驻兵一排看守。四月初一、初二、初三等日，黑旗军攻打河内时，都曾被这两座建筑物的看守者首先发现，报告河内法军预作防备，因此，黑旗军要攻取河内，首先就要拔掉这两颗钉子。四月初九日夜，刘永福派兵偷袭这座教堂。对于这次战斗的经过，刘永福曾向黄桂兰报告：

敬禀者，窃职员连夜派勇往河内暗攻法匪老巢，由城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870页。

外街坊经过，皆被法匪教堂知觉，即先通报法匪严行防守，难以进攻。是以必先破其教堂，免其关报，方易以进剿。于本月初九夜，职员饬前营督带黄守忠挑选劲勇二百名，左营管带吴凤典率勇一百名，右营管带杨著恩率勇一百名，黄夜前往攻袭。不料该教堂自嗣德三年以来围筑三层竹栅，甚属坚固，自知我军进剿，聚集教匪数百名，并于教堂附近新筑鬼楼一座，有法匪三十余名轮更看守，愈为严密。我军进扑，该匪施炮拒敌，各勇攻击，破其栅门，该匪即退回二层，仍复拒射。我军奋力攻击，奈路甚狭窄，一连数次枪炮交施，该匪被我军射死十余名，抵敌不住，败入教堂，当堂斩获教头三名，教匪多名。随即攻其附近鬼楼，缘各勇未带有竹梯及大铁斧，惟以大刀劈其楼门。攻击良久，该法匪死守在楼，将四面枪炮绕射，弹下如雨，欲以薪草焚其门，一时急切不能取得。各勇间有受伤，退出教堂，毁其耶稣妖像，即放火焚其教堂并栅内教匪房屋。收队回营，查点各营兵勇，被炮重伤三名，轻伤十四名，现在医治。①

教堂虽然没有攻下，但刘永福的诱敌之计却奏效了。

自从进军北圻以来，李维业仅率数百法军，却将数以千计的越南官军视为木人土偶，到处征伐，战必胜，攻必克，如人无人之境。河内、南定这样的大省重镇，都被他不费多大力气即已轻易攻取。这一连串的意外胜利，使这个军事素养本来就不很高的李维业逐渐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情绪，很快就抛弃了那种小心谨慎的作法，认为"黑旗一军，不过中国刘某一人，号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919~920页。

召无赖之徒，乌合之众，不值李某一击，前胜安邺，乃偶然事耳，何足为虑耶"![1] 他并把刘永福的挑战书看做是"中国式的吹牛"，怀疑是否可以在怀德的约战中找到他。李维业不相信关于黑旗军骁勇善战的情报，认为"他们实际上的炮兵只有黄佐炎驸马借给他们的不良的平滑小炮，并且错误地认为他们快枪少，子弹又不多"。他很恼火黑旗军的夜袭教堂，因为这使法兵丧失了体面[2]。因此，李维业决定不再等候已向交趾支那总督请求增援的1000士兵到达，即接受刘永福的挑战，立即对怀德府采取军事行动。

四月十三日（5月19日），李维业率领河内法兵向怀德出击，在纸桥一带与黑旗军展开激战。关于这次战斗，《历史草》曾有详尽细致的描写：

> 法国即起大兵五千人马出仗来攻，挂帅大将七画李威吕（即李维业）。刘永福侦悉，号令三千人马分为队，左翼吴凤典一队，右翼杨智仁一队，两队照应攻打，前敌先锋黄守忠、邓士昌各一队，互相协助，刘永福督率儿子刘成良带亲兵队，居中指挥。两军交锋，杨智仁、吴凤典身先士卒，奋勇向前，极力攻击，互有伤毙。少时，左右翼两队直趋向前，混战一阵。法兵伤亡数百，吴凤典受伤，杨智仁死于乱阵之中。刘永福得悉，喝令亲兵队刘成良极力奋勇，直前猛攻，势如波涌涛翻，一齐奋臂大呼，枪弹击射，甚似飓风暴雨，又毙法兵数百，法兵即退一步。法将大怒，督饬排齐队伍，势如排山倒海拥来。刘永福遥见

---

① 《中法战争》(1)，第267页。

② 《中法战争》(3)，第341～342页。

其预备，登即嘱令各军如此如此，分为两帮，互相传说预备。及法兵枪声齐响，声如天崩，黑旗军前帮队伍一齐仆下。七八法兵以为黑旗军兵士尽皆仆毙，即率大队飞赶而来，待取首级，方将近前，仆地军士一齐卧而响枪，又击毙法兵数百。时法兵已近身边，各即翻起，概用刀斩数百人，法兵大败，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刘永福下令追赶，尚有一二千残兵，拼死逃走，因天气酷热，口渴到极，即在清水沟皆吸冷水满腹，又惊慌飞走，汗如雨下，赶得到河内城门，刘永福始鸣金收军，而法兵所吸冷水的，回去死了七八。统计是役，晨九点打到下午一点，黑旗军大获全胜，击毙法兵二千余人，斩首千余级，法元帅李威吕、副元帅五画某，及四、三、二、一等画数十人，皆斩首级，夺获军械无算。计法国是役全军尽没，刘永福获胜收队后，部下各营各解法兵首级缴交，共有千余。①

《历史草》的这段记载也有讹误失实之处，如出击及伤亡的法军人数并没有那么多，李维业等人的职衔没有那么高等等。

据法方参战人员的回忆，《李维业远征记》、《请缨日记》等资料所载，这次战斗经过如下：四月十三日，在法军出发前，黑旗军已从谍报中得到此事。当时，右营管带杨著恩闻知法军将于平明倾城出战，他杀敌心切，一反黑旗军的作战惯例，要求让向来当先锋的前营黄守忠部靠后出发，而让一般都在侧翼作战的右营充当前敌先锋。刘永福看到他情绪激动，曾告诫他："战洋人不可急，急则损！"杨著恩答道："见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虽死愿任先锋！"归队后，他等不及做饭进

① 《中法战争》(1)，第267～268页。

餐，即率全营出发，在纸桥附近设伏待敌。刘永福也命吴凤典率左营埋伏在路左为奇兵，黄守忠率前营扼守大路迎敌为正兵，自率亲兵等营随后接应。

杨著恩率右营300余人刚在纸桥设伏完毕，李维业亦率海军陆战队两个连及炮兵、勤杂人员等400余人赶到对岸。法军先用炮火对黑旗军的阵地作火力侦察，富有作战经验的黑旗军将士静伏不动，法军又用望远镜细细观察后，认为确实没有敌情，才放心前进。由副司令韦医带领骑兵过桥，刚刚走到桥中，黑旗军伏兵枪炮各施，韦医和几名骑兵应声落马，法军队伍混乱起来。李维业见势不妙，赶紧从后面到前面指挥反击，



1883年8月，在河内附近的纸桥之战中，法军司令李维业（左侧操炮者）被黑旗军击毙。

激战开始了。由于法军装备优良，火 力猛烈，多持土枪土炮、仅有少量洋枪的杨著恩部抵敌不住，只得向后退却。激战中，杨著恩先是双股中弹倒下，但仍坐在地上继续指挥作战，开枪射击敌兵。后来他的右腕又中弹骨折，不能开枪，但他咬紧牙关，改用左手开枪杀敌，直至被一颗子弹击中胸部，壮烈牺牲为止。

李维业在击溃杨著恩部后，以为黑旗军也和被他打败的许多越南军队一样，在第一次抵抗被击破后，就会溃不成军，法军只要大胆向前推进，就可以大获全胜，于是，他得意洋洋地指挥军队，大摇大摆地向前推进。这时，黑旗军各部亦赶到设伏地点，进入阵地，等到法军走近到百米左右，及时射出密集的枪弹，法军猝不及防，马上呈现一片混乱。

李维业立即站到法军的前列，企图平息自己士兵的慌乱情绪，但是，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肩头，李维业倒下去了，法军上尉连长雅关企图以自己的身子蔽护李维业，也被击毙了。刘永福趁机指挥各部冲锋过来，先前后撤的右营溃兵也回头反击，双方纷搅一起，混战一场，黑旗军将士短刃交下，法军枪不及施，只得狼狈退却。刘永福因杨著恩战死，吴凤典受伤，便没有指挥黑旗军过桥穷追，而整队凯还。事后，法军清点伤亡，计毙命 32 人，受伤 52 人，总计伤亡 84 人。

横行一时的李维业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混战中受伤倒地，被黑旗军取首级而亡。李健儿所撰《刘永福传》记某军卒话道："吾亲见杨快狗大哥（杨著恩绰号）枪杀李威吕。李跨马窥吾阵，见快狗大哥往来指挥，指上御钻石戒指，知为我军将领，即发枪击快狗大哥中胸。讵快狗大哥卧地垂死时，尚能忍痛，俟李骑近时，发枪击之，李中额而颠。敌人失

去主帅，故此大败。此次大胜，自以快狗大哥之功最大。"[①]另一种说法则谓李维业受伤后，被溃兵遗弃，成了黑旗军的俘虏。黑旗军将他捉回怀德斩首示众，法军曾遣越官往说黄佐炎，愿以3万金赎回李维业的首级，遭到刘永福的拒绝。刘永福将李维业的首级到处示众后，装进一个漆盒里，埋在大路上，使过路人践踏，以示轻蔑与侮辱。后来，黑旗军撤离怀德，法军才去找回这个首级。

第二天，刘永福将力歼李维业的经过禀报黄桂兰：

敬禀者，窃职员于本月初八探得法匪添来匪党二百名，十二日添来红毛党二百余名，火船四艘，该匪党羽既多，势甚猖獗。十三日寅刻接探报，法匪率党八百余人来怀德府与我军决战。职员即令右营管带监生杨著恩率右营练勇至纸桥之右列阵，前军叶成林率勇接应；左营管带守备衔吴凤典率左营练勇至纸桥之左列阵，前营督带都司衔黄守忠率前营练勇在怀德府前村列阵。职员督同同知衔韩再文，文童刘肇棠，同知衔刘成良，监生梁茂芳，蓝翎补用都司刘光明，云南补用盐大使韩再勋，蓝翎拔补千总刘安南，武生刘绥汉，拔补把总张慎泰，贡生李唐、陈鸿光，管带亲兵刘文谦、刘启元，率亲兵在怀德府城外列阵。

不料右营进抵桥头，该匪分两路而来，势甚汹涌，我军迎击，枪炮交施，弹下如雨。右营佯退回上安决村，该匪直扑至村外，黄守忠率前营练勇接战，吴凤典率左营练勇兜其后，职员同各员弁率勇直当其前，鏖战三辰之久。

---

① 李健儿：《刘永福传》，第141页。

前营哨长邓遇霖、谢炳安率勇将该匪截为两段，右营哨长张维桢、黄青云冲出其右，我军奋勇合击，勇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该匪抵敌不住，溃败而走，我军大获全胜，直追过纸桥。当阵斩获五圈匪首一名，三圈一名，一圈三名，匪党二十三名，教匪一名；炮毙四圈匪首一名，三圈一名，匪党八十余名，伤数甚多。夺获快枪二十一枝，马一匹，射毙四圈匪首所骑之马一匹，该匪败窜稍远，追之不及，收队回营。查点各营弁勇，右营管带杨著恩，右营哨长何承文，左营哨长陆天球俱阵亡，左营管带吴凤典被炮重伤，计阵亡勇丁四十七名，受伤五十五名，现在医调。[①]

四月十九日（5月25日），刘永福专足递书唐景崧报告此役战况，则毙伤敌数又略有所增："阵斩创谋吞越之五画李威利，斩四画至一画兵头三十余人，斩法兵二百余人，伤者无算。"[②] 四月二十三日（29日），刘永福又向出驻谅山的徐延旭禀报："十三日，法兵出城接仗，复阵斩其五画官、四画官各一员，三画官、一画官各三员，又炮毙其四画官一员、三画官、二画官各二员，法兵死伤各百余人。"[③]

与法国、越南资料关于这次战役法军伤亡数目的相比较，应以刘永福四月十四日（20日）报告的数字较为准确，后两个报告则尤其夸大。究其原因，大概黑旗军此仗虽获全胜，但伤亡却比法军略多，黑旗军亡50、伤56，法军仅亡32、伤52。四月十四日，刘永福新胜之时，不及考虑其余，故能据实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920～921页。
② 《中法战争》(2)，第77页。
③ 《中法战争》(5)，第171页。

直书。四月十九日后可能醒悟自己的伤亡较法军尤重，才略略夸大法军的伤亡数字。但都不如《历史草》的夸大过甚，将李维业的五画夸大为七画，法军伤亡不足 100 人夸大为 3000 余，斩首达一千余，缴获枪支仅区区 21 支，夸大为“无算”。

黑旗军为什么能够力歼李维业，取得此战的胜利呢？

从黑旗军方面来看，胜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刘永福的指挥得当，设计诱敌出城，在野外设伏聚歼之。以及黑旗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如杨著恩的请当前敌，受伤不撤；黄守忠的不畏强敌，死战不退，一反越南官军一触即溃的作风；黑旗军就是这样以其英勇顽强的精神战胜强敌。当然，人数较多也是一个原因。

从法军方面来看，失败的原因主要应该归咎于李维业的骄傲轻敌，指挥失当。事后，担任东京总司令的波滑根据参战法军各部的报告，从单纯军事技术的角度，分析了李维业指挥部署疏忽的地方：

1. 从对 5 月 19 日行军部署的研究可以看出，没有执行步兵各单位按规定可以独立作战的原则，反而将步兵连队与海军陆战队混在一起，从而完全妨碍了部队长官的协调一致、一切有效的领导。

2. 从战斗的本身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完全忽略了先头部队的作用。先头部队可以发现突然袭击，如果别无办法，它可以部分承受袭击的后果。虽然先头部队因一场精心策划的袭击而受到损失，却可以使部队主力免遭暂时的失败。当把大部队投入战斗时，先头部队就处在这种暴露的位置，然而，尽管韦医营长提出这个意见，人们还是把整个这支大部队变成了先头部队。另一方面，人们忘记，一个纵队的展开，不应该一定要

在尖兵的位置上进行，在正常的情况下，当先头部队与敌人遭遇，并且占据有利位置时，部队主力一般都在其附近集结。但是，当先头部队不管愿意与否，所占据的位置很不利时，一个指挥官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其附近集结，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在后面选择一个阵地进行布阵，然后将先头部队召回到那里。

3. 关于炮兵，要指出的是，没按现行规定的原则来使用这支部队，它对进攻或者撤退，都没有以炮火作准备进行突破，加以支援。相反，它起的是跟土著步兵一样的作用，结果把纵队所有剩下的人都吸引到它这边，因为部队相继都来把大炮拉出来，所以这天里两支部队的作用完全颠倒了。我要补充指出的是，在一个只能在堤坝上行走的地方，人们不应将炮车拉到火线上。

4.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阵地上没有布置后备部队，以防备可能的后撤，保护作战部队的运动。

1883 年 9 月 12 日，法国海军部长在致外交部长的函中，引用 6 月 7 日的中国报纸摘要，委婉地批评了李维业："李维业司令是非常勇敢的，但不太懂军事，也不够聪明。战斗的前一天晚上，当他和他的军官们做第二天的部署时，两个中国仆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知道了他们的行动计划，于是告诉了黑旗军，黑旗军便在法国军队的通道设下了埋伏。"①

从上述的这些分析来看，也许是由于本身的指挥能力太低，或许是过分的骄傲轻敌，李维业完全忽略了起码的军事指挥规则，无怪乎会招致兵败身死的悲惨结果。

我们认为，决定法军战败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李维

---

① 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0。

业、韦医、雅关等各级指挥官的过早被击毙。事实证明，虽然刘永福指挥得当，黑旗军将士英勇善战以及人数超过法军七倍，因而占有一定的优势；而法军由于李维业指挥失当，人数较少，因而从一开始就居于劣势。但是，由于法军的武器装备远较黑旗军精良，军事素质也较高，因此，在经历最初的打击后，只要指挥官能略加指挥，法军会很快镇定下来，重新组织反攻。如作战一开始，韦医即被打死，但李维业稍加整顿，法军很快就向黑旗军反扑，给黑旗军以沉重的打击：作为前敌先锋的黑旗右营300人组成的三道防线被冲破，主将杨著恩战死；接续而来的黄守忠前营1000余人组成的三道防线也被冲破两道，伤亡惨重。以至后来刘永福不能乘胜追歼残敌，原因都在于此。只是由于李维业等各级指挥官相继毙命，法军失去指挥，不能形成一致的军事行动，才最后溃败。

在攻取河内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只率领数百法军的李维业俨然成了北圻的太上皇，他气焰嚣张，行动霸道，忽战忽和，随心所欲，攻城掠财，肆无忌惮，玩弄越南群臣于股掌之上，毫无信义可言。越南政府和文武官员言战言抚，议论纷纷，实际上是一筹莫展，毫无办法。但在纸桥一战，敌酋授首，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法国殖民当局的气焰，延缓了北圻的沦亡，大长了抗法军民的志气，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喜事，捷报传布，人人惊喜若狂。唐景崧身历其事，曾写道："一时谅营大小将弁、华裔、越庶以及巡抚、布、按文武各官，齐来致贺。"兴奋之余，唐景崧于四月十六日（22日），动笔为刘永福起草了一封大义凛然、浩气干云的告四海檄文：

越南三宣副提督刘永福为檄告四海事：溯越南自秦汉以降，俱隶中华，至宋始沦为外域，前明犹改行省。逮大

清朝，虽越主迭经易姓，而皆递列藩封，纳贡有期，载在盟府，四五尺之童谁不知越南为大清属国者！法兰西独不闻乎！既与中国和好，即不应欺其所属，用兵于越南，无异用兵于中国也。兵端开自法人，如中国大皇帝赫然震怒，声罪致讨，法兰西何说之辞？即不然，而遣师救护藩服，亦不得援两国相争他国不得接济之公法相比。

前者攘据西贡，遂使越南贫弱至今。同治十二年，突攻北圻，议和通商，迄今十年，未尝稍得罪于法人也。去岁无故堕其河城，总督殉难，兵船盘踞下游。法使宝海忽在天津，有通商分界之议。夫欲通商云南，则通之已矣；欲往保胜，则往之而已矣。至越南土地，岂法人所得而分之？且久居大皇帝覆载之中，频年出师剿除土匪，未见法兰西有一矢之助，何所赖其保护？据人之城，戕人之官，掳人之仓库，犹靦然自称保护，岂不可羞！及至天津已约会议，请中国退师，而宝海忽尔西旋，增兵倏已南至。弃礼蔑信，一至于此！不独虐越南，实欺中国也。请质之海外诸大邦，谁曲谁直，谁启兵端，恐亦无辞为法兰西解也。

本年二月十九日，击破我南定。三月，阻粮于富春，攻北宁之新河，窃山西之丹凤，志在鲸吞，横暴已极。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提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于是恭奉越南国命，督率全军，逼攻河内，慷慨誓师。四月初九夕，焚毁河内教堂。十三日身率劲兵，与法人血战三时之久，炮声雷动，人肉星飞，我军奋勇直前，无不一以当十，当经斩获该兵头五画一名、三画一名、一画三名，法兵死伤无算，夺获火枪马匹甚多。彼兵溃遁，追至河内城西，闭关不出。呜呼！法

人所为，神人共愤，今受兹大创，天道昭然。如其悔过退师，仍申旧好，则永福为民惜命，抑又何求？倘犹怙过不悛，负固罔服，则永福誓不两立，定当力翦仇雠。设更向我中国妄肆纠缠，则将延礼英才，纠集忠义，一檄之下，万众遝来，列举义旗，往夺西贡。夫天下之积忿久矣，杀机隐伏，如火待燃，有倡者必有和之，众愤激发，非条教所能禁，岂独不利于法兰西乎？恐海邦之在中国者，亦因越法交锋而受累，幸勿束手旁观，致蹈城火殃鱼之祸，何不发一言而辩曲直以解纷也？

至于我越教民，食毛践土，受国深恩，乃甘为仇人役使，昔与法和，姑容尔辈。今与法战，则从教者即逆党也，痛杀无赦！如能改过自新，输我以敌情，结我以内应，则赏赍仍有加焉。再如西贡旧民，岂不怀思故国？乃愿为彼前导，丧尽天良！阵前倒戈，即贷一死。若其堂堂衣冠之族，矫矫草莽之雄，亦甘托足其中，隐谋诡计，窃已耳闻姓名而口不忍言。所望今日为汉奸，明日为义士，永福犹尚礼之而敬之也。

永福僻处一隅，志虑短少，伏乞大贤硕彦，奇材异能，济其力之未充，匡其术之不逮，谨愿匍匐而受命焉。越南幸甚！天下幸甚！特此檄告四海知之。[①]

将这篇檄文与四月初三日的挑战书细加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差别很大。挑战书纯系站在越南的角度上说话，檄文则是站在中越两国的立场上说话，并提出请各国评论是非曲直，号召越南教民和西贡旧民共同抗法的设想，都是刘永福从前很少涉

① 《中法战争》(1)，第 304～305 页。

及的，而与唐景崧的历来主张相近。因此，这篇檄文虽然以刘永福的名义发布，但主要反映的是唐景崧的思想，刘永福认可这篇檄文，说明他在唐景崧的影响下，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从中越两国的立场上考虑抗法问题了。

刘永福力歼李维业，在中法越三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当刘永福和唐景崧起草檄文时，他们可能希望看到十年前的那幕重演：李维业像安邺那样授首后，法国侵略北圻的势头又被遏止住了，法军龟缩在有限的几个据点里，接着，又是长达数年乃至十年的和平对峙时期，从而为越南人民争得一段喘息的时间。但是，形势的发展，使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1883 年的法国政府已不复是十年前的那种虚弱无力的状态了。早在李维业被歼之前，因驳回《李宝协议》的缘故，法国政府已一反前任的容忍退让做法，决定增拨侵略北圻的经费和添派远征军。当这些提案被提交议会讨论时，传来了李维业被歼的消息，法人毕乐记录了法国政府当时的反应：

> 这位勇敢富有同情感的军官的悲剧的结局产生了一个哀痛的反响，在议会里，在全国里，只有一个声音，即应该为这个光荣的牺牲者报仇，应该使国旗所受的损害获得补偿。法案被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同时政府宣布，已采取了步骤，以保证法案的执行，并追求一个光辉的补偿。
>
> 为运送远征军团而预备了的运输船马上就要出发，交趾支那政府在等候这些远征军团的到达的时候，接到了命令：指挥一切可抽调的军队到战场去，交趾支那军司令波滑将军受命为东京的高级指挥官。[①]

---

① 《中法战争》(3)，第 322 页。

法国侵略者活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为了一劳永逸彻底地消除他们并吞全越南的最后障碍——黑旗军，他们准备派出为安邺所率56人和李维业所率200人多达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军队（最多时为2万人）到北圻去。五月十七日（6月21日），茹费理用恶狠狠的口吻对前来交涉的曾纪泽说："今昔情形大不相同，其所以然者，乃因法国统将李维业等遇害，死亡甚多，此事无论中国、西洋皆有雪耻之义。盖统将既死于战，其本国必当报复也。……法必欲扫靖盗贼，平定地方，使百姓安堵而已。"①

1883年5月15日，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指示正在北京取代宝海与中国谈判的脱利古："据宝海的报告，中国政府决心反对我们在东京方面的行动，准备以大量兵力送至东方抵抗我们。这些说法在别方面又没有什么可以证实。我们因此以为宝海的观察可能是由于中国好战倾向所给他的先入成见所造成的。"要求脱利古"准确地调查中国方面的意图和准备"，以作法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参考②。为了迎合茹费理政府轻视中国、好大喜功的狂妄自大心理，6月18日，脱利古作了关于中国在军事上并未作好对法战争准备的报告："所谓准备是十分夸张的，中国求以虚而不实的武装来哄骗我们。"③ 7月5日，他再次报告，极力贬低中国的军事实力说："中国在陆海两方的实力，奇异地为我的前任所夸张了。如果我们在东京作强力的行动，我们必将看到中国的匪帮在我们面前退却。如果我们决定作一种海军的牵制行动，我们将能使天朝遭受最严重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002～1003页。

② 《中法战争》(7)，第156页。

③ 《中法战争》(7)，第161页。

的损害。现在从南方各省召募来的 3 万人，散布在云南边境上，武器不良，大部分没有训练，他们决不能与有一支强大炮队支援的、坚强的六个步兵大队相对抗。”①

茹费理政府对脱利古过甚其辞的乐观报告深信不疑，决定改变前任对华忍让的作法，而采取强硬的政策：即不惜冒对华作战的风险，也要出兵并吞越南北圻。光绪九年五月初四日(6 月 8 日)，脱利古向李鸿章转交了茹费理政府的强硬声明：清政府“若欲稍侵甲戌年约之权利，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② 8 月 19 日，沙梅拉库致函茹费理，建议在法军蓄谋攻占越南国都顺化，逼胁越南政府彻底投降的同时，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的军事讹诈政策：“你看到，除非有一种决定性的军事成功，我们没有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要它转回来的路程实在是太远了，如果没有严重的威胁或武力，中国是不会让步的。”③ 这就意味着中法战争。

对于越南政府而言，它是以一种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对待刘永福取得的第二次纸桥之战胜利的，这从事后它不断地对刘永福及立功将士加官进爵和多方赏赐上表露出来。越南史书记载：

嗣德三十六年（1883 年）四月十三日，山次官军剿法兵于纸桥（河内省罗城坞门外之西），大破之。辰统督黄佐炎调山次兵勇并刘团回怀德府（属河内）连兵屯扎，令刘团出队挑战，法兵不出。适闻报法掌水检点兵炮图往攻，永福乃分团勇先伏。是日早（十三）法掌水韦医率兵

① 《中法战争》(7)，第 169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48 页。
③ 《中法战争》(7)，第 176～177 页。

六百余直抵桥处，伏兵起与之鏖战。右翼杨著恩阵亡，左翼吴凤典被伤，团勇少却。永福与黄守忠冲出，直突炮阵力战，法兵败走，追斩韦医于坞门，（及二三圈各一，法兵毙二十，重伤六十，轻伤多数。）捷闻，帝大喜，赏永福升授提督，赐正二品冠服，加赏忠勇金牌一面；黄守忠（宣慰同知从六）升宣慰使（从四），领领兵官，赏赏功紫金牌一面；吴凤典（防御同知从六）升授宣慰副使，领副领兵官，摘银两参桂给调，加赏格银一千两，又普赏在行练勇钱二千缗。调度得宜之统督黄佐炎（原革留）准复原衔，加赏军功二级。阵亡之杨著恩（从八品百户）追授宣慰副使，加赠副领兵官。余各赠恤有差。[①]

六月，嗣德王崩，王长子瑞国公应祯继位，旋被阮文祥、尊室说等废黜，另立绍治王之第二十六子洪佚为协和王。可能是秉承嗣德王的遗命，协和王即位之始，即有谕："准封提督刘永福为义良男。以永福屡有战功，因晋尤推恩也。"[②] 并"赏长翅冠、圆领广袖蟒袍、牙笏、朝靴等物"。又"赏北次团练韩伯铭等军功级纪凡七人。先是河内纸桥之役，该等均有战功，至是议成，蒙赏有差（韩伯铭、梁茂林从八品百户）"[③]。十月，阮文祥、尊室说等又废黜协和王并杀之，另立嗣德王第三子膺祜为福建王。这时，黑旗军已从山西撤至兴化，法军已占北圻大部，但越南政府仍赠恤在纸桥一役中牺牲的黑旗军将士的遗属，于十二月谕令："给刘团杨著恩等三人妻子钱米（著恩等均前于纸桥阵亡，经蒙赠恤，兹加给其妻子每氏名月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九，第 364～365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七〇，第 9 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七〇，第 31～32 页。

各钱一缗，米一方）。”[①] 相比那些在短期内擢升大官、飞黄腾达的阮文祥等人而言，除刘永福外，越南政府给其他抗法有功的黑旗军将士的官衔及赏赐都还是很低薄的。然而，那时的形势已十分紧张，在法军攻取越南国都顺化前后，越南政府已被迫割断与中国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沦为法国殖民当局的傀儡，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政府仍能顾念到黑旗军将士，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法行动。

清政府的反应又如何呢?

闻知李维业率法军攻破南定的消息，二月十九日（3月27日），翰林院侍讲学士何如璋上奏《越南危急，请派知兵大员出关筹办折》，拟请旨特派知兵大员出关节制粤、桂、滇三省防军。清政府显然考虑了这些意见，在三月初八日和二十五日（5月1日）有旨给沿边沿海各大臣，提出“在我保护属邦，固守边界，均关紧要”[②] 的设想。并派丁忧回籍的李鸿章前往节制督率粤、桂、滇三省军务，因为“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过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③]。摆出一付对法强硬的态度。清政府的这些部署虽不免有些虚张声势，但也反映它不愿坐视法军轻易并吞全越，威胁我西南边疆的思想。

但是，身当其事的李鸿章却接连上奏，对清政府的上述决策提出不同意见。四月初一日，李鸿章上奏《密陈越南边防事宜折》，指出越南今日之祸，源于当年私自与法国订立1874年条约，从而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无形中也就割断与中国长期存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二，第11页。

② 《中法战争》(5)，第143页。

③ 《中法战争》(5)，第145页。

在的传统宗藩关系。因此，中国欲要“保护属邦”，于理于势皆不相宜，主张中国袖手旁观，让越南自取其咎，“甲戌之约，语多悖谬，当日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有听越之自为而已”[①]。五月初四日（6月8日），他又致函总理衙门，重申上述主张：越南是“自取危亡，无从援救”。据此，李鸿章主张中国放弃“保护属邦”政策。对于“固守边界”的决策，李鸿章倒是赞成的，但他认为北圻地理环境复杂，“道路崎岖，水毒风恶，烟瘴终年不解”，加上又有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那里抗法，法军不会那么容易并吞北圻，扰及滇、桂边境。因此，只要继续执行原来的部署，滇、桂两省派出军队入越镇慑即可，“似不必调远省客军，致涉张皇烦费也”。“今惟仍由滇、粤量力添兵进扎，严明约束，固我边防，徐观其变，再作区处。”李鸿章特别强调，根据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财政情况，中国不应该为助越而与法国开战。“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想在高明烛照之中。所冀钧衡在握，勿惑浮议，激成祸端，致误全局，实为至幸。”[②] 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取消其节制督办三省军事的任命，命其即回北洋大臣署任，这意味着清政府从“助越抗法，保护属邦”的立场上后退了。

得知刘永福力歼李维业的捷报后，五月十六日（6月20日），清政府密寄李鸿章等上谕谓：“法、越构兵一事，久未定局。法人近为刘永福所败，必不甘心，其蓄谋报复，自在意中。法使脱利古与李鸿章会晤，以中国是否助越为言，意在挑

① 《中法战争》(5)，第150页。
② 《中法战争》(4)，第45页。

衅，甚为叵测，亟应先事筹防，以杜狡谋。”著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何璟、曾国荃、张兆栋、刘秉璋、裕宽将沿海防务实力筹办，认真布置，不可虚应故事，徒令外人轻视[1]。有李鸿章的危言在前，脱利古的恫吓在后，清政府已经气馁，在这个上谕里，不但不敢再提“保我属邦”等话头，连援越助刘抗法也不提了，只是战战兢兢地唯恐惹怒法人，招来战祸，于是命令诸臣筹备防法。本来清政府是出兵越境助越抗法，握有主动权，现在变成在本国沿边沿海筹备防法，一副被动挨打的样子。

主战派官员很不满意清政府的懦弱胆怯，纷纷上奏分析利弊，指出法不足畏，中国仍应坚持助越援刘抗法的正确决策。

如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提出：中国诚贫，法亦不富，中国诚弱，法亦不强，而地则主客异势，远近殊形。此而怯懦自居，游移不断，使属藩翦灭，列国生心，实为铸一大错耳。又指出，我欲和则法必战，我能战则法自和耳。因此，他主张中国仍应援刘抗法：“刘永福之军不患无人，而患无饷。法军在河内，则保胜一带商旅不前，榷税必减，一可虑也。又不患无饷，而患无火器，各国枪炮远莫能致，二可虑也。夫永福一战杀安业，再战杀李维业等，不独为越屏藩，亦足为我羽翼。唐炯前议，谓器械暗资永福足以制法，其言已有明证。应请密饬滇、粤两省疆吏，妥为料理。”[2]

御史刘恩博奏称：中国如不敢抗法，则连刘永福不如，“刘永福中国一土寇耳，率其党数千人，驰檄文，斩骁将，法

① 《中法战争》(5)，第155页。

② 《中法战争》(5)，第162～164页。

人甚形狼狈，进退两难。堂堂中国，诸大臣竟托于持重，不敢与之交锋，虽有辞以谢法人，独不耻为土寇所非笑欤”[①]。

南洋大臣左宗棠也是主战派，他有函指出：“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他不知从哪里听说：“刘永福本永州一健卒耳，旧隶王前藩司德榜部下充当勇丁，撤营后由粤西流入越南”，因此请求派王德榜以押运军火赴滇、桂为名，“并嘱回籍后，遣其旧部与刘永福熟识者，径赴刘永福处，探视军情路途，据实禀报，以便区划”[②]。在这里，左宗棠可能误信人言，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但也反映他主张援刘抗法的思想。翁同和记称：“左论越事，函致总署，力持战论。后半忽言刘永福乃王德榜部下散勇云云，令王藩司带军械回湘，将资刘军也。”[③]

李鸿章也没有闲着，五月十二日（6 月 16 日），他上奏《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极力反对中国增兵入越与法开战：“或谓华兵前往越境交战，不在华界，我非显与失和。不知法、越业经开仗，其滇、粤兵之已扎越境者，尚可诿为自防边界。若添调客军再入越境，显系助越拒法，安得不谓之失和？恐不待中、法兵交，彼必多派兵船北犯津沽，南闯粤海，甚或声东击西，捣虚避实，以分我兵力，摇我人心。我军远戍越疆，不战仍无以助越，战则敌兵或更舍越而先图我，所有沿海、沿江各省，必应预为备御，务使敌兵所至各能自全，庶前敌可无返顾之忧。昔林则徐拒虎门，而敌从定海入浙、入苏；僧格林沁拒大沽，而敌从北塘入京师，此尚言其近也。今

① 《中法战争》(5)，第 166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985～987 页。
③ 《中法战争》(2)，第 1 页。

越与内地相去数千里，若陈师远出，而反戈内向，顾彼失此，兵连祸结，防不胜防。"①

在倾听了各方的意见后，清政府作出了照顾各派意见的决策：一方面给滇、桂等省增拨饷械，准添募勇营，以加强边防。另一方面，从五月到七月的三个月中，清政府小心地避免谈及助越援刘抗法事宜。只是得悉法军攻下了越都顺化，越南政府彻底投降法军后，清政府才于八月初三日（9月3日）颁谕，指示滇、桂两省援刘抗法："刘永福一军果能始终扼扎，越南尚可图存。该督抚等随时斟酌，相机应付，以顾全局，是为至要。"②

其实，清政府由于受李鸿章的影响，已经决定不再为越南问题与法国决裂，以致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也不能扭转这种情况。翁同和在这年八月十七日（17日）的日记中写道："醇邸到值房议事，先有信致恭邸，意在大张声势，又先与脱言明，彼若开衅，偿款即由彼认云云。其言甚壮，然无赞成者，并从而疵议之，略坐而去。"③

当清政府的大小官员在坐而论道、争论不休的时候，刘永福力歼李维业后带来的大好形势，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恶化，出现了不利于黑旗军和越南人民抗法的局面。唐景崧曾批评清政府的失策说："是时中旨尚不明言刘永福，而以后迭谕接济者，盖令边臣默喻而行事耳。纸桥捷后，法兵甚单，该国是时用费无多，尚易收束。倘刘军乘此获饱腾之资，攻复河内，法人立可转圜，越圻犹幸图存，边事即不至大坏。乃计不

① 《中法战争》(5)，第157页。
② 《中法战争》(2)，第236页。
③ 《中法战争》(2)，第2页。

出此，以致法兵渐增，日久费巨，该国遂苦于欲罢不能，而兵连祸结矣。”①

三　从怀德到丹凤

李维业被歼后，河内法军惊慌失措，一度欲弃城而逃。但接替卢眉任交趾支那总督的沁冲很快就镇定下来，着手采取补救措施，他任命交趾支那驻军司令波滑将军为东京地区的最高指挥官，指挥可以从交趾支那调动的军队，配备充足的枪炮弹药，火速出发前赴东京。同时请求法国政府派来2500名士兵和三连炮兵组成的增援队伍，其中1500人组成远征军到东京地区。据说在接到李维业被歼的噩耗七天后，即已运送800人前往。到6月1日，由于援军的陆续到来，河内法军已约达1700人。而在李维业被歼的前三天，法国政府刚刚通过给东京增派1500名援军、拨款550万法郎的法案。现在，远在千里外的法国政府也急忙派远征军前往东京地区，这支远征军包括每营600人的三个法国步兵营，每连125人的四个土著步兵连等共约2000余人；任命孤拔为东京湾海军司令，以加强海军的指挥力量。同时还任命何罗栏为东京特派员，前往管理东京地区的行政事务，使法军能集中力量对付黑旗军。这样，黑旗军很快又面临寡不敌众的严峻局面。

为了对付法军的反扑，刘永福曾打算利用决战前的空隙时间，加强黑旗军的防御工作，这包括：重新构筑防御工事、补充武器弹药、添募兵员等。要做好这些工作，就需要投进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刘永福和黑旗军都

① 《中法战争》(2)，第84页。

没有这个力量。援越桂军本来可以帮助刘永福做好这一切，但是由于清政府对援越助刘抗法持消极态度，影响到广西的地方官也缩手缩脚，不敢大力援助刘永福。身历其事的唐景崧曾沉痛地指出："徐方伯本决意济刘，倪中丞亦云不为遥制，而论者辄戒不宜。又云万一不慎，被法人擒去生供，讯得接济铁据，敌必借口索费，而徐亦自此徘徊缩手焉。"① 结果，由于广西地方官的消极态度，刘永福和黑旗军没有得到什么帮助，这就影响到他的防御措施的实施。

例如，黑旗军要加强防御，就要募勇购械筑垒，这都要投入一定的财力。可是，云南方面，自从光绪八年（1882 年）九月唐炯在木厂会晤刘永福，一次性地给了 1 万两银后，似乎再也没有银钱来往。广西方面，据《请缨日记》记载，在五月间，"徐方伯议月给渊亭五百两犒军"②。光绪六年至七年间，越南政府因为要黑旗军追剿黄崇英余部，曾许下每名勇丁月饷银 2 两。而抗法则又重于剿匪，饷银不应低于此数，以黑旗军原额 3000 人计，每月至少需饷银 6000 余两，则徐延旭所许每月 500 两，曾不及十分之一，相差实在太远，以至不能办什么事情。

关于添募士兵，刘永福想从几方面解决，一是将投奔而来的抗法民众改编为黑旗军。如将广东人庞振云、胡昆山带来的 300 人，在五月间改编为武烈营。以原由叶成林、朱冰清所率部队 200 人为唐景崧随护，升格为营，以连美为营官，号武炜营。另外，为对付法军舰艇，刘永福还准备建立一个扒船营，

---

① 《中法战争》(2)，第 84 页。
② 《中法战争》(2)，第 81 页。

以上思州贡生李唐为管带，以水勇一名月给饷三两，头工、艄工、炮手三两六钱的待遇招募水勇。五月间已有木船六只，装备快枪、小炮，防守水路，但办理并不顺利。二是向清军借兵。据唐景崧记称，刘永福曾向徐延旭请求借兵400人，徐延旭答应了，要求黄桂兰、赵沃从所部各抽200人给黑旗军。黄桂兰抽调把总何有龙等170人交唐景崧带往，而赵沃口头上派游击田福志募200人入黑旗军，但迟迟不见派往。倒是唐景崧趁徐延旭准其留营，并招募亲兵营之机，将叶成林等所率200余人的武炜营，补足为400人。但是，这些少少添募，对加强黑旗军的战斗力帮助不大。

至于枪械弹药的补充，刘永福考虑从几个方面解决：一是自行购买。大概仍像以前那样，派人带银到香港购买，再设法运回北圻。但是，这样来购买军火，路途迢远，运输困难，实在是远水不救近火，难济燃眉之急。二是向清兵借枪。五月间，刘永福曾接连向徐延旭借洋枪200杆，但延至九月才拨给。云南方面也曾接济军火给黑旗军。九月十九日（10月19日），云贵总督岑毓英奏称："惟刘永福颇忠义善战，诚如圣谕，果能始终扼扎，越南尚可图存。故臣等于上年即密济以饷项军火，并滇省所铸开花炮铲去字迹给以二十余尊。"[1] 这些所谓的开花炮，大概只是一些笨重无用的土炮，以至刘永福在力歼李维业后，不能利用它们作攻打河内的利器。

当时，援越桂军根据李鸿章总结的"避炮之法"，在驻防的地方沿堤开濠，于临河田基加筑丈厚土墙，或紧靠河堤，或横跨大路，参差交错；又将路掘断，仅留委曲一路，以便伏兵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09页。

抵御，总使彼兵不能登岸，而炮无所施，我或可以用火箭、喷筒从旁遥射，杀伤敌人。在与刘永福接触的过程中，黄桂兰等人大概将这个办法传授给刘永福，并嘱其“添船换炮，修筑炮台，竭力防守”。于是，在黑旗军驻地，都模仿这种样式构筑了各种工事，徐延旭曾报告倪文蔚：“刘团因有洋人出花红二万两行刺之说，合营俱发腰牌，上镌平西二字，出入俱手执护牌或文件，亦可为严密矣。各路水旱均筑炮台，挖断来路，由江入山西省城，本有两路，今只留一道。”[①]“其富良江干亦经刘军构筑炮台在前扼守，以塞彼船入口之路。”但是，由于缺少新式的枪炮和充足的弹药，使得这些防御工事在未来的战争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清军中一心一意愿意帮助刘永福的只有唐景崧而已。本来，清政府曾有旨催唐景崧赴云南听候差遣，却为广西奏留。他是坚决主张实际援助黑旗军的，但位微言轻，“不操寸柄，仅以虚言激励刘团，庸有济乎？”[②] 唐景崧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争取招募武炜正、副两营和亲兵一营，共三营1200人加入黑旗军作战，并调动部分清军援助黑旗军。唐景崧所做的主要事情，是在精神上随时激励刘永福及黑旗军将士。他曾禀告当轴诸大臣谓：“窃景崧留防营后，于五月初六日（6月10日）重至刘营，吊亡抚生，鼓励士气，所部极为欢慰，慨赋同仇。惟黄佐炎素与刘永福龃龉，吝赏忌功，诸多掣肘；近复有人挟嫌奏劾，永福心甚怏怏。越南仗此一军撑柱全局，而犹刻待如此，甚哉其愦愦也！永福尝言，非为景崧故，决不出赴山西，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102页。

② 《中法战争》（2），第85页。

亦决不能力战。经景崧调和劝励，其气始平，其心尚壮，而部下尤人人思奋，极欲报效中国。”①

五月初十日（14日），唐景崧向徐延旭报告黑旗军状况称：

此间前四五日，彼族日来岸侧窥探地势，近日雨水溢田，计尚未出于战。永福及其所部，闻垂念周详，蒙公拨军暗助，各欢欣鼓舞，摩厉以须。惟彼深伏不出，无术攻坚。黄罗洲日日促之，河内总督阮有度逃至怀德府，奏参永福妄杀百姓，致遭国王切责。据永福则云，所杀者乃教匪，且曾与罗洲商之，非敢擅杀；所杀者十余人，而士卒亦被教匪击伤十余人。因十三日之战，阮有度只递消息于罗洲，而不递刘营，以致得信已迟，未得预为布置。是日赖梁竹圃递信，始悉敌至，造饭不及，乃枵腹而战三时之久，永福以此抱怨该总督，及其来，拒之不见，而该总督遂挟嫌参之。甚哉，南官之可恼如此！

崧语永福，谓仰仗方伯威德，诸事忍耐，决不使其为难。现商以木筏上置油薪，在上游顺流而下，撞焚其船。其船如避行，则岸兵势必惊慌，刘团沿江乘懈而击。明日约同往查看江岸建筑炮台，以防是日彼族得信先来，则以岸炮拦截，纵筏而下；且沿江置炮，即可借扼进窥山西之路。若望诸山西地方官，则百无一成。永福乞我军是日在新河助壮威势，以大炮火箭射其楼船，截其不能上驶。若恃南兵，则闻炮即奔，转懈对岸军心，其可否暗助之处，我公自有鸿裁。而目前不得不权宜允之，以坚其志而壮其兴；且谓击洋楼与船，新河为便，此间则遥隔河城，不能

① 《中法战争》(2)，第83页。

望及楼与船也。永福说来甚有理致，属试为之，不成无害。今已向罗洲商之，劝其勿惜工费，幸能听从。[1]

综上所述，由于中越政府及广西地方文武对助刘抗法一事态度消极，因而在力歼李维业后，黑旗军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补充和加强，就投入与法军的生死鏖战之中。

与刘永福孤立无援的窘态相反，东京地区的法军不但得到了大量的援军，而且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7月30日，何罗栏、孤拔和波滑三巨头在海防聚会，共同制订一个行动计划。当时，法国政府认为："顺化是冲突与斗争的策源地，从那里发出了（一切）在东京继续战斗的命令及向中国（请求）援助的呼吁。一天顺化政府被打败，在红河两岸的抵抗失去了领导，这抵抗或者就会停止。至于中国，在安南屈服之后，或将不至于为自己直接的原故继续战争。这就是〔法国〕负责这问题的政治及军事人员们当时的意见。"于是，东京三巨头决定实行双管齐下、两路出击的计划，即由孤拔率领7艘舰艇和1000名士兵攻取顺化，波滑率2000余士兵攻打黑旗军防守的各据点。

而早在此之前，波滑已着手进行进攻黑旗军的准备。他不时派出几艘舰艇沿河前往侦察，但都遭到黑旗军的狙击。如五月十四日（18日），有法人轮船三只，三枝桅者一艘，枝半桅者二艘，驶上山西省辖之瑞香社，刘团旧有炮船六号驻防该处，登即开炮轰击。该船炮位不大，只有二百数十斤，连发五十余出，无不击中轮船，最后碎其三桅船头板片，乃各仓皇遁去。维时刘团派出快枪手一百名在江干助战，目睹桅上一人中

① 《中法战争》(2)，第291～292页。

炮坠落，登时毙命，其余纷纷倒向舱内，不知其数。及后探确，伤者29人，毙者二人，刘团阵亡一名，炮船亦被击漏二号。二十四日（28日），又有轮船三枝桅三艘上驶，直薄山西省辖之丹凤口，人心惊慌，至有挈家迁避者。右军都司田福志管带奋勇一营适至山西城下，立即会同滇军悉去号衣，另树黑帜，伪作刘团勇练，列阵江干，放枪争击，逾时始退。刘团派队援应，猝遇其船于浅狭之处，竭力截击，相持良久，终被脱逃，探知法人伤亡四十余名。

六月十九日（7月22日），法人轮船二艘上驶，欲犯山西省城。刘团截击于上池社，其船只到左凤即行折回河内。

七月初五日（8月7日）清晨，探报法人由河内出队来犯，其众不过五百名，多系客勇、教民，法兵绝少。刘团派三营出外，分途埋伏，而以劲旅赶先迎诱，自率亲兵一营，直当其前，拟俟彼众来至府坡，即行发号，三面夹击，聚而歼旃。殊料其甫至河岸，侦知我军大集，不敢轻进，转过近村，掠牛数十头而退。初七早又来，我军照前布置，各施枪炮，击中数人，彼即退去，我亦不追等情。

经过几次这样的试探后，波滑对黑旗军的防备和战斗力有所了解。8月14日，波滑向政府法国报告黑旗军防御阵地的情况称：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自纸桥始，至四柱庙终，途经安西。第二道防线自怀德府至内村与洪村。在洪村以北，有多处木制内堡，四周又围有竹栅栏，旁边有两座炮台，可朝沿河行驶的炮舰进行炮击。在这两层防线后面，又有一条宽10～12米的小河，称作元江，形成一个圆弧，小河后的桥梁已有部分被拆除，但在断口处布上竹竿。这样，只要把竹竿一撤除，交通就被截断，这一阵地是敌人的中心堡垒了。山西公路路面状

况极好，完全可以通行。内村公路虽稍差，但亦可通行，沿河堤伸展经计村面前经求仙桥的公路路面可通行火炮，其他公路路质较差，但亦并非不能通行……此乃一马平川之地，其间杂陈数座竹林掩映的村落，村村之间有稻田小径相通，竹林沿径而栽，构成了天然的防御物。

波滑认为他手中目前掌握的兵力不足以在作战中稳操胜券，还需要一些时间来作准备。但是，为报复心理所激动的何罗栏对他的这种行为不满，他向波滑指出："我们犹豫不决的态度，长期呆在栅栏和壕沟后面按兵不动，给我们由于5月19日的不幸事件而已经受到严重破坏的威望带来极大的损害；任何推迟向前挺进都会被我们的敌人视为一种软弱无力的迹象……我恳求将军至少要加快夺取怀德府的堡垒。"

由于受到这样的压力，波滑只得在兵力不足、准备未够的情况下，于七月十三日（8月15日）向黑旗军踞守的怀德府发动进攻。事后，波滑于8月23日向海军殖民部报告，认为是打了胜仗：

15日，我率领全部可以调动的兵力——一千八百人、十四尊大炮——向敌人进攻。左翼，利维雍上校向五千中国人严密防守的工事发起进攻，经过整天战斗，于夜间返回。中路，科罗纳舰长占领了怀德府的工事，在怀德府城下陈兵，打了一整天，就在该阵地上过夜，至16日傍晚返回。右翼，比硕上校在所有炮艇的支援下，沿红河前进，由舰队轰击敌人的炮台，夺取筑有防御工事的塔庙。在大堤的缺口处，上校让一半士兵登上炮艇，一些炮艇停泊在塔庙旁。这一重要事件后，敌人撤出他们的阵地，向山西逃窜。洪水使军事行动无法继续进行，水流太急，炮

艇无法上溯行驶。

波滑认为，虽然这一仗使黑旗军付出了死 300 人、伤 1000 人的代价，但是，对方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精神无可非议，使法军损失惨重，两名军官和 10 名士兵阵亡，两名军官和 47 名士兵负伤。波滑承认：法军所取得的并不是一次彻底的胜利，而只是一次进攻性的侦察。要战胜黑旗军须要法军出动一个整师的兵力才行。

但是，在法方内部却有人认为波滑这次作战不是战胜而是失败。在 9 月 16 日，交趾支那总督沁冲却向海军殖民部转送了何罗栏等人关于这次战斗的两份报告，这两份出自不同的人的报告不约而同地指出：在向黑旗军发动进攻的三路法军中，其他两路法军的表现都无关大局，而由波滑指挥的那一路法军的战败导致整个行动的失败。

一份报告这样写道：

由海军陆战队、炮兵和土著士兵联合组成的一支二千人的部队，于凌晨二时分三路纵队向怀德进发。中路军实力最强，由司令指挥，右路和左路分别由比硕上校和贝杰上校指挥。司令的中路军一通过纸桥，就进入 19 日曾发生过冲突的那条有名的公路，不一会儿就与敌人遭遇，战斗正式打响。我们的炮兵完全无用武之地，因为今年这个季节，稻田被水淹没，堤埂很滑，大炮滚进水中，六十名士兵不得不下水寻觅。就在这个时候，黑旗军的炮火给我们造成许多损失。经过八小时的战斗，司令不得不率领被击溃的士兵带着六十具死尸和伤员撤退。两名军官阵亡，一名军官受伤，十名士兵阵亡，四十七名士兵负伤。

另一份报告写道：

波滑率领的纵队，在越过李维业司令被害之地后，这个纵队的左翼由乔治的黄旗军护卫，一直走到 Phuai，那里仍没碰见敌人，而人们原以为会遭到严重抵抗，因为我们的侦察报告，该村驻扎有大部队。在 Phuai，看不见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一个安南人的踪影，波滑司令得意洋洋，以为至少可以轻易地抵达山西，但是由于高兴过头而忘记叫人作认真的侦察。当部队主力到达望村——较之背靠戎江的大村来，它只是一个小居民点——附近时，却遭到巧妙地隐蔽在竹篱后面的碉堡的猛烈扫射，打得司令蒙头转向，不知所措。部队成散兵线地铺开，但无济于事。黑旗军的防御工事延伸几公里，由竹林、陷阱和土壕三道防线组成。工事后面有七八千中国军队向我们的士兵猛烈射击，我们的许多士兵被击毙或击伤。在那里，卡隆少尉中弹身亡，与此同时，其连队的一名副官和两名士官也被击毙。

于是司令下令撤退，部队还不到六百人，确实不能冒险发动进攻，撤退秩序井然地分级进行。中国军队以猛烈的扫射和密集的炮火向我们追击，就在此时，中路纵队猛烈扫射中国军队，掩护波滑撤退。傍晚五时，纵队回到河内，一名溃兵在纵队之前逃回，到处叫嚷部队溃败，此人以后被押送军事法庭。我们有二十人被打死，五十四人受伤，其中不少人终身不愈。另外黄旗军中有三十五人丧命，六十多人受伤，其华人首领也被击毙。

沁冲在致海军殖民部长的信中，谈了自己在读过这些报告的感想：波滑发动的这次进攻是不成功的。

关于中方对于此次战事的记述，据徐延旭八月五日的奏折，可知刘永福曾有专折向他报告战事经过，但刘折已找不

到。倒是唐景崧当时恰好在刘永福营中，在七月十三日报告了耳闻目睹的情况，并在《请缨日记》中作了记述，黄桂兰、赵沃也在七月十五日（17 日）根据探报向倪文蔚报告了战事经过。综合这几份资料，在中方看来战事经过如下：

十三日卯刻，法军分水陆两路进攻怀德府，势甚凶猛。唐景崧当即嘱刘永福严饬各营坚伏不动，待敌人近前始起奋击。刘永福率庞振云管带的武烈营、黄守忠管带的前营、韩再勋管带的右营、吴凤典管带的左营、张慎泰管带的亲兵营准备迎击敌人，并传语各自为战，彼此势难兼顾。另有法舰数艘掩护法兵五六百人，进攻在距怀德十里的河岸驻扎的武炜营。法军欺负武烈营新近成军，战斗力不强，逼攻甚紧，韩再勋率右营前往救援，打退敌人的进攻。法军又集中兵力攻打怀德大道，黑旗军在此筑有坚墙，凭墙还击。法军不能得手，只好撤退。武炜营孤悬河岸，仅唐景崧派去扼守的把总何有龙一哨有后膛枪 35 枝，其余都是寻常火枪。法军先以舰艇大炮轰击，然后派 500 法军进攻，情势危急。营官连美率何有龙、朱冰清等拼死抵挡，奋勇还击，叶成林则率兵坚守炮台。法国因受洪水影响，军舰炮火威力不能发挥，登陆法军的攻势受阻。这时，黄守忠分兵前来救援，法军只好撤退。

事后，刘永福与唐景崧谈及各营战绩，认为右营最得力，武烈营次之，亲兵营又次之，由于这三营合力扼击大路，挫敌凶锋，法军才败退。七月二十日（22 日），唐景崧函告徐延旭：“渊亭极赞连参将，以孤营力御强寇，顾全大局，独赏是营哨长百金。”[①] 徐延旭在八月初五日（9 月 5 日）的奏折中，

① 《中法战争》(2)，第 300 页。

摘录了刘永福报告中关于战果的部分：嗣据刘永福折报十三日之捷，较为详晰，“实在阵斩法人兵头三画一名，二画两名，一画三名，兵众一百余名，重伤抢回者二百余名，生擒四名，夺获快枪五十余杆，杂物数十件，查点各营勇丁阵亡二十二人，受伤四十九人，哨长并未阵亡，惟受重伤，可以医痊无碍。”① 十四日（16 日），因天降大雨，双方无战事。十五日（17 日），洪水涨发，黑旗军驻地被淹没，只得撤往 30 里外的丹凤。

1883年 10 月 25 日的《申报》登载了一份“躬预战务”者所写的报道：

七月十三日卯刻，法军四千余人水陆并驰，进攻黑旗，鼓角齐鸣，旌旗掩映。陆路分作五队，径渡纸桥，用结轮炮数架、开花炮数十架为前锋，而后膛快枪千余杆次之，围扑刘提督诸营，锐气有如潮涌，几欲灭此而朝食焉。刘提督闻报，传令各营勿得妄动，著精卒悉伏壁内，以听中军号令，而亲自率精兵出驻大路，以为策应。探悉法军尚隔里许，提督乃解鞍磐踞地而坐，员弁刘文谦、韩再文等背枪手剑环侍左右，纸桥之右为右营、武烈营，其左则前营、左营，均秣马厉兵，敦阵固列。法军五路齐进，见各营偃旗息鼓，并无动静，蜂拥向前，齐施枪炮，声如雷霆，势震山岳。而营中仍声息无闻，法军乃迤逦转过桥右，猛扑武烽营。将及壁垒，刘提督中军施放号炮，营弁庞振云偕勇士突出，截击法军，鏖战良久。法军一队绕出阵前，直逼右营，营弁韩伯铭见敌逼近，振臂一呼，

① 《中法战争》(5)，第 193～194 页。

骤启营门，率敢死士从枪炮中奋勇杀出，无不以一当十。武烈营见之，气愈壮，战愈勇，法军血肉坌飞，肝脑枕藉，仍不肯退，既却复前，再接再厉。中路军往来游奕(弋)，欲蹈瑕隙，直取刘提督之军，前营、左营弁兵见法军势大，遂各出战以牵制之。庞、韩二弁各营接战，勇气百倍，力扼大路之右，法军用炮连环轰击，而遣快枪队迭次冲突，两营兵屹立如山，咫尺不移。其时，沙尘蔽空，风云变色，人怀必死之心，士无或生之气。刘提督恐右营有失，大呼上马，率其亲兵，从大路冲出，首先陷阵。法军猝出不意，瞥见刘字帅旗，苍黄惊骇，庞、韩二军合而蹴之，法军左右不能相顾，遂被刘提督军直捣中坚，枪击刀斫，如入无人之境，法阵大乱，纷纷逃窜。刘军追逐五里许，时已酉刻，天忽晦暝，雷雨交作，提督乃命收队回营，此陆战之情形也。计斩获百余人，夺得军装无算。

其水路则法船九艘，亦于卯刻用炮遥攻河干之炮台，旋以兵五百名登岸攫战。守炮台兵仅有二百余名，距刘提督大营且十余里，势颇孤立。法船迭用开花炮向台轰击，幸弹悉陷土中不能炸裂，守兵悉命与拒，枪刀并用，法兵五百名终不能近前。相持至晚，突见一军黑旗招展，星驰电掣，前来救护，兵只百人，而枪皆命中及远。法军乃遁回船，后侦知乃黄守忠督带之前营，人呼为北江黄二者也。

余以贸易之故，偶在行间，得作壁上观，目击此情形，殊有感焉！是役也，黑旗右营最得力。伯铭名再勋，广西南宁人，弱冠补弟子业，文艺优娴，例得明经。感怀时事，仗剑出关，谒见刘永福，纵谈天下大势。刘永福大悦，相见恨晚，留在营中，待以殊礼，每事必咨，然后举

行。庞振云一军，所用火枪仅五十杆，且属寻常，而首先犯敌，与韩伯铭掎角制胜，庞亦人杰矣哉！河干炮台守兵二百余人，惟得后膛枪三十杆，法船九艘连环轰击，终不可破。

综合各方的战报，可见他们关于作战经过和伤亡情况的叙述差异很大，都把自己写作战胜者，夸大了对方的伤亡。不过，从总的情况来看，波滑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指挥官，他在作战前对黑旗军的情况侦察了解不够，在作战时各部法兵的联络协作也不好，而且作战时机选择不当，炮兵的作用没能发挥出来。就黑旗军而言，以他们的窳劣装备，战胜只有 400 士兵、两门大炮的李维业已很吃力，与拥兵 2000、有炮 14 门的波滑作战，胜负实难预卜，他们完全是靠自己的机智勇敢，才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当波滑从怀德无功而返时，孤拔却指挥法军在经过三天战斗后，轻易攻占了越都顺化外围的顺安炮台，直接威胁到越王宫的安全。越南政府由于嗣德王刚死，继立的瑞国公应禛旋即被废黜，新立朗国公洪佚为协和王，朝政一片紊乱，无法组织有力的抵抗，只得在法军逼迫下，接受丧权辱国的《越法顺化条约》，最终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完全割断了与中国长期存在的传统封建宗藩关系。就在这个时候，越南政府接到黄佐炎、刘永福关于怀德之战的捷报，悲喜交加，不知如何是好。协和王愀然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交机密院和兵部区处。院部臣复奏："该次有此胜仗，固应奖赏，但今情势既异，另俟拟办。"①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七〇，第 22 页。

波滑见孤拔得手，也急于向西线进攻，在得到一部分增援后，于8月31日重施故伎，亲自率领舰艇十余艘，士兵二千余人，分水陆两路夹攻丹凤。

丹凤是怀德与山西之间的小镇，四面环江，筑有大堤防洪，堤宽五尺，高五尺至一丈不等，砌石填土，战时可作临时工事。因为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法军舰艇可循江直逼河堤，而堤内洼地积水数尺，不便驻守，是个攻防皆不宜之地。

波滑很不走运，他选择的进攻时机不当，湍急的洪水使法军的舰艇炮火威力不能充分发挥，而大雨和积潦又使法军兵力无法展开，勉强登陆的法兵寸步难行，以至被黑旗军的顽强抵抗压制在堤下。就这样僵持了三天，在付出一定的伤亡后，法军只得退回河内。

9月8日，波滑向法军海军部报告这次战斗称：我们终于领教了对手的厉害，参战的欧洲兵员中有十分之一丧失战斗力。敌人坚守自己的阵地，并在拼刺时被杀，其兵力在不断增加，并配有新式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幸亏他们缺乏优质火炮，但不难预料，这类炮火他们最终也会有的。至于他们选择防御阵地之机灵和巧妙，那是无可置疑的，9月1日他们在48小时内赶筑的那个阵地堪称典范。

9月16日，孤拔根据一位参战的鱼雷艇艇长的来信，向沁冲报告了波滑再次受挫的消息。20日，沁冲又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海军殖民部："孤拔向我报告，9月1日和2日，在东京与黑旗军进行了新的战斗。舰队从河内运载八百人前往巴兰，溯红江江面而上，攻击丰村坚固阵地前面的三个村庄，以便将敌人赶到底河，那里已埋伏有三艘炮艇，准备将其退路截断。尽管遭到激烈抵抗，两个村庄还是被攻克。鉴于黑旗军得

到二千援军，我们不得不把纵队集结在巴兰。二十名法军被击毙，其中有两名军官，大约五十人受伤，其中有三名军官。”[①]

法人马罗尔在撰写《李维业远征记》时，对波滑指挥两次向黑旗军发动的进攻作了一个否定的评价：“大约像波滑将军于八月和九月两次战役中所得的结果一般，将是一种胜负不决的战事。像这两次战役一般，我们必得要先敌人退却。总之，这是一个失败，使我们丧失体面，并使我们无力保卫河内市。”[②] 早已和东京民政特派员何罗枿意见不合的波滑，由于这两次失利，被法国殖民当局撤去了东京军队总司令的职务，改由海军将领孤拔担任此职。1883 年 9 月 21 日，孤拔向法国海军部报告对怀德、丹凤两战后东京形势的看法：黑旗军是要认真对付的对手。东京远征军在和黑旗军的作战中，已经死亡了一些人，还有更多的人受伤不能战斗，与我们现有战斗人员总数相比，是巨大的数目。我们日益削弱，为了补充缺员，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前线，而留下少数部队驻守我们现已占领或将占领的城堡，调来大批增援部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孤拔要求法国政府给东京增援一个配备三个营的野战团、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150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两连炮兵。从这里可看出，黑旗军曾给法军沉重的打击。

其实，关于这次战役，刘永福曾分别向黄桂兰、赵沃及徐延旭作了禀告，其中，又以八月十九日（9 月 19 日），徐延旭上奏清政府时摘引的刘永福来禀较为详尽具体。文称：

（法人）以大小轮船十一艘，板船九艘，于七月二十

①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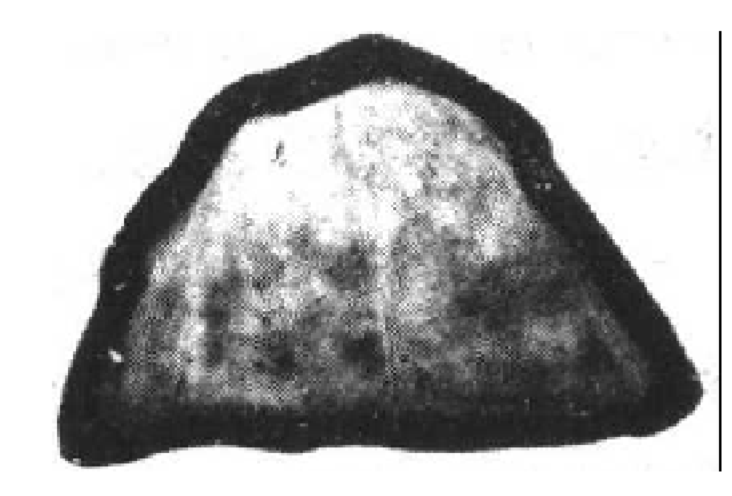
② 《中法战争》(3)，第 343～344 页。

九日（8月31日）薄暮驶至丹凤县喝江口——即左风小河，该处为刘永福驻营之所。刘永福先已侦知并闻其陆众三千，分头来犯，乃饬所部各营预为之备：自率亲兵营刘成良、刘文谦等伏丹凤堤边，前营督带黄守忠、正前营管带黄宝珠伏堤之正路，副前营管带邓遇霖伏堤之右路，左营管带吴凤典伏丹凤正路，右营管带韩再勋伏丹凤右路，而以参将连美武炜营伏高舍一路，以为策应之师。八月初一日（9月1日）清晨，彼已麕至，因知刘军分伏以待，遂悉众并归丹凤堤正路来扑正前营，马驱车载格伦炮六架、开花炮数十架，余则纯用快枪，势极凶猛。黄守忠、黄宝珠率队迎敌，邓遇霖续起助之，枪炮连环，声震山谷。会值倾盆大雨，战已多时，刘成良等各率亲兵接应，刘永福指挥纵击，毙其兵头一人，敌势稍却，天将暮，退至村边，犹复列队放枪，彻宵抵拒。刘永福先已乞援山西，一面赶筑炮垛，以备久战。留营主事唐景崧商之越南统督黄佐炎，立拨两营星夜驰往，并助以快枪通码，又向滇军借给锁头通码一万出。初二日（2日）黎明，彼复来扑，奋不顾身，各军勇气百倍，力能制敌，鏖战竟日，互有伤亡。连美亲督选锋，纵横荡决，彼犹拼死不退；适见大队黑旗掩至，知系山西来有援兵，于是退至村中，仍前彻夜枪不绝响。初三日（3日）早间，即向瑞香社一带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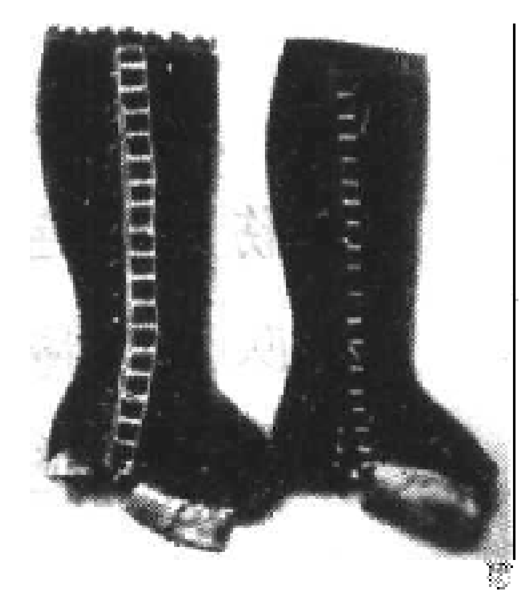
其轮船初来九艘，在左风小河，原派扒船管带李唐、武烈营管带庞振云等分扼水陆，以顾后路。初一日来船已进河口，李唐督饬水勇放炮连轰，庞振云等亦各以抬枪击之，破其中船、小船各一艘，彼即退泊数里。初二日，又

驶轮船十一艘来左凤河面，板船九艘鱼贯而至。初三日午后，刘永福自督亲兵，施放大铜炮，于堤岸指击，恰中其中船一艘，势不能支，亦向瑞香河面退去，恐其诈诱，水陆未敢往追，遂各收队回营。连日歼厥丑类，多被抢回，未及割取首级，不知实数。及其退后，询据所踞各村土民称说，经见炮毙兵头六画一人，四画、三画各一人，二画、一画各二人，兵众八十余人，勒令伊等抬尸下船，载回河内，尚有客匪六十余尸，即在大吉社前掩埋，其各项受伤轻重不等，约计二百有余。查点所部弁勇，阵亡正前营哨长陈英茂、何正辉，副前营哨长邓士吉、曾来福，勇丁四十二名；受伤亲兵帮办梁茂林、哨长刘文谦，正前营管带黄宝珠、副前营管带邓遇霖，各营勇丁九十八名。[1]

八月初八日，刘永福也曾向黄桂兰等禀报战事，其中提及伤亡情况称："查点部卒，计阵亡哨弁陈英茂等四员，勇丁三十八人，伤者管带黄宝珠、邓遇霖等及勇丁共九十八人。"[2]







中国军民在抗法斗争中的部分战利品

唐景崧当时也在山西，他记称：

八月初一日，法兵轮六艘围攻丹凤刘营，

① 《中法战争》(5)，第210～211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291～1292页。

又陆路千人循堤而进。丹凤四面为喝江所环，轮船乘夏涨由红江入也。长堤直通河内，黄守忠据堤迎敌，亡三哨弁，勇丁死数十人，守忠握刀坐地不退。堤狭弹密，敌避堤下，黄军亦趋堤下，两军仅隔五尺堤，蹲伏对枪，昂头即死。而船炮俯击营中，开花如雨，水陆受敌。渊亭飞函乞兵，适兵轮一艘驶至山西下游二十里日昭社，咸谓省城吃紧，不宜分兵救刘。余曰："此以孤轮掣我师，恐我救丹凤也；不救，中敌计矣。刘败，省城不保，刘胜，敌决不攻省城也。"乃遣黄云高、田福志往援，冒雨拔队，并借云军通码一万解赴刘营。黄军、法军相持于堤下，露坐两昼夜，战场一线，无可用武，涨溢平地，又不能绕出奇师。渊亭料兵轮不退，围不解。黄佐炎营有神炮，事急祷而后用，初三日六发中五，轮退堤下，法兵乘大雨骤奔。黄军追斩八十余级，而前营精锐实已损于此战矣。[①]

四　山西之战

丹凤之役战胜后，刘永福与越南官员商议，准备移营河内省辖的青威县地方，那里地势高爽，不畏水潦，不近江河，轮船不能驶至，距河内 20 里。移营既毕，即进兵收复河内，谁知，形势的变化，使他的这个计划不能实现。

原来，越南政府与法军签订《法越顺化条约》后，一改抗法变为顺法，下令北圻抗法越军停止抵抗，撤兵罢团。越南政府这样做，给黑旗军带来了两个不利的影响：

一是黄佐炎等率领的越南官军接奉命令后，不顾刘永福及

① 《中法战争》(2)，第 91 页。

清军将领的劝阻而停止抵抗。黄佐炎回兴化经营私事，其他人也惶惶不可终日，军心涣散。“山西各官则已有呼应不灵之势，各官懈怠胜于平日，虽以永福之咆哮，而卒莫之理，需之急则勉强点缀而已。”[1]“山西额兵七千，按支粮饷。渊亭属阮廷润调集守堞，屡应曰有，而寥寥仅二三百名。”[2] 这就使黑旗军失去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同盟军。因为越南官军虽然打仗不行，但驻扎后路、协助后勤等还是有用的，在紧要的关头，有时也能帮上一点忙。反之，如果这些越南官军受越南政府指使或法军胁迫，助纣为虐，帮助法军攻打黑旗军，摇旗呐喊，旁敲侧击，则会给黑旗军带来很大的威胁。

二是使黑旗军面临断绝粮饷的危机。刘永福官居越南提督，黑旗军虽然不算是官军，但长期为越南政府作战，越南政府也支给黑旗军一份相对越南官军来说还算很优厚的粮饷。越南政府投降法国后，继续坚持抗法的黑旗军就成了法越两国的共同敌人，越南政府当然不会再给黑旗军支发粮饷了。八月十八日（9月18日），法使德理固与李鸿章谈判时，就曾傲慢地宣称：“黑旗从前有越南王接济军饷。现越之府库粮税均由法人管理，越南不能再行接济。”[3] 中国方面也考虑到这种情况，当黑旗军随同黄佐炎等退回山西后，八月二十一日（21日），徐延旭有函致黄佐炎等越南官员，要求他们设法保证黑旗军的粮饷军火供给。唐景崧也向黄佐炎提出：“刘团之聚散系乎粮饷之有无，今尔虽抗疏请战，设富春为敌所胁，一纸停厥粮饷，则不散之散。须将粮饷之柄暗授之永福，虽有国命停饷，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403页。
② 《中法战争》（2），第309页。
③ 《中法战争》（4），第72页。

而永福自可抗之。刘团一日有饷，则一日不散。”[1] 但越方表示难以遵办。

形势的变化也引起了援越清军态度的变化。清军入越，本意是要助越抗法，但清政府又不想明显与法决裂，所以一再告诫清军不要卷入法越战事："第法人并未与我失和，我军总以剿办土匪为名，未可显露助战之迹，致启衅端。”当时滇军张永清等三营已进扎山西为刘永福声援，清政府于七月十三日（8月15日）有旨给云南督抚，担心清军驻扎山西容易和法军发生冲突。岑毓英、唐炯于八月接奉这道朝旨后，鉴于越南已投降法国，遂决定将进驻山西的滇军撤退至兴化、大滩。已出省到新安所督率防军的新任云南巡抚唐炯，也借口旋省接篆，与岑毓英面商增兵、筹饷事宜，于八月十一日（9月11日）回昆明，而让黑旗军独守山西，由云南每月助给饷银5000两。

广西本来也有军队驻扎山西，现在见越南政府投降法国，因而军心动摇，态度消极，也准备继滇军之后撤军。八月十一日，受命出关督师的徐延旭向倪文蔚提出置身事外的建议。新任广西提督的黄桂兰则准备将派出各营暂加收束。倪文蔚将这些意见转呈清政府时，也表示赞同："不为无见。”[2] 刘永福曾惊叹："黑旗一军，原足防守省城，但滇军一退，粤军继离，值此人心惶惶之秋，岂不更形解体?”[3]

甚至连万里请缨入越助刘的唐景崧也对刘永福失去信心。

原来，唐景崧始终没有忘掉他劝说刘永福取代越王的计划，当刘永福撤至山西时，他又重提旧事。关于此事，《请缨

① 《中法战争》(2)，第314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272～1273页。
③ 《中法战争》(2)，第303页。

日记》记称：

余因说渊亭曰："越南国破君降，社将屋矣。足下宜乘是时倡举义旗，号召北圻七省，申请边疆督抚，谓越社再兴，仍归故主；不能，则将率土来归，听候天朝部署，而后求助军实，事当有成。"渊亭曰："前王待我厚，故吾愿效驰驱，今非其主矣！"余曰："阮氏将不血食，子能代兴，存亡继绝即所以报故主也。且阮福时薨而子无背主之嫌，富春降而子无窃国之诮，此天以美隙与足下，诚豪杰千载一时之会也。"渊亭谢不敏，卒不从。[1]

唐景崧八月二十日（20日）曾把他劝刘代越的经过向徐延旭报告，内容又与《请缨日记》所载不完全相同。文曰：

至于永福，则始终持定一策以相劝，谓无论越社之存亡，滇、粤之是否接济，尔总以守定山西为根本。其事有大举、小举。大举则竟以山西为己有，取其关税、钱粮所入，计之可养万人，传檄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宣光、兴化等省，不必遽尔称王、称霸，只言为越南守土，不肯从夷。将来越可中兴，仍归越国；不能，或率土而献天朝，或即自据，皆不失为英雄之事。北宁有粤军镇住，山、北二省不陷于敌，则各省俱在掌握之中，养精蓄锐，再议进取。适滇中亦劝以是言。而永福则谓：如此恐中国以僭逆相待，与之为难。告以果能如此，即为中国扼守边隅，不独不与为难，且必仍有资助。而永福则惟以战自任，谓无此等才略，且终信中国不坚，此大举之不能为也。而小举，则告以与山西各官约法三章，一人专司饷

① 《中法战争》(2)，第92～93页。

事，我今为国守土，无论国谕停与不停，吾军粮饷专仰给于是省，届时不得谓我跋扈。若不如此，我军立散，越官今日其奈之何?[1]

两相比较，可见这两份资料是互相补充的。《请缨日记》不及《上徐方伯函》详尽，而后者则又缺少前者的露骨说辞。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外有强敌压境，内则人心涣散，当此之时，唐景崧劝刘永福乘危据地为王，实为鲁莽之举。只会使抗法阵营内部更加混乱，不待敌人来攻即已分崩瓦解，同时也不合清政府的一向主张。所以，刘永福不为唐景崧的说辞所动，可见他还是有一定见识的。

唐景崧说刘代越为王遭拒绝，他为此感到十分不满，曾在上都中诸大臣书中痛心疾首地写道："永福终拘泥身系越官，不肯稍逸范围。眼见南交二千年来同轨同文之土地，阮氏不能有，刘氏不能有，中国亦不能有，终归于非我族类之人而已！伤心痛恨，曷有既极。"[2] 他因而老羞成怒，一反以往对刘永福赞不绝口的作法，去函清军将领诋毁刘永福，并危言耸听地预言黑旗军将会发生内哄变乱："刘永福自退山西之后，因见越都已和，滇军已退，心中愈加无主，而其人本多疑，吝啬苛刻是其素性，各将弁畏威怀恨，多不敢言。唐主事每劝其宜示以恩，彼则以将弁无一可靠为词，殊不知将士离心，已非一日，唐主事与处已久，目击现在情形，深虑其中有变。"[3] 其实是唐景崧见刘永福不纳己策，即在黑旗军中另觅才能可与相比的将领取代刘永福，他曾在九月十六日上都中诸大臣书曰：

① 《中法战争》(2)，第314页。
② 《中法战争》(2)，第100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30页。

“万一刘永福或不足恃，而其部下亦正继起有人，阴为要结，皆愿受命。”[1] 唐景崧所物色的人选就是刘永福的得力部将、黑旗军前营督带黄守忠。

原来，云南督抚决定将原驻山西的滇军驻扎退兴化后，一方面答应刘永福仍会暗助军火，密饬增募健勇，扼守山西老营，以与北宁掎角，收其租赋以充军实，号召十州、三猛义勇多树法敌，以存越宗社，固我藩篱。同时又准备派一个有胆识的人帮刘永福出谋划策，事情才有把握，考虑到唐景崧忠义奋发，不避艰险，并得刘永福信任，遂函嘱留驻刘营，代为调度。

八月十八日（18日），唐景崧与刘永福面商由黑旗军驻扎滇军原来的营地事宜。刘永福因为越南政府已投降法国，越南官民军队也态度消极，加以滇、桂各军又纷纷撤退，影响黑旗军人心动摇，已逃跑了几十人，心想仅恃黑旗军孤军作战，难抗强敌，也想放弃山西，退守保胜、十州。所以，当唐景崧与他商及扎营事宜时，刘永福迟迟不答。

> 唐景崧发现情况不对，马上问道：汝现作何打算？
>
> 刘永福答称：越南今已无主，惟望天朝当前，卑营随后，无不听命。若独卑营单任守任战，力实不及。云南既欲退兵，虽许以饷，亦不敢领。现在各营弁勇，其心已散。且当日出师，拟一二月即可毕事，得财得官，不料迟延至今，事又大变。弁勇薪水、口粮本来菲薄，若军务一时莫了，则人多不愿为。惟有仰望粤关内外办事诸大人定一主意，如何扶我。

---

[1] 《中法战争》(2)，第95页。

唐景崧问道：汝究竟欲如何，不妨明白言之，凡可行者，则诸位大人决无不行。

刘永福答道：须两统领住在北宁，弟住在山西，将来进兵尚要天兵相助。

唐景崧说：五月以后何尝不拨兵来助？何尝不接济军火？我何尝不在汝身旁？北宁决不退兵，两统领何至退处？至天朝难开兵端，不肯露面之故，曾经历次开诚布公而言之，所以用及尔军，云南给饷，属自招营；徐方伯饬用朱冰清，给粮饷成营，皆不得已之苦衷。实则于尔有益，赏罚调遣自专，胜于拨兵相助，何处觅此等恩遇！尔今遁处乡间，不为备御山城之计，在己亦甚失算！

刘永福低头不语。

唐景崧又问：汝之不敢为，得非见越南解体，以后之饷难恃乎？至于弁勇薪水口粮欲增若干，需银几何？开一清单，以便函商两帅，请诸徐方伯，此事可力任之。

刘永福：自从法越议和，人心已散，非稍加以饷，焉能再聚！如诸位大人开恩，肯予臂助，则每勇月加钱两贯，十长、百长、管带每人或十数贯不等，则足矣。

唐景崧：如此计来，每月千金即可，余可为请于两统领及徐方伯，谅亦允可。此项加饷，可从九月朔起支，按月拨解北宁，尔自行遣人赴两统领军中领用。

刘永福欣然道：有此加饷，军心可望复固，但望滇、桂两省能源源接济，不至食言为好？

唐景崧曰：滇、桂有一日接济，则尔用一日之力，无接济，则不能禁尔不退。

刘永福道：既然如此，明日可与尔同去踏看地势，先

定扎营之处，俟十月水落，山城可以无虑，即全军仍发河内，以图进取。

然而，唐景崧事后一想，终觉得不放心，于是又秘密走访黑旗军诸将了解情况，他在给徐延旭的报告中，只提到走访连美的情况："退后访诸璧峰，始知近日军心散乱，实由渊亭之过。疑昨夕忽有退兴化之议，谓退兴化即退保胜也。其中委曲，一言难尽，非亲晤两帅不能再述而细商之。"其实，唐景崧这份意思含糊的报告中有许多话不便直说，从次日的情况推断，可能唐景崧在走访连美之后，还串连了黄守忠，并密谋如刘永福战意不坚，力主退军的话，即由黄守忠挺身而出发动一次小型政变取代刘永福，指挥黑旗军留驻山西抗法。而黄守忠此举将会造成什么后果，是刘永福因而改变态度，坚持留在山西抗法？抑或是黄守忠顺利地取代刘永福，取得黑旗军的指挥权？最可怕的是因之而造成两人的流血火并，互有死伤，从而使已经混乱的形势更加混乱到不可收拾，甚至导致黑旗军的瓦解。由于不能预料事态的发展，所以唐景崧的报告也就欲言又止，含含糊糊，只说"明日观其动静再为续达"①。

关于黄守忠要求取代刘永福的经过，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请缨日记》称是黄守忠自己去和刘永福交涉，唐景崧不在场。黄守忠造渊亭请曰："提督退保胜，则全军付末将代守山西，有功提督居之，罪归末将。"渊亭大惊，诘曰："谁代汝划此策者？得毋唐公言？"乃不敢再言退②。

在唐景崧八月二十日给徐延旭的报告中，则对自己是否在

① 《中法战争》(2)，第312～313页。
② 《中法战争》(2)，第92页。

场含糊其词：刘永福次日忽又中变，无非首鼠两端，以致将士哗然，纷纷无主，一日之间，势将瓦散，为之再三约住，密与图谋。前营黄守忠乃慷慨直陈于永福，谓："尔退则让吾为之！粤军一日不退北宁，则黑旗一日不退山西，事不成有死而已，何谓退乎？国王自弃其土地人民，吾为守土，将来事定或仍归之，不然则率而献于天朝，何谓之僭！"于是诸将鼓舞愿从。永福见如此情形，又恐一朝失势，五内徘徊[1]。这里所述黄守忠的说辞完全是照搬唐景崧的意思，这也可见唐景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八月二十六日（26日），徐延旭有函给倪文蔚，其中提到黄守忠是和唐景崧一起去说刘永福的："黄守忠同唐主事劝永福，永福仍属迟疑，黄守忠拍案大叫：永福汝不敢为，我黄守忠当继起为之。永福为之色动。"[2] 以上三段记载虽然稍有异同，但都说明一件事：当刘永福抗法信心发生动摇时，唐景崧或亲自出面，或背后出谋划策，欲由黄守忠取代刘永福。这件事当时虽然没有酿成什么大变故，但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却是促使黑旗军发生内部分裂，从而严重削弱黑旗军战斗力的重大事情。

其实刘永福的惊慌动摇只是在严重形势下的一时失态，他很快就从慌乱中镇定下来。九月初七日（10月7日），黄桂兰向两广总督张树声报告："永福现已修整戈矛，准备御敌。日昨复致书法兵头约日会战，如其不来，拟即进剿河内。"函中所附战书称：

① 《中法战争》(2)，第314～315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34页。

越南三宣提督军务刘，致书富浪沙兵头，为约战事：尔富浪沙无礼无义，天怒人怨，自与本提督交战以来，一败于纸桥，再败于怀德，三败于丹凤，折将损兵，不可悉数，尔辈各自明白，不待本提督之扬其丑也。尔辈乃无可奈何，乃往攻我顺化，胁我君臣，勒逼议和。其条约如何，本提军一概不知，亦一概不管，惟闻有逐我黑旗出北圻境外之语，不禁哑然一笑也。前因我将士连番苦战，暂憩山西，兼旬以来，战志各不可遏。现本提督安坐省城，待尔来逐，限自致书之日起，五日以内，尔即率大兵来省会战，以决雌雄。尔不敢来，我军即要逐尔，指日进剿。本提督一军进止，独断独行，非他人所得怂恿，亦非他人所得阻挠。言出必行，决无虚假。如尔等有胆有力，即来决战，若往欺我富春，乃是下等伎俩，五尺童子，亦且羞之，窃不愿损尔富浪沙之名也。此约。①

据说，在这段时间里，中外曾传说法军向刘永福招降，《中法战争资料》上收有《法官招降刘提督书》，文称：

大法国北圻吏部尚书兼掌通国正事务生，词与黑旗大将刘提督知悉：我大法国既与提党相攻，是天命不顺乎提，而胡不顺承天命？提若善推，则今何向而保永后大利？我大法虽击提党，而亦惜提是聪明智勇之将，提兵亦是勇悍之兵，纵使归我大法，则得为大臣、名望及盛利诸事。若仍前与大法拒逆，则不惟失其名职各款，而欲设立屯垒，据险以守，抑或逃去山林，潜回清国，无可得也。本职本为天下惜才，经禀大法元帅大臣，咱（越南字，即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52～1353页。

听字)，许本职谕提来降，则准许提一大权与才相称，毋有吝爵。而我大法国官与提团同心，毋将作逆是好。如提欲情愿如何，即宜词来本职知照；抑欲本职派人将通行札文毋致阻碍者，亦即词回，俾提得遇我大法官相与商办大事可也。

对于法国侵略者的胡言乱语，刘永福复以拒降书，给予义正辞严的驳斥，表达了毫不妥协的抗法决心：

越南国三宣提督义良男刘致书法国吏部尚书生知悉：大凡为国之道，必须上顺天理，下顺人情，方能长治久安，各保疆土。我越南并未失礼，尔法国无故相侵，本爵提督以一旅之师，与尔鏖战多年，尔之损兵折将亦已多矣，越南之民遭罹兵刃亦甚苦矣。是兵端之始，祸在尔，天怒人怨，必有所归，若果再不知悔，必为天下之所不宥矣。尔国纵欲逞忿，借国债，雇黑奴，逆天行事，希图报复。然尔占水我占山，我有无穷之饷源，尔无久支之兵费，尔纵设立码头，我必频年兴兵，杀尔人，焚尔居，扰尔商政，使尔不得安枕，虽有红江之利，尔法国岂得久享哉?

今尔尚书深知天理不可强违，念我越南民人久遭涂炭，欲与本爵提督议和，其意甚善。然本爵提督大清国广西省人也，父母之邦不可背；又越南极品元戎也，知遇之恩不可忘。尔尚书若以息兵保民，各国仍归和好为言，本爵提督敢不相听?倘如来书以大权盛利相诱，欲陷本爵提督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本爵提督心如金石，岂为尔所动摇！况高爵厚禄，大权盛誉，本爵提督之所固有，又何赖于尔国耶！今尔尚书果欲真意讲知，望即将各

国如何利益之处，据实言明，以待本爵提督奏请大清国、越南国，同派钦差一同会议，以其永遵无弊，得以长久相安，使海外各国皆知本爵提督暨尔尚书大公无私之本意，岂不美哉！倘再恃强逞凶报，执迷不悟，尔兵头必有安邺、李威利之祸，悔之晚矣。①

真正使刘永福在困难中感到支持和鼓舞的，是清政府完全改变了对他和黑旗军的态度。

原来，法国茹费理内阁上台后，改派德理固（亦译脱利古）取代宝海来华与清政府谈判。德理固态度横蛮，气焰嚣张，在五月初四日（6月8日）便代表法国提出：中国“若欲稍侵甲戌年约之权利，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遭到了中国的坚决驳斥，“执论中国不认同治十三年法安所立和约”②，双方不欢而散。七月，法军攻下顺化，越南投降法国，签订《法越顺化条约》，完全割断了长期存在的中越传统宗藩关系。八月，德理固再次来华与中国谈判，他宣称法国要占据全越，逼迫中国承认法越新约，撤回入越清军，停止援助刘永福抗法。

清政府不顾李鸿章的阻挠，坚决拒绝法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胁越之约断不认”。而且不撤回入越清军，不停止援刘抗法，即使为此与法国开战也在所不惜。九月三十日（10月30日）有旨：“法人既与越南立约，必将以驱逐刘团为名，专力于北圻。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现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

① 《中法战争》(1)，第314～316页。
② 《中法战争》(4)，第51页。

为天下各国所共知。今乃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倘竟侵及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①

既然准备对法开战，当然要重视黑旗军的作用，于是，清政府一改过去对黑旗军支持不明确不坚决的做法。为此，清政府传旨严行申饬擅将滇军从前敌退扎、对黑旗军支持不力的云南督抚，接着，又将未奉谕旨即率行回省的新任云南巡抚唐炯革职留营。继八月初四日赏给唐景崧四品衔后，九月二十二日(22 日)，还有旨奖赏刘永福、唐景崧：“刘永福矢志效忠，奋勇可嘉，著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唐景崧多方激励，亦甚得力，如能将河内攻拔，保全北圻门户，定当破格施恩，以奖劳勩。”② 而在此之前，岑毓英于九月十九日（19 日）奏称：前拟暗助刘永福军饷，已按月给银五千两作为三营饷需，尚有军装暨先后助之赏号二万金在外。同日，徐延旭也上《密陈力保北圻就近筹办折》，亦称：（黑旗军）所部饷银每月实需五千两，臣与黄桂兰等往返函商，禀经抚臣核准，此后月饷由臣行营酌量发给，使无缺乏。

按说，清政府改变态度，完全支持刘永福抗法，对抗法将士来说应该是一件大喜事。因为饷匮械乏，遭受内外煎迫的黑旗军，在抗法斗争中，时刻都渴望得到祖国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但滇桂两省的援越清军，受到“不得衅自我开”的朝命束缚，以致在气焰嚣张的法国侵略者面前，藏头收尾，缩手缩脚，无所作为。现在，清政府明令援越清军可以与法开战，并一次赏给黑旗军十万两银，这将是多么大的鼓舞和支持呀！

① 《中法战争》(5)，第 223 页。
② 《中法战争》(5)，第 98 页。

可惜，清政府这时才彻底改变对法态度，时机已是太迟，以致被各种不利因素所抵销，而作用大大减弱。

一是援越清军师老兵疲，锐气全无。广西防军自光绪四、五年随冯子材入越追剿李扬才，光绪六年为张树声奏留驻越防边，至光绪九年已逾五年。既适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又富于山地作战经验，是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但长期来没有冯子材这样得力的将领的指挥，又拘守北宁一隅，无所事事，兵民混居，致有娶妇生子情事，弄得兵不兵、民不民的，哪里还有什么斗志。云南边军则出关较迟，不适应当地的水土气候，以至疾病死亡相继，加以又有仓促退兵之举，锐气受挫，战斗力也大大减低。

二是黑旗军因唐景崧的捣鬼，造成刘永福与黄守忠的矛盾激化，分裂在即，战斗力已大大下降。

三是广西文武出于妒忌心理，不满清政府的明令褒奖刘永福和唐景崧，反而多方刁难刘永福和唐景崧，给他们的抗法事业制造困难。

当刘永福外受法国侵略者的进攻，内遭叛变投降的越南政府抛弃，清政府态度又十分冷淡，因而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广西关外文武大员因职责所关，倒是愿意以施主恩人的身份去资助刘永福，既可使刘永福感恩戴德，又可敷衍清政府，归功自己。徐延旭曾有函告人："刘团迭胜，原非其力所能为，专恃我军相助。且刘永福本系我逋逃匪犯，今不加诛而助之功成以自保，实已喜出望外。"① 可是，清政府的煌煌谕旨却表明刘永福并不是他们所想象中的那种卑微可怜的人物，而是简在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413页。

帝心的抗法功臣。广西应允助给的1000～5000两银子，和清政府一次就赏给的十万两银子相比，非但微不足道，而且反衬出广西关外文武大员不识大体乃至伪善。唐景崧赴越未及一年，即得褒奖，而桂军入越四五年，却从未获如此殊荣，这些事情都使广西关外文武大员感到难堪。因此，他们很快就改变以往支持刘永福和唐景崧的做法，反而处处给他们设置障碍和制造困难。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扣留朝廷赏给黑旗军的10万两银。清政府曾指示广西，恐协饷迟缓，可先由广西藩库提出10万两拨给。留守省城的倪文蔚遵旨照办，即将广东解到协饷10.5万两悉数解往关外，奏明由徐延旭陆续发给刘永福。但徐延旭得到这笔款后，却"不肯遽付"给急盼10万赏银募勇购械的刘永福，以至山西战前，"十万赏银分毫未解"[①]。延至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六日（5月10日），徐延旭奏称：先后发过银二万八千三百八十两，准备续发八千两。六月初十日（7月31日）岑毓英向清政府报称："前月据刘永福面禀，蒙恩赏由广西拨给之项，尚未领获银六万数千两，路阻难领，请酌量垫发。"[②] 由此可见，这10万两赏银在被扣留的十个月中，只发给3万余两，从而使得本来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一笔巨款，变成一笔笔零碎的小款，作用大大打了折扣。

二是截留拨助黑旗军的枪炮弹药。广西负有资助黑旗军的任务，北宁战役之前，赵沃曾奉命饬查北宁发给刘团的枪炮子药数目。据报在九、十月间，广西右路防军拨给快枪300枝，

① 《中法战争》(2)，第101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814页。

左路防军拨给200枝，另有抬枪200枝，弹药则丝毫没拨，这些枪"皆天津解粤之笨枪，药弹多不著火"。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唐景崧认为是由于赵沃搞鬼："赵庆池又忌余与渊亭独蒙奖谕，遂不肯接济军火；凡晓帅由谅山解往山西者，皆为北宁截留。"这样一来，急需枪械弹药的黑旗军就从广西方面得不到多少帮助。

三是拒绝派兵援助黑旗军。早在七月间，徐延旭曾上奏清政府，准备从黄桂兰所率右路清军中，拨四营归唐景崧节制，以助黑旗军守山西。九月初，唐景崧从山西返北宁领军，"在北宁，接统四营，管带官黄云高卓轩、尚国瑞鼎臣、贾文贵彬臣、李应章文斋，曰新四营，并武炜一营，又命朱冰清成一营曰武炜副营，共六营"，并拟在十月初先带新四营中的两营赴山西。但是，清政府九月二十二日的奖励谕旨下达后，广西防军两统领都反对唐景崧率带所统桂军前往山西，唐景崧经过力争，才被允带一营前往。《请缨日记》记称："余拟十月初往山西带两营，赵庆池尼之，谓山西乃云南门户，桂军宜驻北宁。黄军门亦悔拨余四营，拟以两营归余发饷，而四营仍受渠节制。然渊亭屡求助兵，今自统四营全不往，将疑我。不得已，带贾文贵半营、李应章半营"，共一营前往山西，"实则权仍不属，勇且不足，军火不备。"① 后经唐景崧再次请求，才于十一月再拨给李应章半营。但"余一营有半，不及五百人"。此外，唐景崧曾向黄桂兰划策，"请统八营赴山西，会合刘团下击河内，而庆池不肯独守北宁，计亦不行"②。而作为回报，

① 《中法战争》(2)，第97～98页。
② 《中法战争》(2)，第98页。

是黄、赵两人反于十月间将原留驻山西的桂军三营撤回北宁。山西之役时，刘永福和唐景崧曾向北宁乞军，但黄、赵二人无动于衷，仅轻描淡写地报告徐延旭："鄙意刘军但能力拒两日，彼族当自气馁，我军在此，复以游兵扰其后路，则亦可分敌势也。"[①] 实际上是见死不救。

由于广西方面的刁难，从八月初丹凤之役到十一月中山西之役的三个半月中，刘永福所争取到的援助计有：饷银方面，云南拨给两个月助饷1万两。军火方面，除广西拨给的500笨枪外，又从唐景崧处得枪120枝。十一月，"渊亭购粤商运到洋枪四百杆"，但未提到弹药事。人员方面，除已编成的武烈、武炜正、副营共三营外，刘永福曾派员回国招募新勇，十一月已有1000人到营，编为七星四营，由刘荣瑁管带，但既乏枪械，又未训练，战斗力可想而知。清军来援者，除唐景崧所率一营半不足500人外，山西之役前夕，唐景崧函恳滇军三营来援，约共1000人。总的说来，是枪械约增加1000枝，人员则增近3000人，情况有所改善。只可惜枪不甚精，弹药又乏，3000增兵中约有1000人为新募，无甚战斗力，因而改善又很有限，不足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恶战。

10月25日，孤拔受任为东京远征总司令。12月初，又接到新的援军，从而使他掌握的兵力约增至9000人，而且装备着新式的洋炮。孤拔认为对黑旗军发动攻击的时机成熟了，他决定先攻击黑旗军的大本营——山西，然后再扫荡其他地方。12月11日，他带领3艘战舰、10余艘炮艇、40余只民船，运载步兵、炮兵、海军陆战队士兵6000余人，分两路进发，

① 《中法战争》(2)，第358页。

于13日从漯江口登陆，杀气腾腾地向山西逼近。守卫山西的黑旗军、滇军、桂军的总数虽也近6000人，但除其中1000余人为新募，既未训练，亦无枪械外，余下4000余人，只装备了少量的新式洋枪，其余多为旧式的前膛枪、噏枪、抬枪等窳劣枪枝，仅有的一些大炮皆为笨铁铸成，最大的不过800斤，连唐景崧这样的书生也认为是些无用之物。与法军相比较，强弱十分悬殊，但刘永福仍决定在山西迎击法军，于是黑旗军与法军之间最惨烈的一战——山西之战爆发了。

按照以往的惯例，一次战斗之后，刘永福都会有关于战事的报告呈递给各个方面。然而，目前我们却未能从中文档案中找到刘永福的报告。《历史草》虽提及此事，但记载十分简单空泛。倒是唐景崧当时正在军中，事后在《请缨日记》中有较详细记载，但由于他并未亲自指挥战事，对其中胜负成败的关键仍说不清楚。法方资料则有亲自指挥这次战役的孤拔于1884年1月19日向海军殖民部所作战斗报告，及法人斯各特的《一八八四年法国进军越南记》、法人毕乐的《山西、北宁、兴化诸役》等。综合中法双方的记载，山西之役的经过如下：

山西的城墙分为内外两层，内城是一座四周砌有高达5米的砖墙，纵横均为300米的四方城郭，城墙上插满交叉相系的竹桩，这些竹桩向外突出约2米宽，可以阻挡敌人登城。城墙上部宽约10米，上面架设着一座炮台和守军的掩体。城郭四面的中间各有一座砖砌大桥横跨在护城壕上，并通向半圆形箭楼的正中，大桥入口处有一扇竹制大门把关，另有一扇木制大门通过半圆形箭楼和城郭，城郭东门已用砖封闭。城郭四周围有一条宽约20米、深3米（其中有1米注满泥水）的护城河，护城河与城郭之间又有一条8米宽的土道，河的坡面极其陡

峭，并且用砖石砌成。在城郭内，有一座高达 18 米的塔楼耸立其中，俯瞰着远处的景物。

城郭四周即是城厢，系由四排砖房或柴泥土屋构成，这些房屋坐落在通往外城四门的道路两旁。外城四门全用大块砖石砌成，东西两门均已用泥土封闭，南北两门则可开启。城门之间有一道防御工事沟通，系由一堵高 4～5 米的土墙构成，墙上挖有炮眼或雉堞，其上用木块或柴排覆盖，使城上守军可以在开枪施炮时掩蔽。女墙周围开有一条宽 5 米的壕沟，沟中注满从附近小河流入的河水。壕沟上有一层用未经修剪的干茅竹构成的鹿寨。在壕沟和女墙之间还有一道 3～4 米宽的坡径，其上密密麻麻地盖有一层高达 8～10 米的青竹，把整座城市完全掩盖起来，使外人无法窥见，这层竹篱在密集的火力下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外城的西门已被封死。但在门南 40 米处，却从竹篱丛中开出一条 1 米宽的通道，直达城堡脚下。通道的入口处筑有一道圆柱形围桩，围桩本身也用一扇木门关闭。城外有一条大路通向西门，并且绕过壕沟直达围桩的木门，因此，首先必须通过这道木门才能经过从竹篱丛中辟出的小径鱼贯地进入外城。北门、南门与东门均筑起圆柱形围桩来保护，各城门的四周及顶上均布满零散的防御设施以及木桩、铁蒺藜和竹篱。

在城外，到处都是村庄和庙宇，村与庙前都用竹丛构成的绿篱和土墙防护，土墙上还开有枪眼，护卫着外城的四周。因为城北离江只有 5 里远，城东是法军来路，两处都被黑旗军列为防守重点。除沿江扎竹排拦江外，又在河堤上架炮以狙击法舰，从江边至北门外，并筑有竹栅栏五处以御敌。其中由黄守忠率前营暨吴凤典左营驻扎东门外，派连美、朱冰清带武炜

正、副两营扎东门口为先锋营；派韩再勋右营、胡昆山武烈营、刘荣珊七星四营，并李应章一营共七营扎北门外；南门外有李唐一营及贾文贵半营；西门外有滇军三营，唐景崧带亲兵驻内城，刘永福带亲兵驻外城，黄佐炎等率 2000 越南官军驻南门外村中。

十一月十四日（12 月 13 日）早晨约 9 时，法军开始从北门外的河堤发动攻击。他们先用舰炮轰击城郊及城寨，并集中哈乞开斯枪火力射击设防的河堤，然后由陆军登陆进攻。但在守军的迎头痛击下，即使有炮火支援，法军仍寸步难行，以至最后只得停止进攻，就地布防。这时，刘永福命令黄守忠、吴凤典、朱冰清等营由东门抄人北门敌后。这支援军巧妙地利用当地的掩护物，没有受对方注意地向前推进。他们的迂回动作是聪明地设计出来的：他们行进在法军及舰队中间，所以舰队不敢向他们开炮。他们从左侧攻击法军，欲将法军驱逐到一个狭窄的漏斗形地带，法军在那里将无法躲闪地不断受到黑旗军工事的射击。黑旗军的这种战术使得法军十分惊慌，以致一些军官认为一切都完了，而被胁迫来当夫的安南苦力和仆役则趁机成群结队地逃走了。孤拔见势不妙，慌忙调集所有的大炮到他身边，当黑旗军冲进到 300 码以内时，才应以成排的开花炮弹和排枪子弹，这才遏止了黑旗军的攻势，迫使黄守忠等后退。事后，刘永福曾怒责黄守忠执行包抄战术不力。下午 4 时，喘过气来的法军再次发动进攻，他们在洋枪洋炮的密集火力掩护下，尽量掩蔽着前进，但仍被以竹栅栏作掩护的守军的致命枪弹击中，大片大片地倒下。一位曾经参加过普法战争的军官认为他在那里也没有受到这样猛烈的射击。鏖战至五时，法军才凭借自己的优势火力和人力，以死伤 200 名士兵、22

名军官的代价占据了河堤。当晚，唐景崧鼓励滇军和桂军出去夺回河堤。战斗像日间一样激烈地进行了 4 小时，法军死伤 25 人，两位高级军官被击毙，清军也死伤了六七十人，但始终没能夺回河堤。

第二天，刘永福将防线收缩，调全军人城布防，分守四门，并请唐景崧飞函北宁派兵来援。黄桂兰、赵沃闻报，仅派提督陈德朝带队于山西、北宁适中之地列阵逡巡，黄桂兰自督各营往攻新河、慈山，却无一兵一卒到山西赴援。所幸法军在这天忙于掩埋死尸，救护伤员，也没有发动攻击。

第三天黎明，法军两次发动猛烈进攻，黑旗军顽强抵抗。当法军以重大伤亡为代价，在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冲近城边时，黑旗军战士又用竹筒装满炸药掷向敌人，法军躲闪不及，大批倒下，最后，法军丢下 60 多具尸首退了下去。

虽然法军的攻势被打退了，但黑旗军也竭尽全力，内无饷械，外无救兵，“城万难守”。结果便发生了那件谜一样的事情：守城的黑旗军除留下少量掩护部队后，主力全部撤出山西城。等到法军在太阳落山，重新发动进攻时，遭到的只是掩护部队的拼死抵抗，经过半个钟点的激战，优势的法军占领了山西城。后来，法军在打扫战场时，只找到 250 具黑旗军阵亡将士的尸首和 50 个伤员。法军的死伤总数则为 411 人。孤拔的报告谓仅死伤约 170 人，则可能统计不完全。

关于黑旗军从山西撤退的情形，事后众说纷纭。《历史草》认为是由于清军首先败走，从而牵动黑旗军也被迫撤退：法军冒死排山倒海拥近城边，黄军管带贾文贵，见了番人早已心怯三分，今见其势大烈，即先由西门出走。自贾营先逃，黄、岑两军人马，随尾纷纷逃遁一空，往兴化而去。唐景崧时在山西

城内，看看不是头路，亦走出城去了。刘永福等见孤自一军，法军又占了主动，先挫锐气，亦拔全队上兴化[①]。

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7日），徐延旭上奏清政府，根据探报认为是由于越南官军的阵前倒戈酿成了山西之败：当激战之时，法军"暗用教民导至南门内，南兵齐换白衣，倒戈相向，唐景崧与刘永福等犹押队巷战。无如军民纷纷溃乱，南官黄佐炎首先出城，阮廷润继之，于是刘永福及滇、粤各军带队血战，与唐景崧等冲出围城等语"[②]。十一月二十六日（25日），唐炯也有类似报告。

但也有记载表明，山西之退是黑旗军自己的主动撤退。如唐景崧事后为刘永福起草致法军的战书称："十五日战于城下，本提督凭堞而观，见尔法兵尸横遍野，触目惊心，遂饬将士而谓之曰：法兰西海外最强之国也，此次再败，颜面何存？今宜姑让此城，俾占一线便宜，而饶群鬼之性命，未尝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于是督率全军退驻兴化。"[③] 考虑到这封战书是送给刚在山西交过手的孤拔，同是当事人，如无丝毫事实的影子，恐亦难以写出此语。光绪十年九月初二日（10月20日），刘永福因获授记名提督而叩谢天恩时，也说："因军火缺乏退守山西。"[④]

唐景崧当时也在山西，亲临战事，他在《请缨日记》中，记载作战经过称：

法兵轮十二艘、民船四十艘，载一月粮，陆兵三千余

---

① 《中法战争》(1)，第271页。
② 《中法战争》(5)，第274页。
③ 《中法战争》(1)，第309页。
④ 《岑襄勤公（毓英）遗集》，卷二二，第14页。

人，弹药车五百辆，进薄山西。渊亭重扼陆路，派黄守忠全部暨吴凤典左营扎东门外，派连美、朱冰清带武炜正副两营扎东门口为先锋营，派韩再勋右营、胡昆山武烈营、刘荣瑂七星四营，并余李应章一营，共七营扎北门外。南门外则李唐一营及余部贾文贵半营，西门外则滇军新到三营也。余带亲兵八十人驻内城，渊亭驻外城，外城筑土为墙，周二十里，廛市在焉。黄佐炎、梁辉懿带兵二千驻南门外村中。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14 日），法兵由东北角陆路击北门营，七营迎敌。余与渊亭观战于东城堞下，法船桅炮悬击城中，炸弹屡过左右，下巡廛市，谕民无惊。旋内城，与芷庵、汉甫、琴石登台观战，历历在目。法兵已却，退据一村。七星营搴旗直进，法枪自村击出，烟焰漫空。李应章军在敌所据村对面一庙，滚枪环击，我军大势得手。方余之在东城也，渊亭传令黄守忠、吴凤典、朱冰清由东抄入北门敌后。至是凝望抄兵，不见旗影，而李应章遣弁至，献馘七级。甫降望台，忽报黑旗兵败入城。城未闭，法兵已夺头栅。余急徒步至北门押队复战，并调贾文贵带队过北助李应章。滇军在西列队，未战已退，亟以契箭调扼北门，夺回头栅，军心略定，而七营之地均为敌有，并夺据河堤炮台。

渊亭詈将士不已，询其所以至挫，渊亭则詈官军先遁，官军则咎刘荣瑂之七星营。实则堤下炮台先为敌碎，一弹入炮口，炮裂，军声一哗，各仓皇走，敌遂乘之而据我军垒，抢登河堤矣。河堤高与城齐，又紧接北门市栅，我军不得出路，渊亭责守忠包抄，何以不至。则称溪阻绕行，及闻我军败，遂折回耳。渊亭怒不可遏，独命右营出

扼市栅。枪声断绝，若缓若紧。

二鼓，余坐城下，召李应章、贾文贵、张永清曰：刘提督此际难与言，我等何计夺回此堤？三将曰：惟再战耳！余曰：浪战无益，宜出敌不意袭夺之。众曰：诺！乃悬重赏，挑死士，首登者准保守备花翎，约定四鼓进兵。旋内城，命亲兵具粥食士。坐不安席，入市巡视居民。四鼓，张永清带队直冲，李应章、贾文贵带队横冲，堤虏乱枪齐举，我军三进三却。越南稀见月色，是夜独明如昼，照见须眉，不能暗袭。张永清部下死六七十人，终不能夺堤。五鼓，渊亭入内城问计，商乞北宁军，并议分守四城。

十六日（15 日），辰刻，参赞梁辉懿来见，议恳援于北宁。余知北宁必不来援，而不得不徇其请，飞函黄、赵，仅调余所部黄云高、尚国瑞两营而已。下令闭外四城，禁民外徙，恐乱军心，无如越主我客，条令格格不入，教民混杂其中，无从辨其良莠。渊亭调全军入城，独七营在东门外，滇军及余所部纷请恤赏，倾囊付之。余是时无权、无饷、无兵、无军火，而众军仰于一人；拥虚名而无实际，身处危城，真无可奈何也。三鼓，巡阅四城，城薄不能支帐，堞多兵少，罅漏特多。环城植竹，视外不能明，闻风声疑寇在左右，乃知竹林不可为城也。至北门，与渊亭坐堞下窥，法兵露坐堤上，悄寂无声。五鼓归寓，不眠者两夕矣，明知城万难守，援必不来，而不敢稍露去志，惟暗检日记信札付仆僮密藏。

十七日（16 日）。黎明，法兵攻北门，我军力拒，轰毙无数。火包下掷，竹根为焚，敌尸纵横城下，稍却。辰

刻，又攻，而轮桅击炮碎铁满城，妇稚惊哭。敌又悬巨炮于西门古刹，更番轰击。巳刻，枪炮略息，黄佐炎由南门入见，忧惧无人色。午刻，枪炮复震，细弹雨落，洒遍内城，余寓左右炮弹着地开花，不知所避，厨下盂盘粉碎，满空鸱鸣。派差官持令箭督战。芷庵、琴石走探消息。未刻，攻愈紧。贾文贵在北门告弹竭，瞠视无以继之。莫矜智守西门，炮最烈，城崩楼毁，军无立地，驰骑请派锄夫四十人筑地营。仓皇得十六人，负锄往。阮廷润邀余坐城根避弹。申刻，西门急甚，再派差官督战，忽报黑旗俱下城，寇已入城。急旋寓，戒左右勿动。亲立南门，问刘提督何在。无应者，惟见兵民蚁窜，而枪声已息，南城越兵骤然大炮，改着白衣。知事不可为，乃乘马率亲兵八十人，差官数人等出城。[①]

迫使黑旗军放弃山西的原因，一是内无弹药，外无援兵，法军进城后，发现“军火库差不多是空了”。孤拔报告称缴获黑旗军大小炮一百余门，各式子弹二十余万发，则可能夸大过甚。二是可能刘永福与黄守忠的矛盾加剧，以致不能再坚持作战下去。因为黄桂兰曾报告徐延旭：“窃查山西前月不守，并非兵力饷械不足，实缘军心不一，内应乘之，良深扼腕！”[②]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敌我对比强弱悬殊，再坚持下去，虽然能给法军一定的杀伤，但无法击退法军，山西最后还是会丢失，还不如在条件有利时，及时全师而退。

事后，滇、桂两省督抚于十二月十六日（1月13日）为

① 《中法战争》(2)，第102～104页。

② 《中法战争》(2)，第362页。

黑旗军出力阵亡将士奏请奖恤：

刘永福部下营哨各官皆籍隶两粤，或系文武诸生，或捐有佐杂职衔，虽戮力外藩，实欲扬名中国。近因迭次血战，越南不为主持，存者无升迁之赏，殁者无赠恤之荣，颇存觖望。刘永福不得已，将应奖恤诸人开单，呈由云南抚臣唐炯咨送岑毓英，转咨到臣，声请会衔具奏，并准调任抚臣倪文蔚咨同前由前来。臣查刘永福奋勇敢战，胆壮志坚，久为法夷所顾忌。本年率军拒敌，亲身陷阵，所部营官弁勇皆随之拼命直前，故能迭挫敌锋，而阵亡亦复不少。前月山西之役，子药用尽，势已不支，犹抵死督战，手刃数十人而出。现尚锐志图复山西，以报圣恩。是保护越南，即以捍卫边圉，虽立功藩服，无异效力天朝，亟应如诸臣所咨，奏恳鸿施，赏给奖恤，以励前劳而期后效。惟所拟请奖各项，稍觉过优，与部定章程多有不合，但现值用人之际，不能不仰求朝廷破格鼓励。兹谨分缮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单给予奖恤。并祈饬下部臣勿拘常例驳斥，速复施行，俾作士气而维人心，臣得借收臂指之用，于时局实有裨益。除立功勇目黄邦儒等九名由臣核给功牌，以把总拔补，咨部注册，并阵亡勇目邱日财等七十四名，每名发给恤银二十两，准其附祀龙州昭忠祠外，所有恳请奖恤刘军缘由，谨会同云贵督臣岑毓英、调任抚臣倪文蔚、云南抚臣唐炯合词恭折具奏，伏乞圣览训示。再，此系激励刘军之举，内地保案皆不得援以为例。如蒙俞允，并拟请饬下，毋庸发抄，合并声明，谨奏。

谨将刘团一军请奖文职衔名，备列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同知衔刘奇谦、黄棕盛。该二员办理营务，查探机宜，不避危险，均拟请以同知选用，并赏加知府衔。

补用盐大使韩再勋、布经历衔刘肇廷、州同衔黄金印、贡生李唐。该四员名管带水陆营勇，争先陷阵，出力异常。韩再勋等三员拟请以通判选用，并赏戴花翎，加五品衔。李唐拟请以府经历、县丞选用，并赏戴五品蓝翎。

贡生黄焕中、生员刘肇经、刘肇谟、六品衔梁茂林、监生刘肇章、文童刘成章、刘成业、刘肇棠。该八名或帮办营务，或筹解粮饷军火，不避艰辛。黄焕中、刘肇经均拟请以府经历、县丞选用，并赏戴蓝翎；刘肇谟拟请以府经历、县丞选用；梁茂林拟请以巡检选用；刘肇章等三名拟请以巡检选用，并赏戴蓝翎；刘肇棠拟请以主簿选用，并赏戴蓝翎。

谨将刘团一军请奖武职衔名缮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二品封职游击衔刘永福。该员督军打仗，每战必先，不避枪炮，屡建奇功，拟请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给勇号花翎。

补用参将连美、都司衔黄守忠、守备衔吴凤典、蓝翎补用守备张慎泰、蓝翎补用千总刘安南、六品军功黄宝珠、邓遇霖、胡昆山。该八员名带队督战，奋勇争先，极为得力。连美拟请以副将补用，并赏给勇号花翎；黄守忠拟请以游击补用，并赏给勇号花翎，吴凤典拟请以都司补用，并赏给勇号花翎；张慎泰拟请以都司补用，赏换花翎；刘安南拟请以守备补用，并赏换花翎，加都司衔；黄宝珠、邓遇霖、胡昆山均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蓝

翎。

都司刘积璠、都司衔卢玉珍、武生刘绥汉、六品军功陈鸿光、刘文谦、刘启元、廖发秀、刘肇荣、梁有才、吴凤新、苏瑞芳、刘秀均、韦高魁、张吉士、黄利贞、叶成林、吴士勋、刘善璿、何俊秀、刘开华、吴蔚文、练忠和、李德仁、黄云青。该二十四员名分带哨队，打仗奋勇。刘积璠拟请以游击补用；卢玉珍拟请以都司补用，并赏戴花翎；刘绥汉等二十二名均拟请以千总拔补，并赏戴蓝翎。

谨将刘团一军请恤衔名备缮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管带右营监生杨著恩。该监生每战勇往冲锋，四月在怀德接仗，已受炮伤，犹跃起放枪击毙五画兵头，实属奋不顾身。拟请赏给骑督尉世职，并入祀龙州昭忠祠。

哨弁何承文、陆天球、黄荣标、陈英茂、何正辉、邓仕吉、曾来福、黄有光。该八名遇敌敢战，因迭次打仗阵亡，均拟请赏给云骑尉世职，并入祀龙州昭忠祠。①

此件奏报到京后，光绪十年正月十六日（2月12日），军机处密寄上谕给徐延旭等称："刘永福一军，著岑毓英、徐延旭加以激励，令其速行进取。该军屡次血战，奋勇可嘉。前据张树声函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将出力阵亡各员分别奏请奖恤，经该衙门电复，兹据徐延旭开单奏请，著暂行存记，候旨施恩。"②

上述奏折写好后，徐延旭曾告知驻扎北宁的黄桂兰、赵沃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O，第26～28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一，第3页。

转知刘永福及黑旗军将士。十二月十六日，黄、赵二人报告徐延旭："奖恤刘团军中此次出力者，蒙恩入告，鼓励之机，莫捷于此。遵亦传谕军前，使知各有观感。"① 但是，后来却没有了下文。

据1884年1月8日的《申报》记称：

法兵于十一月十七日攻获桑台。从十五日开仗，相持两日夜，枪炮之声不绝，其兵船泊于红河，去桑台约三里之遥。法兵分两队，一队三千名由陆路进发，一队三千名由水路进，发开花炮轰击，弹丸雨落桑台，守兵伤毙无数。桑台外有三炮台，其两炮台乃阿兵及客兵奋勇，各以枪上之刀肉搏先登，据有其地，其一则黑旗自行退让。黑旗在桑台亦用炮相击，惟不甚得力。法兵既得三炮台，命阿兵及客兵两队为先驱，法兵自为后劲，死命相搏。故阿兵客兵被杀最多，有阿兵一队计一百五十名，其得免者仅四十五人而已。兵官等皆奋勇上前，元戎科烈亦亲冒炮火，驰突于枪林弹雨之中。而黑旗枪炮一似注意于兵官也者，故兵官死伤计有三十余人。……法兵官往攻桑台之时，初意不谓得之如此甚易，今见桑台易得，则又谓北宁当亦不难攻破。②

这是黑旗军与法军作战第一次遭到惨败，对于后来事态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打破了黑旗军乃至清军强悍能战的传说，提高了法军作战的信心和进攻的勇气，埋下后来法军攻打北宁及以后扩大对中国侵略的祸根。

① 《中法战争》(2)，第366页。
② 《申报》，第24册，第43页。

第五章

北宁之战

一　徐延旭出关督师

清政府在定策助刘抗法之始，原以为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与云南的河口仅一水之隔，双方联系便利，所以，便把助刘抗法的责任放在云南方面。早在光绪七年八月十二日（10 月 4 日），清政府就有旨：每年由四川拨给（云南）练军饷银 20 万两，谕令云贵总督刘长佑等将增军备边事宜妥为布置。光绪八年二月，又任命川东道唐炯为云南布政使。四月十二日（5 月 28 日），刘长佑等复奏，已饬候补道沈寿榕前赴临安，就地选募练军八营，以资调遣，另抽调练军四营，为移缓就急之计。同日，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荐福建巡抚岑毓英堪以筹办越事。五月初二日（6 月 17 日），清政府命刘长佑著饬令沈寿榕带兵出境，与广西官军联络声势，以剿办土匪为名、保护越南即所以屏蔽吾圉。初七日（22 日），又有旨命岑毓英署理云贵总督。七月二十四日（9 月 6 日），唐炯自昆明启行，由开化府马白汛出关，与沈寿榕会晤筹商。他并在一个叫木厂的地方与刘永福见面，给了刘永福一万两银子。但这时滇军由于不服水土，先后瘴故文武员弁 20 余员，兵练 240 余名，连沈寿榕也病死了，赴越助刘抗法的事情遂耽搁下来。光绪九年四月，云南当

局改饬参将张永清等挑带二营，驰往越南红水河、大滩及兴化省一带择要驻守。五月二十一日（6 月 24 日），清政府并命四川再拨银 20 万两给滇省作援越军费。但滇军行动迟缓，唐炯曾于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日（12 月 6 日）奏称：盖由新安所到越南山西，必须取道蛮耗，如由水路雇船顺流直下，但每船不过装运二十余人；如取道陆路，则计程二十余站，道路险恶，比到山西，兵勇必皆疲病。所以，滇军并没能起什么作用。清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点，就把助刘抗法的任务改放到广西方面来。

光绪九年二月十八日（3 月 26 日），李维业率领河内法兵攻占北圻另一重镇南定；四月十三日，黑旗军在河内纸桥力歼李维业。清政府从这一连串的事变中，预感北圻局势将日趋严重，需要认真对待。连连有旨指示滇、桂督抚：法人经此挫败，势必添兵报复，越兵能否久持，殊难逆料。着令滇、桂督抚督饬关外防军，挑选劲旅，扼要进扎。并特别强调指出："此次筹备各节，非从前事机尚缓可比，该督抚等务当悉心经划，实力整顿。"[①] 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援越桂军。包括：

1. 拨款。援越桂军于光绪七年十月出关防法，至光绪九年四月的一年半中，清政府并未拨给分毫经费。光绪九年三月初八日（4 月 14 日）有旨准滇、桂各省可以添兵入越，接旨后，三十日（5 月 6 日），倪文蔚奏请饬拨饷项以备增兵。四月底，清政府由四川拨给饷银八万两。清政府后来有旨提及此事称："现令户部查明，曾于九年四月奏拨四川盐厘银八万两，

① 《中法战争》(5)，第 143 页。

除已解外，尚欠银二万九千五百余两。”[1] 这是清政府拨给广西的第一笔防法经费。

第二笔防法经费在五月二十一日（6月25日）拨给。有旨著倪文蔚督同徐延旭选募边民之能耐炎瘴者迅速成营，与现有队伍于北宁一带分布扼守，所需饷项“著曾国荃、裕宽、崇光于粤海关税项内，即行拨解广西银十二万两，俾济要需”[2]。

第三笔款项于七月初一日（8月3日）拨给，有旨：“广西防务经徐延旭出关布置，尚属周密。惟粮饷军火需款甚多，前由四川及粤海关共拨银二十万两，尚恐不敷，著张树声、曾国荃、裕宽于广东应解京饷项下截留银二十万两，解交广西应用。”[3]

这三笔拨款共计40万两。

2. 济械，七月十一日（13日），署两广总督曾国荃函告清政府：因为广西咨请接济枪械，经饬善后总局将广东上年购存之快枪二千枝、子药袋二千副、枪码子二十万出、铜火箭三百枚，先行拨交委员解赴西省以应急需，于四月已陆续送赴关外应用。九月十三日（10月14日），张树声奏报《拨广西饷银军火数目片》称：拨给洋磺一万斤，另拨借士乃打后膛枪子十万颗[4]。

3. 授官。继二月授予徐延旭专折奏事的特权后，六月十九日（7月22日），广西提督冯子材因被言官张佩纶参劾，遂

---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一九二，第721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第32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第11页。
④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七，第13页。

告病去职。清政府以记名提督黄桂兰为广西提督①。当时，由于连年征战，在清朝的武将中，因功得授记名提督衔名的何止成百上千，而全国每省只有一名实缺提督，因此，只有极少数得补实缺，一般都屈尊低就总兵以下各职，乃至当一营的管带、帮带。而不走运的则一辈子都难补实缺，只得一个虚衔而已。黄桂兰在淮军中并无赫赫功和籍籍名，而得授实缺提督，实为异数。但八月初一日（9月1日）倪文蔚曾请示清政府，黄桂兰是否有与徐延旭会衔奏事之权时，却被清政府驳回了，可见其地位并不及徐延旭。

提高援越桂军将帅的地位，这表示清政府的重视态度，使得援越桂军将帅有职有权，可以比以前更加实际地筹备布防。

光绪九年四月十五日（5月21日），徐延旭、黄桂兰、赵沃三人在龙州相会，共同商酌，决定援越桂军日后的行动方针："以保守北宁为自固藩篱之至计，以暗助刘军为维系藩情之要着。"②

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1860年）进士，出知广西容县。因参与镇压浔州农民起义有功，累晋知府，在任时以善治盗著称。他在担任太平知府时，曾奉命接待越南贡使和勘查边境卡隘和道路，事后撰有《越南世系沿革》、《中越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等文，在当时算是了解越南情况的官员。在任梧州知府时，他曾资助过时在广西做官的鹿传霖。据说徐延旭后来的发迹与这两件事有关，徐宗干的《归庐谈往录》称："徐中丞延旭之抚广西也，由湖北襄郧荆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1563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917页。

道，不逾两年，迁擢之速，震耀一时。盖徐尝辑《越南纪略》一书，张制军之洞于奏保人材时并以进呈，朝廷重之。其书体例糅杂，姑不深论，而于越南地势民风，政教禁令，率皆摭拾大略，如官府须知册子之类。至今昔沿革，损益利害，均未之考。惟中越边界各隘，历粤至滇，计有千八百里，详载无遗，尚足备览，然《广西通志》固有之矣。徐自言，任太平府时，款结贡使出关，抵一人家，雨，留数日，得抄册，纪载越事，携归，并采案牍，汇为是书，不意缘此致福耳。徐以咸丰庚申进士，即用知县至梧州知府，最为知名。梧州号称富区，税榷盈余，足供挥霍。徐极慷慨轻财，一时上下同僚，有求必获。鹿中丞传霖时亦以翰林致官，同在广西，公私积累，几不可收拾。徐先后资以万金，结为姻好，制府荐举，鹿盖与有力焉。"[①] 徐宗干的这段记载并不全部可信，例如张之洞荐举徐延旭时还只是山西巡抚，不应称为制府；张之洞几次荐举徐延旭而并未提及徐所撰书事。但这段记载所谓徐延旭因资助鹿传霖而得清流派好感之事，却很有参考价值，可惜我们并不能找到更可靠的材料来证明这种说法。

徐延旭发迹的真正经过是这样的：

光绪七年十月，清政府筹议抗法，其中便提及要加强援越桂军事。光绪八年正月，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上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指出：广西抚臣是文吏，不习边事，以为当以知兵大员代之，他极力举荐徐延旭可任广西边事："安襄郧荆道徐延旭久守梧州，屡出关治群盗，得交人心"，若以徐延旭

①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2)，第238页。

领粤西一军，则交人乐附[1]。清政府纳奏，在光绪八年正月，将徐延旭升为广西布政使。然而，他尚未赴任，因为李维业攻下河内，越南形势危急，清流派官员又轮番上奏，举荐徐延旭知兵，可胜任援越抗法重任。如光绪八年四月初十日（5月26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张佩纶联名上奏，建议"应饬徐延旭急引粤西现军出关，分别剿抚诸土匪，借以牵制法兵，抚定越地"[2]。四月二十日（6月5日），山西巡抚张之洞两次上奏举荐徐延旭："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正直强明，兼资文武。在粤有年，威惠及于僚属。任襄阳道数月，政绩已彰，才品俱优，洵堪大造。"[3]"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可统军出关。……尤宜假以事权，责成滇、粤督抚勿掣其肘。"[4]清政府纳奏，于五月十九日（7月4日）有旨给广西巡抚倪文蔚：该藩司到任后，"倘边务紧急，即著派令出关督办，以资得力"[5]。徐延旭因而成为广西边军的统帅。

光绪九年二月，李维业率法军攻陷南定，形势复趋紧张。二月二十三日（3月31日），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上奏，极力吹嘘徐延旭："徐延旭前在关外捕盗，甚得交人之心，以道员超擢藩司，朝廷所以驱策之者，本不在簿书之事。可否敕令出关治军，经划北圻，大修战备，与黄佐炎、刘永福联络声势，所有关外事宜，即令专奏，以归机速。如此，则粤西之军声稍振……以战则可胜，以守则可固，以和则可成矣。"[6]清政府

---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84页。
② 《中法战争》(5)，第106页。
③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卷四，第9页。
④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卷四，第11页。
⑤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第13页。
⑥ 《中法战争》(5)，第140页。

纳奏，二十五日（4月2日）有旨："藩司徐延旭于关外情形颇为熟悉，著即出关，相度机宜，豫筹布置，准其专折奏事。"[1] 一个刚刚到职的新任藩司就能专折奏事，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殊荣，这说明清政府对他的信任和重视。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清流派官员对徐延旭并不了解，对他的吹嘘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这个被捧为"知兵大员"的人实际上并不"知兵"，清政府选择他为援越桂军主帅，是继选择黄桂兰、赵沃统率广西边军之后犯的第三个错误。

徐延旭于三月二十日（4月26日）出关，五月初二日（6月6日）到达谅山。此后，徐延旭长期逗留在龙州和谅山等地，主持援越桂军的后勤事务，主要有：

1. 添募勇营。五月初二日，徐延旭到北宁视察军情。当时，援越桂军左右两路共17营7000人，其中右路5营分扎的防区各处，距离北宁尚远，只有左路12营布置在龙州至北宁一线。为了加强北宁兵力，徐延旭招募入越农民军余部1800人编为3营，派都司连美、副将党敏宣、县丞林寿棠等管带，又招水勇1200人编立3营，派千总李文遂、谢洪恩、卢祖牲管带；均归左路统领。另于左路抽挑奋勇400人，由守备贾文贵管带；右路抽挑奋勇400人，由都司田福志管带。以上新增8营，实添3000人，均于五月间陆续成军。

六月，徐延旭因需将右路各营调赴北宁设防，批准赵沃在太平、镇安两郡属边民中，择其朴实精悍、能耐烟瘴者挑补成军，共添五营，遴委副将党敏宣、王正明，都司谢洲，守备梁云翀、方金安分别管带，于七月出关。按桂军每营足额400人

---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第31页。

的营制，应增2000人。七月初三日（8月5日），倪文蔚奏报清政府：计左路原统12营拟加四营；右路原统五营，拟加七营，益以水师两营，合共新旧30营。黄桂兰与赵沃彼此商定，左路各军扼守涌球、宁城一带，右路各军扼守新河、慈山一带，各分疆界，以专责成，仍复互相应援，以壮声援。

从五月出关视师到九月，徐延旭先后为援越桂军添募调防约13营5000余人。

2. 添购枪炮弹药。在徐延旭出关前，倪文蔚已派广西候补盐大使凌彝铭赴广东采购军火，四月十八日（5月24日），他函告徐延旭："镜涵在东，已定购枪子百万颗。"[①] 徐延旭出关视军后，发现于北宁一带水陆布防，需要购置水雷、地雷，倪文蔚即于六月"去函托东省友人代购"，后来据说买到10架水雷。六月二十七日（7月30日），凌彝铭"又禀商抚宪，函托东省再购六十万子弹"[②]。七月十六日（8月18日），倪文蔚奏报清政府："现又购得前膛洋枪一千五百枝，子药俱全，均由水陆先后派员督解前赴防营。"

与此同时，据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0月16日）彭玉麟等奏称：前招商局候选道唐廷庚，以越南招商局为法人所毁，捐办德国克鹿卜后膛炮6尊，炮子960颗；英国皮利后膛枪200枝，枪子10万颗；法国来福前膛枪1160枝，美国士兵令马枪500枝，四开金底铜帽100万颗，报效广西军火，经西省委员赴沪由海道运至东省。据禀炮身太重，梧浔以上滩河水浅，转运艰难，出关山路崎岖，炮车亦不能行，当经两广总督

① 《中法战争》(2)，第261页。
② 《中法战争》(2)，第269页。

张树声商明西抚倪文蔚，将炮六尊留东配用，其余枪械均运至梧州，转运关外[①]。这批枪械大概于光绪九年底运到前敌应用。

八月十一日（9 月 11 日），广西按察使国英报告徐延旭：又有彭香九观察解到抬枪百枝，子药逾万，外有铜帽二百盒。

自五月出关至八月间，徐延旭千方百计，设法购到约 3500 枝枪，加上广东拨给的 2000 枝，共约 5000 余枝运送前敌。

3. 初步布防。徐延旭出关前，援越桂军右路各营正在高平、太原、宣光一带搜拿农民军李亚生余伙，左路各营则分扎边内龙州、养利、宁明、上思州，外而谅山、北宁、太原等省所属，最远扎至北宁附近的涌球、安勇。五月初二日，徐延旭赴北宁视军，发现北宁在谅山东南 290 里，居河内之北，相距 70 里，中隔两小河，以北诸省类皆荒凉残破，我师已无立足之区，抑且烟户甚稀，粮草不给，即我沿边亦无扼要之处。因此，他认为要巩固广西边防必守北宁，于是将左军各营更扎近北宁城郊各处要点：派左军游击张金泰率先锋营，进扎北宁西北郊里许的土山，并分出哨队进驻北宁外城；调守备贾文贵管带新挑奋勇营 400 名，扼扎城西南二里许之克念总；调副将周炳林、守备叶逢春两营，助守北宁之北相去八里的月德江，配带水勇以助陆军防备水路，并派守备彭瑞华、陆桂枝各带两哨扎于北宁城北以通声气；加派都司田福志管带右路新挑奋勇 400 名进扎北宁、山西之间的浪泊湖北岸，以与山西各垒声息相通，便于应援；黄桂兰与赵沃则同驻北宁经理提调一切。唐

---

① 《中法战争》(5)，第 589 页。

景崧日记称："此次北宁设防自徐方伯始。"[1]

五月十四日（6月18日），徐延旭离开北宁入关，黄桂兰随与赵沃同赴新河、嘉林、涌球各处察看地势，并将防务略作调整：改派已升都司的叶逢春管带奋勇营驻扎嘉林，副将周炳林经营慈山一路，专顾新河；都司尚国瑞一营经营月德江一路，专顾涌球；总兵陈得贵、守备贾文贵两营分扎涌球左右河堤。并指示各营均沿堤开濠，于临河田基加筑丈厚土墙，或紧靠河堤，或横跨大路，参差交错，将路掘断，仅留屈曲一路，以便伏兵抵御。总使法兵不能登岸，而炮无所施，我或可以火箭、喷筒从旁遥射；又在附近土山高筑炮台，以便瞭望。黄桂兰、赵沃还将所有应驻重兵，应设炮位，或如何堵塞河道之处，详细函商徐延旭酌夺办理，并要求派营队充实防务。六月十二日（7月15日），黄桂兰、赵沃禀报徐延旭：现将慈山到河内大路，每数十丈挖壕筑洞，置炮安守，以逸待劳，如可安地雷之处，亦应安置，以备不虞。其涌球一路，亦应如是设险，以期固守，此北宁之地方可无虑也，又考虑将右路各营调往北宁助守。然而，当援越桂军正在忙于布防之时，却接连发生一些意外事情。

先是在七月间，越南北圻秋雨过多，江水盛涨，堤岸溃决，援越桂军的防务大受影响，"北宁亦大水，我军亦须挪移，道路隔绝"，这就当然谈不上继续布防了。秋雨过后，八月初，越南官员张登憻等告诉黄桂兰等，他们接到越南政府来咨，由于法军攻占顺安汛，威胁越都顺化，越南政府只得与法军议和，"该兵船皆已撤退，现无事矣"。越南政府态度的这种变

① 《中法战争》(2)，第80页。

化，使得援越桂军暂停布防，“布置事宜亦加收束”。以至黄桂兰担心这种无所作为将动摇军心：“恐老师糜饷，坐失机宜，终于边防无裨。且各军合居一处，驻守既无了期，意见断难如一，设或一朝有警，各将弁先存推让之心，其何以课成功专责任？此桂兰每一思及，所深隐虑者也。”① 其至连赵沃也向徐延旭提出：“固守亦未为善，究不如我两军仍以缉匪为名，退军于北宁之后，以免外露，或谅山、南关亦可。”徐延旭也萌生了退意，曾致函倪文蔚：“我师骤退固不可，我师久驻亦无味。”②

这种情况还影响了援越桂军对黑旗军的援助，早在五、六、七月间，援越桂军曾派右路奋勇田福志一营、黄忠立一营、左路奋勇黄云高一营到山西，为黑旗军助阵。八月初，又准备加派右路总兵陈德朝率领本部德字营，并前军左营左哨哨弁何有龙等部赴山西，就近谒商唐景崧、刘永福和衷协谋，相机因应，不用旗帜，不穿号衣参加黑旗军的对法作战。现在，“闻越都有与法人议和之信，事虽未甚确定，然亦实在意中。更虑南人狡诈，一旦与法和好，则一切推之我军，岂不代人任咎？现与赵道相商，拟将前派往相机因应之德字营陈总兵暂缓前去”。到九月，还将田福志、黄云高两营从山西撤回北宁。

大概在九月初，清政府得到曾纪泽报告他七月初六日（8月8日）与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会谈的情形：沙梅拉库气势汹汹威胁说：“华兵入越现已属实，法国须另筹办法。盖中国既助法国之敌，则中国亦为法之敌矣，若中国不退兵，法必与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444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274页。

中国交战也。"[①] 九月底，法国并悍然宣称，要夺踞山西、兴化、北宁三城。九月二十三日（10月23日），李鸿章向清政府报告，法军将进攻北宁。法国态度的陡然强硬，激起了清政府的极大反感，清政府针锋相对地于九月三十日（30日）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国公使，表示中国不能屈服于法方威胁，并指示徐延旭："北宁为我军驻防之所，如果法人前来攻逼，即着督饬官军，竭力捍御。"[②]

为了迎接即将来的战斗，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援越桂军的力量。

1. 将徐延旭擢升为广西巡抚。长期以来，清流派官员就不断建议清政府考虑撤换倪文蔚，改任徐延旭。光绪九年二月十三日（3月31日），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奏称："倪文蔚为人长于吏事，而战阵非所习，洋务非所习，边情非所习，殆吏才非将才也。……若量移内地，而别简知兵大员巡抚广西，庶中原得一贤抚，岩疆得一边材，亦两全之道也。"[③] 四月十八日（5月24日），他又再次上奏："应恳朝廷将倪文蔚酌调他省，责以吏治，而简知兵大员莅任粤西，冀收安边之效。"这个"知兵大员"是谁呢？张佩纶多次上奏竭力把徐延旭描绘为一个"知兵能员"，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其他清流派官员则与张佩纶相呼应，频频称誉徐延旭的"兵事边才"。四月初七日（13日），内阁学士周德润奏称："抚臣倪文蔚才略素短，朝廷以徐延旭权谋机警，洞悉边情，畀以兵事，洵属得人。"五月二十八日（7月2日），詹事府詹事洪钧上奏《倪文蔚、陈士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255页。
② 《中法战争》(5)，第223页。
③ 《中法战争》(5)，第140页。

杰难胜重任片》称：倪文蔚局量稍隘，恐于驾驭人材之道未甚相宜，至于应变决机，尤其所短。臣在南晤李鸿章与论各省疆吏，与臣言相同。七月二十九日（8月31日），翰林学院士陈宝琛奏称："徐延旭既得交趾人心，复明关外形势，如是独当一面，即宜畀以督师之权，授以方略，勿为牵制，以尽其长。"九月初一日（10月1日），内阁学士廖寿恒上奏《夷务机会可乘，请先发制人折》称：徐延旭驻兵龙州，气吞群丑，假以便宜行事，定能迅奏肤功。这些都是很露骨的暗示，清政府可能受到这些意见的影响，于九月初九日（9日）降旨："倪文蔚调补广东巡抚，徐延旭补授广西巡抚，张梦元补授广西布政使。现在边事日棘，徐延旭著即迅速出关，相机调度，用副委任。"① 这时，离徐延旭出关视军还不到半年，升迁之速，实为当时罕见。

2. 拨给巨款。九月十五日（15日）有旨：令户部截拨湖北应解京饷15万两，另由江西拨银5万两，湖北拨银5万两解交广西应用。至此，连前拨三笔拨款，合计清政府拨给广西的军费已有65万两。二十二日（22日），又有旨赏银10万两刘永福以助兵饷，先由广西藩库提给。这10万两虽然是指名拨给黑旗军的，但由于在此之前广西须负担黑旗军的部分饷需，因此，有了这笔拨款无疑就减轻了广西的负担。十月十三日（11月12日），倪文蔚曾兴奋地致函徐延旭："协济我军饷项前后六十五万金，并先拨越饷十万两，天恩可谓高厚。然总盼源源而来，方能于事有济。"②

---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六，第35页。

② 《中法战争》(2)，第278页。

3. 派出援军。早在七月初六日（8月8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就致函清政府，建议由前福建藩司王德榜调募广勇数营驻扎滇、粤边界。九月三十日（10月30日），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十月十九日（11月18日），倪文蔚致函徐延旭称："左相派来援越之王方伯一军，现亦交隶麾下，兵力既厚，士气更扬，闻之距跃。"①

4. 拨济军械。左宗棠在奏遣王德榜募兵赴援广西时，并拨给军械。广西当局闻讯后，认为王德榜军到防较迟，奏恳清政府从这批军火中先抽拨部分给援越桂军应用，十月，清政府有旨命左宗棠酌办。十二月初七日（1月4日），左宗棠复奏办理此事的情况：曾札令永州筹防局拨给王德榜以下军火：水雷24具，棉花火药1000磅，棉花信子火药100磅，洋火箭100支，两磅熟铁后膛过山炮10尊，开花弹600个，铜管拉火17000个，马梯尼步枪300杆，弹子20万颗，温者斯得十七响洋枪200杆，弹子20万颗，大铜火200万颗，细洋枪药3.5万磅，燕飞来福洋枪5000杆，铅子1万斤，六门手枪250杆，弹子19176颗，四门神机炮6尊，自来火子2万颗。"接奉此次谕旨，臣即飞饬该藩司遵照，将所带各件酌拨一半解交广西抚臣，以应该省急需，酌留一半自用。"②

清政府如此重视北宁防务，重任在肩的徐延旭遂一扫犹豫徘徊情绪，实力筹防。

首先是恢复了对黑旗军的支持。九月间，根据唐景崧的建议，徐延旭等答应每月给黑旗军增发1000两饷银，并准唐景

① 《中法战争》(2)，第279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〇，第16页。

崧带贾文贵、李应章两营赴山西助战，旋又将助饷增至5000两。当刘永福提出要入关招募新兵，在内地沿边州县添招精壮千余人，以厚兵力时，徐延旭即行文该地方官，听其挑募。在山西战前，徐延旭以手函奖励刘永福，照给月需饷项，而另派员弁赍解赏银3000两以鼓励之。

其次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越南军民抗法。法军于七月攻占顺安汛后，越南阮氏朝廷很快就投降法军。消息传到北圻，越南官员有的情绪消极，有的惶惑无主，更多的是奋起反抗。其中巡抚高太矙抚使梁俊秀，其籍贯本广东潮州府人，祖父及父亲经商越南，遂入越南籍，考试服官，因办军务，逐渐升职，骁有胆略。此次激于义愤，号召远近人民分屯，几将盈万，并直接指挥李全忠等义勇六营2400多人与法军作战。北宁桂军闻讯后，每月拨给梁俊秀部口粮银2000两并部分军械。

再次是部署援越桂军进扎。令两路统领察看情形，出扎顺城、慈山等府，以顾北宁门户，而壮越军声援。奉命后，黄桂兰、赵沃命令县丞林寿棠、六品军功陈天宋率所部两营与越南义勇李全忠、方金安两营共四营，于十月初三日（11月2日）分扎前距海阳15里，后去锦江10里的平均地方。游击谢洲、田福志两营与越南义勇黄文明、黄福茂、赵福星三营，出扎后去顺城30里的锦江一带，左军督带提督陈朝纲、都司尚国瑞、叶逢春并右军督带副将党敏宣共四营于十月初四、五日，先后驰抵后去北宁老营35里的顺城府城外，高垒深沟，立营扼扎。如顺城之防守转固，则左达嘉林以顾新河而制河内，右扼河口以护涌球而控海阳，前御海防而右障北宁大营，局势较为宽展。

援越桂军刚刚进扎顺城一带，法军即添派轮船陆兵加强海

阳防务，并以火船游弋平均江岸。陈朝纲、党敏宣闻报，即合挑精锐驰赴平均，集商将命，于十月十三日（11月12日），午后密令越南官员阮善暨方金安等营，各率义勇分攻海阳水东，而以李群、林寿棠、陈天宋各营继之，乘夜攻入海阳，目标是由100名越南士兵防守的一个据点。在战斗中，方金安开炮击伤一个法国军官，六品军功林兆桢追敌中炮阵亡，战至天明只得暂退城外5里驻扎。十四日（13日）夜，越南义勇再次进攻海阳，城内一连法军在军舰炮火的支持下顽抗。清军焚毁城东法军兵营，打死敌军4人，打伤24人，缴获大象一只驱回平均。这两次试探性的进攻，使越南义勇和援越桂军了解法军在海阳的防务。至十七日（16日），越南官员梁俊秀于锦江防营添拨先锋，会合援越桂军精壮及义勇，再次进攻海阳。陈朝纲、党敏宣等以海阳城炮垒坚利，人而难守，商之梁俊秀，以李全忠、黄文明等分攻海阳东南西北四门炮楼，以尚国瑞、田福志等专攻婆庙，陈朝纲等自率亲兵专攻庙前围基，均约定是日酉刻城下会齐，分道并进。这次出击开始很顺利地夺据海阳南西北三门炮楼和婆庙炮台，庙前围基也被攻克，只是东门炮楼坚锐异常，援越桂军、义勇并力合攻，正在得手，不意法军乘着江水上涨，派来军舰和城外水炮台环城轰击，援越桂军、义勇无炮，不能抵敌，战至天明，只得收兵回驻平均。清军查点伤亡，计阵亡12名，受伤38名，法军毙17名，伤17名。事后，徐延旭以梁俊秀等义勇各营此次出仗奋勇可嘉，酌给赏项2000两，并解银2000两交两路统领作义民随时赏恤。

通过这次战斗，暴露了援越桂军的许多弱点，唐景崧有函致徐延旭指出：援越桂军进攻海阳已入复出，殊属可惜。“粤

营虽多，核其数实不满万，此固久在明鉴之中者也，任战任守，似不甚足。且营弁之穷，兵饷之薄，军火之未充，皆近日边关不得已苟且之政。”[①] 黄桂兰则禀报徐延旭指出，援越桂军枪炮不及法军精制，而且法军军舰威胁太大：“我军无大炮，攻之已自不易。彼之船泊河下，以开花大炮轰我，避之亦似甚难。”[②] 因而提出在未来的战斗中，首先要塞河断绝法军军舰对陆军的援助：“细询在事弁员，证以本地官绅，僉谓轮船所经河道，有可议塞者五处，如能果乘冬涸，在于海阳之象山、水棠，兴安省之半边岸，南定省之宜兴府，河内省之下游之北栈，均筑塞之，派营数座，分起坚守，上下施放水雷，而我军制敌之援，则以坚守为胜。”[③] 并请求徐延旭速派援军：迅调内地各营守边，即以守边之营抽出，先行派令前往，以应急用。徐延旭接到前敌要求添兵的报告后，马上采取各种措施：

1. 调动内地官军出关赴援。如添调驻防镇安之参将党英华一营，总兵董履高所部游击晋文治、参将翟世祥两营参加北宁之役。

2. 派员到各地招募新兵。如札饬副将刘仁贵前赴南宁添募亲兵一营，参将姚大瑛、都司甘乃斌添募亲兵左右两营出关。其中刘仁贵一营赴北宁参战，其余两营堵守谅山、郎甲后路。

3. 招留流落关外的旧日散勇。如陈天宋等 200 人。

4. 改编越南义勇。越官梁俊秀手下招集有越南义勇二千余人，分为李全忠等六营协助援越桂军作战。援越桂军先是每

① 《中法战争》(2)，第 317～318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1463 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1483 页。

月助给饷银 2100 两，嗣因前敌勇营不敷分布，复经奏明由两统领酌量添募。黄桂兰、赵沃以李全忠等所带义勇随同打仗，尚为得力，因饬梁俊秀就中挑选精壮 1600 人编为五营，即委李全忠等弁管带，由李群督带。

通过这样的征调添募，在十月到十一月的两个月间，徐延旭给前敌桂军增加了 12 营约四千人的兵力。但是，要解决这批援军的武器装备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不但新募之军及改编的越南义勇仍旧多为徒手，即使内地官军也是枪械不齐的。黄桂兰曾提醒徐延旭："查守边各营快枪实未多发，此次调来前敌，亦请西抚院饬行省局及梧州转运，迅将唐道捐助之二千枝赶紧委解下营。"[①] 为了筹到枪械，倪文蔚和徐延旭想了很多办法，但因时间已迟，不能赶及战事了。

二　决战前夕忙筹防

山西战后，法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北宁。决战在即，深知敌我实力相差悬殊的黄桂兰、赵沃感到信心不足。他们在十一月廿一日（12 月 20 日）向徐延旭禀报防务时，虽然仍是大言炎炎："北宁虽觉势孤，弟与庆翁惟当极力固守，以此城相依为命。""职道、黄卉翁军门均传各将士面谕云云，我等众人遇此事，均誓以北宁城为存亡。"[②] 但字里行间，使人觉得胜算不足。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十一月廿八日（27 日），徐延旭上奏清政府，承认对于未来的战事没有把握："今则洋兵日增，装束不一。吕宋显违公法而助其虐焰，南官半率教民而受其牢笼。船炮之恣肆弥多，水陆之险夷尽悉，广西已竭全省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1462 页。

② 《中法战争》（2），第 359～360 页。

之力，北宁实当三面之冲，守则彼益侵凌，进则我虞牵制，欲求荡除妖孽，势非独木能支。”因而要求清政府指示广东、云南、福建三省给予援助：“饬下广东督抚派拨一军，速乘海阳空虚，由东径行攻入，以闽师严扼海口，以滇师直出山西，臣再督率所部，会合楚军进规河内，使彼首尾不能相顾，必可计日成功，大纾积愤。”[①] 后来，在十二月十六日（1 月 23 日）的奏折里，他又重申了这些要求。

清政府怎样处理徐延旭的这些要求呢？虽然在审阅徐延旭的奏折后，清政府十分不满，曾在十二月廿三日（1 月 20 日）批复：“该抚迭次奏报，语甚铺张，乃自到谅山后，日久耽延，现在事机棘手，该抚应如何力求实际，以维大局，何得株守待援，致有贻误。”[②] 但是，对于徐延旭的要求，除非实在做不到的，还是尽量给予满足。

关于请派海军严拒越南海口的念头，徐延旭可能采自幕僚张秉铨的建议。徐延旭曾派张秉铨于十一月前往北宁视察军情，事毕后，他有长篇报告向徐延旭禀报北宁防务，认为并不可恃，提出八条补救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请派海军严扼越南海口：宜再备公牍催令东省多派轮船往塞海防之虎门山也（如东省轮船不合用，即奏请闽省派拨轮船亦妙）。出奇制胜，夺隘收功，实不出此一策。海防一塞，接济路绝，彼族心胆必寒，击之可破也[③]。根据这个建议，早在十一月初九日（12 月 8 日）的奏折里，徐延旭便已向清政府提出：“仍应请旨饬南北洋大臣暨福建船政大臣并兵部尚书彭玉麟、两广督臣张树声会

① 《中法战争》(5)，第 275～276 页。
② 《清德宗实录》。
③ 《中法战争》(2)，第 427 页。

商，酌派得力大轮船十数艘，配足枪炮，驰赴越南海防、顺安各海口扼要分泊。法人如果自知进退，便可按兵不动，否则即以截其归路，并焚击其海防洋楼洋兵而痛惩之，庶足断其援军，制其死命，并可兼顾越都，而河内各省亦不难克期规复矣。惟广东轮船稍小，恐于大洋难期得力。可否饬调闽省轮船及彭玉麟旧部以备战守，伏候命下饬遵。”① 看来，徐延旭是深受光绪七年八月曾纪泽致总理衙门函的影响，仍作着出动中国海军即可慑服侵越法军的幻想，而不知道中国的海军落后，即使是当时实力最强的福建水师也没有可与法国海军抗衡的舰船，自保尚且不足，又怎能远渡重洋去封锁越南海口呢？更何况清政府自始至终采取守势，以待敌攻，不肯衅自我开，根本不会事先派出军舰深入越南海口去胁迫法军后路。由此可见，徐延旭的想法是如何脱离实际。因此，奏上后，清政府便于十二月廿三日的朝旨中予以驳回：“闽省并无大号兵轮，何从征调？”光绪十年正月十六日（2月12日），又有旨：“岑毓英、徐延旭先后奏陈拨轮船自水路进击，现在广东、福建防务吃紧，且无大号得力兵轮，无可征调。”②

关于滇军出扎山西一事，早在山西之役前，岑毓英便在十月初九日（11月8日）上奏，请求准许他挑带滇军20营出扎山西，就近筹办防务。廿九日（28日），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要求，并多次指示岑毓英出关后要与广西防军联系。十二月廿三日，清政府又根据徐延旭的请求，明确指示岑毓英“督饬各营与粤军联络声势，援应北宁”。孰料滇军行动迟缓，未及出关

① 《中法战争》(5)，第262页。

② 《清德宗实录》。

而山西已失，后来迤逦出关，却又迟至光绪十年正月始到兴化。开始，岑毓英还装模作样地致函徐延旭商讨滇桂两军联合作战事宜，到正月三十日，他接到徐延旭的告急求援信，得知法军将大举进攻北宁，援越桂军诚恐不支的情况后，反而按兵不动，只派唐景崧协助刘永福率黑旗军新编 12 营前去援救。可见徐延旭希望滇军出关会有助于北宁防务也是不现实的。

关于要求广东出兵进攻海阳一事。清政府早在接到徐延旭的请示前，就已考虑到要由广东出兵援助北宁桂军，于十一月廿五日（12 月 24 日）有旨："著两广总督张树声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以实后路。"① 接旨后，张树声原打算派在十月新授广西右江镇总兵、当时主持钦廉防务的淮军骁将王孝祺率军前往。但由于法军扬言将犯广东琼州，十二月初四日（1 月 1 日），清政府有旨："刻下东省防务紧要，王孝祺一军即毋庸调派赴关。"但在十二日（9 日）又有电谕："北宁兵力尚单，著彭玉麟与张树声筹商，选派得力将领添募数营，配足军火，迅赴前敌以资接应。"十九日（16 日）又有旨催问此事。张树声等复奏：当查广东营务处道员方长华向在皖省统军，饬令选带得力淮将数员，于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22 日），由东省起程，驰赴梧浔一带，仿照广西营制挑募精壮勇丁五营，刻日出关，听候广西抚臣徐延旭节制调遣，营哨各官均由东军派拨，复从各营抽回毛瑟、马梯呢、云啫士得并坚利前门等洋枪一千数百杆，凑拨车轮、开花各炮 15 尊，一律配足药弹交方长华带往②。按广西营制一营为 400 人，5 营共

① 《中法战争》(5)，第 253 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二，第 2～3 页。

2000人。后来方长华于光绪十年正月行抵南宁，复因饬各营官绕赴北路分途招募，至二月初四五等日始陆续募齐，初十后均可齐集成军出关，但已赶不及北宁战役了。

在奏报清政府之前，徐延旭曾多次有函给张树声，请求广东出兵进攻海阳，张树声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于光绪九年十二月致函李鸿章指出："晓山节次来函，乃坚以东军出攻海阳一路为请。不知总署照会法使，遍告各国，皆言法如侵我驻军之地，惟有开仗为言；是战于北宁、山西等处，彼不得归罪于我。钦州出境至海阳一路，向未驻军。今由东派军进攻，必谓自我挑衅。且此路皆沿海而行，彼之轮船节节可以御我，而我无铁舰辅陆师而进，无论海阳不易攻，即攻得亦难守。果出此道，非精兵万人前后接应不可。内地水路不通，山径崎岖，若由海道逼近越洋，转运粮械，途中殊难保护。况省垣中路兵饷一分于派军防琼州，再分于派军赴北宁，已属罗掘殆尽，若一空所有而赴越，孰轻孰重，不辨自明。晓山已连疏奏请，不知朝廷洞悉此情否？"① 其实是张树声过分强调困难。光绪十年正月十八日（2月14日），因为有旨命张树声考虑徐延旭提出的由东军攻打海阳的建议："方长华一军可否由钦灵一带前进，著彭玉麟、张树声斟酌地势，催令迅速到防，勿得迟延等因。"张树声在复奏时，从地势、兵力、时机等诸方面，极力陈述困难，指出徐延旭的建议是不可取的②。奏上后，清政府便不再提要求广东出兵攻袭海阳一事了。

十二月十六日（1月13日），徐延旭有奏提出：广西所存

① 《中法战争》(4)，第337页。

② 《张靖达公（树声）奏议》。

军火已全部解送前敌，要求清政府指示湖南提供抬枪一二千杆，湖北代购各项洋枪二三千杆。关于拨济援越桂军军火一事，早已在清政府的考虑之中。十一月间，张佩纶就和李鸿章商量此事。二十八日（12月27日），李鸿章将商量结果向清政府奏称：现拟由臣军匀拨两磅后膛过山炮10尊，子弹3000颗，林明敦后膛枪1000枝，子弹160万颗，士乃得后膛枪3000枝，子弹90万颗。吴大澄军匀拨云者士得后膛枪500枝，子药20万颗，由津沪陆续运至粤东，递至关外供用。清政府阅奏后，于十二月初一日（29日）有旨，指示左宗棠、张树声也要接济援越桂军枪械。初七日（1月4日），左宗棠奏称已从拨给王德榜的军火中匀出一半桂军。广东则已拨出人械驰援北宁，就没有另外再拨给。现在，看到徐延旭十二月十六日奏折后，清政府于光绪十年正月十三日（2月9日）有旨："著潘鼎新查明湖南省局现存抬枪，即先提借一二千杆，多配子药，如有合用枪炮逼码等件，一并迅速委员解赴广西，并派熟习员弁帮同广西委员设局打造，俾资接济。并著卞宝第、彭祖贤由湖北汉口采购各项洋枪二三千杆，多备逼码子药，赴紧运解，毋稍延误。"但是，迟至这时再谈"赶紧运解"已是来不及了。如李鸿章十一月匀拨的枪炮，迟至北宁战后才运抵广东，赶不及战事了。

十二月廿六日（1月23日），徐延旭还上奏请求清政府筹拨军费："本年迭蒙谕拨巨款，本已渥荷鸿施。无如需用日繁，现计各省协饷即尽数拨解，亦只能支持至三四月，而广东、四川尚未解清。如果刻日奏功，自谓可仰纾宸虑。否则不能不先行筹划，以免临期贻误。相应请旨饬下户部，再为预筹拨款，咨行解济。并恳饬下广东、四川将本年奉拨未清之款，迅为委

解，俾济穷边而全危局。”[1] 而据统计，当时广东欠拨 16 万两，四川欠拨 6 万两，共计 22 万两，占全部拨款 65 万两的三分之一，问题是很严重的。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2 月 19 日），清政府有旨批复：“上年饬派广东、四川筹解之款，据奏尚未解齐，著张树声、丁宝祯、倪文蔚督饬藩司将未解之数迅速筹解，勿稍迟延。至所请再为豫筹拨款之处，著户部速议具奏。”[2] 迟至这时再来筹拨军费，也已来不及了。

总之，在决战前夕，徐延旭曾多次上奏，要求援军、济械、筹款，清政府也尽量设法予以满足，但终因时间已逼，远水不救近火，全然没有实效，进行这场战役，只得全靠广西自己了。

我们看到，在多方请求外援的同时，徐延旭也竭尽全力援济前敌。主要有：

1. 增军。从山西战后到北宁战前的三个月中，据徐延旭历次奏称，曾先后派记名提督王洪顺前赴浔柳一路添募四营，参将于得富、千总丘世朝分赴邕梧，都司吴阳熊、守备卢仕杰、千总蔡廷禄分赴浔梧各募一营，共九营三千余人，出关助守后路谅山等地。光绪十年正二月间，又委守备甘沛棠、提督康德胜、游击谈敬德各添募一营，又派千总黎彩耀募炮队一营，共四营约一千余人，可能军未成而败耗已传。与此同时，徐延旭与黄桂兰、赵沃一起，将原派驻北圻各省剿匪的副将李石秀、参将黄玉贤、覃东义等三营调赴北宁参战。又调内地各府防勇四营出关助战，其中原驻防浔州的参将蒋大彰、驻防百

① 《中法战争》（5），第 278 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一，第 14 页。

色的副将黄才贵两营参加了北宁之役。十二月，还准许改编部分农军余部李应光、李福良、李润、高岳嵩及陈世华、覃志成各募健勇200人，作为半营，分委六弁管带，均于十二月成军参战。二月，经徐延旭向岑毓英求援，岑毓英派唐景崧协助刘永福率新编黑旗军12营从兴化赶赴北宁参战。这样，经过徐延旭的多方设法，在短短三个月中，为前敌后路增军约30营近万人，大大增强了守军的力量。

2. 加饷。当时广西是个穷省，当兵粮饷菲薄。桂军营制，一营400人，勇丁月饷仅只二两四钱，平时还不发足，只给一两六钱八分，存饷七钱二分，待至散营时归诸统领，营官月费亦仅三十余两。在决战前夕，徐延旭接受了唐景崧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两条措施以提高援越桂军官兵的待遇。一是增给士兵月饷和官弁公费。关于增给士兵月饷，唐景崧记称："议增勇丁月饷，实给二两九钱，营官加给四十两。"[①] 即月增饷五钱。而据光绪十一年李秉衡奏，则士兵月饷加给更多："广西营勇饷章，凡招自邻省者，每名日支银一钱三分，米八角三勺；就本省招募者，日支银八分，米八角三勺。经前抚徐延旭念出关各勇，无论邻省本省，同罹瘴乡，未便轻重悬殊，奏明将边防各营勇募自本地者，无论邻省本省，每日加银三分在案。"每月30日则共增给饷银九钱，较唐景崧所称多了四钱。二是于光绪九年底发文前敌："勇丁加足十成饷银。"这两条措施对鼓舞士气无疑会有一定的作用。黄桂兰、赵沃于二月曾多次禀称："新奉中丞宪台通行加饷章程，惟我前敌之军独蒙厚恩，再不激发天良，实事求事，尚何有于人理！各层明白宣

① 《中法战争》(2)，第99页。

布，法言巽语，不啻五令三申。昨据探事差弁回称，沿途亲见颁贴告示张挂各营，莫不欢声雷动，群感奋兴，争各增厚营垒，勇气倍加。弟兰、职道等尤当迎机策励，而随时部勒之，总期战守足恃，上副委任于万一。"[①] "兹奉公牍下营，以该营勇丁加足十成饷银，当已行知遵照。惟内津贴每营公费银四十两，以为营哨文案小差犒赏盘费之用，仰见俯念营员，无微不至，感激莫名！"[②]

3. 济械。山西战后，北宁形势紧急，徐延旭竭尽所有给前敌运送枪炮军械。他于十二月十六日（1月13日）奏报清政府："广西需用枪炮各项，向由广东采办，现在省局、梧局、邕局所存，均已尽数运解出关。"[③]《关外随营笔述》记称："徐帅则万苦千辛，经年筹运，快枪、兵枪、洋药、土药、通码、开花炮、水雷，经年之久，人负马驮，一概运赴北宁，交存两统领，不令缺乏。徐帅一腔愤恨，不得一战，灭此朝食。"[④]

与此同时，黄桂兰、赵沃也尽力部署北宁防务。

关于北宁防务的设想，十一月间，黄桂兰、赵沃曾联名向徐延旭提出一个主动攻敌的方案：桂兰、职道等通筹大局，兵勇炮械既足，滇军、刘团仍应先塞屯鹤以上之河（此处滩险木多易塞），进兵于山西之后，不能克复，亦足以牵制之。再进一支于青葳县、常信府，或会同我军填塞兴安录江、业江之河，此滇、刘两军之布置也。至如粤军、楚军，北宁现已布置颇稠，先饬数营由金英剿抚人教各村，以通滇、刘之气。一俟

① 《中法战争》(2)，第362页。
② 《中法战争》(2)，第371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〇，第28页。
④ 《中法战争》(3)，第64页。

乙山之河填塞工竣，登即派六营分江守之，联络该处义民阮文袍、安老县大黄、范忠直等，示之以惠，应其炮药，一可窥伺海防，虽不望其成功，亦可牵制以分其势，仍可扼守河道，以截其船，而助我守乙山之营。乙山一路既妥，则分兵至海阳（仍扎顺城府锦江县、柬格县等处）。先派兴安义民阮仲良、阮文思与唐豪县阮善、范贵益等潜至兴安，派员多带银两，以备买料伐树，填塞录江、业江之河。大树一经下河，则该匪船不能往来。我顺城、锦江、柬格之营，星夜前至录江、业江，靠堤筑垒，挖坑架炮，轰截其船，再加竹舟泥石填塞完善；即以该各营坚守（阮善有大炮可用，如防水涨，先择地添筑高墩阜，多备柴米子药，坚心守之），务保无虞。又即派营进扎嘉林、文江等处，靠围基筑营，于基内挖坑架木于基，基内筑低墙，外木高内木低，木上盖泥二尺，人在木内土坑，以避其炮。即于坑内穿围基架大炮，多备子药，轮班轰击河内；并进兵锦江、顺城，以顾我军嘉林、乙山之后。迩时或派营并募本地人民帮同谢现直落南定，由下游击之，添筑其下游之河，则大局可挽[①]。

可能由于这个方案牵涉到滇军和黑旗军的行动，超越了广西当局的权限，加以对未来的战事过于乐观，完全脱离了实际，所以呈上徐延旭后，就没有了下文。但是，这个方案却暴露了援越桂军军事思想的一个弱点：只畏惧法国的军舰，却忽视了防御法国的陆军，重于防水而轻于防陆，实际上是不了解敌我强弱的对比。

当然，这种只畏惧外国的军舰而轻视其陆军的思想并非援

① 《中法战争》(2)，第360～361页。

越桂军的独有，而是相当时期来清军军事思想的一个误区，其中尤以淮军为甚。同治元年，刚刚组建的淮军奉命进驻上海，不久就看到上海的英法军队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弃甲，靠着淮军的救援才狼狈脱围出困的窘态。后来，在与先后由华尔、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一起作战时，淮军将士又常常耳闻目睹其损兵折将的惨况。这就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外国陆军不过尔尔，无甚高明过人之处，只是惊讶于外国海军的船坚炮利："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威整，实非中国之能及。"从而认为在陆上交锋，中国军队并不弱于外国陆军，惟一值得忧虑的是外国军舰的威力。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北宁战前。如光绪九年四月，李鸿章有奏分析法国陆军的战斗力称："臣前在沪与洋兵共事日久，审知彼族用兵素极稳慎，断不敢大队离船冒险深入，若以零队入山雕剿，则刘永福所部及滇、粤防军尚可设法困之。"因而认为所谓法军强悍善战的说法，"皆西人夸诞之言，奚足深信"[①]。甚至迟至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他还有函致清政府："法之陆军新旧合计一万数千人，滇、桂两军及刘团合计则将三万人，若在陆路交战，似足相敌。……但使黄桂兰等能设法塞河拦阻，彼仅以陆队攻我台垒，坚忍苦守，未必骤下；即一处被陷，亦未必处处瓦解也。"[②]

北宁战前，越南军队曾和法军作战，黑旗军更是屡败法军，斩酋搴旗，威震一时，也使许多人产生错觉，以为法国陆军并不可怕，只是海军威胁较大："江道未能与彼争长，而陆路则彼

① 《中法战争》(5)，第149页。
② 《中法战争》(4)，第97页。

难于得志。”徐延旭、黄桂兰、赵沃也这样来看待法军。如光绪八年四月，黄桂兰有函谈法军攻占南定之役：法军发炮八百余响，仅伤越兵数十余，“向传法人火器无虚发者，以今观之，技亦平庸”①。光绪九年又称：“迨至七月，则法、刘隔无三日不战，战必竟昼连宵，冒雨不休。大小数十战，法无一次获逞者，兵头士卒相继连亡，只水战未受大创，勉强乘浪攻虚。”他们从此得出结论是：“陆战我军虽能操胜，而该敌必靠船而战，以期稳固。”② 他们认为：只要水路防御得力，陆路敌人就不难击退乃至消灭。如敌来犯，“业经激励各营，奋勉图功，严持以待，必诱该夷上岸，然后齐出合力，面面截击，务要大挫其锋，振我军威，免为外人轻视”③。因此，在实际布防时，他们主要注意如何遏制对方的军舰，而忽视了陆上的防御和配合。

北宁的地形宛如一个小盆地，北宁城位于盆地中间，四周皆高，河道环绕，决堤可淹。周围水田沮洳，泥淖没膝，难为战场。北宁之南30里为慈山府，再十里新河横出其前，适挡河内来路。其东南六十余里为芹驿关，滨六头江，上为三江口。溯流而上十余里，转向北宁北面与月德江相通，月德江流经扶良等社30里后，到达距北宁城北七八里的涌球，濒天德江，河宽十丈，深八尺，轮船可至河边。溯江而北四五十里，可达谅江府，水涨时可乘小轮船来往。北宁西北有土山一座，距城二三里；城东七八里，也有土山一座。当地商民无不言，敌若据此山，将开花炮近指入城，则城断难守④。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368页。
② 《中法战争》(2)，第354页。
③ 《中法战争》(2)，第386页。
④ 《中法战争》(3)，第64页。

北宁防务粗略可分为防水和防陆方面，而究其实，陆上主要是在各处河口设防，归根到底也是防水。真正意义的陆上设防，如在北宁城周围特别是北宁城内的设防则完全被忽视了，这是守将战略思想失误的恶果。

关于北宁防务，战前不断有黄桂兰、赵沃的报告，战后亦有岑毓英、张树声、潘鼎新等人的报告，但大多数都不够全面。现在，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可知布防情况大概如下：

派防六头江、三江口者，为副将党敏宣、游击谢洲、田福志、千总李应光、军功李福良、李润、高岳嵩、陈天宋等大小八营；驻防扶良一带有总兵陈得贵、副将李极光、参将覃东义、军功覃志成、陈世华、黄福茂等大小六营；派防涌球的为提督陈朝纲、副将周炳林、党英华、参将叶逢春等四营；派防新河一带的为总兵陈德朝、王正明、副将黄忠立、守备梁云翀、义勇赵福星、黄云光等大小六营；派防谅江的为参将于德富、守备甘乃斌、都司李定胜、义勇李全忠及提督王洪顺的新募绥南四营共八营；连结北宁和山西之间的交通要口金英县派有游击李应章和副将刘仁贵两营；派驻城南榄山为副将李石秀、黄才贵两营；驻守北宁城内的为参将蒋大彰一营、千总黄效贤两哨；驻守北宁城外的为黄桂兰率领总兵韦和礼、参将黄玉贤、都司李逢桢、尚国端、参将黄云高、守备贾文贵六营及刘永福所率黑旗军 12 营，是为全军的总预备队。此外，徐延旭自己率部分军队驻扎谅山。

在各处防地，除了一般的筑炮台、埋地雷外，徐延旭还要求各营挖地营以藏兵。除夕那天，徐延旭给北宁各将寄上从滇军处抄来的图样，要求各将按图施工。从张之洞文集中，我们知道滇军地营筑法如下：要隘筑垒之处，垒中只备平时食宿.

于垒外环挖地营，状若护濠，更须曲折成形，宽必六尺，深必五尺。以相距六尺立一垛口，出地尺许，各修枪眼，两垛中仍留本土作间，高与地齐，厚须四尺，由垒门各开明槽通入地营。如敌人来犯，将栅帐锅碗凿穴窖藏，引兵伏入地营，按垛以守，任其炸弹落入垒中，于兵无损。而地营垛口只出地尺许，炮难侧击，营形又复曲折，炮弹自难辄中。即偶尔落入，而垛中有土间，所伤只一垛兵，不能旁及，人心自安。若敌人拥兵扑垒，而我兵各伏地营垛口，环施枪炮，断难进前。筑垒之法，高必八尺，厚必五尺，外用石条合缝砌成，内用横木斗榫层层贴住土中，合以石灰石沙，千锤百杵，筑而成之，则固若铁寨铜碉，虽轰以数十磅之开花炮弹，亦未必即见倾圮。至营垒方圆各式，则须度势为之，不可拘泥。垒旁垒隅均须择要修建炮台碉楼，安置巨炮以备远击[①]。但是，一方面由于挖造地营有一定的困难："滇军所挖地营，在兴化土厚岸高则可，若山西、北宁皆土薄，掘下三尺即水，断难为此。"另一方面也由于桂军将士思想麻痹，嫌费工费力，"即使照办，似亦难避彼族开花大炮"[②]。于是偷工减料，只修筑赵沃设计的简易地营：各营于路口之旁与营前左右，均挖地牢三尺深。面上仅六七尺宽，下牢一丈，牢口筑泥一尺（陆路即在一尺之中开炮眼），再以大竹篾织一大哨箕如牢口大，覆之上面，盖薄草皮，水田即在哨箕边开炮眼，人持枪在其中。如敌来攻，即将勇丁各四五人均预伏地牢中，以少人引之。彼见我人少，渐战渐进，俟其深进，先出大兵从后旁抄，暗号一发，沿途放枪击

---

① 《张文襄公全集》公牍，卷五，第31～33页。

② 《中法战争》(2)，第376页。

之，后抄截杀，使其无一人归巢[1]。这种地牢与前述地营相较，效用相差悬殊，在实战中不能起到杀敌防身的作用。后来徐延旭曾有函痛斥黄桂兰、赵沃："洋轮直至扶朗，如入无人之境，盖因以前所修营垒濠沟等项，不独不能如前寄呈滇师图样，以至人心不固，未战先逃，大属不成事体！"[2]

在筑垒布防的同时，桂军统领又分饬各营，各就本营挑选二等奋勇各 100 名，以备随时冲锋援应。

此外，十一月间，北宁一带的越南义民曾向援越桂军请求助战："该处绅耆、里长前后到营密禀，均云省官靠不住，但愿札饬各乡民村社联络，每总、每社挑集壮勇，领发炮械，随同官军堵御。一二月可自备米粮，但恐日久难支，请薄给口粮，每人米一方，铅钱一贯，合计每人每月银五钱。如花费五千余金，可得万人。如此，则各乡社总之人心已归，而教民亦无可如何，即省官亦无可如何也。"[3] 黄桂兰、赵沃经请示徐延旭批准后，于光绪十年正月招募各义民就地乡导，计有 2000 名，每名月给 5 钱。四月十六日，徐延旭曾向清政府奏报：发给河内、北宁、海阳各乡练口粮银 4980 两[4]。

为了防备法军军舰由水路来袭，北宁援越桂军也采取了一些水路防御措施：

一是塞河。如塞乙山之河，这是因为北宁河路总口，以海阳省东潮县、荆门府山防之界乙山为最。此处两河分流，上下合而为一。一河两边皆石壁，一河无石，而均狭窄，河面仅两

① 《中法战争》(2)，第 390 页。
② 《中法战争》(2)，第 255 页。
③ 《中法战争》(2)，第 370 页。
④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六，第 33 页。

丈余，惟水深四丈，如能堵塞，则法舰难以溯流而达北宁，“塞乙山之河，则北宁松劲”。光绪九年十二月，北宁援越桂军派员与东潮县义民阮文班等联络，认为可以堵塞，惟工程浩大，请先发银 1000 两作塞河费用。北宁援越桂军遂发银 1000 两交阮文班领去，并派差弁马步洲、刘俊清等前往协助，准备先密备大舟石块，订于明年正月初间乘夜堵塞。援越桂军在接到填塞完善确报，再行派营迅往，就近觅就大炮架置堵御，以保无虞。但因越南义民提出必须我军到境，始能堵塞。而到时援越桂军无法派营前往，这项塞河工程看来并未实行。类似情况还发生在派营前赴兴安督同该处义绅阮伸良、阮文思、阮善等继塞录江之河，则河内、山西等匪可以不战而困之的计划上，也是由于未能派营前往而塞河不成。真正塞河成功的有三处。一是涌球。饬守将陈朝纲遵照指示梅花式样，速结竹排，多载零石为之，加筑塞口一道，并于河边扼要筑垒防守。二是扶良。在涌球下游，亦命守将照式择地赶办。三是谅江。拨银 1000 两交由当地义民，拖大树十余根塞于春盎社之上，又沉载石竹舟二十余只于春盎社。

为了与法舰在水上鏖战。北宁桂军还计划拨银 20 万余两，制造被称为“长龙”的舢舨 200 只，每艘约需银一百两，大概准备用来在水上逼近法舰，掷火肉搏之用；又造价约银二百两的炮船 10 艘，大概可以装载小炮发射。但因工料不备，日期已逼，结果只制成少量。二月初一日（2 月 27 日），徐延旭曾奏称：“据两路统领报称：打造大炮船两只，定于二月初六日（3 月 3 日）下水，仍赶紧打造长龙，随造随用。”① 并于战后

① 《中法战争》(5)，第 286 页。

报销“支过塞河造船工料银二千二百零七两”[1]。

为了弥补造船不及，光绪十年二月初四日（3月1日）赵沃又想出造水炮台之法：“如造水炮台则可少造长龙，可以制胜，较塞河较好。”造法如下：其底以木舟并扎大竹，与舟等相间为之，大小随做，至少亦须四五丈。其前用横直大木五六层（高六尺），外钉铁板（四分厚）为皮，外更张罟网，如无罟网，用草席代之，柔可制刚也。其下开大炮眼，以轰击敌船。其两旁厚三尺，有铁板遍钉可固，如无，亦可勉支。其后只三尺高，一、二层大木亦可，其面上密钉排木，加泥五寸。有此水炮台，内安置大炮、开花格林炮，两边与前用竹排护之，并用两扒船、长龙等船随之。岸上则用陆营，或二营分两岸同行，如遇河宽，则两岸均加，多少不等，随时酌用。如涌球一路，即由大辇处徐徐顺流放下，遇轮船即击之，较之塞河为更胜。如此可挫其大炮，该匪退一节，我船即进步，沿江而下。有此水炮台，长龙造五六十只亦可敷用[2]。

北宁援越桂军这些防御措施，一度引起法军的畏忌。孤拔曾报告海军殖民部，认为桂军的工事相当坚固，只有用军舰上的大炮和地雷才能摧毁。毕乐所撰《山西、北宁、兴化诸役》一文写道：北宁的“中国人利用我们不能不停顿的时间，在该地的四周围增加防御工程。在赴河内的道上，防卫尤为坚强”[3]。斯各特所撰《一八八四年法国进军越南记》也记称：北宁“华军作各种准备，想要在大路上好好抵抗一下。横过道路到运河以西，他们把河堤变成一系列的工事，有一些枪和许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六，第33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860页。
③ 《中法战争》（3），第355页。

多的掩护壕。在这前面距运河河岸一英里的地方，田野是完全空旷的，连一条狗也几乎没有掩蔽的地方。运河既深且急，水流速度最少五海里。那边峭峻的河堤已变成坚固的防线。中国军以无限的辛苦，把整个的堤背做成一个真实的要塞。运河弯曲的地方成为自然的城堡，每隔二十码或稍多的地方挖一个炮眼，顶上有低墙掩护来福枪兵。要想攻占这第一道的防线而不付出高的代价，那是不能令人相信的。"①

三　援越桂军多弊端

那么，北宁援越桂军能否胜任这场即将来临的决战呢？撇开法军人多势大和清政府决策失误等客观因素不提，仅从将帅才能、士兵素质、武器装备、军饷拨领等自身条件来看，答案也是否定的。

先看北宁援越桂军的将帅情况。

不可否认，越南北圻山穷水恶，瘴疠侵迫，徐延旭、黄桂兰、赵沃等将帅长年在关外鏖军布防，这说明他们在主观上都有着抗敌卫国的要求。但是，主观热情并不等于客观现实。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首推将帅的军事才能。古语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西谚谓：以狮子率领绵羊，绵羊也会变成狮子；以绵羊率领狮子，狮子也会变成绵羊。道理就在这里。那么，徐延旭、黄桂兰、赵沃等人的军事才能如何呢？

在北宁战前，中国已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从而导致了在军事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一些主力部队如湘、淮军等，

① 《中法战争》(3)，第370页。

开始从单纯使用刀枪剑戟等传统冷兵器，逐渐过渡到使用洋枪洋炮等热兵器；军事技术也从过去的肉搏梃击，捉对儿厮杀改为枪炮对射，据阵相抗。但广西是个偏僻落后的封闭省份，虽然有以黄桂兰为统将的淮军的影响，但变化还很缓慢。这在武器装备上即可略见一斑：在光绪八年前，广西军队基本上还是操持冷兵器；奉命防法后，才陆续添购和装备热兵器，但也只是一些窳劣不堪的前膛枪和杀伤力极其有限的小炮，根本不是法军的对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经费不足等客观原因外，也与主要将帅对近代战争规律几乎一窍不通，缺乏指挥近代战争的才能有关。

我们先来看看被清流派官员吹嘘为“知兵大员”的徐延旭的情况。

关于徐延旭的军事才干，可以从他以下的言论中看出端倪。光绪九年七月廿七日（8月29日），他曾有函告人：用沉木塞河的办法即可阻挡法军军舰的行驶：“昨得探报，越南砍伐大树多株，暗沉顺安讯海口水底，轮船行至该处，轮不能动，停泊一二日，无术可施。”山西战前，他函告总理衙门，援引黑旗军战例，认为法国陆军也无甚可怕：“究之刘团与法人屡次接仗，除枪炮外，洋人别无技巧，而枪炮亦非声声命中，刘团多挖壕沟，炮来则伏于沟内，炮过又出，遂已可大获胜仗矣。现今义民近万人，刘团亦添募勇敢之军，不难一鼓灭之，使北圻断绝洋人。”[①] 他迷信中国一种名曰“抬枪”的土炮，认为胜过法军使用的洋枪洋炮，曾在笔谈时一本正经地两次告诉一个名叫吕春葳的越南官员：“洋人炮虽快，然一炮只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692页。

一子，我抬枪一炮可容数十子，是一炮可敌其数十炮矣，故用抬枪得力，其法与放鸟枪同。”① “打洋人是抬枪得力，一炮可装卅余子，并可及七八十步，不用逼码铜帽，不怕用竭。易用过子母炮，子母炮须会放，抬枪则人人能放。”② 北宁战前，他于十二月十六日上奏清政府，急迫请求大量拨给抬枪以对付法军：“闻道光年间东省御夷，系用抬枪更番间发取胜。而抬枪之合用则以湖南打造者为最，前此东征皆于湖南取给。诚以抬枪子多而及远，且子药皆可自造，随时解营，不至如逼码用竭，其枪便为废物。”③

仅此数端，我们便可窥知徐延旭对于使用热兵器的近代战争是何等的无知。无怪乎早在光绪九年九月二十六日（10月26日），李鸿章就致函总理衙门指出：徐延旭是“实不知兵，不知洋务大局，其言多不可信”之人④。张树声也说：“徐则虚骄之气耳。”⑤ 北宁战败后，二月二十九日（3月16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上奏《请将唐炯、徐延旭等治罪折》称：“徐延旭直庸妄人耳，守梧州时，所禽馘者不过一二探丸胠箧之辈，其著《越南图说》，于方向道里尚且瞢无黑白，又大言，自诩为知兵；年近七十，嗜好瘤深。”⑥ 徐延旭上奏请罪，承认自己“暗直迂庸，罔知军事”⑦。

其次，徐延旭还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早在光绪九年八

---

① 《中法战争》(2)，第483页。
② 《中法战争》(2)，第484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〇，第28~29页。
④ 《中法战争》(4)，第93页。
⑤ 《中法战争》(4)，第94页。
⑥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二，第6页。
⑦ 《中法战争》(5)，第296页。

月，他就托广西按察使国英向倪文蔚诉说病情：现年六十余，不比前次出关，年力正强。边地水土恶劣，无医无药，病势难望就痊。求移退驻南宁地方，最好能回桂林省城调理。被国英婉言谢绝：老兄系钦派筹办边防大臣，进退之权，非院宪所能操，亦不敢率为代请。当徐延旭以虚名骗取了广西巡抚的重要职务后，本应凛遵历次谕旨，亲临北宁前敌督师。但他却在十月上折谢恩的同时，向清政府奏报病情："臣自七月以来，饮食渐减，夜多不寐。至八月中旬，突然气痛异常，比经诊治轻减。不意九月初旬忽又翻发，计两昼夜坐卧不安，几濒于殆，当复赶紧医调，幸得转危为安。固由水土气候不同，微伤于风寒饮食，亦实因日久无功，越南不能自振，焦虑所致。近服扶脾理气之剂，虽渐日就痊可，而犹间觉胀痛，精神眠食亦尚未能照常。"[①] 十一月，他又奏称："臣因起程之前，肝气复发，至此未愈，暂驻谅山医调。"[②] 十二月，虽然局势已经十分紧急，他却不顾清政府的频频催促，托辞仍驻谅山，而不到北宁前敌督师，以至不能及时发现前敌弊端，采取补救措施。直至丢失扶朗的噩耗传来，他才发觉情况不妙，心情沉重地去函严斥黄桂兰、赵沃粉饰欺朦："前屡接两弟大人来函，均言防守已固，兄皆据以入告。岂知全属空言，一无可恃！……国家军政森严，兄独当重责，实觉冤枉！"[③]

如果在太平盛世，徐延旭可能会是一个能干的封疆大吏，清政府盲目听从清流派官员的保奏，由他来主持对法战事，却完全是选错了人，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悲剧，还是国家乃至民族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 19 页。
② 《中法战争》（5），第 261 页。
③ 《中法战争》（2），第 256 页。

的悲剧。

其次，作为北宁援越桂军主将的黄桂兰虽然是行伍出身，但长期任偏裨之将，只是靠着年资和裙带关系才得以升任广西提督，本身其实并无多大的军事才能，连唐景崧也认为他“短于将才”[①]。他跟随李鸿章征剿太平军和捻军时，可能已懂得使用洋枪了。后来，他改随张树声转战于山东、江苏、贵州、广西等地十余年，接触洋枪洋炮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张树声曾电告李鸿章：“粤将尚不知操用洋军火，何论滇、桂？恐各省大率类此。”[②] 这虽然是夫子自道，但又何尝不包含黄桂兰在内呢。黄桂兰由于脱离李鸿章部下太早，因而对于淮军后来放弃前膛枪而改用后膛枪，又放弃后膛枪中落后的士乃得、林明敦而改用较先进的哈乞开思、毛瑟等枪的过程并不知晓，而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继续大量使用前膛枪而不感到落伍。他还不懂得用炮，在北宁战前，曾有函通知后方缓运开花大炮：“董镇所解之开花炮，如夫传不及，可暂请从缓。”[③] 以致李鸿章曾说：“黄桂兰于新购枪炮，全无探讨。”[④] 光绪八年四月，当张树声说动李鸿章拨发枪炮给援越桂军时，就曾有函告诫黄桂兰：“前拨枪炮，亦赖傅相大局关怀，故能竭力资助。……洋枪三千杆，或有多余，似可分给省浔防军领用练习。粤将多不解此，幸无委利器于无用之地也。”[⑤] 但是，张树声不幸而言中，据《关外随营笔述》记载，黄桂兰曾将有关方面千辛万

① 《中法战争》(2)，第 129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13 页。
③ 《中法战争》(2)，第 372 页。
④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4682 页。
⑤ 《中法战争》(2)，第 533 页。

苦购到运送前敌的精利武器大部送给越南军队，“自己营勇反多用噫枪，昏愦有不可解者”[1]。综上所述，黄桂兰对近代战争的规律也是缺乏了解的。

不过，黄桂兰毕竟经历过战阵，多少有点军事常识。李鸿章曾说：“黄桂兰在淮部中向称能守，如粮械应手，似可坚忍揩拒。”[2] 这种评价虽然过甚其词，但也并非毫无实际，因为我们在前面曾引法方资料指出：在北宁战前，法军曾对桂军的防御阵地十分重视，设想如进行正面攻坚将会付出重大牺牲，以至要设法绕开，可见黄桂兰的“能守”也不是浪得虚名。但是，他的这点仅有的军事才能也因上遭徐延旭的排挤，下为士卒不从命而不能发挥。北宁败后，张树声电告李鸿章：“闻当仓猝时，黄所募西土粤勇溃散不可禁遏，由以淮将统粤勇，将与兵不相习，以致于败。又徐帅素疏黄而亲赵。……帅不推诚，士不用命，致黄身败名裂，发愤而死，虽罪不容逭，而情殊可原。”[3]

清政府和战不定，政策摇摆，内部又人际关系紧张，使得庸懦无能的黄桂兰左右为难，无所措手。以至弄得意志消沉，精神颓废，只得沉溺酒色，把精神用到女人身上，不顾身负重任，大战在即：“乃令越官征选土妓，每日三四十名，入供酣乐。”[4] 后来自杀身死，“谅山孝帷中尚有乞妹十余名也。可叹！”[5]

---

① 《中法战争》(3)，第64页。
② 《中法战争》(4)，第13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44页。
④ 《中法战争》(3)，第63页。
⑤ 《中法战争》(3)，第70页。

北宁援越桂军的另一个统将赵沃，也是缺乏近代军事知识的庸才。我们在前面一节曾谈到他在筹备北宁防务时出的一些主意，如挖掘简易地营、修水炮台等，这些都是在近代战争中不堪一击的儿戏东西。这里，我们还可举出两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他的所谓军事才能：一是他训练士兵的方法。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三日（12月2日），赵沃禀报徐延旭："弟拟各营到后，每日随醒炮，无论勇夫，均起装身比炮，至早饭候，然后散开。似此习以为常，习惯自然，则以逸待劳四字可定。否则，临时匆速，则劳以对劳，而敌之至反锐矣。"① 二是他对法军大炮威力的认识："先时各勇不无疑惧，职道开导之，此开花炮一如雷公凿。如雷公一定要打其人，避之不得，若不应打其人，即雷公声扬而走路亦不妨。"② 识见如此浅陋低下，又何以能胜任抗法重责呢？

和徐延旭一样，赵沃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他曾禀称："军事则以能耐驰驱为强，职道年力就衰，实非所任。"因此早就告老乞假，"已于八年冬间已上禀于前抚宪倪，去年二月续上禀于前抚宪倪，蒙批以我宪台正在出关，未便照准等因，奉此。去夏在龙州恭诣节辕，仰恳恩施，未蒙俯准。"③ 北宁战前，他于光绪十年二月初八日（3月5日）禀告徐延旭："自觉头晕眼花，身体微热，皆因年迈不耐劳苦所致。"④ 十一日（8日），又再次称病乞假："职道自前月杪督攻芹驿后，自愧自慊。旋营以来，腹胀便痢无常，饮食日减，精神恍

① 《中法战争》(2)，第355页。
② 《中法战争》(2)，第389页。
③ 《中法战争》(2)，第393页。
④ 《中法战争》(2)，第391页。

惚，治事见客，益形衰惫，总因在营感受瘴毒暑湿风寒。当兹年老气血两衰，百病丛生，若再恋栈，不早让贤，将恐贻误之愆，浮于规避之咎。"[①] 在决战前夕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不顾大敌当前的严重局势，公开推卸责任，"赵称体羸多病，将士骄蹇，愿乞休让贤"[②]。

但是，这样一个既无军事才能而又年老多病，难以胜任驰骋征战的革职开复候补道员却深得倪文蔚、徐延旭的信任宠幸。《关外随营笔述》称："赵统领为历任前抚许可，而徐帅平日且深信。"[③] 以致在北宁桂军中，黄桂兰这个实缺提督也不得不让赵沃这个候补道三分。唐景崧指出：黄桂兰"为赵沃挟徐中丞之势，事事掣肘，以至布置不能尽如己意"[④]。黄桂兰也曾函告张树声："赵道与桂兰在北宁共处将及一年，遇事倾心推让，凡有会衔公事，无不由其主稿，乃犹存意见，不能相谅。"[⑤] 张树声据此告诉李鸿章："黄、赵二统将不和，赵沃乃晓山私人，黄须听令。"[⑥] "北宁自当属黄桂兰坚守，惟现在黄尚须听命于赵，扎处亦大难。"[⑦]《徐延旭来往函牍》收有赵沃向徐延旭密告黄桂兰所统各营兵额不足的小报告等件："左路各营，访闻有三百二三十名，有不及三百名者，则又不得其详也。"倪文蔚、徐延旭一度还欲调黄桂兰入关，将前敌军权统统交给赵沃："庆池老于边务，今得麾下发踪指使，庆池总统

① 《中法战争》(2)，第 393 页。
② 《中法战争》(2)，第 112 页。
③ 《中法战争》(3)，第 62 页。
④ 《中法战争》(2)，第 129 页。
⑤ 《中法战争》(2)，第 525 页。
⑥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4681 页。
⑦ 《中法战争》(4)，第 140 页。

诸军，似觉多多益办。或奏饬卉亭入关，整饬戎行。内熙外攘，举庆得人，请尊裁定夺。”[1] 其实，像赵沃这样的老朽，与黄桂兰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可能是得心应手绰绰有余的，但要指望他在抗法斗争中有何建树，就未免是太奢望了。

至于黄桂兰、赵沃二人所信任重的心腹将领的情况，也并不见妙。

记名提督陈朝纲是黄桂兰手下的主要将领。北宁战前，徐延旭派张秉铨到前敌视察军情，将他了解到的情况密报徐延旭。关于陈朝纲，张秉铨写道：“黄统领之督带陈朝纲，身家颇重，此次出关曾商之蔡丞，欲辞此行，亦未必肯告奋勇以亲临前敌。”[2]

副将周炳林是黄桂兰麾下仅次于陈朝纲的大将，但却不知大局，不识轻重，轻率地得罪前来援救北宁的刘永福黑旗军。唐景崧记称：“陈朝纲有口辩，与周炳林同综理黄军门营务。十四日（11 日）议以刘军千人守涌球，渊亭办地营十座，翌晨忽变计不守涌球，或曰：周炳林轻视之，故怒，然渊亭自是矫矫难合也。”[3] 后来，周炳林便因而获咎。

陈得贵也是黄桂兰帐下的骁将。“得贵重瞳，素骁勇，黄军门保留前敌。”但也遭到徐延旭等人的刁难，“得贵为提督冯萃亭旧部，冯曾劾徐，得贵实结冤于徐。及徐擢巡抚，遂撤萃亭之犹子兆金带左路营者，并撤得贵。”[4] 光绪九年十一月一日（11 月 30 日），黄桂兰曾有函致徐延旭谈及处理二人的情

① 《中法战争》(2)，第 279 页。
② 《中法战争》(2)，第 426 页。
③ 《中法战争》(2)，第 115 页。
④ 《中法战争》(2)，第 115 页。

况："日前接奉大咨，以陈得贵、冯兆金两营勇丁抢掳、拐带、吓诈、骚扰等因，饬即查办，当径檄行。"[①]

副将党敏宣则是赵沃最亲信的将领，也是声誉最坏的人。他长期在广西管带边军，曾随赵沃出关追剿入越农民军。光绪五年，因在追剿李扬才的过程中讳败为胜，被冯子材参劾去职。张树声奏称："副将党敏宣素行奸欺，光绪六年经臣严饬回籍，不准逗留防营。此次徐延旭因该将为赵沃信任之员，复令统带勇队。"[②] 这里说的是徐延旭起用党敏宣。但光绪八年九月的一份批谕称："广西巡抚倪文蔚奏，恳将已革副将党敏宣留营差遣，允之。"可见起用党敏宣的是倪文蔚而非徐延旭。对于党敏宣，张秉铨也作了不利的报告："窃维吾师倚赵统领如手足，赵统领亦报吾师以肝胆，力图报效，誓不与虏俱生，此人所共知而共谅也，其奈所用不得其人！如党敏宣者，平生无甚伎俩，受业所深知，不特左路营官所不服，即右路营官亦所不喜。为所督带者，则田福志、林寿棠、谢洲数营而已，或为乡谊，或属荐保，其新充之王正明、梁云冲二营，则不屑归其督带也。……在赵统领忠肝义胆，不遑寝食，亦非不知党敏宣之无能为者，然舍此又似别无可任心腹。黄统领心不善之，而不能不唯诺相从，且为此一人致两路统领不无意见。"[③] 唐景崧也指出："党敏宣军中积猾也，赵沃庸懦，其作奸肆欺，毕敏宣居间画策，故为其所挟，不遵调度。"[④]

冯子材麾下能征惯战的援越桂军，在徐延旭、黄桂兰等庸

① 《中法战争》(2)，第359页。
② 《中法战争》(2)，第359页。
③ 《中法战争》(2)，第425～426页。
④ 《中法战争》(2)，第115页。

懦将帅的指挥下，变成一支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的军队，无怪张秉铨在视察北宁援越桂军后所作的报告对于将领总的情况曾浩叹："若望此等人才收复各省，是犹种满地荆棘而望生嘉禾，何日可卜成功也？且岂特无功而已，一经开衅，势将决裂，不可收拾矣。"① 预示了北宁战败的结局。

其次，我们来看看士兵的情况：

1. 来源复杂。参加北宁战役的援越桂军数量不少，来源也很复杂，粗略区分可有：

官军。包括原来的援越桂军和后来陆续抽调出关的各府勇营。计有：原来的援越防军十二营。光绪八年五月因要安插赵沃而增添三营为十五营，分成左右两路。光绪九年七月续招三营，十一月又招四营，十一月后复抽调党英华、蒋大彰、黄才贵三营出关，合共二十五营约一万人。又在其中挑选了三营奋勇，即田福志、贾文贵、黄忠立三营，共有28营番号。

由入越农民军改编而来。如光绪八年改编两营，光绪九年十二月改编六个半营。虽有8营番号却不足二千人。

招募边民而成。自光绪九年七月起，前后招募约二十四营之多。

招募流落关外的旧日散勇，如陈天宋半营200人。

改编越南义勇李全忠等五个半营一千余人。

以上共五十余营，约合徐延旭所谓"五十营"之数，再加上黑旗军12营，则几近七十营二万余人。

2. 军饷单薄。王德榜曾禀称援越桂军情况："每勇月给口粮二两四钱，分统、营官、哨官又层层剥扣，勇夫均有烦言，

① 《中法战争》(2)，第426页。

全无斗志。一见法船近防所，每携妇女逃走。营官玩视营务，事前全无布置，平日又剥扣兵粮，短少勇夫，军中有此弊，虽百万之众亦必败也。”[①]《关外随营笔述》指出：“各勇二月犹未领得去年冬月之饷，统领、营官、哨官层递延搁，不肖营官尚贩冬衣、洋烟、铜钱，折饷发给士卒，高价射利。勇丁糊口犹难，遑云接仗！”[②]

军饷如此单薄，自然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关外随营笔述》记载北宁援越桂军当法军进攻时，连营数十座一触即溃的情景后写道：勇之词曰：每月二两四钱，除却米饭，月余数钱洋银，岂真以性命付尔耶！窃维募勇饷廉费省原甚便宜，其如临敌一哄而散何哉！[③] 法方记载也提到这点：中国兵并不都能领到军饷，于是他们例开小差。在北宁，当我们发动进攻时，中国军队都想逃窜，因为他们已有两个月未发饷了。

3. 军纪败坏。黄桂兰行伍出身，所率左路诸营多为服役多年的老兵，据他历次禀报，似乎比较注意军纪。但李鸿章等仍有责词，有函称：“黄桂兰系铭营旧将，略知纪律，一听营规败坏至此，以至身殉名辱，实堪痛恨！”[④] 赵沃虽也带兵多年，但从他把每天随醒炮比身当作大事汇报徐延旭，可见他平日并不注意军纪。张秉铨曾报告：如党敏宣所部尚漫无纪律，他营更可知。凌兆熊也禀称：“此间公论，大事实败于赵，即论平日不能整军罪，亦赵浮于黄。”[⑤] 北宁战后，王德榜前往

① 《中法战争》(3)，第 108 页。
② 《中法战争》(3)，第 64 页。
③ 《中法战争》(3)，第 65 页。
④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4684 页。
⑤ 《中法战争》(2)，第 521 页。

收集溃卒，曾将所见所闻禀报左宗棠：查黄提督桂兰、赵道沃驻防北宁附近之兵计有五十营之多，兵力不为不厚，果能奋发有为，尽堪制敌人之命，何至见敌不战而溃，其故何也？一则因漫无纪律，以至分统、营哨官、勇兵、长夫强占民房妇女为室者十占八九，吸食洋烟者十有六七，又占住民房不扎营垒，其滋扰之状，越人实不堪，其含恨粤军，久入骨髓！[1] 又禀报潘鼎新：该勇习气已深，不知操练，不扎营垒，散居村庄，无所不至。[2]《关外随营笔述》则称："防勇虽多，率皆乌合，仓猝添募，尤多乞丐、游民，不晓洋枪如何施放……营哨大小官皆有越妾者，多放荡成风，一闻警至，营官向住屋觅哨官，哨觅什长，转觅勇丁，数时尚难成队，事急各谋护眷先避。军政如此！"[3]

士兵素质如此低下，如何能抵敌法军呢！

再次是军费开支：

桂军在光绪七年底即已奉饬援越防法，但清政府并无额外军费拨给，所以桂军装备窳劣的状况得不到很大的改善。迟至光绪九年四月，清政府才开始于常饷外增拨抗法军费，至九月的半年中，前后拨给 65 万两。然而拨给是一回事，实际领用又是另一回事。到光绪十年正月北宁之战前夕，实领只有 43 万两，欠拨约三分之一强。

广西领到这些军费，主要用于下列开支：

1. 添募士兵饷需。自光绪九年五月徐延旭出关后，援越桂军大量增募，到北宁战前几达四十营之多，虽然其中各营数

---

① 《中法战争》(3)，第 108 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五，第 17 页。

③ 《中法战争》(3)，第 64 页。

额或多或少，发给的军饷或及时或拖延，但每月总有一定的数额。十二月二十六日（1 月 23 日），徐延旭曾奏称：“自十月以来，因事机日紧，内外交讧，先后募二十余营，每月骤增月饷三万余金。”加上五月以后，十月以前添募的二十余营，每月至少增支月饷五万余两。光绪十年三月十二日（4 月 7 日），广西布政使张梦元、按察使李秉衡奏称：广西为边徼瘠区，军兴以来，地方元气未复，钱粮岁请蠲缓，每年竭力督催，仅征收银二十三四万两。按裁存兵额综计，岁应支银二十九万三千余两[①]。盈虚相差约五六万两，与徐延旭所奏大致相近。这些添募军饷如从光绪九年五月算起，至北宁战前将近有 30 万两，占去所领军费一半有余。

2. 杂支。李秉衡曾奏称：现查月需饷项除军营实支实用之数，此外，尚有不与军营关涉而为用所必需，如省城保甲局、交待局、三仓局、谳局、待质局以及津贴各府属正佐各苦缺经费、亲兵日食，皆须由善后局支应，无非取诸厘金项下，归于军费通融报销。即营官、统领薪水各公费为数较巨，与例未符，实用不能实销，亦须设法融于勇饷之内。是以前次陈允庵先生有商增本省招募之勇每月银一钱三分以及随营长夫、站夫等项之议，即预为报销地步。统计各卡抽厘银两每月仅能拨支勇饷三万八九千两，而报部之数盈绌匀计，每月总在五万两以外，是每月杂项支用将近三万，遇有采办军火及意外之用，由司库酌量提拨，每年十余万或八九万不等，均归军需报销，此历年办理情形。

3. 购买军火。中法战争是一场使用热兵器的战争，需要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1675 页。

消耗一定数量的枪械弹药，而储备和补充这些枪械弹药则需要大笔经费。由于经费不足和见识低下，北宁援越桂军花费在购买枪械弹药方面的款项并不多。有数可查的，如光绪八年广东拨给的2500支前膛枪及弹药等，“此项价值约银五千两有奇”[①]。光绪九年二月。倪文蔚奏报清政府：“臣委员赴东，拨银一万五千两购办军火。”[②] 又致函徐延旭：“镜涵赴东，存银二万托购军火，冬月当可应用。”光绪十年正月，已调任广东巡抚的倪文蔚又致函徐延旭称：为购办军火，已饬善后局与新载生洋人订立合同，先付三分之一定银三万两。全部付清则须九万两。综合以上数项，可见援越桂军先后购买枪械弹药的款项约为十万两左右。利用这笔款项，只能购买价格低廉而质量窳劣的前膛枪（每枝价约二两余）约一万枝，而价格高昂的后膛枪则仅买了二百枝。

将帅无能，士卒怠战，军费不足，装备窳劣。北宁援越桂军本身的这一连串缺点，就已注定了北宁战役的失败结局。

四 北宁之战

法军于十一月中旬攻占山西后，并不急于马上向北宁援越桂军发起进攻，而是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去消化战利品，巩固后方，补充兵力。法军情报处并通过传教士在越南教民中招募了二百多名情报人员侦探各种情报，从而了解北宁援越桂军布防的要点，侦知他们的服装、旗帜和将领的名字，并用八开纸绘制出北宁周围的地形图，制出一份标有包括道路、障碍物、防御工事等内容的一览表。十二月，法军还对北宁援越桂军的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975页。
② 《中法战争》(2)，第278页。

防御工事作了火力侦察：由贝当上校率领的一个阿尔及利亚土著步兵营和一个炮兵排组成的纵队，从红河的左岸出发，经过嘉林试探前进，与在此驻防的陈德朝所部遭遇。黄桂兰、赵沃向徐延旭报告了这次遭遇战的经过：惟是上月杪间，探闻彼族有定本月初五、六、七等日来攻北宁之报，初八日复有十二、十三等日来攻宁辖慈山之言。而宁辖三江口河则有火船大小数艘常川往来。至十二日午刻，别有法军六七百人，忽由河内渡往嘉林。十三日酉刻，法兵分道四路，一由金关、大场，一由春育社，一由青庵，一由晴光社，探路潜进。经督带附近该处扼防新河之亭榜、左由、庄烈一带营垒之总兵陈德朝及王正明、副将黄忠立、守备梁云翀、义勇赵福星、黄云光等，先期布置，按以地雷，预伏河堤，一面分迎袭击。黄桂兰、赵沃等于十三（1 月 10 日）晚得报，即派副将周炳林、韦和礼、刘仁贵、李石秀、都司李定胜、尚国瑞、守备甘乃斌，各出营队五成，造饭毕，五鼓驰往亭榜援应，并带去开花炮四尊。黄桂兰、赵沃等亦各带亲兵及林丞苑生亲赴督战。乃青庵、大场两路来匪，渐将逼近王正明之营，经各营所伏奋勇截堵，致未获逞。而晴光、春育两股，忽分向青峨社掳船六只，欲于春育渡过河，势甚猖獗。陈德朝率领本营奋勇独当其冲，周炳林继之，互施枪炮。陈德朝一面派令哨弁抽带奋勇逾前，三伏三起，突至河边，夺其掳船五只，法军驶脱一船，来势稍却，合队退扎晴光。黄桂兰、赵沃随饬各营夜伏堤边，毋得收队，再挑奋勇乘夜凫水过河袭攻。法军密发枪炮抵挡，子飞如雨，已至天明，桂军未能得手。乃各收队涉河回营，法军也由嘉林渡河退回河内。为了加强新河方向的防务，黄桂兰、赵沃除饬陈德朝照常妥筹战守，未可以敌退而稍涉大意外，并将带去的开

花炮悉留陈德朝营中备用[①]。

自此以后，北宁三江口地方常川泊有法军大小军舰数艘，时往窥伺栎香总，或上新河口，或上扶朗、扶良等处游弋轰炮，或至各处不施炮即行，目的在于侦察桂军的布防和火力。对于法军的猖狂挑衅，北宁桂军不甘示弱，随时给予还击。

当时，党敏宣督率田福志、谢洲、陈天宋、王祚球、李福良、李润等营驻扎锦幢。光绪九年十二月，他们侦知法军一支小部队在芹驿关附近的丰谷村，屯积木石准备在芹驿关河岸起造炮台，以占地势。党敏宣即就近联络桃香总义民丁必应率领土人，于二十日（17 日）夜间毁其丰谷村前炮台地基。二十二日（19 日）夜，又将该炮台基前之木料焚毁殆尽。二十四日（21 日），法军开来五艘军舰到新河口的蓬莱河中，架炮向我守军炮台轰击，守军没有大炮，只能用五子连环炮还击，但各无损伤而退。

二十三日（20 日），一艘法国军舰直驶至扶朗之上的明良社，开炮轰击应、良等营，遭到桂军还击而退。

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2 月 15 日），又有三艘法国军舰驶近扶朗一带，与守军发生战斗。

正月下旬，法军又在丰谷等村筑垒架炮。赵沃拟乘其炮垒未筑成之时，乘虚摸攻，以挫其锋，即于廿七日（24 日）由北宁前赴蓬莱村居住，督饬各营官批队，于廿八日（25 日）更后分别前往摹攻。四更，将至芹驿炮屯，尚去八里之远，而法军得教民通报，已作戒备，连放开花大炮抵拒。各营官奋勇前进，摸上炮屯山脚，法军的快枪和格林炮射击更急，桂军间

① 《中法战争》(2)，第 363～364 页。

有受伤，但仍奋勇进攻。不料该教村四更鸣鼓出队，围截桂军之后。前后受敌的桂军只得且战且退，转头将教民击退，并乘胜冲开教村闸门，焚烧三座教村。时已天明，桂军只得收队。是役，桂军阵亡数人，受伤 20 余人，只缴获快枪一枝，噏枪二枝。

二月初一日（27 日），已调防六头江的党敏宣探知法军将在一个从教村庄修筑炮屯，即率队攻破该村，斩获三十余名教民。法军闻讯开炮还击，我军由于没有大炮，伤亡颇重，计阵亡一名，受伤 43 名。初三日（29 日），党敏宣再次率军攻进该村，焚烧而去。

初四日（3 月 1 日），有法国大小军舰四艘，从新河下游的河口桃香总直至威坡、锦幢。守军党英华、覃东义、覃志成、黄福茂等部即开炮轰击。法舰直驶上左治塘，并派兵数人登岸。守军马上出队，由上游击下，法军撤回船上开炮抵挡，守军被伤三人。

通过这一连串的火力侦察，法军基本掌握了北宁守军的情况，知道从河内到北宁的正面方向，桂军防守严密，兵力较强，但侧面的防守则比较虚弱。于是，在讨论主攻方向时，法军曾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从正面进攻，以主力攻打从河内到北宁公路上的防御工事，但这样必然会遭到重大伤亡；二是侧面进攻，即设法从天德江与六头江的汇流处，集结两个旅团兵力和舰队主力，从侧面进攻桂军的阵地，这样损失可能比较少，并可获得全面的成功。法军总司令米乐毫不犹豫地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案，以此为基础，他制定了进攻部署：

由波里也率领的第一旅从河内出发，越过红河左岸，沿着天德江前进，过江到志村塘与由尼格里率领的第二旅会合。第

二旅则从海阳出发，沿水路到六头江和天德江汇合处登陆，夺取镇桥及涂山的高地，从侧面进攻中国军队在天德江的防御工事，以便第一旅通过该处。两支部队的会合一旦在天德江左岸实现，会合起来的这两个旅继续向前推进，攻击清军的第二条防线，主要是用军舰炮火轰击从中山延伸到拉贝的水坝和从北宁到搭桥的水坝。击溃守军后，追击前进攻占北宁。至于发动这次进攻动用的兵力，《一八八四年法国进军越南记》认为多达一万二千人："一八八四年三月八日开始从两方面向北宁进军。尼格里将军从位于海阳方面的七塔前哨向前推进，眉胪及波里也将军在同一天早晨离开红江。每纵队约六千人。"[1] 按照军制，一个旅团的战斗人员不过三千余人，两个旅团加上米乐本人的司令部直属部队，总数也不会超过 8000 人，余下 4000 人，大概连随军长夫和后勤人员也计算在内。

当法军两路出发进攻北宁时，也是北宁桂军部署防御的时候。

二月初五日（2 日），唐景崧和刘永福率领刚刚按照滇军营制改编成的 12 营黑旗军约四千人，从兴化赶来北宁助战。初八日（5 日），刘永福接奉徐延旭的指示，命其率兵会合北宁桂军进攻嘉林，并拨给饷银 7000 两，逼码 10 万颗。刘永福遂偕唐景崧前往会晤黄桂兰、赵沃共商战事。当时，唐景崧认为北宁桂军和黑旗军都缺大炮，无具攻人，须购到大炮再议此事；赵沃因攻芹驿关无功而返，主张再次攻打芹驿关；黄桂兰则欲俟楚军王德榜部到齐再议进取；两人都不愿意与刘永福合军攻打嘉林。四人议论不一，意见分歧。在晤谈中，黄桂兰、

① 《中法战争》(3)，第 369 页。

赵沃及一些桂军将领有意无意地谈及黑旗军山西战败一事。“面斥刘永福山西之失，致不能并力战守”[①]。最后弄得大家不欢而散，“意不相洽，……遂致不和”[②]。

二月十一日（8日），法军第二旅在海军舰队炮火的支援下，进攻扶朗守军。扶朗守军是左路防营陈得贵、翟世祥、李极光、叶逢春等4营约一千五百人，兵力仅为法军的一半弱，而且“炮台无利炮”，众寡悬殊，优劣不敌，但仍奋起抵抗。黄桂兰曾向张树声禀报战况：二月十一日法军竟以大兵轮五艘、板艇十余只，合教匪约五六千人，分四路围扑扶朗防营。自辰至申接仗五时之久。法军越战愈众，枪炮密如雨点。陈得贵等将率队奋力冲击，破其重围。激战中，翟世祥、李极光皆受炮伤，哨弁勇丁均有伤损，只得收兵撤出扶朗。这时北宁也



黑旗军镇守北宁图

① 《中法战争》(6)，第253页。
② 《中法战争》(6)，第254页。

已接到警报，派韦和礼率领三营士兵前去援救。这支军队才走到半路，已接到扶朗失陷的消息。事后，对陈得贵早存成见的徐延旭致函黄桂兰、赵沃，指示要严惩扶朗守军“未战先逃，大属不成事体！尤可恨者，陈得贵一军并未接仗，带队欲逃，百姓见此景象，焉得不纷纷乱搬？若非弟大人传大令弹压，尚堪问乎！类如此等将官，理宜即按军法示众。……应请卉弟即摘去陈得贵顶戴，另择妥人管带该营，兄即拜疏奏参，不即正法，我弟兄已为厚道矣。”[①] 实际上，“徐劾得贵首失炮台，得旨与党敏宣俱正法”[②]。对于徐延旭这种借刀杀人的做法，唐景崧颇有微辞，他在日记中，一再强调陈得贵素骁勇，“守扶良不止得贵一营，而得贵独苦战半日，他营则壁上观也”[③]。“是日陈得贵力战半日”[④]。

扶朗丢失后，北宁桂军知道大战在即，立刻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

一是调远驻六头江的党敏宣所率大小八营回北宁助守，但是“党敏宣八营远避六头江外，屡调不至”[⑤]。徐延旭亦有函责之：“党敏宣全军，屡见庆弟来函，俱云调回以顾根本，何以至今未到？纵使路多教匪，全军数营何难攻进开道？即无能不敢行正路，亦当绕道而来。乃亲见洋轮上驶，不即尾追，偷安坐视。本亦当摘顶，与陈得贵同科。”[⑥]

二是增强涌球的防守力量。原议增调黑旗军1000人助守

① 《中法战争》(2)，第255页。
② 《中法战争》(2)，第115页。
③ 《中法战争》(2)，第115页。
④ 《中法战争》(2)，第113页。
⑤ 《中法战争》(2)，第114页。
⑥ 《中法战争》(2)，第256页。

涌球，但因桂军将领与刘永福不和，黑旗军变计不守涌球。“十四日（11 日），议以刘军千人守涌球，渊亭办地营十座。翌晨忽变计不守涌球。或曰，周炳林轻视之，故怒”①。

从后来的战况来看，涌球的得失关系着北宁之战的胜负结局，因此，调党敏宣八营回顾及留黑旗军 1000 人共约四千余人守涌球，有助于大大加强涌球的守卫力量，是北宁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条重要措施都落空了，这就注定了北宁战役的失败结局。

二月十四日，北宁清军已得到法军明日将要大举进攻的消息，形势十分急迫。黄桂兰、赵沃传集刘永福及统带韦和礼、陈朝纲、周炳林等，商定是夜四更造饭，天明出队。由刘永福率 11 营居中路之左；以党英华、韦和礼、覃东义、覃志成、陈世华等五营居中路之右；黄桂兰、赵沃率亲兵前往中路督战，以当法兵最重之处；留陈朝纲、周炳林统带陈得贵、翟世祥、李定胜、叶逢春、李逢正、尚国瑞、蒋大彰九营专事涌球水陆之战。各营均要鸡鸣饱饭，天曙列队，俟彼深入，则戮力痛进。

十五日（12 日），桂军和黑旗军已在榄山和桂阳一带严阵以待。按照米乐事后的报告，桂军和黑旗军的阵地是这样的：防线朝东南方向分开，以便既能保护六头江口，又能顾及拉贝水坝。水坝的左岸有个小堡垒，右岸有重重叠叠的地堡，紧邻水坝的村庄有七个四方堡。而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建筑在榄山上，山顶上修有四座堡垒，堡垒的火力能控制海阳至北宁的公路。尖山的东边一个独立丘陵的峰顶上，还有第五座堡垒，这

① 《中法战争》(2)，第 115 页。

五座堡垒使这座巍巍高山构成一个重要的阵地。

根据法方记载，法军第一旅主要是用炮兵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

十二点钟开始攻击。炮队在三千码的地方开炮，但不久即前移到更近的地方。这时中国军在工事上面或者是在山上安静地坐着，好像是一些毫不关心的观众。当着三千法国兵展开阵势准备攻击，又有气球在上空高悬的时候，必是一个很好看的情景。不久，一个炮弹在有白旗的部队上面爆发，他们最少有三分之一立刻逃走了。二十五名士兵带着四个旗子没有跑，并开始在过远的距离外放来福枪。但是不久，他们便退到山边去，留下一个人在后面。这人停留一些时候，在一千五百码处猛烈射击，虽然他枪的照尺或者只有一百码。向他开了四炮，最后一炮在他后面约三十码的山上爆发。他胆小了，拿起两个旗子就跑，比他刚才的同伴表现得更为慌忙。这可能是法军在那叫做 Trung－son 的阵地上所遭遇的最严重的抵抗。

炮队轰击村庄约有二十分钟之久，然后他们的注意集中到山上的工事。法军中的安南冲锋兵居左，海军步兵居中，非洲游击兵居右，用一排一排的枪向村庄和山麓一带的木叠工事射击。但是他们只是把枪打在竹子上而已。他们除了通过泥路走向山上以外，再没有更难作的事了。但是中国军是迅速的，他们已经在大山前面主要工事的半路上，他们中间两人有一个时候辛勤地放射抬枪，但不能伤害人。这就是敌军在 Trung－son 所有的炮火。敌军只要有几根相当好用的枪，那就是一个极难攻的阵地，只要用林明顿枪及勇气来防守，其设计得很好的交织炮火，必已

使法军付出高昂的代价。

事实上，法军未曾付出任何代价，便占领了七座炮台和二十来个村庄。①

根据中方的记载，则北宁桂军和黑旗军曾进行过激烈的抵抗：如黄桂兰多次报告都提到：当法军进攻时，他与赵沃率队亲赴战阵，自卯至申，诸军莫不用命，迭将扶良、桂阳两路吃紧大股法匪击退三次②。

赵沃则报称：

二月十五日，法军分三路来犯。右路各营已派慈山、左河、榄山并桂阳县等处，黑旗军以一千余众同赴中路之右，尚余二千仍在北宁荫桥驻扎。是日早晨，赵沃等率亲兵营林苑生、新右军林寿棠前至桂阳县后，其义字营覃东义、抚标左军左营党英华、成字营覃志成、田福志、尚国瑞、韦和礼，正在开仗吃紧。赵沃即留亲兵三十名为卫护，其余均饬林苑生、林寿棠率同哨长林祖德、连永超、王贵邦前去援应。乃至半途，遇敌开仗，自辰至午，法军添队来冲，林苑生、林寿棠悉力击退。法军复整队而来，黑旗军黄守忠略为退却，赵沃亲赴黑旗军，饬令次队稳扎，再饬林苑生、林寿棠力为坚持，法军退去。而左河之敌正与桂字营、茂字营、抚标前军右营黄才贵等交战。法军于左河、扶良各放一气球四处高望，即分三路进攻，而赵沃在中路督战，法军退去稍远。③

刘永福则禀称：

① 《中法战争》(3)，第370～371页。
② 《中法战争》(2)，第396页。
③ 《中法战争》(2)，第401～402页。

十五日卯刻，职员饬黄守忠督带福字前、后、正、副等四营前赴江柳、江桃等社要路，吴凤典督带福字正左、副左、副右、亲兵右营等四营前赴凤毛社两边要路，职员亲督福字正中、副中、正右等三营在榄山地营，听前敌较紧者即驰援助。

维时坚伏未久，忽据前敌飞报，彼族将轮船驶抵塞河上约五里登岸，格伦炮五架、开花炮二十架，迤逦进扑原扎塞河附近一带之防军陆营，炮声如雷，氛烟盈野，该防军不发一炮，弃甲曳兵而走。职员望见，不胜惨然，即饬黄守忠、吴凤典督率八营进前接应，期挫凶锋。自辰至申，共计血战五辰，炮声联响，人语不闻。彼族抵敌不住，半退半躲，或下轮船，或避江柳、凤毛等社内蔽。职员力督三营，直兜其后，众军起舞，莫不奋勇争先。[1]

根据法方记载，清兵未作什么抵抗便已溃退；而根据清方记载，他们不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且多次击退法军的进攻。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应作如何解释呢？我认为，除了双方记载都有夸张外，还与各自的价值观念不同有关。清方击退的，也许只是法方的少数先头斥候部队，而这些部队的任务仅仅是侦察对方的火力，并非打硬仗，因而稍遇抵抗即撤退，让大部队来打硬仗，清军却认为是多次击退对方。反过来，在法方看来，只有前膛枪和抬枪的清军的射击并不能致人死命，因为这种射击并无可怕，算不上真正的抵抗。所以两方的记载才有那么大的差异。

在黄桂兰、赵沃和刘永福的报告中，都提到他们的抵抗因

① 《中法战争》(2)，第408页。

为涌球的失守而动摇。那么，涌球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呢？

根据米乐的报告，当波里也率法军第一旅进攻黄桂兰、赵沃、刘永福等军据守的正面阵地时，尼格里率领的第二旅则在海军的协助下，避开正面的清军，而从侧面发起攻击，任务是夺取从榄山的最后山坡起一直排列到六头江和拉贝水坝的村子。队伍从早上6时30分出发，经过侦察，尼格里决定分兵两路：一路在海军的协助下从正面进攻水坝，一路则偷偷从后路袭取水坝背后的教堂，从背后威胁水坝的守军，腹背受敌的守军将只得突围撤退。

米乐所谓的拉贝水坝，大概即是中方所谓的涌球或冲沟（土语呼河为涌，桥为球）。关于涌球之战，黄桂兰、赵沃禀称：涌球水陆力战至申，各多伤亡。嗣匪勾通天主台教民截我军后路，暗挖塞河，各路仍力战[①]。又称：法军一面分队至涌球之塞河处所，与周炳林、黄云高、李逢桢等营接仗。正在相持，后面教堂向我轰炮，教民四起，我军腹背受敌，皆困重围之中[②]。《关外随营笔述》则称：十五日，法军分三路进扑北宁，一由轮船驶至城北之涌球，所经过我军用一尺二寸面大木塞河之处，轮船立刻用士颠机器顷刻拔起，毫不能阻。涌球有竹筏大桥，轮船至，先毁竹桥，以断援兵之路，涌球至午遂陷[③]。二月廿一日，徐延旭奏称：法人于十五日黎明，由河内添来悍党数千人，兵轮九艘，合前船众，由扶良水陆直上涌球，并分攻新河、三江口各处。驻防涌球之提督陈朝纲所部数营齐出抵御，总兵韦和礼、副将周炳林、都司李定胜、黄云高

① 《中法战争》(2)，第395页。
② 《中法战争》(2)，第523页。
③ 《中法战争》(3)，第65页。

等营飞驰接应，自卯至申，敌已且战且却，因我军火药用完，被敌乘势夺踞涌球各土山炮台，我军败退涌球两岸[①]。

但是，也有记载揭露涌球守军并未力战即弃阵溃逃。如刘永福指出：法军“将轮船二艘驶抵涌球，所有驻扎沿河一带防军十有余营，纷纷奔走。该匪远眺，势益增雄，即行登岸，炮声一响，而驻守涌球一带高山之防军数营弃枪抛甲，孤手直趋，该高山营盘被其占踞”[②]。唐景崧在二月十七日（14日）就闻知：“法轮突驶入涌球，而守涌球之提督阵朝纲两营闻炮顿溃，周炳林营在附近亦溃。”[③] 他于战后受命点验桂军，曾将点验涌球守军的情况报告徐延旭，认为并未力战，建议给予严惩重治：“本日约同王、康两提督先点陈朝纲、周炳林、叶逢春、李逢桢四营。炳林之前军中营，人最不堪，形同乞丐，而军装甚足，似无接仗被挫之形。叶逢春一营，全无号衣，队伍杂乱。李逢桢仅百余人，情形尚无作伪。陈朝纲一营略整，然守涌球要地，而伤亡仅二十人，是其未败先逃之明验。俟事稍定，必治陈、周以重法，始能作士气而儆人心。”[④]

涌球既失以后，北宁已无险可守，很快也就陷于法军之手。关于北宁失陷的情况，也有两种矛盾的说法。

赵沃两次禀称，有涌球失守后，他曾赶回北宁筹备坚守。在二月十六日（13日）的一份以黄桂兰、赵沃共同署名，实际可能出于赵沃手笔的报告称：法军“申刻已到涌球入城，张登幢已吹洋号迎之；桂兰等回城，已救之莫及。各勇以城不

① 《中法战争》(5)，第295页。
② 《中法战争》(2)，第408～409页。
③ 《中法战争》(2)，第115页。
④ 《中法战争》(2)，第122页。

守，子药均存城中，其四方教民鸣鼓响应，坚围至夜，被该匪炮轰如雨，各勇心寒，渐私逃散。时势如此，桂兰等亦迫得乘夜而退，所有衣服、文案、公件、银钱均为彼有矣"[①]。而在二月廿日（17 日）的报告中，赵沃更是绘声绘色地把自己描述成临危不惧的英雄：涌球失守后，维时黄统领已先回城，刘团亦继回城外。职道迫得回城，商调慈山各军来援，以固根本。当已派差官前调，而该匪之炮已击入城。职道到城外，以慈山之军不能应急，饬令将饷项文案各人均皆入城，以为坚守之计。而该匪已由涌球分党将至北宁闸门。职道急饬田福志并小队新右军坚守闸门。当此事势已迫，商之刘团，许赏花红银二万两，夺回涌球山顶炮台，乃刘团再三不允。职道复单骑入城，营官林苑生等随至，而张总督、黄统领均已出城，刘团亦退。职道再四筹维，空城难守，当即下马，以为城失身亡，而报答宪恩，无如各哨弁差官及亲兵推拥出城，只得苟免偷生[②]。

但据二月十九日（16 日）黄桂兰给徐延旭的报告，声称他和赵沃在回北宁途中已知城失，并未进城即已退走，从而否认了赵沃所谓回城筹守的说法："缘是日敌人队伍枪炮多我数倍，益且精利较胜。维时春娥社教民由后杀出，施放枪炮，各军腹背受敌，皆困重围之中，犹与混战，至暮未退。旋闻法人已由陆路窜踞涌球，分兵进取北宁信息，弟遂偕庆翁率队透围而出，急急回兵，冀图返城坚守。不料张登檀带领女眷及南兵多名，大开城门，先行走避，假称亲往刘营求援等语。致令城

① 《中法战争》(2)，第 395 页。
② 《中法战争》(2)，第 40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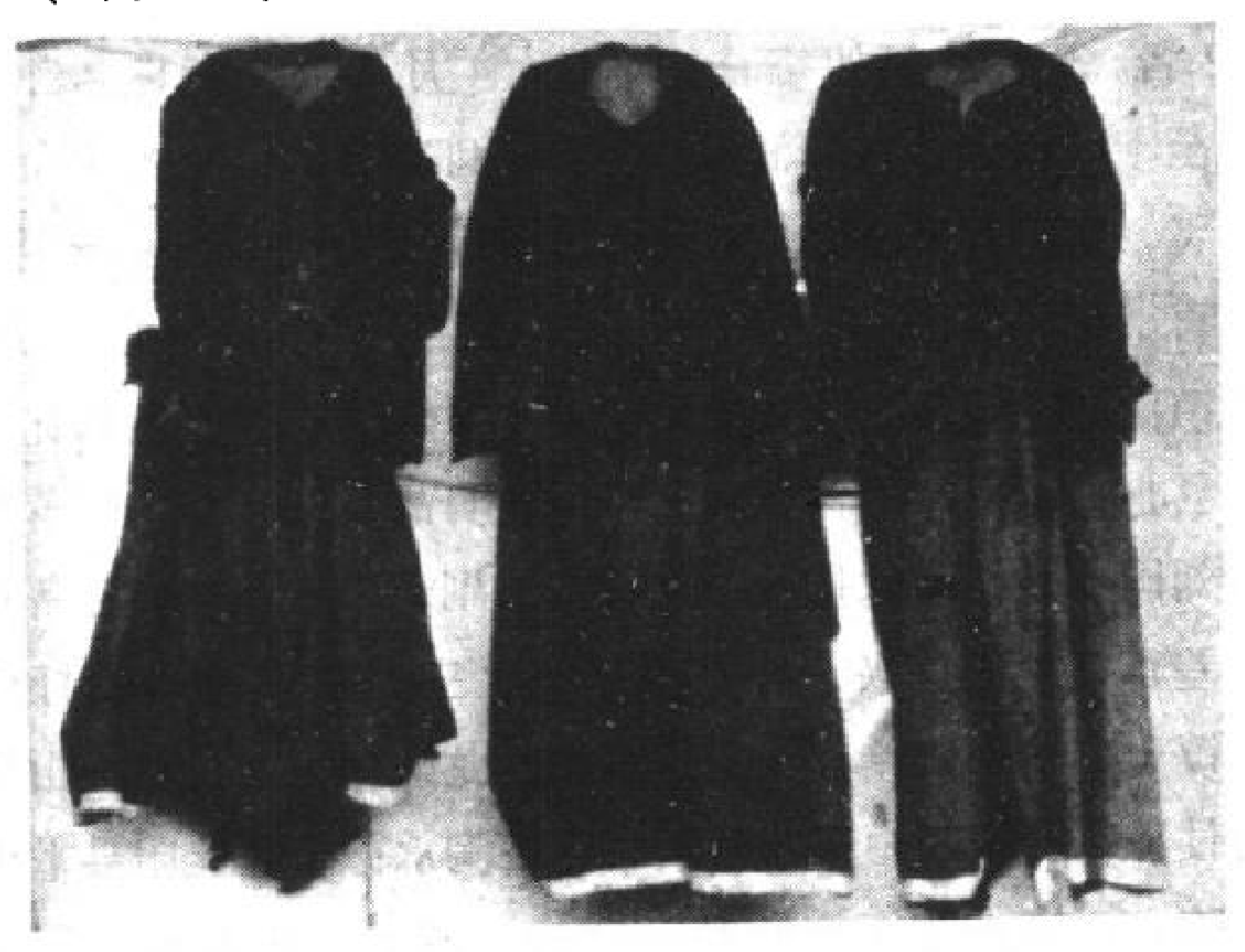
厢内外民人，见之纷纷惊逃，而近城教民人等，穿戴鬼衣鬼帽，起兵应敌，导引法兵入城，四面拦路劫杀。弟与庆翁半途得此警报，知北宁城已失陷，回救无及，登即商定兵分两路退走，以便沿途招集溃出勇丁，免使溃散莫聚。"[①] 在稍后给张树声的报告中，黄桂兰重复了上述说法。

法方记载对赵沃的说法也不利："这位阿尔及利亚的将军（尼格里）激战终日，占一个又一个的高地，一座又一座的堡垒，攻陷无数的村庄与庙宇，他仍然紧迫地前进，只遭遇到比另一纵队多一点点的抵抗而已；不过他进逼得太厉害些，以致踩到了中国军的脚跟就是了。向北宁进军的最后一天，法军死五人，其中一名是伍长，被一发炮弹切为两断，并有二十五名受伤。中国军放弃一切抵抗的念头，只想法渡过六头江。五点钟时，炮队从北山上轰击北宁，但华军业已撤出该地。六点时，法军纵列进入。"[②] 这与唐景崧当时了解的情况相似："敌夺涌球，曳炮阜顶，俯击北宁城。弹三落，城市哗奔，越官张登憻等开城遁。黄、赵犹在阵前，惊闻后路失，亟撤队回城。乱军苍黄，势不能守。黄统领闭户将自缢，周炳林、陈朝纲、尚国瑞携提督印强掖以行，遂与赵统领并奔太原，勇营四溃。"[③] 就是说，在法军的紧逼追击下，清军根本没能组织抵抗，赵沃所谓的种种守城措施，可能只是事后的谎报而已。

北宁丢失后，北宁桂军及黑旗军已全无斗志，纷纷向谅山方向溃退，急于进兵兴化的米乐认为继续长驱紧逼未必有利，只须再攻占谅江府作为前哨阵地即可。于是又分出两支轻骑

① 《中法战争》(2)，第396～397页。
② 《中法战争》(3)，第371页。
③ 《中法战争》(2)，第115页。

兵，由波里也率第一旅的 2000 人，携带八天给养，追击太原一路的清兵。在太原城下，清军曾企图组织抵抗，但在法军威力强大的洋枪洋炮的打击下，很快就崩溃了，法军顺利地占领了太原。根据米乐的明确命令，波里也没有留下军队踞守太原，而是很快全军撤回北宁和河内，以便参加兴化之役。但据赵沃二月廿八日（25 日）的报告，似乎丢失太原应归咎于越南官员的背叛："职道前赴太原，十七（14 日）晚抵境，分饬各勇归队，发米勉支。……当饬陈德朝稳守太原、富平一带。讵料北宁按察使阮玉振引该匪分兵水陆由北宁新省来犯太原，我军前途拒敌，梁云翀，最为得力，正拟击退，而南官已献城，实出意料之外。"① 当法军退出太原后，陈德朝于三月初八日（4 月 3 日）督饬所部及军功方金安、覃志成等五营，挑



法军军服

① 《中法战争》(2)，第 402 页。

选奋勇，连夜疾趋，于初九日（4日）收复太原和富平。但法军很快又将清军赶走。当法军撤出后，清军又再次占踞太原。不久以后，法军再前来，清军焚毁太原后撤出，留给法军的只是一片焦土。

另一路法军2000人由尼格里率领，携带六天口粮，追击谅江方向的清军。二月十八日（3月15日）法军攻打谅江，清军于德富、甘乃斌、李定胜、晋文治等营败绩，李定胜与帮带郭涌泉俱受伤。时党敏宣适以未战，全师过谅江遇敌，诡称觅统领，驰去不顾。十九日，法军进攻离郎甲20里的左溪，提督王洪顺所率绥南四营败绩，退往屯梅，法军进占郎甲。清军军火屯积于此，至是尽落敌手。

北宁之战，据米乐报告，法军阵亡26人，重伤3人，轻伤22名。而据徐延旭三月初十日（4月5日）奏称：自二月十一至十九日，扶良、涌球、谅江、郎甲各战，将士拼命，敌炮纷飞，实属凶恶异常。现据已报到者，伤亡勇丁一千余人，其营官、哨弁自副将以至千把受伤者二十余员。阵亡十员为：统带镇南右军兼带中营提督衔记名总兵克勇巴图鲁韦和礼，在桂阳县打仗，炮断右臂，越七日因伤身故；镇南左军中营哨官游击刘国勋，在涌球打仗阵亡；奋勇副营帮带都司衔守备黄效忠、差官把总班有兴、外委曹正亮，三员均在粤云社打仗阵亡；镇南中军中营差官守备刘辅贵、龙殿邦，二员在揽山凤毛墟打仗阵亡；镇南中军左营哨官守备陶承德，在桂阳县平田村打仗阵亡；镇南前军中营哨官守备卢威志，在粤云社打仗阵亡；镇南右军中营差官把总韦家福，在凤毛墟打仗阵亡[①]。三

① 《中法战争》(5)，第319页。

月十五日（4月10日），张树声奏称：黄桂兰所部左营打仗受伤身故及当时阵亡将弁共28员名，阵亡勇丁510名，受伤勇丁234名。赵沃所部右路各营未据报有临阵伤亡者①。

将中法双方的伤亡数字作比较，可见北宁桂军是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而法军却是轻易取胜。

导致援越桂军北宁战败的原因，首先应归结为法军人多势众。进攻北宁的法军是由新式洋枪洋炮洋舰武装起来的两个旅团约八千人，这在当时是一支相当强大的攻击力量，北宁桂军不是它的对手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其次，因为越南政府的投降法国，作为清军参加这次作战的基础"援越"已不存在，官兵缺乏作战的目标和动力，以至一触即溃；再次则是清政府的决策不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开始，清政府并无意与法军兵戎相见，却惑于"示形慑敌"策，下令战斗力较差的广西防军入越。等到弄假成真，大战在即的时候，清政府再想在短期内加强援越桂军，却已是远水难救近火，缓不济急了，最终无助于彻底改变援越桂军的状况。最后，是桂军本身那种将帅无能、士卒羸弱、装备窳劣、军饷不充的状况，也不足以担负抗法的重任。

《申报》曾载文指出：在北宁之战中，华军并不与法兵力战。这种低下的战斗力，引起法军对清军的轻视，成了后来他们敢于轻易向中国挑衅的原因。因此，北宁桂军的惨败，不仅是自身的悲剧，也是国家和民族落后造成的悲剧。

五　清政府惩处失事官员

北宁战役规模虽然不大，但是，由于清政府在战后对有关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六，第9页。

官员给予严厉的惩处，却对未来的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对战败负有直接责任的援越桂军将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

首当其冲的是广西巡抚徐延旭。在闻知北宁败耗后的第三天，清政府就于光绪十年二月十九日（3 月 16 日）有旨：将徐延旭“先行摘去顶戴，革职留任”①。当时，大概清政府还希望徐延旭会振作起来，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还会有所作为。但是，太原等地相继丢失的败报接踵而来，极度失望的清政府于廿九日（26 日）加重了对徐延旭的惩处：“现在法人鸱张日甚，自攻占北宁后，昨据李鸿章电报，越之太原又为法人攻取。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关外军情万紧，潘鼎新奉到此旨，即日驰赴广西镇南关外，传旨将徐延旭革职拿问，派员解交刑部治罪，广西巡抚著潘鼎新署理。”并迁怒到云



1884 年 4 月，法军占领越南兴化

① 《中法战争》(5)，第 317 页。

南巡抚唐炯，同日有旨："前派唐炯督带滇军，防守越南山西等处，乃该抚并未奉有谕旨，率行回省，以致边防松懈，当经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以示薄惩。连日山西、北宁、太原相继被陷，皆由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殊堪痛恨！著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派员解交刑部治罪，云南巡抚著张凯嵩署理。"①

徐延旭于光绪十年五月从广西解送京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2日）到部，十二月初八日（24日），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奉旨会审，当即遴派章京、侍读、司员公同讯问。开始，徐延旭还推卸责任，呈递亲供为自己辩解："大致以驻扎谅山为经营后路，北宁失守则诿之统领黄桂兰、赵沃二人与刘永福语言不合，致不能并力战守。并谓法人进攻谅山，伊极力堵御，附近数省得以保全。"但在会审官员的质询下，徐延旭才承认了自己的罪责："驻扎谅山，实因见事迟滞，未克前进。黄桂兰面斥刘永福后，周炳林亦向申说，致不能和衷，由伊督率无方。勇丁吸食洋烟，因瘴疠未能禁绝。前敌有无携带妇女骚扰，实系查核未周。至误用党敏宣，实由知人不明。……并称伊才庸识暗，致失机宜，辜负天恩，万死莫赎，只求皇上从重治罪。"② 十二日（28日），世铎等根据审讯结果，定拟徐延旭的罪名奏上："徐延旭合依领兵官已承调遣，逗留观望，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③ 得旨："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定拟已革巡抚唐炯、徐延旭罪名各一折。已革云南巡抚唐炯，出关督师，并不

① 《中法战争》（5），第287页。
② 《中法战争》（6），第252～255页。
③ 《中法战争》（6），第263页。

听候谕旨，率行回省，以致军心怠玩，越南之山西、北宁等处相继失陷，实属罪无可逭。已革广西巡抚徐延旭，督办广西关外防务，始终株守谅山，迁延不进，所统各军毫无纪律，又复任用非人，相率溃败。律以失误军机，尚复何词以解？唐炯、徐延旭均著照所拟斩监候，秋后处决。"①

接着受到惩处的是黄桂兰、赵沃。三月十二日（4月7日）有旨："黄桂兰等不能实力堵御，罪无可辞，著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派员解京，交刑部治罪。"②十日（5日），预感前途不妙的黄桂兰，因其老上司张树声有函责其丧师失律，为淮人羞，心情沉痛地复函张树声诉说苦衷：

提督自光绪五年调办左江边防，统领各营，迭将关外匪首陆之平、李亚生、杨大加伙、覃四娣等，或剿或抚，歼除净尽。七年八月督军出关，密筹布置，于今三年。及越南之河内、南定两省先后为法所陷，提督因南官之请，进驻谅江，并分营扎北宁、涌球一带，其时仅所部一军，未尝稍有畏怯。上年五月，抚臣徐延旭奉命出关，右路统领道员赵沃亦奉派至北宁协同驻守。方幸指臂有助，岂意竟有本年二月十五日之败。维时提督于重围内闻报北宁已陷，为统带陈朝纲、周炳林等拥护而出；所以缓死须臾者，窃意谅江一带，尚有抚臣派防重兵，苟能固守，恢复不难。迨闻谅江、郎甲相继亦为法踞，大局已坏。尚冀收集各军再图一决。讵于二月二十九日（3月29日），连接

① 《中法战争》(6)，第259页。
② 《中法战争》(5)，第294页。

抚臣咨函，请回谅山商理紧急事务，并将提督所部各营概行拨归主事唐景崧节制调遣。提督迭商愿仍任前敌以拼一死，迄不允从；言之再四，始佯许给五营，而军火粮饷及接应之师均无从出。抚臣之心，固早默识，独恨提督未能在北宁立时授命，迁延一月，实负鸿慈。今当兵权尽撤，力竭计穷，目击时艰，一筹莫展。自念受恩深重，既不能向疆埸努力赎罪，又曷若一死明志。沥血披诚，遗咨恳请哀矜，据情代奏，以表寸心。[1]

当天夜半服毒，左右救之以汤，黄桂兰拒曰："吾岂可再活人世哉!"延至十六日（11日）午刻卒[2]。

紧随黄桂兰之后丢掉性命的是陈得贵和党敏宣。早在二月廿九日，张树声就奏请："已革总兵陈德贵，以革员留营，仍不知愧奋防守，扶良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素行奸欺，光绪六年经臣严饬回籍，不准逗留防营。此次徐延旭因该将为赵沃信任之员，复令统带勇营，出队落后，畏缩不前，尤皆罪无可逭，应请将陈得贵、党敏宣二员即在军前正法，以肃戎行。"[3]清政府纳奏，于三月十七日（4月12日）有旨命令潘鼎新、王德榜，将陈得贵、党敏宣即在军前正法。五月初二日（5月26日）夕，潘鼎新等遵旨将陈得贵、党敏宣于谅山正法。

在三月初十日（4月5日）的奏折中，徐延旭就提出要追究失事各将弁的责任：提督陈朝纲、副将党敏宣、周炳林皆身充督带，乃或怯于督战，或失于救援，实属恇懦无能；且遇事巧滑，纪律不严，均未便稍事姑容。相应请旨将记名提督陈朝

① 《中法战争》(5)，第369页。
② 《中法战争》(2)，第129页。
③ 《中法战争》(5)，第300页。

纲、补用副将党敏宣、周炳林，均即革职，以示惩警，仍留军前效力，俾不得置身事外。但清政府胃口比徐延旭更大，在三月十七日的谕旨中，用相当严厉的语气指示潘鼎新追究所有溃败将弁的责任："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①

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查取证后，六月底七月初，潘鼎新按照溃败将弁的不同情况和责任大小，分别拟定处分轻重的意见奏上：除黄桂兰业经革职身故及陈得贵、党敏宣已被正法毋庸议外，臣查已革道员赵沃久驻北宁，专办防务，乃一遇敌踪大至，竟不能固守待援，本应以从重治罪。惟念其庸懦衰颓，驭将无法，致令临时抗调，尚非统将先逃。然贻误事机，咎无可免。已革提督陈朝纲，身充统带，驻防涌球，虽因六头江、扶良已先失事，势难抵御，究系防守不力，仅予革职，不足蔽辜。拟请将已革道员赵沃、已革提督陈朝纲，一并请旨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效力赎罪。革职副将周炳林，调派策应，接战受伤，且阵亡哨官罗威志，并非退缩不前，业经革职，请免置议。此外将弁，臣逐一查明。如随同党敏宣疏防六头江、三江口之游击谢洲、田福志、千总李应光、军功李福良、李润、高岳嵩、陈天宋；驻防北宁守御不力之参将蒋大彰、守备贾文贵；失于援应之副将李石秀、黄才贵；退扎新街之总兵陈德朝、把总黄云光、赵福星、军功方金安、黄福茂；纪律不严之军功覃志成、千总李全忠等，皆有应得之咎，既经查明，不敢徇隐。所有谢洲、田福志、蒋大彰、贾文贵、李石秀五员，均拟请旨一并革职。黄才贵、陈德朝二员，平日打仗尚属奋勇，

① 《中法战争》(5)，第301页。

均拟请旨以都司降补。其李应光、李福良、李润、高岳嵩、陈天宋、黄云光、赵福星、方金安、黄福茂、覃志成、李全忠等十一弁，均即由臣咨部斥革。内覃志成一弁，所部骚扰尤甚，徐延旭本拟惩办，以远在前敌未果，臣仍当随时察看，酌量办理。至驻防北宁之李逢桢、尚国瑞；协防扶良之李极光；驻防谅江之晋文治、李定胜、郭涌泉，并连日打仗，各受重伤。其余各营，或以道远势孤，力不能支；或以甫经到防，扎营未定，是皆不无可原。可否吁恳天恩，从宽免其查办，出于逾格鸿施[①]。览奏后，清政府很不满意，于七月廿四日批复，严厉指责潘鼎新"酌拟惩办失事员弁，殊多轻纵。军政首在赏罚严明，何得轻率瞻徇！著传旨申饬！"并加重了各将弁的罪名和惩处：已革道员赵沃、已革提督陈朝纲，本应军前正法，惟念北宁被陷，系越官开门迎敌，该革员回救不及，尚有一线可原。所拟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之已革道员赵沃、已革提督陈朝纲，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即解交刑部监禁。已革副将周炳林不能联络刘团，以致偾事；军功覃志成所部骚扰地方，情节较重；均著改为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所请革职之游击谢洲、田福志、参将蒋大章、守备贾文贵、副将李石秀，均著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所请以都司降调之总兵陈德朝、副将黄才贵，均著改为革职。所请咨革之千总李应光等十名，均著斥革，不准留营。余著照所议办理[②]。

当时，中法已经宣战，前敌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清政府这样过重地惩处失守北宁的桂军将弁，打击面过宽，未免不合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 2188 页。

② 《中法战争》(5)，第 539 页。

时宜。所以，虽然受到指责和传旨申饬，潘鼎新仍本初衷，在自己能力所及，尽量保全一些将弁，让他们在抗法战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十一月十六日（1月1日）奏报清政府：除已革提督陈朝纲病故外，受惩诸将弁奏恳赏准留营效力，以昭激劝[①]，亦为清政府驳回。

至于赵沃则迟至十一月始被解送京城，与徐延旭等一起被判斩监候。光绪十二年十一月有旨：徐延旭、唐炯、赵沃，均著加恩免予勾决。徐延旭、赵沃著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唐炯著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效力赎罪[②]。据说，徐延旭未及出都起行，即已病卒天牢之中，赵沃则不知所终。

其次，对于北宁战败负有间接责任因而遭到惩处的官员也不少。如战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中枢机构军机处对法态度软弱，和战大局当断不断，贻误战机，前敌将帅选择不当，已经不能担负指挥和领导抗法战争的重任，撤换军机处已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据说一心想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早已嫌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等人不够驯服，碍手碍脚，千方百计要寻找机会搬去这些绊脚石。北宁败耗传来，慈禧太后认为是一个动手的机会，于是在三月初八日（4月3日）召见军机大臣时，大谈"边方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等等，言词严厉，实际是指责军机大臣因循失职，为罢免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

凑巧这天祭酒盛昱上奏，要求追究山西、北宁失守的责任。说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到两年即分任云南、

---

① 《中法战争》(6)，第208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2186页。

广西巡抚，系由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犹不足论，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负安危之局，却轻信滥保，责任难逃；奕訢、宝鋆久值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乃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与李鸿藻同，均应负连带责任。为此请慈禧太后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交部议处，责令戴罪立功，认真改过。

慈禧太后接到盛昱奏折后，如获至宝，为便于实施其变更朝局的阴谋，先将其留中不发。次日，即命奕訢往东陵为慈安太后之死三周年行祭奠礼，支使离京。然后慈禧太后借赐奠为名亲临寿庄公主府第，却在那里召见醇亲王奕譞，共同密谋如何罢免奕訢，由奕譞接管军机处这一重大问题。议定由奕譞负责草拟罢免奕訢等军机大臣的上谕，以及接任军机大臣的人选。三月十二日（7日），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奕譞、孙毓汶等心腹亲信，研究确定了替换全体军机大臣的行动计划。十三日（8日），当奕訢从东陵回京准备向慈禧复命时，“革除奕訢及全体军机大臣的上谕，已由内阁明发下来了”①。其中提到：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老年，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訢著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著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至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和，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

① 宝成关著：《奕訢慈禧政争记》，第320～325页。

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①]。同年十二月，在定议徐延旭等人的罪名和处分时，同旨还提及奕䜣等军机大臣的责任："前军机大臣恭亲王、宝鋆、李鸿藻、景廉，于带兵大员未能详慎遴选，辄行请旨擢用，实属昧于知人，业于本年三月间降旨惩儆，所有应得处分，著加恩宽免。"[②]

在罢免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全体军机大臣的同时，慈禧太后还任命了新的军机处，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五人组成，并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谖相办。"[③] 从此结束了慈禧与奕䜣二十多余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最终确立了慈禧太后的独裁统治，使中国的政局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过，就中法战争而言，新上台的军机处比其前任对法态度较为强硬，一些措施如始终拒绝对法赔款、毅然对法宣战、启用刘铭传、冯子材等将帅也较为得力，对于后来战局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取得中法战争的胜利。

受到北宁战败的牵累而丢官的还有两广总督张树声和驻法公使曾纪泽。

从名义上看，两广总督兼辖广东、广西，虽然实际上驻节广州的两广总督并不过多过问广西的事务，但是，由于与黄桂兰有特殊的关系，因此，老于官场的张树声知道自己对于北宁战败是脱不了干系的。在二月廿九日奏报北宁战败情形时，张树声就主动承担责任，自请交部严议："臣职任兼圻，无能补助百一，相应请旨将臣一并交部严加议处，以为疆臣不职者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 1675～1676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259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 1676～1677 页。

戒。”三月十七日，清政府批复：“张树声职任兼圻，咎有应得，究属鞭长莫及，加恩著改为交部议处。”[①]

然而，张树声知道事情不会这样简单就可结束，因而又在三月廿五日（4 月 20 日）上奏请开去两广总督缺，以专治军事。大意谓前在直隶总督署任时就屡以衰病乞退，回任两广后，脾泻胃弱咳逆畏风不寐眩晕等症，稍感辄发，有增无减。入春以来复咯血数次，精神委顿尤异常时。现在越南北宁、太原相继不守，广西边军失律，边防海防益形吃紧。臣病惫之余，断不堪经纬南服，仰恳圣慈俯念粤东系南洋首冲，两广事繁任重，恩准将臣两广总督缺开去，另简大臣前来接任，以免旷误。由臣将所部抽带赴西，出扎关外，亲当一路，必与潘鼎新共矢同仇，力固残局[②]。

张树声的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未等他的上述奏折呈递到京，清政府便借潘鼎新奏报北宁桂军纪律败坏之机，追究张树声的责任，于四月初四日（4 月 28 日）有旨：“张树声身任兼圻，有统辖营伍之责，粤西各军毫无纪律，一至于此，该督何以漫无觉察？张树声著传旨申饬。”看到张树声圣眷渐衰，一些朝臣纷纷上奏，参劾“两广总督张树声不符物望，难胜兼圻。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任情徇私”。弹章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追究张树声对于北宁战败的责任。如称：去岁越南不堪法人苛令，戕其国主，张树声若能乘机亟往定乱，越南民心尚未尽向法人，犹可挽回。乃张树声既不自往，又不遣人前往，致法人从容定计，收拾人心，越事遂不可问；广西

① 《中法战争》(5)，第 301 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六，第 6～8 页。

是该督兼辖，屡闻警报，乃竟视为膜外。乃至北宁势不能支，始遣王德榜、方长华接应。援兵未至，要隘已失。复于败衄之后，自请处分以为尝试等。都是一些“本无其事，传闻失实，或原无大过，责备太苛，或已经圣裁，不必追论”的事情，张树声不难一一辩解。如有弹章称：“此次广西溃败之提督黄桂兰，素为张树声、倪文蔚所信任，道员赵沃则为徐延旭所信任，故两人不和。张树声又意存左袒，黄桂兰因益骄怙，不受徐延旭节制，以至于败。”张树声则辩称：“广西边防向由西抚臣主政，委任将领，调度各营，粤督不参异同。前抚臣徐延旭出关视师，黄桂兰与赵沃分统左右两路防军，一切军事皆禀承徐延旭，树声实无事左袒，徐延旭前后函牍亦从无言及黄桂兰骄怙不受节制之事。”①

但是，这时再行辩解已属多余，清政府在未曾查实弹章所奏各事之前，已就张树声自请解去总督之奏，顺水推舟于四月二十八日（5月22日）降旨：张树声著开两广总督之缺，仍督所部办理广东防务，两广总督著张之洞署理。闰五月，又借口张树声按事不实，改为革职留任②。九月，张树声病死于广州。

我们在前面提到，在曾纪泽出任驻法公使前，清政府对于法国的侵越行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消极回避态度。曾纪泽使法后，认为法国的侵略野心很大，如果任其吞并全越，难免不会得陇望蜀，染指我国西南边疆。因而从保护中国边境安全出发，力主中国改变态度，出面过问法越战争，阻止法国的侵略势头，其主观意图是爱国的，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在分

① 《中法战争》(5)，第586～592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1739页。

析敌我友的实力对比时，他过分乐观，认为法国已被普法战争的失败所削弱，中国则因举办洋务运动而日渐强大，加上越南政府有联华抗法的要求，因此，只要中国“示形慑敌”，以“保藩固边”的名义出兵援越抗法，法国就会收敛它的侵略势头。事实证明，曾纪泽对形势的估计完全脱离了现实，因为法国虽已虚弱，但却未弱到不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地步；中国虽已渐强，但还未强大到能轻易地抗衡法国的程度；至于越南政府的联华抗法要求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只要稍受压力，越南政府便会很快改变立场。而北宁战败的惨痛结局，证明曾纪泽的预测和努力失败了。三月，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致函李鸿章时，就以战胜者的口吻，肆无忌惮地对曾纪泽进行冷嘲热讽：“中国公使曾侯，竭其生平智能，用去许多银钱，方能命各国新报并法国许多新闻纸替中国说话。今各新报尽以曾侯为笑柄，于中朝体面不无小损。英国代谟斯在法京之探报，现在不但不感曾侯之恩，且甚鄙夷曾侯，不啻以脚踢之。”并要挟清政府撤换曾纪泽，作为中法议和的先决条件[①]。

这时，新的军机处已决定抛弃曾纪泽所倡议的“保藩固边”政策，默认法国吞并全越的事实，只惟恐法军乘胜侵及中国边境而急于与法议和，因而屈服于福禄诺的压力。根据总理衙门的奏请，以任期已满为理由撤换曾纪泽，于四月初四（4月26日）有旨：“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许景澄著充出使法国、德国并义、和、奥三国钦差大臣，未到任以前，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著李凤苞兼署。”[②] 从而免去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

① 《中法战争》(5)，第309页。
② 《中法战争》(5)，第320页。

此外，还有一些朝臣由于举荐或庇护唐炯和徐延旭的原因，也受牵连而遭惩处。光绪十年十二月有旨："李鸿章、左宗棠，于唐炯罪名未定之先，辄以人才废弃可惜奏请录用，殊属冒昧。丁宝桢以唐炯人才可惜代为乞恩，且于陈奏所部官弁殉难恳请建祠折内胪举唐炯从前战绩，尤属有意铺张。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著交部分别议处。涂宗瀛前经荐举徐延旭于属员内遴才保奏，厥咎尚轻，著交部察议。张之洞保荐徐延旭兼资文武，实属失当，惟该督于简任两广后，征兵筹饷，颇著勤劳，著从宽交部察议。陈宝琛、张佩纶力举唐炯、徐延旭堪任军事，请饬分统滇、粤各军出境防剿，卒至偾事，贻误非轻；张佩纶会办闽省防务，马尾一役，尤属调度乖方。陈宝琛著交部严加议处，张佩纶著即行革职。该员尚有被参之案，即著来京听候查办。"[①] 最后议定：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钦差大臣、大学士左宗棠，均著照部议降二级留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应得降三级调用处分，著加恩改为降三级留任。前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之洞，均著照部议降一级留任。前内阁学士陈宝琛著照部议降五级调用[②]。张佩纶则数罪并罚："张佩纶前因滥保徐延旭等降旨革职，左宗棠等所请交部议处，殊觉情重罚轻，著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③]

通过这样的追究责任，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撤换和惩处了一大批官吏，从而影响了军机处以及广西、广东、云南等省的政局，为以后的事态演变准备了条件。

---

① 《中法战争》(6)，第259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1888页。
③ 《中法战争》(6)，第284页。

第六章

清政府整顿台湾防务

一 刘璈筹防台湾

台湾位于我国的东南海中①，北临北海，东向太平洋，东北与日本的琉球群岛为邻，南与菲律宾群岛相望，西北与大陆相隔一条台湾海峡。它由三组岛屿组成：一为台湾本岛及其14个附岛；二为澎湖列岛，有64个岛屿；三为钓鱼群岛，有8个岛屿；加上一些其他岛屿，共有大小岛屿一百多个。它的陆地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其中台湾本岛即占3．57万平方公里，澎湖列岛面积为126平方公里，澎湖本岛面积64平方公里，钓鱼岛群岛的面积约六平方公里。

台湾本岛是一个多山的海岛，岛的中部和东半部大部分是海拔1000～3000米的高山，面积约占全岛的三分之一，低山，丘陵、台地及海岸平原也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西部主要是海岸平原，由许多扇状平原和大小三角洲连络而成，其中的台南平原，长约180公里，宽约40多公里，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台湾四面环海，西部海岸是一片平铺的海滩，东部海岸则是悬

① 本书所述有关台湾历史部分，主要参考陈碧笙所著《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增订第二版写成，就不一一注明了。

崖矗立，都不利于船舶的停泊，只有北端的基隆和西南部的高雄，港阔水深，可容巨舟，是天然的良港。

台湾本岛位于东经120°2′16″至122°4″，北纬21°57′42″至27°17′48″之间。北回归线从岛的中部稍偏南横穿而过，回归线以南地区属热带气候，以北地区属温带气候，加上海风和暖流的影响，平地终年常暖，长夏无冬，多风多雨。北部夏季全年有200天，南部的恒春半岛则长达290天。由于气温高、湿度大、雨量充足，水利大兴，自古农业生产就十分发达，种水稻可一年两熟或三熟，所产蔗糖行销海内外，四时果蔬不断，种茶业也发展得很快。西部的台南平原、中部的台中盆地、北部的台北盆地、南部的屏东平原、东部的台东纵谷平原、宜兰平原和高山型的埔里盆地，都是重要的农业地带。

台湾东西的两面海洋，夏季有来自太平洋北赤道的暖流经过，带来大量的热带性浮游鱼类，冬季又有华北渤海、黄海的寒流流入，带来寒水性的浮游鱼类。有这许多水温习性不同的鱼类来这里觅食繁殖，所以水产资源极其丰富，常见鱼类即有四百余种，成为我国著名的洄游鱼场之一。台湾的地下矿藏也很丰富，特别是基隆的煤矿，更是名闻遐迩。

在军事战略地位上，台湾海峡位于东海与南海之间，宽处将近200公里，狭处仅130公里，北联福建平潭的海坛、马祖、南北麂、大陈诸岛以至舟山群岛，南接东山、南澳、海南岛以南至南海群岛，首尾呼应，构成一条海上长城。而台湾以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的岛屿控其中央，形势更是特别重要，历来被称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辽宁等“七省之藩篱”、“东南之锁钥”。而澎湖位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东抵台南，南趋南峤，北走登莱，西渡金厦，又拥

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良好港湾，很早以来就成了福建渔民打鱼时的停留地，以及中外商船的停泊处。在军事上，它是台湾的门户和咽喉，唇齿相依，存亡与共，“故筹台湾者，必先筹澎湖”。

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关于台湾的记载。三国时，吴国于公元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至台湾。隋时，羽骑尉朱宽于公元607年入海求异俗，便到达台湾。公元610年，隋炀帝派虎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率东阳兵万余征讨台湾。到了宋代，随着福建的开发，福建渔民开始在澎湖停留乃至定居，公元1171年，泉州知府汪大猷派水军长期驻守澎湖。元时，为了招抚台湾的番民，设立了澎湖巡检司。这时，台湾西部与澎湖仅隔一条阔约30海里水道的北港，开始有汉族渔民定居，逐渐形成渔村，后来又出现以耕稼为业的农村，移民多至数万人，大陆与台湾的商业贸易也进一步发展。但在明代，由于统治者错误地实行禁海政策，一度废弛了对台湾的经营。直至公元1542年，才重新在澎湖设置游兵戍守，却将台湾岛视同弃地。这种情况持续长达两个世纪之久，人为地造成了一次大倒退。

就在明代放松对台湾管理的时候，长期垂涎宝岛的外国侵略者，开始了侵略台湾的行动。

在明代后期，来自东邻日本的倭寇，便以台湾、澎湖为巢穴，不断侵扰我国的闽、浙、粤沿海。1539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派原田喜左门，带着用汉字写成的所谓“招谕”文书到台湾。幕府时期，德川家康先后于1610年派有马晴信，1616年派村山等安等人率军侵台。

17 世纪时，号称“海上霸王”的荷兰已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它为了掠夺亚洲人民的财富，航海东来，把目光瞄向战略地位重要的台湾、澎湖。1604 年，荷军侵入澎湖筑城，但很快就被明军赶走。1622 年，荷军再次侵入澎湖，又遭到明军的反击，只得于 1624 年退往台湾，直至 1650 年，先后占据了台湾西部的赤嵌（安平）、北部的鸡笼、淡水等广阔地区，建立了长达 38 年的殖民统治。

与此同时，另一个西方殖民国家西班牙，也于 1626 年派兵侵占鸡笼，后又扩展到沪尾、台北平原及宜兰，建立殖民统治，直至 1642 年被荷兰殖民者驱逐为止。

1661 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大军 2．5 万人，分乘二百余号船舶，从金门料罗湾开航，驶向台湾。经过将近十个月的艰苦斗争，终于结束了荷兰的殖民统治，收复了台湾，建立起郑氏政权的统治。1683 年，清将施琅率军航海打败和迫降郑氏政权，从此，台湾重新归入祖国的版图。清政府设道治理台湾，隶属福建省。此后，汉族移民多至 200 万人，台湾的经济愈益发展，和大陆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但是，清政府囿于成见，始终认为“台湾乃海外孤悬之地，易为奸宄逋逃之薮，故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因而对台湾的防范重于开发。虽然到中法战争前夕，台湾已设加按察使衔的兵备道和台湾镇总兵，及台湾、台北两府治理，并规定福建巡抚半年治闽，半年治台，但始终不允台湾建省，使得台湾防务一直落后，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又成为外国侵略者觊觎的目标。

公元 1771 年，出身波兰贵族、在战争中沦为俄罗斯俘虏的贝尼奥斯基，乘坐一艘俄罗斯军舰，来到台湾三貂角澳登

陆。因为帮助当地的部落械斗，他获得一块有市集和有居民的土地作为报酬。从此，贝尼奥斯基就下决心要在台湾发展殖民事业。他广泛调查当地的居民和物产，测绘登陆地形，制成一份《台湾殖民方案概要》，然后返回欧洲向法国、奥地利等国君主、英国内阁及许多民间资本家兜售，但因始终找不到一个愿意出资的主顾而作罢。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台湾已成为鸦片走私活动猖獗的地区之一，英国鸦片贩子渣甸、马地臣等人一再鼓吹占据台湾。英军发动侵华战争时，台湾也成了他们侵略的目标之一，在 1841 年 9 月和 1842 年 3 月，英军两次进攻台湾，都被台湾军民击退。

这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鼻子也嗅到了台湾这块肥肉的香味。1853 年，美国商人基顿·奈伊写信给美国驻华代办巴驾，建议美国政府出兵占据台湾南方的红头屿，作为经营太平洋航运的基地。1854 年，美军上校阿波特率军舰前往台湾调查，回国后，他的上司贝理根据他的报告，力主美国占领台湾。同年，美国驻宁波领事哈利斯也建议美国用钱购买台湾。

1856 年，巴驾写信给美国国务卿，主张美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的动荡形势，出兵侵占台湾。1857 年，巴驾又为此事大肆活动国务院和驻香港的美国舰队司令。但这时美国的海军力量有限，所以未能采纳这些建议。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由于战败，被迫与英、美、法、俄四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增开包括台湾的安平和淡水在内的若干通商口岸。不久，台湾的鸡笼、打狗又被增辟为通商口岸，共为四口，于 1862—1864 年先后设市开关，由外人担任的税务司管理，英

国并在淡水、平安、打狗三地设立领事馆。

1867年，美国驻香港领事阿伦，借口美国商船“罗妹”号在台湾海面失事，遭到当地土人的袭击为由，建议美国出兵夺取台湾。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则通知美国舰队派遣军舰前往台湾。但美军在登陆时遭到土人的狙击，不敌而狼狈撤退。只有随同前往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却趁协助台湾当局善后之机，深入当地侦探情况，以做日后侵略台湾的准备。

1868年，英商必麒麟因不满台湾当局的樟脑官营政策，挑起了樟脑战争，英军袭占安平一星期，以此要挟台湾当局放弃樟脑官营，使外商得以控制台湾樟脑的生产和输出。

1865年，曾任俾斯麦内阁内务部长的爱伦堡伯爵在报纸发表文章，主张德国出兵占据台湾，作为德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这种主张虽然没为当时的德国政府采纳，却在1868年由一个叫美利士的德国鸦片商人来实施了。美利士勾结一个英国樟脑商人荷恩，擅自强占和开垦苏澳以南34公里的大南澳溪入海处。由于台湾当局的坚决反对，这两个人才被迫于1869年撤出。

1874年，日本政府利用1871年琉球贡船遇风漂至台湾，遭到当地土人杀害的事件，在李仙得等人的怂恿下，以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事务都督，率军侵台。但遭到清政府和当地民众的反对和抵抗，侵台日军进退维谷，在接受清政府以抚恤和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的50万两偿费后，狼狈撤出台湾。

在台湾开港前后，外人纷至沓来，其中除英国设有领事馆外，在台经营的外国洋行有数十家，包括英、德、美国三国的洋行，至于三国的商船军舰，更是往来络绎不绝。但在此期间，却没有一家法国商行、一个法国商人、一艘法国军舰或一

只法国商船来到过台湾。只是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者才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台湾。

光绪九年九月，清政府指示驻守北宁的援越桂军准备还击前来进犯的法军，为防备法军来华寻衅，需先事戒备，特别是法国军舰随时会袭击的沿海各地。十月二十一日（11月20日），清政府指示包括福建在内的沿海沿边督抚备战：法军既屡挫于刘团，不无顾忌。或以不能逞志于北圻，竟以兵船内犯，冀图牵制，则沿海各口难免惊扰之虞。若待事势紧急，始谋备御，必至贻误戎机。要求他们："将应如何修筑炮台，储备军械，慎选将领，调拨兵勇之处，逐一详细筹划，迅速办理，务期缓急足恃。"

早在发生日军1874年侵台事件后，奉旨前往台湾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便决心从防御外寇的角度出发，大力整顿台湾防务。1875年，他奏请将驻防台湾的勇营裁汛并练，"盖分汛裁撤，则骄擅诈扰不禁自除，并营操练，则汰弱补强，渐归有用"。计划除驻扎澎湖的两营不动外，将驻扎台湾本岛的15营，拟仿湘淮军营制归并，以500人为一营，将台南、凤山、嘉义三营调至台南府城，合府城三营、安平三营为一支，专顾台湾、凤山、嘉义三县一带。其北路协副将所辖中右两营、合鹿港一营为一支，专顾彰化一带。艋舺、沪尾、噶玛兰二营为一支，专顾淡、兰一带。这是分区分军防御的雏形。沈葆桢并在各处重要海口，仿照西式修筑炮台，设置西式大炮，于1875年筑成安平、旗后、东宫、妈宫、大城北等炮台。第二年，又筑成沪尾、基隆炮台。清政府并规定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加强对台湾的管理。

1881年，中俄因交收伊犁事产生矛盾，俄国军舰驶往日

本海面向中国示威，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清政府惟恐俄舰侵扰台湾，急调“久历戎行，谙习兵事”的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责成他将台湾防务悉心筹划，务期有备无患。岑毓英到任后，马上赴台湾筹防。他认为台湾兵力有限，备御难周，防务“当以省刑薄敛，团结民心为上；分路屯兵，严守陆地次之；添扎营垒，保守海口炮台又次之，而三者俱宜相辅而行，不可偏废”。他在沈葆桢整顿台湾军务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分区分军防御的方案，将留台兵勇及原存制兵共一万一千数百名，除留守澎湖暨各海口及前后山外，拟分为三小军，一扎台南，一扎台北，一扎中路之彰化县，“无事则认真操练，有事则互相应援”。但是，等到中俄改约议和后，中法衅起之时，岑毓英又被调任云贵总督，离任前将所携黔产开花铜炮八位留在台湾使用，台湾防务便主要落在赏加按察使衔的台湾兵备道刘璈身上。

刘璈字兰洲，湖南岳阳人，以附生投入湘军左宗棠麾下。以功荐道员，到浙江候补。沈葆桢治理台湾时，札委刘璈为营务处，参与筹划防务，有奏称他：“识力过人，情形熟悉，实为台防不可少之员。”左宗棠西征时，奏调刘璈到营，曾委署甘肃兰州道。岑毓英筹办台防时，刘璈已升任赏加按察使衔的台湾道，成为岑毓英的得力助手，也有奏称：“该道晓畅戎机，熟悉情形。”光绪八年四月十二日（5月28日），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荐岑毓英调署云贵总督时，也称：“臣闻李鸿章言，现任台湾道刘璈有独当一面之才，若能查照昔年姚莹任台湾道时故事，略重事权，责以成效，则刘璈得展其才，台事亦可期就理。”

中法衅起，清政府下令整顿海疆防务后，台湾自然包括在

内。接旨后，福建督抚将军一面在台防原存兵勇数额基础上，檄饬镇道酌量添募四营；另方面又要求左宗棠酌拨练勇数营，派员管带渡台协防。并提出："台湾道刘璈前在军营历练有年，抵任以来，汰换营勇，不辞劳悴。此时另派统领赴台，既恐事权不一，亦复难得其人，所有台地防务，应即责成该道相机妥筹，随时报明办理。"① 清政府纳奏，于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九日（12月18日）指示左宗棠："酌拨练勇数营，派员管带渡台，归刘璈调遣，以厚兵力。"② 实际上，除光绪九年底准台湾镇道酌量添募四营外，后又准刘璈回湖南招募三营，左宗棠则派杨在元、杨金龙率湘淮勇各一营渡台助防，福建督抚也派署理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所部擢胜三营渡台驻守淡水、基隆一带。当台湾镇总兵吴光亮因被刘璈排挤，调省另候委用时，淮将章高元署理台湾镇总兵，也率所部铭武二营渡台，统领中路防军。这样，连添募加增调，共给台湾补充16营士兵。

刘璈既然重任在肩，便根据以往跟随沈葆桢、岑毓英办防的经验，很快就提出一整套筹防方案：

一是广泛发动和团结民众，共同办防，办法就是举办多层次的团练。光绪十年四月，他曾将举办团练的详细章程上禀福建督抚，虽遭驳回："办团原不可少，惟行之于用兵之时则可，现在尚未失和，不宜宣布。"③ 但既有此基础，以后要举办就容易了。据说，到战事既开后，刘璈马上邀集台南绅民，按照前订章程举办团练，其法如下：于府县城内设一总局，东西南北中部各举团练一人，归总局经理。城外各乡远近不一，大约

①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34页。
②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35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733页。

以周三四十里为分局，任以团总，副以团佐。闽、粤人之聚居者可设族团，族长主之。凡团内壮丁皆注于籍，分为义勇、练勇、团勇。义勇常驻局中，逐日操练，月给粮金四元八角；练勇按旬一操，每次给银二角，其费皆由铺户捐之，练勇八名抵义勇一名。不归捐者为团勇，自备口粮，每月赴操一次。由局豫选明干义勇为百长，以带练勇，又由练勇选什长，以带团勇。衣装旗帜，捐户备制，各分其色，以俾辨别。其有胆略过人，愿赴前敌，准其自告，别编一册，由县会营，申明号令，随军出战，不与前锋，虑乱行也。信赏必罚，昭示鼓励。从前犯法之人，如能改过自新，以功抵罪，办团绅士，别为请奖。夫团练之设，所以自卫也，在城守城，在乡守乡，足供行军之不逮。后来，刘铭传在台北，也仿此举办团练，各府厅县设总局，以名望绅士理之。下设分局，各乡置团，划为一段，以卫乡里，严守望，诘盗贼①。在日后的抗法战争中，这些义勇、练勇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台湾居民中有相当部分是渔民，刘璈又制定渔团章程，将渔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参加抗法战争：其办法则于海口陆团派委团绅一名，会同水营管带，编选渔户清册。每船每筏给以白布小方旗一面，上书某路某口几甲几牌几号之船，凡近海 10 里以内，或 200 名、300 名、400 名联为一团，派管带、帮带各一员以统率之，每哨置正副哨长。又于水勇之中，每船派充什长一名，每筏伍长一名。每哨配船四只、筏八只，无筏者即用小划。其船逐月租价七两，筏一两四钱，衣旗军器由官给发，每旬逢五操练一次。无事之时，仍准出渔，有事则分哨守战，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 262～263 页。

以与陆团策应。如有勾通外寇，泄露军情，潜为引港者，杀无赦。又按原详水勇名数，由各路挑选泅水精壮渔民，先后招募成军，以固要防[①]。由于渔船与法舰相比，优劣相差悬殊，所以在实战中，水勇渔团所起作用不及陆团大。大概以后用民船运输及与内地联络等事，都可由水勇渔团来完成。

刘璈这样广泛地举办陆团和渔团，对于支援前敌，巩固后方，严防内奸，和发动民众参加抗法战争，无疑是起着一定的作用。

二是完善和实施沈葆桢、岑毓英的分区分军防御的方案。即将驻台各军分为五路防守：前山自恒春至凤山及台湾县之曾文溪为南路，统军5000名，由台湾道刘璈统领；由曾文溪至嘉义及彰化之大甲溪为中路，统军3000名，由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统领。后章高元调赴台北助防，则由刘璈兼统；自大甲溪至新竹、淡水及宜兰之苏澳为北路，统军4000名，由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统领；后山自花莲港、卑南至凤山界为后路，统军1500名，归副将张兆连领之；澎湖为前路，统军3000名，归署澎湖协副将周善初领之。“各路所统之军，分半扼守，余作游巡，临时自为战守，并救应他路，是路与军虽分，而势力仍合”[②]。

经过这样一番布置，刘璈认为台防已有把握，遂于光绪十年四月得意洋洋地上禀福建督抚称：台湾本有为之地，为之亦非无把握，端赖有治人、有治法，又有治权，则事可得为，地方亦可制治。今筹防分派五路，因地制宜。其南路、中路、后

---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262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546～1547页。

路的新旧营勇，皆经职道挑选，训练紧严，及另备活营，皆属器精兵锐，能战能守，兼以水陆团练，认真操演，虚实互用，三路陆防固已可恃。如能得前路、北路一律整齐，则不患台防之不振。故前详不求角力于海中，只求制胜于陆上，则以陆防之权固操自我也。夫权在我，则敌由我制，五路防军虽分犹合，运用皆可自如[①]。对于刘璈的这些做法，后来连横在撰写《台湾通史》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为“有经国之才”[②]。

然而，将台防责成刘璈，就万无一失、固若金汤了吗？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与日后的战事相比，可见刘璈的部署有着如下的弱点：

1. 守军的器械不精，训练不良。在刘璈关于台防的多次禀陈中，只强调治人、治法、治权，却很少强调武器装备。他的部署，基本只是具体实施岑毓英的三点措施，却未能针对未来的战争筹划出具体的对策。这说明他仍是用旧的军事思想来看待新的战争，只强调民心向背、军队数量等传统因素，却没能看到在使用热兵器的近代战争中，武器的优劣，尤其是新式大炮的有无，对于决定具体战斗的胜负所起着的重要作用。在刘璈的防务部署中，武器装备完全被忽视了，后来，刘铭传奏参刘璈，没能及时更新和充实台湾防军的武器装备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台湾道刘璈到任以来，全台饷需军务一手把持，既总台澎营务，又统台南各军。履台数年，不但台北、澎湖毫无布置，即台南安平、旗后两口，除沈葆桢前筑炮台外，竟未添一营垒，未筑一炮台，每年巨款虚糜，未购一精利枪炮；台南各

① 刘璈：《巡台退思录》，第3卷。
② 连横：《台湾通史》，第647页。

军不闻操练，徒借捏截旷以掩虚冒，至各营空额日多，是军务之坏自刘璈始[1]。由刘璈直接掌管的台南防务尚且如此，他人分管的各路情况就更糟了，刘铭传奏称："臣渡台时，军务废弛已极，军装器械全不能用，炮台营垒毫无布置。"[2] 这样的军队，这样的防务，又怎样能抵御和战胜法军呢？

2. 防御重点不突出，南北轻重倒置。台湾孤悬海中，敌舰四面可至，从理论上说，则处处可以登陆。刘璈的分区分军防御，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设。但在事实上，台湾东西两面的地势都不宜舰船的停泊，只有南北两端，才是天然的良港，因而历来的外敌侵台，多从这两个方向着手。就中台南台北又有区别。在此之前，因刘璈建议从台南移分巡兵备道衙门于别处，台北知府林达泉曾撰文《全台形势论》，认为从全台形势来看，台南地处下游，未若台北之地据上游，控制全局；台南逼处海滨，地势卑薄，台北则平原沃壤，并有山水形胜，实为天府之域；台南泉尤不洁，台北则泉脉甘美；台南所产，以糖为巨，台北则菁华所萃，富庶甲于全台；台南的安平、旗后两口岸，一险一淤，通商实无大益，台北的基隆、沪尾二口，占全台通商十之七八；台北邻近省会福州，台南则远而且险，台北易与内地联络。"夫就台论台，台北之胜于台南者四；就闽论台，台北胜于台南者亦二"。因而断言台北很快会取代台南成为全台的政治经济中心[3]。加上台南筹防自荷兰人开始，历时已久，易守难攻；而台北的基隆、沪尾防务草创，易攻难守，是全台防务的薄弱点，最易为外敌选作突破口，应该给予

① 《刘壮肃公（省三）奏议》，卷一〇，第2～3页。
② 《刘壮肃公（省三）奏议》，卷二，第18页。
③ 连横：《台湾通史》，第648～649页。

重视。而刘璈对此毫无分析，抱残守缺，以为台南当时为全台政治中心，因而萃全力于台南，其南、中、后三路士兵共万余人，实为拱卫台南而设。对台北防务，只是敷衍了事。无怪乎刘铭传履台之始，就参劾刘璈部署不当："查全台防军共四十营，台北只存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所部三营，曹志忠所部六营而止；台南现无大患，多至三十一营。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须妥置。"[①] 显然，刘璈的部署是无法抵御日后法军对台北的进攻。李鸿章曾于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 月 25 日）致函张之洞，鄙夷地评论刘璈称："台湾刘道能办土匪，军事布置，未闻方略。"[②]

3. 争权夺利，镇道不和。从刘璈的吏治政绩来看，他无疑是个能吏，但他本身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倚仗左宗棠湘系的势力，飞扬跋扈，凌驾他人之上，甚至连他的顶头上司闽浙总督何璟也不放在眼里。刘铭传在参折中指出："前督臣何璟屡派员渡台访查，逢人辄告，而赡徇隐忍，不肯直发其奸。该道所恃既坚，愈形跋扈，独行独断，旁若无人，与何璟文牍龃龉，尽刻成书以形其短，布散各省，莫敢谁何。"对于后来得任福建巡抚的刘铭传，刘璈更是视若无人，不肯折节。他除了背后打小报告，利用撤出基隆一事大肆攻讦刘铭传外，对于一些有关台防的大事，如募捐、与法人交涉封口、建议出卖个别地方给德国等，都不向刘铭传禀商，即自行奏请办理。光绪十年十月十四日（12 月 1 日），刘铭传就电告清政府："刘璈近更跋扈，自行发折奏事。"[③]

① 《中法战争》(3)，第 142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19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217 页。

于是，在台湾防务刚有头绪，就发生了刘璈与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不和的严重事件。

原来，台湾情况特殊，因而台湾道职权很大，不但例赏按察使衔，而且可以专折奏事。康乾年间还时常兼理提督学政。道光四年十月，始加营务处，颁给督办军务关防，得以调度戎机，奏行赏罚，俨然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然而，台湾镇总兵为挂印总兵，统率师干，权在阃外，不管台湾道有何名义，军队大权仍在总兵掌握。这样，道镇职权重叠，容易产生矛盾，沈葆桢曾有奏指出这一点："镇治兵，道治民，本两相辅，转两相妨，职分不相统摄，意见不免参差，上各有所疑，下各有所恃，不贤者以为推卸地步，其贤者亦时有形迹于其间。"①

中法衅起后，刘璈被责成筹办台防，但职权并不分明。他曾密禀左宗棠诉苦称：职道所得调度者，仅一客军，此外分路各军，自皆不得擅行调度。事必报明办理，非报自不得擅办，即报明不候批回，擅办亦仍干咎。由报而批，待批再办，动经累月，恐办已无及，台事休矣。"台军不由统调，台事不由专办，是阳加责成之虚名，阴埋掣肘之实祸。"为了能独揽大权，他攻讦吴光亮贪鄙险诈，劣迹昭彰，比之于曾勾结英人袭取安平的肖瑞芳，危言耸听地称："加以督辕庇纵，遇事刁难，脱有不虞，何堪设想。"示意要调走吴光亮，并明确他的职权，"或请别简知兵大员，抑饬职道督办，以专责成之处，出自钧裁"②。福建督抚迫于左宗棠的势力，只得将吴光亮调省另行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104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870页。

委用，但并未委任刘璈督办全台防务，反而借口“台南北相距甚远，军情瞬息变迁，恐台湾道刘璈鞭长莫及”。将台北防务责成孙开华督办。结果，台湾防务仍未能做到统一指挥，不利于全力对敌。

刘璈争权夺利的这番丑陋表演传到京城后，却引起了言官的反感和弹劾。刘铭传在赴台前已根据京津流言奏称：“惟闻台湾驻防之兵虽为数不下二万，而器械不精，操练不力。”① 这就很容易成为言官奏参刘璈的理由。光绪十年三月有旨称：“有人奏参福建台湾道刘璈肆意贪横，办防松懈，设遇有警，恐致偾事，请旨饬查。”② 四月十九日（5月13日），翰林院编修朱一新上奏，表示因台湾镇道不和而担心防务不固：“台湾地大物博，得之可以控制南陲，故东西洋人莫不垂涎其地。台湾道刘璈前守浙之台州，尚称果敢。近闻镇道意见不合，闽督驾驭失宜。古未有上下不和而可共兵事者，应请饬查更调，以免贻误。”③ 张佩纶也就此事上书恭亲王：“台湾镇道不和，防务一切阁置”，如果法人来犯，恐不足恃，因而建议恭亲王：“应请随时入告，或别简贤臣以为更代。”④ 后来他出任会办闽防，就负有密查刘璈的使命，他就此电告刘铭传称：“刘道，承中旨属密查，鄙人因法船在马尾，未便至台，其人贤与不贤，当去不当去，望评定见复。”⑤

此外，刘璈毕竟地位低微，对内既不能号令职权相埒的诸

① 《中法战争》(5)，第409页。
② 《清德宗实录》(3)，第493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五，第25页。
④ 《中法战争》(4)，第368页。
⑤ 《中法战争》(4)，第383页。

将，对外也不能催促各省督抚应援，则到作战艰难时刻，很难指望他能领导台湾军兵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二 法舰骚扰基隆

所幸不久就发生了法舰侦探基隆的三月十八日（4月13日）事件，足以检验刘璈筹办台防的可靠性究竟如何。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了的清政府被迫和英、美、法、俄四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一款规定：外国船（包括兵船）可以往来于沿海各通商口岸。中法衅起后，法国政府为了牵制中国不能全力出兵援越抗法，便借助上述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利用其海军优势，于1883年下半年，派梅依率领中国—日本海分舰队的部分舰只游弋中国东南沿海的各口岸。1884年初，海军准将利士比接替了梅依的职位。

光绪十年二月十五日，法军攻下援越桂军长期驻防的北宁。二月二十一日（3月18日），利士比向法国海军部报告："根据我所得到的传闻，目前中国居民的最大忧虑，似乎是由于中国正规军参战保卫北宁，法国将会索取一大笔巨额赔款。"① 二十八日（25日）又报称："中国的两广总督因我们在东京的胜利而惊恐万状，因为他无疑会特别害怕我们索取大笔的战争赔款。"② 或许是由于利士比的这些报告，促使法国政府产生向中国索赔军费的念头。为了预防中国不肯妥协让步，以至法国为了勒索到赔款而需要进行夺取质押品的战争，利士比未雨绸缪，派出手下各舰前赴中国各海口侦探，其中，"窝

①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61。
②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61。

尔达”号来到台北基隆港，“收集我们感兴趣的一切情报”。于是，舰长福禄诺一手导演了“三月十八日事件”。

三月十八日，“窝尔达”舰来到基隆港外，先是发出信号要求港方派引水员前来引港，但引水员以法船从未到过基隆（此时还没有法国商人来台湾贸易），不敢代为引水，“窝尔达”号只得自行进港。接着，法船员又找到当地专办洋船水菜的商家，要求宰牛两只作为船上食物，该商家不敢承办。法船又向英商得忌利士洋行提出买煤 60 吨，但洋行存煤不多，也不能满足其要求。

午刻，法舰派出两个船员登岸上山瞭望，偷绘基隆地形图，很容易就会看到曾任基隆税务司的贺璧理所描述过的情形：“基隆海河形势湾环，与沪尾相对，炮台筑于河西北岸，若失和以后，洋船由海河直入，便可对面轰击。今未经失和，法国兵舰任便游弋，可绕至炮台后面。炮台有前洞无后洞。若法人将炮悬至桅上，在后面旁面攻打，炮台不能还击。”① 随后，这两人还想走进炮台侦探，却被炮台管带尹营官及吴教习拦阻，不让入内。适逢此时有一条狗在旁边乱吠，被炮勇将狗赶走，法人遂回船。

事情至此，“窝尔达”舰的侦察任务本已完成，但福禄诺仍不满足，仍想考查一下守军的警惕性和抵抗意志。于是又借口清兵以戏狗为题，詈骂法国船员，致函守军统领曹志忠，要求清方饬令管理炮台的武弁数员前往登舰赔礼认错道歉，并嘱令设法弹压所部兵丁。函称：

敬启者：本日敝船有两位随员到岸游历，并无生事，

① 《中法战争》(5)，第 484 页。

被东边炮台众兵凌辱，以戏狗为题。此系琐事，本不敢奉渎，如不惩戒，恐日后有往来船只到此，众兵统以效尤为之，不得不请为惩戒，请照所拟三条惩办：

一、将炮台管带官带同哨长并滋事之各兵，到敝船边认错。

二、请将滋事之兵惩办。

三、请出示实贴炮台，以儆后来滋事。示中叙及此番滋事情形，已经惩戒。

据愚见所请谅蒙照准，如此明晰，倘见我国军门备陈一切，足仰一秉至公。再启者，敝船拟于礼拜三午时开驶，望将所请速复为妙，又及。

又以买煤不成，致函要挟基隆通判梁纯夫：

敬启者：刻敝船待需煤炭六十吨，商家何以不卖，事属不解，想必是官中示禁。究之不知中国有无禁否？莫非疑我国与中国相敌之意，抑或有上谕颁行煤炭禁卖别国？倘有此情，吾亦无可相商，谅必不致如斯。惟借传谕各商，照常售卖。第思法国提军派调兵船来基游历，因无煤炭阻留于此，断无是理。当此不已直陈，望乞立即从中斡旋，给凭为据。不但当事心感，则我国亦沾惠良多。并祈知会在事官员，幸勿阻滞。

第二天，由于没有得到答复，福禄诺又致函中方官员，公然以武力相威胁：

基隆口文武官员赐览：昨日敬肃一函，谅蒙鉴及。至乞买煤炭一事，亦未蒙照准。惟是敝船俟至本早八点钟，尚未得复函，甚是焦急。窃思必是官中禁止买炭，以致如此卑词敬请，竟然不理，必有相仇之意，似此我国兵船游

历中国者，定遭阻碍。当此情形，敝船不得已，要将头桅设立红旗，钩炮桅顶，立即开炮，且将开放阖船洋枪，则居民商贾何以遽避？如此相抗，定必两国失和，实无益而有损也。然本管驾性本谦和，恐伤和好，隐忍未发，故再尽此一函，敬呈诸长官钧鉴酌夺。当思以保护百姓、城池为重，咸存两国式好无尤之意，是所切望。

接着，"窝尔达"号驶进内港，致函该口税务司胡美利云："该处同泊有英国夹板船一只，如法船轰击炮台，恐致伤损英船。兹借与小轮船并水手等，将该夹板船移泊无碍之处，如有他国之人，莫如一并移避为妥等因。"

胡美利看到法舰来势汹汹，马上赶赴该舰解释中方答复迟延的原因："所发法文信函，华官未能辨识，倩人翻译，须稽时日，且如此克期订办，关系非轻。"恳其再为酌量。福禄诺虽经向胡美利查问，知道中国官府并未禁卖东西给法船，仍装模作样表示："已有定意，未便更改。"

胡美利见法船已做好开战准备，情势危急，因即行趋曹志忠及梁纯夫两处，将他们接到的法文来函译诵大意，并告知所见法舰备战情形，劝说二人满足法方要求，以期息事宁人。

梁纯夫查知在法舰向得忌利士洋行买煤60吨时，该洋行存煤仅有二三十吨，因不敷所求，所以回复未卖。即向官煤厂拨煤1000担，交得忌利士洋行转卖给法船，并复函福禄诺称：

敬启者：昨日三点钟接奉来函，因系洋文，敝厅未习西学，随即派差带赴八斗煤局曾习西文者翻译，是以尚未奉复。顷税务司胡美利到来，说及此间百姓不肯卖煤及食物与贵兵船，并谓官府有示谕，不准与贵兵船买卖，闻之殊深骇异。查贵国与中国彼此通商和好，何得有不通买卖

之事，中国各官亦并无此等告示。敝厅现已出示晓谕百姓，照常买卖，不得拦阻，其煤炭亦已谕知百姓，交由德忌利士行照卖矣。专此发达，并请大安。

三月二十日（15日），梁纯夫第二次致函福禄诺，回复他的十九日（14日）来函称：

敬启者：今日八点钟奉达一函，交由胡税务司代达，备陈煤炭已由德忌利士行主起驳下船，以应贵船之用，并出示晓谕百姓，照常买卖，不得高抬市价情由，谅邀台览。顷由八斗煤局将贵船主昨日所致敝厅之信译回，知系因商民不卖煤炭，嘱速晓谕百姓，照常买卖等因。查彼此通商和好，官中并无禁止贸易之事，请为查察。敝厅今早已亲督各百姓，将煤交由德忌利士行驳回贵轮应用，想已运到矣。嗣后如有所需，或火食或物件，请知会海关税务司转知敝厅，自必查照办理，断不敢稍有延缓也。街上百姓系照常贸易，请祈放心，谨此奉复，并请台安不具。

基隆厅所出告示称：

为晓谕事：照得现在各国通商，遇有英、法及外国轮船抵口购用煤炭、食物等项，均应一视同仁，照常买卖，公平交易，不得居奇刁难，合行示谕。为此示仰所属商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中外一体，遇有英、法及外国船只到港购买煤炭、米食、物件等项，务必公平货卖，不得阻止及高抬市价，致干拿究。各宜懔遵毋违，特示。

曹志忠也令驻守炮台员弁前往登船赔礼，且晓谕军兵，免致嗣后肇生事端。并缄复福禄诺：炮台弁兵拦阻闲人不准混人，系属分内之事，委无詈骂，至犬吠生人，亦属常事。

本来，购买煤炭食物不得，是法舰与商家交涉的事情，至

于犬吠生人，更是琐屑小事。福禄诺却横生风波，将一切归咎基隆当局，并以武力相威胁，实在是小题大作，无事生非。而梁纯夫、曹志忠在法舰的胁迫下，一一屈从其要求，态度未免过于软弱，也反映了他们毫无应变能力。福禄诺见试探目的已经达到，遂于二十日启航出口[①]。

事后，刘璈接到梁纯夫、曹志忠等人关于此事的禀报后，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是对法舰以小隙挑衅，事出情理之外而感到困惑。他上禀福建督抚，建议通过外交交涉的途径来约束法舰：合无仰恳将台湾基隆各口并无法商在地贸易情形，咨明总理衙门，咨商驻法使臣，照会法国外部及驻京公使，转饬游弋兵船通过通商各口无法商贸易者，无故可勿进口停泊。如有采办物件必须进口，务先报由领事照会地方官，派人妥为照料。该兵船主尤须约束兵丁水手，不许上岸浪游生事。至炮台营垒，系操防重地，不在游历之列，尤不得违禁擅入。庶几商民安堵，中外无猜。倘使不先照会，任意闯入生事，是彼自行无礼，则衅由彼开，我当照万国公法，请各国理论，以顾通商大局。“在彼终欲借端挑衅，我惟以礼自持，务使无端可借，无衅可挑，免致因小误大”[②]。

对于即将打上门来的敌寇，刘璈却幻想“惟以礼自持”，照万国公法行事，未免过于胡涂颟顸。按照他这种认识和办法，肯定难以应付日后的突发事件。

离开基隆回至厦门，福禄诺向等候在这里的利士比报告了事件的经过，他把过失完全归咎于中国方面：基隆虽是条约规

---

① 上述交涉过程，参见《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1707 页。

② 上述交涉过程，参见《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1722～1727 页。

定的开放港口，但一驶进锚地，福禄诺舰长便看出中方的明显敌意。“窝尔达”舰的一位军官，为了解军备情况而在港口周围散步时，受到中国士兵的威胁，他们把邻近的家犬唤来咬他。为了寻找煤炭，舰长求助于当地的各供应商，得到的回答是道台已有命令，任何物资均不得供给法国军舰。一位欧洲籍领水员，前一天曾为“窝尔达”领航，应当再来帮助该舰调换锚地，可是他在岸上经过时，却装出没看见给他发出呼叫信号的样子，他承认他是在中国官员的威吓下才这样做的。最后，福禄诺给道台和军事指挥官写的几封信，也始终未见回音。面对如此明显的敌意，福禄诺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并以武力相威胁，中国官员被迫让步，满足了福禄诺的要求。

利士比无暇去分析福禄诺报告中有多大夸张的成分，他关心的是关于基隆煤矿质量优良和基隆港防务薄弱的情况。当天，他先是用电报给法国政府简要报告：“‘窝尔达’号在基隆遇到麻烦，但舰长的强硬态度已使中国官员让步，取得了优质煤，大矿山全归政府所有，没有欧洲人。土地富庶，当地人对我们有好感，占领无困难。”①

接着，他又以信函形式，向法国政府详细报告“窝尔达”号赴基隆的经过，再次提出占领基隆作质押物的建议：基隆港位于沃土地区，群山环抱，风景如画，停泊安全，可以容纳大量的船只。它由几个装备不良的炮兵连守卫着，只有一个连有五门克虏伯大炮。然而，“窝尔达”号避开它们，从侧面驶入内河锚地。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非常顺利地占领该地，在战争时期，这个地方将是颇为宝贵的。占领整个台湾大岛，也不会有

①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61。

多大困难，而留守那里的军队，对我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①]。

在4月底，同样的建议再次提了出来。罗亚尔的《中法海战》记称：利士比建议在基隆采取行动："如果与我所预期的相反，东京的事情不是如（福禄诺司令和李鸿章两人间）所议定的条件进行，我以为立即攫取一件担保品是好的，在以电报跟你商议之后，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占据基隆的煤场和台湾的北部。"[②]

虽然我们不知道，利士比的这些建议对于法国政府作出向中国勒索赔款的决定曾发生过多大的影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由于利士比的努力，法国政府才把基隆定为他们需要夺取"质押物"时的首选目标。"观音桥事件"后赴华率领法舰的孤拔，曾向法国政府建议在中国沿海采取行动时，目标是旅顺、烟台、威海卫、吴淞、福州，但没提到台湾。茹费理却根据利士比的报告选定了台湾，"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③]。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三月十八日的"窝尔达"舰基隆之行，是法军侵台的契机和起点。对此，刘璈可是懵然无知的。

台湾岌岌可危了，靠谁来挽回危局呢？

三 清政府起用刘铭传

清政府物色来挽救台湾危局的人选，是淮军宿将、前直隶

---

①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61。
② 《中法战争》(3)，第540页。
③ 《中法战争》(3)，第539页。

提督刘铭传。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公元1836年生于安徽肥西县。他年幼时生过天花，脸上落下麻子，身材也不甚高大，但神态气质别具一格。陈衍所撰《刘铭传别传》称他："面黄黑，疏麻隆准，躯不逾中人，杂立稠众中，一望辄见，若高出人表然。"在他一生的传奇性经历中，与日后领导台湾抗法战争有关的事情，大约有如下几件：

1. 志向远大。虽然刘铭传出生于贫苦家庭，但据说从小胸怀大志，极有抱负，"尤好治兵家言，常以大兵家皆以治家列奇零之数，其正者则在治国"。曾多次登上家乡的大潜山巅，仰天长叹："大丈夫生当有爵，死有谥。"[①] 同治九年，李鸿章奏荐他督办陕西军务时称他："近年辞官归里，折节读书，深明大义，其志趣愿为国家效死。"台湾史学家庄练也评论："刘铭传乃是一个有抱负有大志的功名之士，他很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以期对国家有所贡献。"[②]

刘铭传这种强烈的报国情绪，在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很容易就升华为一种炽热的爱国精神。还在1883年初，他闻知中国出兵援越抗法，就自告奋勇，愿意率旧部万人前往越南作战。现在，接受新命后，他的反侵略热情突出地表现为两点：

(1) 赴机迅速。受命后，刘铭传认为："现值事机紧急，自宜早日到台，以免棘手。"[③] 于是顾不上调集旧部兵将，即孤身渡台。与之相比，早在光绪九年（1883年）便奉旨协防

---

① 本书有关刘铭传的史事，多引自姚永森著《刘铭传传》，就不一一注明了。

②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195页。

③ 《中法战争》(5)，第409页。

福建，光绪十年（1884 年）八月又被命赴台协防的杨岳斌、光绪十年五月奉旨助滇的鲍超，均因行动迟缓，都未赶及战事。

（2）对敌态度坚决。基隆守将曹志忠受福禄诺的愚弄，饬令将弁不准对法舰肇生事端，其实是放弃警戒；而基隆通判梁纯夫则出告示，要求商民与法舰正常贸易；这些做法，都很容易给法舰制造突袭基隆的机会。而刘铭传赴台伊始，因为法舰“费勒斯”舰尾随而来，并重施“窝尔达”舰的故伎，要求上岸联系购煤，即遭到刘铭传的峻拒，并下令军兵加强戒备。从而在法舰六月十五日的突袭中高度戒备，并战而胜之。后来，刘铭传在内外交困的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最后领导台北军民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都与他对敌态度坚决有很大关系。

2. 丰富的军事阅历。刘铭传出身贫寒，十五六岁时曾贩过私盐，后来因为杀死一个侮辱其父的土豪，被乡人拥为当地的头目。当太平军、捻军在安徽活动时，1859 年，23 岁的刘铭传接受官府的招安，受委“办理本乡团练”，从此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

1862 年，当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乡招募淮勇时，已因功晋升为都司的刘铭传，经同乡张树声的介绍，投到李鸿章麾下，募成铭字营，随同征战。不到十年，刘铭传所率铭字营就发展为人数量多时将近二万人的铭军，成为淮军中的头号主力部队。刘铭传本人也不断地擢升官职。1864 年，他因参预镇压太平军有功，被授为直隶提督，赏穿黄马褂，赐头品顶戴。1868 年，又因参预剿灭东捻有功，赏赐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同年，复因参预剿灭西捻有功，晋爵一等男。1871 年，刘铭传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成为当时淮系各将中官衔最显赫

者。

这十几年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涯，使刘铭传获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李鸿章曾奏称："查刘铭传智勇才略可当一面，于军事历著成效，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其治军以操练纪律为要，爱民除害为本，至其意度豁达，性情爽直，能驾驭将士而使各尽力，能决机俄顷而应变不穷。"曾国藩也在为《大潜山房诗抄》作序时指出："省三用兵亦能横厉捷出，不主故常，二十从戎，三十而拥疆寄，声施灿然，为时名将。维所向有功，未遭挫折，蔑视此虏之意多，临事而惧之念少，若加以悚惕戒慎，豪侠而且敛退气象，尤可贵耳。"从而为他在日后领导台北抗法战争时，正确分析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一支派系复杂、装备窳劣、训练不精、仓促组合的军队，战胜用先进的洋枪洋炮洋舰武装起来的法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接受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先进思想。刘铭传长期追随的老上司李鸿章是洋务派头子，刘铭传受其影响和熏陶，潜移默化，也就亦步亦趋，接受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先进思想。台湾史学家王尔敏指出："淮军一直为开风气的先驱，使用新式枪械，既多且精，随时代的不同而改进。并时各军，均不能及。"[①] 刘铭传作为淮系首将，自然不甘后人，他在组建和指挥铭军时，很早就注意用洋枪洋炮来装备部队，聘请洋教习来训练士兵，刘铭传还和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结成终生友谊。铭军内部分为步、骑、炮等兵种，所用枪械，悉改泰西新式，所以铭军的战斗力一直很强。

---

①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1 版，第 297 页。

后来，刘铭传赋闲在家期间，设法购买了许多西方书籍和报刊的中译本来阅读，并经常游历江南，结交陈宝琛、徐润、薛福成等人，他们有的是洋务派人物，有的是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这些人的耳熏目染，刘铭传的思想大为开阔，不满于朝廷内那班“咏太平、竞党争、诟西法”的顽固守旧人物，而“益静研中外得失之林”，“思耸国家于富强之列”的方法。据说，有一次，刘铭传与人饮宴，酒酣耳热之际，他乘醉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公等识之，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

1881年，中俄因交收伊犁问题起衅，清政府特召赋闲已久的刘铭传入京计议军国大事。在陛见时，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自强折》，指出俄日两国正在加紧修筑铁路，以备入侵中国，“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而中国想要自强御侮，关键也在于建造铁路，“臣每私忧，窃叹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建议清政府立即着手筹建南北三条铁路。刘铭传的建议终因守旧派的反对而不为清政府所采纳，但他是清朝官员中较早提出要修造铁路的人，在洋务运动中有其一定的地位①。

在当时的纠纠武将中，像刘铭传这样主动地广泛地深入地接受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先进思想，还是比较罕见的，因此，刘

① 姚永森：《刘铭传传》。

铭传堪称为“洋务将军”。正是由于他洞悉中外强弱的对比，了解近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情况，才使刘铭传在筹防台湾时能够抓住要害问题大力整顿，在作战时能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略技术，扬长避短，抵御并战胜法国侵略军。

4. 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赏识。关于曾国藩赏识刘铭传的说法有多种，其中最可信的是容闳的说法：当年，李鸿章从合肥招募淮上豪杰之士，回到曾国藩大营，“某日，曾帅与鸿章步行无驺从，悄入宿馆。所来淮军诸名人，有赌酒猜拳者，有倚案看书者，有放声高歌者，有默坐无言者。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巡视毕出馆，诸人皆不知为曾帅，亦不趋迎鸿章。曾帅归语鸿章曰：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其人为谁，即淮军有名之刘铭传”①。

姚永森先生则根据刘铭传后人的记述称：当年，李鸿章带新招淮将谒曾国藩，适逢曾国藩午睡未醒，管家叫李鸿章等人在客厅静候。等了半个时辰，还未见曾国藩出来，同去的刘铭传按捺不住，当着众人面发作起来：“对部将如此怠慢，岂不令人心冷?!”此话恰巧被从屏风后走出的曾国藩听见，众人都暗暗为刘铭传担心。谒见后，曾国藩单独留下李鸿章，询问那个“额广面长、钟声铁面、颊有麻斑”者是谁? 李鸿章如实奉告。曾国藩说：你带来的几个淮军将领，我看只有刘铭传有“雄侠威棱”之气，将来能给你鼎力之助，须要好好看待他②。

①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记先师容纯夫先生》。

② 姚永森：《刘铭传传》。

林其泉先生的说法又不同：早年，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三个人。曾国藩后来评论称：左边一个俯首而沉默，不敢仰视，此乃谨慎之人，可任掌管军需一类职务；中间一个两眼左右探索，乃阳奉阴违之徒，不可录用；右边一个怒目而视，挺立有神，此乃刚毅有为者，将来功业不在你我之下，应加以重用。右边这个人就是刘铭传[①]。

以上三种传说的真实程度已不可考，不过这些传说的存在，说明曾国藩确实很赏识刘铭传。曾国藩虽然早死，但影响仍在，特别是他的弟弟曾国荃在台湾抗法期间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他继承乃兄的余风，对刘铭传也很好。后来，曾国荃能够大力拨军济械助饷援济台湾，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

至于刘铭传的老上司，长期担任权力颇大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的李鸿章，更是对刘铭传的一生有极大影响的人。不但刘铭传的早年迅速擢升是出于李鸿章的大力拔荐，即使是这次在中法期间的复出，也是由于李鸿章多方活动的结果。他不但自己上疏，而且设法多方鼓动张之洞等一批官员连番上奏举荐刘铭传，要求清政府重新起用刘铭传，还指使他幕中的袁保龄等利用私人关系向军机大臣为刘铭传说项，最后终于冲破层层阻挠，使刘铭传得以复出。此外，李鸿章又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尽量支援刘铭传，为取得台湾抗法战争的胜利出了一份力。

曾、李的赏识以及南北洋对台湾的大力援济，对其他官员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促使福建、广东等省督抚也尽力援济台湾，从而扭转了台湾因受法舰封锁而一度出现的危急局

① 林甘泉：《台湾札记》，第 329 页。

面，坚持作战到最后胜利。

刘铭传上述的这些长处，当然不是资历浅、地位低、又主要是担任文职的刘璈所能相比的，清政府选择刘铭传来督办台湾防务，当然要比刘璈合适得多。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刘铭传身上也有不足之处，其中与台湾战事有关的是：

1. 与左宗棠结怨。淮系头子李鸿章和湘系另一头子左宗棠长期不和，作为李鸿章的得力部将，刘铭传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在督办陕西军务期间，刘铭传深受以陕甘总督身分亦督办陕西军务的左宗棠排挤。庄练先生指出："刘铭传到陕将近半年之后，因感事事受制于左，处处遭其白眼，不但心中难堪，而且亦已意识到无法在此与左宗棠共建功名。"[1] 这时，清政府有密旨给刘铭传，要他秘密侦探左宗棠及所部湘军的情况，刘铭传在复奏时乘机说了左宗棠的不少坏话，此事被左宗棠知道后，遂与刘铭传结怨。

刘铭传奉旨督办台湾事务后不久，左宗棠也奉旨督办福建海疆事务，俨然成了刘铭传的顶头上司，而台湾道刘璈又是左宗棠一手扶植起来的老部下。他们两人内外勾结，上下夹攻，不顾台湾的抗法大局，一直不断地给刘铭传出难题、找麻烦，最后，左宗棠甚至杀气腾腾地抓住刘铭传丢失基隆一事，上奏清政府，要求如同对待丢失北宁的前广西、云南巡抚一样，给予刘铭传革职拿办处分。他们这些行动，给刘铭传带来了不少的干扰和压力，弄得刘铭传一度忙于应付，焦头烂额。

2. 与霆军结仇。同治六年（1867 年）三月，刘铭传在湖

---

①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 209 页。

北追剿捻军时，与霆军统领鲍超相约，在尹隆河一带两路合击东捻。到时，求功心切的刘铭传不顾部下大将唐殿魁力主持重的意见，一意要行险徼功，于是不待霆军到来，就提前一个时辰孤军出击。结果，寡不敌众，反而陷入捻军的包围之中，大将唐殿魁等战死，刘铭传本人也丢盔弃甲，坐地等死，差点全军覆没。幸得鲍超率军及时赶到，内外夹攻，才救出刘铭传和铭军残部。事后，刘铭传为了推诿责任，就恩将仇报，伙同李鸿章上奏，讳败为胜，反诬鲍超不能如期约会，致陷铭军于险地。清政府一时不辨真伪，颁旨谴责鲍超，鲍超好心不得好报，立功反遭谴责，气得发昏吐血，旧疾复发，只得向清政府乞病去职，所部霆军随之大部遣散。

霆军大将孙开华在此之前奉调福建，已带所部赴任。后来，霆军将领宋国永、曹志忠也先后到福建发展。抗法期间，曹志忠率所部六营守基隆，已升任署理福建陆路提督的孙开华则率所部守沪尾，并先被任为台北诸军总统，后任帮办台湾军务，在军中地位仅次于刘铭传。刘铭传赴台后，花了很大力气才笼络孙、曹二将，团结对敌。但孙开华对刘铭传积怨甚深，面和心不和。二人虽然勉强合作取得沪尾大捷，但关系始终不能融洽。当台北战局危急之时，尚能顾全大局，隐忍不发。当战事稍趋平稳，孙开华就附和左宗棠攻讦刘铭传，刘铭传也奏请清政府不要信任和重用孙开华，最终二人反目成仇。刘、孙不和，对刘铭传抗法事业自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上种种，又成为刘铭传领导台湾抗法战争的消极因素，使他在指挥作战时受到很大的制约。

1871年，刘铭传在督办陕西军务任上称病乞休，获准赏假三个月回籍调理。孰料就在他离任期间，仍留驻陕西的部分

铭军将士因不服新任统领曹志忠而哗溃。清政府迁怒于刘铭传，将其革职，从此，刘铭传赋闲在家13年。

然而，此时淮军已继湘军之后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主力部队，清政府要抗敌御侮，保家卫国，自然就要出动淮军，也就免不了要借重刘铭传这员淮系首将。因此，当中法衅起，战事日亟的时候，在清廷朝野中就不时发出要求重新起用刘铭传的呼声。

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五日（5月1日）有旨，任命李鸿章督办援越抗法事宜，节制广东、广西、云南三省防军。李鸿章的任命一下，朝野就有不少人建议清政府重新启用刘铭传襄助李鸿章。四月十一日（17日），监察御史陈启泰上奏："李鸿章旧部刘铭传颇具将才，海道进兵，似可责其独当一面。"[①] 十八日（24日），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也奏称："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令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②]

在李鸿章幕下的阁学袁保龄，因闻刘铭传近颇奋发，有得旧部万人，愿往保越之说。认为如有朝命起用，优以事权，或当投袂而起。因而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两次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力荐刘铭传可任援越抗法的重任："保越之师，就今日人才论之，彭大司马当首屈一指……次之，则刘省三，虽桀骜，究是淮将翘楚。其旧部，如铭军在直，武毅军在江阴者，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第9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第14页。

合之可二十余营，且总兵黄桂兰亦其旧将，前茅后劲，更可一气相生，指挥如意。"[1] 又称："省三胸饶权略，虽气吞强寇，尚不至一味恃勇，无端挑衅……黄镇桂兰昔隶铭部，省三卵而翼之以有今日。铭部旌旗一出，黄必不肯再属他人……而以黄镇全军专归省三节制调遣，则上下一心，缓急足恃，既收指臂相使之功，亦免文武不合之患。"[2]

薛福成闻知李鸿章奉旨节制三省防军，急忙向李鸿章上书论救越南事宜，认为"中堂宜早还北洋，或暂驻南北洋适中扼要之地，调兵选将，兼筹全局"，而不必亲临前敌。他发挥李鸿章"荐刘军门铭传率万余人前往，已足伐敌谋而壮声威"的想法，极力主张由刘铭传代为亲临前敌督办军务："请荐刘军门铭传为督办也。刘军门在诸将中，韬略优长，声望夙著；惟退居有年，恐其无意出山。似宜密请朝廷，优以礼数，假以事权，驰往前敌，总统诸军，相机援越，其智略气概，必可詟服远人。所有分驻南北洋之铭军皆其旧部……夫以刘军门之才与铭军之习战，且得滇粤官军为援应，而法兵不过一二千，又在山险箐密崎岖之地，火器不甚得力，揆诸众寡之势，未必彼胜我负。"[3]

但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朝野诸人这番荐举刘铭传的行动，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据说，当年参预镇压太平军时，刘铭传曾于常州无意中得到一件珍贵文物——"虢季子白盘"。曾中状元，两任帝师，官居尚书的翁同和，也对文物酷爱如命，闻知此事后，多次托

① 《中法战争》(4)，第 623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624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615～616 页。

人欲以重金向刘铭传购买这件国宝，甚至愿意与刘家结为姻亲，但都遭到刘铭传的拒绝，翁刘从此交恶①。光绪九年，翁同和得任军机大臣，权势炙手可热。可能是由于翁同和的从中作梗，清政府虽然采纳了重新起用刘铭传的建议，但旨意却十分冷淡，既没打算让他“独当一面”或给予“襄办法越事宜”的头衔，也没有让他“募足万人，迅成劲旅”的意思，只是于四月十八日密谕李鸿章：“提督刘铭传系李鸿章旧部宿将，声望夙著，如令其调募数营，统带前赴粤西作为后路援军，于事能否有济，著李鸿章悉心酌度，据实复陈。”

当时，奉旨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是徐延旭，这是一个不懂军事而又年老多病的文官，而统带关外边军的分别是刘铭传的多年旧将记名提督黄桂兰，以及题奏道赵沃，这三个人无论资历或是职衔都远远不如刘铭传，更不用说军事才能了。但如刘铭传遵旨调募数营，前赴广西作为后路援军的话，就将成为听从徐延旭、黄桂兰等人节制调遣的偏裨之将，这就不是重用刘铭传，而是侮弄和调侃他，拿他来开玩笑。李鸿章深知刘铭传生性倨傲，做事喜欢独当一面，不肯轻易下人，即使对待他这个多年的老上司，每“抗论大计，辄面赤眦裂”，因而肯定不会接受清政府的这种安排。果然不出所料，李鸿章奉旨函招刘铭传来沪面商，探询他能否遵旨酌调旧部统带赴粤。刘铭传表面上感激恩知，誓当及时图报，却借口“旧患目疾，现值肝阳上冲，目蒙愈甚。若冒暑远役，诚恐办事掣肘，病更加剧，而于事仍无所裨助，昨已回籍就医”，将事情推脱了。李鸿章在复奏此事时，婉言提醒清政府不该这样慢待刘铭传：“窃查刘

① 姚永森：《刘铭传传》。

铭传智略勇干度越诸将，从前筹办粤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究心史事时务，见机敏决，才识过人。若令独当一面，寄以边防重任，于操纵控驭机宜，必能措置裕如，其威望亦可使远人慑服。现扎津郡之刘盛休，分防江阴、吴淞之唐定奎、吴宏洛各营，皆系该提督募练而成，久经大敌，素称劲旅，兵将一心，尤易踊跃用命。"① 可能当时的执政者并非真心要起用刘铭传，因而李鸿章奏上后，便没了下文。后来，黄桂兰因兵败北宁而服毒自尽，出身淮系的两广总督张树声受牵累去职，曾有函抱怨刘铭传当日不肯出山相助黄桂兰："又恨阁下之遗弃世事，不肯折棰以清羌胡也。"②

李鸿章等人并未因此而罢休，一有机会，他们就接二连三地上奏，要求清政府重新起用刘铭传。如光绪九年七月二十五日（8月27日），太常寺卿吴大澄《请命将出师以解越南之危片》称："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才略过人，身经百战，年力稍壮，旧部亦多劲旅，若能假以事权，必可胜封圻之寄。"八月二十八日（9月28日），李鸿章借复陈北洋防务情形之机奏称："刘铭传非独当一面，不能罄其所长。"九月初五日（10月5日），翰林院侍读陈学芬奏请起用宿将，其中就列入刘铭传的名字："皆久历戎行，实心任事，不宜投闲置散，屏于无用之地。臣伏愿朝廷特畀以重任，使之各尽其所长，不许以病躯推诿，不可以微瑕摈弃，庶朝廷得收指臂之助，而邦本于以固，民心于以定，即外患于以弭矣。"③ 十一月十七日（12月16日），陈启泰再次奏请："刘铭传才略尚优，素为该督（指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第25页。

② 《中法战争》(4)，第333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六，第30页。

李鸿章）所倚重，似可谕令来津帮办防务。且淮军休息过久，从前精锐大半销磨，得刘铭传搜讨而振刷之，自不难复成劲旅。"① 十二月十一日（1月8日），道员何维楷上奏《请简威望素著大员督师援越片》，提及刘铭传"勇胜于谋，亦多成功"②。

当时，山西巡抚张之洞，亦欲上折保荐刘铭传，事前，曾有函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复函称："大潜才气陵轹一切，但不欲轻出，所部散在南北，若调集则饷不应手。时事艰棘，彼固深知，不易强起。"③ 暗示非朝廷予以重用，刘铭传不会轻易出山。虽然张之洞未接此复函即已于十二月初六日（1月3日）上奏，但对于李鸿章的意思早已心领神会，因而在奏折中不仅要求清政府重用刘铭传，还建议破格予以文职："李鸿章（津防）所部铭军、盛军两枝，皆淮军也。欲激励铭军，惟有用刘铭传。该提督战略素优，闻其羡慕文职，尽人皆知。窃谓驾驭人才之道，患其无欲，苟有所欲，便有可用。朝廷用人无方，军兴以来，文武互改者不少。假如予以文职，使为帮办津防，必能感奋图报，不惟铭军能战，即盛军亦必观感激励而赴战矣。于国家毫无所损，而于津事大有裨益。振作淮军之微权，似在于此。有李鸿章之持重闳深，有该提督之勇毅勃发，庶可相需为用，应请垂询李鸿章酌度复奏。"④ 奏上后，清政府十分重视，批转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臣会同妥议具奏。两衙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30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九，第16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4页。

④ 《中法战争》（5），第268～269页。

门复奏称：刘铭传等“曾著战功，应否调京备用，伏候圣裁”[①]。可能由于执政者与刘铭传的积怨未消，所以这些奏复呈上后，又没了下文，要求重新起用刘铭传的努力再次失败了。

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原班军机处因北宁之败全遭罢免，刘铭传的对头翁同和亦出局。新的军机处组成后，刘铭传复出一事才有了转机。

光绪十年二月初八日（3月5日），张佩纶上奏《拟请武科改试洋操折》称：“起鲍超、刘铭传辈以任洋务，未必胜任，然欲选中国之武将，再求一如鲍超、刘铭传者，能乎。”[②] 北宁战败后，前敌需人，三月初四日（30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吴峋上奏《边事屡败，请简任宿将折》，奏荐鲍超、刘铭传称：“虽有訾议，要为中国名将，倘蒙天恩加以巡抚衔”，使刘铭传统现有淮军，由轮船到广东，陆行出关，于战事必有好处[③]。二十五、二十六两日，清政府接连收到工科给事中秦钟简、通政使司参议延茂的奏折，要求重新起用包括刘铭传在内的宿将[④]。同时，清政府又接到李鸿章报告利士比率法舰八艘向北开驶，有并力内犯的迹象。局势危急，清政府才于三月二十六日（4月21日）颁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势艰难，需材孔亟，著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⑤]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537页。
② 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三，第63～64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二，第20页。
④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第14～19页。
⑤ 《光绪朝东华录》，第1687页。

清政府准备如何任使刘铭传呢?

有些著者认为,在刘铭传应召赴京时,清政府就已经内定由他赴台湾督办防务了。如台湾史学家庄练先生引用王树枏撰《刘铭传传》所载:"法事岌,诏给巡抚衔督台湾军,乃强起。"及陈衍撰《刘铭传别传》所述:"甲申,朝命督办台湾军务。铭传时已不屑为钦差大臣,欲为督抚。廷寄下,故挟数姬游杭州西湖。鸿章急递促之,不顾,寄语曰:非封疆,勿相溷也。李鸿章为婉陈,加巡抚衔,始受命。"然后评论称:刘铭传认定非改文职,决难以展布抱负。于是,逢到政府有意征用他,他就要借此要挟一番。他的借事要挟,在最初都不能达到目的。直到光绪十年,总算达到目的[①]。姚永森先生在所撰《刘铭传传》称:当刘铭传接奉诏旨,从上海坐船道经天津赴京,在天津停留时,李鸿章设宴招待,宴后,李鸿章告知刘铭传,"清廷将派他渡海赴台"[②]。

其实,上述记载都是捕风捉影的揣测之词,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史实,即三月二十六日诏旨召刘铭传赴京时,并未许诺给他任何的职衔。我认为,清政府不会早就内定派刘铭传赴台督办防务。理由首先是刘铭传原来声称有病,究竟病好了没有,能不能担负军事重任?这需要通过陛见这道面试的考察手续才能确定。其次,此时中法关系变化急剧,法方时而要求清政府签订和约,时而翻脸起衅,以战争相威胁,如何任使刘铭传,总要等到局势明朗后才能决定。最后,诸臣奏荐刘铭传,或谓可督办广西关外军务,或谓应襄办北洋海防。如四月初十日

①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213~214页。

② 姚永森:《刘铭传传》。

(5月4日)，兵科给事中洪良品奏称：刘铭传等屡经战阵，兵略优长。今京师中五营八旗兵卒强弱不齐，患在有兵无将。诚得是三人者，选其可用之兵加以训练之实，旬月间即可得劲旅万人，令其统往京师附近地方屯驻，亦可壮声威而销敌患。同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屠守仁上奏《复陈会议法越事折》称：惟望宸衷独断，仍召鲍超、刘铭传等迅速来京，就京师、直隶现有之兵，日夕训练，并相度形胜，分驻通州及近畿扼要地方。[①] 赴台督办防务，应该是在中法重新起衅和清政府得知朝臣奏参刘璈及法舰侦察基隆后才作的决定，所以说，在下旨召见刘铭传时，清政府不会内定派他赴台湾督办防务。

接奉赴京陛见的朝旨后，刘铭传先到南京，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会晤了两次，商量日后两人互相协作的事情。五月二十日(6月13日)，他航海到达天津，不但见着老上司李鸿章，也与恰巧逗留此处的新授署理两广总督张之洞、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张佩纶、会办北洋海防吴大澄等相逢。五月二十六日(6月19日)，张佩纶奏报此事称："窃臣奉命赴闽，陛辞后道出天津，与李鸿章酌调员弁，商榷事宜，适张之洞、吴大澄、刘铭传先后至津，相与讨论兵事，讲求机器，审度洋情。"这样一路联络，不但使从未筹办过海防的刘铭传集思广益，开阔眼界，而且联络各方大员的感情，奠定日后闽、粤、南北洋四处督抚联合援台的格局。

在天津，刘铭传与李鸿章等人盘桓十余天后，才转赴北京。闰五月初二日(24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了刘铭传。陛见时，刘铭传上奏了《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其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四，第25、第30页。

中条陈了海防十事，包括：严守商埠和产煤之区；改建各海口炮台；筹办新式海军；购买外洋新式枪炮等。这个奏折大概是刘铭传和李鸿章商讨后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他并未实际筹办过海防，如果没有李鸿章等人的悉心指点，很难设想他会说出如此中肯的意见。不过，此折并未针对台湾防务立言，也是他未被内定督办台防的一个标志。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了重点防守通商口岸和产煤之区的意见：中国海口纷歧，万无处处设防之理，用兵之道，实宜合而不宜分，守御之机，在扼要尤在守险。查各国以商埠为要区，轮船以煤炭为性命，如将各商埠及产煤之处布置周密，守御得宜，各国商贾货财皆已入吾掌握。其兵轮久居海中，既无煤炭，又无淡水，即得我沿海一州一邑无关大局之区，坚力以持，当可不战自固。以及防守炮台须重后路的思想：究之筑台虽坚，尤须炮利，兵不善守，与无兵同。现计各口防军，虽重地面设防，六营已无不足，次则二三营皆可支持，惟必用炮队兼操水雷方足以资战守。尤可虑者，敌以陆兵由他口潜登，袭攻瑕之故智，则后路必筹游击之师，庶免重战轻防之失①。这些思想，后来都被刘铭传运用到整顿台北防务和指导台北抗法战争中去。显然，他的这些看法，远较刘璈的笼统分军分区防御的方法更实用，也更高明。此折奏上后，得到清政府的赞同，曾批转给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时作参考。

至于清政府授给刘铭传巡衔督办台湾防务，可能是出于如下原因：

1. 当清政府旨召刘铭传后，四月十二日（6月6日），署

---

①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二，第7~8页。

国子监祭酒李端芬奏请清政府破格重用刘铭传："臣闻刘铭传忠勇有谋，颇以不得文职为觖望。现值海疆多事，正臣子效命之时，如谓有挟而求，该提督断不出此。伏乞特旨敦促就道，令率淮军以居前敌，勿许托故迟延。立功之后，朝廷不妨破格迁除，以昭懋赏。"[1] 加上有张之洞、吴峋等人的前奏，所以才有授刘铭传巡抚衔事。

2. 在刘铭传陛见前，清政府已得知台湾镇道不和及法舰侦察基隆等事，法军的侵台野心已昭然若揭。有旨：彼族挟兵舰来华，无非为恫喝要求之计，屡据扬言将夺踞一口岸为质，借索兵费。沿海各要隘均应严防。琼州、台湾两处地属偏隅，非通商口岸，无所牵制，尤为彼族所觊觎，倘有疏虞，办理益形棘手[2]。特别是台湾防务并不可靠，急须职务高于并能够驾驭台湾镇道的知兵大员前去镇守。

3. 大概在刘铭传陛见后的一二天后，清政府便得悉援越桂军在观音桥与法军冲突并开仗的消息，中法关系呈现微妙局面，《中法和约》面临被撕毁，中法战火将会重开的危险，由于福禄诺曾代表法国声明："和局不成，将取台湾、福州。"[3] 因而台湾岌岌可危。再加上此时清政府已在各地添派大员：云南加派鲍超，广西新派潘鼎新，广东是彭玉麟和张之洞，北洋是吴大澄，南洋是陈宝琛，福建是张佩纶和杨岳斌。所以顺理成章，才有了闰五月初四日（6月26日）的谕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著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四，第35～36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第32页。
③ 《中法战争》(5)，第408页。

各官均归节制。”[1]

刘铭传奉旨督办台湾事务的第三天，中法关系急剧恶化。一个索赔，一个坚拒，互不相让，关系濒于破裂。局势如此紧急，刘铭传虽然毫无准备，但他挂念台湾安危，决定不等调集旧部兵将即孤身赴台。为此，他于闰五月十二日（7月4日），向慈禧太后、光绪帝匆匆陛辞请训，随后又请执政的醇亲王奕譞指授方略。十四日（6日），刘铭传离京赴天津与老上司李鸿章商量一些具体事务，包括：

1. 两人根据基隆既是通商口岸，又是重要的产煤区，并在三月十八日曾被法舰骚扰过的情况，推断它可能会成为法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决定将基隆作为全台防务的重点。由于事机危急，刘铭传准备航海径赴基隆视察和部署防务。对此，李鸿章表示愿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北洋大臣李鸿章深虑微臣临难渡台，孤身无助，不克妥筹防务，且恐难控台军”，商令在刘盛休所部铭军十营内，选派教陆操者百人，教炮队者三十人，教水雷者四人，都计一百三十四人；并派铭军旧将记名提督王贵扬等十余员同赴台湾。李鸿章又筹给毛瑟后门枪三千杆，配齐子弹；并由南洋大臣曾国荃由上海机器局筹拨前门炮十尊，另饬道员龚照瑗由金陵机器局筹拨后门小炮二十尊，水雷数十具，“计前项军火，可勉为目前基隆一处防守之用”。此外，刘铭传还打算在路经上海时，拟选妥实炮厂订购口径一尺内外的大炮数十尊，后门枪数千杆，加上修建炮台的费用，需向清政府请拨银40万两[2]。

---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70页。

②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三，第1~2页。

2. 虽然在授予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的谕旨中，清政府强调“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但这个督办头衔毕竟是个临时差使，有事则设，事毕则撤，还不如实缺巡抚有权威。而且权力一事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属下听从指挥，凡事遵令而行，则长官是谓有实权；反之，属下阳奉而阴违，凡事表面答应，实际不去实行，则长官的意志就很难贯彻。更何况督办这种临时差使，一时半时也难以对付盘根错节的原有官僚体系，事情就不好办。李鸿章曾有奏谈督办的尴尬处境：“军务……在在与地方交涉，督师者号令黜陟，不能必行，动多掣肘，以武臣临之更难著力。”庄练先生在引用陈淡然所论督师而无督抚之任，则所至督抚抵牾，州县抗其权威，不能真正治兵讨贼后称：“督兵之人如无疆吏身份，必难收臂指之效。”刘铭传的督办台湾事务，也将面临台湾当局抵制的局面，以至“李相国见公孤身入台，兢兢以难制台军为惧”，两人可能还商量了对付刘璈和孙开华的办法，决定借重与李鸿章的关系密切、新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管及台湾）而权力颇大的张佩纶。张佩纶表示愿意协助，很快就答复刘铭传：对付孙开华并不难，因为孙开华是临时调防台湾的，只要将他调离台湾即可，“孙开华三营拟调至泉州，免公难处”。对付刘璈则没有那么容易，张佩纶最初打算借口署台湾镇总兵杨在元曾吞饷滥委，参劾去职，改由调台驻防的铭军旧部章高元署理台湾镇总兵，“庶与公同心共济”，与刘璈相抗衡。[①] 至于以后的事情，张佩纶准备亲自赴台一趟，再与刘铭传商量决定。只是由于很快就发生了法军第一次袭攻基隆的战斗，台北形势危急，防务

① 《中法战争》(4)，第382页。

需人，调走孙开华一军的计划只得放下。张佩纶也由于法舰聚集马尾，重任在身，赴台一事未能成行。

诸事粗有头绪后，闰五月十六日（8日），刘铭传在天津启用“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前直隶提督关防”的木质大印。十八日（10日），刘铭传乘船离开天津南下，于二十日（12日）到达上海。在上海，他停留了两天，一是筹运沪宁所拨军械；二是设法订购新的军械；三是招集一些幕僚随员，“臣铭传由京渡台，道经上海，仓猝启行，文武随员甚少，适有记名道朱守谟，恳随东渡”[①]。刘铭传从上海乘船启行，于二十四日（16日）到达基隆登岸。

关于刘铭传航海渡台的经过，曾经流传有这样一则轶闻，即刘铭传用计巧妙地摆脱法舰的袭击阴谋。如《纪刘省三宫保守台湾事状》一文称：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命下之日，有以书致公京师，谓敌将邀于海，而为公危者。公阳惧，先期征师船为卫，至沪上，更示趑趄状，而阴则潜舟以济。比至，敌人蹑公者之舟亦至，而已无及矣”[②]。

《书先壮肃公守台事》则记称：“初，公之衔命过沪也，法使数来会，探行期。公则置酒高会，声言某日乘某舰渡台。是夜，大风雨，公乃微服乘小艇，登他舰疾行，去岸数时，法使乃觉，疾发兵舰追之，思要之于海，比至沪尾，则公已登岸两时矣。”[③]

姚永森先生撰《刘铭传传》写及此事，则以《合肥刘朝宗先生家传》所载为蓝本，又糅合诸说，加以想象发挥，再绘声

①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一〇，第1页。
② 《中法战争》(3)，第149页。
③ 《中法战争》(3)，第153页。

绘色地铺陈渲染，将事情描述成一则富有戏剧性的惊险故事：

公元1884年7月12日（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日），刘铭传到上海后，突然以两江总督曾国荃副手的身份，参与同法国公使巴德诺的外交谈判。这是刘铭传的一个计谋。原来，此时法国远东舰队在南中国海游弋，正密切注视中国的动向。据来自法国内部的准确情报，法国舰队已做好准备，一俟巴诺德发来关于刘铭传率舰渡海赴台日期的电报，就在海上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予以击沉。为保证后勤船只顺利抵台，刘铭传采纳其侄孙刘朝宗的建议，命令他带队先期渡海，他本人则留在上海与法国公使兼高级间谍巴德诺周旋数日，陪伴曾国荃进行对法交涉事务。

巴德诺果然前来拜访刘铭传，并探询他动身的日期。刘铭传设宴热情款待他，席间觥筹交错之际，刘铭传假装顾虑重重，告诉巴德诺将在某日等大批护卫师船聚齐后，才乘某舰渡海赴台。7月14日（闰五月二十二日），上海一带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巴德诺见天气如此恶劣，又见刘铭传状若无备，再经密探探报刘铭传征集的大批护卫师船尚未到齐，就断定刘铭传暂时不会离沪。

谁知，就在这天夜间，化装成布衣模样的刘铭传，冒着大风雨，先乘一只小舢板，七弯八绕，登上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即下令全速驶往台湾。两天后，巴德诺在谈判桌上不见刘铭传露面，心生疑窦，派人打听，方知中计，连呼上当，急忙电告孤拔，疾发兵舰追之，可惜晚了，待法舰赶到台湾基隆海口，刘铭传早已登岸两个小时。①

---

① 姚永森：《刘铭传传》。

然而，细加推敲，就可发现这则轶闻破绽颇多，与当时情形并不相符，恐非事实。

首先，前引三则记载虽然说是同一件事情，但彼此差异很大，并不一致。如有的说刘铭传在京师时已得知“敌将邀于海”的消息，有的则把它说成是法军的内部机密；有的说刘铭传去岸数时，法使乃觉，有的却说成是两天后，法使才发现上当；有的说刘铭传在基隆登陆，有的却说是在沪尾上岸。出现这种莫衷一是的矛盾分歧情形，就意味着这则轶闻本身并不可靠，臆测虚构成分很大。

其次，说刘铭传曾以副手的身分，陪伴曾国荃在上海与法使巴德诺交涉谈判也不符合事实。我们在第七章将指出，曾国荃到上海与巴德诺谈判详细条约，清政府派陈宝琛会办，邵友濂、刘麒祥随同办理。后又增派驻法公使许景澄会同办理对法交涉。朝旨煌煌，陪伴曾国荃与巴德诺交涉的四个副手中，并无刘铭传的名字。奉旨后，曾国荃于六月初四日到达上海。他与巴德诺初次会晤和交涉的时间是“初五拜巴，初六巴来答拜，初七议事”[1]。这时，距刘铭传到达台湾的时间已有半个月了。据曾国荃七月间向清政府报告：当刘铭传奉召进京，于五月间路过南京时，曾与曾国荃会晤过两次。自奉旨督办台湾事务后，两人仅只有函牍来往，并未晤面。可见，说刘铭传曾以副手身分倍伴曾国荃在上海与法使巴德诺交涉，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那么，刘铭传在上海逗留期间，会不会与法使巴德诺来往呢？这是整则轶闻的关键，弄清楚了就可以判断事情的真伪

---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〇，第17页。

了。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对外交涉任务的一般官员是不允许与外国使臣随便来往的。基隆首战后，法将利士比要求刘铭传到法舰晤谈，被刘铭传以“未奉旨”、“体制所关”为由予以拒绝，事闻，清政府曾颁旨嘉奖，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何况刚刚接受赴台御法重任的刘铭传又是一个民族自尊心极强、嫉恶如仇的爱国官员，又怎么会毫无原则地“设宴热情款待”作为敌方首席代表的巴德诺，并与他谈论渡海赴台督办防务的军事机密呢？如果两人曾经会晤，刘铭传必定会报告清政府，但我们至今未能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至于巴德诺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殖民主义者，他来上海是奉法国政府的命令，欲借中法两国军队在观音桥冲突的事件，向中国讹诈和勒索巨额赔款。他狂妄自大，气焰嚣张，当得知清政府派曾国荃一行前来谈判交涉时，就盛气凌人地宣称：中国如“不先允偿（赔款），江督到沪不必相见”。既然如此，他又怎会屈尊降格地主动去拜访地位远逊于曾国荃、又不参加谈判的刘铭传呢？在法方资料中，也没有关于二人多次会晤的记录。可见，说刘铭传在上海曾与巴德诺先生宴饮周旋云云，亦非事实。

姚永森先生赋予巴德诺在这则轶闻中的使命是：侦知刘铭传的渡台日期，以便通知法国远东舰队在海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击沉其坐船，这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法方为了诱迫清政府屈服，以讹诈和勒索到巨额赔款，曾一再同意展延停止军事行动的日期。就在刘铭传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谢满禄代表法国政府照会清政府军事行动展限七日。同日，法国海军部长裴龙指示在华法舰司令孤拔派出军舰到福州

和基隆的同时，特别强调："不要使用武力，如果你没有被攻击的话。"[①] 因此，当第二天刘铭传航海赴台时，应该是碰上了相对平静的时机。显然，巴德诺和孤拔都不会仅只为了对付一个刘铭传，就公然违背法国政府的明确命令而动用武力，"邀击于海上"，从而破坏他们所精心导演的讹诈骗局。

据袁保龄致李鸿藻函可知，在此前后，刘铭传曾与张佩纶相约往返台湾、福州之间："幼樵十三日到福州，前见其致省三电云，拟二十五渡台。省三复以在台相见，同往福州。"[②] 如此毫无顾虑地准备多次航海往返，也反证出刘铭传根本不担心法舰袭击。可见，说法舰企图在海上突然袭击刘铭传，完全是为了人为地拔高刘铭传所作毫无根据的牵强附会。至于法舰与刘铭传的坐船先后到达基隆，实际是孤拔执行派舰到基隆的命令的一种巧合，二者并不存在追击与被追击的关系。

最后，李鸿章于闰五月二十九日致总理衙门的一封电报："海晏船送省三赴台回"[③]，则揭穿了关于刘铭传在大风雨乔装乘军舰赴台的谎言，因为"海晏"是轮船招商局一艘来往于津沪之间的寻常商轮，而不是什么军舰。

其实，刘铭传的赴台虽然带有军事保密的性质，却只是一次寻常的航行：为了运送人员和武器的方便和军事保密，可能刘铭传在天津时就已租用了"海晏"轮船，途经上海稍为逗留，即直驶基隆。但对于行程，如何时离开天津，何时抵达上海，再离开上海赴台湾等日程则无保密的必要。我们查阅当时的《申报》，发现上面几乎逐日报道了刘铭传的行程。如1884

① 《中法战争》(7)，第225页。
② 《中法战争》(4)，第627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64页。

年 7 月 11 日（闰五月十九日）载："巡抚衔督办台防刘省三爵帅，于十八日早乘海晏轮船启节，绕沪赴台。"① 1884 年 7 月 13 日（念一日）载："爵帅准于十八日包海晏全轮趱程径赴台湾，或不绕入上海。随带亲兵数百名，枪子数百箱。"② 1884 年 7 月 15 日（二十三日）："刘省三爵帅抵沪，即须迅赴台防。刘省帅昨在上海某洋行定购军装，计银二十五万两，殆将运往台湾也。昨早，本埠印委各官俱赴爵帅行辕禀见。爵帅即于下午两点钟时，仍坐海晏轮船径赴台湾。"③ 其间，刘铭传既不必在上海演出与巴德诺周旋的把戏，也无法舰企图邀击于海上的惊险镜头。好事者杜撰出巧计摆脱法舰袭击的轶闻来突出刘铭传的聪明机智，讽刺敌人的愚蠢无能，只可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却不能当作可靠的史实。

---

① 《申报》，第 25 册第 61 页。
② 《申报》，第 25 册第 73 页。
③ 《申报》，第 25 册第 83 页。

第七章

中法重新起衅

一 潘鼎新临危受命

北宁战败后，徐延旭被革职拿问，溃败的桂军大部分被裁撤，清政府改任潘鼎新为广西巡抚，配以从各省抽调的精锐生力军赶赴广西前敌抵御法军。

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合肥人。1849 年中举，1857 年从军。1861 年奉曾国藩之命募勇成立鼎字营，编入李鸿章新组建的淮军序列。1862 年，潘鼎新随李鸿章赴上海与太平军作战，所部逐渐配备洋枪洋炮，并扩充至十营之众，战斗力也不断提高，成为淮军的主力之一。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潘鼎新逐渐升官。同治年间，从知府、道员擢升至山东按察使、布政使、云南布政使，光绪二年升任云南巡抚。同时还获赏黄马褂、赐敢勇巴图鲁名号、加头品顶戴、予云骑尉世职、晋一等轻车都尉。光绪三年，他与云贵总督刘长佑交恶互参，因清政府左袒刘长佑，潘鼎新遂去职，从此赋闲在家。光绪五年，他的老上司李鸿章曾把他接到天津帮助筹办海防，并千方百计为他图谋复职，都被清政府以"物望未洽"为由婉拒。中法衅起之始，李鸿章曾希望潘鼎新能任广西巡抚，由于张佩纶等谏官上奏反对而未果，张佩纶称："其人特偏裨才，

难以独当一面，内多欲而外无威，终必偾事。”只得在光绪九年署理湖南巡抚，很快就因“开爽明晓，事理平易”而获真除，任途重变顺遂。然而，广西前敌抗法形势的陡然变化，却完全改变了潘鼎新的人生道路。

早在光绪九年十二月，因为担心北宁援越桂军无法抵御法军的进攻，张树声便致电李鸿章，建议用潘鼎新取代徐延旭主持北宁战事：“如得琴轩任桂事，则能联岑，能用黄，前敌一气，庶望有济。”① 虽然清政府没有马上批准，但李鸿章已写信与潘鼎新谈及此事，潘鼎新于光绪十年二月十二日（3月9日）复函，“已有慷慨筹边之意”，被李鸿章认为“尚非外行也”②。直到二月十七日（14日），李鸿章向清政府报告北宁战败的噩耗，由军机大臣李鸿藻出面推荐，两天后清政府才匆忙下旨：“湖南巡抚潘鼎新驰赴广西督办军务。”③ 廿九日（26日）又命潘鼎新署理广西巡抚，接统广西边军。奉旨后，潘鼎新随带湖南抚标小队560人，于三月十三日（4月8日）自长沙启程。途中接奉十七日（12日）朝旨：“广西巡抚著潘鼎新补授”④，四月廿七日（5月21日）驰抵龙州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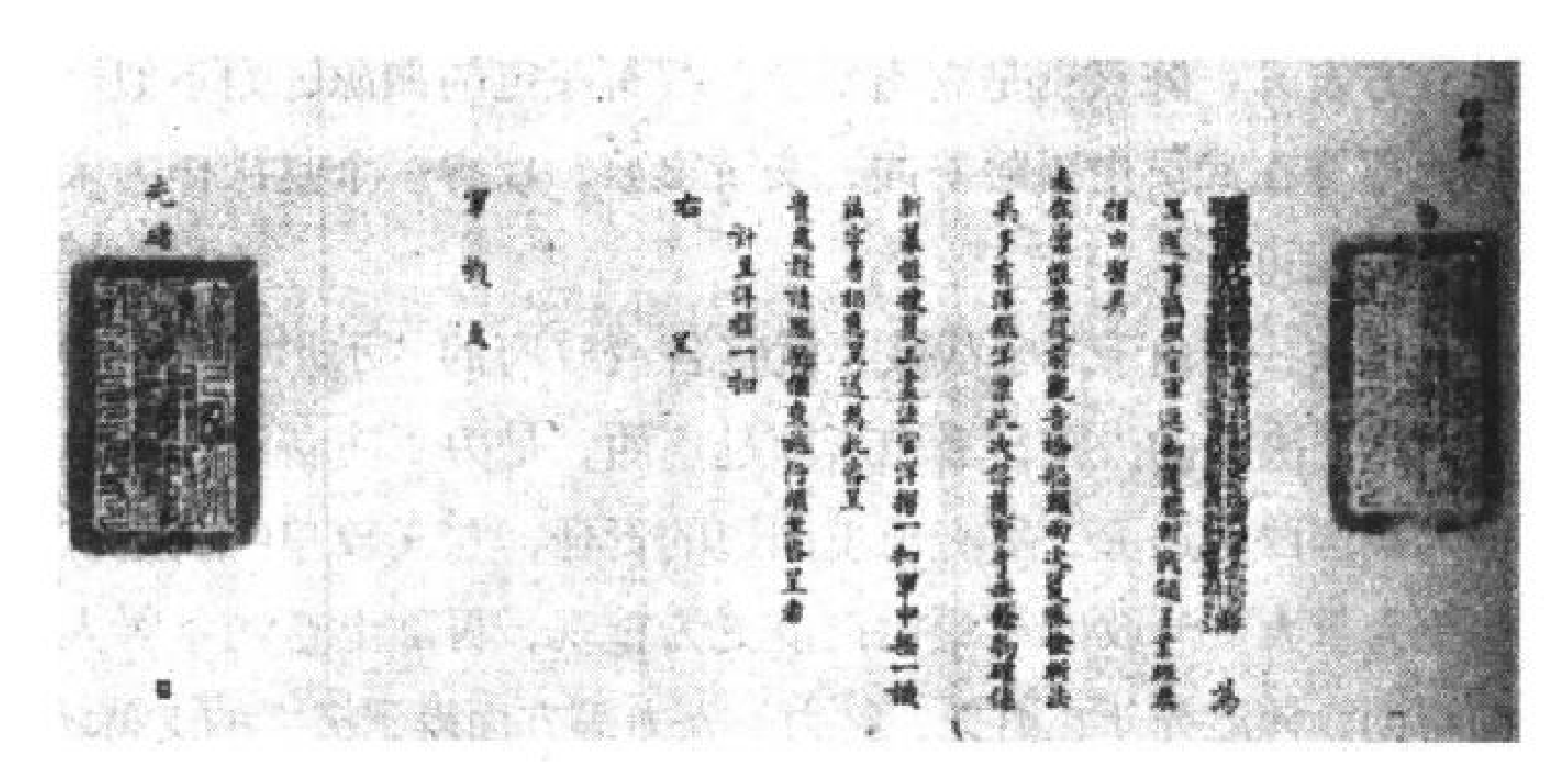
与徐延旭相比，潘鼎新具有许多长处。

首先，潘鼎新虽然官居文职，本人却是行伍出身，历经战阵，军事经验丰富，特别是具有较多的近代战争知识。早在上海、江苏等地镇压太平军时，潘鼎新除所部大量使用洋枪洋炮外，还曾奉命兼统上海的英国教练勇和常胜军，“于洋人火器

① 《中法战争》(4)，第141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4682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1671页。
④ 《中法战争》(5)，第287页。

用法颇知究心，所部鼎字淮勇十营，洋枪居多，内有开花炮队一营，炮位器具皆臣陆续购自外洋，为中土难得之物，堪为海疆镇守”[①]。光绪五年后协助李鸿章筹办海防，见识更加开阔。光绪九年四月，李鸿章奉命督办滇、桂、粤三省军事，就欲借重潘鼎新：“执事倘能据鞍顾盼，率诸将以南征，足张吾军矣。”[②] 后因清政府改令李鸿章回任北洋而不果行。当他于光绪十年二月十九日（16 日）临危受命前赴广西时，李鸿章廿五日（22 日）去电鼓励他：“执事老于戎行，智深勇沉，断无避危畏难之理，务望闻诏即行。此局全仗执事挽回，切盼切盼！”[③] 期望很高，寄托很大。

其次，潘鼎新在官场的关系较多，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帮助。李鸿章是潘鼎新的同乡兼老上司，二十余年来两人的关系一直密切。而李鸿章在清政府中地位特殊，权势很大。他既能



1885 年 1 月，广西巡抚潘鼎新咨军机处前试抗法北形文

① 《李文忠全集》奏稿，卷八，第 46 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4674 页。
③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4681 页。

随时窥伺清政府最高领导集团的决策和动向，又有与各国使节交涉的便利，因而能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政治迷雾中，掌握底蕴，抓住要害，提供给潘鼎新作参考。李鸿章自己也有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对于未来战事的预测和决策定计，也比一般纸上谈兵的御史言官易中要害，随时奉告，对于潘鼎新也会是不小的帮助。李鸿章掌握军事二十余年，囊中尽多精兵良将、新式枪炮，可以大量接济潘鼎新。此外，潘鼎新在淮军时与张树声长期共事，关系融洽；在云南任官时，又与云贵总督岑毓英同事，关系尚好。他在三月二十日（4月15日）奏称："臣维张树声与臣结交最久，岑毓英相契亦深，谊属寅僚，而情同手足。矧边疆有事，同在行间，尤当针芥相投，患难与共，断不敢稍存意见，致负平生。"[①] 至于与诸将的关系，则周寿昌原是淮部旧人，杨玉科、蒋宗汉均为云南故将，苏元春、方友升、陈嘉则是湖南新交，都有一定的渊源，而不似徐延旭那样在武员中孤陋寡闻，交游寥寥，仅得一个赵沃作为亲信的情况可比。

再次，是由于北宁战败，就宣告清政府的"示形慑敌，援越抗法"决策的失败，潘鼎新前赴广西，是为了防备法军乘胜侵入我国西南边疆，负有保境固边的责任，意义较单纯援越抗法更为重大。清政府对此比以前更为重视，再加上李鸿章等人的帮助，使潘鼎新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得到极大的支持。

关于财力支持。在潘鼎新受命之始，李鸿章就在三月初二日（3月28日）去电为他出谋划策，要他向清政府提出解决

① 《中法战争》(5)，第316页。

军费问题："饷需请拨，未必有著。"[①] 于是，在四月初二日（4月26日）甫抵桂林，潘鼎新就上奏清政府提出："臣添此一军（指潘鼎立五营）合之前所调杨玉科、方友升、苏元春、叶家祥等将及二十营，每月需饷银五万数千两，除苏元春、叶家祥共三千余人若能仍用湖南原饷外，尚须银四万余两，可否饬部照数筹拨。"[②]

对于筹拨广西前敌的军费，清政府早就有所考虑。户部曾于二月初一日（2月27日）上奏，自五月起至十二月底止，由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省和江海、闽海等关，每月共协拨广西饷银四万两[③]。三月廿四日（4月19日），清政府有旨：著准潘鼎新截留京饷十万两，以资饱腾[④]。四月十八日（5月12日）又有旨：潘鼎新现需军饷，拟于前拨云南银100万两内拨给银30万两。苏元春等所带三千余人仍用湖南原饷[⑤]。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再次指示：所有苏元春一军，除留湘营外，共到粤1800余人，所需饷银，仍著庞际云按月拨解，毋误要需[⑥]。这样，潘鼎新在赴任之始，就得到清政府拨给的七十二万多两军费，超过徐延旭等所得65万两军费的总和，基本能满足了前敌的要求。

关于物力支持。早在二月廿五日（3月22日），李鸿章就函告潘鼎新准备拨给他的军械：前携去毛瑟枪千枝，即尽数带往。顷解两批后门枪炮，由振轩转拨，即尽数提用。三月初二

①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4682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五，第17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一九二，第721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一八〇，第512~513页。
⑤ 《清德宗实录》卷一八二，第547页。
⑥ 《清德宗实录》，卷一八五，第1~2页。

日（3月28日），又再函告潘鼎新：六月间订购克鹿卜过山小炮，到沪当再分拨二三十尊，可专立炮队二营，再调教习弁勇随往[①]。十二日（4月7日），因为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粤军所用军火等项，极关紧要，并著设法接济。李鸿章于十七日（12日）复奏，干脆提出要将原来准备拨济滇、桂两省的军火两磅过山炮十尊，林明敦后膛枪一千杆，士乃得后膛枪二千杆，配齐子弹各项，全部转拨给潘鼎新。因电商两广督臣张树声全数截留梧州转运局，就候提用。并咨明潘鼎新知照，可备目前急需[②]。七月初一日（8月21日），李鸿章去电潘鼎新："前咨拨尊处后门枪、克鹿卜过山炮是极精品，应遴委员搭轮赴沪提解。"[③] 可能又考虑到潘鼎新派员赴沪提解有一定困难，李鸿章干脆自己找人代运，于初三日（23日）又通知潘鼎新："枪炮电苏道代解，月杪可齐。"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大概是受到李鸿章的感染，已被解除两广总督职务的张树声，也在等待交卸期间，尽自己的能力所及帮助潘鼎新。他于五月廿九日（6月22日）报告清政府：东拨西锔，潘后军共解11万。现又在东省炮营内抽来复炮六尊，借拨新购毛瑟枪千杆，子30万，解济要需[④]。闰五月初十日（7月2日）又称："东省现又加拨毛瑟子二十万，洋药十万斤，铜帽三百万。"[⑤] 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也于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一日（2月25日）电称："冬腊两月解过桂军士乃得枪千五百杆，毛瑟各

---

①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4682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第4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88页。

④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七，第27～28页。

⑤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八，第10页。

种弹百七十万。闻谅急，电饬龙局截留唐、刘枪千济桂。"[①] 这样，潘鼎新就从李鸿章、张树声和张之洞等处得枪近一万支，炮 50 尊。

此外，潘鼎新还通过其他办法弄得部分枪械。一是争取各省援助。如他四月初二日奏调安徽皖南镇总兵潘鼎立募勇五营 2500 人，就要求两江总督配以枪炮军械，四月十八日有旨批准了潘鼎新的要求，著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荃遵旨办理。曾国荃于光绪十年五月十八日（6 月 11 日）复奏："皖南镇总兵潘鼎立招募淮勇赴粤，奉旨由两江拨给枪炮。经臣饬军械所于五月初三日（5 月 27 日）拨发温者斯得十七响步枪四十杆，药弹一万六千颗，马梯尼枪六百杆，铜管自来火子十八万颗，燕非来福枪一千五百杆，铜帽二十万颗，点交该镇来弁领齐。"[②] 潘鼎新奏调的杨玉科招募三营 1500 人，据四月廿二日（5 月 16 日）上谕："杨玉科在湘募勇，已将应用后膛枪如数选配给领。"[③] 照此类推，则方友升四营 2000 人及赵济川所募一营 500 人，亦应由各省配给枪械。二是通过奏调各省现役防军，连人带械一起携赴前敌。如奏调湖南防军苏元春所部五营 1800 人，周寿昌所部黔军一营 500 人，以及潘鼎新本人随带的湖南抚标小队 560 人（疑为由叶家祥统带），估计随身都有枪械，这样又解决近 3000 人的装备。此外，先期到达前敌的王德榜所部楚军十营已配备有枪械，溃退裁撤余下的桂军估计也会有部分军械。

综上所述，潘鼎新到广西前敌督办军务，所率各部将士军

①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奏，卷一，第 27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1741 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五，第 37 页。

械装备都要比徐延旭时候充足精利，从而为与法军打硬仗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至于人力支持。一是由清政府出面，主动指调各省生力军给潘鼎新调遣。三月十二日（4月7日），清政府指示李鸿章推荐其他得力将领给潘鼎新调用："前有旨令潘鼎新署理广西巡抚，克日驰往接统徐延旭所部各营。边事正殷，需才孔亟，潘鼎新到粤后，必须有人相助为理。著李鸿章于各将领中择其堪胜边疆提镇之任者，据实保奏一二员，听候简用。"① 十七日（12日），李鸿章复奏举荐唐仁廉、周寿昌二将，三天后，清政府批复，不但允准了李鸿章的举荐，而且加派驻军湖南永州的记名提督苏元春所部五营前赴广西②。

但是，唐仁廉奉旨署理广西提督后，"求奏拨专饷未允，求带仁字一营亦未允，遂观望不前"。并由于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四月十四日（5月8日）上奏，以海防紧要为由，请仍以唐仁廉留驻北塘。清政府纳奏，将唐仁廉留而不遣，改派丁忧在家的湖南籍记名提督方友升募军前往广西，于廿四日（18日）有旨："所有驻扎永州之提督苏元春统带防军二千四百余人，著潘鼎新全数调往，俾资厚集。并著檄委提督方友升招募二千人陆续前进。"③ 在此前后，清政府还曾令告病在籍的前广西提督冯子材驰赴关外接统黄桂兰所部各营，前浙江提督黄少春酌带江南五营驰赴广西，与潘鼎新会办军务，均因故未果行。

二是潘鼎新自己提出奏调人员，由清政府允准调往。如潘

---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1671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第5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五，第12页。

鼎新曾奏："粤西边防吃紧，奉命前往援剿，已奏请著杨玉科招调旧部一千人，作为亲军，随同前往，统领粤西防军。"[①]清政府于四月廿四日批复："潘鼎新奏请调员差遣等语。前广东高州镇总兵杨玉科，即著准其带领亲军并旧部弁勇，随同潘鼎新前往广西。署四川越隽营参将徐联魁、署四川阜和协副将蒋宗汉、江苏候补道赵济川，著曾国荃、丁宝桢饬令各该员迅速前赴广西军营，交潘鼎新差遣委用。"[②] 又如允准潘鼎新奏调潘鼎立等。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清政府调给潘鼎新差遣的这些将领，大多是清军中的一时人选，《清史稿》上的有名人物，远胜于无籍籍名的黄桂兰者流。

如苏元春，广西永安人，生得躯干雄硕，轻财好士，能得人死力。其父因抗拒太平军被杀，苏元春遂投入湘军。在镇压太平军和贵州苗瑶等少数民族起义中，积功晋提督，赐号健勇巴图鲁、更勇号锐勇、法什尚阿，赏穿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赐头品秩。到广西后，即调剿思恩莫梦弼之乱，因功为潘鼎新保奏，于五月奉旨署理广西提督，很快就得实授。后来因为参预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及督办广西边防的缘故，成了清末的名将。部下有骁将陈嘉等。陈嘉，字庆余，广西荔浦人，从苏元春征伐，累勋授记名总兵，赐号讷思钦巴图鲁。他在苏元春部下一直担任先锋头敌，打仗骁勇，屡建奇勋，战后伤发，殁于防所。

杨玉科，回族人，祖居湖南善化，寄籍云南丽江。早年随

① 《中法战争》(3)，第83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第11～12页。

岑毓英镇压云南杜文秀起义，为将素有谋略，用兵如神，曾被刘坤一称为："年力正强，留心洋务。"左宗棠称他："才略出群，饶有气概，战阵勇往，实为边才之选。"[①] 积功至提督，赐勇号励勇巴图鲁，易勇号瑚松额，赏黄马褂，两予骑都尉世职，改一等轻车都尉，晋锡二等男，赐头品服。先后署理云南开化镇总兵、广西右江镇总兵、广东高州镇总兵、署理广东陆路提督，光绪初年告病回籍调治。光绪十年为潘鼎新举荐募勇2000人随征，实际募得广武军三营1500人，于闰五月十二日（7月4日）驰抵边关防所。部下有骁将蒋宗汉等。蒋宗汉，云南鹤丽人。投军后隶杨玉科麾下，每战辄为先锋，智勇双全。积功赐勇号著勇巴图鲁，更勇号图桑阿，擢记名提督，赏黄马褂。曾署腾越镇总兵，实授顺云协副将，杨玉科殁后，代统其军，在取得镇南关大捷中立下功勋。

方友升，湖南长沙人。咸丰末从军，随左宗棠、刘锦棠西征，有骁勇名，"宗棠大器之"[②]。积功至记名提督，赐勇号哈丰阿巴图鲁，赏黄马褂，赐头品秩。光绪八年丁母忧归，奏调后，募勇四营2000人从征。

周寿昌，原为淮军大将周盛传部下将领，李鸿章评论他："淮军讲究利器，以盛军为最。现贵州安义镇周寿昌为海舲所擎赏，性情虽少有出人，精悍能战守，又略习枪炮用法，似可就近奏调。""且与潘鼎新曾共征役，气谊投洽，采用洋械，亦知讲求"[③]。奏调后，率带黔军一营500人赴桂。

潘鼎立，是潘鼎新的堂弟，五月招募五营2500百人赴桂，

① 《中法战争》(3)，第83页。

② 《清史稿·方友升传》。

③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4642页。

七月，“触暑遄征，中途病故”，死于广州天字码头。所部改由潘鼎新亲自率领。此外，尚有叶家祥率领的湖南抚标小队560人，江苏候补道赵济川招募的亲兵一营500人。

这样，潘鼎新奏调带赴广西的各省生力军就有将近一万人。

此外，先期到达广西的王德榜所部楚军及裁撤归并后的援越桂军中，也有一些骁勇善战的将领，如王德榜、董履高等。

王德榜，字朗青，广东东莞人，三世前迁居湖南江华。咸丰初与其兄起乡兵对抗太平军，后隶左宗棠部下。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积功擢升福建布政使，赐号锐勇巴图鲁，赏黄马褂。复随左宗棠西征，因为有勇有谋，屡建奇勋，受到降敕褒嘉，赐头品秩，以丁母忧坚请解职回籍省墓。光绪七年入京，教练火器、健锐诸营。左宗棠为江督时，饬留江南督其旧部专办修水利石工，对其评价颇高，曾致书李鸿章称：“王朗青英锐能战，亦一时之选。”[①] 光绪九年，左宗棠欲赴抗法前敌，因误信刘永福为王德榜旧部的讹言，趁王德榜回籍省墓之机，命其募兵八营，配以枪械入桂，以作前驱。左宗棠曾致函杨昌浚述说用意：“近因法越交兵一案，枢部束手，不得已为赴滇、粤边界之请。先令王朗青方伯于回籍之便，挑募广勇乡兵数营，一面径赴刘永福处，察看军情地势。弟再率新募各营接踵前进，一往图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未知朝廷许我否耳。”[②] 在赴桂途中，王德榜又派员到广东东莞、连州增募两营，合以原募共十营5000人。部下有骁将张

① 《中法战争》(4)，第325页。

② 《中法战争》(4)，第329页。

春发、肖得龙等。张春发，字兰陔，江西新喻人。初隶刘松山麾下，从征陕西，积功授记名提督，赐号杰勇巴图鲁，更勇号哲尔精阿，赏黄马褂，予世职。治军严，尝云兵佚则骄惰，以故朝夕躬训练。肖得龙，湖南蓝山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积勋至记名提督，赐勇号博奇巴图鲁。

董履高，字仰之，安徽合肥人。同治元年春投入李鸿章淮军营中，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积功授记名总兵。光绪五年，随张树声至广西，署浔州协副将。中法衅起，奉命募军四营移屯南宁、龙州，以备策应。光绪十年，再署浔州协，旋因参与平定思恩莫梦弼之乱，著以提督记名，并赏给奇车伯巴图鲁名号。调署新太协，仍驻龙州。张之洞曾称誉他："智勇深沉，勋勤卓著，忠勇苦战，公论交推。"[①]

有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作基础，广西前敌的形势大为改观了。

二 李福和谈及协议

北宁战后，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法国政府和军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茹费理为首的一些人过高地估计了法军胜利的意义，过低地估计中国政府及军队的抵抗意志，因而主张在乘胜吞并全越的同时，向中国勒索赔款。当时的报纸有这样的说法，四月初二日，茹费理就电告法国驻华署使谢满禄：即将赴任的驻华公使巴德诺将要求与清政府订立一个协定：（一）互相保证两国国境；（二）对法国赔款。[②] 第一点所说的"两国"指的是中国和法属越南，签订这

①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卷二八，第14～15页。

② 《中法战争》(7)，第212页。

一条，就意味着用条约的形式确定法国对全越的吞并；第二条指的是中国因北宁战败而向法国赔款，签定这一条，不但完全把战争责任归于中国，否定清政府所奉行的“援越抗法，保藩固圉”政策，而且意味着法国对中国的进一步勒索和侵略。而以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乐为首的一些军人，则认为清军和黑旗军只是被击溃，其有生力量并未受多大损失，如果卷土重来，仍会给侵越法军带来很大的麻烦。因而法国的胃口不可一下子太大，而主张分两步走：即先巩固北宁胜利的成果，完成吞并全越的程序，在此之前，应该把中国暂时搁置一边，以不向中国索取赔款为条件，换取中国对法国并吞全越现状的承认，以免节外生枝。米乐在攻下北宁后，并未乘胜挥师将援越桂军完全逐出越境，即是贯彻这种主张的一个例子，为此，米乐后来还遭人攻讦以至去职。而这种主张的全部要点则反映在海军校官福禄诺致李鸿章的信中。

光绪十年三月，法国“窝尔达”号军舰中校舰长福禄诺与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香港偶然相遇，两人谈及中法关系，趾高气扬的福禄诺大放厥辞，“侈陈军情”，胁迫中国撤换曾纪泽，放弃干涉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撤回在东京的援越军队，以此条件与法议和，法国可以不要中国赔款。具体条款如下：

一、现在法国既为中国南省之强邻，中国宜与之订立南省通商章程，并税关规则，日后商务愈旺，则两国交情愈密。

二、现在情形既已如是，中国即可不必想法以限制或拦阻法国保护越南之权利。

三、于拟订约章中，法国愿极力担保，约中措辞必有以全中国体面，不至于中国朝贡之邦少失天朝应有威权。

四、中国宜迅将驻法公使曾侯调开。其所预断越南事宜，亦毫不符合。惟时时妄以中国将与法战相吓诈，致使中国有失体面，欧洲众议皆以中国为不可信。曾侯一日不行调开，即法国一日不与中国商议此事。

五、法国欲向中国索偿兵费，且拟乘此机会用其兵力占据东方沿海地方以为质押。中国如果与法国实心敦睦，及早挽回，法国亦可将此层极力相让。如立一简明条约，果能即在天津或北京议定画押，外面而不至张皇，殊有以全两国之体面。①

虽然在这封信的末尾及其他场合，福禄诺反复强调："该函所写均系福禄诺一人私见，并未向本国请示。"但像他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校级军官，如果不是代表军方相当势力的意见，何以敢这样贸然地插手国家的重要外交活动，并且提出系统的方案？后来，当李鸿章邀请福禄诺前赴天津谈判时，福禄诺通过其顶头上司、东京和中国海分舰队司令利士比，将他的建议请示法国政府。茹费理和福禄诺的私交很好，自然信任他，可能被其所述理由说服，改变了向中国讹诈赔款的想法，同意福禄诺以个人身分前往天津，以其信函所列各条为基础先与李鸿章交涉，谈判定妥后再由利士比代表法国政府前去签订正式的条约。这些变化说明福禄诺的主张已经被法国政府所认可，法国放弃向中国勒索赔款。

当时，李鸿章知道清政府因为越南政府已经完全投降法国，出兵护越的做法失去了意义，因而放弃以前的"保藩固圉"主张："近年以来，越事益急，朝廷轸念藩服，不忍漠视，

① 《中法战争》(5)，第309～310页。

特命云南、广西督抚率师扼扎北圻地方，俾壮声援；此固字小之义，为保护该国计，因以为屏蔽边境计也。乃该国昧于趋向，始则首鼠两端，继且纵令教民抗我颜行，肆意侵逼，山西、北宁之失，皆系该国民人纷纷内应所致。辜恩悖义，莫此为甚。……因思出师护越，越不知感，法又为难，兵连祸结，亦非万全之策。"① 同时又闻悉法国海军企图夺踞质押物，"实因彼将调集兵船攻占台湾，为讹索巨款地步，不得不随宜应付，为救急止兵之计"。加以此时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矛盾日增，冲突越甚，需要集中力量以对付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因此，李鸿章极力主张在福禄诺建议的基础上与法议和，及早从法越矛盾漩涡中脱身出来，于三月廿五日（4月20日）致函总理衙门称："似将来此事收束亦只能办到如此地步（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夺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② 清政府纳奏，于廿七日（22日）批复："事属可行，许其讲解。"③ 四月初一日（25日）再次有旨：对福禄诺所提条款"详加披阅，均尚无伤国体，事可允行，该大臣即照所拟办理"④。为了表示谈判诚意，清政府还根据福禄诺的要求，于初四日撤掉曾纪泽的驻法公使职务。初六日（30日），又将李鸿章的电信和福禄诺的条件，发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大学士、六部九

① 《中法战争》(5)，第325～326页。

② 《中法战争》(5)，第306页。

③ 《中法战争》(5)，第311页。

④ 《中法战争》(5)，第313页。

卿、翰詹、科道等官员讨论。初十日（5月4日），清政府根据众官的讨论结果，指示李鸿章在与福禄诺谈判时应注意的事项："目前最要者约有数端：越南世修职贡，为我藩属，断不能因与法人立约，致更成宪，此节必先与之切实辩明。通商一节，若在越南地面互市，尚无不可，如欲深入云南内地，处处通行，将来流弊必多，亟应预为杜绝。刘永福黑旗一军，屡挫法兵，为彼所深恨，蓄志驱除，自在意中，岂可遂其所欲，更长骄矜之气？此次法人侵占越南，衅自彼开，用兵以来，屡经谕令通商各口岸，保护法商取以优待者甚至，我与彼毫无失和之意，为各国所共知。若再索偿兵费，不特情理所必无，亦与各国公法显背。以上各节，均与大局极有关系。"要李鸿章在这些方面不能让步①。

四月十一日（5日）晚，德璀琳陪同福禄诺抵达天津。是夜，德璀琳来见李鸿章报告与福禄诺一路同行时打听到的情况："该国众议均以兵费必须索赔，福意欲稍减让，该税司屡阻不可。盖闻其密计，法提督孤拔、利士比等遍查中国沿海防务，闽、粤、江、浙罅隙颇多，若乘此夏令越南暑瘴之际，移调水陆来扰，必可随意攻夺一二口岸，为要索巨款的地步，其意尚不在此也。"十二日（6日）下午，福禄诺与李鸿章谈判，十三日（7日），李鸿章向清政府报告了两人谈判的经过：

下午三点钟，法国总兵福禄诺同其驻津领事法兰亭来见。

福云：此番北上，承水师提督利士比嘱请中堂安。

询云：提督好否？

① 《中法战争》(5)，第334页。

答云：甚好。禄诺此次来津，概欲一抒愚诚，中堂幸勿见怪。中堂深明交涉之法，和局可以长保，吾知中国所争者不在区区一越南，实以属邦甚多，不能轻弃越南，致使上国体制有碍。

答云：此事关系极重，允宜恪遵朝廷意旨。贵兵官谓中国所争者在上国体制，不徒在区区一越南，可谓明白已极。

福即于怀中取出洋字一张译云：此系禄诺所拟办法，不知中堂以为何如？

答云：试念念给我听。

福云：此稿已有三款，第一款云：中国南省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无论外国何人前来侵犯，无论系何情形，法国约明均应保全护助。

询云：此条于中国有何益处？

福云：将来别国如有与中国开衅，法国不能暗地与之立约有碍中国。且“保全”二字，即系法国不再侵犯之意。第二款云：中国既经法国许以实在凭据，于中国南省边界，勿得侵占滋扰。中国约明，即将北圻驻扎各防营退回，并约明于法、越已定未定各约，概置不问。

答云：从前法、越甲戌条约云：不论何国皆无统属。去年七月新约首条云：越南有与何国交通，必由法国掌管，即大清国亦均不得预及南国之政云云。此等话于中国数百年来为越南上国体制大有违碍，必须删改。

福云：此事再商，末后可另添一条，专论法、越历次约章。

答云：必须说明将历次条约销废，另行议改。

福云：亦可商量。

询以此条“不问”二字系何意思。

福云：“不问”二字与“不认”二字有轻重之别，中国不问法越条约，并非认允其约，犹之法国不问越南朝贡中国之事，亦非承认中国属邦也。

答云：何不即将此节写上条约？

福云：彼此议论三年，正为此事，若载入属国字样，法国断不能明认。且此种简明条约，最怕有人挑剔，全在措辞得体，于中国无碍，所以须另添一条浑融在内。又念第三款云：北圻边界听凭彼此货物往来运销无阻。

答云：但不准在中国境内开口通商。

福云：兵费照公法必应议赔。

答云：中国驻兵越境，保护属国，为应尽之职。贵国自行添兵攻取，衅自汝开，与中国何干？何能说到此节！

福云：法国众议如此，我何敢违？

答云：我已说过，提到兵费，即无办法。汝若真心要成就此事，切勿再提。

福作为难之状，再四沉吟。答云：万不得已，只可另添一条：因感中国和好商办之情，姑允将兵费免去，但中国亦宜益敦睦谊，优待法人，许于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并约明日后派使另议详细商约税则，期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庶外部可借词搪塞议院需索兵费之口。

答云：在越南境内中国有可让法国者，总可和衷互商，若欲在中国境内开口设领事等事，中国断不能准。

因命随员马建忠等回寓与福禄诺照所议大略，另行商

订简明条款。

福云：我等商定大略，急须电告外部，以定和战大计。中堂即先函知总署，俟两国国家答应，法国即派水师提督利士比来津，与中堂画押，不过八天工夫，即可定议。①

最后，李鸿章和福禄诺议定《中法简明条款》五款：

第一款：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并或有他人侵犯情事，均应保全助护；

第二款：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均置不理；

第三款：法国既感中国和商之意，并敬李大臣力顾大局之诚，情愿不向中国索偿赔费。中国亦宜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并约明日后遣其使臣议定详细商约税则，务须格外和衷，期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

第四款：法国约明现与越南议定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立各条约关涉东京者尽行销废；

第五款：此约既经彼此签押，两国即派全权大臣，限三月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

再，此约缮中法文各两份，在天津签押盖印，各执一份为据，应按公法通例，以法文为正。②

---

① 《中法战争》(5)，第352—355页。

② 《中法战争》(7)，第419～420页。

定议以后，两人各自呈报本国政府。李鸿章在四月十三日致总理衙门的信中特别指出：福禄诺在谈判时有两个问题没有涉及："至刘永福一节，彼未提及，我自不应深论。盖刘永福本系越将，前守山西及协剿北宁，均被大创，法人观之蔑如，似在无足轻重之列。将来若派使会议及此，再与酌定安置之法，亦未为晚。"以及"北圻华军调回边界"的具体日期问题[①]。十五日（9日），清政府有旨："将李鸿章与福禄诺所拟五条呈览，不索兵费，不人滇境，其余各条均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②] 这时，由于担心清政府内部的主战派会起来否决条约，福禄诺决定不等利士比到来签约，自己与法国政府联系，请求给予签约的全权。四月十五日，他将法国政府的批复给李鸿章阅看："奉国旨：予汝全权，无须利至，即可与李大臣押定。"并声明草约"彼不能改易一语，无可再商"[③]。福禄诺又以延期签押可能会重新酿成战争相要挟，催促李鸿章早日画押。十七日（11日），李鸿章和福禄诺各自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画押。假如没有下面的节外生枝，历史进程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在福禄诺看来，《中法简明条款》五款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款，正如他后来在议院听证会上所说的：签署了这一条款，就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它对越南的宗主权，以后，这一宗主权就成为纯粹的历史回忆而已。如果把这一点与允许中国在东京驻军的《李宝协议》相比较，那么，就可以衡量出，由于签署这一条款，法国在几小时之内走过了多么长的历程，这是巨大

① 《中法战争》(5)，第352页。
② 《中法战争》(5)，第355页。
③ 《中法战争》(5)，第349页。

的一步。这一宗主权曾在外国报刊中和各国大使馆中被经常地提到，把它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现在问题已不复存在了，再也没有人谈到，再也没有人想到此事，它已被人遗忘了。以至后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一个人再拿中国的宗主权作为反对法国的理由了。

《中法简明条款》的第二款既然如此重要，以至法国政府和福禄诺都希望尽快实现这一条款，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插曲：在签约后的第三天即四月二十日（14日），福禄诺接到茹费理的指示，要他向清政府提出中国兵由东京立即撤退的要求，并把中国召回它的士兵的命令分别通知法国政府和东京远征军总司令①。于是，曾经强硬地声称对于条约“不能改易一语，无可再商”的福禄诺只好食言，于廿三日（17日）厚着脸皮向李鸿章提出对第二款的重大修改：“该国应保护北圻全境。提督米禄拟二十日后即派法兵或越兵前往高平、谅山；四十日后前往保胜至红河两岸。无论何处，宜调置法兵或越兵前往攻击黑旗或其他匪党，中国兵营宜限时退出。”②

李鸿章是怎样对待此事的呢？

根据法方说法，李鸿章同意了福禄诺的要求。闰五月初十日（7月2日），署理法国驻华公使谢满禄照会清政府称：“本署大臣接到福统领详报，知退兵一节，由福统领开示清单，于起程日交与李相，李相复准，所以允许各将帅将接撤兵之令，诚福统领防乱未萌之善法也。”③

但按李鸿章的多次说法，他是明确地拒绝了福禄诺的要

① 《中法战争》(7)，第216页。
② 《中法战争》(4)，第100页。
③ 《中法战争》(5)，第402页。

求。早在“观音桥事件”爆发之前，他就在五月二十三日（6月16日）给总理衙门上了《论边兵退守》一文，指出福禄诺在离华返法之前与他告别时，已经发现他在前次谈判时遗留的两个问题：即中国边军撤回边境和消灭黑旗军，并试图予以弥补，于是两人又进行了交涉：“四月杪，法兵官福禄诺赍约本回国，濒行时来询简明条约第二款，北圻各防营调回边界，究已调回何处。当告以粤军似在谅山一带，滇军似在保胜一带，皆距中国边界不远。福谓中法既经定约，仍请照约调回边界为是。该国拟派队巡查越境，二十日外当至谅山，四十日外当至保胜等语。鸿章答以越本为我属国，我军分扎北圻边境，防范土匪，均近中国边界，与法何涉？法兵不必深入谅山、保胜等处，致启嫌疑。倘必派队往巡，现既议和，切勿与我军接战生衅。”李鸿章并询问福禄诺，法军“派兵往保胜何意？福云：黑旗系越南叛匪，历年在保胜以下阻扰商路，法兵力能驱逐。必俟此股剿逐，乃可撤减兵队回国。鸿章答以黑旗可由中国设法安置。福云：此自不干中国之事，请勿费心”[①]。等“观音桥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于闰五月初九日（7月1日）致函总理衙门申明福禄诺原议：“彼注意系在第二条，中国兵营限时退出。即面告以滇、粤各军闻分扎谅山、保胜一带，皆距中国边界甚近。十余年来，久驻剿匪，属邦赖其弹压，与法国毫无关碍。兹既议和，应俟详细条款定后，再议办法。今汝国商令限期退兵，语近胁制，我实不敢应允，亦不敢据以入奏。”[②]并称福禄诺曾将限期退兵一款写在和约正文旁边，经李鸿章抗

① 《中法战争》(4)，第98~99页。
② 《中法战争》(4)，第100页。

议后，福禄诺又将其涂抹掉。后来，在交涉时，中方代表曾将福禄诺涂抹过的地方出示给法方查看。如六月廿二日（8月12日），会办南洋海防陈宝琛电称："昨示巴（德诺）字据，一即福临行商李撤防者，李未许，福遂自抹去并署押。其既归，乃谬称续约，致法误会，以有谅山之役。一昨巴将印本给各领事寄公使，以助评论。"①

李鸿章和福禄诺两人的说法截然相反，究竟谁是谁非呢？

由于参预其事的当事人很少，因此，当他们各执一辞时，旁人就很难评判其中的曲直，正如美使杨约翰六月初八日（7月29日）照会总理衙门所说的："查法国所谓中国违约与中国所谓未尝违约，本国国主现时均无从查核，是以于此事难以定有主见。"②

然而，从情理上来看是福禄诺理亏些。首先，在议定和约五款时，他就声明不能改易一字，但墨迹未干，却又提出重大的修改，这本身就违反了外交惯例。其次，外交交涉的重大结果都要以契约的方式表现出来，但福禄诺要中国限期撤军，却没有完成这些程序。这正如六月初九日（30日）总理衙门拟复杨约翰照会所称："试思此等紧要公事，彼此倘已商定，必有往来照会，或往来信函可为凭据。福总兵所言撤兵限期，李中堂既无允许之言，又无允许之文、信为据，不得谓中国为违约者。"③

那么，李鸿章是否就没有一点责任呢？

就本心而论，李鸿章可能也意识到第二款关系重大，因而

① 《中法战争》(5)，第496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49页。
③ 《中法战争》(5)，第452页。

并不愿意过分迁就法方而匆忙撤军。早在四月十三日，他就向总理衙门建议："查桂军退扎谅山、滇军退扎馆司、保胜，皆近边界。此约倘蒙许可，只须密饬边军屯扎原处，勿再进攻生事，便能相安，亦不背约。"[①] 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在中法和约签字画押后，"似无另饬调回之旨，内意但以续议条款责望敝处，其余一切不问，只得由外间相机酌办。"[②] 因此，李鸿章拒绝福禄诺的限期撤兵要求，是合乎情理的。

问题是李鸿章在驳回福禄诺时的态度是否坚决明确，"当即正言驳斥"[③]，使得福禄诺马上"自将此条勾抹，并加花押为凭"[④]。则福禄诺不管如何糊涂外行，也不至于将李鸿章的明确拒绝当作答允。实际上，李鸿章虽然认为福禄诺的要求不便应允，但内心却感到是在情理之中。他后来电告潘鼎新称："原约调回边界，福酋临行又请限期撤兵，鄙固未允，然不得谓非照约行事也。"[⑤] 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则李鸿章可能就不会坚决明确地加以拒绝，而用清朝官场惯会的"含糊应对"办法，即既不应允，也不驳回，敷衍过去而已。四月廿四日（5月18日），他致函潘鼎新谈与福禄诺交涉此事情形："法人日催照约办理第二款，中国将所驻北圻各防营调回边界。初以为桂军退谅山，滇军退馆司、保胜，均离边界不远，但扎原处即可相安。而法外部虑我军不尽调回，或有寻衅生事，该国现扎越南水陆各军即不便抽撤，昨令福酋来告：何日全调回本境，

① 《中法战争》(5)，第352页。
② 《中法战争》(4)，第150页。
③ 《中法战争》(5)，第405页。
④ 《中法战争》(4)，第173页。
⑤ 《中法战争》(4)，第161页。

该国即派兵前往高、原、谅山等处设防，届时若华军未回，当限以十二时后退出，否则难免攻击之事云云。鸿答以两国和局既定，只可委婉商办，不能逞强，俟我通知边境带兵大员酌办。惟谅山距粤界仅数十里，我军驻扎，何碍尔事，断不可冒失，致彼此误会。"[①] 据此看来，李鸿章是既未拒绝撤军，但也未答应限期撤军。正如他于五月初二日致函潘鼎新谈及将来应付巴德诺提出限期撤兵要求办法："新使巴德诺闰月杪来津，必先催询我军是否调回边界，当告以闻已调回，含糊答应而已。"[②] 很可能，李鸿章对待福禄诺采取的就是这种含糊应对的办法，既未明确答允，又未坚决拒绝。而福禄诺毕竟于外交是外行，因而没有文函为凭而仍以为李鸿章已应允，遂闹出这样误会。法人斯各特在所撰《一八八四年法国进军越南记》关于此事写道：中法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有错误，但是谁的错误和误解比较大些，或是比较不可宽恕些，是不清楚的。法人赔款之要求，是基于五月十七日的书面节略。根据该节略的法文原文，东京应"立刻"撤兵。在另一方面，中国宣称，这个词"立刻"是法国签约人福禄诺特别解释的题目。特别起草这个节略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五月十一日初步专约内某些条款。节略里头首先规定谅山和高平于六月五日撤兵，老开于七月一日撤兵。李鸿章总督对于这点认为十分地不可能，福禄诺同意此点，所以用铅笔删去这句话并签了字。然后又来了对于"立刻"一词的解释问题：按照福禄诺，这个词的意思是"从二十天到四十天"，而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思是三个月。假若这个词

①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4683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4685页。

的绝对意义可以这样曲解作为“二十天到四十天”的话，当然没有语言学的理由为什么不能包括三个月，而且李鸿章提出保证必定在这个期限内撤走军队。李又肯定地说，福禄诺曾接受此点。这位先生（福禄诺）一句话不说，那些为他辩护的法国人们狂妄地说，直隶总督删削该节略的字句及捏造签字，但这种说法无补于事[①]。这里所描述的交涉经过可能比较接近事实。据说，“有在津约钩抹三条为证……法国谓伊（指福禄诺）办理不善，众人讥责”[②]。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办理外交出现差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崇厚未经请旨即与沙俄签订《里瓦基亚条约》，宝海没得法国政府同意就擅自和李鸿章议定《李宝协议》，都是一些典型的例子，李鸿章和福禄诺所出的纰漏与之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如果不是碰上一个更加鲁莽冒失的杜森尼中校把事情搞得一塌胡涂，无从挽回的话，也许只是小事一桩，可以很容易加以弥补。

三　观音桥之战

光绪十年四月廿六日（5月20日），潘鼎新在贵县接收了徐延旭遣差交来的广西巡抚印信，廿七日（21日）驰抵龙州，五月初九日（6月2日）至谅山，正式到任视事。当时，边关百废待举，颇费踌躇：北宁溃军亟待整顿，偾事将弁等候查处；王德榜、方长华两客军因水土不服，病者大半；随潘鼎新调来广西的湘军则需拨出苏元春所部到思恩助剿莫梦弼之乱，仅到抚标亲兵一营和方友升所部四营。而前敌屯梅、谷松等处

① 《中法战争》(3)，第376～377页。

② 《中法战争》，(6)，第4页。

皆在谅山百数十里以外，其地偏僻荒凉，大军久驻，米粮早已无可采办，需从南宁购买，由龙州节节运送前往。其间道路遥远，舟车不通，只靠人力转输，难资接济。枪炮子药等笨重物品，运解尤觉维艰。以至出现了“有全队病而不举火，有一营仅食一粥”的严重情况。当潘鼎新手足错乱，匆匆布置之时，却发生了观音桥之战（又称“北黎事件”）。

原来，法国政府根据福禄诺关于中国同意限期撤军的报告，即指示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乐派出军队按期前去接收谅山等地。在经过派人对观音桥等几个将要加以占领的地方进行几次侦察后，米乐命令杜森尼中校率领一个 310 人的海军步兵营、一个携带六门 4 厘米山炮、有 90 名炮兵的山炮连、约三百人的两连东京土著步兵及骑兵、工兵、医疗人员共约八百人组成的一支部队前去执行这一任务。队伍出发时，米乐指示杜森尼要以和平方式进驻谅山，而不是进行一次军事行动，并明确规定，在队伍遭到意外阻截时，必须请示。如果仅仅是反击土匪强盗的骚扰，杜森尼可以自由行事，但当碰到中国军队时，杜森尼必须及时请示米乐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这个杜森尼是个冒失鲁莽的军人，他身材高而瘦，面多白色而易动怒，“毫无外交手腕，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被破坏的危险”①。一个法国作家这样评论他，因而不是执行这一任务的适当人选。

北宁战败后，徐延旭在二月廿九日（3 月 26 日）任命唐景崧为总理前敌营务处，所有前敌各营均归他节制调遣。三月初一日（27 日），唐景崧驻扎距谅山 150 里的观音桥，一面陆

① 《中法战争》(3)，第 507 页。

续点验溃退各营，一面以原隶左路的李定胜、李应章、李极光、黄云高等18营布防在长庆路至观音桥一带，诸营“皆残破，不满五千人”[①]。但仍克服种种困难，尽力布防，“拟专挑快枪截击隘口，虚设旗帜于深林曲涧间，以为疑兵而壮声势”[②]。很快就颇具规模，攻守渐固。

杜森尼率军从河内出发时，沿途遭到越南义民的骚扰截击，并将敌情及时禀报桂军。潘鼎新早就从李鸿章的密函中得知中法签约及法兵巡边的消息，但却一直未接到清政府关于进一步行动的指示，不知道清政府如何决策，因而和战不定，进退两难。当王德榜等将请示如何对待即将来犯的法军时，他曾复函称：“战亦违旨，退亦违旨。”[③] 无奈，他只得向清政府电报敌情，请示办法：“十九日探报，法兵来至屯梅、谷松以外，我军防守戒严，似此则与福使廿日派兵往巡之语相符。若未经说明往来巡边，一经见仗，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且驻军屯、谷，实在边界百数十里之外，显与调回边界议约相反，若一意与战，较易著手。似此进退两难，乞与总署明示以定办法。”[④] 其中，“胜亦从此多事”六字，后来成了人们垢病潘鼎新的口实。其实，这是潘鼎新针对清政府和战未定，欲撤还留的情况而言，因为如果清军打了胜仗，法军肯定会报复不休，战端重开，战事不止，就会影响清政府脱身法越战争的初衷，并非是潘鼎新希望中国军队不打胜仗，不必过于苛责。

据说，在《中法简明条款》签订后不久，越南政府就在法

① 《中法战争》(2)，第121页。
② 《中法战争》(2)，第123页。
③ 《中法战争》(2)，第545页。
④ 《中法战争》(5)，第380页。

使巴德诺的胁逼下，被迫将清政府颁给的印玺焚毁，这是明显违背中法和约有关决不伤碍中国体面条款的。因为福禄诺在与李鸿章谈判时，曾请示法国政府同意，将来巴德诺前赴越南任务之一，是将法越条约中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照议删除”[①]。现在却出尔反尔，违约而行，连福禄诺也感到是太过分了：“这一消息等于火上加油，因为这是与我们保证维护天朝在顺化的尊严相违背的，它给主战派煽动皇太后提供了借口。”清政府获悉这一消息后，加上主战派一直反对《中法简明条款》，于是对法态度起了变化，决定不再过分迁就退让。当潘鼎新的电报暴露了李鸿章隐瞒福禄诺曾提出限期撤军一事，清政府就以事先对此并不知情也未允准为由，一方面传旨申饬李鸿章，另方面根据李鸿章五月二十三日给总理衙门信中提出的办法：滇、桂边军“倘未奉旨移扎以前，彼或逼战，我军自不能不回击，在我亦不能任咎也”[②]。指示滇、桂两省的前敌将帅不准退守示弱，而要采取强硬态度，于廿五日（6月18日）有旨：“福酋前既与李鸿章言及拟派队巡查越境，何以该督并未告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殊属疏忽！滇、粤两军驻扎之地，断不能退守示弱。本日已电谕岑毓英、潘鼎新按兵不动；如彼族竟来扑犯，惟有与之接仗。李鸿章迅即照会法国，中法既定简明和约，倘法兵来犯我营，则衅自彼开，即不能保全和局，此意必须切实说明。”同日并有旨指示潘鼎新：“严饬各营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倘法兵竟来扑犯，则衅自彼开，惟有与之决战，力遏凶锋。”[③]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九，第49页。
② 《中法战争》(4)，第99页。
③ 《中法战争》(5)，第381页。

当时，由于情报不准确，潘鼎新以为法军势大，担心我军寡不敌众："法兵及黄邪六千余、越匪二万余分路攻谷松、屯梅。"因而一度信心动摇，力主照约撤军回国，于廿二日（6月15日）电告清政府：一经接仗，和局复败，朝廷得无责备否？桂军恐不可恃，已密疏请照章守界，以顾门户[①]。廿三日（16日）又电称："惟有敌来则战，衅非我开。惜兵将未齐，炮械不至，米粮缺乏，不知谅山能保否。"[②] 同日并有奏历数前敌困难，恳请准许桂军撤回，"就粮内地，敛兵关前"[③]。针对潘鼎新信心不足的情况，廿八日（21日），清政府有旨严责潘鼎新，要他竭力御敌："前令潘鼎新驰赴广西关外，本系备豫战守，该抚上次电信，亦有一意主战，较易著手之语。目前法人有意寻衅，何以该抚又有炮械不至，米粮缺乏等语？岂欲以此为卸责地步耶？衅自彼开，惟有决战，果能办理得手，朝廷有奖励无责备。著即密速筹划，汰弱留强，分别奇兵、正兵，俾有接应，即使稍有挫损，亦不至一溃难收。务当懔遵前旨，竭力防御，倘有疏虞，该抚不能当此重咎也。"[④] 清政府的坚决态度，一扫潘鼎新的动摇情绪，他马上着手布置，除将二十五日（18日）电旨"即行恭录转行各营，无不人思自奋"外，还因唐景崧称病告假，"观音桥各营既无统将，布置亦未周密。臣仓猝出关，随带员弁亦无多人，当委已革总兵万重暄前往联络，赶筑长墙，坚修营垒，调备粮药，谕以并力死守，不得再蹈北宁故辙。复由那阳调督带副将黄玉贤驰赴前敌，借

① 《中法战争》(5)，第382页。
② 《中法战争》(4)，第151页。
③ 《中法战争》(5)，第408页。
④ 《中法战争》(5)，第382页。

资统率。并派驻扎屯梅之提督王洪顺挑带小队数百人，帮同战守，谅山各营亦拨派勇夫负粮药以壮军心。臣与王德榜、方长华均在谅山，商筹调度”①。严阵以待，迎击法军。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中法两国军队在观音桥附近发生冲突，根据中法双方资料，冲突经过大概如下：

初一日早晨，杜森尼所部法军先头部队在渡河时曾遇到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法军把这些人驱逐后，桂军派来一个使者与法军交涉，宣称桂军的前锋离法军不远，早晨向法军打枪的不是桂军。又说他们知道《天津条约》，并且避免与法军发生敌对行为，但要求法军给予时间让他们撤移。到10时，又来了第二个使者，再次重申要法军给予桂军撤移时间。杜森尼回答说，按着《天津条约》，清军应该已经返回边界了，他得到了命令不允许他停止部队的前进，只要中国军队立即撤退，就不会发生任何麻烦，并表示希望会见清军司令官。

下午，清军使者引着万重暄来到法军军营附近，要求杜森尼出营商谈，但杜森尼却傲慢地派一个军官叫万重暄等人营相见。万重暄不愿意，只责备法军“款议既成，何得复生枝节”②，就离开了。杜森尼老羞成怒，狂妄叫嚣：我奉有开赴谅山的命令，我要前去，有了像我这么一支军队，我能够直捣北京，“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并将桂军使者“刃毙二人，枪毙一人，胡弁遇广东通事放回”③。接着，杜森尼命令法军向清军逼进，但不得先开枪。事后，米乐多次指责杜森尼此举的冒失：在遭遇清军时，杜森尼本应向米乐请示，却没有

① 《中法战争》(5)，第560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22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60页。

请示，如果米乐能及时接到报告，他将亲自赶到那里去，这样，一切都会妥善处理而不会发生冲突。

不过，枪声还是很快就响起来了，在事后的交涉中，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开枪，要承担起衅责任。其实，在当时那种剑拔弩张、群情汹涌的情况下，要想弄清楚是谁首先打响第一枪，无异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考虑到在此之前已经发生杜森尼残杀桂军使者的惨剧，显然法方是起衅的罪魁祸首。由于法军因为道路崎岖，随带辎重行军困难，在路过谅江时已将炮兵留下。而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两连东京土著步兵又首先溃逃，只剩下 400 余人的法军作战。在驻防观音桥的八营桂军约 3000 人的奋勇攻击下，很快就丢盔弃甲，败溃而去。第二天，双方再次交战，得到援兵的桂军派新正、新副、新左、奋勇副四营分路接战，军中左、军中右、右军中三营于扼守长墙之外，各派五成队分路围攻，左军左营及绥南各营各挑奋勇绕小路接杀。俟法军攻扑前进，枪炮对施，各勇即分路绕出，奋勇直前，又以大队冲杀。其后敌势不支，拼命奔溃。桂军亦于申刻收队，查点伤亡共 300 余人①。无名氏所撰《查探越南边务情形禀》详细地记载了冲突的经过：

闰五月初一日，万军门派胡差弁送文至法营诘问，……问其来意。法魁云："我往谅山、高平二省之路，粤兵堵住，若不退回关内，势迫开仗。"胡差弁责以大义，法兵即将其随从三人杀死，捶挞胡弁，遂回。幸左军黄玉贤等粤勇八营，先已准备，法兵大队赶到，先施枪炮三排，黄玉贤等出队于江岸抵御，法兵至夜败退。初二

① 《中法战争》(5)，第 424～425 页。

早，法兵汹涌复来。黄玉贤、韦和炳由屯梅各带一营守观音桥老营，王洪顺以其所部一营助之，其余六营分三路应敌。李应华一路从右边路先出，分哨登石山顶，直注法营。李定胜、李逢桢、李极光等三营同御大路。战至巳刻，黄云高、陈世华两营从左边小路包抄法营之后，法军拒战亦力，黄、陈两营前而复却者二次。李应华等四营闻黄、陈两营炮声如雷，亦极力猛攻。有四画官一名登时被李应华击毙，获其所乘八尺大高骡。黄、陈两营闻李应华四营枪紧，亦拼命冲杀，法阵自乱，法众脱帽拱手向后奔窜。我军乘势遂克法营，法兵退三十余里，至屯牙养息喙喘。此我军战于观音桥大获胜仗之情形也。事后查点，我军"阵亡者百数十人，伤者三百有余"。[①]
米乐则向法国政府报称：

西六月十七日，法兵向谅山前进，有拉杂人发枪，似非官兵。二十二日晚，即中历五月二十九日，在松江左边，亦有人发枪。西二十三日，即中历闰月初一日，法兵渡河，以枪击散其发枪之人。有中国前锋官来云：官兵离此不远，昨发枪者，系山中土人，我官军知天津已立约，不愿背约，但须等候六日，以候北京之示。巳刻，有华军官来，云是广西抚台所派之总统，云：五六日方可退兵，晨间之信，不知所写。法副将氐顺云：照津约华兵应早已撤回，今法兵陆续前往，华兵陆续退让，亦不可此时可与中国总统商量。总统云：下午带统领再来。未正，又有华官二员来，等候在谅山、北宁两省之交界，请法副将往

① 《中法战争》(3)，第73～74页。

商。法副将派都司格来登往请华员来商，华员亦允。奈既来又借端而回去，法副将遂派晨间送信之华弁往告华营云：迟一点钟将前攻。申正，法兵前进，令勿先开炮。及到窄路，有许多敌兵攻击，约有四千人，俱有远击之枪，从申正至二十四日即闰月初二日黎明寅初，法官死伤各一人，兵死者七人，伤者四十二人。及辰正，法前队受三边攻打。巳正，敌人欲抄截法兵郎格之后路，枪声甚密，法兵不能回打，法人不能不退。法军方欲运粮草，因敌枪甚密，扛夫俱逃走，是以兵官之粮食不能带回。未初，退过松江，驻扎于北黎。是日，法官死一人，伤三人，兵死十人，伤三十三人，不知下落者二人。[①]

总计两天作战，法军死伤失踪恰巧 100 人。九月初七日，清政府有旨奖恤参战出力将弁：除黄玉贤业已病故，另案请恤外，“万重暄著准其留营效力，余均照所请奖励。李应华并赏给固勇巴图鲁名号，李定胜并赏给锐勇巴图鲁名号，黄云高并赏给果勇巴图鲁名号”[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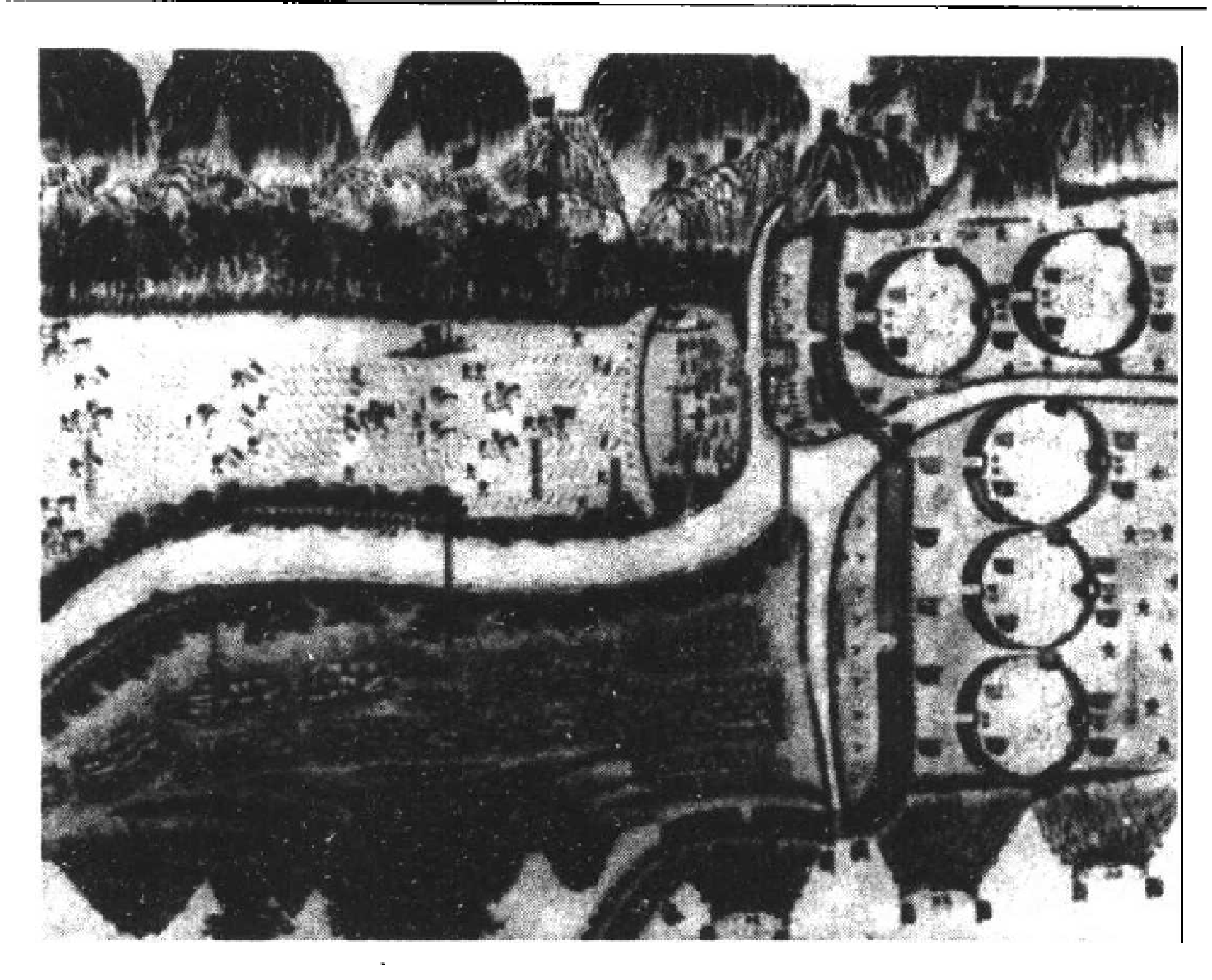
在中法议和以后，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一场后果严重的冲突呢？

表面看来，事情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促成的：假如法国政府不是委派鲁莽军人福禄诺，而是改派老练的职业外交官来和清政府谈判；假如法国政府在李福签约后不再节外生枝地提出限期撤军要求；假如福禄诺没有产生错觉而把未经清政府明确批准的限期撤军要求当作已经应允；假如米乐不是挑选杜森尼

---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 351～352 页。

② 《中法战争》(5)，第 561 页。



粤军八营扎观音桥，五营扼河岸，三营驻左山。

而是另一个适当的人选；假如杜森尼在遭遇桂军时，不是鲁莽冒进，而是采取“对中校来说最谨慎智慧的方法，是向在河内总司令将军请示，等候命令”①，那么，排除这一系列的偶然因素，观音桥之战也许就能避免了。但如果往深处想，则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偶然性里蕴含着深刻的必然性。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观音桥之战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必然性。

试想，像福禄诺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校级军官，在没有法国政府的授权之下，何以敢擅自插手过问与其本身职务并不相关的重大外交问题，并在致李鸿章的信函中，跋扈狂妄地教训和胁逼中国政府，提出诸如要中国撤换驻法公使、放弃与越南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撤回援越军队等蛮横要求，

① 《中法战争》(3)，第506～507页。

从而严重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在和约签订的前后，福禄诺出尔反尔，予取予夺，始则声称对约稿“不能改易一字”，继则在签字画押墨迹未干时提出重大修改，并不待清政府明确批准即视为答允，玩弄清廷君臣于股掌之上；而杜森尼这样一名仅率领400余名法兵的区区校级军官，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居然敢肆无忌惮地违背顶头上司有关遭遇清军必须请示的明确命令，以为仅恃这点兵力甚至可以直捣北京，因而凶残地杀害中方军使，强硬进逼桂军驻地，以至酿成流血冲突；联系到在李福谈判前茹费理曾指示巴德诺向中国索要赔款，冲突发生之后，又不顾中国一再退让，甚至主动撤军回国，却一意大兴风波，向中国索要赔款，甚至不宣而战地炮轰基隆和马尾，蓄意扩大事端。这一系列事实告诉我们：由于在北宁一役中法军轻易地击溃了长期布防的清军，因而从法国政府到军队中都从上而下地滋生了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即以为取得军事胜利就可以随意欺凌和讹诈弱小国家。在这方面，主张暂时不向中国索要赔款的米乐等人虽然比茹费理等较为冷静和收敛一些，但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情绪的影响下，从法国军政要员以至普通的海陆军官，都根本不懂得尊重中国政府和军队，不遵守起码的外交准则和国际交往道德，而是把中国政府和军队看成是软弱可欺，可以随便蹂躏践踏的对象，福禄诺的狂妄、杜森尼的鲁莽、茹费理的蛮横，都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下的产物。在这时，即使换了另外一些人来处理这些事情，也不会对中国更为友好。代替福禄诺前往和中国继续谈判的巴德诺不是明目张胆地违背不伤及中国体面的条款，而强迫越南政府交出并当众焚毁清政府颁给的玉玺吗？在中法交涉期间，不宣而战地炮

轰基隆和马尾的利士比、孤拔者流不是比杜森尼更冒险蛮横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要法方存心挑衅，就不管中国是如何忍让，他们总可以随时随地找到借口挑起冲突，重燃战火，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茹费理、福禄诺和杜森尼者流的表演，正是这种必然性的体现。

法国侵略者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清军在北宁一役吃了败仗，而急于脱身法越矛盾漩涡的清政府宁愿在屈辱的条件下与法议和，但是并不等于中国军民就甘心任由法人欺凌，完全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御寇保国的决心。反之，在他们内心蕴含着强烈的抵抗乃至复仇情绪。主战派奋起反对《李福条款》的浪潮使得李鸿章不敢呈报福禄诺的限期撤军要求；而力敌法军的观音桥守军，"皆黄桂兰旧部，淮人较多，盖为桂兰雪愤，加万重暄为之提倡，故竟能得力"[①]。一旦法军过分侵逼，就会遭到迎头痛击。

法军因胜而骄，以为可以为所欲为；清军因败而愤，渴望报仇雪恨。这两股相反的力量终于在观音桥相撞，就必然会爆发新的战争。

四　索赔与反索赔斗争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早在北宁战胜后，法国政府就有乘胜向中国索赔的念头，只不过是由于急于签订李福协议而暂时抑制住了。"观音桥事件"给了法国政府重提索赔的机会，于是，中法两国之间，开始一场索赔与反索赔的斗争。

清政府是在闰五月初五日（6 月 27 日）从张树声的来电

① 《中法战争》(5)，第 397 页。

中正式得知观音桥之战的消息，初六日（28 日），又得到更详细的报告。同日，署理法国驻华公使谢满禄即前来总理衙门交涉，代表法国政府就此事向清政府提出索赔要求，

谢云：近日接到广西新闻纸否？

答以：是何新闻？

谢云：接巴黎外部电信，法兵在谅山被中国兵四千人打劫。

答云：谅山是中国驻兵之地，与镇南关最近。近闻法兵前往谅山，扑我营盘，先行放炮，中兵不能不抵御。

谢云：天津所定之约，谅山应归法国。洋六月间，李中堂在津定约，有先交谅山之说，法国是以派兵前往。

答以：条约中并无此说。（遂将条约给看）又云：约中所云边界界务，现在未定，中国曾经行文令边防各军不准进步，不准向法兵先行动手。今闻法兵竟来开炮，我兵不能不动手。

谢云：按天津约，谅山已让给我国，外部以为北圻已无一个华兵。

答云：条约并无此说。

谢云：有续条约三条，曾否见过？

答云：李鸿章并未寄过此件，亦万不能有此续约；倘有此续约，李鸿章不能不奏，万无此理。

张荫桓云：天津定约时，我在座，亲见李鸿章与福总兵画押后，法兰亭宣读一遍，即是五条，并无另有三条续约。

……

舌战没有结果，谢满禄将早已准备的照会交给总理衙门。

照会称：

为知照藐视和约，本大臣不得不沥陈下情事：前于本年四月十七、五月十一日，北洋大臣与本国福总统，在津约定画押。领兵总统按定华兵应退之期，旋遣兵收取谅山，竟被四千华兵攻打。今奉本国特发之命，声明不服之意。此等明明许定之事，复又变更，且将攻打之责任在中国，无论明暗攻打，法国定欲暂存应得赔补之权，与在北圻所受凌辱之处，是以本大臣特恳贵王大臣等，立饬华兵迅速复回交界，及早退出北圻全境可也。[①]

初七日（29日），总理衙门复照谢满禄，对法国初六日的照会提出的无理要求，据理作出针锋相对的强硬答复：

贵国官兵既欲巡边，何以不待详细条款议定之后，又何以不先知照贵署大臣明告本衙门，以便转行中国滇、粤各防营知悉，而遽行前进攻打，核与简明条约第二款“不虞有滋扰之事”相背。似此情形，贵国官兵应任攻打之责，认赔补之费也。[②]

如果说谢满禄的勒索赔款要求是通过外交词令文质彬彬地提出来的话，那么，利士比的副官日格密向李鸿章提出的同样要求，就显得粗鲁和露骨多了。

初八日（30日），驻在烟台的利士比派遣其副官日格密赴天津会见李鸿章，以重开战争来威胁恫喝，勒索中国赔款，被李鸿章严词驳回。李鸿章将此事报告总理衙门称：

早晨十点钟，日格密云：利提督有要事奉达，特遣格

① 《中法战争》(5)，第393~394页。
② 《中法战争》(5)，第395~396页。

密来津面谈。

询云：利提督有何见教？

日于怀中取出洋字一纸云：此系利提督接到法国驻扎北圻陆路提督米乐之电报，内开（下略）今中国官兵在谅山南边相距两天路程之处攻击法军，显系背约。现据利提督看来，中国如能与法国以实在凭据，以后永远不背条约，并许法国以赔偿，则时机尚可转圜；否则，水师总统孤拔必率舟船前来中国侵扰。

答云：华军驻扎谅山，已逾十年，应否退扎，一俟详细条约议定，朝廷自有权衡。据两广来电，此次法兵先开枪炮，衅开自法，安得转以背约相责？至条约在所必遵，亦勿庸过虑。

日云：天津简明条约，系中堂画押，今弃而不用，是中堂花押不足凭了。我们外国人以中堂为中国宰相，权柄极大，故与订约，以昭凭信。今竟违背不遵，是中堂并非中国执政。试问今之执政大臣为谁？

答云：贵国公使在京当晓得了。凡替国家办事，总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俟巴公使到后，自可详妥议商。

日云：谅山既有此信，巴公使即不来了。此事中堂既无权柄办理，总须孤拔与北京执政面议。

询云：孤拔何时晋京？

日云：所谓面议者，系以兵戎相见。

笑云：孤拔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

日云：届时便见分晓。背约一事，在万国公法中情节极为重大，中国想未深知。

答云：中国并无背约，法国先自开衅。

日云：福禄诺临行时，曾经面请中堂，限明西历本年六月初五日将北圻官兵退回等语。今已过限一月，北圻尚有官兵，非背约而何？

答云：福禄诺临行虽有是语，我曾告以限期退兵，事同挟制，此事断做不到。我若以此语奏朝廷，必触朝廷之怒。滇、粤各处官军，亦非我所能节制。三个月后，详细条约议定，朝廷自有权衡，是我并未允许福禄诺限期退兵之说，何所谓背约乎？且此事，当时福禄诺面请，即经我面驳，故彼此皆未动用公文，尤无所谓约也，背于何有？

日云：原约第二款云：即行调回，即行二字乃即刻之意。今未调回，显系背约。为中国计，急宜将广西兵官惩办，以谢法人，再认兵费、赔费，方保无事。

答云：俟详细条约定议，彼此再行撤兵，亦不为迟；赔偿更无此理。

日云：中堂如此说法，格密即无须久留。

询云：孤拔几时来华？

日云：中国海疆处处震动，远近炮声不绝，即孤拔来华时也。格密明早回烟报命。

答云：回烟晤利提督代为道念，此事终望不致决裂。

日云：既经背约，和局终难保了。以上所陈，俱系实情，毫无假饰，惟望中国留意。

遂别去。①

闰五月初九日（7月1日），总税务司赫德闻知中法重新

① 《中法战争》(4)，第101～103页。

起衅的消息，便想插手此事。于是，他先到法使馆打听情形，然后到总理衙门，转达谢满禄的要求："若今日或明日，总署给我照会，说中国照约以法文为正，立即发电撤兵，我可以电报本国，或肯答应予我以解和此事之权，我与总署商议了事，不至再提赔偿的话。"[①] 谢满禄并将此意正式照会总理衙门。但遭到总理衙门驳回，"称中文不能不算"。谢满禄也不客气地复照称：他在初六日向中国提出的"拟请赔补之处，均奉本国之命，本署大臣所不能更改丝毫者也"[②]。

与此同时，在法国首都巴黎，自闰五月十二日（4日）至二十六日（18日），署理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也与茹费理展开艰难的交涉。闰五月十三日（5日），李凤苞电告总理衙门，茹费理邀请李凤苞的随员陈季同见面称："中国分党争权，背约之机已见。"故调兵船前往中国助巴德诺索赔。李凤苞前往与茹费理剖辩，茹费理不顾李凤苞关于"法国恝置谅山之事"的要求，坚持中国有错，表示"尚须另议赔补"[③]。十六日（8日），总理衙门复电李凤苞，根据清政府"应与争者，仍向外部力争，不可许者勿擅许"的指示称："查福总兵在津临行与李相面



赫德（1835－1911），英国使华的代表人物之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48年之久。

① 《中法战争》（5），第400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02～403页。
③ 《中法战争》（5），第403～404页。

说撤兵限期，李相未允，亦无往来文信为据。第二条并未载有撤兵日期。中国本拟照约勘地退扎，法以巡边为名，并未先来照会，遽行开炮，伤华军三百余人，亦应向法索偿。兹以保全和局之故，中国不提此款。"[①] 但茹费理仍于十九日（11 日）正式向李凤苞提出，要中国照约退兵及"赔留兵调船费二万五千万佛郎"[②]。通过这些交涉，李凤苞报告清政府：这是法国蓄意挑衅野心的暴露，"凤苞揣知法国已定计欲夺福州船政及台湾北境，是以此次就弭衅，颇不愿意，每思借端翻异"[③]。二十一日（13 日），谢满禄也照会中国政府："奉命向贵国索偿赔银至少二百五十兆夫郎"，并限期中国七日答复，否则法国"必当径行自取押款，并自取赔款"。总理衙门复照，强硬地答复：撤兵可以，赔款则不允，因为这是违背津约的。如法国敢这样做自取押款，"于约尤为相背，中国即当布告有约各国"，请求公评[④]。

这时，新任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本已于闰五月初九日来华，但却逗留上海，不肯赴京津会议。赫德遂去上海两次会晤巴德诺，寻找打破僵局的办法。闰五月二十四日（16 日），赫德将巴德诺的要求报知清政府：所有法国军需等费，俱必由中国赔偿。中国若不允照行，则古军门按照本国末议（即哀的昧敦）之文，占据中国某处地段为质，除于他处动兵外，俟将法军逐日加增各费，扫数交清，及中、法交涉事宜全行议妥，始将所占之地退还。兹续为论议，亦属无裨，中国只立订允与不

① 《中法战争》(5)，第 407 页。

② 《中法战争》(5)，第 411 页。

③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 197 页。

④ 《中法战争》(5)，第 413～414 页。

允而已[1]。法方为什么这样嚣张地利用"观音桥事件"这样细小的冲突来勒逼中国赔款呢，原来是福禄诺从中国返回法国时，曾向法国政府作了一个极端贬低中国国力的报告："中华帝国财政上已遭到极大危机，因急办无价值的军备上的开销，海关的存款已尽，商务已告停顿；中国银号在破产后都关了门；国营的大公司，开平的煤矿及招商局，均完全破产，政府不能弥补二百万银两的借款；全国各省的半数，均遭受水灾及饥馑摧残；南方发生武装的暴动，反对官吏特别征收税款的办法。"[2] 法国政府据此便以为中国已不堪一击，只须稍加压力就会投降，所以才借小隙兴大衅。

在法方步步进逼的情势下，据1884年7月16日的《申报》报道这时候清政府的动态称："总署大臣每日面叩机宜，为和为战，向未有一定权衡。据都中传述，谓圣意：如法仍照前订草约，情愿不索兵费，则可重订约章，或竟将谅山守卒先行撤退；如果坚要赔款，则我国惟有以兵戎相见。"[3] 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总理衙门复电赫德，除答应立刻撤军外，其他问题奏派两江总督前往上海与巴德诺会商。在此之前，法军不能开衅[4]。二十七日（19日），赫德电告总理衙门。法方强调"偿款，万不能免"[5]。清政府则一面照会各国申述事情始末，并宣称：中国"不能认此无名兵费"[6]。一面降旨命署两江总督曾国荃，著作为全权大臣，驰赴上海，与法国使

① 《中法战争》(5)，第417页。
② 《中法战争》(7)，第288页。
③ 《申报》影印本第25册，第91页。
④ 《中法战争》(5)，第418页。
⑤ 《中法战争》(5)，第421页。
⑥ 《中法战争》(5)，第425页。

臣办理详细条约事务。又先后加派会办南洋事务陈宝琛、驻法公使许景澄会办，苏松太道邵友濂、四川候补道刘麒祥随同办理。在军机处二十八日（20日）给曾国荃的电旨中，特别声明：在谈判时“所索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①。同日，总理衙门复李凤苞电信也强调：中国不会答应向法国赔偿，“如坚索恤费，只可各出恤款，彼此相抵”②。

而法方在得知清政府派曾国荃与巴德诺会谈的安排后，认为是中国示弱的表示，态度更加强硬。茹费理对李凤苞说：“今幸已派江督就巴议，并允必满法国之意。已饬巴先议偿，限六月初十议妥。”③ 巴德诺也称：“不先允偿，江督到沪不必相见。”④ 中国“除允偿一层，别无免却失和之法”⑤。六月初一日（22日），谢满禄照会总理衙门，申明法国以中国答应赔款为谈判条件。双方的立场相距很远，从而注定曾巴会谈不会有结果。

曾国荃于六月初四日（25日）到上海，初七日（28日）与巴德诺会谈，巴德诺提出三条要求：一、革刘（永福）爵职，拒不与联；二、索赔二百五十兆；三、交银地方、期限，口称速了，可减五十兆，“索费志甚坚”⑥。曾国荃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六月十三日（8月3日），曾国荃向清政府报告这几天与巴德诺谈判的详细经过称：

初七日巳刻与巴使在广肇公所会议十四刻之久，听其

① 《中法战争》(5)，第427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29页。
③ 《中法战争》(5)，第431页。
④ 《中法战争》(5)，第434页。
⑤ 《中法战争》(5)，第432页。
⑥ 《中法战争》(5)，第448页。

畅所欲言，谈毕，伊出节略一纸，立逼荃要允赔偿。荃答以事关重大，可传电请旨，不能遽说偿字，待细斟酌，明日再议。初八日（29日）酉刻在后宫复议。荃亦仿其式，遵译署历示辩论，摘叙节略，交巴使翻译微席叶述与巴听。巴即云：是决意不认赔，我当电报本国知之。荃答曰：尚可允商。彼竟怫然而去，不肯少留片刻。理合将巴件与荃之摘件抄呈钧览，伏求面奏，即请勋安。

照录清折。

（法方提出的条件）兹因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大清国大皇帝，以两国军兵前于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一日，在谅山左右构衅一役，致彼此均有不合之处，须将所有歧出之事调处，以修和好。是以现议另立专款，以便日后将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天津简明修［条］约各节之意，早日商订详细条约。所以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特派全权大臣，大清国大皇帝特派全权大臣，彼此将所奉全权文凭交阅，均系妥给［洽］，即会议酌定条约开列于左：

第一款，前法国派兵取守北圻谅山地方，中国官兵与之交战，启衅之故，中国朝廷实心悔怜。现经明议，自今以后，倘遇有损碍两国和好交情之人，中国置而不认，以昭信义而息谣惑。所有在安南地方敌拒法国者，或黑旗余党等匪，中国拒而不与联合，并将党首刘永福一切职爵全行革除。

第二款，谅山一事，令人多惑，致误会中国之意有劝该处人等与法国相拒为难，使法国不能平靖北圻，以致法国不得已将所驻北圻军兵全数留住不撤，以保太平而固通商，俾两国均沾利益。因此法国所费兵饷等款尤巨，议定

中国赔补法银二百五十兆夫郎克，以为给与在谅山被戮受伤各法兵之亲眷及赔补法国格外花费之银数。

第三款，以上所开偿款若干，应在欧洲交与法国。其全数银两，应分□期交清，其第一期在互换详细条约之后一日即交银□□□□，此后每年交银□□□□。此项银两由中国海关所入税款内交收。

以上各条，均以法文为正。两国御笔批准用宝之各文，议明在法国巴里京城至速互换，以昭信守。

（中方则驳称）

一、法未到越以前，越系中国所属。后来法将中国之属国据为己有，何能令中国赔费？

一、法兵未过河内以前，华兵早经驻扎北圻数处，法国备兵进攻，何能令中国赔费？

一、法兵行抵谅山时，中国兵仍在彼驻扎之缘故，实因待详细条约议妥，方能撤兵，是乃按照新约办理。虽有意外事出，究不能令中国赔费。

一、若说福总兵于四月二十二日见李相面订撤兵日期云云，然福总兵虽有订期撤兵之说，李相并未允准；即有订期之节略，又将其中所写日期当面勾去；节略虽留于李相处，而李相并未行文登复，且亦未将此层奏报有案，是福总兵虽与李中堂议及此事，实与不议同。中国不按此期撤兵，诚自然之理。虽有意外衅端，何能令中国赔费？

一、法国派兵前往谅山一带，若待详细条约议定以后，何至有交仗之事？乃必亟不可待，启此衅端，又何能归咎中国，迫令赔费？

一、简明条约既定，中国派李中堂会同四星使在津专

候，法国使臣一到，即议详约；后因法使不肯到津，又派江督会同陈、许两星使赴沪议订详约。是中国愿敦睦谊，不愿决裂，已有明证。何得不顾邦交，转令中国赔费？

一、法国侵占中华藩属，理应责问。何得以攻城得地之所费，转令中国偿费？①

第二次会议，曾国荃将答复交给巴德诺，巴阅后称："此是决计不认赔"，双方不欢而散②。

第三次会谈，已是初九日（30日），离初十日（31日）的最后期限已近，法方的条件有所削减，但坚索赔款。李鸿章于是日电报总理衙门："邵道本日午正电称：巴交节略草，刘一款可允削，期亦可展，索费彼不得不遵，决书数减则任我，且必有以报我，此李梅私语。友以开口太大难合拢。已电丹诘外部，费可减，必不可无。而督宪以未奉旨，并有无二字不敢决，再宕，恐误事，请示云云。"③ 曾国荃情急之下，向清政府提出："事愈急，拟允请恩抚恤数十万两。"④

第四次会谈，曾国荃告诉巴德诺，"抚恤名目请旨只能数十万两。巴问实数，则许五十。请益，拒之。巴云：电报法廷，直笑柄。临行不允之词甚决"⑤。

巴德诺则报告法国政府各日谈判情形称：

28日，早晨我和中国的全权代表们有一个长的会晤。他们自限于重申总理衙门的论点。在一个徒劳的讨论的三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121～122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50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〇，第27页。
④ 《中法战争》(5)，第451页。
⑤ 《中法战争》(5)，第455页。

个钟点里，我试从他们获取任何一种答复都落了空。我问他们二十次到底中国赞成不赞成赔款的原则，而不能从他们获得否定或肯定的答复。因此我递送给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案：谅山事件结果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费用，因此提出了二百五十兆佛郎，作为目的在赔偿法国开销的一种出资。全权代表们宣称：他们不敢把这样一个方案转到北京去，因此我要求他们今天晚上给我提出一个对立的方案。在同意之后，他们刚通知我，他们不可能拟出一些和我的建议相妥协的东西。29 日，全权代表们并没给我昨天他们答应向我提出的对立方案，而自限于递给我一张照会。照会意在证明我们不能向中国要求赔款，并重申总理衙门所有的辩论。我宣称：在这样一个不严肃的回答面前，我只有退席。我停止了会议。一个钟头以后，总督要求一个新的会面。我同意明天接见他，而以这次我要能够获得一个正式的建议为条件。30 日，今天早晨的会议，和以前一样是徒劳的。现在全权代表们答应今晚给我一个建议。他们装着相信我们将再延长七月十二日的最后通牒的期限。全权代表们全面地、坚持地宣称我们的赔款要求是非正义的，他们依妥协的精神，提议给我们五十万银两，约三兆半法郎，名义是救助谅山的死难者。他们又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数目的话，他们将建议皇帝用这意思颁发一道谕旨。我自然拒绝这个建议。我只告诉总督，要把这建议提交我的政府。[1]

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据 1884 年 7 月 27 日的《申报》

① 《中法战争》(7)，第 233～235 页。

报道，这时的清政府已决定不向法国的无耻勒索低头，即使因而重新开战也不畏惧：“京师访事人来信云，醇邸与左相力主战议。谓迩来内外臣工，风成泄沓，若不及时振作，不知伊于胡底。此次无论法人所索一时难于允从，即使取之裕如，亦不过如剜肉医疮，权济目前之急，诚何益哉！侯相并谓：胜固当战，败亦当战，目下一千万磅之说，断不可从。窥法人之意，何尝欲一出于战哉！惟骑虎之势成，难于反汗耳。且自古争战之世人才始出，当日无发逆之变，不佞亦将以广文老，尚何畏首畏尾，而不为之戮力疆埸乎！”[①] 清政府决策已定，所以得知曾国荃的答应给法国 50 万两偿费后，认为违背了中国既定原则，“实属不知大体”！著传旨申饬[②]。

看到中方态度坚决，法方也怕中国不肯就范，只得大幅度削减赔款数额。十一日（8 月 1 日），巴德诺的属下李梅私自来与曾国荃属下的张委员晤谈，“两日内恤款能得三百万之数，可以了局；数少不敢必，过期不敢必”[③]。但曾国荃已不敢擅自做主答应了。同日，李凤苞也报告清政府：茹费理愿意将赔款数目“减至五十兆”[④]。但清政府对这些要求的答复是：“切勿议款。”[⑤] 巴德诺看到再谈下去也难得便宜，遂于六月十三日照会曾国荃，宣布谈判决裂：“日后我大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⑥]

六月十五日（5 日），法舰袭击基隆，开始，法军误报战

① 《申报》影印本第 25 册，第 157 页。
② 《中法战争》(5)，第 456 页。
③ 《中法战争》(5)，第 458 页。
④ 《中法战争》(5)，第 459 页。
⑤ 《中法战争》(5)，第 460 页。
⑥ 《中法战争》(5)，第 461 页。

胜，巴德诺据此于十八日（8日）照会曾国荃称：“我法国现拟向贵国索赔不过银八十兆夫郎克，分十期交与本国收领，一年为一期，十年交清。”[①] 六月十九日（9日）午后两点，税务司贺璧理来到总理衙门，重申他在十七日（7日）提出的400万偿款，到了晚上11点，他又到总理衙门，将偿款增至1000万[②]。清政府的答复，是于二十日（10日）照会谢满禄及各国驻华使节，强烈抗议法国“一面会商，一面踞地索偿”的野蛮做法[③]，赔款当然更不用提了。很快，在闻知刘铭传收复基隆的喜信后，加上1884年8月10日《申报》报道的情况：“闻曾劼刚袭侯电致总署，力陈法国目下饷绌兵单，束手无策。议院会议时，拟集巨资，以图再举。国人以越南一役，费实不赀，现虽事已垂成，然欲筹善后事宜，需款尚不止以千百万计。倘再穷兵黩武，与中国交绥，恐财匮民穷，行将怨咨交并，故皆不肯醵资。曾侯又谆嘱云：法人如索偿兵费，断不可含糊答应。”清政府的态度因而也强硬起来，于六月二十四日(14日）电称：“此事中国理足，廷议佥谓难给津贴。”[④] 同日并照会各国驻华公使，揭露法国的讹诈勒索面目，其中强调指出真正违约的国家是法国。二十七日（17日），清政府接到李凤苞电报，知道法国“允筹经费三十八兆，令向中国取押，逼照津约”。明白开战在即，决定奋起反抗，“法使如此骄悍，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惟有一意主战”[⑤]。清政府态度的这些

① 《中法战争》(5)，第479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83～484页。
③ 《中法战争》(5)，第486页。
④ 《中法战争》(4)，第184页。
⑤ 《中法战争》(5)，第502～503页。

变化，使得法方也认为："中国人视基隆事件为我们的失败，据说，他们继续积极地备战，并有首先开战的意思。"[1] 二十九日（19日），谢满禄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索八十兆佛郎克，十年交清，限二日，如不允，即离京，孤拔尽力从事。"[2] 七月初一日（21日），清政府答复法方的最后通牒，重申拒绝向法国赔款的坚定立场。双方谈判完全失败，战争不可避免了。

初三日（23日），法军在马尾大败中国福建水师，初六日（26日），清政府颁旨，正式对法宣战。旨中历数法国侵略越南及我基隆、马江，以及撕毁李宝协议及李福协议，挑起衅端的罪行，部署反击侵略，"该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各路统兵大臣暨各该督抚，整军经武，备御有年。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刘永福虽抱忠怀，而越南昧于知人，未加拔擢。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收为我用。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凡我将士奋勇立功者，破格施恩，并特颁内帑奖赏；退缩贻误者，立即军前正法。朝廷于此事审慎权衡，总因动众兴师，难免震惊百姓，故不轻于一发。此次法人背约失信，众怒难平，不得已而用兵。各省团练众志成城，定能同仇敌忾，并著各该督抚督率战守，共建殊勋，同膺

---

① 《中法战争》(7)，第249页。
② 《中法战争》(5)，第187页。

懋赏"[1]。在当时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亚洲诸国中，敢于向西方强国宣战的，中国是头一个，所以，其行动极具魄力，是亚洲各国反帝斗争的创举。

在这场索赔与反索赔的斗争中，法国政府过高估计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低估计清政府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讹诈的精神与决心，结果碰了个大钉子。清政府顶住对方以开战相威胁的压力，坚决不向法国的无理勒索低头，从而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表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与外国侵略势力抗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五　第一次基隆之战

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刘铭传在基隆港登陆上岸。第二天，法舰"费勒斯"号尾随而至。据1884年8月12日《申报》报道，双方差点发生冲突：刘省三爵帅已于闰月下，乘"海晏"轮船行抵基隆矣。是处地方文武印委各员皆出迎迓，驻防兵勇亦整队出迎，陆中炮台及中国兵舰皆燃炮致敬。是时外国炮船之泊于口内者只法国某兵船而已，法管驾闻炮声隆隆，急出瞭望，瞥见兵勇蜂拥而前，不觉杯蛇市虎，自起猜疑，随即升旗，请中国各兵舰停止燃炮，并言如越一刻犹闻炮声，即当以炮相还等语。后经"海晏"轮船之舟师造舟求见，陈说其事，法人之疑始释[2]。敌情严重，刘铭传稍事休息，即动身视察基隆防务。

基隆位于台湾北部的顶端，由层层叠叠的高低山峦环绕着一个断崖型的港口组成。在当时人的著述中，对基隆地理形势

---

① 《中法战争》(5)，第518页。

② 《申报》第5册，第252页。

的描述都比较简略。如刘铭传奏报基隆形势，仅称："口门外狭，船坞天成，不虑风涛胶搁，仿佛燕台。"① 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奏折的状摹则稍为具体形象：查基隆一境，背山面洋，前展后高，其形如椅，中有民舍数百家。右曰八斗，距基隆五里许，煤局在焉。左曰仙洞，其后有山曰基隆岭，山不甚高，然得建瓴之势，故守淡水者，以此为扼要。又左则沪尾江，江之深者不过丈余，广者不过数丈，无险可恃，惟恃兵力。基隆口洋面，正对福州之五虎门，轮舟六时辰可达②。在基隆岭之外，还分层环绕着一些更高的山峦。在法国人卡诺的著作中，把这些山峦形象地称为"桌状地形"、"圆形剧场"、"齿状地形"等等。

在卡诺所著《法军侵台始末》一书中，对于基隆的地理形势有着较为细致详尽的描述：

> 基隆是周围若干公里内一片沿海小盆地的中心，位于借着一条小运河连络着淡水河与基隆河的端点。在基隆周围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连山，由这连山发源的溪川注入一个中心点，即海湾深处；连山的山峰高达二百公尺左右，山峰下面是一片初看似乎无法清理的乱杂的洼地、小山顶、深渊等等，这一切都长着茂密的植物。远处则又是一些高峰，它们被深深的豁壑与基隆附近的连山所隔开：东方是三貂角和八堵岭；南方是人迹未到的淡水河发源处的高山；西方是大屯等。向北方敞开着的基隆湾，成新月形地深深地嵌入陆地。地势起伏不平而又长满荆棘的社寮岛

① 《中法战争》(3)，第141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534页。

和桶盘屿，多少可以阻遏那些来自东北方而使海湾内的船舶动荡不安的巨浪。海湾可以容纳二十艘左右的船舶，湾底泥泞多石，且不甚深。至于商港本身，因被冲积的浅滩壅塞着，只有汲水量很浅的木船可以进入，港内有两个树木葱郁的岛屿。

有五个谷地和基隆市街相连接。第一谷地起于基隆西北三公里处，而止于西山山麓。第二、第三及第四谷地则在港底集结成一个共通的河口，由于这些谷地涨滩的结果，构成了一个泥质的三角洲，而基隆城市的一部分便建筑在这三角洲上。最后，朝着东方，在海湾的另一面，和西山相对，有着在北部海边地方出现而达到新炮台的最后一个谷地，即第五谷地。

基隆是一个约有一万人的大镇，局促于海湾和山岭之间，城里除了海关的两所高雅房屋以外，其余都是一些没有个性的木造、砖造或土筑的房屋而已。基隆附近也没有任何堪称为"道路"的道路，只有一些仄狭的小径，无论是机动的抑或人力的车辆在这带地方从未见识过，运输几乎全赖人的肩背驮运。在这种条件下开辟了三条与外界联络的道路，即从东面到八堵，从西面到马锁，从南面到淡水盆地。

基隆由于其附近的煤矿而显得重要，这些煤矿位置在基隆市街东面四公里，处于那些给基隆盆地在这方面划下界线的崇山峻岭中，巨大的桌形高地几乎全都含有煤炭，煤与地面几成水平；某些地方只要把植物层扒开便可发现煤炭。

在基隆、淡水地区，虎列拉是一种风土病。森林热亦

即和疟疾一样的畏寒的热病，也非常猖狂。这种热病的来源，主要是由于饮了被分解中的植物性物质所污染了的水的缘故。

基隆旧称鸡笼，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及煤矿遍布的缘故，所以很早就成为一个航运中心、商货集散地和煤炭产地。

据陈碧笙所著《台湾地方史》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官府即在鸡笼设卡，以收取航经台湾北部的商舶的水饷和引税，在1626年以前，已经有汉人到鸡笼收购硫磺。

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占据台北，他们在岛上建筑圣救主城，驻兵守卫。在西班牙人占据时期，原为荒秽之地的鸡笼地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基隆港的仙洞，即是西班牙人开采煤矿后留下的矿洞遗迹。西班牙人并仿照占据台南的荷兰殖民者，募民开垦鸡笼周围的荒地，以戈、甲等方式征收田赋。1634—1635年间，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极盛时期，“鸡笼成为华南与吕宋贸易的中继地，最盛时有满载货物的西班牙商船二十二艘同时入港”[①]。

1642年，荷兰殖民者驱逐了西班牙人，势力扩大到台北。他们在淡水、基隆筑垒，派兵戍守。大兴黄叔敬所撰《台湾使搓录》卷一记称，在淡水的圭柔山西下数里，有红毛小城，高二丈，围二十余丈；基隆港口有红毛石城，非圆非方，围五十余丈，高二丈。荷兰殖民者还将统治台南的制度移治台北。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初，从台南败撤的荷兰人曾一度逃匿鸡笼，以图东山再起，但被郑成功派部将黄安率军将他们驱逐出岛。

郑经统治时期，先遣右武卫林升率兵巡逻台北，坠毁西班

① 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第69～70页。

牙人所筑鸡笼城。后又虑“北鄙空虚”，命大将刘国轩率兵一旅驻守鸡笼。郑克塽时，命左武卫何祐为北路总督，智武镇李茂为副手，率兵以戍鸡笼。后人曾在基隆找到一门明崇祯三年的旧炮，可能就是那时的遗物。1674—1675年间，郑氏政权还把永春马跳涧起义军领袖吕华及降清的洪承畴、黄梧、杨明琅等人的亲族流放到鸡笼、淡水充军，并让移民到鸡笼地方垦殖。鸡笼的土番也开始被役使，“初，军戍鸡笼者，遇北风盛发，船不能往，则命土番转运，沿途供役”[①]。鸡笼的商业也得到保护和发展，附近的哆啰土番采到金沙，有时也会拿到鸡笼交易。郑氏政权为了与日本维持和扩大通商关系，还特别优待日本商人，“日人之居台者皆礼之，别以鸡笼为商埠，许其侨住。台湾所用之铜来自日本，德川幕府亦辄以宽永钱助饷，岁率数十万贯。此则郑氏通商之策也，其所以裨益于国计民生者甚大”[②]。

清康熙时收复台湾，继续有人开采鸡笼煤矿，至乾隆时始禁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居住淡水的鸡笼通事赖科聚众开垦鸡笼一带的荒地，至康熙末年，此地已成“欣然乐郊”、“乾嘉以还，居者渐聚，耕渔并耦，鸡狗相闻，由淡水而鸡笼，由鸡笼而噶玛兰，盖已大启土宇矣”[③]。随着鸡笼的日渐开发，它在台湾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康熙末年参预撰修《诸罗县志》的陈梦林著文指出：“鸡笼为全台北门之锁匙。”雍正六年，鸡笼被划归淡水同知管辖。

进入近代以后，鸡笼成了外国侵略者觊觎和垂涎的目标。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291页。
② 连横：《台湾通史》，第443页。
③ 连横：《台湾通史》，第89页。

早在1825年，就有英国鸦片贩子到鸡笼用鸦片交换樟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禁烟之役，英船辄至鸡笼，潜以阿片易脑”。英军两次袭击台湾，也选择基隆为目标。嗣后，鸡笼的煤矿又引起外人的注意。道光“二十八年，英国水师游击吴伦至基隆查勘煤层，归报其国”。1850年，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文翰致函两广总督徐广缙，企图购买或自运基隆地方所产的煤炭，被驳回。1854年，“美国水师提督彼里亦来勘，以煤层丰富，谋据此地建军港，以开美国贸易之途，而台人不知也”。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战胜的英、法、美、俄四国于185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里面就包括开辟台南、淡水为通商口岸的条款。1859年，台湾当局按约在道署所在地台南设立通商总局。1860年，由于英籍海关税务司的请求，增鸡笼和打狗两口，并各设通商分局，委派通商委员驻扎。1864年，由外人担任的福州税务司、淡水税务司曾先后请求准予开采鸡笼煤矿，均遭清政府的拒绝。

此后，出入基隆港的外国轮船渐多，都要补充燃煤，新开办的福州船政局等处，也需煤不少，这些情况，引起官府注意基隆煤矿的生产。1870年，闽浙总督派员踏勘了基隆的煤矿，发现在海港东边的八堵、暖暖、四脚亭、大水窟等处，都有人在开洞采煤，“于是召集山主及乡人士，妥订开采章程，立石为界，不许租与外人并私相典卖。各洞相距南北二十五里，东西五六里，闭者不得再开，以七十洞为限。而煤户须本地人，又有亲族庐墓者，互相环保，其曾为洋行办事者不许。煤工亦土著，家在五十里以内者方可用，每洞不得过二十人，煤户具保。所出之煤投行仲卖，官为督办，违者照罚”。又将煤分三

等以定在山之价，上等曰角煤，每担值钱二百文；次等曰中煤，价稍降；又次曰煤粉，价最贱，每担仅得五六十文。煤户在山不用纳税，但若运到市上出售，照例每担征税五厘，惟船政局采用者豁免[①]。到中法战前，“基隆出煤，其卖煤于海面各轮船，大约每年可销八万吨，其价计银十六万两，除去本银，不过可得六万两耳”[②]。

1875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称：鸡笼一区，“欲建县治，则其地不足，而通商以后，竟成都会，且煤务方兴，游民四集，海防已重，讼事尤繁。该处向未设官，亦非煤务微员所能镇压，若事事仰成艋舺，则军民共困，应该改噶玛兰通判为台北府分府通判，移驻基隆以治之”[③]。鸡笼遂改名基隆。

1875年，沈葆桢着手筹建官办的基隆煤矿，1877年出煤，“质坚亮且轻，能耐久烧，并少灰土，洵称好煤”。“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当”[④]。从此，基隆煤炭更加名闻遐迩。1877年，并在基隆设立煤务总局。1881年，岑毓英巡台，以台地孤悬海外，非舟莫渡，商诸船政大臣，派拨“琛航”、“永保”两轮船，循环往来，以速文报，并准商人搭货。其后又增派“伏波”、“万年青”两船，而基隆也成为这些轮船的停泊点之一，“载煤至上海者亦较多”[⑤]。刘铭传的赴台，也沾了轮船航运之光。

然而，可能是由于当时基隆地区气候恶劣的原故，“基隆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637页。
② 连横：《中法战争》(6)，第17页。
③ 连横：《台湾通史》，第89页。
④ 张国辉：《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企业》，第191页。
⑤ 《台湾通史》，第637页。

地方周围不过三十里，日日风雨，烟瘴毒厉、水土恶劣，不独异于内地，亦与全台各口不同。各将士致身行间，不畏死于兵戎，惟恐没于烟瘴"[①]。因而除土著人士外，只适合于商贾的短期逗留贸易，却不宜于军兵的长期驻守。所以，初时未闻在基隆驻兵，至沈葆桢时，因在基隆修筑炮台的原故，开始驻扎炮勇。岑毓英驻台防日，因基隆距日本最近，遂派随带黔勇驻扎基隆。岑毓英调任云贵，将防务交由前来接替的曹志忠楚勇三营。防法事起，曹志忠已得授福建福宁镇总兵，所部也增为六营。光绪十年四月，孙开华率所部渡台，任台北诸军总统，驻扎沪尾，也从所部三营中抽调一营到基隆助防。

刘铭传虽然在此之前并未实际办过海防，但因军事阅历丰富，加上在赋闲时可能阅读过有关西书，赴任前又从李鸿章、曾国荃等人那里接受了一些海防知识，所以稍作视察，他就敏锐地看出基隆防务的一些重大缺陷：

首先是炮垒的建筑地点选择不当，“其地旧有炮台，势居低下，且在口门以内，不能远击敌船”[②]。以致刘铭传叹曰：“此绝地，恶足恃！”[③]

其次是守军不适应近代战争。基隆守将曹志忠，据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称，是以前曾代刘铭传统领留陕铭军的曹克忠的昆弟。台湾史学家王尔敏先生在所著《淮军志·淮军统将表》中，称其原属鲍超所部霆军，同治之年，改隶铭军[④]。我怀疑其中“改隶铭军”一说可能有误。

① 《中法战争》(6)，第495页。
② 《中法战争》(3)，第141页。
③ 《中法战争》(3)，第151页。
④ 王尔敏：《淮军志》，第167页。

曹志忠因在台北抗法有功，后来历任福建、湖南等省实缺提督，但名不见经传，特别是早年经历已不可考。查陈昌撰《霆军纪略》，同治六年，霆军统领鲍超因尹隆河一役受诬病发开缺，所部三十四营遣散二十营。曹志忠虽因此役有功，“著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水陆提督总兵缺出，先行请旨简放，并赏给芬臣巴图鲁名号”，实际上却已列入遣散名单。为了安排曹志忠的出路，曾国荃两次有函提到，要他和唐仁廉等著名骁将，招募马队附入淮军作战。唐仁廉后来果然带领马队三营归入淮系，但曹志忠是否跟随前去？投入淮系后是否改隶铭军？却已不可考。但有迹象表明，曹志忠可能另谋出路，并没投入淮系，更未成为刘铭传的部下。根据有二：一是嗣后由于剿灭东西捻军，李鸿章论功行赏，奏保部下大小将弁百余员，内中却无曹志忠之名。如果曹志忠曾投入淮部，参预作战，不会一役未与，寸功未立。二是刘铭传赴台，于六月初四日（7月25日）奏折中提及曹志忠，称其“久著霆军，饱经战阵”，却不如像章高元那样称为“旧部”[①]，也是曹志忠从未改隶铭军的明证。

同治十三年，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李宗羲筹备江防，奏调霆军旧将宋国永、曹志忠等募练霆庆等营，驻防南京。光绪元年改扎扬州，光绪三年调防福建。光绪四年宋国永死，曹志忠改隶孙开华部下，仍为霆庆军统领。光绪八年，岑毓英调任云贵总督，所遗基隆防务由曹志忠率军接守。

霆军虽为湘军系统中著名剽悍之师，但统领鲍超却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将领，早年带兵打仗，只强调统将勇猛敢战，却不

① 《中法战争》(3)，第142页。

大讲求武器装备。曾奏称："臣向来教战，五成戈矛，以枪炮排列于前，即以戈矛相间而进。两军相薄，戈矛突出枪炮之前，直扑敌人，而敌人火器虽精，无所施其伎俩，此霆军之所长也。以我之所长攻彼之所短，不难百战百胜。"直至光绪六年北上乐亭驻扎防俄，目睹淮军使用新式洋枪洋炮的情况，又了解外国军事技术的发展，鲍超的观念才大改变，知道"一器也而成败系之，敢不先事讲求，以期有备无患"。改而用新式枪炮装备所部[①]。曹志忠早年隶属霆军，受到鲍超的影响，也不大讲求武器装备。刘铭传初会曹志忠，便发现他虽然"性情朴实，稳慎过人"，但对于器械操练却少讲求[②]。以致基隆驻军"军装器械全不能用，炮台营垒毫无布置"[③]，不适应即将来临的战争。

刘铭传在基隆停留四天后即赴沪尾视察防务，在此期间，他赶办了几件事：

1．晓谕守军提高警惕，戒备法舰。在"三月十八日事件"中，曹志忠屈服于福禄诺的压力，晓谕军兵嗣后不得对法舰肇生事端，其实就等于在法舰面前放松警惕，解除戒备，这就很容易给法舰以突袭的机会。刘铭传在基隆登岸不久，法国一级巡洋舰"费勒斯"号尾随而至。"询所由来，答以游巡海口"，刘铭传揣知其来意不善，"即密饬各军，严行戒备"[④]。为了侦察基隆守军的布防情况，"费勒斯"舰又重演"窝尔达"舰的故伎，要求准许派人上岸联系购煤，刘铭传当即予以断然拒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1021～1022页。
② 《中法战争》(3)，第142页。
③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二，第18页。
④ 《中法战争》(3)，第143页。

绝，“饬封煤窑，不准出售”[①]。清政府闻知此事后认为：刘铭传断绝接济，是制敌要策，所办甚是，著传旨嘉奖[②]。这样一来，也一扫基隆守军萎靡不振的松懈情绪，为日后战胜法军做好了思想准备。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刘铭传的胆识和魄力，是刘璈、曹志忠等人所远远不能相比的。

2. 增筑炮垒，加强基隆防务。刘铭传在详察基隆防务后，认为仅只一座炮台，力量太过单薄，决定在基隆外海口门扼要的岸鳞墩、社寮岛两山对峙之处，各筑炮台一座，别建护营一座，各安大炮三门至四门，以遏敌舰进口之路，也使基隆炮垒火力增强两倍。为此，他向曹志忠面授规模，拨支款项，于闰五月二十八日（7 月 20 日）即令督勇兴工，“惟一材一料类皆取购厦门，现无轮船过海，望洋束手，万难迅速告成”[③]。卡诺的《法军侵台始末》一书，称法军首次进犯基隆时，此三炮垒均已修峻参战。但据中方资料，可能只筑起框架，并未完工，卡诺大概是言过其实了。

3. 添调铭部，加强守军力量。基隆炮台火力单薄，守军曹志忠六营装备窳劣，素质低下，不足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战斗，于是刘铭传又想添调别处军队来加强基隆守军的力量，为此，他除了檄调原为铭部旧人的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所部两营外，还产生了调整全台防务的想法。六月初四日，刘铭传奏报清政府提出：“查全台防军共四十营，台北只存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所部三营、曹志忠所部六营而止；台南现无大患，多至三十一营，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须妥置。臣旧部章高元武

① 《中法战争》(4)，第 164 页。
② 《中法战争》(5)，第 434 页。
③ 《中法战争》(3)，第 141 页。

毅两营，现经饬调北来，作为护队，其余尚须审择将领，徐整戎规，固非一时所能猝办。”[①] 这样一来，就等于否定了刘璈的杰作——五路分防方案，这事可能成为二刘结怨的起因。后来，李鸿章电告刘盛休：“省初至台即奏劾刘璈，彼衔恨。”[②] 指的可能即是此事。

刘璈是在半个月后才与刘铭传相见的，“职道于六月初七日（28日）奉爵帅刘传谕令北行。遵即带同奉调淮军两营队伍，乘坐‘伏波’轮船前往晋谒，业已报明宪鉴在案。初八日（29日）午刻抵基，初九日晋郡禀谒爵师，面陈一切事宜”[③]。刘璈在台北一直逗留至十六日（8月6日），才由陆路星夜兼驰，于二十一日（11日）回到台南道署。

按照刘铭传的行事方式，他在与刘璈相晤期间不会不提出他关于改变全台防务的想法，但是，公私文件都没有记载此事。不过，在七月初二日（22日）刘璈呈给刘铭传的《禀示全台各属仍旧照章办理团练由》，却透露了一些迹象。

这份禀文首先引用刘铭传给他的一个命令：“台属团练之设，初意原为防务紧要，兵力不敷，现在统筹调度防军，逐一整顿，兵力足敷分布，无须团练，应即通行裁撤。”[④] 即是说在此之前，刘铭传曾与刘璈谈及“统筹调度防军”的事情，实际就是改变全台防务的想法。

刘璈如何看待刘铭传改变全台防务的想法，也没有直接的资料，但也是在这份禀帖里，显示了对抗的苗头。在刘铭传看

① 《中法战争》(3)，第142页。
② 《中法战争》(4)，第221页。
③ 刘璈：《巡台退思录》，第3册，第268页。
④ 刘璈：《巡台退思录》，第3册，第269～270页。

来，台南防务较松，因而可以裁撤团练。而刘璈的禀帖，却巧妙地借台湾府知府的禀文，暗示台南防备仍紧，裁撤团练要“俟防务稍松”后再办。这样，就顶住了刘铭传的命令不办，并为他日后公开强调台南防务紧要，拒绝将台南防军调援台北抗法的行为埋下伏笔。

刘铭传曾奏劾刘璈跋扈难制称：“及臣到台一年，台南军务如募勇造械、动用公款以及地方委差委缺，该道从未请示候批，辄行自办，凡所禀详，偶经批驳，彼辄置之。”这种情况，在二刘关于改变全台防务的第一次交锋已经显露端倪，刘璈的抗令不遵，发展下去，就变成刘璈的按兵不动，见死不救，而刘铭传也无法动用全台防军投入抗法战争。

刘铭传饬调北来的章高元武毅军两营，因士兵患病的缘故，实际到防只有 500 人，分别由章高元、苏得胜二将管带。章、苏二将都是安徽合肥人，刘铭传的老部下，因为屡建战功，均擢至记名提督，章高元还获赐奇车国巴图鲁名号，署理台湾镇总兵；苏得胜则获赐号励勇巴图鲁。他们的到来，使刘铭传有了自己熟悉的部队，指挥起来较为得心应手。刘铭传当饬章高元率兵靠近炮台驻扎，借资辅助。

刘铭传到达台湾后不久，中法谈判濒于破裂，法方图穷匕见，准备进行一次夺取质押品的战斗来吓唬清政府。六月初九日（7 月 30 日），茹费理宣称：“今虽云在沪开议，然初十日不允偿仍即动兵。”① 初十日（31 日），法国海军部长指示在华法舰司令孤拔：最后通牒的期限业已届满，立即派遣“拉加利桑呢亚”号和一艘炮艇前往占领基隆和煤矿，直到最后订出赔

① 《中法战争》(5)，第 451 页。

款额。但是，当孤拔遵命派船前往后，六月十三日（8 月 3 日），法国政府又向清政府表示："本国深欲两国仍敦辑睦，商议妥帖，当著巴使且听贵国再行熟商。"[1] 又"止孤（拔）按兵候议"，于停议三天后继续与中国谈判。但已无法阻止或召回派往基隆作战的法舰，基隆首战已不可避免了。

六月十二日（8 月 2 日），孤拔命令他的副手利士比前往攻打基隆，任务是破坏港湾的防务设施并占领市街，及被推测为在市街附近的煤矿。配备给他的舰艇和兵力是：旗舰装甲巡洋舰"拉加利桑呢亚"号，舰上装备有 24 厘米炮塔炮两门，24 厘米炮座炮 4 门，10 厘米炮 6 门，旋回炮 8 门，舰员 350 名，并载有原在"巴雅"号上的海军陆战队 120 名；炮舰"鲁汀"号，装备有 14 厘米炮座炮两门，10 厘米炮两门，旋回炮两门，舰员 78 名。以及早已在基隆港外，执行监视和封锁任务的一级巡洋舰"费勒斯"号，该舰装备有 14 厘米炮座炮 15 门，旋回炮 8 门，舰员 260 名，并有海军陆战队 80 名；三舰总计有大小炮 49 门，兵员约九百人，其中海军陆战队 200 人。

这是法国舰队第一次在我国东南沿海作战，其目标则是为了迫使中国屈服，讹诈和勒索到巨额赔款，而长期策划、处心积虑急欲取得的质押品基隆，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孤拔却只能派出这样微不足道的兵力前去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这说明：1. 法国跨海远征，兵力严重不足，难以承担法国政府所赋予的艰巨使命。此后，兵力不足的阴影一直缠扰着孤拔舰队，使它心劳日拙，疲于奔命，最后不得不以可耻的失败来结束它在台湾的冒险历程。2. 尽管由于要威胁同驻马尾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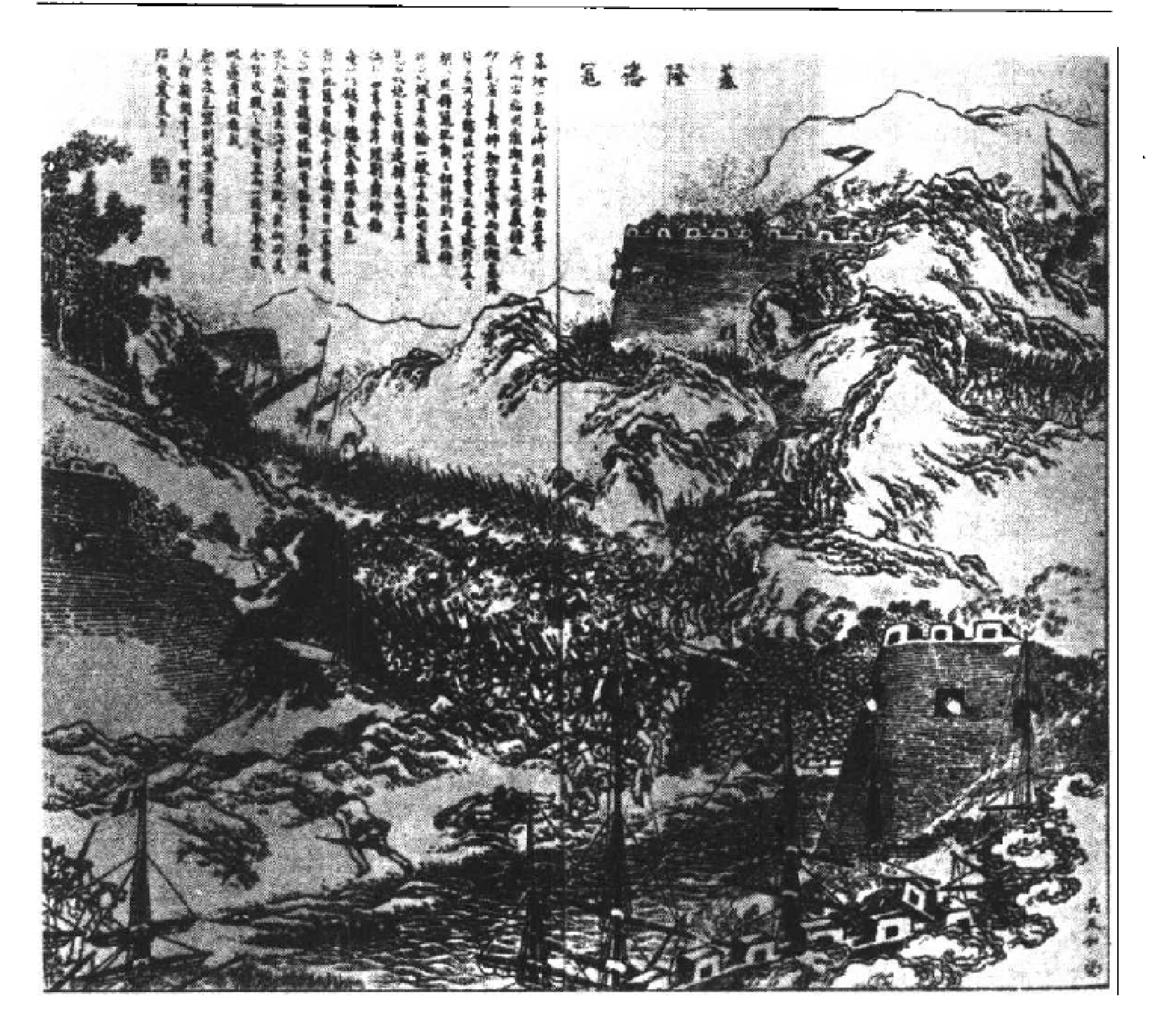
---

① 《中法战争》(5)，第 467 页。

国福建舰队的需要，孤拔确实很难抽出更多的兵力前去攻打基隆。然而，兵力不足，可以拒绝执行这个任务；既然要打，就应该认真对待，因此，派出这样少的兵力就去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毕竟说明孤拔思想上的严重轻敌冒进，这是在北圻战胜后法军上下弥漫的骄傲轻敌情绪在孤拔及其部属头脑中的反映，也是刘璈筹办台防不力给予敌人造成的错觉，从而导致孤拔犯下了严重的战略战术错误。

六月十三日，利士比乘坐“鲁汀”号从闽江驶达马祖，于当晚移驻旗舰“拉加利桑呢亚”号，两舰驶往基隆，于十四日（4日）午前与停泊在那里的“费勒斯”号会合。当天，利士比便“迅速调查当地情形及防御工事的地势”，他发现，与三月十八日“窝尔达”号侦察到的情况相比，基隆守军的防御已经大大加强：控制着海港入口的主炮台，是由三合土厚墙筑成，五个炮眼都用20厘米钢板作护板，每个炮眼安放一门17厘米的克虏伯大炮；在港口两旁还有三座小炮台，一座装有四门18厘米的滑膛炮，另外两座各装三门18厘米的滑膛炮。不过，利士比看出，清军的这些大炮均为落后的旧式炮，射程不远，穿透能力不强，因而舰身用15厘米钢板防护的法舰，只要距离敌垒1000米，就足以使它的铁甲获得有效的保护，不必担心受到敌炮的伤害。

根据这天侦察所得的情况，利士比将所率三舰作了如下的部署：“拉加利桑呢亚”号由于吃水深的缘故，不能驶入内港，胆大妄为的利士比就在港外选择一处仅距守军主炮台900米的地方停泊，战舰的右舷向着守军的主炮台，左舷向着装着四门炮的炮台，舰尾的炮火则可以侧击到一个装有三门炮的炮台。虽然该舰因此而落在守军炮火到达的范围，但利士比并不畏惧，



1884年8月，台湾军民在基隆抗击法国侵略军。

“他想凭着炮手们的技术和镇定来抵销其位置上的危险”。“费勒斯”号的位置稍远，处于守军主炮台的射程之外，它的左右舷炮火主要对付各装三门炮的两个小炮台。至于“鲁汀”号，则由于吃水浅的缘故，因而进入到港湾的深处，在那里，它将冒着守军炮火的威胁，向两岸的守军炮位进行侧面或背后的攻击。

上述部署完成后，利士比便派遣一名副官登岸，向守军发出最后通牒，宣称中法和议不成，限期已届，要求守军解除防御，交出炮台，否则，定于翌日攻击炮台。守军统领曹志忠、章高元、苏得胜等对此根本不作答复，只是一面指挥将士严行

戒备，一面派人飞报已赴沪尾布置防务的刘铭传。刘铭传闻报，知道基隆炮台本无可恃，当即飞驰基隆督战，走到半路，却听到炮声震地，原来战斗已经开始了。

六月十五日（5 日）的早上，因为昨天发出的最后通牒得不到答复，7 时 30 分，利士比向法舰发出准备战斗的命令。8 时整，法舰的大炮便向清军炮台发出猛烈而准确的炮火，而清军炮台也立即以同样猛烈的炮火还击。营官姜鸿胜奋战甚力，指挥射出的第一排炮就击中"拉加利桑呢亚"号的铁甲，有两发炮弹在击中木制垫板后爆炸，一颗炮弹甚至夹着啸声钻进一门 24 厘米大炮的炮膛，击坏了这门炮。"费勒斯"号也被从附近小炮台射出的几发炮弹击中帆缆索具，将几根绳索炸断。

"费勒斯"号用全部的炮火向守军炮垒射击，但它的 14 厘米炮的炮弹对于守军的炮垒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害。倒是"拉加利桑呢亚"号的 24 厘米大炮发挥了作用，以其准确的舷炮齐射，在第一排炮中就将守军的主炮台轰毁。此后，利士比命令放慢射击速度，以提高炮手的命中率，于是，法舰的炮弹不断地射进守军炮台的各个炮眼，轰毁炮膛和炮架，炸死炮手。最后，法舰的一发炮弹击中守军主炮台的弹药库，引起强烈的爆炸和大火。率领百余士兵潜伏在炮台墙外沟中的章高元、苏得胜看到藏身不住，只得命令姜鸿胜带领残存炮手撤退，但已伤亡弁勇 60 余人。至于其余三个小炮台在法舰的攻击下，很快也被轰毁，失去抵抗能力。守军退往港口高地，继续用步枪射击法舰。

利士比在指挥舰炮摧毁守军炮台的同时，命令"费勒斯"号上的 80 名海军陆战队登陆占领守军遗弃的阵地。在海军上尉雅格米埃的率领下，这支小部队很顺利就占领了近海的小炮

台，但当他们企图进占主炮台时，炮台里的猛烈大火和不断爆炸使他们退了出来。

接着，利士比又下令“拉加利桑呢亚”号上的120名海军陆战队，在舰长马丁中校的指挥下，登陆与“费勒斯”号的海军陆战队会合，在法舰炮火的支援下，准备攻占由撤出炮垒的守军驻守的港口高地。于是，3艘法舰集中火力向港口高地延伸射击，守军立足不住，再次后撤。其中，协防基隆的孙开华所部杨龙标营表现最差。“六月十五日基隆之战，杨龙标并未接仗，即退奔十余里”①。后来，杨龙标为此受到摘去顶戴及撤掉营官职务的惩处。法军海军陆战队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占领了港口高地，至此，基隆港全部落入法军手中，法军用火药将清军阵地全部炸毁破坏。天黑后，海军陆战队在新占领的阵地上宿营。

当天，以为大功告成的利士比派“鲁汀”号驶往上海，向巴德诺报告占领基隆港的喜讯：“我未折一兵一卒，却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内心甚为欣喜。我同时准备攻占基隆市街，我认为，几乎可以兵不血刃地达到目的。”而已赶到基隆的刘铭传则沮丧地电告清政府：“十五日，法船五只攻打基隆炮台，八点钟至十二点，炮台全行打碎。基隆山口曹镇营仍守，伤亡兵卒六十余人，煤矿已令自行轰毁。海外孤悬，信息不通，兵单器缺，茫无措手，先电飞报。”② 这里不知是什么原因，刘铭传将来进攻的3艘法舰写作5艘。

通过总结十五日实战的经验教训，刘铭传认识到，与法舰

---

① 《中法战争》(6)，第528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88页。

进行炮战，武器落后的守军只有挨打的份，他“愤法人之轻我也，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于是将撤下的章高元等各营饬移后山以避敌炮，只有曹志忠所部营垒“虽近海，中隔小山，仍令照常严守”。同时设法激励各军，坚筹血战，誓挫凶威。据说，刘铭传曾对章高元、邓长安等人施用了激将法：“公念敌炮瞰射莫能御，欲出奇计阴毁之，未知所使。乃召诸将议而激挑之。诸将至，公方食，语幕客曰：吾尝以数千人破粤捻十万之众，然皆吾将唐殿魁、刘盛藻力也。使是二人者在，吾岂忧法人哉！于是章高元、邓长安闻之，气咻眦尽裂，乃进曰：某等从公亦十余载矣，公今困绝域，某等义不生还，唯公命之！公释箸遽起，前握两人手曰：好男儿，勉立功名，唐、刘不得专美于前矣！乃各授以计。”[①] 因为在十五日的夜间下起了倾盆大雨，法军海军陆战队在新占领的阵地上无法休息。到十六日（6日）早上，天色才转晴。上午，利士比忙于指挥海军陆战队布置临时营地和修建防御阵地。直至下午 2 时，利士比才准备执行他的任务的第二部分：占领基隆市街及其附近的煤矿。于是，雅格米埃上尉率领手下的 80 名士兵首先出发，前去侦察一个俯临基隆市街、四面设防的兵营。但他们一走上大路，就进入曹志忠所部阵地的火力范围内，曹志忠一面布置士兵严守阵地，一面亲自督同副将王三星等率领 200 名士兵迎敌。“费勒斯”号的海军陆战队寡不敌众，经过短暂的枪战，丢下一具尸首后就仓皇后撤。马丁中校见势不妙，赶忙率领手下的 120 名士兵迎前援救。这时，刘铭传命令章高元、苏得胜率百余人从东边，邓长安率亲军 60 余人从西边夹

① 《中法战争》(3)，第 151 页。

攻过来，曹志忠见有援兵到来，士气益壮。由于刘铭传已将所带后门精枪配发给各营，并督促将弁认真操练，所以在作战时，“我军所持后膛枪皆能命中”，给法军造成很大的威胁。陷入三面夹攻的法军发现自己无力抵挡，如不及时撤退，将会被清军包围消灭，马丁中校立即指挥撤退。利士比也发现情况不对，命令舰炮支援海军陆战队。就这样，在法舰舰炮的掩护下，海军陆战队花了一个半小时，才走完1200米的道路，溃不成军的法兵沿途丢弃枪枝弹药，还有两面国旗，狼狈地登上守候在岸边的小艇，驶回各自的军舰上。清军“夺获洋枪数十杆，帐房十余架，并获其二纛，斩首一级”[①]。法军承认死亡2人，受伤11人[②]。“若不是中国军队的射击技术低劣，我军损失当更为严重。”利士比事后报告称。

当天，心灰意懒的利士比派“费勒斯”号驶回马祖，向孤拔报告战败的噩耗。刘铭传则兴高采烈地向清政府报告收复基隆港的喜讯：“即日十一点钟，法人上岸四百余人，携炮四尊来攻曹营，经派曹镇、章高元等带队旁抄，生擒法人一名，死伤不下百余，抢来坐旗一面，乘势破其山头炮台，得炮四尊，帐房数十架，洋衣帽甚多。”[③] 虽然其中的歼敌数字夸大过甚，但胜利的喜悦仍溢于言表。

当基隆首战的硝烟散尽之后，极度失望而又不肯甘心的利士比，还演出了以下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十六日，基隆税务司帮办英人鲍琅荣受利士比委托，致函刘铭传，“法乐提督意甚殷勤，欲邀臣赴彼船面商事件”。由于清政府早在闰五月二十

① 《中法战争》(3)，第144页。
② 《中法战争》(3)，第545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81页。

七日（7月19日）命两江总督曾国荃赴上海与巴德诺谈判时，在电报中就提醒曾国荃：在谈判过程中，“切勿登彼船只，受其挟制”[①]。刘铭传遂认为“体制有关，未便前往。惟彼族既以礼来，当约该税务司于十八日巳刻在基隆相晤，询问该酋所商何事？”到了十八日（8日），鲍琅荣来见刘铭传，“谓法提请传上船”。刘铭传当即答复：并未奉旨与法交涉，体制所关，未便前往，如有话请其酋上岸来说。鲍琅荣又与利士比联络，“旋函称，法提闻传不到彼船，心甚忧戚。并称彼非欲与中国交敌，乃欲踞基隆为索费地，并请将基隆市廛如常”。但利士比始终不敢上岸。十九日（9日），利士比又邀沪尾税务司法来格到法舰，请他向刘铭传转达：中法两国未失和，欲请来商，只当未开仗，彼此候信。又称：初意攻炮台便可驻守，不料十六之失基隆，不能占踞，请传函致津沪，速议和。对于利士比的这些要求，刘铭传答称：偿和非所知，应由全权做主。拒绝为利士比传话[②]。清政府闻知此事后，有旨称赞刘铭传的做法：“刘铭传不登法船，具有识力，嗣后如有此等诡计，切勿为其所绐。钦此。”[③] 利士比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企图玩弄外交阴谋仍不得逞。

捷报传到京城后，清政府十分高兴，于七月初二日（22日）下旨奖赏前敌后勤有功员弁：刘铭传调度有方，深堪嘉尚，著交部从优议叙；尤为出力之记名提督、福建福宁镇总兵曹志忠，著赏穿黄马褂；提督章高元、苏得胜，均著遇有海疆总兵缺出，即行简放，章高元并赏换年昌阿巴图鲁名号，苏得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89页。

② 参看《中法战争》(5)，第529页；《中法战争》(4)，第146页。

③ 《中法战争》(5)，第504页。

胜并赏换西林巴图鲁名号；副将王三星著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给额腾依巴图鲁名号；已革游击邓长安著开复原官。参预后路转运的基隆通判梁纯夫著赏换花翎，县丞游学诗著以知县补用，补用盐大使钱寿益著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补用，游击孙安邦著以参将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已革道员裕庚著准其留营效力。慈禧太后也由内帑节省项下发去银 3000 两，赏给尤为出力兵勇[①]。清政府的这种及时奖赏，对于鼓舞台北抗法军民、特别是基隆守军的士气，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作战经过和双方的伤亡人数来看，第一次基隆保卫战无疑是一场规模很小的战斗，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军队首战告捷，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基隆首战告捷，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挫败来犯法军，对于因为援越清军的连连失败，面对咄咄逼人的法国索赔而苦苦撑拒的清政府，无疑是一剂及时有力的强心针，增强了它的抗法信心和决心。

当中法因观音桥事件而重开衅端后，六月初七日，法使巴德诺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向中国提出索取巨额偿款的要求。但由于清政府坚决不认赔费，经过一些局外中间人的从旁周旋折中，法方的态度是渐趋和缓了。待到误闻法军攻占基隆的讹言后，巴德诺的态度陡然变得强硬起来，未经请示法国政府，即自做主张通过赫德向清政府提出："前议四百万恤款，中国不允，现在情形不同，改恤款为边界经费，加至一千万两，如中国立刻允准，仍分十年清还，每年一百万两，仍可了结，基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 162～163 页。

隆亦即退回中国，法不占据。如不肯允，定要轰夺船厂并福州省，再驶船北来索款。到那时候，台湾地方即归法国，是不退还了。”[①] 在无理攻打中国的通商口岸，造成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后，仍要中国赔给巨额偿费，这是法国侵略者的强盗逻辑。

开始，清政府也为基隆失守的讹言所震慑，对于法国的无耻讹诈与勒索，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抗议：“兹竟一面照请会商，一面攫取基隆，中外无此办法。”[②] 但是，除了吁请各国出面调停外，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参预交涉的李鸿章甚至悲叹：“事已至此，奈何?”他希望清政府能够对法妥协，酌允赔款，以解救台湾的危局，为此，他致电总理衙门：“乞属赫问巴，四百万可了之说，能再减若干，作何名目，妥酌电示。”[③] 可见，假如基隆首战是中国战败的话，后果会是相当严重的。

但是，在闻知刘铭传打败法军，收复基隆港的喜讯后，清政府的态度由软弱变得强硬起来，于六月二十四（14日）电称：“此事中国理足，廷议佥谓难给津贴。”[④] 六月二十七日（17日），清政府得悉法国索偿不得，恼羞成怒，法国政府“允筹经费三十八兆，令向中国取押，逼照津约”的消息，知道开战在即，决定奋起抵抗：“法使似此骄悍，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⑤]，“惟有一意主战”[⑥]。连李鸿章也似乎忘记了北宁战

① 《中法战争》(5)，第484～485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86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80页。
④ 《中法战争》(4)，第184页。
⑤ 《中法战争》(5)，第502页。
⑥ 《中法战争》(5)，第503页。

败的惨痛教训，却从基隆首战告捷中得出新的结论："法国在陆地不像在海上那样容易取胜。"[①] 清政府态度的这些变化，使得法方也认为："中国人视基隆事件为我们的失败，据说，他们继续积极地备战，并有首先开战的意思。"[②] 七月初一日（21 日），清政府拒绝答复法方的最后通牒，双方关系破裂。初三日（22 日），孤拔舰队袭击马尾，中国的福建舰队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被毁。七月初六日（26 日），清政府正式下旨对法公开宣战。从这短短二十天的局势变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隆首战告捷对于鼓励清政府的决心抗法起着重要的作用。

相反，基隆首战的失利，对于法方却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

首先是打击了法军的骄悍气焰，挫其士气。

光绪十年二月，法军以死 26 人、伤 25 人的轻微代价，就几乎不经过认真的作战即已占领了由二三万援越桂军布防近两年的北宁城，接着，法军乘胜追击，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又占领了北圻另外两个重镇太原和兴化。这种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轻易胜利，使法国侵略军自上而下地滋生了严重的轻敌情绪。法国政府因观音桥事件的小隙而向中国讹诈和勒索巨额赔款，勒索不成又单方面诉之军事行动；孤拔只派出 200 人的海军陆战队，就想占领基隆，其中，骄傲轻敌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法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抵抗决心和力量，这正如六月二十八日（18 日）驻法公使李

① 《中法战争》(7)，第 261 页。
② 《中法战争》(7)，第 249 页。

风苞报称的那样："法谓我万不敢战，四千人（约一个旅的兵力）可扰七省。故议员准恫喝，虽我布告仍玩视。"①

基隆首战的失利，却像当头棒喝，大杀法军的骄悍气焰，严重挫伤其士气。首当其冲的是极力鼓吹夺占基隆，而在实战中却一败涂地的利士比。据说，在败挫后，利士比对法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大感失望，曾经叹道："水手永不到地上作战。"② 这种低落情绪，不能不影响到他日后指挥攻打沪尾仍以失败而结束，再往后看，在整个侵台战争中，利士比都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战绩可言，显然有着基隆首战失利阴影的消极作用在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曾在越南顺利地攻占顺安炮台，威胁越都顺化，逼迫越南政府彻底投降；并力克山西，打败纵横北圻十余年的刘永福黑旗军，一时风头甚健的孤拔，本来也是极其骄傲轻敌的，以致以为凭他所指挥的几十艘舰艇和600海军陆战队，就可以随意攻打和夺据中国的吴淞、福州、烟台或旅顺。现在，受到基隆首战失利的影响，虽然轻敌之心并未全消，但也变得缩手缩脚，较为谨慎起来。在不久以后进行的马江之战中，孤拔在指挥法舰消灭福建船队以后，却突然取消原定由海军陆战队登陆占据福州造船厂的作战计划。罗亚尔的《中法海战》描绘当时孤拔的思想活动说："登陆战队，自从清扫以后，即预备上陆去。他们要保护那些即去轰炸造船厂并将它毁坏的水雷艇。但到最后一刻，提督改变了主张……他可使用的登陆水兵只不过六百人，而中国方面则有数千步兵，或者

① 《中法战争》(4)，第186页。

② 《中法战争》(3)，第573页。

如人所传说，他们已在船厂埋藏了地雷，登陆一事，实在过于冒险，他抛弃了这个计划。"[①] 接着，在马江之战取得辉煌战绩后，孤拔没能执行法国政府的命令，立即乘胜二次进攻基隆，而是借口兵力不足，要求从越南拨给 2000 援兵来加强登陆作战的兵力。在拖延了 40 余天，一再反对二次攻打基隆均被驳回的情况下，孤拔才勉强挥师进攻。卡诺指出孤拔其实有着一定的畏难情绪："法国政府和孤拔提督意见的歧异，颇值吾人注意。这种歧异显然表露出提督是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在基隆采取军事行动的，因为他确信我们会在那边遭遇到各种无穷的困难。"[②] 结合孤拔在以后指挥台北作战的种种处置不当，进取不力的情况来看，基隆首战失利的消极影响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基隆首战的失利，也使法国政府梦寐以求并大吹大擂的夺占基隆作为质押品的侵略计划，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境。卡诺在书中描述了法国政府在首战失利后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法国政府原希望对于基隆的炮击会使中国让步，反之，这次袭击并没有收到任何实际的效果。法国政府计划变成徒劳无益之举，8 月 1 日的最后通牒似乎可以解决的问题还停留在原来的地位。反之，法国政府在基隆方面更多了一层困难，因为它不能放弃基隆的占领而不承认它的失败。在第一次败北之后便将这据点完全放弃，会被人看作是一种犹豫的征象或是一种无力的告白，而这事非极力避免不可[③]。结果，法国政府为了维持颜面和报仇雪耻，一再拒绝孤拔提出放弃攻取基隆，改而进攻

① 《中法战争》(3)，第 557 页。
②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第 7～10 页。
③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第 7～10 页。

其他目标的请求，顽固坚持攻取基隆的计划，致使原来可以在中国东南沿海发挥极大破坏作用的孤拔舰队长期困守基隆，无所作为，从而最终使它企图讹诈和勒索中国巨额赔款的计划完全失效。

从上述这些意义来看，我们应当承认，战斗规模很小的基隆首战在中法战争史和台湾抗法战争史上占有着一定的地位。它的胜利，是台湾军民和全国军民取得抗法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六　马江之战

在洋务运动中，曾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于1865年聘用法国人日意格等，在闽江海口江畔的马尾地方办起了中国的第一所船政局和福建水师。有此渊源，直至中法战前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法国对福建特别是马尾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中国其他地方的了解。因此，当中法重新起衅后，法国提出“据地为质”的方针时，福州（实际指的可能是马尾）就被作为首选目标提了出来。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李福协议草签后，清政府加强各处海防时，就派主战最力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前往会办福建海疆防务。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张佩纶到达福建。在与地方各官见面后，勤劳王事的张佩纶马上赶赴马尾视察防务，并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二十八日，将军亲往长门，张星使移住马尾洋楼，劾参闽安协蔡康业，以张诚代之，马尾一切水师惟张诚号令是听”[①]。

张佩纶这样重视马尾的防御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天下滨

---

① 《申报》第25册，第551页。

海诸省，独福州海口奇险天生”。福州将军穆图善曾奏称：窃查闽港自口外至省垣二百余里，层峦叠嶂，暗礁跑沙，有山皆石，天险著名。省城平衍滨河，东流数十里为林浦，北高山，南旷野，以水涉沙跑为一结束。下即马尾，水深宽十余里，名马尾湖。北岸船厂，后山小，三面环水，无险可扼。下流转入员山汛，旧炮台一，东南北高山峡流十余里，最为险要。员山寨、田螺湾、闽安镇、南岸、北岸、过屿六炮台列峙水边。过此，北为屯头村，南为梅花港，通外洋，水宽沙现。再下，北岸馆头街，水深阔，地平衍。又下流，北长门、南金牌对峙，宽不及里，为入港第一要口，各设炮台。口前紧连水中，浮两小陂如龟，名南北龟[①]。刘子明、丛培在《中法马江战役军事部署初探》一文中称：从海口到马尾有30公里航程，其中，长门是由海入江的第一要隘，航道水深礁少，大型舰船可直达马尾。长门、金牌两山相峙，中流一束，江面宽仅380余米，总扼芭蕉、五虎、连江三个入口，实为江海之锁钥，福州之门户。闽安是由海入江的第二要隘、闽江之咽喉。南北两航道至此复合为一，地势险要，两山夹束绵亘十余里，水道较窄，最窄处不及百丈，南岸沿江无路，修有设炮六门的暗炮台和设炮八门的明炮台。北岸虽能行人但崎岖，有设炮七门的铁炮台，田螺湾炮台仅有旧式杂炮数门。马尾据闽江口之上游，闽江与乌龙江汇合之处，江面宽阔，罗星塔与海关间宽两里半，水深流缓，为兵商轮船极稳之锚地，是福建水师的基地[②]。马尾船政局也设在这里，大略可分为三部分，即厂区，内设锤铁厂、

① 《中法战争》(5)，第612页。

② 福建社科院历史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1～52页。

拉铁厂等11个厂；学校，内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以及住宅区。到开战前，已造成各式轮船24艘，开工而未完成的轮船一艘，近三万吨[1]。

时任船政大臣的广东大埔人何如璋，字子峨。1868年中进士，1876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驻日公使，1880年回国后任詹事府少詹事，1883年改任船政大臣。在战争中，他负有指挥水师、保卫船厂的责任。但他是个书生，并无军事阅历和经验，而且权限不大，难以担负与法国水师对敌的重任。而在战事爆发前夕，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张佩纶赶来帮助指挥。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他是同治年间的进士，1875年授侍读，1883年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并在总理衙门行走。他是当时被称为"清流派"的一班谏官的主将，曾经奏劾不少大员要吏，因而也滋长了一种睥睨天下的傲气，使他在潜意识中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曾纪泽轻视法国军事力量和海军言论的影响。他在对待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持强硬态度，多次上奏主战，特别是主张出动中国海军与法国海军作战。他在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2月26日）上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时，就把法国称为"收合余烬之法"，意为在普法战争惨败后未能完全恢复国力，因而法国侵越海军舰队也就不会很强大，"法以水师名天下，其在西贡，则海舨仅与我威远诸船相埒，而内河江艭十余艘，亦仅与我根钵诸船埒，其遣越南战舰可以驶行富良江中，则亦江艭之属。……故法之水师仅仅如此。我若以水师大船坐镇珠崖，而以快船水雷船出入其神投海口，与

① 本节内容在观点和资料引用等方面，曾广泛参考俞政先生所著《何如璋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就不一一注明了，特此注明。

越之民团相联络，以遥为两陆军声援，则法不敢以全力注越都”。有不把法国侵越海军放在眼里的意思[①]；同年四月初十日（5月26日），他与陈宝琛联衔上奏《存越固边宜筹远略折》称：中国只要从超勇、扬威两舰中移缓就急，酌调一艘，并得力师船数艘分布粤洋，“虽未必能出洋搏战，而琼崖驻有兵轮，则有可捣西贡，可巡神投、多渔各海口之具”[②]。六月二十日（8月3日），张佩纶上奏《统筹法越全局折》，就用轻蔑的口吻称：法之兵船在越海不过十余艘，中国只要“征津之冲船、闽之轮船驻琼崖以拟其后，可以牵制西贡，可以直捣富春，可以尾截神投之辎重”。从而断言法军舰队在中法对峙中将会失利[③]。一年后，张佩纶在光绪九年五月十七日（6月21日）上奏《边情已亟宜早定宸谋折》时，几乎逐字逐句地又把这些说词重复了一遍[④]。光绪十年四月初八日（5月2日），他又奏称：“中国兵轮分之见少，合之尚多。若择敌所必经之地，以大队师船扼扎其间，运重不过帆船耳。我屯险伺便，专为截资粮，防奸宄计，即难击其惰归，或可阻其深入。”[⑤] 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严重轻敌情绪。

但是，随着援越桂军在北宁的战败，事后，朝廷追究北宁战败的责任，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军机处被全体撤换。而举荐徐延旭最力的张佩纶则自知罪孽深重，难逃公论，只好准备接受言官的弹劾和朝廷的重责。他曾多次致函李鸿章称：“误荐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80~85页。
② 《中法战争》(5)，第106页。
③ 《中法战争》(4)，第345页。
④ 《中法战争》(5)，第163页。
⑤ 《中法战争》(4)，第350页。

晓山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①] "徐、唐均已逮问，此时自劾转涉畏祸沽名，不如一听他人指摘。失言、失人，咎当以一人承之。"[②] "此间自徐、唐逮问后，言者纷纷。可庄之介弟旭庄，偏诣其相识之人，力诋鄙人。"[③] 弹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至无颜在朝廷再呆下去，有"求去"之心[④]。

但是，由于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统治阶层对张佩纶颇有好感，所以，尽管人言汹汹，弹章不断，张佩纶却不但没受惩处，反而被命出任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从后来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张佩纶的这个新差使相当于是中央政府派到地方的钦差大臣，地位几乎与总督平行，可见，他实际上是被破格重用了。清政府就是在关键时刻，以这个异乎寻常的行动，宣布了对张佩纶的信任，并让他远离京都是非之地，实际上就是示意朝臣不要追究他误荐徐延旭的责任。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让他出任会办福建海防，其实是慈禧太后对他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张佩纶曾不无得意地致函李鸿章称："恭（亲王）、李（鸿藻）黜，徐、唐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绵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并点明是慈禧太后对他的特别眷顾："丹老来述慈圣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恩。"[⑤] 所谓"内隙可弭"，指的是平息言官对他的弹劾。这件事，后来却被一些人

① 《中法战争》(4)，第370页。
② 《中法战争》(4)，第371页。
③ 《中法战争》(4)，第372页。
④ 《中法战争》(4)，第371～372页。
⑤ 《中法战争》(4)，第373页。

渲染成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如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称：“盖光绪初年之四谏，及清流，议论风生，封事劘切，久为西朝所不满。……陈弢庵以内阁学士，拜会办南洋军务之命，亦宫中强委以兵事，欲入以罪，会陈丁艰归，其后卒以荐徐延旭、唐炯案降五级。张绳庵则最不幸，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识者谓微中法一役，绳庵亦不能独免，推西后积憾清流之心，说盖可信。”[①] 黄浚的这种看法，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学者。我们的一些论者没有窥透这其中的奥妙，却作出相反的解释，认为是慈禧太后要“瓦解清流”的阴谋，其实离事实何其太远！

张佩纶在赴任福建之始，曾致函李鸿藻称赴任福建的想法：“抵闽三日，略得大凡，炮台苦卑，船局苦敝，枪炮苦杂，子药苦少，而十羊九牧，朝令暮更，尤其锢弊。就福建论，既有将军会办矣，就台湾论，又有省三督办矣，鄙人来此，岂非赘疣？初意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覆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所见颇决。”[②] 正是因为带着这种失意情绪，所以他有一种不顾一切也要将功补过的趋向。当他拒绝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要他撤出与法对峙的军舰的命令时，就有人讥讽他“好奇尚气，好胜沽名”，并非毫无根据[③]。天生傲气而又急于表现，就成了他在指挥马江之战中犯下战术错误的思想基础。

马尾船政局濒临马江，日常只不定期地驻有兼任福建水师营务处的“扬武”舰及“福星”、“福胜”两舰，其余各船则分

---

①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第 57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374～375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385 页。

驻台湾、厦门等地及出援广东、浙江等省。在张佩纶离京赴任之始，曾上奏《拟将闽局轮船抽调聚操》一折，得旨：闽局所造轮船分防各省沿海，难以聚操，“张佩纶到闽后，先就留防本省之轮切实考校，认真操练，以立始基”①。所以，他有权调动和指挥福建水师的舰船。他于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到达福建，当即巡视各处海防，然后回到省城福州。然而，这时，中法很快就因观音桥之战起衅，形势已不容张佩纶“从容筹度”了。当法国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索偿巨额赔款的要求后，法舰陆续进入马江，以防中国不肯就范时，即占据马尾，实行“占地为质”的阴谋。面对法国咄咄逼人的侵略势头，张佩纶曾与闽浙督抚商讨应付办法。《申报》称：“闰五月二十一日（13日），法船进口两支。二十七日（19日），又进口两支，有请照万国公法，进口兵船不得逾两艘，停泊不得逾两礼拜，违法即行驱逐出口。不肯出口者，立即开仗，未蒙允许。六月中旬，法又进大船二、水雷二。各营闻基隆信，以法人起衅，请以开仗，不许。末旬，又进两艘。”据欧阳昱《见闻琐录》，当7月13日法舰要求进口时，闽浙总督何璟曾举行会议，参加讨论的福建大员共四位：“制军（何璟）会议，张幼帅（张佩纶）居首座，将军（穆图善）、中丞（张兆栋）以下概在列。”在这个会议上，张佩纶主张阻止法舰进口，但何璟等查阅历次寄谕，发现早在四个月前，福建督抚曾就类似事情电询过李鸿章：“设有法国兵船进口，应否阻止，抑分别多寡，如何措置为妥？”李鸿章答复：“各国兵船应听照常出入。惟法船进口，若只一二只，尚未明言失和，似难阻止；若

① 《中法战争》(5)，第385页。

进口过多，似应派员询其来意，劝令速去，宜避嫌疑，免致民情惊惶。”在随后清政府给李鸿章、何璟的电旨中，两次指示：“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皇。”法舰进入闽口的前十天，清政府在7月2日的电旨中，还命令沿海将军督抚：“彼若不动，我亦不发。”由此可见，允许法舰进口，是清政府早在战前已确定的方针，也是此前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国防的束缚，不能归咎于哪一个具体的人①。

张佩纶于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得到李鸿章传来的一个消息，即法军可能于二十八日进攻船政局，遂冒雨带兵连夜赶到马尾，与船政大臣何如璋一道指挥抗法事宜。陆上防御包括修筑炮台、举办团练、招募陆军、埋设地雷、储藏粮食等。六月二十日（8月10日），张佩纶报告陆上防务称：该处原有陆兵两营、水师一营，“并饬闽安协副将杨廷辉招募两营，补用副将杨美胜、记名提督沈茂胜、补用道刘倬云各募一营，分扎马江及南台”。期间，不知是不是这样一件事引起张佩纶的误会。他在二十九日（7月21日）函告黄再同：“二十七午，忽得合肥电：谓领事林椿言，二十八日哀的美敦书期满，即日攻马尾，属让船局作质；鸿章不敢许，谨闻各语。佩纶恐播之同人，省城必沸，即日冒雨率亲兵先济。未明，舟至马尾，福靖军选锋亦至，属其多张旗帜疑敌。侵晓，孤拔在舟中望见吾旌，遣人来问中国何故开衅？佩纶军未至时，先密令水师游击张成以师船与敌夹泊，备其猝发撞击同碎。孤拔恶之，舟中誓曰，谁先动即谁为戎首。故两日来敌以多船围张成舟，而张成屹然。至是，佩纶遣成答孤拔：中国堂堂正正，不行诡

① 俞政：《何如璋传》。

道，贵提督无疑惧。孤拔亦云，中国有礼，吾亦当退两船，是夜潮小，船不能退。我军宜言伏洋地雷某山，洋水雷某港。孤拔令各船施放电光灯，照彻数里，防我劫船，而鄙人劳倦，鼻息鸣矣。惜中旨戒先发，吾军亦疲，若是夜一战，彼舟不能驶行，必可小胜也。次日微明，法两艘退至壶江之马祖山，昨日又一艘退至闽安，省城及马尾人心稍定。"[①] 言下似有法军胆怯的意思。又致函安圃侄谈此事："敌本虚声，今亦中止。今退去两艘。吓我不动，去吓老穆矣。"[②] 又致函李鸿藻："法人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二十八夜战定可胜[③]。轻敌之意溢于言外。六月十四日（8月4日）向清政府奏报防务时，他还提到这事。

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使张佩纶头脑中存在的轻视法国海军的战略思想，变成了集中华舰与法舰对峙的战术思想。六月初一日（7月22日），张佩纶有电给总理衙门称："彼（指法舰）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④] 将一般适用于陆战的军队数目多少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的规律，搬到海战上来。而何如璋是船政大臣，福建水师舰船的调动正在他的职权范围，所以在闰五月下旬就调集了"扬武"、"福星"、"福胜"、"建胜"四舰，"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⑤]。接着，张佩纶和何如璋还多次致电清政府，要求及时调拨南北洋和广东水师的舰

① 《中法战争》(4)，第378～379页。
② 《中法战争》(4)，第380页。
③ 《中法战争》(4)，第382页。
④ 《中法战争》(5)，第433页。
⑤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123页。

船前来马尾助战，朝廷纳奏，向南北洋下达了旨令。但南北洋大臣则比张佩纶更有军事头脑，认为海战以军舰的强弱分胜负，而不以舰船多少分高下，当时中国舰船远较法舰弱小，以弱舰敌强舰，无异以卵击石，因而都拒绝派船援闽。六月初六日（27日），总理衙门奏报清政府："法兵船现已深入福州，张佩纶等迭请南北洋浙粤酌派兵轮策援，以为牵缀之计。而南洋电复，以兵轮不敷守口，实难分拨；北洋电复，以现有兵轮较法人铁甲大船相去远甚，尾蹑无济，且津门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浙省亦以船少尚难自顾电复；均系实在情形，惟粤省拨去两船。"[①] 为此，张佩纶以及会办南洋的陈宝琛还和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冲突；只是张佩纶通过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等的特殊关系，调回了福建水师原来调给广东的"飞云"和"济安"两舰，张佩纶在致安圃侄函中称："香涛以两船及五营来援。"[②] 何如璋则调到出差在外的"振威"和"伏波"两舰，以及一些旧式师船。

还在闰五月底，张佩纶有信给陈宝琛谈其对法舰的看法："佩纶所以促南北师船来此者，敌入内港，若水陆夹击，截其后路，实可一胜，欲以破其恫喝之计，而和议亦可得体。"[③] 又致函黄再同称："法船越险深入，本犯行军之忌；其意以和济战，即以战挟和，计太狡毒。佩纶建议，法船在中国者仅二十余艘，若南北师船联络一气，视敌所向而尾缀之，即吾船不敌法船，而与炮台陆军相依附，是我三而当彼一，主客劳逸之

① 《中法战争》（5），第443页。
② 《中法战争》（4），第382页。
③ 《中法战争》（4），第383页。

势相较，则彼气沮而吾之理可伸。”[①] 他六月十四日奏报清政府：法三船在口外，内船仅多于我两艘，全队登陆，则我水军牵之；以半登岸，则我以二千人敌其数百人，彼未必遂胜。深入数百里，我处处可以截后，而连日潮汐小信，敌船可出入者不过一二时，皆犯军家之忌，此又微臣所以欲战之故也。为此，张佩纶得到清政府的称赞："览奏具见勇敢，布置亦合机宜。”[②] 六月十八日致安圃侄信称："以马尾地势、法人军谋而论，战必先水。现在法船仅九艘，我船足与相当……但敌不骤增多船，水战未必能败。”[③] 六月二十日电告张之洞："论闽口现在敌情，先发可胜。”[④]

在当时的海战中有一个规律，在一般的情况下，弱舰应该避免与强舰对敌。早在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月4日）复议曾纪泽的建议时，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指出中国水师并非法国海军的对手："法人水师最精，如中国沿海兵轮未必足以示武，不过聊备一著。”[⑤] 而李鸿章更清醒地看到中法海军力量的巨大差距，曾多次奏称：中国"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⑥]。南北洋水师统领可能多少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肯将他们手中的舰船派来送死。光绪十年六月十五日，李鸿章曾电寄总理衙门："鸿等前在烟台，曾上法铁舰看操，其船坚炮巨，实非南北各船所能敌。今法两铁甲驻闽港口以堵外援，我船铁板厚仅五分，易被轰沉；即曰尾缀勿

① 《中法战争》(4)，第379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124～125页。
③ 《中法战争》(4)，第384页。
④ 《中法战争》(4)，第403页。
⑤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67页。
⑥ 《中法战争》(5)，第198页。

战，若开衅彼必在海面寻战，倘挫失，徒自损威，于事何济?"[1]

而张佩纶、何如璋不懂海战规律，把陆战和木帆船作战的一些作战方式如“靠近击撞并碎”等，放到新式炮舰的作战上来，何如璋甚至自以为是地写信给他的弟弟：认为福建水师“力足制敌”[2]。在这些糊涂想法的指导下，他们千辛万苦地将散在各处的弱舰调集，送到法方强舰的炮口下当靶子，无异是将羊肉送进虎口，怎么不闯祸呢！至开战前，总共调集了11艘舰船与法舰对峙。它们是木质兵轮“扬武”（1560吨）、“福星”（515吨）、“伏波”（1258吨）、“振威”（572吨）、“飞云”（1258吨）、“济安”（1258吨）、“艺新”（245吨），木质商轮“永保”（1358吨）、“琛航”（1358吨），“建胜”（250吨），“福胜”（250吨），总吨位约一万吨，装备大小各种炮50尊。“所有这些船只都是木制，未装铁甲，外表美观，但质地脆弱。船身借一些不透水的壁板，多少得以免于沉没。”加上船上没有机关炮，也没有机关枪，因此，对法方的威胁不大。至于另外九只武装的师船，每只装有七至八尊旧式平滑大炮，载有60～70兵员；另外两只很大的帆船，至少载有兵120～150人；七艘汽艇及三四只使桨小艇，都在船前头装有水雷发射器；其他又有很多装上爆炸物的火攻船[3]，在法舰看来，不过是一些炮靶罢了。张、何还为各船添配弁勇火夫。六月二十日奏报清政府称：“各轮船添配升火炮勇水手等项：‘扬武’八十名，‘济安’、‘飞云’各五十名，‘福星’十五名，‘永保’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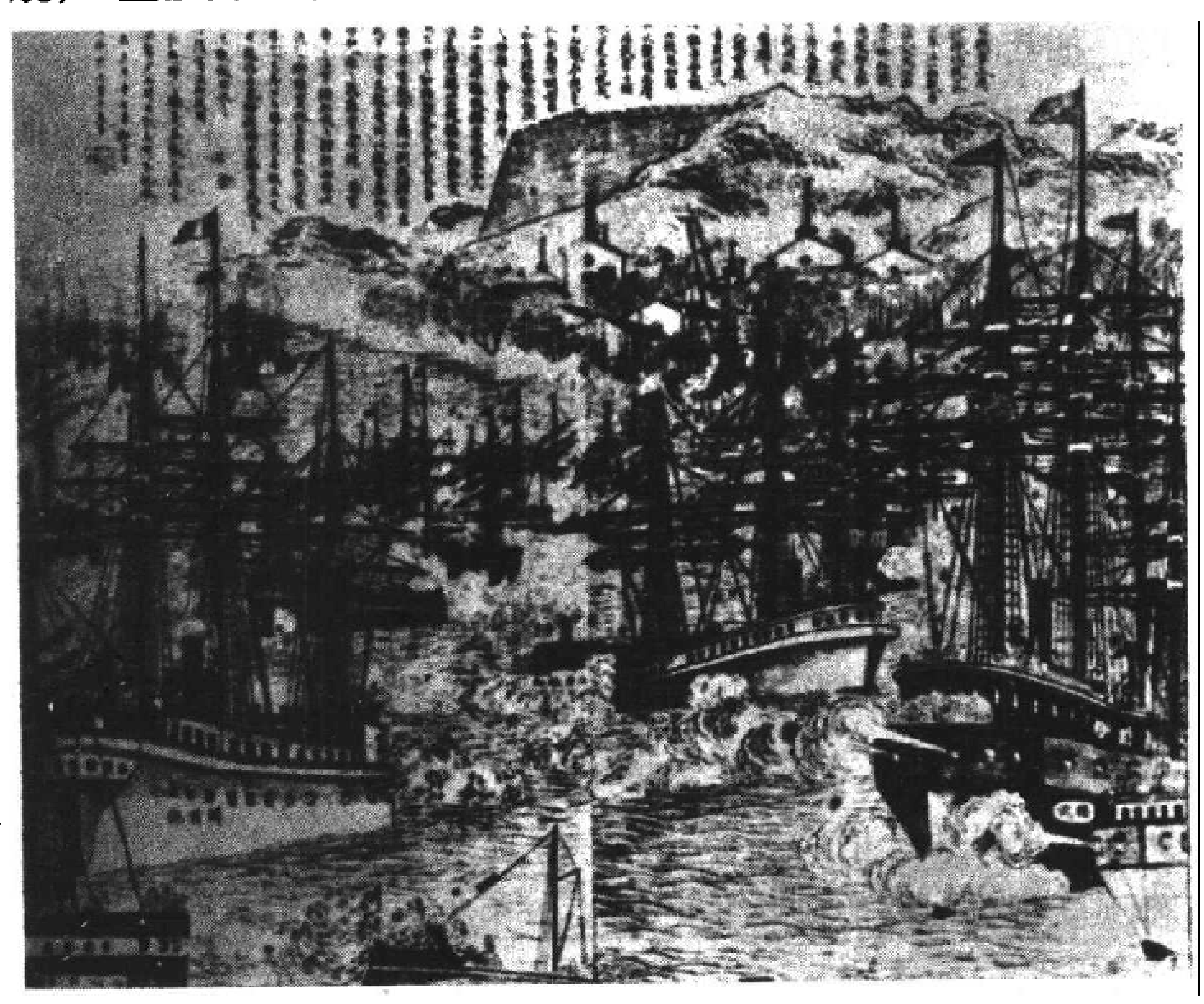
① 《中法战争》(4)，第177页。

② 俞政：《何如璋传》。

③ 《中法战争》(3)，第546页。

十名，'伏波'三十名，'福胜'、'建胜'各十二名，平海中营一号师船添勇十名，平海左右营师船八号添勇一百六十名，就近在尚干乡饬在籍二等侍卫林培基选募水师弁勇火夫共三百四十一员名；署督标水营参将傅德柯招募水勇哨弁火夫一百五十员名；候补水师游击募水师弁勇七十九员名。"①

与中国舰船对敌的法舰也是11艘，其中"凯旋"号为装甲战列舰，"野猫"号为铁甲炮舰，"德斯丹"号、"杜居土路因"号、"费勒斯"号为一级巡洋舰，"窝尔达"号为轻巡洋舰，"益士弼"号、"蝮蛇"号为炮舰，"南台"号为运输舰，还



1884年8月，法舰在马尾港对中国水师发动突然袭击。

① 《中法战争》(5)，第499页。

有 45 号和 46 号鱼雷艇以及四只小汽艇。这些舰船总排水量将近 15000 吨，除“南台”号和两艘鱼雷艇不计外，其他八舰的总炮数为 72 门，其中，24 厘米重炮六门，19 厘米大炮约 5 门，14 厘米大炮约 47 门，各舰艇还配备了每分钟可发射 60 发子弹的机关炮及机关枪。和中国舰船火力相比，占了绝对优势。

随着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法方的索赔要求，局势越来越紧张。六月初十日（7 月 31 日），李鸿章还好心地建议张佩纶：曾国荃与巴德诺的上海谈判没有成功，法方企图“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轮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定必原物归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扫尽，力难复兴”。怂恿张佩纶同其他福建官员“密图之”。李鸿章同时打电报给总署，建议总署电催张佩纶酌办。十一日（8 月 1 日）深夜，总署致电张佩纶等人，干脆全抄李鸿章的主张，要张佩纶等“两害相形取其轻，事急莫如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为第一要义。”“总以勿呆守马尾，避其锐气，伺隙而为方妙。”而张佩纶等并没有遵办，反而一再催促清政府派船援闽，但没有结果[①]。

大概是到六月廿六日，张佩纶才发现自己将众多弱舰调来与法军的强舰同泊，其实是做了一件大蠢事，有函致称：“我至廿六日以后，诸将已觉仓皇”[②]，“守疲援断，……颇露窘态”[③]。但这时法舰已将华舰视为囊中物，“各兵船抛碇在江，

① 俞政：《何如璋传》。
② 《中法战争》(4)，第 387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388 页。

法舰监之，不许移动，声言动则开炮”①。

光绪十年七月初二日（8月22日）晚8时，孤拔召集法舰舰长到“窝尔达”号参加军事会议。孤拔决定：(1) 8月23日下午约近两点时，当退潮引起船身转动时，各舰准备行动。(2) 第一信号旗升起时，鱼雷艇攻击“扬武”和“福星”。(3) 第一信号旗收回时，全队开火。

当法舰部署发起攻势时，中方却在一片混乱中度过。

首先是各舰船管驾发现张、何二长官“敌我连舰”的作战部署不大对头，于是，遂有各管驾前去请求改变这种部署的要求。如潘炳年记称：“各轮船管驾迭陈连舰之非，张佩纶斥之。”

死难管驾家属的呈文写道：“七月初二日晚，各管驾……同谒帅府，力陈连樯列阵之非，并呈图说，张、何二大臣仍未行改动。”

1884年10月3日《申报》报道：“振威管驾许寿山以船多江窄，并在一处，难以转动，请疏罗列，张诚不答。遂与福星管驾陈英合闽管驾五人上策于张星使，以轮船须与艇船、木哨船相间，首尾分列，胜则可截可追，败则相援相救；且既让其先开炮，尤不宜并在一处。而论者反谓闽人胆怯，不及粤人，非并一处必致败沮。”

《甲申战事纪》记载：“各船抛锚地址，俱张成所定。有言于张成者，谓华船与法船并泊太近，敌先开炮，我军立烬。须与师船疏密相间，首尾数里，以资救应。若前船有失，后船尚可接战。张成不之许。张佩纶亦以各员为怯，置不理。”

---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02页。

据俞政先生的意见，其实在开战前几天，法舰出于全歼华船的目的，已经禁止华船移动了。因此，虽然张佩纶不允华船分散的意见是否合理还值得探讨的话，当时的客观环境已不允许华船变换阵列，福建水师没抓住能逃脱全军覆没的最后机会。

还有所谓的"藏匿战书"事。原来，法军在开战前，曾向闽浙总督衙门递交战书。但当时福州和马尾的通讯联系不畅，结果，未等送达前敌将士手中，法舰已经开炮袭攻，先发制人，而我舰受人所制，被动挨打，很快就全军覆没。事后，人们怀疑张佩纶和何如璋"藏匿战书"，贻误战机，导致前敌惨败。俞政先生指出，该照会的接收人何璟承认：法方"初三发开战照会送省，亟电会办，信到炮发"。也就是说张、何只是来不及将战书送达前敌，我舰尚未起碇准备，法舰即已开炮，而并非故意藏匿战书。战后，左宗棠调查此事，责备张佩纶措置不当："总理衙门于七月初一电告各省督抚备战，初二日刻，何璟电知张佩纶告以所闻，谓明日法人将乘大潮力攻马尾。张佩纶复电答云严备。乃以照会未至，迟疑不决，……法人照会虽无确信，何璟电报岂同谰言乎？此备战之不夙也。"左宗棠又奏劾张成："军情日急，该革员身充轮船营务处，应如何刻刻备御？乃平日毫无布置，及初三日法已悬旗示战，该革员始行登舟，又不督饬各船竭力抵御。'福星'、'振威'、'飞云'、'福胜'四船死战不退，而'扬武'著名坚大之船，仅还一炮；陈英、高腾云等尚能力战捐躯，该革员遽以船受炮伤，驶至浅处，凫水而逃。"[①]

① 俞政：《何如璋传》。

由于强弱对比悬殊，加以法舰握在主动权，所以，虽然中国军舰在开战后也曾奋起还击，如“扬武”舰开尾炮击中法舰“窝尔达”号的船桥，“振威”、“福星”、“福胜”、“建胜”等舰也奋勇迎敌，但已不能挽回战局，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清政府用了十余年时间和许多银两组建起来的福建水师的大部分舰艇即被法舰击沉，只逃脱两艘小舰“伏波”和“艺新”。当双方舰队在水上交锋时，中方的岸炮也曾开炮轰击法舰，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郑丙炎所撰《福州马江战事大略情形》一文，记述了作战经过称：

> 是日法船在马江者六艘，泊于罗星塔下流者三。我以“振威”、“济安”、“飞云”三船与之相拒。我船迤南泊，彼船迤北泊。泊于罗星塔上流者三，孤拔之船在焉，我以“扬武”、“福星”与之相拒。我船迤西泊，彼船迤东泊，我犹在其上流。彼之水雷快艇二只，均泊孤拔之船旁。我之“伏波”、“艺新”二船，在“扬武”上迤西南泊焉。“福胜”、“建胜”二船在其旁。“永保”、“琛航”泊于船厂铁水坪前，二船系商船，无炮可以击敌，拟各载勇三百名往冲敌船，拢近时，即过船，以短兵杀贼。而我之桿雷小烟船七只，均泊海潮寺前。此外尚有闽海安平海水师艇船八号，蔼镇军炮船十号，均泊于罗星塔。马尾傍岸一带，福州水勇配北船三号，漳泉水勇配渔船二十余号，均错杂停泊其间。此水军之布置也。陆军则船署之前，有福靖新左、新右二营驻焉，后山火药库，福靖新后营驻焉，皆黄提督超群为之统领。山上则副将升楷之福靖老后营驻焉，马尾道则方观察之潮普勇驻焉，旺岐则杨副将之漳泉陆勇驻焉，出头则林侍卫之三百人驻焉。此陆军之布置也。

下午一点钟时，下流有法船一艘飞驶而来。彼船在罗星塔下流者，有一人执旗招展而舞，不知发何号令。彼船锚链之旁，均有两舢板守焉，大抵断链弄锚也。我船号令在营务处，而“扬武”船寂然。彼船舞旗毕，燃号炮一声，众炮齐轰矣。我三船在罗星塔下流者，均受有炮弹。“振威”管驾许寿山在望台，传呼斫碇开炮。碇链甫断，彼三船第二周之炮，均专注“振威”一船，兼以荷士基、格林炮连珠弹纷如雨集。彼盖见“振威”管驾能军，虑其船走动则难制，故并力攻之。四叶轮果被其击坏，船不能行矣。许管驾已中连珠弹，颠矣。敌船复一炮，中其锅炉，船即沉没矣。而“济安”、“飞云”二船锚链尚未断也。彼船更数炮，而二船火矣。我三船既沉毁，彼船仍停原处泊所，不走一步，惟开炮以击罗星塔旁岸之师船，及隔山轰炮而已。此我船在罗星塔之下流被击之情形也。

其在罗星塔上流者，彼船一燃炮，炮弹均专注于“扬武”一船，“扬武”即受弹两处。彼盖知“扬武”为营务处，系各船主将，且船大炮多，此船一破，诸船之气自夺，故首先并力攻之。“扬武”甫开炮回击，彼之水雷快船已到船底，发一雷而“扬武”沉矣。管驾坐舢板载红旗而遁。“福星”斫碇赴救，业已不及。斯时敌船枪炮弹如骤雨，“福星”管驾陈英屹立望台，传呼开炮击敌。其仆程姓者请曰：“伏波”、“艺新”已开向上流，我船亦宜开向上流，合各船相机回击。英瞋目曰：尔欲走我耶？叱之退。遂令于众曰：男子汉食君之禄，当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我船锐进为倡，当有继者，安知不可望胜！全船诺声雷动，由是鼓轮掌舵，贯敌阵而前，开边炮

以左右击之。惜炮小又未能中其要害。我船亦被弹数处，然亦均非要害。复在下流装足子药，贯敌阵而回，击之如前。至此，我船受创甚矣。斯时也，“伏波”、“艺新”已向上流而遁，随“福星”而进者，惟“福胜”、“建胜”二船。该二船系水炮台，惟前向大炮一尊，船小行滞，不能冲锋陷阵，只能遥击，故“福星”成孤立之势。孤拔见“伏波”、“艺新”之遁也，鼓轮追之，弗能及。“艺新”船转舵，回轰数炮，孤拔亦递退。三船合围，以击“福星”，“福星”管带已中弹殒于望台，三副王涟继之开炮奋战，亦被弹颠。船上死伤枕藉，仍力战不退。迨火药舱中弹药发，船焚，始纷纷赴水。该船额配九十五员，名存者仅二十余人，可谓血战矣！“建胜”燃一炮及孤拔之鹢首，受其微伤，敌船即萃击之，管驾林森林即中弹殒，船亦被轰而沉。督带“福胜”、“建胜”炮船吕游击翰在其船，亦及于难。是时仅余“福胜”一船，船尾已受弹，火发，尚燃炮奋击，管炮翁守正发数枪，殪敌二人，敌弹贯其胸而踣。管驾叶琛枪弹贯颊，蹶而起，指挥装炮，敌弹复集其胁而亡，船亦旋没。法逆见我船悉破也，始进攻。“永保”、“琛航”二船尚在水坪前，未动也，连轰十余炮，二船亦火矣。我之捍雷船七只，各率杆雷，向港汊而匿，被其水雷艇追击，沉者三百余。各师船以东风劲，不能前，坐以待毙，但见敌燃一炮，我沉一船，不须臾无孑遗矣。此我船在罗星上流被击之情形也。①

七月二十二日，何如璋向清政府奏报战况称：

---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813~815页。

初三日天忽晴明，未刻接奉电谕，知法外部议款不成，势必开战。因与张佩纶传令各船管驾即行动手。忽闻炮声震耳，法既先发，张佩纶一面飞饬各陆营出队，一面偕臣登高指挥，彼此互攻约半时之久。“扬武”已被击沉，“福星”随坏，“伏波”、“艺新”两船，乃向中岐退回。嗣法船赶至厂前，由厂中差弁开炮横击，旋即退去。随又上驶，再为击退。究因炮小，法船未受大伤。前泊在厂前“琛航”、“永保”两商船，正欲开轮往樯，为法炮邀攻，船坏不行，随被焚毁。其“飞云”、“济安”、“振威”三船，在下流与法船互击，忽见火起，悉行自焚。“福胜”、“建胜”两炮船，往来冲击，力战逾时，一被击沉，一被焚毁。其内海各师船及所备引火各船水勇木排等件，以法船格林炮子如雨集，霎时均为扫尽，时当申末。我驻防马尾之陆勇，与罗星塔炮勇，伏沟狙击，抵死不退，法因聚船攒击，相持至酉末，始各收队。是日苦战，我兵商各轮船被毁九艘。[①]

事后统计，福建舰队共阵亡官兵800多人，而法方仅死6人，伤27人。9月14日的《申报》曾登载中方死伤的详细数字称：

“永保”船主林文和，厦门人，未伤，水手六十七名，死四名。“琛航”船主杨永年，广东人，重伤，水手六十七名，死三十名，伤二十五名。“福胜”船主叶琛，福建人，阵亡，水手四十七名，死三十四名，伤六名，司机器人死二名，管轮死三名。“艺新”船主林承谟，广东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237~238页。

人，未伤，水手四十八名，亦未伤。“建胜”船主林森林，广东人，未伤，水手四十八人，俱未伤。“伏波”船主吕文经，厦门人，未伤，水手一百三十五名，管舱人死一名。“扬武”船主张成，广东人，未死，船上水手二百七十名，死一百八十五名，伤八十名，炮手死二名，学生死三名，司机器人死二名，管舱死三名。“福星”船主陈茵，福建人，死，水手八十八名，死三十四名，司机器人死三名，管驾死二名。“济安”船主林国祥，新加坡人，伤，水手一百六十六名，死八十五名，伤四十九名。“飞云”船主黄伦苏，福建人，死，水手一百六十六名，死一百名，伤四十名，司机器人死二名。“振武”船主许寿山，福建人，死，水手十名，死三十名，司机器人死二名，管驾人死二名，炮手死一名。此外，又有战船八号约共四五百人，死者大半。又有水手之善泅者五百名，死去三百余名。潮勇四百名，用小艇满载火药煤油，以轰敌船，讵未及驶近，已为敌炮遥轰，悉数毙命。①

第二天，法军原计划要派兵登陆，但孤拔发现他手上能用于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只有 600 人，而岸上的清兵数量众多，这时，想起法军在第一次基隆之役惨败的经历，孤拔觉得不能再做冒险，所以取消了登陆打算，只用舰炮轰击船厂，给予了极大的破坏。随后，得胜的法舰在驶出马江时，还连续轰击了沿岸的中国炮台。后来左宗棠谈陆军作战情况称：“候补道方勋、提督黄超群等部各营，虽间有逃窜，而拒敌保厂，尚非虚捏。惟法人既无大队登岸，将士自无血战之功。……况所

① 《申报》第25册，第551页。

部兵勇又有抢掠学堂机器房情事。”①

综观马江之战的全过程，可见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如中方在事前无法阻止法舰入口，清政府在和战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张佩纶、何如璋不懂军事，敌我战斗力对比悬殊等，因而战败是必不可免的。但是，损失能不能减轻些呢？如果张、何二人不是自作聪明地从各地将福建舰队的弱舰集中到马尾，送给法舰作靶子，也许就可挽救福建舰队，而法国侵华舰队要一次消灭那么多中国舰艇是根本不可能的。少了和福建舰队作战的乐趣，再加上登陆作战不容易占便宜，也许孤拔的马江之行不会有多大的战果，马尾惨败也就能避免。但张、何二人的蠢举帮助了孤拔。后来左宗棠查奏此事，就批评张佩纶谓：“张佩纶才识夙优，勇于任事。以文学侍从之臣，初涉军事，阅历未深；抵闽省之日，法船先已入口，据我腹地，未能审察形势，将我兵轮分布要隘；明知敌人船坚炮利，乃调令兵商各舰，与敌舰聚泊一处，遂至被其轰沉，此调度之失宜也。”②

但是，是否马江之战就没有一点积极意义呢？也不能这样看，中方在马江之战虽然遭到重大的挫败，但它仍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法国侵略的殊死抵抗，正是这种抵抗，使得法军在取得水战的完全胜利后，不敢乘胜占据造船厂，更不敢进扰福州，失去他们“据地为质”的重要目标。从这个意义来看，马江之战也是中国人民抗法战争的组成部分。

① 《中法战争》(6)，第249页。

② 《中法战争》(6)，第249页。

第八章

台湾抗法斗争

一　第二次基隆之战

基隆首战后，法舰仍逗留基隆海面游弋骚扰，基隆守军不时接到法军将要开战的情报。七月初三日马江之战后，法舰逐渐撤出闽江，聚集到基隆海面，并开始作一系列的战前火力侦察。刘铭传曾奏称：自七月初九日（8月29日）法船出闽后，即以三艘近泊基隆，势极猖獗，挂旗索战，连日不休。七月初十、十一两日，敌兵开炮猛攻，我勇凭山为障，开炮还击，屡中其船，彼炮反无所施其毒，彼劳我逸，敌颇伤亡；然后退泊口外[①]。又称：基隆初十、十一两日接仗，法人死伤十余名，我勇阵亡一名[②]。孤拔则向法国报告：前些日子，中国军队在基隆用膛线山炮轰击“巴雅”号战舰，使该舰受到一定的损失，3人受伤，但我们很快就将他们的炮火压下去了。这些迹象表明，法军再次进犯基隆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

在这危急时刻，清政府采取直接和间接两种办法，来援助台湾抗法军民。

---

① 《中法战争》(3)，第146页。

② 《中法战争》(4)，第195页。

直接的办法是在六七月间，多次指示南北洋及广东等三地督抚，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援助台湾。如命广东派铭营旧部吴宏洛五营或他军携精械航海至旗后上岸；曾国荃派刘朝祜率铭营旧部四营赴援基隆；李鸿章则拟派总兵聂士成率铭武三营赴台作战，三处督抚还赶筹大批枪械军火送往。可是，由于法舰封锁台湾海面而造成的运输困难，直至第二次基隆保卫战前夕，仅有刘朝祜所部二百余人得以在台北登陆，后来参加了沪尾作战外，其余各部均未能赶及此次战事。

间接办法则是命令滇、桂等省边军入越作战，以牵制北圻法军不能就近抽调兵力援助孤拔舰队。这种想法，最早是由会办南洋防务陈宝琛提出来的。陈宝琛是“清流”中人，与张佩纶等人的关系很好，当时正急于解救马江之困，于六月十五日向清政府提出：“琛意闽若开仗，即宜急电（云、广）两军进剿，以牵其势。”[1] 清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六月十八日（8月8日）寄给彭玉麟等人的电旨中便已提及：“法情叵测，万一决裂，必宜出奇制胜。潘鼎新、岑毓英务将现住关内各军切实训练，听候调遣，彼此联络声势，庶足迅赴事机，牵制敌势。”[2] 六月二十七日（17日），当清政府决心对法开战的同时，就指示滇、桂两省边军和黑旗军出兵进攻北圻法军。七月初，盛宣怀将清政府的决策电告刘铭传：“事急，云、粤必进兵，公能坚守全台，两月后彼必解围回援。”[3] 七月初四日(24日)，张之洞密电清政府，将这种做法称为“战越牵敌”

① 《中法战争》(5)，第467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74页。
③ 《中法战争》(5)，第509页。

策："牵敌以战越为上策"[1]。清政府的这一攻敌必救的妙招果然奏效。在援越清军的步步进逼下，法国政府被迫把战争重心从中国的东南沿海转回越南北圻，并不得不拒绝给孤拔增援攻占台北乃至全台之用的足够兵力，不过这已是后话。由于滇、桂边军的行动迟缓，直至八月中旬始能接敌作战，因而既不能阻止北圻法军抽调二千援军加强孤拔舰队，也就无补于第二次基隆保卫战了。

外援既然都是远水不救近火，基隆防务主要还须依靠当地军民。在吸取基隆首战的经验教训，考虑到法舰同时骚扰基隆、沪尾两口的新情况，刘铭传对基隆防务产生了新的想法：

1．采取扬长避短，诱敌上岸陆战的战术。基隆首战的经过表明，由于敌我双方大炮的数量及火力强弱相差悬殊，因而基隆守军海岸炮火力根本不是法方舰炮火力的对手。所以，不能以海岸炮战的得失作为战斗胜负的依据。反之，法军要占据基隆必须依靠海军陆战队，但法军的海军陆战队相对于守军来说人数较少，战斗力也较弱。因而，守军应该扬长避短，不与法方在海岸作战，主动放弃海岸，任由敌军登岸，再诱至其舰炮火力不达之处，集中兵力围歼，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取得作战的胜利。早在基隆首战后的六月十六日（6日），刘铭传就已有了这个新战术的初步设想，他奏报清政府："敌人船坚炮利，若再增兵增船，曹志忠所守正营中营离海过近，难支敌炮，拟令移扎后山，以保兵锐。"[2] 这种想法后来逐渐完善：基隆近靠海岸，敌船入口，即不为我有。曹志忠所守营垒逼近

① 《中法战争》(5)，第514页。
② 《中法战争》(3)，第145～146页。

海边，如法人添兵添船来攻，即须退守山后。我之所恃者山险，敌之所恃者器利，彼来攻我，我得其长，我往攻彼，彼得其长[①]。按照这种想法，刘铭传调整了基隆的防务：六月十五日被法舰炮火轰毁的海岸炮台已经放弃，不再修复。在临海的港口前山布置第一道防线，由曹志忠、章高元各率所部分两路踞守。而在法军舰炮火力不能到达的后山则布置第二道防线，这才是主阵地，守军的陆炮配备在这里。作战时，第一道防线仅仅稍作抵抗，诱敌来攻，即退往第二道防线，在那里，守军将用陆炮轰击占据第一道防线的法军，然而再集中兵力围歼其有生力量，收复第一道防线，逐敌下海。

实施这个战术以克敌制胜，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兵力充足，二是武器精利，而这恰好正是基隆前敌所缺乏的。六月二十一日（11日），清政府收到刘铭传的告急电："兵单器缺，茫无措手。"[②] 当天有旨指示刘铭传调台南守军赴援台北："闻台南兵数尚足，可否调赴前敌，著刘铭传酌度办理。"[③] 可能是由于刘璈的态度消极，不予合作，加以法军封锁台湾海面，军队只能取道陆路迂回前进，所以刘铭传的调兵并不顺利，七月初九日（29日），他电告清政府："曾调台南两营，廿余日始到一营。"[④] 这一营，可能即是后来参加第二次基隆保卫战的陈永隆营。迟到的另一营，可能即是后来参预沪尾布防的柳泰和营。对于刘璈的如此做法，清政府十分不满，遂据刘铭传的请求，于七月十九日（9月8日）有旨派淮将周盛传

①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二，第17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88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二，第8页。
④ 《中法战争》（5），第529页。

渡台协助刘铭传，并“统办台南防务”[①]，欲尽夺刘璈兵权，后因周盛传未能成行而罢。由于增兵过少，加上战前基隆地区瘴疠流行，士兵多病，曹志忠、章高元等八营仅能挑选1200人作战，内中还有勉强抱病应敌者。兵力如此单薄，就给第二次基隆保卫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 准备弃车保帅，撤基保沪。六月二十四日（8月14日），原为“清流”中人的署理两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也从解救马尾危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台湾抗法战争的新思路：孤拔舰队如果在我国东南沿海乱窜，威胁很大，如能将孤拔舰队牵制在台湾，而不去窜扰东南沿海的其他要口，对中国更为有利。他写道：闽法又图台，此中国之利也。敌注台则闽解，他海口亦舒矣。“拟请速敕刘督办设法诱之、怒之，优旨悬赏，激励军民，力战固守，能使敌牵留于台，即以为功”，止此是困敌之方[②]。如果台湾能吸引住孤拔舰队，马尾危机自然就会解除。也许是这种新思路启发了刘铭传，加上台北兵力缺乏，不足以同时兼顾两口的现实，使他产生了“撤基保沪”，以诱困孤拔舰队的新想法。

当时，台北诸军的军械粮饷均储于台北府城，而沪尾距台北府城只有三十余里，法军如占沪尾，则可溯淡水河直上台北府城。基隆则距台北较远，且只有陆路相通，沿途丛山迭岭，小道崎岖，行走不易。基隆不守，一时还不会影响沪尾的安全；沪尾如失守，则会抄了基隆的后路，基隆就成了孤立一隅的绝地，也难守住。而且沪尾防务又较基隆薄弱，“其时沪尾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746页。

② 《中法战争》(5)，第500～501页。

只孙开华三营，刘朝祜一百余人，并张李成新募土勇一营，甫经到防，炮台尚未完工，又无营垒，地势坦平，无险可扼，危迫情形，不待旁言”。两相权衡，刘铭传决定“撤基保沪”：“臣早已忧虑及之，曾函致孙开华、李彤恩，如果敌犯沪尾，臣即撤基隆之守来援，嘱令坚守以待。”① 与此同时，刘铭传做好了撤离基隆的准备工作，如令协防基隆的擢胜营官杨洪彪预先将基隆八斗煤矿的机器拆卸下来，移至山后，并将煤矿房屋一并烧毁，轻装上阵，随时可以撤离。

另一方面，法方也在频频地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基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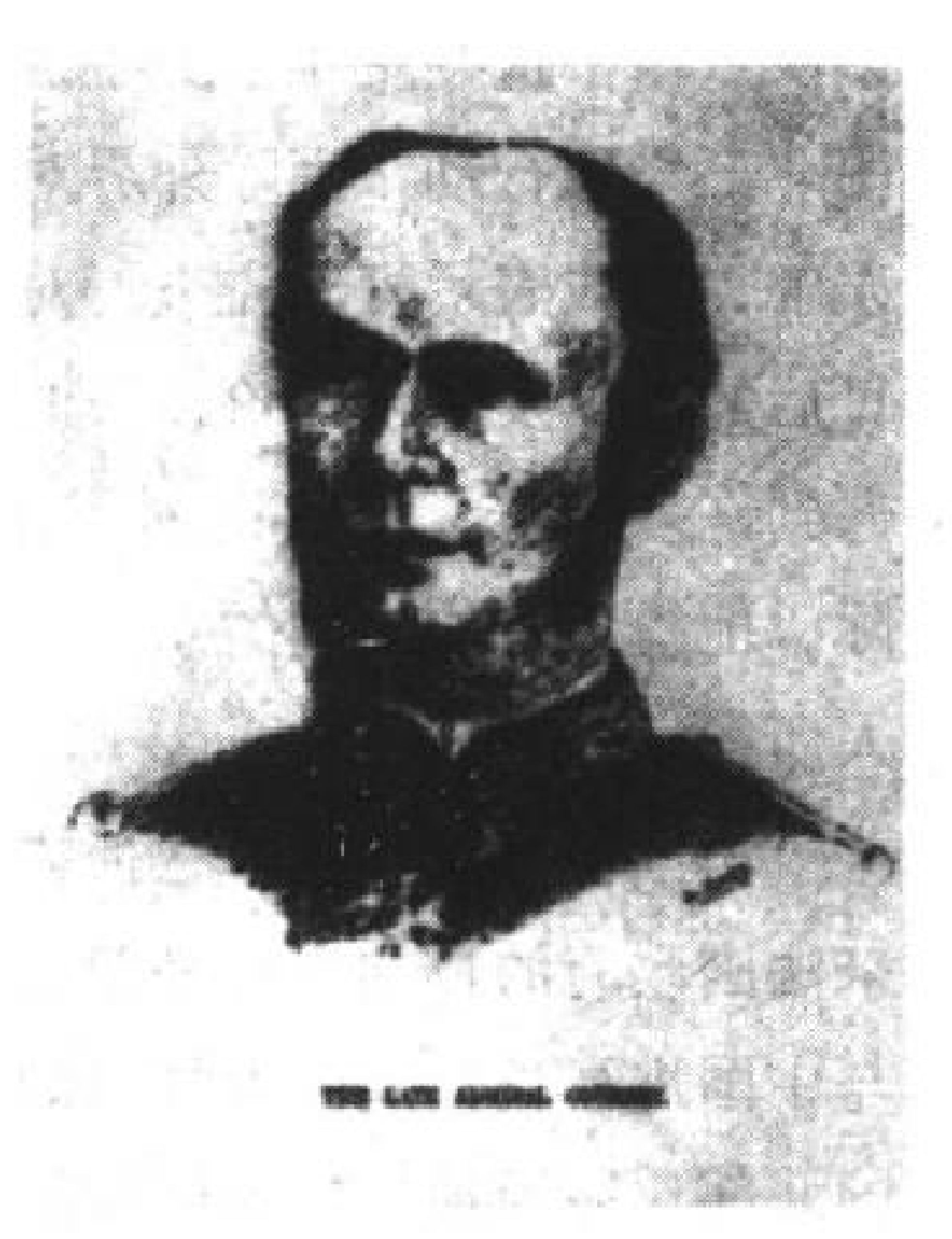
法舰在马江肆虐后，为了适应在华战争，新组成了远东舰队，最初时统辖大小舰艇近三十余艘，新任远东舰队总司令的孤拔，是一个远比力主攻取基隆乃以整个台湾的茹费理、利士比等人更具战略眼光的海军将官。他认为：要想使中国政府屈服，讹诈和勒索到巨额赔款，法军必须在它的首都附近，在直隶方面给它以打击，如果只在远离北京的地方行动，对于中国政府则不会有多大影响。因此，从一开始，他就主张攻取旅顺、烟台等地，却把台湾排除在外。但是，法国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茹费理断言：台湾守住闽江的入口处，控制北直隶湾，掌握了它便关系到中国沿海的安全，因此，将使中国心惊胆战，坐立不安②。却在六月二十五日（15 日）给他下达了再次进攻基隆的命令：在马尾行动后，孤拔将即赴基隆，并进行他认为以他的兵力可做的一切战斗。“他将确定地告诉我们用

①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二，第 15 页。

②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54。

何种新方法来保证取得矿区，这个矿区应成为我们补给的中心点"[①]。七月初九日，法国海军部在致函孤拔时顺便提到，在必要时你也可以封锁淡水港，因为它是由中立国船只运送中国部队的登陆地点[②]。

这个进攻基隆的命令并不符合孤拔的心意，因此，当他胜利地进行了马江的战斗后，借口需要补充2000兵力才能对基隆再次采取行动，就把事情拖延下来了。七月十五日（9月4日），他乘舰赴基隆海面侦察，发现守军已放弃了滩头阵地，却在港口高地山顶上紧张地修筑工事，严阵以待：在俯瞰市区和港湾的高地上，东西南三方的山巅上看出盖有一条几乎连续不断 的铺着浅草的肩墙，而这肩墙上飘扬着正规军的无数杂色旗帜。在一定间隔处，由于那种明显地透露出碧空来的炮眼的空隙，我们看到若干座山炮。



法军远东舰军司令、海军中将孤拔，1885年3月，在进攻镇海时被中国军队击伤，6月死于澎湖。

从基隆海面返回后，孤拔立刻向法国政府发出要求改变作战计划的电报："本人刚从基隆归来，中国人为预防吾人登陆起见，已在当地四周构筑大规模的防御工事。他们部队的人数甚多，我军在联队到来之

① 《中法战争》(7)，第250页。

②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59。

前是绝对不能有所尝试的。而且，即使在联队到达以后，出征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该地多山而且多密林。由于出产煤炭的缘故，基隆的占领也许是件有利的事，但这始终是一个不能展开大的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能够碇泊大舰的水面甚为仄狭，且经常有着波涛，当东北季候风到来时，波涛尤为险恶。此外，这东部的据点和福州一样远离北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对于北京的决定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政府有意攫取台湾岛，澎湖岛的港湾会是一个较佳的军事根据地。但为着征服台湾全岛起见，必须有比现在多上三倍的兵力，如果政府无此意图，则以在中国北部采取行动较为有利。"[1] 后来，孤拔又多次重申了这些主张。为了诱使法国政府同意让他的舰队在中国北部采取行动，消除外界对于法国放弃进攻台湾而会引起的误解，孤拔表示可以先进行对于基隆和沪尾两地的进攻。结合日后的战事发展来评价孤拔的这些看法，他预计侵占基隆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当然比利士比等人的过分乐观显得更符合实际，他提出占领澎湖的意见，表明他的战略眼光远非茹费理等人所能及。

法国政府虽然也承认孤拔的主张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来法国政府的目的主要是要讹诈和勒索中国的赔款，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长时间的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如允许孤拔舰队在中国北部攻城掠地，就无疑要冒战争升级的危险，这却是法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二来法国国力虚弱，维持侵越战争已十分吃力，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孤拔舰队在中国北部的冒险行动。三来如果同意孤拔舰队转向中国北部，势必导致完全放弃攻占基隆

---

①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的计划，这又会给外界造成是在台湾吃了败仗的样子。因此，法国政府再次指示孤拔：基隆是我们使用两千兵员可以持久占领的惟一据点，而这些据点以后可能会成为对中国的交换物，要他继续执行攻占基隆的计划。

为了满足孤拔的增兵要求，法国政府从侵越法军中抽调三个大队的海军陆战队、一些炮兵及辅助兵力，共约二千余人给孤拔。孤拔在反对进攻台湾的一切努力失败后，只得打点精神进行这场违背他的本意的基隆进攻战。由于他在前面曾有同时进攻基隆和沪尾的提议，这个在战略上极具眼光的孤拔，在战术上又犯下了盲目轻敌的错误，即把手中掌握的有限兵力分为两路作战，结果虽然攻打基隆得手，却在沪尾遭到了挫败。

进攻基隆的命令在七月二十九日（9 月 18 日）最终下达给孤拔，孤拔只得无条件准备执行。他把手中掌握的兵力一分为二：他亲自率领由伯多列威兰中校指挥的远征军前去攻打基隆，全部兵力包括刚从越南调来、分别由伯尔少校、郎治少校、拉克罗少校指挥的、各有 600 名兵员的三个海军陆战队大队。这三个大队士兵曾参加过山西、北宁、太原、宣光等役，较富作战经验；由鲁窝特尔上尉指挥，装备有六门 4 厘米山炮的第二十三炮兵中队，官兵约七十二人；由巴利上尉指挥，装备有两门 80 毫米山炮的一个陆军炮兵支队，以及若干名苦力和 12 名宪兵，共计二千余人。配合作战的海军舰艇有：装甲巡洋舰“巴雅”号，一级巡洋舰“杜居土路因”号，二级巡洋舰“雷诺堡”号，炮舰“鲁汀”号、“胆”号、“斗拉克”号，运输船“尼夫”号、“梭尼”号。利士比则率装甲巡洋舰“凯旋”号、“拉加利桑呢亚”号，一级巡洋舰“德斯丹”号，炮舰“蝮蛇”号及 300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去攻打沪尾。

八月十二日（30 日）清晨，孤拔率军来到基隆口外停泊，他与伯多列威兰乘坐炮舰“鲁汀”号，花了一天时间来侦察清军的防务，他们发现“中国军队很坚强地据守控制淡水大路的南方各山峰及西南方的高地。在西方有一高岭，狮球岭，很容易攀登，山脚一直至海。这山控制邻近的所有山峰，可以真正看作为本处地形的管钥”①。于是孤拔决定法军的登陆将在西山山脚开始，目的是占领此山的山顶，在那里设置炮位，用炮火轰击所有中国军队的工事。他指定由伯尔大队来担任这一进攻任务，其他两个大队则沿岸边的山脊路线绕转港湾，驱逐可能遇到的清军，然后支援伯尔大队。与此同时，所有舰艇的大炮都向清军阵地轰击，以援助步兵的行动。进攻时间定在第二天早上。

这时，密切注视敌情的刘铭传则在紧张地分析着法军的动静，因为已决心引诱敌军上岸决战，所以他倒不担心敌军不来，而是怕它转而进攻沪尾。他与曹志忠等将密商，如敌兵明日战后即扎仙洞，则不致遽攻沪尾，如战后收队下船，我军即须预备回援沪尾，以保后路。

八月十三日（10 月 1 日）早晨 6 时，伯尔大队离开“尼夫”号运输船，从海滩登上西山脚，这时，“巴雅”号向西山丛林的清军阵地发出第一炮，接着，所有舰艇的大炮都向同一方向射击，同时轰击有清军踞守并以枪炮火力回击的各个工事。6 时半，伯尔大队在西山脚下的仙洞登陆完毕，开始进攻西山。驻守这里的恪靖营官陈永隆、武毅右军营官毕长和，各带百余名士兵前往迎敌，“往复冲荡，相持两时之久”，终因对

① 《中法战争》(3)，第 560 页。

方舰炮火力太猛，守军伤亡不少，章高元、陈永隆等抵挡不住，只得率军退往西山。9时，伯尔大队占领西山，“从这个地形绝险的据点，大队以猛烈的炮火向筑有工事的敌兵射击，敌人不久即急遽撤退”。当法军派出一支小部队，向清军撤退的地方侦察前进时，遭到陈永隆等部的还击，法军被打死二人，打伤五六人。梁纯夫曾向刘璈禀报战况称：“本日黎明，法率队由仙洞上岸，我军驻防仙洞之恪靖巡缉营与霆庆中营暨章署镇高元率领武毅二百余名，前往接战，奋勇拒敌。法鬼直登仙洞旁最高之山顶，爵帅饬将四十磅大炮安放，连放十一炮，中其七炮，法鬼站立不住，纷纷而逃。计毙法兵四十余人，伤六十余人，割取首级一颗，我军伤亡弁勇二十余人。”[①]这里，梁纯夫关于敌我伤亡的数字可能并不准确，夸大了法军的伤亡，却缩小了我军的损失。而据八月十五日刘铭传奏：此战阵斩法酋一名，我勇伤亡百余人[②]。激战时，刘铭传冒着法军的炮火到前敌督战，：“法军开炸炮，所乘马忽屈伏于地，弹丸从顶上过，左右皆惊失色，公独夷然，益挥军进，众以是益服之。”[③]。

正午12时，作战了一个上午的伯尔大队已十分疲劳，只得将新攻占的阵地交给随后而来的两个大队接防，而炮兵部队则迟至午后4时才到达西山山顶。这天的其余时间，法军忙于布置阵地，没有和清军发生战斗。入夜，法军的所有海军陆战队和炮兵都在岸上休息过夜，准备第二天的激战。

这天夜里，刘铭传也没有好好休息，他先是和梁纯夫分析

① 刘璈：《巡台退思录》，第3册。
② 《中法战争》(5)，第563页。
③ 《中法战争》(3)，第153页

敌情，筹划第二天的战事，认为："明日当有一场恶战，仙洞旁高山为法人所必争，幸我四十磅大炮两尊已移置，可以攻击对面山顶之敌。且今日已经苦战获胜，士志已壮，再加赏犒，法奴登岸，可以聚而歼旃矣。"正在谈论间，曹志忠、章高元、苏得胜三将也来到，刘铭传遂和他们商议明日如何进剿，如何接应，如何奖赏自告奋勇的官兵等事，拟定由曹志忠从驻守东岸的五营士兵中各挑出四成队伍，到西岸会同章高元所部进攻西山法军营盘。

谈到三更时分，刘铭传却连续接到兼管沪尾前敌营务处的候补知府李彤恩的两封告急函，大略称："法人明日定攻沪尾，沪尾兵单，孙军门之勇万不可靠，若不派兵救援，沪尾必失。且领事费德里、税务司法来格云：法人十四日十点钟定攻沪尾，攻破沪尾之后，长驱到台北。台北空虚，料难抵御。若台北有失，则全台大不可问。以洋人论，则基隆重而沪尾轻，以中国论，则基隆轻而台北重。务请率师救沪尾，以固台北根本。"函中并引李鸿章关于是否死守基隆的意见："兵单力弱，可守则守，不可守则不勉强争此孤注"来提醒刘铭传。

开始，刘铭传并不为所动，他亲笔复函孙开华、李彤恩称："基隆兵尚不敷，不能派队驰救。现已飞调甫到新竹之武毅右军左营赴沪助战。基隆今日甫获胜仗，诸将不肯拔队，万难分兵，请坚忍为一两日之守，以顾威名而全大局。"[1] 谁知，又很快接到李彤恩800里排单来营的告急函。关于此函的内容，刘铭传曾奏称："沪尾忽报同日来敌船五只，直犯口门。该处炮台尚未完工，只安炮三尊以保沈船塞口之处。敌炮如

① 《中法战争》(5)，第565～568页。

雨，孙开华、刘朝祜等饬张邦才等用炮还击。炮台皆新用泥土沙袋堆壅，不能坚固，被炮即毁。阵亡炮勇十余名，张邦才亦受重伤，飞书基隆告急。”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刘铭传是在接到第三次告急函才改变主意的：“奴才闻言，当以基隆前敌正在万分危迫，沪尾又被急攻，基隆绝无兵力可分。而沪尾为基隆后路，离府城只三十里，仅恃一线之口，借商船稍通声问，军装、粮饷尽在府城，该口除沉船外，台脆兵少，万不足恃，倘根本一失，则前军不战立溃，必至全局瓦解，不可收拾，不得已只有先其所急，移师顾守后路。”① 又谓：“事急不得出十全，必有所弃而后有所取。今敌既不得志于基隆，必以全力攻公军，沪尾失，则台北危，基隆之师将自溃。”② 于是，连夜密传诸将即时拔队撤回台北府城。

对于刘铭传的突然决定，曹、章、苏三将及梁纯夫都大感意外，力请其暂免拔队，待两三日看沪尾信息如何，再行打算。梁纯夫强调指出：“孙提督系久经战阵，有勇三营，刘统领新勇营半，另柳太和一营，李彤恩三百，岂不能为一日之守？不日新勇到，又多生力数百，总请放心。若弃基隆而不守，则基隆以达宜兰、而苏澳非复国家土地矣。况守基隆胜于守艋舺，基隆不守，敌人即有立足之地，不独可以直下艋舺，且到处可扰，其关系大局，殊非浅鲜。”③ 而章高元则跪下哭谏，要求刘铭传收回成命。刘铭传主意已定，对于众人的谏止不以为然说：不舍基隆，台北不能保也，违者斩。并拔佩刀砍

① 《中法战争》(5)，第563页。
② 《中法战争》(3)，第152页。
③ 《中法战争》(5)，第568页。

前案，誓曰：军家大计，非若辈所知，违令者视此。果遭重谴，某自当之，不累若辈。并反复说明：吾计已决！罪谴吾自当之！有违令者斩！[①] 于是力排众议，除留曹志忠部奋勇 300 人驻扎狮球岭与法军对峙外，全军则连夜撤离基隆，于十四日退回台北郡城。十五日，刘铭传即命曹志忠、章高元、苏得胜等将共率奋勇数百人驰救沪尾。由于法军等待援军，一时未能发动对沪尾的进攻，加上朱焕明所部铭军 300 人已由新竹赶赴沪尾，兵力渐多，稍可腾挪，又改令曹志忠率领所部六营，由淡水进扎水返脚山岭，以防基隆法军由东路窜犯台北。

守军既撤以后，法军便在基本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基隆港及其邻近地方，并修筑阵地，准备固守。据说，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法军损失总数为死 5 人，伤 12 人[②]。

姚永森所撰《刘铭传传》谈及“撤基援沪”事，谓在从基隆撤往台北的途中，刘铭传在板加地方遭到百姓的围攻肆殴：“刘铭传率军撤至板加时，台湾道刘璈的爪牙朱守谟在该地士民中煽动不满情绪，几乎引起民变”云云[③]。姚永森的根据，主要来自沪尾税务司法来格致赫德的信中所述情形。为了辨明事情的真相，我们不妨引法来格的原函来作分析。光绪十年八月十九日（7 日），法来格致赫德函报告基隆战事称：法兵未登岸，未曾据有基隆之先，而基隆战事实多奇异。按法兵往攻基隆，派有一队中国之天主教民首先登岸，为中国曹总镇击败，而刘爵帅令曹总镇退兵。随法之中国天主教民乘势攻取基隆，散居民舍，行同野兽。当本月初五日，其中有一教民获该

① 《中法战争》(3)，第 152 页。
② 《中法战争》(3)，第 561 页。
③ 姚永森撰：《刘铭传传》。

地一十五岁幼女，强行污辱。该地人大怒，群起同仇，杀戮随法之中国天主教民约二三百人，余皆逃回法船。刘爵帅退至板加地方，该地人民怒而围之，捉爵帅发，由娇中拽出肆殴，且诟之为汉奸、为懦夫。爵帅惟曰：好好！尔辈欲我战乎？我今即回基隆，但尔辈谁为愿随我去者？言甫毕，计挺身前立愿随爵帅去者约有千五百人，爵帅即以火枪银钱分给此众，帅之而行。闻沿途添收乐从人民已计有七千之多……[①]

对于法来格的这封信函，鸿胪寺卿邓廷修虽已看出其部分内容“系得之传闻”，但仍据以参劾刘铭传：“失机丧地，调度乖方”[②]。

法来格函中所述情形是不是事实呢？

法来格身任淡水关税务司之职，当孤拔指挥法军进攻基隆时，他正在沪尾，并不在基隆，因而，他在函中所述基隆战事，全都出自传闻，基本不是事实。例如，据法方资料记载，法军进攻基隆时，首先登岸的是伯尔大队，而非什么“一队中国之天主教民”。在孤拔麾下，也没有这样一支由汉奸组成多达数百人的战斗单位，更不可能轻易就被该地民人杀戮二三百人。

至于说刘铭传在板加地方被民人围攻肆欧，则无论是从情理上和事实上来看，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从情理上看，首先，在战争中，胜负进退乃是兵家常事，战胜进取固应高兴，败挫后退也是常有的事，如果一闻败挫后退，即拿主帅来围攻肆欧，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何况当时正

① 《中法战争》(6)，第 192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191 页。

当战事紧张时候，最后胜负尚未判分，主帅在军队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即使一时受挫，兵士也不会轻易舍弃主帅，任凭民人围攻肆欧。其次，当基隆激战时，朱守谟远在台北府城，并未参预军机，基隆撤军决定突然，行动迅速，朱守谟不可能预先得到消息，而鼓动民人半途拦截刘铭传。据当时随同大军撤退的官员禀称：刘铭传于十三日夜间三更率军撤离基隆，中途并未多作停留，于十四日各营陆续抵达台北府城。按，台北府城所在地，原名艋舺，沈葆桢时，“建台北府，以淡水为附郭，治艋舺”。法来格函中所谓“板加”者，可能即为艋舺的误译。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板加即艋舺，是台北府和淡水县衙门所在地，为有王法地方，当地民人即使因为误会而不满，也不致作出围攻肆欧钦命督办大员这样大不韪的事情来。

至于所谓“板加即艋舺士民鼓噪逼迫刘铭传事”，则除法来格所述外还有以下的几种说法。

一是孙开华于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一日（4 月 25 日）密缄闽浙总督杨昌浚，提到刘铭传率军队从“基隆退守及在艋饬县雇夫搬运军装饷项前赴新竹，商民罢市，聚众阻止各情形”[1]。但语焉不详。

二是刘铭传在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六日（2 月 20 日）上奏《复陈台北情形请旨查办李彤恩一案以明是非折》，其中谈到：自沪尾战后，台北的文官武将各请添募土勇。“忽有台北府书识陈华，声称愿招土勇一千五百人，自备枪械，包取基隆，每月每勇需银洋十二元，托亲兵哨官奚松林来说，当经臣申饬不许多事。朱守谟闻有包取基隆之说，即私许陈华招募。及臣以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947 页。

淮楚营制每勇只月饷四两二钱，陈华大言轻敌，不知能否得力，即给如此重饷，何以服老勇之心？坚执不许添增口粮。该勇俱知台北府无兵，只亲兵数十名，即聚众呐喊鼓噪。”刘铭传花了很大力气，才把事情平息下去①。

再有就是刘铭传在《严劾刘璈折》中提到的士兵鼓噪闹饷事：自上年八月十三日基隆退守之后，台北饷需奇绌，刘璈不独丝毫不济，忽于八月二十日（10 月 8 日）咨行署提臣孙开华、曹志忠等，据称台北 12 营，俱至六月十六日（8 月 6 日）起加足夫价 192 人。该道明知台北无饷，意在诱胁各营哗溃，也使刘铭传几乎“死于噪饷之兵”②。

除了以上几条外，台北的文官武将均未见报告士民鼓噪，围攻肆欧刘铭传事。可见，法来格函中所谈有关情形，是传闻失实，不足凭信的。

由于刘铭传不经力战即率军撤出，以致基隆落入敌手，这在当时是很难为不懂军事战略的当地民人所理解，以致他们受到保卫家园的朴素情感所驱使，出现“群情汹涌，鼓噪闹事”的现象，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因此而夸张成因受朱守谟的调唆而致当地民人围攻肆欧刘铭传，这就不符合事实了。

刘铭传不经力战就撤出基隆的大胆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各方面的责难，根据不同的情况，他作了不同的处理。

一部分台北绅民，出于保卫家园和抗敌御寇的朴素感情，不理解刘铭传“撤基援沪”战术的苦心，曾为之鼓噪骚动。除基隆通判、淡水知县等官员纷向刘璈禀告外，台北士民还联名

①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二，第 16 页。

②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一〇，第 3～4 页。

上禀刘铭传，以基隆退守，佥请恢复，禀中有些词句包含着责备的意思：

具禀台北艋舺安定团练局、基隆保安局各绅董暨铺户、耆民、士庶人等，为要险不守，郡城堪虞，叩乞规复基隆，以全民命而遏凶焰事：窃职等草野愚昧，固不知兵。惟食毛践土，世受皇恩。当此法夷肆逆，意在吞噬台湾。荷蒙爵帅从天而降，督办全台事务，驻扎台北。六月十五日，该夷船闯入基隆，公然登岸。十六日，全军大获全胜，杀戮无算，俾异类退走下船，台北士民莫不同声欢欣鼓舞，以手加额，颂国家之洪福，爵帅之神威，俾台疆黎庶安居乐业。即基隆而民不知兵，两月以来，高枕无忧，尚叨庇荫也。

八月十三日，法船十余号分扰基、沪二口。基隆一仗，又复大胜。士庶引领而观，一战而战，尽歼丑类，大快人心。乃不意十四早突然拔队，将基隆九营一概抽退，营垒皆空，大炮器械尽归乌有，任听法人四五百人从容上山，分扎四路，为长久守御计矣。愚民惊骇，私相偶语，有言用计者，有言弃之者，甚至有言祸不深、功不烈者，啧啧人言。窃爵帅勋高望重，盖世英名，称扬四海。今基隆之故，愚民妄言，固在不足有无之数。而在职等，则思基隆为台北府城门户，最为扼要。门户一失，堂奥堪虞。且法人之所难得者煤炭耳，今民炭任在搬运，海上之船从此有恃无恐。而脚踏实地，步步为营，长驱直入，水陆并进，凡台湾苍赤难免遭殃。即现在基隆之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穷民不能搬者，皆遭其劫，惨难尽状，如在倒悬，望救之殷，日长如岁。况台湾为海外重镇，如此一变，天

下大局震动。凡有血气者，莫不捶胸顿足，号哭郊原，痛切剥肤，感动公愤。

全台形势，北路则恃基隆为第一要隘，港道深稳，轮船随时出入无碍。陆路如狮球岭、六堵等处，天生险阻。至沪尾港道浅塞，而官渡洲、仔尾等处，亦易遏断，其不便长驱而利出入较次于基隆明矣。今基隆一失，陆路而南，直须大甲方有关键，中港、后陇皆不足恃。今爵帅为全台保障，国家柱石，惟有仰恳恩施逾格，俯念海外苍赤，百万户口，有关大局。目下基隆百姓，咸望出水火而登衽席，即发大兵，规复旧基，社稷山河之福，即海外士庶全台之幸，合家顶礼，万代公侯！

对此，刘铭传作了耐心的解释说明，对上述公禀批复道：

据禀各情，所论实为切要。惟前因沪尾紧要，距府过近，台北万一有失，所关尤重，不得不移师赶回，以顾沪口之防。兵力单薄，不敷分布，而外人何得而知？此本爵军门之苦心，亦即军事之机要。昨候沪防布置粗定，业即饬曹镇全部六营由水转脚进取，并添募土勇数千以厚兵力。据曹镇具报，已将水转脚营垒扎定，刻期进取基隆，本爵军门用兵有年，非万不得已，岂肯轻弃要隘！现在惟就现有兵力，竭力防剿，以抒绅民士庶义愤之忱。天地神明，实共鉴之！①

对于清政府的责备及一班言官谏臣的弹章，刘铭传则持一种不屑多辩的态度。《清史稿·刘铭传传》称：初，铭传之弃基隆也，将卒皆力谏，朝士闻之，骇然大哗，铭传不为夺，曰：

① 《中法战争》(5)，第 569～570 页。

兵事变化，岂局外人所能遥度耶？《刘壮肃公（省三）奏议·卷首》亦谓：中朝闻公退基隆，则大骇，严旨趣公旋军基隆，公曰：兵事变化，恶有隔海可遥度者！卒守便宜不进[①]。

对于那些出于派系门户之见，抓住撤出基隆一事大作文章，大造舆论，恶意攻讦倾陷，纠缠刁难的人，刘铭传则据理力争，奋起反击。

刘铭传在赶台途中，曾在上海招收记名道朱守谟为幕僚，到台北后，当委朱守谟办理营务转运一切，会同府县弹压地方。但朱守谟不耐艰苦，又见台军危迫，思欲规避敌锋，加上已和刘璈等人勾结一起，便即请归。刘铭传从基隆撤回台北后，“该道遂造言倾陷，遍告绅民，谓基隆未败忽退，皆李彤恩得银数十万卖于法人，城厢绅民一时哗噪”。后来又跑到台南、福州招摇播弄，一时弄得外界议论纷纷，给刘铭传带来很大压力。事后，刘铭传奏参朱守谟：“临危乞假，规避敌锋，又复造言生事，摇惑军民，尤属故违军令。更于撤差之后，沿路招摇，逗留福州，钻营差委，肆口谗谤，计败戎机，实非寻常造谣可比。”请求将其革职，永不叙用[②]。

据说，“台湾旧制镇道专折陈兵事，而道益专，其势略与巡抚等。”刘璈在排挤台湾镇总兵吴光亮后，在台湾官场已是唯我独尊的人物。刘铭传赴台之初，清政府只赏给巡抚衔，“刘璈性固骄恣，见其非闽抚，意轻之”。二刘之间本来就有湘淮门户之争，左刘派系之见，再加上刘璈不满刘铭传在六月初四日的奏报中批评他的防务部署南北轻重倒置。当他设法收集

① 《中法战争》(3)，第152页
② 《中法战争》(3)，第148页

到一些台北官绅在沪尾捷前不满刘铭传的意见，就迫不及待也跳出来，攻讦和倾陷刘铭传。

首先，他颠倒事实，谎称台北敌弱我强：基隆法兵不过千余人，皆汉奸及安南各处胁从之众，法提督晚间率兵回船，惟留安南各处人驻守营卡。二十日进攻沪尾，仅只放小划数十只，载兵数十名而已[①]。“总计法兵不过四千，又分两支，力有几何？”在此基础上，再断言不必撤基即可保沪：沪尾之捷，仍系孙开华诸营之功，即无大队往援，亦未必失沪尾也[②]。他还耸人听闻地夸大渲染丢失基隆的后果：惟基隆为台北要口，系法人专指夺据之地，朝旨亦专重保守。法人之分扰沪尾者，无非为基隆起见。基隆失，则宜兰全失，淡水亦寖失。失地即失人心，将见土匪蜂起，内外交讧。彼族啸聚其间，人物两便，取用如携。再挟基、沪两路以犯郡，无论石墙空城，不堪抵御；而腹背受敌，守亦颇难。台北不守，势必席卷台南，是弃基即弃全台矣[③]。从而给人造成刘铭传误听失策，调度乖方，罪大恶极的印象。

刘璈的鬼蜮伎俩很快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八九月间接到丢失基隆的噩耗之初，清廷内外还能保持冷静，认为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事情，并未追究刘铭传个人的责任，但当刘璈的蜚语传播后，舆论为之突变。一方面是左宗棠及一些言官以刘璈的禀报为依据，多次奏劾刘铭传，动摇清政府对于刘铭传的信任。另一方面，在议论纷纭之中，清政府也失去了对于台北战局敌强我弱形势的冷静分析，多次下旨催促

① 《中法战争》(6)，第 121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180 页。
③ 刘璈：《巡台退思录》第 3 册。

刘铭传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攻和收复基隆，严重地干扰了刘铭传对基隆法军采取的“长期相峙，困而不攻”的作战部署，造成进攻基隆的台北军民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牺牲。要不是刘铭传能够力排干扰，坚持不动用军队主力去做进攻基隆的无谓尝试，以及清政府始终信任刘铭传的话，则台北抗法战争的结局及刘铭传的个人前程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为此，刘铭传与刘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清政府也在九月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后，于十一月指示他考虑撤换刘璈：“刘铭传身任巡抚，属员用舍是其专职。台南地方辽阔，刘璈统率台营办防，职任极重。如果可用，该抚当屏除畛域成见，督率妥办；如竟不得力，另易生手，不致贻误防务，即将刘璈撤去。”[①] 据《醇亲王奕譞致军机处尺牍》，可知此时清政府已有意派龚照瑗前去取代刘璈[②]。

署福建陆路提督、沪尾守将孙开华是鲍超霆军统将，刘铭传奉命赴台，即对他能否与自己合作抱有疑忌之心，但从保台抗法的大局出发，仍尽力折节下士，笼络对方。沪尾之战获胜后，刘铭传奏称孙开华“身先士卒，忠勇善战，力支危局，厥功尤伟”，请求清政府“破格加恩，以奖战功”。但是，当左宗棠向刘铭传发难时，孙开华派性发作，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助纣为虐，先是于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密缄杨昌浚，攻讦刘铭传轻弃基隆及攘功饰过，恕己刻人[③]。又于三月二十五日（5月9日）致函杨岳斌等，声称：李彤恩未历戎行，不谙军务，平日与西人最稔，恐军机泄漏，并未与讲求战事。当敌犯沪尾，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1861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7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6)，第2946页。

孙开华静以待之，并无只字乞援等语。又称当沪尾开战之时，李彤恩先已潜回关渡。孙开华亲临前敌，既未与之晤面，亦未据有禀缄，忽于是夜接据艋舺营参将张欣单报，基隆防军尽退回郡城，并闻李彤恩有三次飞书告急之事。孙开华当即函致刘铭传，告以沪防无恙，请督军折回，迅图规复[①]。为左宗棠等人弹劾刘铭传提供材料。

刘铭传得知孙开华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行为后，十分愤慨，上奏参劾孙开华："已故大学士左宗棠到闽后，刘璈合谋倾陷，蜚语上达天听；孙开华竟乘势朋挤，谤功诿咎，忘其所以。楚淮构讼结仇，固自刘璈兴之，实由孙开华成之。"要求清政府不可信任重用孙开华[②]。

大学士左宗棠受命督办福建海疆防务，于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2 月 14 日）到达福州，二十九日（16 日）即据刘璈的密禀，奏劾刘铭传在撤守基隆一事上，"始则为李彤恩所误，继又坐守台北不图进取，皆机宜之坐失者"。指责刘铭传懦怯株守和任用非人，运筹未协等[③]。刘铭传闻之后，于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六日上奏，反唇相讥左宗棠"空言大话，纵可欺罔于一时，能不贻笑于中外"[④]。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四日（7 月 15 日），左宗棠根据孙开华的密禀，再次上奏弹劾刘铭传，甚至将退守基隆与失守北宁相比，"刘铭传失地辱国，其罪远过于徐延旭、唐炯"。"而以畏敌之一念，遂至于误军；以文过之私心，遂至于罔上，臣不禁为刘铭传惜也。"奏上后，清政府批

① 《中法战争》(6)，第 508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528 页。
③ 《中法战争》(6)，第 180 页。
④ 《中法战争》(6)，第 509 页。

复："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饷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罪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于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内，似不于伦。左宗棠著传旨申饬，原折掷还！"[①] 左宗棠等人参劾责备刘铭传的最根本一点是，如果刘铭传不从基隆撤军，孙开华部也能守住沪尾，"其实，二十日沪尾之捷，仍系孙开华诸营之功。即无大队往援，亦未必失沪尾也"。这个结论未免有失武断。因为利士比进攻沪尾之前，曾向孤拔请援，由于刘铭传已率守军撤离，孤拔的主力被困在基隆，遂只能派出区区 300 人去增援利士比，致使利士比因攻击力量不足而失败。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刘铭传仍坚守基隆，孤拔进攻不顺手的话，则当利士比请援时，孤拔就有可能留小部队佯攻基隆，而率主力转攻沪尾，这样的话，仅靠孙开华的力量能否守得住沪尾，还是一个未知数呢！所以，"撤基"是"保沪"的前提条件，把二者生硬地分开，并不能真正认识问题。刘铭传曾有奏谈二者的关系称："基隆退后，敌兵上岸住营，兵势已分，往攻沪尾不足千人。若不撤基隆之守，敌必全队攻犯沪尾，无兵往援，虽提臣孙开华骁勇敢战，器械不敌，众寡悬殊，何能保其不失？"[②] 这是有道理的。

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保卫国土，但如力量不能兼顾的话，弃车保帅，也不失为聪明之举，所以，不应该过分苛责刘铭传。

二　沪尾大捷

光绪十年八月二十日，台北清军在沪尾大败利士比所部法

---

① 《中法战争》(6)，第 509～510 页。

②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二，第 15～16 页。

军，中外史书多称其为“淡水大捷”，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中法战争前，“淡水”一词有着多种含义：一是指淡水河流域。台湾岛由于地形关系，河流一般都很短，淡水河全长144公里，长度已居全岛第三位。连横先生指出：“初，天津之约许开淡水，而范围广漠，凡淡水河所至之地，皆可互市。”[①] 这里所说的“淡水”即指淡水河流域而言。二是指淡水行政区。清雍正九年，设淡水同知，治竹堑，凡大甲溪以北地方俱归统辖。光绪元年，裁厅置县，附郭台北府。淡水县的辖区，南至土牛沟，与新竹县交界，北以三貂溪为限，与宜兰县相邻，南北五十里，东西五六十里，方圆百里有余。三是指淡水港。1792年，台湾开放淡水港与福州对渡，港口设在八里坌，一时成为商贸中心。可惜好景不长，不几年，一场洪水把台北盆地的大量土石冲向八里坌，淤塞非常严重，于是，商船开始改泊沪尾港，八里坌的商贸组织也迁来沪尾，福建泉州并大量向沪尾移民。随着岁月的推移，沪尾港也逐渐淤塞，往日繁荣兴盛的港口景象一去不复返，沦为寻常市镇，民国元年，正式改名为“淡水镇。”四指沪尾口岸。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允开淡水口岸。1860年，清政府照约在台湾开设海关，在淡水则以八里坌为通商码头，而于对岸沪尾设关。1862年7月18日，沪尾开关征税。1863年正月，札委淡水同知代理，设关渡验卡，以查洋商进出，巡逻仍用关船。光绪十年八月二十日的战事即发生在沪尾，因而，称此战为“淡水大捷”，似嫌笼统，不如径称“沪尾大捷”为宜。

---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445页。



1884 年十月，法海军进攻沪尾（淡水），法军采取诱敌上岸战术，取得胜利。这是作战形势图。

沪尾其实就是淡水河的入海口，曾任台北知府的林达泉撰《全台形势论》一篇，其中提及沪尾称：台北水溪“则有二甲九、三角涌、水返脚三溪，源远流长，百有余里，均汇于艋舺，乃由关渡出沪尾以入于海”①。“沪尾”一词，为原住当地的平埔族人的土语转音，本意是指捞鱼范围的尽头。当时的先民用一种竹制工具沿淡水河阻水捞鱼，到沪尾已是尽头。淡水气候异常，长年飘着小雨，加之语意传达有误，到了淡水河口，给人感觉是下雨下到了尽头，这地方就被说成是“雨屋”，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 648 页。

转音即为“沪尾”。

据说，在沪尾曾发现一座明代的女墓，显然在那时已有汉族移民居住。1627 年，占据基隆的西班牙守将伐尔得斯命倍拉率 20 名士兵，乘舢板在沪尾登陆。同年 9 月，西班牙又从菲律宾调来远征舰队，攻取沪尾，并沿淡水河直上，夺取台北盆地，势力遍及整个台北。接着，西班牙人在沪尾的北岸高地上修筑圣多明各城。全城面积约为 1．24 万余平方米，呈方形堡垒式，分作二层，一层是两个房间，相传其中一间是监狱，非常阴暗潮湿。第二层有四个房间。左上角有一个小望楼，是观海和放哨的地方，望楼顶上有一根较粗的白色旗杆。城的四周约有 60 米，筑起 3 丈高的城墙，墙厚达 7 尺，极为坚固，城顶四周全用红砖砌成，绕以雉堞。从城上楼顶处眺望，沪尾全景尽收眼底。1642 年，驻台南的荷兰殖民军趁驻沪尾的西班牙人大部调回菲律宾镇压土人起义之机，海陆两路来攻，在沪尾血战四昼夜，才击败西班牙人。

清嘉庆年间，因海盗蔡牵曾占据沪尾以为巢穴，官军逐走蔡牵后，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与闽浙总督河林，以台北守兵单弱为由，奏请清政府将兴化协左营守备改为水师，移驻沪尾，设守备一员，士兵 260 名。自从同治年间正式开口通商后，沪尾的商业地位逐渐上升。在台湾开设四个通商口岸中，以沪尾为正口，鸡笼、安平、旗后为外口，征税银册均由总口转缴关库，归福州将军督办。当时，台湾种植茶叶已有百余年，道光年间渐销岛外。同治年间，英人德克来在沪尾设立德记洋行，除贩运鸦片、樟脑外，还深知茶业有利，遂贷款劝农植茶，收成时悉为采买，运销海外。于是，沪尾逐渐成为台湾茶叶的输出中心，到中法战争前，每年出口茶叶五六百吨。台湾当局还

在沪尾先后设立了烙号局、官银局、厘金局等机构，台湾通航轮船后，沪尾又成了重要的轮船码头。随着商业的发达，沪尾也日见繁盛，同治十三年，沈葆桢曾奏报沪尾的兴旺情况："沪尾港门宏厂，舟楫尤多，年来夹板帆樯林立，洋楼客栈，阛阓喧嚣。"

沈葆桢巡台时，沪尾被看成海防要隘，修筑了新式炮台，安放西洋大炮。筹备防法之初，福建督抚曾过问沪尾炮台事宜。光绪十年四五月间，福建督抚派遣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赴台北，主要就是担当沪尾守备。孙开华，字赓堂，湖南慈利人，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说他从军时年十八，为鲍超部骁将第一，貌姣好若女子，军中呼为孙美人。骁果迈众，而深沉，喜怒未尝形于辞色，好客轻财，平居无疾言遽色。他因随鲍超镇压太平军有功，于同治五年得授福建漳州镇总兵。同治十三年署理福建陆路提督，募勇成擢胜营。光绪四年，宋国永死，所部霆庆军由孙开华接统。光绪十年，率擢胜三营督办台北防务。

由于法军在侵台之始，便封锁了基隆海面，内地运济台北的军械及士兵，只得改从沪尾上岸。这种情况，使得刘铭传在筹划基隆防务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沪尾防务。他于闰五月二十四日在基隆登陆，停留四天后，即于二十八日（7月20日）赶赴沪尾视察和整顿防务。在基隆失陷之前，刘铭传基本是兼顾两地，两头来回。在沪尾战前，他主要是做了三件事：

1．整顿擢胜营，提高其作战能力。按刘铭传本意，他与鲍超部下骁将孙开华是难以合作的，应该由张佩纶出面将孙调开。但未待实行，基隆首战已经打响，台北防务需人，加上张佩纶又已为马尾战事纠缠，调孙一事无从谈起，只得委曲求

全，与孙开华共筹沪尾防务。

虽然在六月初四日所上奏折中，刘铭传称孙开华“器宇轩昂，精明强干，久著霆军，饱经战阵”。但这只是笼络部下的表面文章。实际上，刘铭传对孙开华及擢胜营并不满意，一是嫌擢胜营军纪太差：“臣渡台之时，孙开华为台北总统，所部三营，一扎基隆，一扎淡水，一扎沪尾，兵勇皆散住民房，营官杨龙标等出门乘舆张盖，营务废弛已极。”为此，刘铭传与孙开华“连日接谈简器练兵之法，类皆欢欣鼓舞”，实际上是示意他加强军纪，操练士兵。并借在基隆首战时，协防的擢胜营官杨龙标不战而逃的例子，督促孙开华及时更换不得力的营官，“孙开华始将杨龙标、向兴贵两营官同时撤换，以李定明、范惠意接带。”三个营官换了两个，不能不算大整顿。二是嫌擢胜营装备太差，“器械操练虽少讲求”。因而刘铭传从所带来的后门精枪中拨给一批，“三营共领毛瑟枪五百杆”。这就大大提高了擢胜营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三是嫌孙开华对防务漫不经心，尤其是没有增筑沪尾炮台，于是，“臣将该部三营并归沪尾，派令修筑炮台”。只可惜孙开华仍不用心，以致修筑炮台的工程进展缓慢。“自六月十二日兴工，至七月底尚无一分工程”①。当八月中旬法军来攻时，“斯时中国海滩中炮台，已设许多沙袋围护，备有新式克虏伯大炮五尊。并于其上面高处所尚未修葺完竣之炮台，备有一尊从前膛装药之大炮”②。

经过刘铭传的这样一番整顿，擢胜营从人员到装备以至精

---

① 《中法战争》(6)，第528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258页。

神面貌都大有改观，沪尾防务从而得到了加强。

2. 增兵募勇，加强沪尾的军事力量。除了大力整顿擢胜营外，刘铭传还及时增加沪尾的防守力量。措施有两个。一是调兵增援。如将从台南北调的柳泰和一营，从江南调台的刘朝祜、朱焕明500人，以及从基隆撤回的章高元所部两营，调赴沪尾助防。二是命李彤恩招募土勇一营助战。关于李彤恩招募土勇事，徐珂辑《中法战争轶闻》记称：张李成，台湾内山人，操俳优业，傅脂粉登场，初不审其为勇士也。光绪乙酉，法人攻台北，观察李某以刘省三中丞命，练土兵拒敌。张忽舍所业应选，李呼张小字曰："阿火，汝胡解兵事？"张慷慨言曰："火生长是间，不欲变服饰为西人奴也！山中善火者可千人，招之立集，善猎能枪，可应敌！"李善之，易其名曰李成，谓李氏所成就者也[①]。刘铭传曾奏报此事称："李彤恩力保张李成打仗奋勇，请募五百名，发给后门枪二百杆，令其操练助防。"

经过这样的添调增募，使得沪尾的守军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为战胜来犯法军奠定了基础。

3. 赏识并重用李彤恩。尽管刘铭传于用人之际，极力笼络孙开华，以图搞好关系，协同对敌，孙开华也表面合作，不似刘璈那样横生异议，但两人毕竟积怨已深，内心隔阂是短时期可以难以弥合的。所以孙开华对待刘铭传仍心存戒备，态度消极，"除饷项之外，布置一切并不闻问，且与楚淮诸将皆不浃洽"[②]。为了避免接触愈多，怨隙愈深，他们两人不约而同

① 阿英编：《中法战争文学集》，第462～463页。

② 《中法战争》(6)，第528～529页。

地找到一个中间缓冲人物。闰五月二十八日，当刘铭传从基隆赶到沪尾视察防务时，孙开华向他推荐时任沪尾通商委员的候补知府李彤恩"办事勤能，熟悉洋务"。当时李彤恩因体弱多病，已决意乞退，刘铭传遂托孙开华致书慰留，并札委李彤恩兼办沪尾营务处。以后，刘铭传有什么事情需要督促孙开华，但自己又不便过多出面时，就由李彤恩从中转达斡旋。如七月间，"敌信日紧，臣函嘱李彤恩，转劝孙开华整顿队伍，速修炮台营垒，并请其住营督防，李彤恩屡言不听"①。

李彤恩是由孙开华引荐给刘铭传的，但既得刘铭传的赏识和重用后，孙开华又反过来疏远和防备李彤恩，对李彤恩采取不理不睬的消极态度，"孙开华与李彤恩同居一室，李彤恩经营填塞海口，安设水雷，孙开华毫不预闻"②。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体弱多病的李彤恩仍四处奔走，多方筹划，为加强沪尾防务做了四件重要的事情。（1）如招募张李成土勇一营，前面已提及。（2）填塞沪尾港口门。六月十五日基隆首战后，李彤恩认为沪尾也将面临法军进攻的危险，于是及时禀请买船填石堵塞海港口门。当时正值秋茶上市，来往出入沪尾港的中外船只颇多，专门采买茶叶外销的英商怕因此影响生意，故而百般恫喝阻挠填塞口门。李彤恩争取到英领事及淡水关税务司法来格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与英商反复辩论，谕以利害，多方开导，始得顺利地沉船封港。不久，法舰即来窥探，滞留港内的一艘英国军舰告知口门封塞，法舰徘徊口外，怏怏离去。事后，刘铭传奏称："若非李彤恩先期塞口。法船混入一

① 《中法战争》(6)，第528页。
② 《中法战争》(6)，第528页。

只，台北已不堪问。绅士陈霞林等每晤谈时，辄称其功。”[①]（3）在港口安设水雷。李彤恩指挥水雷手在岸上的隐蔽地方建立遥控站，用电线控制布设在港口水面的数十具水雷，这些水雷对法舰的威胁很大。后来的法军登陆主要是为拔除水雷遥控室，结果被清军打得大败而回。所以，李彤恩的这一工作，是清军取得沪尾大捷的契机。（4）管束外籍引水员和外国舰船不被法舰利用。李彤恩长期担任沪尾通商委员，由于职务上的便利，他熟悉沪尾港的外籍引水员和进出的外国舰船，这时便利用这些关系，要求他们保持中立，不要被法军利用，“羁縻引港洋人不为法人雇用”。七月二十日（9月9日），孤拔乘炮舰“鲁汀”号到沪尾侦察，“它把征求领港人的旗帜挂在它的前桅上，没有一个领港人来应征。‘鲁汀’想根据万国船舶信号与被困在港内的英国通讯舰联络，但英国舰长发出信号，他不能答复任何问题，以免违犯中立”[②]。可见，李彤恩的努力产生一定的效果。

经过这样上下同心协力的整顿，沪尾防务大为改观：守军由原来的一营增至六七营，并堵塞口门，安置水雷，可以有效地防止法舰的突袭。

如果说刘铭传在基隆首战前便已开始重视沪尾防务，并以战略家的眼光将沪尾看得比基隆更重要的话。那么，一心一意只想攻占基隆的法军，则要在一个多月后，才开始注意到沪尾。罗亚尔写道：“占领基隆和它的煤矿工场既决定为我们的目标，对于淡水作军事行动显然是必要的了。这两个城市由一

---

①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二，第18页。

②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条大路连接起来，它们近在咫尺，所以占据了这一个，就绝对必需占住别一个。这种必要性是由于这两个港口的简单的地理形势所产生的。但是它似乎很长时间没有为人们所认识。自七月底以来，不断有一艘或数艘法国战舰停泊基隆港前，无疑地阻止了中国或外国的汽船，将大清国送至台湾北部的军队、枪炮和军火在那里着陆。但距离基隆仅三十里左右的淡水港，从未为我们所占据或封锁，所有船只均可在那里自由卸运。中国方面当然将他们的人员和物资的运输都转向这边来。照我们所有的行动，只封闭两点中的一点，实在是像一个警察要捕拿一个藏在屋子里的坏人，他的行动总是看守前门，而毫不留心到听任大开着的后面的窗户。”①

七月二十日侦察沪尾后，二十三日（12 日），孤拔电告法国海军部：倘若政府同意在北方立即行动，我准备在此之前摧毁淡水防御工事②。十一天后，他又致电法国海军部：政府如执意要占据基隆作为质押的话，最好在中国加强布防之前，立即行动，同时攻击负责补给的淡水港③。法国政府批准了孤拔的计划，但加以一定的限制：政府同意如有可能便摧毁淡水的防御工事，但不要波及城市，因为这是一个开放口岸，而且有相当多的欧洲商人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政府和孤拔虽然考虑到要攻击沪尾，但只是把它看成是攻击基隆的附带行动，把基隆看作是要务必攻占的首要目标，就像罗亚尔把基隆比作大门，却把沪尾看成是后窗一样，说明他们并没有从战略

① 《中法战争》(3)，第 563 页。

②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59。

③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59。

④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53。

的高度来认识沪尾的重要性，从而注定了法军进攻沪尾的失败结局。

当孤拔率领远东舰队主力进攻基隆时，他命利士比率“拉加利桑呢亚”号、“凯旋”号，“德斯丹”号等三舰及所载300名海军陆战队驶至沪尾港口，与早在此地执行监视任务的“鲁汀”号会合。孤拔给利士比的任务是：“我希望您将瞰制淡水内港及外港的防御工事予以破坏。其次，您也许要除去一道由沉入水中的戎克船所构成的障碍。为着完全开放水路起见，尚须清除埋在该水路中的鱼雷……关于敌人所敷设的鱼雷，最稳妥和最迅捷的方法是占领水雷的点火哨，一旦到达哨内便将水雷予以爆炸。领港人会给您指出一个点火哨的位置。可是这项点火哨的占领以及敌炮的破坏工作必须派兵登陆方能达成任务。请您自行判断您所属三舰的陆战队，由一些军用小艇掩护着，是否足够？如果不足，您可要求增援，或是试着在登陆地点将水雷点火线挖出。以小舰艇十分安全地占领淡水港并予以封锁，这便是您要达到的目的。”

八月十三日，利士比率舰驶达沪尾港外，法舰面对的，是为高山护持着的沪尾港，在半山上，是一座被法军称为“红堡”、新近赶筑尚未完工的新炮台，控制着差不多整个港口的海面水平线，炮台据说装有三门17厘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在海滩上，还有一座被法军称为“白堡”的旧炮台，它有四个炮眼，指向的正是淡水河的入海口。利士比指挥他的军舰尽可能地靠近海滩，和新炮台保持3400米的距离，和旧炮台保持2500米的距离。当天，利士比便给停泊在港内的英国通信舰发出信号：“我将于明日十点开火。”

八月十四日清晨6时半，清军用装在新炮台上的三门大炮

首先向法舰开火，利士比急忙发出作战信号，四艘法舰立即向清军炮台还击。由于这时太阳正照在俯瞰城市和堡垒的群山上，法军炮手的视线被扑面而来的阳光映花了，同时，整个海岸又出现了高度的折光现象，并有一阵浓雾把清军阵地完全遮盖住。这就影响了法军炮手的瞄准，在最初的半个小时炮战中，法军的炮弹都因瞄得太高而打不中目标，倒是清军的大炮打得比较准确，好几艘法舰都被击中[①]。法来格身历其事，他写道：清军“炮台发出炮弹，可命中击打法船，将法国维伯战船头桅打成两截，复于其船旁击一大洞，是只维伯战船，为前数日开来本口者。而法国船发出之炮弹，甚不得利，均击中于事无济之他物，独不能打炮台”[②]。

七时左右，随着太阳升起，折光和浓雾消失，法舰的炮手射击才较准确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拉加利桑呢亚”号的 24 厘米大炮炮弹就轰毁了清军的旧炮台，但新炮台仍旧坚持作战，炮手们不顾在他们周围雨点般落下的敌炮弹，不停地开炮还击，到将近 10 点，新炮台的大炮才被敌炮摧毁殆尽。

由于害怕港内布有水雷，利士比不敢命令法舰闯入港口，只是指挥他们在余下的时间里，每隔若干时间便向清军阵地发炮一次，据法来格报告，当天，“中国人之死伤者约五十人”[③]。孙开华致函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报告这次战事称：“十三日，法船四只约次晨十点钟开战，当率勇丁全队出扎，四路埋伏。沪尾新筑炮垒安八十磅大炮三尊，于六点钟先行轰攻，弹落彼船开花，法人受伤不少。台外筑有围墙，彼未能窥测，轰有三小时之久，

①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258 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258 页。

见我炮出烟之处,始就此处还击,攻坏围墙一缺,炮架略被击坏。油车口小炮台亦经开放,至午后始被攻毁;仅伤二人,余均无恙,大小炮未大伤。"[①]

当天夜晚和第二天早上，利士比都派出小舰艇潜入港内探测有否水雷，结果，发现港内果然布有由岸上电控的水雷。这证实了利士比从一个曾参与帮助清军安放水雷后，又为金钱而转向法军效劳的外籍领港人那里得知的情报："这些水雷共有十个，装满炸药及电力自动机。水雷的燃放观察站，据他说是在白堡的后面。"[②] 必须先清除这些水雷，才能炸掉堵塞港口的沉船，完成孤拔交给的任务。而要清除水雷，最彻底的办法是占领陆上的水雷燃放观察站，这就意味着法军必须登陆作战。但利士比认为他没有足够的兵力来进行一次登陆战，于是，他派"德斯丹"号驶回基隆，向孤拔要求派出一个大队步兵的增援。

"德斯丹"号驶回基隆时，碰上孤拔正指挥麾下的三个大队步兵占领清兵撤离后遗留下的阵地。由于道路的缺如、地势的险恶、尤其是极端的炎热，使得基隆法军的占领和部署新阵地遇到了许多困难，加上还要预防清军的反攻，因此孤拔深感兵力不足，认为他所掌握的步兵，在人数上仅足以维持在基隆已攻占的阵地而已，再要抽出一部分兵力去沪尾作战，确是很困难的。结果，孤拔只派"杜居土路因"号、"雷诺堡"号和"胆"号三艘军舰，并载了 300 名海军陆战队，于八月十七日（10月 5 日）驶到沪尾，去增援利士比。后来，卡诺批评孤拔

① 《中法战争》(3),第 238~239 页。
② 《中法战争》(3)，第 565 页。

的决策错误："孤拔提督未能将闲驻在基隆的三个步兵大队中的至少一个，拨归他的副手指挥，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这样的一种增援会特别使得利士比少将所担负的任务比较容易。不幸的是基隆方面须预防敌人反攻，而孤拔提督便不以为应当将如此有限的兵士放在一些情形不熟和准备不周的阵地上去冒险作战。这是一种错误吧？给利士比少将派遣一个大队并非绝对不可能的事吧？我们是有权这样怀疑的。总而言之，我们只要将由于占领淡水而来的结果加以考察，便可看到占领军的情况以后会如何不同。"①

得到增援后，利士比手下有了 7 艘军舰和 600 名海军陆战队。他将这 600 人编成一个分成五个中队的大队，担负登陆作战任务。这时天气突然变坏，海上波涛汹涌，法舰被迫驶离岸边。直到八月二十日，天气变好，海面很平静，登陆小舰可以驶近岸边，利士比决定执行登陆作战计划。法军登陆部队除了分为五个中队的 600 名海军陆战队外，还有两个携带电池和特为爆炸水雷之用的各种器械的水雷兵分队，每人携带一天的口粮和 120 发子弹。登陆部队的任务是：乘小艇到河流北岸的一个小湾靠岸登陆，从那里攀登上到达新炮台，将炮台里的大炮炸毁，随后向下朝旧炮台进发，将设置在旧炮台后面的水雷点火哨占领，使敷设港内的水雷爆炸，然后归舰。全部行程约为 6 公里，都有舰炮火力掩护，虽然如此，利士比还是告诫登陆部队要避免走进两座炮台之间的密林中去。登陆部队原拟由参加过基隆首战的马丁中校指挥，但马丁病了，临时改由没有陆战经验的"雷诺堡"号舰长波林奴指挥。

①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八月二十日上午 9 时，利士比命令满载登陆部队的小艇出动，接着，所有舰艇都向清军阵地开炮。法来格函称："观法兵开炮，实多奇异。凡见有华式衣冠者，不问为何如人，即以巴贝德炮向之轰击，而总不得一中，其炮弹则常穿入西人房舍。我辈西人惟以身不预诸战事，法兵必无加害之心以自慰，然视法人开炮向击之式，实无时不可使我西人中其炮弹也。"[①]

在这铺天盖地的炮火掩护下，登陆小艇很顺利地在预定地点靠岸，陆战队员涉水上岸，在海滨排列队伍。由原载在"拉加利桑呢亚"号和"凯旋"号上的 240 名士兵组成的第一、第二中队立刻展开作战队形，从新炮台右翼方向前进。在他们后面约二百米的地方，由原载在"德斯丹"号、"雷诺堡"号、"胆"号、"杜居士路因"号等舰上的 260 名士兵组成的第三、第四中队接踵而来，构成预备队。而由原载在"巴雅"号上的 100 名士兵组成的第五中队则担负着掩护左翼的任务，它就沿着这一方向前进。"这支小军队的军容颇为壮观，它以勇敢的自信向前进。它与其说是走的，不如说是跑的。它不久就在低洼多沙的长堤后面隐没不见了。它似是放弃了提督所明智指示的路线，它的热诚带着它直扑白堡，并不从红堡经过。它走入它应当避开的厚密丛林，已经看到它很近白堡了，在青绿的丛林中间，现出水兵们的白布帽。"[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由于法军盲目轻敌的结果，他们以为在法军舰炮密集炮火的轰击下，清军一定会跑得看不见影子，因此，在他们看来，"这次行动不过是一种军事的游行散步，一枪亦不用放的"[③]。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257 页。
② 《中法战争》(3)，第 569 页。
③ 《中法战争》(3)，第 572 页。

这时，就在法军前面的这块密林覆盖的地段中间，清军早已严阵以待了：孙开华督令擢胜右营营官龚占鳌带勇伏于假港，擢胜中营营官李定明带勇伏于油车口，以后营营官范惠意为后应，认守南路；章高元、刘朝祜各带本部及武毅、铭中两营官朱焕明等共四营伏于大炮台山后为北路，防敌包抄；张李成带所募土勇一营派守北路山涧。刘铭传告诫诸将："待敌薄我而后战。"[1]并悬重赏："杀敌一级者赏百金。"

很快，法军就走进一个林木覆盖的山谷，该山谷约有一公里宽，在这里，法军的各个中队乃至各个小队被浓密的树丛隔断，不再能保持紧密的联系。波林奴已不能统一指挥，只好由各个中队长独立行动，以那还可以看到的新炮台为目标前进。这时，穿着红色和蓝色制服、人数众多的中国士兵从新炮台后面的埋伏阵地中蜂拥而下，对法军包抄过来。虽然法舰马上以密集的炮火阻截他们，但他们仍不顾一切地向法军冲杀，很快就和冲在前面的法军第一、第二中队接仗交火，战斗旋即变得非常激烈。作为预备队的第三、第四中队几乎也在同时到达战场，第四中队立刻去增援第一、第二中队。第三中队却在它的正面发现了敌人，于是也开始枪战。由于地形困难而不能在左翼斜行前进的第五中队，已转而和第四中队汇合一起，向冲杀过来的清军射击。在一条长达1500米的阵线上，两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孙开华的擢胜营冲在最前面，由于法军火力猛烈，交战片刻，即已伤亡百余人，以致前队稍向后退。正在危迫之际，章高元等将率淮勇大队直捣而进，刘铭传也亲手杀戮逃跑的士兵，将逃兵止住，交给一个姓朱的哨官率领。朱哨官看到

---

① 《中法战争》(3)，第152页

法军猖獗，“乃尽裂其衣服，袒身衔利刀持炮狂呼轰击而进，其属五十人亦大呼驰进，遂衷敌师，裂其阵。比罢战，朱哨官血淋漓满身，不可睹面目”[①]。孙开华见援军到来，勇气倍增，亲率卫队奋勇直前，阵斩法军旗手一人，并夺取法军军旗。清军将士见敌旗被夺，士气更高。

当前队清军与法军紧张厮杀时，张李成率所部土勇抄至法军后面，埋伏在山坡的草丛中，个个赤身散发，口嚼槟榔，吐出红沫润其口唇。一等敌军退后近来，持枪的200土勇就以右脚作支撑架枪，跷起左足，以脚扣动板机射击。法军只闻枪声，却看不到人，都惊骇以为遇着鬼神。未等他们清醒过来，其余数百土勇又披头散发，手持刀矛，怪叫着从草丛中跃起，冲杀过来，配合前面的清军围歼法军，杀得法兵鬼哭狼嚎。

由于清军冲锋猛烈，法军只得急速射击，波林奴发现弹药消耗太快，原想下令停止射击，但号手已受伤倒下，他只得发布口头命令，可亢奋的士兵听而不闻，未能放慢射击速度。在激战中，第一中队长方丹上尉、第二中队长德荷台上尉、第三中队的笛玛少尉都中弹负伤。法军发起的几次冲锋，也都被清军击退。最后，法军的弹药快要用完了，一个信号兵奉命登上港口灯台的石柱，用手臂向军舰发出信号：“弹药用罄，损失重大，我们非撤退不可！”在得到允许之后，法军由第一、第二中队殿后，陆续向海滩撤退。“鲁汀”号驶近海滩，开炮狙击尾追而来的清军，掩护法军撤退。法军退到海滩后，发现风浪太大，登陆小艇无法靠岸接应，败军只好涉过齐脖深的海水爬上小艇。登陆艇驶近军舰时，海浪更加汹涌，这些虽然没能

① 《中法战争》(3)，第150页。

难住健康的士兵，却给伤员在登舰时增加了许多痛苦。第一中队长方丹上尉被清军的一颗子弹打伤了脚，不能行走，只得由三个士兵轮流抬着，跟在大队后面撤退。却被埋伏在草丛中的张李成部下用装有长柄的铁钩叉钩住衣服，跳出来杀死包括方丹在内的三人，只逃走一人。第二中队长德荷台上尉为清军击伤脑部，虽然被士兵救回，不久终因伤重不治而死去。慌乱中敌船因救护败兵，开炮乱击，自行击伤小艇一只，其所遗格林炮一尊，亦为我军所获。

当交战时，法来格在高处目睹战事经过，他函告赫德称：十月初八日，即中国之八月二十日，法兵登岸约在六百名八百名之间，连战四点钟之久。时孙总镇率兵一千二百名，并土勇二百名，力将法兵御退。按此战之详细情形，惟时法有大铁甲战船二，即加利孙也与德轮凡得；带有铁甲之次等木战船二，一名杜盖都音，一名德拉革；铁甲大炮船一，名沙多伦挪；铁甲炮艇一，名维伯；外此又有一极大载兵之木战船。于初八日早八钟半时，法兵始下大战船，分上诸小船，迨九点钟，以上法船皆由旁开炮轰击。时法兵登岸，分为三队，一顺沙滩整队南行，直扑华军炮台；一整军北行，一整队向内地行。孙总镇督军而出，亦分为三，与法兵对，每一军以一总镇统之，皆列阵于沙堤高下崎岖之处，其军为丛密小树遮蔽者殆半。法兵进至枪弹可及华军处施放枪弹，旋即退去，一任华兵冲出，法军如是布置，其自遗之患实非鲜浅，缘时华军张两翼而进，胆力坚定，步武整齐，不少退缩，以来复枪夹攻法兵，连施不绝。法兵竭力抵敌，志在前进，初不料俨然不动，概无少退。法兵皆持来复枪，并多带有轮旋施放之新式炮，加以法船皆开炮相助，乃力战四点钟之久，法兵终不获已而退，此时尚皆竭力携

扶死伤，回至诸小船内。华军尾追至岸时，法船向华军开炮，反自毙法兵数名，并自击沉二小法艇。至过午之一钟半时，战事皆毕，岸上遗有20法兵尸[①]。法来格的描述虽不甚准确，却也表达了对于沪尾清军的赞赏心情。刘铭传曾奏称：当日，“沪尾英人登山观战，拍手狂呼，无不颂孙开华之奋勇绝伦，馈食物以鸣欢舞”[②]。“此次接仗实为非常恶战，海关英人皆为啧啧”[③]。

事后法方统计，据说法军伤49人，死17人，总计66人；清军死80人，伤200人[④]。这与刘铭传奏称“孙开华部下中后两营，首迎其冲，鏖战最久，战士多伤，阵亡哨官三员，伤亡勇丁百人，其余各营弁勇俱有伤亡”的情形相近[⑤]。战后，孙开华函报彭楚汉称：“二十日辰刻，法人在沪尾四路上岸，经我军拦头迎击，孙军门亲自督队，士皆用命。至午刻法人败北，我军乘胜追逐，斩馘甚多，夺获旗帜并格林炮数尊，逐至海边，法寇逃上小船者，又因潮涨风狂，覆去四船，全行溺毙。是役也，擢胜营哨弁勇丁伤亡二百余人，法人在岸、在水死亡约有五六百人。”[⑥] 则夸大了法军伤亡的数目。

沪尾一仗，清军战胜，法军挫败，其原因何在呢？

清军的战胜，无疑是前敌将士孙开华、章高元等人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结果。他们愤恨侵略者的嚣张猖獗，在接仗前，冒着法军密集的舰炮，镇静埋伏，严阵以待；在接仗时，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261～2262页。
②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三，第11页。
③ 《中法战争》(5)，第580页。
④ 《中法战争》(3)，第571页。
⑤ 《中法战争》(5)，第578页。
⑥ 《中法战争》(3)，第239页。

又不畏法军的急速射击和法炮的狙击，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将法军击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应该指出刘铭传的筹谋帷幄和李彤恩及时堵口布雷的重要作用。

至于法军失败的原因，罗亚尔只简单地归结于参战的登陆部队的素质不高。利士比指挥的600海军陆战队，多是“在舰上做管储藏室和舱面的水夫、管桅樯的助手的事情的老实人，仅给他们以克罗巴失克式枪并不足以使他们成为步兵”。这些缺乏正式陆战能力的水手，在不到一个小时便消耗掉随身携带的120发子弹，终至招致败挫[①]。这等于是批评孤拔任人不当。

卡诺的总结则较详尽，除了重申罗亚尔关于登陆部队的素质不高的原因外，他还指出了登陆部队人数的不足及缺乏战术经验等原因：“没有任何前卫来保护战线的向前运动；不曾有过准备，便冒着那些埋伏着且有坚强掩护的中国狙击兵的射击，将战线投入一片困难而又未经探查过的土地。当刚刚组成战斗队形时，便表现出缺乏统一指挥与团结力。在这混乱中开始的射击，出乎指挥官意表地将预备队过早地投入战线。”等等[②]。这些似乎都是批评波林奴的。

当法国政府审阅关于沪尾之战的详细报告后，海军部长曾致电孤拔，批评利士比指挥上的错误：仅仅为了消灭清军的水雷点火哨，并没有必要让我们所拥有的小小部队穿越一公里的树林和荆棘地带，也就是说，没有必要让他们完成一项最艰巨的任务夺取树林，然后加以砍倒，以便去破坏哨位。我也不了

① 《中法战争》(3)，第572页。

②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解什么原因使利士比准将决定上午 9 时才在低洼的沼泽地登陆，这就使我们的敌人十分容易地看清我们的准备工作，从而做出部署。预定的袭击只有出其不意才能成功，而这次偷袭本应在黎明时分进行的。因此，在我看来，从要达到的目的来说，作战计划订得不好，而计划的执行也有问题[①]。这是指责利士比的。

关于沪尾战胜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去理解。

虽然沪尾之战与两次基隆之战相比，都显得较为激烈，但与黑旗军、援越桂军在越南北圻与法军的多次鏖战相比，则还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但是，由于它的特殊历史背景，使得它无论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在台湾近代抗法战争史和中法战争史上，都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战胜之后，刘铭传根据孙开华等人的禀报及开列名单，于八月廿四日（10 月 12 日）上奏清政府为有功将士请奖，并特别附片声明："现值援绝饷绌，惟恃此重奖以励人心，不能不稍从其厚。是以均照原请上闻，未能遽加删减。"[②] 由于当时通讯阻滞，清政府要迟到九月中旬才能接阅此奏，而在此之前，清政府已从其他渠道得知沪尾战胜的消息，并决定重奖台北抗法有功将士。

九月十一日（29 日），"有旨将刘铭传补授福建巡抚，仍驻台湾督办防务"[③]。这不但是刘铭传个人仕途的重大转折，也是清政府更加重视台湾抗法战争的反映。

在接阅刘铭传的捷报，了解作战的详细经过后，清政府下

①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53。
② 《中法战争》(5)，第 580 页。
③ 《中法战争》(6)，第 10 页。

旨普赏有功将士。孙开华先是加恩赏给骑都尉世职，十一月初八日（12月24日），又著派帮办台湾军务，后并实授福建陆路提督；章高元交部从优议叙；总兵刘朝祜赏加提督衔，提督龚占鳌著赏穿黄马褂；总兵李定明以提督记名，赏换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与提督朱焕明均著交军机处存记，遇有各省总兵缺出先行请旨简放；游击范惠意、孙光治均著免补游击、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范惠意并赏给额腾依巴图鲁名号；副将毕长和、陈永隆均著以总兵记名简放；总兵梁秉成著赏给克勇巴图鲁名号，并赏加提督衔；沪尾营守备肖定邦著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军功张李成著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赏加都司衔；陈振泰、黄国添、蔡国梁，均著以千总尽先拔补，并赏加五品蓝翎；从九品刘恕著免补从九品县丞，以知县留于福建补用；慈禧太后并发去内帑银一万两，赏给此次出力兵勇①。这些奖赏成了鼓励台北抗法将士士气的有力因素。十月间，张之洞所遣云骑尉白维桢到台北住了17日，回粤后报称：台北抗法“将士奋发，土勇甚好，人人思战，不畏法虏”②。特别是张李成从布衣白丁被破格提拔为都司衔守备，对于日后号召大批土勇参战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沪尾大捷是台湾抗法战争的里程碑，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沪尾战胜还改变了中法外交谈判的形势。当法军攻占基隆后，一时谣传沪尾也已失守，法方利用中方消息不够灵通的弱点，在占据基隆后，尽量宣传法国据地为质的决心③。九月初九日（10月27日），法国政府以“遥想台北一带，恐已被法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457页。

② 《中法战争》(6)，第236页。

③ 《中法战争》(7)，第269页。

人进踞”为由，通过德璀琳向清政府提出四条谈判条件，除仍照津约外，还要挟中国同意“法国要在淡水、基隆暂管煤矿、海关若干年”。否则，中国要赔款给法国[①]，始终不改其勒索中国的初衷。但当茹费理接到巴德诺通报淡水挫败的消息后，于10月11日向中方提出议和条件，就强调：“赔偿字样不再提及。”

等到清政府接阅了刘铭传的奏报，得知沪尾战胜后，对法态度立刻改变。九月十七日（11月4日），当赫德再来总署催问对法国所提四条的答复时，总理衙门表示明确的拒绝：“大约是不能行。”赫德转换口气说：“法相茹斐礼对人说，现若仍照津约办理，即可了事。”总理衙门答复：“津约已作废纸，你此节略内，批准津约一语，恐仍难行。”[②] 不稍妥协。九月二十三日（11月10日），军机处拟通过英国作调停人，向法国提出八条议和条件，其中就包括：酌改津约，中法驻兵北圻，法国取消保护越南名义，立约中应以中国文字为主，中国免索法国赔款等内容[③]。俄国外长则“把台湾作战比作蜂螫象背”，对于法国的侵略目的“不能有所成就”。中国对战争前途充满希望，好像中国相信继续作战“可以使法国疲劳”[④]。这说明，沪尾战胜改变了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的被动地位，加强了它的抗法信心。

沪尾的败挫，对于法国政府和侵台法军则有着悲剧性的影响。

---

① 《中法战争》(6)，第5～6页。
② 《中法战争》(6)，第95～96页。
③ 《中法战争》(6)，第102～103页。
④ 《中法战争》(7)，第286页。

沪尾的战败，大大挫伤了侵台法军的士气，利士比就不用说了，即使孤拔也将沪尾视为畏途。他连连电告巴德诺称："仗打得不好，我们没有得到什么不得了的利益"。"淡水失败严重"。"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①。罗亚尔写道："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人们可以说，这次的登陆作战不过是一种简单的侦察，这样说以减少这次事件的严酷性。侦察或否，都不管，这总是一次失败。"② 当法国政府指示孤拔考虑再次进攻沪尾，进而占据整个台北乃至台湾全岛时，孤拔答复：当此东北季候风时节，不可能再从水路进攻沪尾，而只能在外海军舰的掩护下，从基隆出发作陆上的进攻。进行这样的行动，必须至少派遣步兵 3000 人、山炮兵两个中队、工兵一个中队、军需人员及对于 6000 兵员的补助员等，以上各项并不包括已通知派遣到基隆的亚非利亚大队在内，同时还须假定海军步兵各大队的兵额均已补充完备。力不从心的法国政府在这些要求面前退缩了，"如此规模的兵力扩展被法国政府认为是不可能之事，对此问题加以一番审议之后，法国政府乃将进攻淡水的行动予以延搁，并嘱提督暂以占领基隆附近的矿山为满足"。其实，这是放弃进攻沪尾的一种遁词，"十月八日对淡水所作的企图，永不再试了。而且中国方面在那里坚强地筑了防御工事，派去了很多的军队。我们的战舰留在河口前面，仅仅封锁港口而已，就这样，直到和约签订"③。沪尾的败挫，不但完全抵消了法国占据基隆的胜利，使之变成了不能扩大战果的徒劳之举，更因为沪尾清军的威胁，使基隆变成套在法国

① 《中法战争》(7)，第 266～267 页。
② 《中法战争》(3)，第 572 页。
③ 《中法战争》(3)，第 573 页。

舰队脖子上的大石，牵制了它的进一步行动。孤拔多次指出：基隆的占领，对于中国政府的决定将不能有所影响。可是由于淡水败战而势在必行的对于台湾的封锁，却将使我们的大部分舰艇受到牵制[①]。“基隆及其矿山的占领，根据孤拔提督的意见，是既不能作为军事行动的根据地，也不能作为认真的保证占领。即使我们占有了淡水以及基隆、淡水间的整个地域，我们也只能从这项占领上取得一些和必要费用不成比例的利益。中国会在这一带地方和我们不停地作战，至于目前，准备激战的敌人，其主要目的也许不在将我们逐出基隆，而是要迫使我们将海陆军都固定在这地方；因为我们的海陆军在中国其他地方会更加有效地使敌人受到威胁，敌人便竭其所能地将我们牵制在这地方”[②]。于是，在占据基隆三个月后，认为得不偿失的法国政府和孤拔不得不考虑自动从基隆撤退的问题。法军占踞基隆是为了实施“踞地为质”，借以讹诈和勒索中国赔款的政策。沪尾的败挫，使它不得不放弃对基隆的占据和赔款要求，从而宣布这一政策的完全破产。

法国借“观音桥事件”与中国起衅之始，曾将战争重心放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即由孤拔舰队攻占基隆及整个台湾，讹诈和勒索到中国的巨额赔款。沪尾的败挫打破了法国政府的如意算盘，加上援越桂军在北圻的进攻，迫使法国政府拒绝了孤拔为了进一步行动而要求增援的3000军队，并把战争的重心转移到越南北圻，从为勒索赔款而战变为保护北圻而战，战略上的这种巨大转折，说明法国政府已默认侵台战争的失败。

①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②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三　基隆外围争夺战

基隆、沪尾战后，各有所得的中法军队都需要一个消化战利品的时间，于是战场上出现了难得的短暂休歇，利用这一机会，双方都为下一阶段的作战做了紧张的筹备。

乍闻基隆失陷之始，八月二十二日（10月10日），清政府有旨："基隆要地，岂容法兵占踞，著刘铭传乘其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并募彰嘉劲勇助战，将敌兵悉数驱逐。立功者予上赏，退缩者即正法。"[①] 后来并多次有旨催促刘铭传收复基隆。十月二十九日（17日），奉旨督办福建海疆事务的左宗棠到达福州之始，就受刘璈等人的谎言所惑，以为台北形势是敌弱我强，也上奏清政府要刘铭传出兵与基隆法军作战："伏查法夷犯台兵不过四五千，船不及二十艘；我兵之驻基隆、沪尾者，数且盈万，虽水战无具，而陆战则倍之。抚臣刘铭传系老于军旅之人，何以一失基隆，遂致困守台北，日久无所设施？"[②] 其实，他们都只是从表面上来看问题，并不了解台北抗法清军的真实情况。

刘铭传所以不能立即挥师收复基隆，起码有如下几个原因：

1. 没有掌握足以收复基隆的人力和物力。沪尾战后，经过多方添募土勇和增调防军，台北抗法兵力增至约一万二千人，但却须分防四个地方：首先是沪尾，由孙开华、章高元、柳泰和等淮楚七营、土勇三营约五千人驻守。其次是基隆外围，由曹志忠六营、苏得胜、林朝栋等土勇五营约5500人防

① 《中法战争》(5)，第576页。
② 《中法战争》(6)，第179页。

守。此外，由刘朝祜所部800人和土勇200人共1000人驻守台北府城，由游击张得贵率土勇300、并练勇200共500人防守新竹。兵分力单，不能集合为一支有力的打击力量。

由于当时疫气传染台北，军民俱病。章高元所部两营1000人，伤亡病故后只剩200余人；曹志忠所部六营3000人，除去伤病，能战的精兵锐卒不足四成，只有千余人。各军的统领营官也大多染病，“提臣孙开华、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总兵柳泰和俱抱重病，曹志忠六营营官无不病者”。“传亦抱病，岌岌可危”[①]。以至刘铭传后来提及，仍心有余悸：“其地瘴烟风雨，寒燠不时，将士随臣身临前敌，死于战阵者十分之一，死于瘴疫者十之四五，其幸而存者，类皆瘴疠锋镝余生，恍如再世。”[②]这又大大削弱了防军的战斗力。至于土勇数虽不少，皆新募而成，既无精械，又没训练，并未具有多大的战斗力。加以军火不足，到九月时“洋火药已缺”。十一月时，“炮弹枪弹无多，一旦用尽，无以御敌”。凡此种种，使得刘铭传不具备收复基隆可能性。所以刘铭传于十月间致电清政府，申诉不能进攻和收复基隆，只宜固守待援，相机防剿的原因：“将士伤病之后，气衰力竭；土勇有胆耐劳，只能倚山守险，难当大敌，法兵增即难支持。旨令迅复基隆，精锐无多，难以力取。敌有兵船守护营垒，攻固难，守尤难。兵情不能稍挫，一败不可收拾，惟相机防剿，期保危局。”[③]

2．人心浮动，内部不稳。隐伏在清方内部的门户派系之见，以刘铭传撤出基隆一事为契机爆发出来。与刘璈关系较深

① 《中法战争》(4)，第217页。
②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九，第60页。
③ 《中法战争》(4)，第219页。

的台北知府陈星聚等，先是瞒着刘铭传，向刘璈密禀撤离基隆的种种不是，为刘璈攻讦刘铭传提供材料；接着，他们又不计“饷项军械之有无”，违背刘铭传的意思，胡乱添募土勇，以至闹饷鼓噪，差点酿成大乱；最后，陈星聚在多次禀请刘铭传进攻基隆遭拒之后，暗地里又去怂恿曹志忠孤军作战，直到九月十四日挫败以后，才逐渐老实下来。

就在台北形势危急之际，台湾道刘璈也赤膊上阵，撕下伪装恭顺的假面具，一次又一次地向刘铭传发难，制造各种难题，企图把水搞浑，增加刘铭传的压力。

如他不顾台北饷项支绌，绕开刘铭传，擅自给台北抗法各军加饷，从而给刘铭传增加压力。刘铭传在《严劾刘璈折》中指出：上年八月十三日基隆退守之后，台北饷需奇绌，该道不独丝毫不济，忽于八月二十日咨行署提臣孙开华、曹志忠等，据称台北12营俱自六月十六日起加足夫价192人，当经臣商将孙开华三营自七月初一日起支，其余自八月初一日起支。该道明知台北无饷，意在诱胁各营噪饷哗溃，危及刘铭传[①]。

其次是抓住刘铭传撤出基隆一事，与左宗棠等内外勾结，大造舆论，“到处谣诼”，“左相反据刘璈禀奏，先催进攻基隆，欲挤台北速失”[②]。

刘璈还按兵不动，见死不救，顽固地违抗清政府的明确朝旨，不肯派兵援助台北军民的抗法战争。本来，在前引八月二十二日朝旨指示刘铭传与刘璈“合队攻剿”，就包含有将台南防军抽调部分到台北助战的意思。但刘璈却在九月二十九日

①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一〇，第3～4页。

② 《中法战争》(6)，第241页。

(11月16日）上奏，拒绝这种安排："台南合前后中共支应四路，计大小三十营，各路犹以地阔兵单，纷纷请添防勇，势不能不酌予添招。"① 既然台南兵勇尚且如此紧缺，援应台北就无从说起了。

十月初三日（20日），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澄上奏，提出解救台北危机的办法，其中就包括："闻台南旧有防勇三十营，兵力尚不甚单。刻下法人全力专注台北，似台南各口防务稍松，请饬杨昌浚檄令台湾道刘璈酌拨数营，由陆路前往台北，以资策应，毋得稍分畛域。"② 这些奏词虽然语气平和，内里却包含着很深的谴责意思：当时刘铭传已被实授福建巡抚，台湾道是他的下属，应该听从他的指挥，现在却要由更高一级的闽浙总督来发号施令，不是明摆着出身湘系的台湾道不以国事为重，不肯服从出身淮系的福建巡抚，策应台北的抗法战争吗？所谓"毋得稍分畛域"，实际是说"畛域严重"。因此，这份奏折其实等于是委婉参劾刘璈。但是，闽浙总督杨昌浚似乎并不在乎，上奏继续偏袒刘璈，拒绝施加影响以使刘璈拨兵北援："台事可虑，半在法寇，半在堂属不和。刘璈布置不错，刘铭传恶之，若易生手，恐台南不保。"③ 靠山既然如此护短，刘璈更加有恃无恐，根本不再考虑与刘铭传合队攻剿基隆法军一事。刘铭传只是在十一月因防守新竹需要，以"现在台南防务较松，已檄刘璈酌拨一营前来协守，以顾要区"④。还不知道实行了没有。

---

① 《中法战争》(6)，第139页。
② 《中法战争》(6)，第146页。
③ 《中法战争》(6)，第230页。
④ 《中法战争》(6)，第197页。

综上所述，可见在撤出基隆之始，就出现了李鸿章所曾提出过的：以武臣为督师，容易为地方各官掣肘，“督师者号令黜陟，不能必行”的情况。只是在清政府实授刘铭传为福建巡抚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最后，由于侦探手段的落后，刘铭传所得的敌情情报不准确，以至不但不能正确了解基隆法军的虚实，反而往往为其虚张声势所迷惑。

当时，刘铭传对于基隆法军的了解，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派人潜入基隆侦探敌情，他奏称：“现募勇士夜入敌营摸索，时有斩获。”[①] 二是收买法军营中雇佣的亚洲人。关于此事，刘铭传在十一月间曾详细报告清政府：“本月初一日，由暖暖土勇拿获奸细陈番婆一名，解至府城。臣当令释放，好言抚慰，赏给洋银，嘱仍回基隆，将所有奸细全数密为招致，旋即投出安南人十余名。并迭据番婆信称，安南通事并法船中国通事五人，暨本地奸细五十余名，均愿投诚自效。只以安南人分隶敌营，胁做苦工，防守甚严，不能同时逃走。臣以该通事等既愿弃逆归顺，正可留之敌中，以通消息，不必遽令全出，转致无用。现已密谕该投诚人等，不动声色，随时确探敌情，暗通信息。”[②]

显然，通过这两种办法，刘铭传得到的只是一些低层次以至不准确的情报。如他在九月间电称：初一法添船三只，装兵五百名，闻尚有续来者。十月十四日（12 月 1 日）电称：敌于九月二十五日（11 月 13 日）添兵四百五十。十月初六到小

① 《中法战争》(6)，第 216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209 页。

轮船七只，声言俟兵到齐攻沪尾。十月二十九日（12 月 16 日）又称：二十二（日）基隆到法船二只，添么罗黑鬼，声言尚有续到。直至十一月初九日上奏时，他还相信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惟据本月初二日投诚安南人四名供称，并船通事密报，法现至安南装兵，不日可到，嘱为严备等语。现彼族据基陆兵多病，三次共添来 1500 人，分守七营，皆依山靠海。其实，这些都是讹言，在此期间，基隆法军非但并未加添，而且由于撤出伤病员的缘故，还减少了几百名兵员。刘铭传误信这些假情报，以至对于法军的实力估计过高，对己方的力量则估计过低，一度悲观沮丧，认为自保尚且困难，遑论攻敌。曾电告清政府：敌势甚大，日内必有恶战，如十日外无电，则北不保。传同将士惟拼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台局不堪设想，可为痛哭！

此外，在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六日的奏折中，刘铭传还提到：他所以没有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浪费兵力去攻打基隆，内中有着养精蓄锐，与敌长期对峙的深意，“若听局外大言，轻敌浪进，上月初十日，孤拔添兵大举，战无策应之师，守无可据之险，必至一败不能立脚！”[①]

根据上述主客观的条件，刘铭传制定了固守待援，缓攻基隆的战略。他奏称：“法兵劳师远涉，利在速战，久亦不支。我军惟固守待援，相机进取。此臣因海岛孤悬，兵单器乏，接济为难，期保危局，不敢孟浪进取攻基隆之由来也。”[②] 事实证明，这是克敌制胜的正确战略，是法军最为害怕的。孤拔于

①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二，第 18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224 页。

1884 年 12 月 24 日致电法国海军部长叹称：至于目前，准备激战的敌人，其主要目的也许不在将我们逐出基隆，而是要迫使我们将海陆军都固定在这地方，因为我们的海陆军在中国其他地方会更加有效地使敌人受到威胁，敌人便竭其所能地来将我军牵制在这地方，从这最后的观点说来，最近的发展已使敌人感到正中下怀[①]。

根据“固守待援，相机进取”的战略思想，刘铭传将孙开华、章高元等精兵强将集中于沪尾设防，而除沪尾本身五千余兵力外，邻近的台北、新竹两处的约二千守军其实也是沪尾的后备兵力，一旦法军进攻沪尾，这两处守军很快就能驰援。同时，刘铭传还在沪尾加强海陆防御：海路是令把总张泽锦在海口添设浮桩 800 个，以防法舰袭击。陆路则令孙开华、章高元、柳泰和三将各据形势布防，并督修暗沟，安置地雷。这样层层布防，就给基隆法军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敌人将岛上所有的预备兵和在岛上登陆的援军全部召集到淡水。”在几个星期内，为着防备我们从海上去攻击，淡水竟成了一个非凡地设防和武装地域的中心[②]，迫使法军不得不最终放弃再次进攻沪尾的念头。

对于基隆外围的暖暖、深澳、六堵、七堵、八堵等处，刘铭传则派战斗力相对薄弱的曹志忠所部六营及土勇五营前去防守。其中，曹志忠亲率五营士兵驻扎五堵；派两营土勇分驻六堵、大武仑一带；苏得胜则率土勇两营驻防水返脚。暖暖的地理位置重要：“暖暖街离郡不及五十里，离沪尾止六十余里，

①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②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山后均有小路可通沪尾一口，为敌人所必争。”[①] 原有团董王廷理、周玉谦等所率土勇500名驻守，曹志忠又增拨300士兵前去助防，刘铭传也加派彰化绅士林朝栋所率500土勇前去协守，共同扼守与基隆九弓山法营逼近的隘口石梯岭、鸟嘴峰一带，深澳等处的各董也集练助防。关于他们的设防情况，卡诺写道：在曹志忠九月十四日（11月1日）的冒失进攻失败后，“认为恢复攻势作战并无利益的中国人，便采取一种更加适合于他们性格的战术。他们以如下方法对基隆做有计划的攻围：在占领一个阵地之前，他们必先在那里筑造壕堑；他们必先遮断谷地，封闭接近的峡路，占领山巅，然后向我们的阵地接近，但始终受着掩蔽”。

与此同时，基隆法军在做什么呢？

由于沪尾一战的惨败，冲淡了法军侵占基隆所带来的喜悦，而且在基隆法军头上笼罩了一层恐怖，使得他们非但不敢乘胜扩大战果，占领垂涎已久的基隆煤矿，二次进攻沪尾；还由于担心清军的反攻，而匆匆在基隆修筑防御工事，以图长期困守。卡诺写道：“在提督的卓越和勤勉的策动下，基隆在数星期内成了粮库和舰队的补给中心。改为防御阵地的它的附近各处，勉强掩蔽着军队以备敌人的反攻，幸而敌人在占领初期并不想怎样冒险。”

基隆法军的防御阵地主要分为三部分：

西方防御区。主要设在基隆港西岸的仙洞山一带，由清军原来修筑的三座炮垒改建而成。开始时曾派遣三个中队士兵，配备七门大炮防守，后来因为此处从未受到过清军的威胁，并

---

① 《中法战争》(6)，第391页。

且由于疾病的传播使守兵病倒不少，于是孤拔逐渐减少守军至一个中队士兵和三门大炮，只防守一座炮垒。

南方防御区。主要设在环绕着基隆外围的那些高山上：在南面斜坡中腰的一个清军遗留下来的防御堡里，法军改建成他们称为“淡水炮台”的主炮垒，在这个炮台的东南方和西北方的两座险峻山峰的峰顶上，各修一座装甲防舍以与淡水炮台互为掩护。这个阵地派有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海军炮兵分队及六门大炮防守。而在基隆市街南面的一所方形大屋子，则被法军改建成一个方形射击塔，由一个中队的步兵驻守，以保护基隆市区的安全。

东方防御区。是将清军遗留下来的，由一道铺有浅草的胸墙连接着的三座堡垒改建而成。其中被称为“A点”的炮台派有两个中队的士兵和装备五门炮，其余两个堡垒各驻一个中队的士兵，其中一个炮台只有一门大炮。

为了防守这些防御区，基隆法军用上了大部分的大炮和八个中队的士兵，以至可以用于防御区以外的军事行动的机动兵力，就只剩下四个中队步兵和四门大炮了。这种部署，说明法军已由侵占全台变为只固守基隆一隅之地。兵力的严重不足，使得法军的“踞地为质”方针大大打了折扣，以至变成微不足道。

法军的参谋部、勤务部、宪兵队、海军陆战队的预备中队、医院、炮兵厂等部门，都住在基隆街上的欧式住宅区里，海关内的一栋房屋则成为孤拔及其僚属的宿舍。为了防止抗法军民的武装袭击，法军还焚烧和摧毁了众多的中国居民住宅。法军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港务部。

正当法军忙于在基隆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碰上

了一个远比台北抗法军民的武装抵抗更为可怕的敌人——由于水土不服而发生的各种疾病。卡诺写道：一段时间以来，基隆法军纷纷病倒死亡。他们死于什么疾病呢？死于赤痢、一般衰弱、伤寒症等，但尤其是死于一种被医生称为“森林热”的怪病，这种被人叫做“病”的寒冷的发作，人们都归咎于当地溶解有植物性物质的饮水中毒。这种病由激烈的头痛、晕眩、呕吐开始，随后便突然发热，伴随着关节部的疼痛、全身衰弱、精神错乱、恶寒，以至死亡。病的全部发展每每只需数小时的时间，因而有人早晨还是壮健的，午后却已经死去，连将他送入医院的时间都没有。

疾病最初发生在西方防御区内，该地的守军立即死亡多人，以至孤拔不得不将其中一个炮台的守军全部撤退。接着，疾病蔓延到其他法军阵地，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初，法军已病死11人，住院56人。到九月中旬，又有17人死去，52名重病者需要运送到西贡去治疗，350人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执行军事任务。再过十天，又病死了16人，住院生病的士兵有136人，需要休养的士兵229人。到十月中旬，有26人病死，住院病兵增至220人，休养兵增至260人。到十一月初，有23人病死，法军能够作战的兵力已减少到不足1000人。到十二月，又有12名士兵病死。到光绪十一年一月，法军病倒91人，其中31人死亡。总计在侵占基隆期间，法军共病死了135人，远远超过他们在作战中阵亡的人数。

当基隆法军忙于布置防御阵地和对付疾病的侵扰时，就无力对基隆外围的抗法军民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了。

虽然刘铭传力主“固守待援”，但是，迫于上下的压力，他也不去强硬制止部下要进攻基隆的冲动，以便能够有机会用

事实来证明自己决策的正确性。于是，便有了九月十四日曹志忠部进攻基隆法军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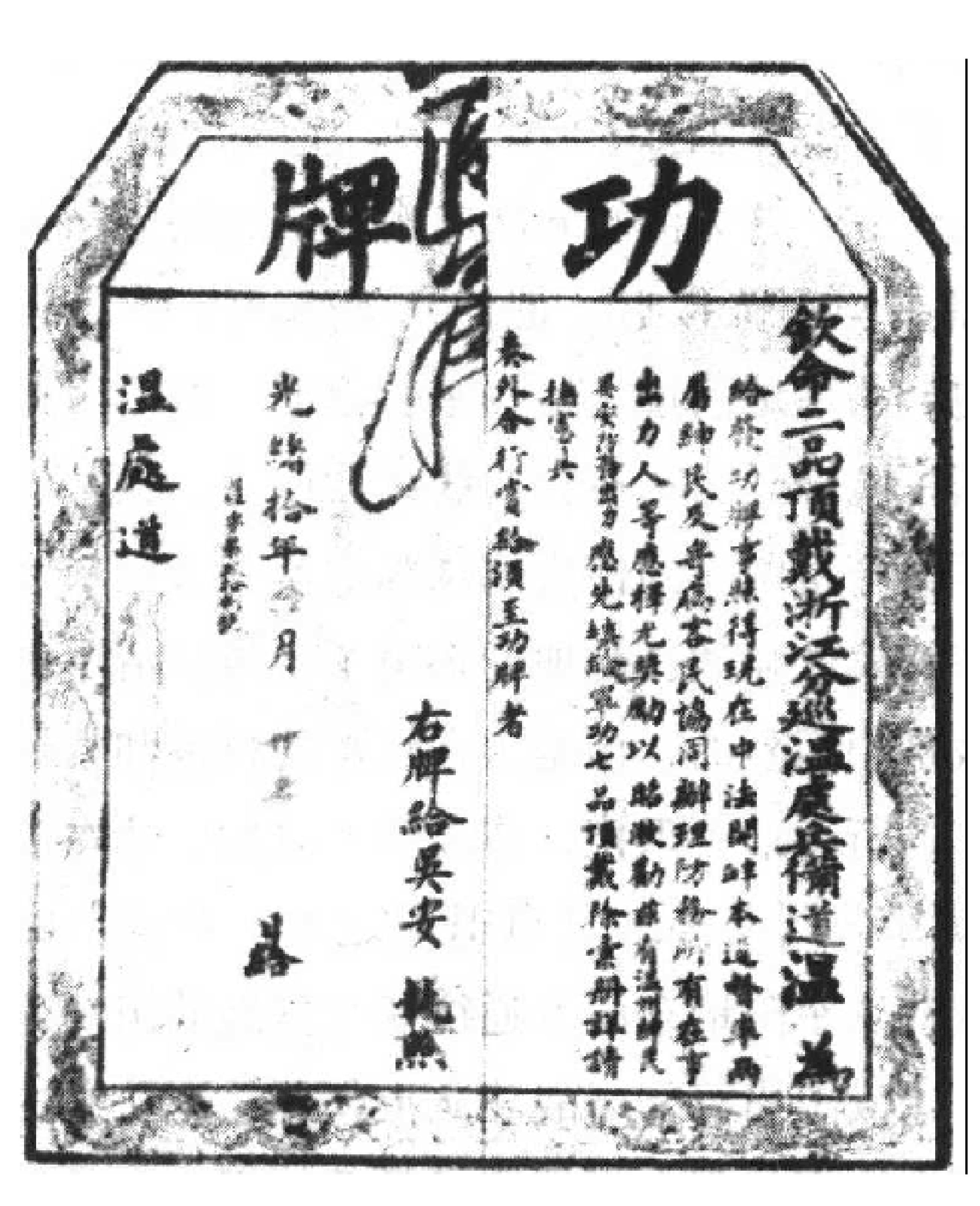
事情是由急于收复基隆的台北知府陈星聚引起的。陈星聚大概侦知仙洞法军染病撤退的消息，“妄听谣言，谓基隆法兵病死将尽，又谓业已退去上船”。在多次面禀请求刘铭传进攻基隆均遭婉言拒绝的情况下，就转而去怂恿驻兵水转脚的曹志忠，“并以危言激之”。曹志忠原为基隆守将，有守土之责，虽然撤离基隆是奉命行事，但内心可能并不好受。加上由于对近代战争规律缺乏了解，不能正确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听了陈星聚的话后，一时愤急，不经请准刘铭传，遂于九月十四日率领本部能战将士 1000 余人前去进攻基隆法军。刘铭传大概对此也不会毫无所知，但也不作阻拦。

卡诺记载此次战事称：这天清晨 6 时左右，法军南方防御区的哨兵报告有大批中国军队接近，他们从淡水河转弯处出现，朝着通往淡水炮台的各地前进。当法军吹起作战的号声并且展开射击时，中国军队绕开法军右翼防线继续前进，他们的首要目标似乎是法军因守备队受到传染病蹂躏而于三天前放弃的一个炮台，这一特殊事件显然已被他们知道了。虽然清军对于淡水炮台的奇袭战是很猛烈的，但是，在法军的排枪和大炮的猛烈打击下，清军的行动遭到阻挠，作战半小时后，清军放弃了他们的包围行动并向西南高地寻觅退避之处。在同一时刻，另一股清军出现在法军阵地东南方通往淡水盆地的山峡顶上，他们人数众多，遮满了山峰并以战斗队形朝着法军防线的左翼前进，这批清军在法军的狙击下受到了显著的损失，最后也只得退却了。

清军的进攻虽然在整个防线上都受到阻挠，但他们并不因

此就停止进攻。到 7 点钟，他们又对被称为“鹰巢”的法军据点发动进攻，甚至将一门轻炮拉到距离法军据点 200 米的地方射击。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清军显得非常勇猛，有着法军前所未见的勇气和自信，以致法国阵地一度遭到完全的包围。但是，由于法军的顽强抵抗，而别的据点的法军又以炮轰和枪击来作火力支持，并派出援军前来。清军经过半小时没有效果的努力后，终于撤退了，他们边战边向南方退走，借着丛林和高低起伏的山岭掩护而消失了踪迹。法军则直到 10 点钟，才停止射击。

事后，刘铭传奏称：“曹志忠于九月十四日三鼓，率队欲趋狮头岭，袭取九芎坑敌营。山高路险，为敌知觉，该军甫至山下，敌即开炮，立刻伤亡四十余人。该镇见敌有备，遂收队退回，后经臣饬令稳扎五堵，扼守水陆要隘，不得轻进。”他认为清军失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武器落后，尤其是缺乏攻坚利器——新式西洋大炮，因而不能压制对方火力的结


功牌

欽命二品頂戴浙江分巡溫處兵備道溫 為

奉外合行賞給須至功牌者

右牌給吳安 執照

光緒拾年 月 日

溫處道

浙江海州兵各道颁发的抗法立功人员奖状——功牌。

果。通过这次进攻失利，他更坚定自己“固守待援”的方针，“臣屡于该镇等三令五申，不必图攻轻进；若为基隆一隅之地而失台北大局，获咎更重”①。而法军在战斗中据说仅负伤一人。

法军得胜以后，即于第二天派出一支由四个中队法军组成的轻装部队，离开基隆去侦察淡水盆地。这支部队行进至离法军阵地约八里的七堵地方，与驻守在这里的清军遭遇，相互射击一阵后，法军不受任何损失地回到基隆。刘铭传奏称：“敌于十五日即渡河耀兵七堵。”

八月二十二日，张之洞曾致电刘铭传，提出一个对付法军的办法：“洋兵最患夜战，不得眠息，若分（兵勇）为十余起，分路更番，日夜扰敌，疲其兵力，耗其子药，数日法必困，官军乘乏，然后可胜。”② 现在，明攻既难获胜，又无坐视敌人在基隆从容布置的道理，于是，刘铭传便实施张之洞的办法，“现密选勇敢之士，悬以重赏，乘夜袭其边营”③。又奏称：“嗣后练勇恃有山险，愈守愈壮，乘夜潜入敌卡，不时馘获敌首以归，皆经照章给赏。”④ 至于赏金数目，中方资料没有记载，法方资料则称：中国的将军们都悬赏征求法国兵的首级，每一个兵士的首级赏银 50 两，即比 350 法朗略多少许⑤。如果这个说法可靠的话，则比沪尾之战中所悬赏金数目少了一半。

---

① 《中法战争》(6)，第 223 页。
② 《中法战争》(5)，第 576～577 页。
③ 《中法战争》(6)，第 198 页。
④ 《中法战争》(6)，第 196～197 页。
⑤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这种夜袭行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卡诺记称：还在法军初占基隆不久，当原来由中国人居住的市街在居民撤离后，“夜晚则只有敌人的游击队进出，企图袭击我们的步哨”。直到1885年1月，清军游击队仍经常出没法军的西方防御线，“并且这时如果兵士单独走出阵线以外，比从来都要危险。因为敌方的游击队一直前进到了社寮岛。港务指挥所的两个水兵受到一个妇人的阴谋引诱，被割去了首级。尽管戎克船从社寮岛经过时日夜受到监视，并且所有的舢板日落后都被看管，但敌方兵士仍旧泅水到岛上来劫掠民家”。

在刘铭传的奏报中，曾提到台北义勇中营营官张仁贵，“本系宜兰巨盗，经曹志忠设法招致来营，选带精壮二百名，屡告奋勇，夜袭敌营。奈山高路滑，两次袭取，未能得手”①。在卡诺的书中，记载了清军游击队两次袭击法军阵地的经过：11月3日（九月十五日）午前，一群相当多数的敌兵前来进攻庙宇，守备兵任令敌人前进到相距约20米的地方，然后以迅速的射击迎击敌人。发狂般的敌人消失不见了。若干日后，他们利用一个黑夜，把一箱火药靠住大门放着，并在那上面点上了火。幸而守备兵都是惯于战阵的，听到哨兵告警的叫喊每个人就走上他的战斗岗位。院子里冒着浓烟，守备兵列队站在最初以为是墙上的一个破孔后面，枪上装好火药，插上刺刀，等待着行动的时刻，中国人却消失不见了。大家定下心来一看，门还仍旧立着，仅有一部分屋顶已经炸坏。

法军从清军的不断攻扰中，感到“敌人显然已在从事新的计谋，而这非迅速认识其力量和性质不可”。于是，法军也不

① 《中法战争》(6)，第279页。

断派出侦察队来侦探清军阵地。

九月二十四日（11 月 12 日），法军派一个中队的步兵到基隆附近的一块谷地去侦察，在这条谷地尽头一道瀑布附近，突然发现有清军新近设置的阵地，这是一道设在一个四周似乎无法进攻的险峻之地的壕堑。法军突然受到清军步枪的射击，他们虽然也以枪还击，但终于撤回基隆。

第二天，法军集合了所有能够调动的兵力，包括四个步兵中队和一个炮兵小队，组成一个比较强大的侦察队，再次去侦察清军的阵地。法军在高高的野草和厚密的林木间异常艰苦地步行两个小时后，才接近距离基隆约两公里的一个清军阵地。法军侦察队的前队立刻遭到清军的迎头痛击，但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法军赶忙占据了左侧附近的高地，在那地方架设大炮轰击清军。但是，这时天色已晚，并有下雨的征兆，加上在六堵和水转脚两处有清军援兵过来，法军不能继续行动，只得就地宿营。二十六日（14 日），法军继续在复杂的地形中艰难地行进，但跋涉一整天都没能找到清军，只是破坏了清军留下的一些工事。露宿了两天两夜的法军，于二十七日（15 日）精疲力尽地转回基隆。这次行动，法军有三名官兵受伤。刘铭传奏称："九月二十日以后，法人连攻暖暖三日，均经周玉谦等守住要隘，伤毙法兵十余人，并毙其三画兵酋一名，土勇亦伤亡十余名。"[①] 则可能夸大了战果。

法军的这些行动并没有吓住清军，清军继续进逼。卡诺写道：在这时期，业已恢复自信的敌人，逐渐接近了法军的阵地，在"鹰巢"对面，有一个位置在东南方 300 米地方由岩石构成

① 《中法战争》(6)，第 196 页。

的高地，显出一颗牙齿的形状，而其断崖朝向北方，其比较缓和的南方斜面则完全逃避了“鹰巢”的视界。这齿形高地以约二十米的高度监视着驻守“鹰巢”的法军。这是天生给清军设置监视哨的地方，清军利用了它，建成一个由一道胸墙形成一个三角形围廊的堡垒，清军称为鸟嘴峰阵地。法军虽曾派出军队去驱赶清军，但等法军撤走后，清军又立刻重新占领该阵地。

为了彻底驱逐这上面的清军并摧毁其阵地，十月二十五日(12月12日)，法军派出由330名精悍士兵组成的队伍，去进攻鸟嘴峰清军阵地。清晨6时，100名法军组成袭击队，悄悄地直冲清军阵地。清军没有警觉，当法军突然冲进堡垒时，“骇疯了的中国人赶快去取武器，一部分逃走了，其余的则被刺刀就地解决了，这简直是一场肉搏战。大约有二十个中国人闭藏在暗壕内，只有一张低矮的门通暗壕，要想不受到严重损失而进入暗壕是不可能的事。法军上尉在几分钟内叫人在门外堆上一堆枯干的野草并点上火，被烟呛着的中国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走出来，都给杀死了或在出口被捕了。”但是，当法军着手摧毁清军工事时，清军已冷静下来并重新采取攻势。他们借着丛林掩护近距离地向法军射击，打伤了好几个法兵。法军只破坏了部分清军工事后，便匆忙撤走了，清军尾追一段路后，因受到其余法军的伏击而停止了。事后统计，法军阵亡一人，受伤七人。刘铭传奏称：“十月二十五日，敌众百余名于黎明突由九弓山分路猛扑鸟嘴峰土勇营卡，练勇悉力相持，几至不支，适营勇练丁同至救应，枪伤敌众十余名，夺获小红旗一面，敌始退回。”[①]

---

① 《中法战争》(6)，第197页。

这次战斗虽然使清军受到了一些损失，但却没能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相反，他们仍利用一切机会向基隆法军进逼。卡诺写道：日复一日，清军包围圈紧缩起来，12 月 12 日所破坏的清军防御工事，还有齿形高地，不久便重又被占据了，而且这次是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占据的。从此以后，在齿形高地和南方防御线之间，每天交换着步枪的射击。有时候，为着使枪战告一段落，淡水炮台便发射一颗炮弹将清军堡垒的顶部摧毁，于是法军便可以得到几小时的宁静。可是，夜晚一来，中国人便安全地修葺着他们的堡垒，而翌日黎明时分，猛烈的枪战重又开始了。从 12 月中旬开始，显然已经获得新的援军的中国人，朝着东南扩展他们的阵地，以致有一天早晨，法军哨兵发现在自己的对面，在谷地的另一边，有些敌方的哨兵藏在新堆起的土墩后面监视着法军。清军已经占据了“圆形剧场”高地，他们盖满了从社寮岛谷直至八堵道路的诸山巅，封锁了山脉、道路和谷地。清军在夜间从社寮岛谷地和“圆形剧场”高地的深处派出一些别动队一直推进到基隆，法军营舍附近和基隆市街都充满着间谍和从事劫掠的清军士兵，以致法军些微杂役的移运都必须有武装兵的卫护。

由于不断有人病倒而战斗人员急剧减少的法军，无法阻止清军的一次又一次进逼，他们冒着流血牺牲去驱赶对方完全徒劳无益，最后只能耐心地等待着援军的到来，在此之前是毫无办法。12 月 21 日，孤拔致电法国海军部长哀叹：“此仗如此打法，后果不堪设想。”①

正是由于台北军民的这些不停进攻，使法军最终被迫做出

①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53。

放弃基隆的决定。

为了改变基隆法军被动挨打的局面，1884 年 12 月 1 日，法国政府组成台湾远征军，从东京远征军中抽调杜琛尼上校担任台湾远征军总司令，辖下包括正拟调赴台湾的亚非利加大队和外籍兵团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以及已在基隆的三个海军陆战队大队和工兵、宪兵等等，总兵力约为一千余人。

十月二十八日（12 月 15 日），从越南调赴台湾的杜琛尼上校到达基隆。卡诺记称：在等着援军于最近时期内到来的期间，孤拔吩咐杜琛尼上校向他提出一个关于军情的报告，杜琛尼上校很快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认为：已经宣布的援军到来可以帮助占领矿山并将清军逐退数公里，更多的战果就不可能了。为着占领淡水，必须增派 3000 兵员和炮兵、工兵以及附属的军需人员和军需物资。十一月十八日（1 月 3 日），孤拔以电报向法国政府报告了杜琛尼上校的结论。“法国政府明白了在台湾作战的错误，并且懂得了即使增援在途的两个大队到达以后，那小规模远征军在台湾所能获得的成功也是了无价值的。因此，孤拔所部海陆军必须从台湾撤退，以便进攻更有价值的目标。撤退将在 4 月后进行。”

22 天后，即在 1885 年元旦过后的第五天，基隆法军盼望已久的第一批援军——亚非利加第三大队到达了。亚非利加第三大队共有 917 个员额，其中包括高中级军官 17 名，下级军官 45 名，伍长及兵士 855 名，分为六个中队。这个大队的士兵，多是从陆军监狱或苦役场释放出来的犯人，或是在入队前即犯案累累的青年人。他们多自称为“西风”，即因受惩治而被送往阿尔及利亚的苦役兵的意思，他们的身份簿上毫无例外都有着触犯刑律的记载。他们的行为都有着盗窃和劫掠的趋

向，与其说他们是无纪律毋宁说他们是以无纪律而自夸，他们都热心于做坏事，时刻想要投身于一些最荒唐的冒险冲击。当然，如果他们打仗勇猛而果敢，则并未断绝晋升之路，如确实被认为适于统率他人时，他们还能升为伍长或低级军官。

这个大队大部分的准军官、军曹、伍长等都系来自各步兵队，主要来自阿尔及利亚轻步兵队及狙击兵队。这些人渴欲升级或是仅只想要冒险，促使他们出于志愿申请而调来这个大队。他们知道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要管束这班素质极差的士兵，为此，他们要尽力配合高中级军官，随时准备应付最出人意外的突发事件，和随时使用武器来强迫部下服从。在大多数场合，这个大队的军官应使士兵盲目服从他们，当然，在必要时，这些军官也以许诺“前科赦免”作为统率士兵的一种极为有力的手段。

经过 45 天的长途航行后，亚非利加第三大队的官兵仅仅在基隆简陋的新营舍中休息了三天，便因为一件极为偶然的突发事件，促使他们主动地向清军阵地发起了第一次进攻。十一月二十五日（1885 年 1 月 10 日），将近正午的时候，这个大队第六中队的一个伍长和 11 名士兵打赌，要将法军营舍对面的清军工事上方悬挂的一面中国旗帜夺取过来。说干就干，他们私自携带武器，不顾上级一再要求他们回来的命令，迅速地离开营舍，越过盆地，就向着掩盖在荆棘丛中，主要由林朝栋、周玉谦等部土勇据守的阵地攀登，不久，双方就发生了枪战。他们的冒失行动激发了亚非利加大队其他士兵的情绪，他们跟着骚动起来，乱糟糟地拿着武器涌向营舍大门。大队长为了防止这些自发行动的士兵因为孤立无援而成为清军的牺牲品，遂请求闻讯而来的杜琛尼上校允许全体士兵出击前去援救

他们的伙伴，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于是，该大队的六个中队士兵分成好几个方向朝清军阵地进攻。

法军这种没有缜密计划的突发进攻遭到了清军的迎头痛击，很快就被遏止住了，其中冲得最快的一个小队的法军，还在清军的猛烈射击之下，“受到了惨酷的损失”，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5时，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军只得撤回基隆。事后统计，法军阵亡14人，失踪3人，失踪者的尸体后来被找到了；负伤34人，其中包括一名中尉。

十二月初三日（1月18日），刘铭传向清政府奏报这天的作战情况：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兵百余在大牛埔一带查看地势，与营勇接仗，互有伤亡，旋即退去。二十五日卯刻，九弓坑、沙帽岭、草领各路敌营，同时开炮，向我营隘轰击。林朝栋知其必来扑犯，当饬义右营营官苏树森、团总王廷理等整顿以待，一面分饬浙江秀水县县丞徐国柱并团总周玉谦、刘廷玉等分率团勇，严守各隘。辰刻，果有法兵千人，由狮嘴岭、鸟嘴峰、石梯岭、大水窟四路齐进。鸟嘴峰等处山势险峻，难以进逼，相持两时，即经周玉谦等击退。惟有红衣悍敌五百余人，猛扑林朝栋所驻之大牛埔、大水窟一路，势极汹涌。林朝栋传令各勇，俟其逼近营隘数十步，始行开炮轰击。敌兵屡却屡进，枪如雨发，并于基隆山顶各营同放炸炮助攻。我军以逸待劳，适曹志忠派来援兵亦至，愈战愈励，自辰至戌，恶战一日，敌兵始行败回。至子刻复来抢尸，经帮带林朝昌率勇击毙数名，杀贼七名，夺获洋枪数杆，衣帽数十件，我勇共伤六十余名。据此，刘铭传为有功人员请奖：“兵部候补郎中林朝栋，拟请赏加道衔，并赏戴花翎；候选员外郎苏树森，拟请赏加四品顶戴；尽先千总林朝昌、王国经，武举王廷理三员，均拟请

以守备尽先补用；林朝昌、王廷理并赏戴花翎，王国经并请赏戴蓝翎；布经历衔周玉谦，拟请赏加五品顶戴，并赏戴花翎；优增生刘廷玉，拟请以训导尽先选用；五品军功陈维乐，拟请以把总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恒春营游击刘维真，拟请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用示鼓励。”①

十二月初五日（1月20日），基隆法军的第二批援军、人数多达千名的外籍兵团第二大队也到达了基隆。比起亚非利加第三大队，这个大队官兵的素质较好，士兵多是从欧洲的四面八方招募而来的，既有逃避德国兵役的阿尔萨斯、洛林人及以外国人名义入伍投效的法国人，也有相当数量的德国和奥地利军队的逃兵。因此，这些士兵只有一个祖国，即他们的联队；只有一个家庭，即他们的中队。加上又在越南经过将近一年的实战锻炼，士兵们将服从纪律的精神、牺牲的精神和疯狂般的英雄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由于被一些具备各种军事才干的军官卓越地领导着，外籍兵团的士兵对于他们的长官都是盲目地服从，虽然他们比较不那么好说话，比较冷漠而又比较沉静，但他们兼有勇敢镇定，无所畏惧而又吃苦耐劳等长处，使得他们有着“西风”们的一切长处，却没有他们的缺点。

基隆法军原来只有约四百人的机动作战队伍，所以陷于被动挨打的窘境，而得到这两批援军后，法军的机动兵力骤增五倍，就可以改变以前那种“坐待敌攻”的被动局面，而向清军发起主动进攻了。卡诺写道：“我们台湾远征军终于获得了他所期待的一切援军，它们的实力虽还不足使远征军从事一次大规模的出击，却至少可使它将基隆附近的敌人加以扫荡。”

① 《中法战争》(6)，第239～240页。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作战中，法军认识到：由于逼近基隆的大水窟（法方称为“圆形剧场”）和鸟嘴峰（法方称为“齿形高地”），山高路滑，并被清军占据形势修筑了防御工事，因而正面进攻这些地方很难取胜，于是考虑另外选择作战目标。杜琛尼上校选中了离暖暖村不远的月眉山。从望远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月眉山是耸立在基隆东面的一座巍峨的悬崖，顶部似乎没有修筑堡垒，只有一些孤独零散的防御工事，据守着某些山峰或是封锁着某些山峡，这些防御工事大都是沿着山峡的分水线而设，进攻它们虽然有着一定的困难，但并非不可克服。而一旦攻占了月眉山，便可从背后进攻大水窟等清军阵地并使它们陷落。进攻目标选定后，法军很快就组织起一个进攻纵队，包括一个150人的海军陆战队中队，人数750名的亚非利加大队，以及人数900名的外籍兵团大队，还有一个配备四门大炮、人数60名的炮兵中队以及少量的工兵、卫生救护队等，总兵力为1900人，每个士兵携带120发子弹和四天的粮食。因为杜琛尼上校临时患病，改为曾指挥攻取基隆的伯多列威兰中校负责指挥。

十二月初九日（1月24日）夜间，这个进攻纵队出发，法军瞒过鸟嘴峰及大水窟等地的清兵监视哨，沿着基隆东面的险崖蜿蜒蛇行。穿过无数葛藤和竹丛，黎明时分，法军的前卫部队来到一条可通往八堵谷地的峡路，在那里，他们终于被清军的哨兵发现并开枪射击，战斗打响了。

法军在炮火的支持下，发挥其兵力优势，前后夹攻清军的前哨阵地，很快就将清军哨兵赶跑。继续前进，在法军南面前方两公里处，月眉山的巍峨断崖完全暴露在法军面前。法军按照原定计划分为两个平行的纵队：外籍兵团大队和海军陆战队

中队约一千余人，从西边迂回向山顶前进，亚非利加大队则从东边迂回向山顶进攻，他们在前进途中将遇到的少数清军哨兵赶走。但是，由于道路难走，法军前进得非常缓慢，以至到夜幕降临时，法军几乎只向月眉山推进一公里。无奈，法军只得停止前进，就地宿营。这一夜，法军过得很不舒服，“夜间不断地受到惊扰，这是因为中国游击兵利用长钩想要捕捉我方哨兵引起的。由于黑暗的缘故，我们无法探明敌人的动静”。结果，法军的两个哨兵因受到袭击而负伤，清军则加强了防御。

十一日（26 日）早上九时，法国向严阵以待的清军阵地进行猛烈的炮轰，虽然清军因而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当法军步兵发起冲锋时，清军仍从树林和堡垒里向法军射出一排又一排的枪弹，冲在最前头的亚非利加大队第四大队的先头部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了。在向中央堡垒发起冲锋时，“中国人的快速射击使得前面几行中的许多人丧命”。当法军费尽力气扫清月眉山外围的清军阵地，进至距离月眉山约四百米的地方时，“一道高达 30 米以上的垂直断崖阻住了进击者的突进。断崖的各方面挂着厚厚一层葛藤、竹子和树木一样的羊齿类的植物；没有任何小径可以通往断崖。纵队的先头部队想要在那里开辟一条通路，但却没有成功”。

这时，曹志忠看到月眉山的情况危急，忙派所部营官廖得胜、叶友胜各带楚勇 300 名相继赶到增援，与扼守月眉山的土勇各部在各个山头配置了一道狙击兵阵线，并伺机向法军发起反攻。法军的损失越来越大，双方鏖战一团。天又下起雨来，双方的士兵在泥泞中难以行走，战至下午 5 时，战斗缓和下来，当法军好不容易重整队形清点人数时，发现已死伤 80 人。他们明白，想一鼓作气攻下月眉山已不可能，于是决定再沿左

方作一个大迂回运动，去袭取月眉山的背后阵地，从那里进攻月眉山。但是，两天两夜的连续大雨阻碍了法军的行动。十三日，当法军想冒雨前进时，却又遭到月眉山守军的坚决狙击，法军受到一些伤亡后，只得停止行动，撤回十一日新占领的地方。十四日，法军留下亚非利加大队踞守新占领的地方，大队则撤回基隆。这次作战，法军虽然未能攻占月眉山，但毕竟占领了月眉山的外围阵地，可以从背后进攻大水窟等处的守军。卡诺写道：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法军得出以下的结论：

中国人靠着他们众多的兵力，并且也靠着在官吏号召之下都肯前来效力的人民的合作，已将他们所有的阵地筑成堡垒。敌人已经带着一种不能预见的激昂之情表现出他们的强韧。敌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在突袭时的诡诈与智巧的传统。敌人曾将多数武装良好的征募兵掺入他们的作战部队。敌人有着超出一切限度的勇气并且能够坚持到最后，只有冲锋可以克服他们的固执。敌人是由欧洲人巧妙地指挥着或是采用着欧洲的军事原理建筑防御阵地。法军要守基隆，便必须占领其周围的高山并坚固地守卫。

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8日），刘铭传向清政府奏报此次作战经过称：法人于十二月初五日以兵百余名，于暖暖附近之大武仑探路，经勇团击退。该处兵力单薄，当经曹志忠派拨王三星、陈士贵两营前往助战。初十日卯刻，法兵千余分攻大水窟、圆窗岭一带，另以船装兵四百，由八斗上岸，抄袭深澳坑后路。该处仅有民团守隘，前后受敌，一时俱溃。敌兵乘势进犯暖暖对河之月眉山，林朝栋、桂占彪等分头迎击。义中营营官张仁贵率勇200名冲至山下竹林之中，与敌相持一日，众寡不敌，当被围困，幸大雨昏夜，敌不敢逼。十一日卯刻，林朝

栋、桂占彪等下山救援，正在对敌吃紧之际，曹志忠所部营官廖得胜、叶友胜各带楚勇300名相继至，奋力夹攻，敌兵稍退，始将张仁贵救出。敌又增兵千余来战，当以百人夺踞月眉山顶，并分兵攻犯大水窟、圆窗岭。月眉山绵亘数里，山势最高，若为敌据，暖暖、大水窟各隘皆不能守。廖得胜等督带张仁贵奋力攻击，枪毙山上敌兵十数名，接战一日，始将山顶夺回。酉刻，法兵退伏山腰对敌。其分犯大水窟之寇速放排枪，猛扑营隘，皆为林朝栋开枪击退。敌攻圆窗岭，该处本有桂占彪楚勇一哨，苏树森土勇一营，适苏得胜所派营官邓长安、胡德洪土勇三百余名赶至，会同暖暖练勇百余人奋力拒战。敌于月眉山、圆窗岭、大水窟三路环攻，自巳至酉，入夜后，两军不能收队。当夜，曹志忠闻报，由五堵赶到，率带坐营，于十二日黎明亲临督阵。义勇中营张仁贵率勇百余冲锋陷阵，讵被敌炮击中，登时阵亡，各勇并力向前，夺回尸首。两军冒雨接战，直至十三日未刻，枪毙兵酋，敌兵始败退里许，犹在月眉山顶，彼此用枪射击。十五日，曹志忠于月眉山顶赶造土垒，敌亦在山下筑营对垒，枪炮始息。“我军与敌相持五日，恶战三日夜，敌兵着雨衣，更番接仗。我军力薄，无可更换，将士忍饥冒雨，目不交睫，遍身淋湿。曹志忠、林朝栋与各营官皆跣足督战，泥淖满身，实属劳苦异常，言之下泪。我军计阵亡九十余名，受伤百余人。”刘铭传并为战死的将弁请恤：“相应请旨将军功张仁贵照守备阵亡例从优议恤，其阵亡哨官副将衔湖南补用参将秦正福，请照副将阵亡例从优议恤；都司衔守备孔得胜，请照都司阵亡例从优议恤，以慰忠魂。”[①]

① 《中法战争》(6)，第277～279页。

为了保守和巩固已夺得的阵地，法军冒雨连夜修筑工事，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就筑起“一道由荫蔽堑壕、堡篮堆成的肩墙、遮蔽道路等构成的临时防御线，可使我们从右翼到左翼得着几乎安全的交通，中央方形堡的凸面及炮座的筑造也已完成，派有三个中队驻守。”可是，由于敌我阵地相距过近，而清军踞守在高处，可以不停地射击法军，法军在一个上尉于白天指挥修筑工事被击毙后，只得改在夜间工作。为了破坏法军的筑垒工作，十二月初六日（1月31日）夜间，曹志忠会商林朝栋，乘敌营修筑未成之际，设法攻取。当夜，曹志忠亲率廖德胜、邓长安等分四路往攻。卡诺记载了作战的经过：当夜11时左右，和桌形高地最接近的法方守军，对那将敌我阵地分隔起来的峡路方向传来的特殊喧骚和武器的响声引起了注意，立刻得到报告的指挥官便加强了步哨。在将近11时30分的时候，传来了从基隆谷地发出的朝法方另一阵地的射来的枪声，但只维持了几分钟。将近2时左右，又向那阵地上射来了新的枪声，同时，在法军的最前哨阵地距离堑壕若干米的地方，爆发枪炮和铜锣的可怕的声音。在几秒钟内，前哨阵地的法军都已处在战斗岗位，接着，枪声开始了。清军激烈的射击，绵延到整个法军防线，随后更到达了法军的后方。清军还向法军阵地发起了三次冲锋，但都被法军其他工事的炮火击退。战至天明，清军仍无法得手，只好撤退。2月3日，孤拔向法国政府报告：在1月31日至2月1日晚上，我们的新阵地曾受到2000名中国人的攻击，被坚决的抵抗击退的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了近二百具尸首，其中有金发上系有三色绥带的欧洲军官一人和中国高级军官数人。我方的损失为一人阵亡，一人负伤。据刘铭传奏称：清军仅“各伤亡数十人”。但在同一

奏折中，刘铭传提到的：十二月二十日（2 月 4 日）的战斗：“敌兵百余复犯大武仑一路，经驻扎该处营官陈士贵、林则荣会同练勇合力拒击，法兵伤亡二十余人，始行退走。”可能并未发生。

在随后而来的二月里，天开始不停地下着雨，在法军仓促筑成的营垒里，堑壕泛滥着洪水，道路小径变成溪流，落不完的雨水像冰块的尖锋一样打着人的脸孔，常使人们费尽力气燃起的火熄灭，并将宿营的地方变成一片泥塘。在这番雨水之下，兵士们都卧在一尺深的泥浆里面，以致污秽不堪的制服，再也分别不出颜色了。为了排遣苦闷，法军兵士到处搜罗基隆居民走失的家畜，以杀来吃肉改善生活，“这类小小的搜索终于变得漫无限制，而不得不加以禁止，兵士们被冒险精神所诱，走得最远的人竟达到敌人的前哨线，并每天引起一些小冲突，干部们费尽心力才没有让这些小冲突变为真正的战斗”。前面所说刘铭传奏报的十二月二十日的战斗，可能即是其中的一例。不过，这种情况也就持续了短短的几天，“自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后，两军各凭营垒对攻枪炮，兼之日日大雨，俱未出队”。趁着这个休歇时期，刘铭传命令曹志忠不惜经费，多雇民夫，自大水窟至月眉山一带十余里，连夜修浚深沟，挖洞住兵，以避敌炮。并考虑到军士久战疲劳，苦无后继，只能坚守待援。且自月眉山前敌以至暖暖而达六堵，横亘大武仑，周回三十余里，最要险隘十余里，皆须严密防御，地阔兵单，顾此失彼。曹志忠、苏得胜所部全行抽拨赴援，后路空虚。因而在十二月间改命原来驻守台北郡防的刘朝祜所部淮勇千人，孙开华也从沪尾抽调土勇 100 名，分赴暖暖、六堵，协同战守。正月间，又增派王诗正等恪靖五营并聂士成所部共三千余人赴

援。

在卡诺的书中，也以一个法国人的眼光，记述了清军筹防的情况：在二月间，中国人所发挥的活动是异乎寻常的，他们在我们面前聚集防御的物资，获得一次又一次的援军，在岛民中征募到大队的劳工。在一个月内，他们将桌形高地和圆形剧院诸阵地造成一个可怕的设防阵地，里面驻屯着多数的守备兵，装备着丰富的粮食、兵器和弹药。一道长达一公里、有着壕沟和附属防御物、外层围以竹篱的连续防御设备，在十二月杪的时候，围绕着那面对八堵的断崖和那些转向"圆形剧場"高地的断崖，朝着东面，在桌形高地的防御设备的末端，有一个掩堡支持着。朝着南面，有一个同样性质但较不重要的堡垒，结束了西方的堑壕线，在那些中间的主要山巅，则设有一些小型的内堡。

在竹堡和桌形高地之间，沿着那些瞰制着矿山盆地的南方斜面的山顶，敌方早已放弃了一部分受到法军前方阵地炮火的瞰制和侧射的旧阵地。可是，从一月杪，中国人预料他们的右侧面将于最近受到攻击，便和上述的阵地线成垂直形地设置新的防御工事。敌人原是精力绝伦的土著，他们最初即绕着竹堡的斜面施工，始终受到掩蔽地向我方接近，终于由北到南，开了一道长达600米、装有掩蔽物并设有枪眼的堑壕。在这道防御线的后方，正像在桌形高地的防御线的后方一样，结集在几个营舍的守备兵，都固定地住在一些茅舍内，准备一有警报便前往哨所。每个营舍内部设有米仓、弹药库及被服库，最后是一串长得可惊的遮蔽道路，越过盆地和洼地，连络着东方阵地和"圆形剧場"高地的阵地，延长到齿形高地的防御工事，以致中国人可以在我们前面一条长约六公里的战线上来往而不受

我们炮队的打击。

和我们对峙的敌方军队，大部分来自福建和直隶，他们是中国军队中最好的兵士，身躯高大而又强壮的士兵，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宽大的亚细亚式的裤子长及半腰，而大袖的上衣加上一个巨大的朱红色的徽章，徽章上用黑色方块字载明他们所属的大队和中队。当天冷或下雨时，他们便穿上一件或几件衬有棉花或涂上鱼胶以资防水的上衣，腿上缠有绑腿布，而脚上则穿着毡底的中国鞋。他们的武器是相当不一致的，有的用德国毛瑟枪，有的用林明顿枪，但用得最多的是美国黎意枪和哈乞开斯枪。敌人所预备的给养是非常丰富的，在防御工事内，每个士兵各有一袋或一篮的子弹，供他们狂热地使用。卡诺的记载可能不完全是事实，因为据我们所知，清军的武器并不如他所说的“多用优良武器”，而更多的是使用前膛枪。而且兵力也明显不足，那么一点兵力，却要防守那么宽阔的地带，兵分力单，容易为法军各个击破。

久已盼望的晴天终于在一月十六日（3 月 2 日）来到了，只要经过 24 小时的短晴，便可将道路和小径晒干，便于通行。杜琛尼抓住这个机会，于十七日将台湾占领军的一切可以使用的部队组成一支流动纵队，以便向清军发动最后的进攻。这支进攻队伍包括：由伯多列威兰中校率领的海军陆战队的三个中队 300 人，由丰特布里德少校率领的亚非利加大队的四个中队 600 人，由谢沙利上尉率领的外籍兵团大队的两个中队 300 人，由尚革朗上尉率领的半个炮兵中队 70 人，配备两门 4 厘米炮、一门口径 80 毫米山炮，以及由吕斯上尉率领的 20 名工兵，总兵力约 1380 人。每个士兵携有六天粮食和 170 发弹药。这还不包括在前哨阵地的外籍兵团三个中队。杜琛尼上校的作

战计划是首先指向八堵的东面，随后便占领在桌形高地方面作为其他防御工事支柱的第一座堡垒，而最后便从背面进攻清军设在“圆形剧場”高地上的重要防御阵地，那里的某些地方甚至设有七道防线。

一月十八日（4 日），清晨 3 时半左右，这支流动纵队离开营房。6 时，法军避开清军的视线，进人八堵阵地。7 时半，法军分成两部分，迂回进攻位于八堵港的戏台山，这里驻着曹志忠、刘朝祜部的七百余人。10 点钟，清军首先向法军开火，但在法军的攻击下，在一时，法军即以负伤二人的代价占领了高地。下午，法军肃清周围的清军后，就地宿营。第二天，法军的进攻目标是月眉山的附近阵地，双方展开激战。刘铭传奏报此战称：

十八日，法人添兵大至，以轮船四艘装兵于八斗登岸，抄袭月眉山之后，曹志忠、刘朝祜共派七百人把守戏台地山口堵战一日，飞书告急。苏得胜土勇两营防守六堵，已派一营把守竹枝寮隘卡，仅余五百人，闻信即驰往援应。十九日辰刻，敌以兵二千余名由枕头山、竹篙山、龙潭堵三路分进，曹志忠所部楚军六营，除分扎大武仑一带两营，又派三百人扼守戏台地外，只率四营七成队伍布守月眉山、深澳坑十七里长墙，兵单地阔。敌兵直扑长墙，曹志忠当由月眉山各隘抽拨三百人，同苏得胜等挥兵敌御，相持两时之久。敌突以兵千余，由深澳坑直抄长墙之后，将戏台地前军截断。我军腹背受敌，苏得胜所部左营营官梁善明中枪阵亡，前营营官邓长安亦受重伤，与曹志忠勇丁俱伤亡过多，不能抵敌，退一山头。法兵由长墙直扑月眉山头卡，数路分道齐攻，并以炸炮两面夹击。深

澳坑新筑长墙，雨后倒坍，营官肖清福御敌受伤，守卡兵勇只百余人，当时溃退。法兵遂直犯月眉山顶，廖得胜营勇皆为曹志忠带往迎战，仅余百余人抵御。适刘朝祜率勇三百人合同敌御，恶战一时，敌势过众，已将月眉山三面包裹。刘朝祜、廖得胜勇丁伤亡过多，不能抵御，退至山下，会同曹志忠、苏得胜于新煤厂暂行扎队。

臣铭传于十九日（5日）闻信，恐六堵空虚，敌如由狮头岭下山，暖暖各军皆无归路，当即率带聂士成所部五成队伍，驰赴六堵调度策应。王诗正于十八日行抵五堵，闻前敌警报，十九日即派威、良两营前往救援。六堵至暖暖必由敌营山下经过，白日不能行走，该道于二十日酉刻，率刚营、副中营及亲兵队续进。臣当令王诗正会同曹志忠先在暖暖夹河扎营，以保大水窟后路。均定二十一夜亲至暖暖商度战守。①

但在二十一日（7日）日间，王诗正已率兵与法军作战。王诗正后来禀报此战经过称：

正月十八日奉调率所部进扎五堵。十九日卯刻，连接总兵曹志忠、司员林朝栋飞报，法逆近又载到黑兵数千，由八斗登岸，猛扑月眉山、深屿坑等处兵隘营垒。各营兵单力薄，不能调拨，势颇不支等语。革道一面饬调提督申道发、贺兴隆拔队速进，一面飞派威营刘见良、易玉林，于辰刻带六成行队前往，相机援应。酉刻，复得暖暖街坐探委员李秉钧报称：我军未刻进抵暖暖街，则月眉山卡营垒先被法逆占据，并言大杠峰势甚高耸，此地既失，不特

① 《中法战争》(6)，第352～353页。

大水窟站脚不住，恐暖暖街亦不堪问等情。是夜，威营、良营整队进逼暖暖街前面五六里许之厂坪，以法逆夜袭，革道于二十日五鼓加派刚营继进，自率亲兵队驰赴调度。是日，法寇麋集月眉山，又分队攻大水窟之栋字营，势殊岌岌。当饬威营先赴河之北岸攻月眉山左路，饬良营继渡攻月眉山右路，而令刚营偃旗息鼓，绕月山之后。该逆向威营直前轰击，提督刘见荣、易玉林令各勇皆依山蛇伏，一枪不发，待其既近，使连环卧攻，伤毙法夷颇多，抵死不退。及刚营从山后转出，四面围击，复鏖战甚久，该逆乃渐溃败，遂将月眉山头层要隘营垒夺回。其大水窟一面，亦因贼势萃集大杠峰，得以站立带住。革道即饬威、良、刚三营驻扎所夺营内，并调副中营近驻山脚，以成犄角。

革道飞调中营队伍，并约曹志忠于二十一日黎明出队，分路进攻。是日，法逆亦约齐基隆水陆所有之贼，分七八路，遍布山谷。兵既倍我，火器尤足，并于四山峰顶连轰开花巨炮，我军屹不为动。良营前哨百长胡少亭、刚营前哨百长罗国胜、旺威营右哨百长李长青、副中营左哨百长龙春芳齐告奋勇，直抢大杠峰顶贼垒，已逼卡门，贼俱披靡。胡少亭、罗国旺举旗先登，皆中炮殒命，李长青、龙春芳抢护忠骸，各员重伤。刚营提督申道发扼隘死抵，足受炮子重伤，始将全队收还，而威营、良营、副中营仍复分路上山，横击贼腰。革道督率中营，会同曹志忠绕入山里以击贼伏。战势方酣，另股贼突由大水窟抄出暖暖街右，一由鸟嘴峰抄出暖暖街左断我军后路。各隘土勇皆已溃散，贼悉萃月眉山，愈战愈多。我军面面受敌，战

至酉刻，应援已断，枪子罄尽，势难再守，乃与曹志忠全队下山，冲出重围，收回五堵。

在这次出击中，“我军伤亡亦数十人”。后来，人们评论此次出战失败原因称：“林朝栋与王诗正之兵最为奋勇，惟所用皆前膛旧枪，又无车轮炸炮”①，与法兵优劣不敌而败。

事后，刘铭传为战死将弁请恤称：“所有力战阵亡之记名提督梁善明、升用提督两江遇缺尽先题奏总兵奇穆钦巴图鲁胡少亭二员，均请敕部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恤；参将衔游击陈玉堂、花翎游击陈得升二员，均请照参将阵亡例从优议恤；花翎都司王先仁，请照游击阵亡例从优议恤；花翎都司衔守备罗国旺、蓝翎守备邹继图二员，均请照都司阵亡例从优议恤；守备衔千总吴子元，请照守备阵亡例从优议恤；六品军功高春和、李国斌二弁，均请照千总阵亡例从优议恤，以慰忠魂。”②

这一战可能就是争夺基隆外围的最后一战了。

综观整个作战过程，可见台北抗法军民虽然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较差，但占有人和地利的优势。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所以不顾伤亡牺牲，反复与法军鏖战，使得法军虽然占领基隆，但却一直无法扩大战果，最后不得不狼狈撤出基隆。正是由于他们的抗争，终于取得台北抗法战争的胜利。

四　台湾海面封锁与反封锁斗争

在侵台期间，法国不但攻城踞地，而且，为了切断内地对台湾的援助，还长期封锁台湾海面。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 《中法战争》(6)，第389～391页。
② 《中法战争》(6)，第355页。

闰五月底，孤拔派法舰“费勒斯”号前赴基隆。虽然“费勒斯”号对基隆守军声称此行只是“游巡海口”，其实它是执行战前侦察任务，并负有监视和封锁基隆海面的使命，这是法舰封锁台湾海面的先声。

由于害怕法舰的刁难，“中国各轮惮于南下”。刘铭传留在上海负责运送沪拨枪械的委员游学诗，迟至六月初九日（7月30日）始雇到德国商轮“万利”号，载运军械于十二日（8月2日）到达沪尾。刘铭传吩咐将其中的大炮和水雷运往基隆。十三日（3日），“万利”轮到达基隆海口，果然遭到“费勒斯”号的阻挠。“战舰司令维威埃把严禁枪械或军火上陆的命令晓谕船长。德国汽船虽全面抗议这个做法，理由是我们没有战争，封锁也没有正式宣布。但在‘费勒斯’号司令书面命令之下，他服从了”，将大炮和水雷运回沪尾[①]。

基隆首战后，中法之间的敌对状态更加严重，法舰“拉加利桑呢亚”号一直单独留在基隆港执行封锁海面的使命，“此项封锁直到两月以后，即10月2日始行解除”。法舰的这个架势，连洋商和外国轮船也感到忌惮，六月二十六日（16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鸿饬沪员设法雇洋船包运枪械赴台，据复，风声日紧，法船封口，洋商不敢装运。”[②]

马江战后，穷凶极恶的法国舰队筹划同时进犯基隆和沪尾，事先封锁两处海面，“敌人逐日以一两船拦泊沪尾口门，遇有商船即搜，以阻援应，商船多日不来，音问不通”[③]。八月初，上海当局所雇两艘外国商轮“汇利”、“万利”，装载江

① 《中法战争》(3)，第541页。
② 《中法战争》(4)，第185页。
③ 《中法战争》(5)，第562页。

阴刘朝祜营勇 600 人到沪尾，只用剥船接卸百余人于初二日（9 月 20 日）上岸，即因避风入海。初三日（21），当“万利”轮将所载 50 人接卸完后，“敌人已上船搜查，见无军装始去”。初九日（27 日），上海所雇英轮“华安”号装勇三百余人，刚到沪尾，即被法船阻截，罗亚尔记载此事称：一只英国汽船，载了 150 名中国兵从上海出发，来到碇泊处。“蝮蛇”号威吓要把它击沉，它才退转回去。可惜，在这种不是正式战争的报复情形中，有十分决心的“蝮蛇”号的舰长所能做的只有阻止登岸而已。捕拿士兵作为俘虏，抄缴军械，这些都是不许他做的，他仅有驱逐这船回归洋面的权利[①]。后来，“华安”船将士兵载至新竹上岸。李鸿章则接到“华安”船主报告：“华安”已放回，勇械均无恙，惟不许赴台[②]。

九月间，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电告总理衙门：前与省帅、庚堂往来文函，系由“海龙”、“福建”两船轮流开赴淡水，派弁互递。现法阻各船，不准渡台，各轮已不载往，将来文报亦塞不通[③]。10 月 16 日，孤拔向法国海军部报告搜检“海龙”等船的情况：9 月 24 日，首先开始巡航的“雷诺堡”号，有机会对两艘船只进行了检查，第一艘是德船“威”号，第二艘是委托香港商行代管的英船“海龙”号，它们于 24 日到达淡水港外。接着“蝮蛇”号检查英船“福建”号，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船就是巴德诺先生曾经告诉过我的“利远”号，它是于 21 日载着电线杆及军火离开上海的[④]。

---

① 《中法战争》(3)，第 564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201 页。
③ 《中法战争》(6)，第 2 页。
④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59。

从闰五月底至九月初的三个余月中，是法舰封锁台湾海面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法舰只在内部奉有封锁的命令，对外则未公开宣布，封锁的范围局限于基隆、沪尾两处海面，行动也较温和，只作警告和阻拦，并未发生扣船乃至开炮轰击等激烈行为。

八月二十日进攻沪尾铩羽而归后，法国政府和孤拔并不死心，仍积极筹划二次进攻沪尾，进而占据全台，实现其“踞地为质”的野心。为了不让台湾抗法军民得到内地的军事援助，他们已不满足于原先那种暗中封锁的方式，于九月初四日（10月22日）悍然由孤拔公开向各国宣布封锁台湾海面：

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长官孤拔海军中将，照其所有之权力宣布下列事项：自1884年10月23日起，从南岬经过西部及北部（前者为北纬21°55′，东经118°30′。后者为北纬24°30′，东经119°34′）以至苏澳，所有台湾各港埠、海湾都处于本长官所属海军兵力封锁状态之下，一切武装舰船务希于三月内装载完毕并退出各封锁区域。对于一切企图侵犯上项封锁的舰船，将依照国际法及现行条约之规定处理。

这样开始的封锁最初将对船舶的检查权限于台湾的直接沿岸，一个月后，孤拔又将此项封锁扩大到沿岸五里。在这界限以内，法舰有权检查中立国船舶，甚至有权以武力驱逐它们，在经过一次特别的通知以后，法舰有权扣留中立国的船舶。但在这界限以外，法舰没有战争状态所授予的权力①。

为实施对于全台海面的封锁，孤拔除仍留部分军舰继续封

① 卡诺：《法国侵台始末》。

锁基隆、沪尾两处海面外，另派出军舰游巡台南等处海面。10月29日，孤拔报告法国海军部：我专派海军准将利士比先生监督封锁行动，但至今我只调拨五艘战舰用于该行动，这五艘战舰是“拉加利桑呢亚”号、“杜居士路因”号、“益士弼”号、“德斯丹”号，及“鲁汀”号。它们一般以两艘或三艘军舰为一组，编成梯状队形，彼此保持可以相望的距离行驶。

根据中方资料，早在孤拔公开宣布封锁台湾海面的八天前，法舰已对台湾海面做试探性的游巡了。八月二十七日（10月15日），刘璈函称：法一艘距安平二十余里，又有三艘南行，恐扰澎湖。刘铭传也电称，八月二十八日（16日），法四船扰台南。等到九月初四日后，法舰不仅“日巡南北不辍”，而且停泊各海口。九月初十日（28日），刘璈报告法舰窜扰台南，守军严阵以待的情况：初五日（23日），有法铁甲船一只进安平口，离炮台约二十里寄泊，升挂红旗，又有法船一二只时上时下。是晚据旗后通商委员杨猷猷电报：明日法提督升白旗坐舢舨进口，欲来郝翻译处交接公文等语。当饬不准舢舨进口，如有公文，只准在口外传递去后。旋据电复：已托郝翻译往口外代收公文，法提督系利士卑士。又报，郝翻译回称，法船因我守严不敢近岸，彼亦不敢往，并无所谓公文。初六（24日）早，又有法船一只进安平口，旋向旗后开去，其寄泊铁甲船仍挂红旗，并于桅上悬炮二尊循转，似将开战。又据旗后电报：本日有白底法兵船一只，由安平驶进打狗山后沙湾游弋。又据凤山县禀：有法兵船三号，在由凤至郡城之中段青水墩外，碰上华人，即询问旗后炮台如何？屯兵若干。复驶小舟，似欲登赤嵌海岸，闻团众鸣锣，遂即开去。并据恒春、嘉义各县及水勇所报，各海口均有法船游弋，并闻炮声各等语。初七

日（25 日），据旗后炮台陈管带电禀：本日清晨，有法兵船一艘，驶至旗后沙滩之外，约离炮台十余里，其炮口向我炮台，似将开炮，经我军施放五炮，头一炮中其桅上横梁，二三炮弹由法船旁下，其后两炮甫经施放，该船已掉尾远扬[①]。后张之洞有电谈此次开炮经过，谓旁观者“赞此炮手眼力甚神”[②]。

此后，就经常有关法舰游弋台南各地的报告。如刘璈于九月二十九日（11 月 16 日）奏称：“法寇图犯台南，屡来安平口外聚兵轮至五六艘，曾挂战旗。臣督率将士严阵以待，度其未及，毋许轻发一炮。彼此相持数日，迄无响动。现已陆续开驶，仅于安、旗二口各留一艘，禁止商船往来。”[③] 澎湖守将也报称：“九月二十七日（14 日）有法船一号驶泊乌嵌海面，次日开去。十月初三（20 日）、初六（23 日）等日，又有法船一艘来泊，旋即开行，见船必搜，商贾裹足。”[④] 据孤拔向法国海军部报告，在此期间，法舰除阻止英轮“瓦维利”号在台湾卸下所载兵员与弹药外，还扣押了中国海关所属的灯塔船“飞虎”号。

法舰窜扰台南，刘璈守土有责，除了督饬将士严行戒备，以防敌攻外，还通过多种方式禀奏清政府，提出各种建议。如他书呆子气十足地将法舰的行动与国际公法的有关条文对照，认为并不符合：查万国公法，虽有战国封堵敌国海口之例。然如系不义之战，诸国例得辩问。公法所载城池地方被战者围困，局外者不得与之贸易，固也；若台湾仅失基隆偏隅，旦夕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339～2340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132 页。
③ 《中法战争》（6），第 138 页。
④ 《中法战争》（6），第 229 页。

可以收复，岂得以围困论？及仅凭法夷一纸空文，遽准堵塞，在我固多不便，而于各国商务尤有窒碍。要求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京公使，与法国据理辩论，"立开台湾海口，以保商局而重邦交"①。又建议以借用洋款为名，将法舰所未及封锁之后山番地口岸，或澎湖一岛，酌定年限，仿照香港、澳门例出贷给德国。这些建议由于不符合实际，当然没有什么结果。

法舰对于台湾的封锁，只在开始的半个月内起了一些作用，"几于水泄不通"。但是，由于军舰数量与要封锁的广阔范围极不相称，加上这段时间遇上雨、雾、海涛和东北季候风所带来的连续风暴等无数困难，法舰没有取得其预期的封锁效果。九月二十三日（11 日），孤拔沮丧地电告法国政府："在目前这季节内，封锁的任务在海军是极端困难的，因而大部分失去它的效力，如果装载着违禁品或军队的中立国船舶在封锁区外不必担心受到检查或没收，它们定会找到机会逃过我们舰艇的警戒。"在此期间曾运送淮勇在台南上岸的英轮"威利"船长则称："台南运送勇械系万妥之处，法人不知其径，是以此口未被封禁等语。"② 并多次往返。不久，因为传闻中国将出动军舰攻击法国向越南及台湾运兵的邮船，法国政府命令孤拔派军舰从西贡起对这些邮船护航，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捕捉和消灭中国的军舰。为了能够调动几艘军舰执行这些任务，孤拔决定除基隆、沪尾两处海面外，暂时取消对台湾其他地方的海上封锁。十月廿一日（12 月 8 日），刘铭传电告清政府，

① 《中法战争》(6)，第 180～181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296 页。

“敌闻上海兵轮来援，现撤台南巡船，绕马祖澳以遏我师”[1]。

这是法舰封锁台湾海面的第二阶段的概况，其特点是时间较短，封锁的范围较广阔，封锁手段渐趋残酷激烈，而且公开宣布。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效果并不十分显著。

台南有安平、旗后两个通商口岸，和平时期商船往来，贸易兴旺，自法舰宣布封锁和窜扰台南海面以后，自然断了中外商船的影子，兼理台湾通商总局的刘璈，突然发现法舰撤离台南海面，书生气十足地以为这是废除封锁的表现，他急于恢复中外商船的来台，便于十一月二十日（1月5日），鲁莽地照会驻台各国领事：

查公法封港，非密设兵轮以阻之，只派数船在洋面梭巡而无定所者，不作封堵论。封堵敌国口岸，其势衰弱而不实力办理，即作为废弛等语。今法人于台南安平、旗后二口，自中历十月二十九日，即西历十二月十五日以后，迄今十余日，并无一船巡泊，所谓定所者何在？实力者又何在？法人何得不遵例速告弛封，转自蹈使诈局外之咎？况公法独于封港一款，不行禁止，转若允准，殆以被封之国，一经封堵，立见危困，可以力屈求和，不致长出争战，用意最为深厚。今法人既据台北，屡败于官军，再挫于民团，封港以后，全台军民安之若素，守御自如，若不知为封港也者。试问凭何围困？此固不能掩各国耳目，何忍久累各国商人？公法既应作为弛封，商船即应通行，若非明白宣告，恐各国内地商轮不知，以为尚在封堵，致仍望洋裹足，令各国在台通商者日受其累，而于各国商局大有违碍。职道为通商大局起

① 《中法战争》(6)，第189页。

见，故未敢缄默不言也。除照会台南北领事暨税务司，电呈外务驻京各大臣并总税务司核复。[①]

驻台英领事接阅这份照会后，也认为按照万国公法，法舰的行为应视作弛禁论，可以恢复中外商船来往，遂据此与法方交涉。恰好此时孤拔看到台南海面解除封锁和全部军舰集中在台北海面的结果，是任令中方的多数新的援军和物资从台南登陆。因此，尽管还未能完成追歼中国军舰的任务，就已决定在十一月中旬将“德斯丹”三舰仍派回台湾海面游巡，因此，在与驻台英领事交涉时，顺水推舟地答称：“此间封口既经暂且废弛，合再从新出示封禁。”十二月十三日（28日），刘铭传将此事电告清政府，埋怨刘璈：“台南海口法弛封两月，由澎湖转运甚便。刘道忽照会英领事，责其废弛。英据文转法，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复行封禁，巡查更严，掳船伤人甚多。”[②] 光绪十一年五月十六日（6月28日），刘铭传奏参刘璈，还将此事列为其罪状之一。其实，法舰恢复游巡台南海面，与刘璈异想天开的照会并无因果关系。

此次封锁从十一月中旬直至第二年的四月，约五月余，是法舰封锁台湾海面的第三阶段，其特点是时间最长，手段也较为凶残，除大量残虐过往台湾海面的中国船民外，对待外国商船也比较严厉，曾俘获“平安”轮和“瓦维利”轮。不过，由于用于封锁的法舰数量与被封锁的广阔海面相比太不成比例，因而基本没能阻止中国的运输船的往来。

在连横所著《台湾通史》的“外交志”和“刘璈传”中，

---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757～2758页。

② 《中法战争》(4)，第228页。

曾不厌其烦地重复记载了在此期间，刘璈与孤拔会晤舌战事：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二日（3月18日），孤拔亲自率舰泊安平，通过英领事请刘璈相见。刘璈“欲往，左右谏曰：法人狡，往将不利。璈曰：不往，谓我怯也。咄！乃公岂畏死哉。至安平，戒炮台守将曰：有警，即开炮击，勿以余在不中也。遂登舰，孤拔相见甚欢，置酒飨。语及军事。璈曰：今日相见，为友谊也，请毋及其他。孤拔曰：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璈曰：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默然，尽醉而归，法舰亦去，而台南得以无害”①。

连横比较偏爱刘璈，撰述上述逸事，足显刘璈的魄力才智异于常人，也影响了后人对刘璈的评价。1985年，台湾学者许雪姬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据此对刘璈作了高度的评价：“事实上，刘璈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十分杰出……尤以在法舰上面见孤拔时所表现的勇气，更令人折服。”② 我以情理及事实考之，却怀疑其真实性。

从情理上看，早在闰五月廿七日，清政府指示曾国荃与巴德诺谈判时要注意的事项时，就特别规定不要轻易登法舰；六月基隆首战后，刘铭传以“体制所关”为由拒绝利士比的邀请登舰，为此，清政府曾颁旨褒奖刘铭传。有此严旨和先例，则刘璈不可能违旨破例，贸然登临法舰。其次，法舰封锁台湾海面期间，刘璈亲禀或转禀有关法舰残虐台南船民报告多起，其中伤心惨目的情景，令人发指。何以战火未熄，即与敌酋握手言欢，觥筹交错，大谈所谓的“友谊”，岂非不伦不类吗？最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288页。

② 转引自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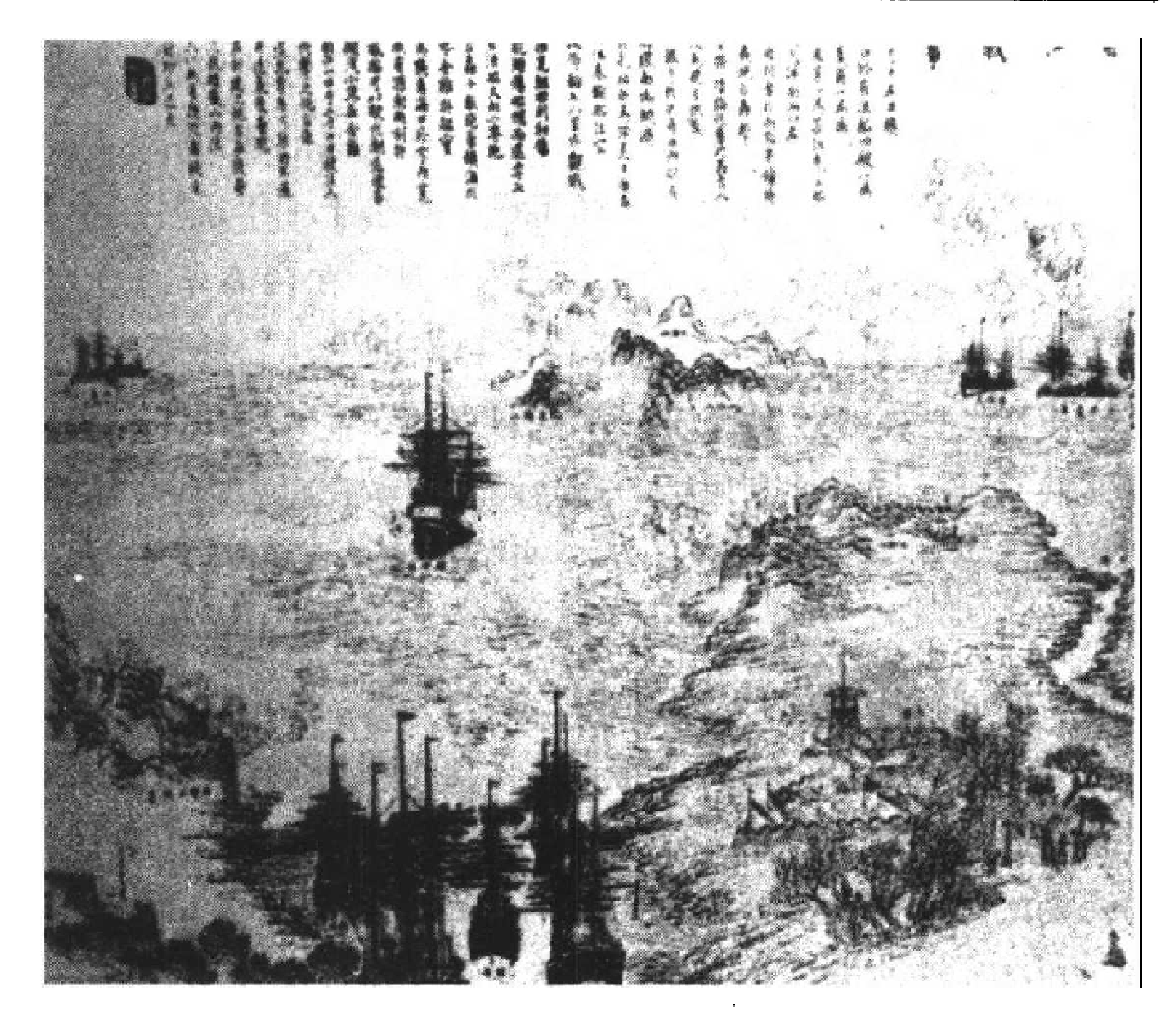
后，如刘璈曾经登上法舰与孤拔会晤，中法双方的史料必定会有记载，但至今我们除连横书外，未见有类似记载留存。

从事实看，帮办福建军务杨岳斌于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日（3月8日）从澎湖潜渡，二十一日（9日）在台湾卑南登岸。二十四日（12日），杨岳斌自卑南向台南进发，二月初二日前后在旗后会晤刘璈。他于二月十二日（28日）奏称："沿途接见文武官绅，访察地利民情。适台湾道刘璈在旗后炮台，臣即前往详阅一切。二月初三日（19日）同抵台湾府城，随率先看安平炮台。"[①] 据此，可知二月初二日，刘璈正在旗后，初三后才陪同杨岳斌到安平，而杨岳斌的奏报，并未谈及刘璈初二日与孤拔会晤事。据法方记载，3月17日孤拔正在宁波港外指挥法舰封锁甬江、禁止中方运输米谷等事宜。为了执行攻占澎湖的计划，孤拔要求利士比前来甬江接替他，3月21日利士比到达宁波港外替换孤拔。第二天，孤拔动身离开，于3月23日回到基隆。可见，在二月初二日，孤拔也不可能在台南安平港外。既然两个当事人在二月初二日都不在安平，则刘璈在此与孤拔会晤一事可能就是子虚乌有的。

台湾与内地隔海相望，援济全靠航运，一旦中法起衅开战，势必会遭到法舰的封锁。在外援受阻的情况下，台湾军民就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克服包括兵员、饷项、武器等方面的困难，坚持抗法战争。有见于此，清政府在千方百计大力援济台湾的同时，又采纳张之洞等人提出的"台人能战，有饷械可就地募"[②] 的建议，从七月初起多次指示刘铭传联络台湾绅董就

① 《中法战争》(6)，第360页。

②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 1968。



1885年3月法舰在甬江口被清军击退

地劝捐，多募客民土人为勇助战[1]，使用抬炮、排枪等土造武器应急。

沪尾战后，法舰全面封锁在即，八月二十四月（10月12日），刘铭传向清政府奏报台北所面临兵员、饷项、武器不足的情况：我军苦战之余，伤亡日多，器械子药无以为继；饷款益绌，现台南库存仅敷目前之用，台北所存不足十万，不过仅支一月，顷上海忽有“华安”轮船在海被劫之谣，闻各船俱不敢再装兵械，无复有接济之望。外援受阻，台湾抗法军民只得

① 《中法战争》(5)，第529页。

设法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1. 添募土勇。刘铭传带兵比较讲究军纪的好坏和装备的优劣，而这两点恰好是新募土勇所缺乏的；加上在初时对于战争的严酷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以为可以等待指调的铭武旧部到来，所以，在开始时刘铭传对于添募土勇助战一事的兴趣不大。他承认："臣到台北，有言招募土勇者，臣因其所用土枪不能御敌，不肯操练，不曾招募。"直到沪尾战前，因敌情严重，而防军仅孙开华等部，人数太少，不足应敌，刘铭传才准李彤恩招募张李成等一营500人，发给后门枪，令其操练助防，这是招募土勇助战之始。

在沪尾一战中，张李成所部土勇作战奋勇，杀敌立功，声名大著，引人注目。一时间，不但各军统领均请添募土勇助战，台北知府陈星聚、基隆通判梁纯夫、淡水知县周有基也纷纷请募，一些台北绅士则自愿备资斧招募土勇参战。这时，刘铭传虽然对于土勇的看法并未完全改变，但迫于抗法战争的严酷形势，也准许招募土勇，只是在具体实施时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对待。

对于各军统领请示添募土勇，以作本军的辅助兵力，并受该统领节制调遣的，虽然将要为此开支大笔饷项，刘铭传仍表示大力支持。于是，当孙开华、曹志忠、苏得胜、柳泰和等各请添募千名土勇时，刘铭传不但照准，还因台北绅士陈霞林等屡言内山御番土勇常见仗，即告知各军前往内山选募。结果，柳泰和原率楚勇一营，募土勇800名，驻守沪尾南岸观音山一带；孙开华原率擢胜三营，添募土勇一营，仍驻沪尾；曹志忠率所部六营，并添募土勇两营，进扎与基隆接壤的五堵、六堵及大武仑一带；苏得胜率新募土勇两营，驻扎水返脚；刘朝祜

带所部800人及新募土勇200人，驻守台北府城；游击张得贵则率土勇300人，协守新竹县城。

对于台北官绅自行招募的土勇，因为不受各军统领的节制调遣，刘铭传则根据其饷项来源的不同予以区别对待。

开始，陈星聚、梁纯夫、周有基及朱守谟等禀请添募土勇，就含有官府负责饷需的意思，但当时台北的饷项缺乏，实在无力过多负担，所以各人才一招募，即已发生土勇闹饷鼓噪事。除前面谈到的台北书办陈华所募土勇鼓噪事外，淡水知县周有基募勇400名，尚未成军，亦已闹饷鼓噪。梁纯夫见势不妙，已不敢招募。对于这种既耗饷项，又不听节制调遣、鼓噪闹事的土勇，刘铭传或是大加裁减，或是分别拨归各军统领节制调遣，不让其继续捣乱。如陈华所募1500人，刘铭传令其先到曹志忠营听候调遣，由苏得胜与曹志忠密商，先行挟以兵威裁去500名，复调300人归柳泰和裁并，其余随即一并裁撤，但已费饷一万余两。周有基所募土勇四百余人，即拨归柳泰和节制。

对于台北绅士自备资斧招募土勇，以助官军作战，虽然这些土勇基本上是独立作战，不受各军统领的节制调遣，刘铭传却抱着支持的态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帮助。如暖暖练董武举王廷理、捐职周玉谦等捐资募勇300人，与深澳等处各董练扼守，每处或三五十名，或百数十人，凭险堵御。刘铭传恐民团力单，除饬曹志忠派拨营勇300人驻扎暖暖，以助战守外，并拨款饬王廷理等添募土勇300人，还发给他们少量的洋枪以与土枪参用。彰化绅士郎中林朝栋，急公好义，自备资斧两月，募勇500名来助防剿，刘铭传也设法给其凑解军械，令赴暖暖共图捍守。新竹绅士郎中林汝梅也筹款两月，募练勇200名，助守新竹。到十一月二十二日（1月

7日)，刘铭传奏称："添募土勇五千余名。"后来又有候选员外郎苏树森，尽先千总林朝昌、王国经，优增生刘廷玉，五品军功陈维乐等台北绅士，"皆自行捐资募勇，或二三百人，或数十人，与敌相持"。

至于台南防区，《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收有刘璈于光绪十年九月和十月两次札饬彰化县绅士招募土勇的命令：照得现在法防戒严，兵力尚须厚集，本司道查彰化县辖之南投、罩雾乡迫近内山，捍御生番，动资炮火。故居其地者，素于火器均极精练，铳具系自制造，施放极有标准，长约一丈零，腹大而轻，善受铅药，兼能及远。其中膂力精壮者，亦多可用。该县绅士林朝栋、林文察、吴朝阳等聚族于斯，素为一乡信服，应饬该绅等各募不吸洋烟、年力精壮土勇五百名，均须自备用熟有准枪炮，随带赴募。先由该绅开招面试，或中三枪及二枪、一枪，分定次第。中三枪者，准充什长亲护兵，照楚军行粮发给；中二枪者，准照楚军正勇口粮，月给四两二钱；中一枪者及不能命中而人尚精壮者，照现募仁营虎勇章程，月给口粮三两六钱，俟训练娴熟之后，果能打仗，准照楚军行粮一律给发；其所需子药，并由局按数领用。俟招齐后，送郡点验，由本道当堂复试枪准果否相符，再照核定口粮。并编列礼、义、信字营名，即委该绅为正管带，另由本道委帮办一员，归高分统登玉节制调遣。每营四哨，设正哨长四员，概由该绅在本地选派，其副哨名色改为教习，仍给副哨薪粮，由该绅等禀请在楚军营内派往，免至将来借材异地。

后来，由于林朝栋前往暖暖助守，高登玉所统仅候选同知林文钦、广东候补同知吴朝阳等土勇两营。其中林文钦营于十一月成军，吴朝阳营于十二月成军。刘璈又准每营各用长夫

80名，每名月给薪粮二两四钱。据战后刘铭传派人点验，吴朝阳土勇一营，空勇18人，全营无一长夫；林文钦一营，空勇49人，亦无长夫，官长仅见前哨哨官，林文钦并各哨弁均不在营。为此，刘铭传曾奏参二人。这两营土勇主要协守中路，均未参加实战。

此外，刘璈曾奏称台南、中、前、后四路统领请添防勇事，却未见详细禀报，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7日）的奏折中，左宗棠提到刘璈札委凤山县武生杨应龙就地招募土勇一旗，借资调遣。（据刘铭传严劾刘璈折，台南招募的土勇共五营。）

后来，前浙江温州镇总兵吴鸿源渡台，被饬令驻守中路彰化，所部仅一营，兵力太单，准其添募土勇三营。左宗棠派道员陈鸣志渡台，途次澎湖即禀请招募土勇两营。又派前江苏题奏道王诗正率湘军赴台，因台地语言难通，路径歧杂，哨道间谍，非土勇不为功，也请添募土勇两营，均蒙左宗棠允准照数添募。

经过这样的逐渐添招，台北约共招募土勇万人，大大弥补了防军的兵力，在后来的基隆外围争夺战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2. 大办团练。为了弥补前敌的兵力不足和巩固后方治安，台北也像台南一样，大力举办团练。连横先生关于此事记称："当是时，巡抚刘铭传驻台北，亦办团练，奏简林维源为团练大臣，各府厅县设总局，以名望绅士理之。下设分局，各乡置团，划为一段，以卫乡里，严守望，诘盗贼，其制甚善。"[1]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647～648页。

连横先生所谓在刘铭传任福建巡抚后，奏简林维源为台北团练大臣一事，可能有误。因为林维源早在开战前即已离开台湾去了厦门，抗法期间一直未能回台湾，既然如此，刘铭传当然不会轻率地奏简林维源为台北团练大臣。举办台北团练，刘铭传依靠的是退职知府陈霞林等台北绅士，“皆令设局办团，以期联络居民一气”。在基隆外围争夺战中，台北的团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3. 举办捐借。向台湾富户捐借是清政府解决台湾饷项的一个办法，从七月起就指示刘铭传等举办。在《台湾通史》一书中，连横先生认为台湾举办捐借的成绩很大，并把功劳全都归于刘璈身上：为了解决台湾的军饷问题，“防务大臣刘铭传即定璈办之。以台湾军饷先以十个月计之，需银二百万两。全台各县，彰化最广，殷户较多，应派四十万两；淡水、嘉义次之，各三十万；凤山、台湾、新竹、宜兰，又次之，各二十万。澎湖地瘠，恒春新建，均免派，南北两郡郊商各十万，分为十月匀缴……其时淡水林维源先捐二十万两，各属绅商亦慷慨报效，故防务之中，兵饷得以无缺”[①]。一些大陆史学著作也引用了连横先生的说法，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因台湾地方贫瘠，富户不多，刘铭传等人虽然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举办捐借，但效果似乎不大。

例如，关于台北绅商的捐借，应该是刘铭传和台北各官绅的功劳，不能笼统地算到刘璈的身上。因为刘璈的筹办捐借章程是九月间才拟出并上禀刘铭传的，得蒙批复后实际施行的时间则更晚。而早在八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就有旨：“刘铭传当联络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263页。

绅董,因地劝捐。”[①] 奉旨后,刘铭传即派同知刘寿铿向林维源劝捐,林维源“允捐二十万元,并先缴十万,以济急用”。到十月初,刘铭传因饷项支绌,又札令李彤恩会同福建候补知县郑建中,到台北府城会同官绅办理捐借饷需事。李彤恩等即会同陈霞林等向台北城乡殷户借银票二十余万元,毫无勉强,即已办成[②]。但这两笔捐借似乎不应列入刘璈的计划内。

至于刘璈所拟捐借 200 万两，则只是一个书面计划，实际并未办成。当时，刘铭传在审阅这个计划后，就于十月廿九日（12 月 16 日）报告清政府，“刘道议捐全台二百万，绅民哗然，万做不到，空言大话”[③]。据刘铭传翌年总结此事称，他后来和左宗棠、杨昌浚先后批令刘璈将捐借总数减为 100 万两，以期实效。“讵刘璈徒事空言，抗不遵办，亦无一字禀陈。本年正月臣派前贵州藩臣沈应奎总办全台粮饷，会同刘璈筹办捐输，驻扎彰化。沈应奎委催各县举办，刘璈置之不问，各县阳奉阴违，俱不肯认真筹办。惟台湾县知县沈受谦首先劝捐报捐银一万两，嗣后各县始陆续筹捐，除淡水借用银票未办捐输，其余台、凤、嘉、彰、新、宜六县共筹捐洋五十四万元。直至三月初一日停战通商，始据刘璈申复筹捐一百万两，台南绅民均以刘璈议定开口后停止缴捐，各怀观望。台湾县知县沈受谦已缴捐洋三万五千余元，彰化县地方殷富，经沈应奎督同县令蔡麟祥分催，已缴洋五万六千余元，其余各县或缴一二万不等”[④]。

---

① 《中法战争》(5),第 576 页。
②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二,第 18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219 页。
④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八，第 5 页。

从刘铭传此奏来看，全台捐借并不顺利，除台北地区因正当敌攻，所以捐借40万外，其余各地仅共捐50万余元而已，而且还是书面数字，须至光绪十一年三月后才陆续缴交，而在光绪十年需饷最殷的十至十二月间，并未能有补战事。据台湾道库簿据所载，到十一月，刘璈分管的台南中前后四路军兵的营饷已"无款支发"。十二月，刘铭传报称："捐输一时难集。"光绪十一年正月又称："台饷紧要，捐借至今毫无头绪，已令沈应奎妥筹速办。"二月又电称：饷项台南业已告竭，台北仅能支发一月，并无连横先生所谓的"兵饷得以无缺"的充裕情形。战后，刘铭传严劾刘璈，在捐借一事上空言大话也是其罪状之一。

至于台北抗法军民是如何解决武器弹药不足的困难，诸书记载均少，大概不出张之洞所谓的："可饬地方文武赶速多造土药，备土枪为持久计"一途。此外，刘铭传曾奏称："令工匠连夜修理各营所缴旧枪，分拨应用。"也是一个办法。不过，这些不是办法的办法似乎作用不大，刘铭传对此并未寄予多大希望，所以常有"土勇器械不精"的感叹。法国台湾远征军司令杜琛尼也指出：清军武器落后的情况大大减轻了对于法军的威胁，"如果华军能正确估计他们武器的射程，他们肯定会使我们无法守住所占领的堡垒"①。

五　清政府援济台湾的努力

从上节可知，由于受到当时本身条件的限制，因此，依靠自身的力量，台湾军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兵员、武器及饷项不

①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

足的困难。要坚持长期的抗法战争，还需要清政府从内地给予大力的援助。

清政府对于台湾的援助，是随着台湾抗法战争的日益深入而逐渐加强的。

奉命赴台之始，刘铭传虽然知道责任重大前途多舛，但对于具体将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并不能预知。所以，他只是筹备了一些饷械，就带着李鸿章拨给的百余将士匆匆赴任。

基隆首战后，刘铭传向清政府告急称："兵单器缺，茫无措手。"已经有请清政府除运济饷械外，还要派遣援军的意思，只是碍于他在受命赴台前后，曾向有关方面如曾国荃等表示过"不调铭武各营"[①]，因此还不好意思明言。待到马尾战后，清政府对法宣战，法舰麇聚基沪海面，局势十分严重，刘铭传这才放下面子，于七月初八日（8 月 28 日）致电清政府，明确指调分隶南北洋的铭武旧部："台军人数不足，又多烟癖，平时不操，利器不能用，已请南洋派铭武两营"，并要求北洋"速饬刘盛休派三营，或赵或聂来台助我"[②]。二十四日（9 月 15 日），他再次电称："兵单不能分守，台北紧急万分，请饬南北洋迅遣救兵来。"[③]

由于台湾在抗法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因而清政府也把援济台湾当作是重要的事情，对于刘铭传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在得知基隆首战的捷报，下决心对法作战之始，清政府便于六月二十八日（8 月 18 日），下旨指调驻防广东的铭武旧部赴台援助："著彭玉麟等速拨吴宏洛五营或他军，携精械航海至旗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028 页。
② 《中法战争》(5)，第 531 页。
③ 《中法战争》(5)，第 540 页。

后上岸。”彭玉麟等因吴宏洛守长泰要冲，无可替代，建议清政府改调南洋铭营赴台，并举荐起用素称谋勇，告病居厦的前温州镇总兵吴鸿源或在厦募数营援台，或径赴台募数营助战。清政府纳奏，于七月初二日（22日），有旨指示南北洋及广东等三处督抚：“趁此未经开仗之时，务望广东督抚速行多备枪炮、军火运往省三处应用，南北洋大臣一并设法接济。”① 对法宣战后，又于初七日（27日）指示曾国荃：“即饬章高元旧部迅速赴台”②。并“奉谕饬吴鸿源带所部千人赴台助剿”③。

李鸿章与刘铭传的关系不同一般，六月二十八日奉旨援台后，二十九日（19日）即“饬沪员密雇英商轮船运军火赴淡水”④。七月初八日（28日），刘铭传致电李鸿章称龚道解到枪1500杆，可能即是此次运送的。至于派兵赴台，李鸿章则表示因雇船装运不易心有余而力不足：“南北各口商轮因各国示禁接济，均不肯为中国载运军火兵丁，省三请拨铭营，又无可辞，但商轮不敢冒险装运，亦无可如何，姑商南洋酌办。”⑤

广东督抚两奉谕旨济台，七月初一日（21日），张之洞等致电总理衙门：“竭力搜得卑钵北洋步枪一千二百枝，马子五十二万，炮弹一万二十磅，并饷银二万两，雇船径送淡水，后日抵台。”⑥ 八月十三日（10月1日），张之洞致电刘铭传：“饷已到台郡交讫，械现已解台。”⑦

---

① 《中法战争》(5)，第510～511页。
② 《中法战争》(5)，第521页。
③ 《中法战争》(6)，第2页。
④ 《中法战争》(4)，第185页。
⑤ 《中法战争》(5)，第572页。
⑥ 《张文襄公全书》电奏，卷一，第3页。
⑦ 《中法战争》(4)，第451页。

曾国荃对于拨发军械济台倒是积极的，奉旨后，“派道员龚照瑗雇英国野雉船两次，密载炮位军火多件，运到基隆、淡水”①。至于派兵援台，他在开始时则意存犹豫，以“现正江防万分吃紧，铭武八营扼守雄关，势难抽调”为由，再三推托。后经李鸿章、刘铭传函电催促，清政府又迭次饬江阴铭部刘朝祜四营赴台，曾国荃才发给刘朝祜部各项精良器械军火及3万饷银。由龚照瑗于八月初二日（9月20日）雇“万利”、“汇利”两船，到江阴装刘朝祜部600人，于初三日驶至沪尾海面，只赶用驳船卸约二百人，余下则因海面风势紧急，两船无法停留而折回上海。接着，又改雇“华安”轮于八月初十日（28日）载三百余人由新竹登岸。“船价之贵，实为闻所未闻，而英船以鞭笞凌厉勇丁，金云见所未见，只以欲救基隆之急，不得不忍辱包羞”②。八月中旬，又雇“威利”船载第三批兵丁正待出发，因法军已攻基隆、沪尾，海面航路不通而罢。八月二十四日（10月12日），刘铭传奏称：“前者南洋装兵，竭无穷之力，三次仅装六百人，万分险阻。”③

沪尾战胜后，法舰厉兵秣马，意图报复，台北形势更加险恶。除刘铭传仍频频催促南北洋援助兵械饷项外，孙开华也利用其署理福建陆路提督的身份，要求福建督抚派兵援助：“迭咨彭楚汉由厦拨两营速渡，并催吴鸿源驰援。”刘铭传还特别强调济饷问题：台北饷缺尤甚，将帅无银支发，亦不足以驭众，较运解兵械尤急。十月十八日（12月5日），副将侯得胜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032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210页。
③ 《中法战争》（5），第576页。

从台湾回厦门，亦称：台尤缺饷，金每两换洋卅五六元①。根据刘铭传的要求，九月十三日（10月31日），清政府有旨指示南北洋暨广东、福建督抚："凡有可以援台之处，竭力筹划，切勿畏难坐视。"② 十月间，又命南北洋派出兵轮援台。

刘朝祜四营2000余人，南洋仅运600人，不及三分之一，当务之急是要把余下千余人运送台湾。九月十六日（11月3日），邵友濂、龚照瑗雇得"威利"轮驶至江阴，装载勇丁640名、官10员，于二十八日（15日）开行，由法舰封锁不到的恒春登岸。但上岸了430人后，因风浪过大，船舶不能湾泊，尚余220人未能离船登陆，复并洋炮十二尊载回厦门③。"威利"轮返回上海后，龚照瑗等与船主商量续载余下的铭军前往，经过一番折腾耽搁，延至十一月初六日（12月22日），"威利"轮才将江阴淮军尾帮扫数装船赴台，曾国荃"并因台地需饷万紧，饬上海邵道由关税项下先手以五万两易金，即附该船而行"④。初十日（26日），"威利"轮驶至台东海岸，因岸高浪猛，未能登陆。随后觅得引水两人，于十一日（27日）驶至台南，放划上岸，觅雇竹筏民船，冒着大风浪，才将所载兵勇、军械和饷银各件全行上岸，丝毫无遗。"台民欢声动地，云有神助。"十一月十七日（1月2日），曾国荃奏报清政府："威利"轮船载送尾帮渡台勇丁六百名及随带饷银军械等件，已于十一月十三日（12月29日）悉数抵台登岸，恰应刘铭传

① 《中法战争》(6)，第195页。
② 《中法战争》(6)，第20页。
③ 《中法战争》(4)，第289页。
④ 《中法战争》(4)，第290页。

之急需[①]。接着，曾国荃又将广东订购的云者士 12 响马枪 1000 杆、枪弹 100 万，运解厦门交吴鸿源之子妥运赴台，大概也是雇的“威利”轮船。龚照瑗等还嘱船主到厦门后，顺将前寄该处的 220 名淮勇及大炮等附搭赴台。后来才知在此之前，彭楚汉已由“平安”船送至澎湖，换搭渔船暗渡。至此，南洋运兵济台事才算告一段落。后来，曾国荃致函刘铭传称：“江阴四营之赴台也，为日太久，槎浮太难，经仰蘧等千方万虑，始得运峻。”[②] 功虽未丰，劳不可没。十二月间，曾国荃还通知刘铭传：“近得仰蘧沪上电报，密雇糖船装两磅弹七千，拉火万枝，并台地定购之过山炮十尊及各件，由该糖船包送到台，已于十三日开行。祝其安稳报到，以应麾下之用。”大概平安送达。

北洋运兵赴台，也需从上海雇船。当洋船忙于运送江阴铭部时，则北洋无所措手，只得设法先汇饷银台北救急。九月间，李鸿章督同在津司道多方罗掘，于长芦运司库历年商课内凑拨银 10 万两，交由上海怡和洋行，“设法将汇票在台兑换，将所得银两交与统帅刘收用”[③]。又于历年帑利项下，借垫银五万两，交由厦门绅士候选道叶文澜，设法汇兑台湾。十月间，叶文澜电告李鸿章：“汇项五万，初六到淡水。”[④]

等到“威利”轮运完南洋援台兵勇后，北洋始得雇其于十二月初七日（1 月 22 日）到榆关，装载聂士成所率北洋援台弁勇 870 人，“除勇丁带枪刀之外，炮位军火成箱四百余件，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529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306 页。
③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371 页。
④ 《中法战争》(6)，第 157 页。

饷银二万余。初八至燕台，添购炮船二只。十三夜抵台东之卑南，未见法船，即拨勇护饷上岸。天明，番民咸呼天兵又至，争放竹牌来接。至十四午刻，勇弁饷械全数到岸，点清守候。”以装人数计，该给“威利”轮水脚银14700余两[1]。

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3月7日），李鸿章将南北洋援济台湾情况奏报清政府：计自六月至十二月，道员龚照瑗会同苏松太道邵友濂，雇船探信，传递折报，并多方重价购觅商轮民船，先后十次昼伏夜行，运送淮军3000余名，大小后膛钢炮60余尊，后膛新式洋枪9000余杆，大小枪炮子弹300余万颗，水雷40具，电线80余里，饷银10万余两，以及拉火、铜引、火药各项，一一解到，并无丝毫遗失，“刘铭传迭次电信：得以保全台北者，实赖有此接济。所有押运员弁司事及中西各式人等多未支薪水，皆能共行忠愤，涉风涛而不却，冒锋镝而犹前，出生入死，亲赴前敌，洵属著有异常劳绩”[2]。刘铭传也于光绪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奏称：“臣与南北洋、闽、粤各疆臣，广悬重奖，俾由民船冒险往来。其陷于敌兵，坏于风涛者，群相踵接，各员于万死一生之中，间道接济，幸而得达，无不蓬头徒跣，憔悴无复人形。”[3]

在指调援台的铭武旧部中，刘铭传特别钟意驻防广东的记名提督吴宏洛及其所部，因而自六月至十二月，多次请旨指调来台，但广东督抚一直以种种借口推托搪塞。到十二月十五日（1月30日），还欲以游击方沿所率粤勇五营代替援台，为刘铭传所拒绝。有记载绘声绘色述其援台事：吴宏洛，性至孝，

① 《中法战争》（6），第271～272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651页。
③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九，第11页。

笃友爱，公困台北，宏洛方守粤，督师强留之，屡疏调不遣。宏洛闻公急，独舍军孤身诈渔服，用大雪抵台，人军帐大呼："吴宏洛来！"公大惊，狂喜出，见其寒且冻也，急脱狐裘服之①。

九月二十日（11 月 7 日），张之洞电告总理衙门：奉旨济台军火，已购备前膛洋枪千枝，洋药数百担，托人向港厦多方商办，饵以重价，拟俟能解再奏闻。十月初一日（18 日）又电称：兹与一洋人商，允令相机汇兑银两赴台，俟取有台湾收银确据，随时照付，汇银多少难定。援兵难往，现访求得湘、淮熟习将弁愿往者十数人，并募得煽土提漂制药员匠 13 人，令其设法潜渡，借可稍助臂指。今连前共购得前膛大吉洋枪二千枝，枪炮药十万磅，铜帽百万，派员运往泉州一带相机分起雇民船，潜由鹿港登岸。达与不达听之，即被截，所费尚不甚巨。张之洞的这番努力没有白费，刘铭传后来奏称："十月初，两广督臣张之洞雇轮澎湖，复济饷银三万两暨火药等项。"

十一月以后，广东督抚设法多次运送饷械赴台湾。十一月十二日报称：近运两次台饷，一三万两，一二万两，均由布袋港登岸，奏闻。又由华商分三起汇银五万元。至军火，乃派员弁四出，于仙澳泉厦一带设法。船小而难，现起解两批，已到。十二月十一日（1 月 26 日）电称：粤济台军火三批，皆民船运送。第一批出发后即无音信，第二批初五日到，第三批初七日亦到，遇法船，得旗后炮台开炮护之。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4 月 7 日），左宗棠电称：昨粤督咨，委解大吉枪

① 《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首、惩暴略序十。

2000，士乃打枪 500，并子药大批赴台，如能早到，当资接济[1]。除此以外，八月二十六日（10 月 14 日），张之洞致电李鸿章：宜为台亦定 10 尊气炮。十二月初四日（1 月 19 日）电奏，借德商五十万镑，以百万作援济台越用，余作气炮用，初六奉旨依议行。可能由于得到较迟，已无补台湾战事。战后，刘铭传奏称：广东先运送士乃得枪 500 杆，大唧前门枪 3000 杆，协饷 10 余万，均当台北急需之际，立救危亡。三月以后，张之洞复委员陆续解饷 10 余万，运送后门枪 3000 杆，尤是始终如一。

福建督抚为台湾的该管上司，有责任援济台湾。但七月马尾战败，福建督抚被参革，局面动荡，所以清政府也不强求福建援台。后来，清政府任命大学士左宗棠督办福建海疆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杨昌浚为闽浙总督，福建局面渐定，清政府遂将援济台湾的重任主要放在福建。

清政府原以为闽台相近，渡兵容易，于八月二十二日命杨岳斌即带湖南现有八营迅赴福建，设计渡台。但杨岳斌军行迟缓，十二月始到福建，渡台则更迟，已无补于战事。九月初六日（10 月 24 日），左宗棠命彭楚汉募漳泉勇渡台，孙开华也函嘱就厦招募楚勇二三百名渡台助剿。但彭楚汉雇“福建”轮船搭去 60 名赴台，却被法舰阻截，未能登岸即返，福建当局运兵援台一事暂告失败。

九月初，李鸿章嘱杨昌浚潜运银 12 万两赴台[2]。二十三日（11 月 10 日），刘铭传也电请清政府速饬闽督，转饬厦门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867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20 页。

闽关道备银 20 万，知会叶文澜属其信知各商存银在厦，见兑单即发[1]。福建当局遂利用闽台之间微妙的经济联系，在饷项方面大力援助台湾。

当时台北兵勇用款，每月需银 11 万两，但九月间存饷仅余 10 万两，勉支一月，十分紧急。十月间，杨昌浚、叶文澜先后派专人到达台北，觅兑厦门饷 10 余万两，“暂救目前”[2]。刘铭传十月即电称：“饷拼凑敷至年底。”[3] 曾国荃曾有函称赞彭楚汉：台南北及澎湖三处所需款银及军火等件，经执事统顾兼筹，多方解济，为数已多，可以暂应目前之急。其中，彭楚汉十二月函称，闽省拨解台饷，由厦汇寄已数次，汇去台北 19 万余两[4]。至十二月，台北又陆续收到兑款 30 余万元，“饷可支至明年二月底”[5]，基本解决了问题。

十月二十七日（12 月 14 日），左宗棠到达福州，他关念台湾局势，“连日商定以救台为急”，以极大的魄力来组织和推动运送兵员饷械援济台湾。

吴鸿源奉敕援台，七月间已将两营招募成军，但因雇不到船只运送而不能渡海。九月间，在福建督抚的迭次催促下，吴鸿源欲以重资雇请洋轮或民船运送，均因法舰封口而不果。左宗棠到闽后，问及此事，因其带勇航海困难，遂变通办理，饬令选带得力将弁配渡，就地募勇助剿。吴鸿源于惠安县辖的崇武、獭窟等澳雇到渔船四五只，将随带的春字营防勇，按船酌

---

① 《中法战争》(4)，第 215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189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217 页。
④ 《中法战争》(3)，第 244 页。
⑤ 《中法战争》(4)，第 296 页。

配，于十月二十九日（16 日）起程渡台，驶赴台湾梧栖港登岸。闻知吴鸿源渡台后，十一月十二日（28 日），张之洞电奏清政府，极力吹嘘吴鸿源：该镇兼谋勇，习台事，以克复基隆自任，则台必得力。洞见澎湖副将苏吉良函，极言台人盼吴。并要求将广东在上海新购的云者士枪一千杆、子弹百万发拨给吴鸿源部[①]。但吴鸿源渡台后，因只带一营兵勇，拟于彰、嘉一带募三营以厚兵力，而集结训练、添办器械，非一时所能竣事，刘铭传遂命其驻守彰化，就近招募，腾出彰化守军杨金龙所部楚勇两营、练军一营驰赴台北助防。由于吴鸿源的新募三营无器械，由刘铭传于台北拨给洋枪 300 杆。等到两人见面后，刘铭传对于吴鸿源的印象却并不佳，电称：吴鸿源年近七十，素带水师，所部皆水师将官，新募土勇，器械不精，兵将又不得力，只派令防守中路[②]，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由于到任伊始，左宗棠即参劾刘铭传不能及时收复基隆为“懦怯株守”，而以收复基隆为己任，决定派出湘军赴台执行这个任务。十一月间，他檄饬前江苏题奏道王诗正统领恪靖亲军三营陆续开赴泉州、蚶江一带取齐，扮作渔人，黑夜偷渡。又派江苏候补道陈鸣志克日渡台，会商台湾镇道及地方士绅，妥筹恢复基隆之策。十二月初，左宗棠又续派记名提督申道发管带恪靖刚营，杨昌浚又于督标楚军各营内挑选一营，委县丞朱佩馨管带，克期继进，仍归王诗正节制调遣，以厚兵力。十二月，王诗正、陈鸣志率三营从澎湖渡台。正月，后帮二营也由“平安”轮船载送卑南登岸。有记载称：王诗正，字纯农，湘

① 《中法战争》(6)，第 205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379 页。

乡人，湘军名将王鑫之子，曾随左宗棠平定新疆，左宗棠尤以国士待之，为忌者劾归。赴台时，慨然率数千人乘夜发，亲友知其事者，临送，无不为之泪下。始迂道出澎湖，乃易商船，甫半渡，天黑风厉，海波涌起，舟乍为礁石所破，水骤入没膝，舟中人皆号，而夷船巡弋者方衔尾掠而过。王诗正躬撤卧褥塞舟所穿处，越日乃得济[①]。后来，王诗正、陈鸣志等又添募土勇四营，于正月中旬抵达台北，十八日赴基隆外围参预作战。一同赴台的还有刘璈等新募岳军1500人。

杨岳斌迟至十二月十四日（1月29日）始行抵福州，与左宗棠等计议后，于十九日（2月3日）驰赴泉州，先妥布置，等各军到齐，即设法分批渡台。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八日(3月4日)，杨岳斌率一营由泉州出分，绕道澎湖，于二十一日从卑南登岸。二月初，杨岳斌赴台南视察防务，一面等候后续军兵渡台，一面与刘璈切筹台南防守事宜，"旋即为病魔所窘"。三月二十日（4月5日）始行抵达台北府城，其时已经停战。二月二十六日（4月11日），杨岳斌部乾军七百余人，乘"平安"船渡台时被法舰掳去。

左宗棠还指示闽浙当局大力拨解饷银济台。正月初八日(2月22日)，福建先就厦门闽海关所收税项，随收随解赴台。又饬令藩司筹解3万两赴厦，并拟一俟洋款借到，再大批汇济台湾。当刘璈委员在上海购械需款时，又拨银3万两付给。据报，在正月间，福建已汇解台北银83000余两，采办银5500两，并汇兑台南银9000余两[②]，将近10万两。到二月，左宗

① 《中法战争》(3)，第155～156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699页。

棠又奏报清政府："洋款甫交百万，已汇兑二十万赴厦，交彭楚汉、叶文澜等汇兑（台湾）。毛瑟枪子此间仅存二十余万粒，亦拟设法解去。"

综上所述，在台湾抗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命令南北洋、广东、福建等督抚，给台湾运去军兵万余人：包括杨岳斌所率一营500人，陈鸣志所部约千余人，刘朝祜部2000余人，王诗正部2500余人，聂士成部875人，吴鸿源部500人，广东500人，刘璈等所募1500人；饷银百余万两，包括北洋15万，南洋5万，广东约30万，福建约七八十万；前后膛枪约2万杆，大炮60门，以及子药大批，远远超过台湾军民自筹的数目，成了支持台湾抗法战争的重要物质力量。

内地援台最悲壮的一幕，就是南洋五舰与法舰的战斗。早在光绪十年十月，因法舰封锁台湾海面，福建当局援台困难重重，遂请求清政府指派南洋水师舰船前往，"借分法势"。南洋大臣曾国荃遵旨于十二月派出"南瑞"、"南琛"、"开济"、"澄庆"、"驭远"五舰前往。但这个行动很快就被法方侦知，派出法舰沿途截击。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3日），南洋五舰在石浦洋面与法舰遭遇，正准备作战时，"忽风雨大雾"。过了一个多时辰雾散，"澄庆"、"驭远"两舰避入石浦，其他三舰则避至镇海。

战后，曾国荃派员调查"澄庆"、"驭远"二舰避入石浦的表现称：

该五船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潭头山洋面甫经驶出，突见法船七艘由北衔尾冲来。正在前驶迎敌，忽然大雾弥漫，咫尺莫辨，所幸"开济"、"南琛"、"南瑞"三船驶行较快，"澄庆"、"驭远"开满机器行驶迟缓，被法船

开炮轰击，渐逼渐近，万分危急。该船自知众寡不敌，遂驶入山口之三门湾。不料法船封围港口，有铁甲三艘将出路截住。蒋超英、金荣深恐以船资敌，遂入石浦为自守之计。戌刻，法小轮船入口，当经该船击退；并商之管带象石练军副将刘青山，派队排列岸上，帮同御敌。三十日（14日）卯刻，法舢板驶入内港，我轮船用炮击退。巳刻，又由小火轮拖舢板两只，每只约数十人，由铜瓦门至东门外洋面测量水道，意图进口劫夺船只，并入港窥探，屡经开炮轰击。众目共睹，石浦厅黄贻桥等亦均禀明有案。是夜天色昏暗，远望各口门时有法酋小轮窥探，均随时开炮轰击。初一日（15日）寅刻，法酋又以小火轮夹杂于被掳渔船之中，乘黑潜入，偷放鱼雷。该两船后艄均被碰伤，其船上水手勇丁素未经战阵，相率凫水潜逃。蒋超英、金荣力为阻扼，犹冀补救。讵两船受伤之处，逼近火药舱，倘被轰燃，不特全船人命均成灰烬，且恐祸延居民，殃及商船；又患法人掳去船炮，不得已亟放水管，引以自沉，救全船炮。时蒋超英、金荣志在与船俱没，经弁勇扶掖上岸。①

在石浦施暴后，法舰侦知“南琛”等三舰藏匿在镇海，便想一鼓作气，把三舰消灭，于是由孤拔率领“巴雅”号、“尼埃利”号、“凯旋”号及“梭尼”号前去攻击。而浙江当局早就严阵以待，与法舰展开激战。事后，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向闽浙总督杨昌浚禀报战事的经过称：

此次法船势甚凶狡，利见先于正月十四日（2月28

① 《中法战争》(6)，第414－415页。

日）戌刻探得法酋驶来四船，排泊镇口七里屿洋面，当即函商北岸统领亲兵营提督杨岐珍整备，一面飞传南岸各营严阵以待，并抽调各队赴金鸡山布置；饬达字中营提督伍金洪率五成队伏西北隧道以备冲锋，饬练军副中营参将郑洪章率五成队伏西南隧道以备包抄，饬健左旗副将费金组率八成队伏沙湾海滨堤墙之下以备策应；此外楚军练勇各营，各出三成队，轮替分守各段卡墙，仍留七成队驻营听候调遣；凡各要隘密布地雷，责令经管电线熟手临时引机即发。杨岐珍得信后，即将所部亲兵营抽派总兵何乘鳌两哨，各带过山炮分守北拦江及县城西北隅，派左营帮带蔡邦清率领二哨分屯洋关福建会馆；其亲兵一哨带格林过山炮驻守东岳宫、长城，兼助新修炮台，并调中营总兵璜瑾带队驻招宝山迎敌；其游击王鳌所带之右营，总兵龚锦标所带之后营，均饬严密戒备。利见复会商轮船统领吴安康，督率"南琛"、"南瑞"、"开济"三船，同心御敌，又谕饬"元凯"、"超武"管驾副将贝珊泉、都司邹骢保，实力扼守；五兵船与红单船分泊椿内，其塞口之"宝顺"轮船，紧泊中留口门，先将四石船沉下，如至万紧，即行沉塞。所有炮台、兵船，谕令必计弹子可及敌船，即行轰击，勿开虚炮。陆师队伍均各衔枚蹲伏，敌不登岸，不准外露。又商之营务处同知杜冠英移驻招宝山，守备吴杰总带炮兵督守两岸炮台，何处紧急，立即亲督战守。会商既毕，随带帮办营务数员，亲驻金鸡山督率，兼顾天然、自然两炮台，相机调度；一面飞饬统领小队各营总兵钱玉兴，安排后路接应，并商由地方官，禁止渔商各船出入。

布置甫定，十五日（3 月 1 日）巳刻，法先以小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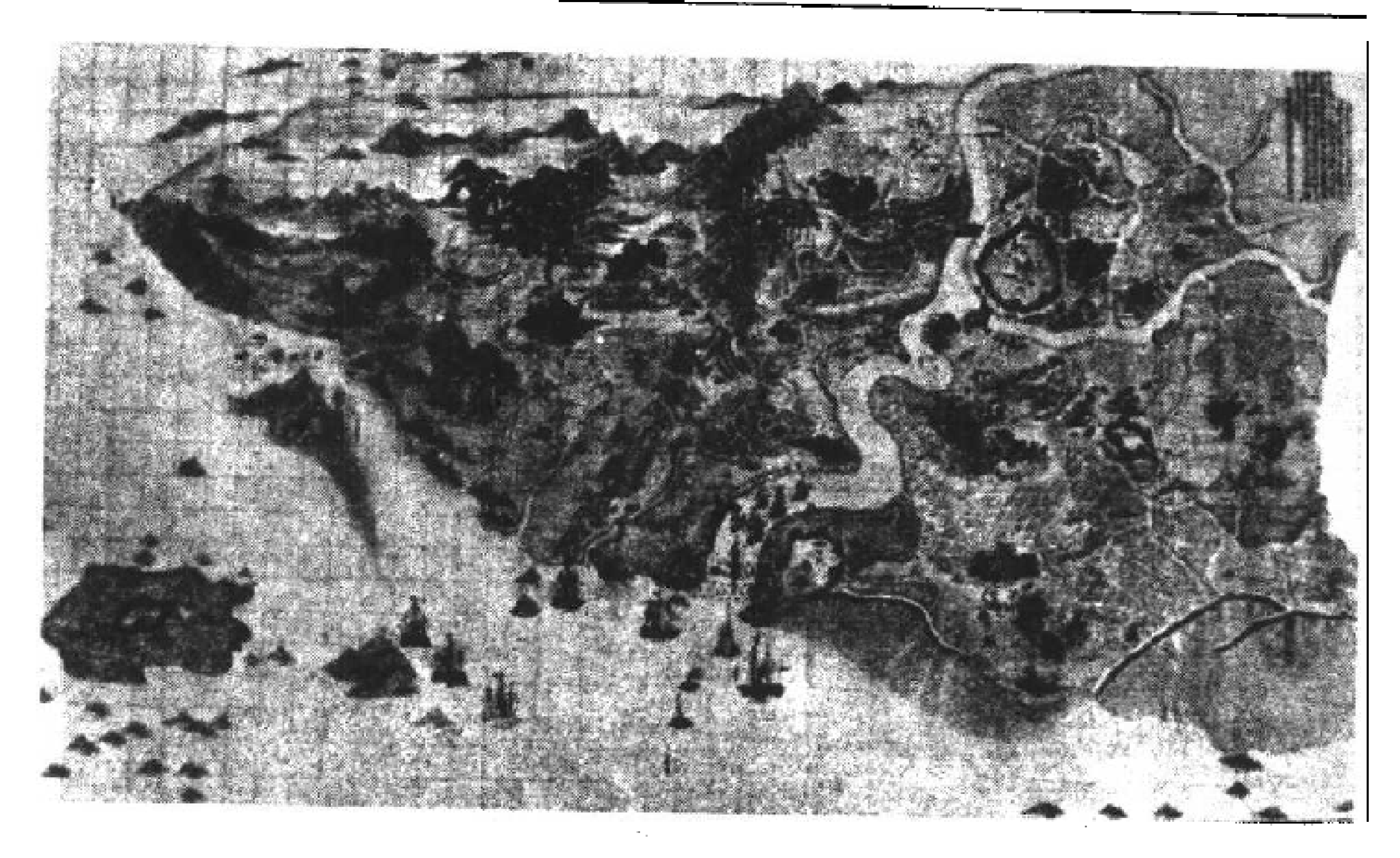
来，径向游山口暂泊之商轮探信，经招宝山炮台开炮击退。旋见一大黑舰开驶进扑，三船尾之而进。我军兵轮炮台齐力轰击，连中数炮，将当先之大黑舰洞穿船身，法兵被伤不少，犹复冒死前进。我军竭力酣战，敌不能支，猛放黑烟，弥漫海面，图蔽我目。我军仍复痛击，黑船方始败下，衔尾三舰相继亦退。其时后路统领钱玉兴亦督率所部小队赶到驻守衙前山策应。此十五日初次接战击伤法船之情形也。我军战后查点各营，惟招宝山炮台被弹阵亡炮兵二名，受伤一名，北岸亲兵营弹毙长夫一名，该台受弹甚多，略损无碍。……

十七日（5日）巳刻，法又换一黑舰，如前来犯。将出游山，即经我军炮台、轮船同时开炮，内一炮击穿烟筒，一中船尾，倒轮而退，受伤较前次尤重。[1]

经过这两次交战后，再没有大的交锋了。

光绪十一年五月辛未有旨奖赏守台诸将弁：提督苏得胜，著交部从优议叙；郎中林朝栋，著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前选用；总兵刘朝祜，著以提督记名简放；道员陈鸣志，著以道员归江苏候补班遇缺题奏；提督聂士成，著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海疆总兵缺出，请旨简放；柳太和，著遇有陕甘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副将刘天云，著交部从优议叙；提督刘见荣，著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总兵易玉林，著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总兵唐安仁、廖得胜、桂占彪，均著赏给一品封典；副将谈发祥，著总兵记名简放；游击肃清福，著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参将郑洪胜，著免补参将，以

① 《中法战争》(6)，第363～364页。



中法战争期间，清军在浙江镇海地区水陆布防图

副将尽先补用；都司陈辉煌，著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知府方策勋，著免补本班，以道员改留闽省补用；知县郑建中，著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仍留闽省归候补班补用；郎中林汝梅，著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选用；知府陈霞林，著免补本班，以道员仍留原省归候补班补用；内阁中书潘成清，著以同知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前选用；廪生李秉钧，著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前选用；同知刘勋，著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闽省归候补班补用；县丞蒋木鉴、黎庶怀均著俟补缺后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县丞戴运寅，著俟选缺后以知县归候补班补用；福建布政使沈保靖、前长芦盐运使额勒精额、道员奎俊，均著交部从优议叙；道员伍廷芳，著仍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选用；盛宣怀、孙钦昂、叶文澜，均著交部从优议叙；朱福荣、胡燏棻，均著仍以道员归候补班补用；邵友濂，著赏给一品封典；龚照瑗，著赏戴花翎；已革副将武清龙，著赏给参将衔；已革道员裕庚，著以知府留闽补用；已革花翎四品官兼佐

领金福元，著销除永不叙用字样；王诗正著赏给五品顶戴；沈应奎著赏给四品项戴；曹志忠、杨金龙、申道发、贺兴隆、彭楚汉，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吴鸿源著赏给头品顶戴。阵亡之总兵曾照礼、副将刘义高、千总段有升、把总尤运农、祁文等，均著交部照阵亡例从优议恤①。

由于自身的主客观条件所限，台湾要独自抵抗法军侵略是十分困难的，只是由于得到内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才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因此，台湾抗法战争是两岸合作、共御外敌的光辉典范。

六　澎湖的失陷

据说，澎湖列岛原是海中一块巨大的玄武岩方山，经过长时期的日晒雨淋，风吹浪拍，地床陷落，基础沉降，最后分裂成为几十个分离的岛屿，形成今天所见的澎湖列岛。其中，澎湖、白沙及渔翁是三个主要的大岛，各岛之间，环围着一个广袤的、几乎各处都深达 10～20 米的港湾，而包围在澎湖本岛内的马公港更是一个水深面阔的天然海港②。

和面积大约 3.6 万平方公里的台湾本岛相比，面积仅只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的澎湖列岛就像是一个小配角，犹如太仓一粟，牛尾一毛。但它位于大陆与台湾中间，西至金门、厦门约二百二十公里，东抵台南约五十公里，与台湾西部海岸的北港，仅隔着一条约三十公里的澎湖水道，从大陆到台湾，至澎湖时已得三分之二的路程。地理位置的这种特点，使得澎湖列

---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 1961～1962 页。

② 本节涉及到澎湖的历史知识，均引自连横的《台湾通史》及陈碧笙所撰《台湾地方史》两书，就不一一注明了。

岛比台湾本岛较易受到大陆移民的注意，因而开发也较台湾本岛为早。

据连横先生的《台湾通史》所载，澎湖之有居人，尤远在秦汉之际。或曰，楚灭越，越人之子孙迁于闽地，以至流落海上，甚或居于澎湖。可见，澎湖与大陆交通为时已久。到隋时，曾遣虎贲陈棱率军略至澎湖，见"其屿屹立巨浸中，环岛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苫茅为庐舍，推年大者为长，畋猎为业。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间，各牦耳为记"。据说，在澎湖虎井屿的东南，有海底沉城的遗迹，"天空浪静，望之在目，缭垣相错，周可数十丈。渔者常得其砖，色红坚若铁，然当没水凿之，上生蛎蚌，似千数百年物，或曰，隋代之所建也。"

到唐朝中叶，有汾水人施肩吾，在元和中曾举进士，但却隐居不仕，率其族人避至澎湖，有诗咏澎湖景物："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唐代以后，中国的对外交通贸易日趋发达，与澎湖相邻的泉州成为当时世界的四大海港之一，福建渔民出海打渔，就不时会到澎湖各岛停留。所以，宋元史籍已多有关澎湖列岛的记载。南宋时的泉州知州汪大猷在澎湖建造房屋两百间，派水军长期驻守，这是中国军队驻守台湾地区之始。元时，澎湖居民已多至一千六百余人，《元志》记称："澎湖，三十六岛巨细相间，坡垅相望，有七澳居其间，大约有土无木，土瘠不宜禾稼，产胡麻、绿豆，山羊尤多。居人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土商兴贩，以广其利，贸易至者岁常数百艘，为泉外府。"元政府时已设澎湖巡检司治理台澎地区。

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一度裁废澎湖巡检司，并尽迁其民于漳泉之地，澎湖遂成为弃地。倭寇乘机在澎湖出没，据以为侵

扰大陆沿海的巢穴。1564 年，总兵俞大猷率军追击海匪林道乾，曾在澎湖的暗澳筑城驻守。1592 年，明政府在澎湖重新设置游兵。1597 年，始创一游、一总、四哨，各乌船 20 艘，目兵 800 有奇。翼年春，又虑孤岛寡援，增守备一，游总哨舟师称是。后以兵饷难继，又减为一总、二哨，各乌船 20 艘，目兵 850 有奇。

明时，日本倭寇长期窜扰澎湖，但没有得逞。荷兰侵略者则继日本之后，两次侵入澎湖，最终在台湾建立了 38 年的殖民统治。

明末，郑成功要收复台湾，也是先率军驻扎澎湖以为根据地，向台湾发动进攻，终于迫使荷兰侵略者投降。郑氏政权在澎湖设安抚司治理，并加强防务，建炮垒，驻军万余人以守。康熙时，清军收复台湾，也是先在澎湖与郑军决战，打败郑军主力后，台湾即不战而降。

台湾归入清朝版图后，清政府先在澎湖设巡检司治民，设副将率两营两千兵驻守。雍正五年升海防通判，同治八年驻军减为两营七百余人。光绪年间建有妈宫炮台、大城北炮台及西屿炮台。法军侵台期间，台湾当局一度想加强澎湖的防御，但限于主客观条件，收效不大。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7 月 6 日），左宗棠奏称：

伏查澎湖诸岛，外蔽全台，内固金、厦，历来视为险要。然其地不产五谷，不生草木，薪米须取给于外；且仅协署一井，淡水亦复无多，故平日不能屯聚大兵，设为重镇。自中外通商，西人以兵轮往来海洋，如履坦途，局势大变。该岛悬隔海中，地形散漫，非有坚船巨炮，战守两难，实不足以自保。而自敌人得之，则足以塞援台之路，

而为水师停船之区，其势又在所必争也。上年津约中变，该副将等禀请军械，迭经前督臣暨臣等批饬台道就近筹给。惟巨炮一宗，自马江战役后，各国借辞公法，无由购运。此次法人以大队兵舰分途扑犯，外无舰船可援，内无山险足恃。澎湖向无城郭，协厅衙署逼近海滨，无可扼要。[①]

卡诺则记称：

澎湖群岛在台湾海峡当中，介乎福建沿岸和台湾本岛之间，占着一个中间位置。它包括十二个大小不等、半属沙滩半属珊瑚礁、有着错杂的锯齿形海岸线的岛屿。其中最高山峰在白沙岛北部，达到海拔七十二公尺。这是些刚刚露出海面的低地，大海在它们的四周延伸为广袤的泥泞或珊瑚的海滩，或是形成一些像马公和澎湖那样水深十公尺以上的良好的海港，而一年四季那些最高吨位的船舶都可以在这里躲避风浪并且出入便利。澎湖本岛、白沙岛及渔翁岛是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它们围绕着一个广袤的、几乎整个范围都深达十—二十公尺的碇泊港，而碇泊港又形成马公等三小湾。前两个小湾因为泥滩及珊瑚礁阻塞，船舶出入颇有困难；但围在澎湖本岛内的马公港则形成一个水深而面积广阔的海港，可供全世界一切舰队避难之用。这碇泊地的安全性吸引着由厦门开往台湾的戎克船，而建筑在港湾西北端的马公市街，成了澎湖群岛的首府和往来于台湾海峡的船舶所经常必去的避难处。澎湖本岛为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仅只东北方有一些极小的溪流，可是岛上

① 《中法战争》(6)，第504～505页。

到处都有水质良好的水井。土地为沙土或珊瑚质，故极为瘠薄；主要的耕作物为黍及落花生。估计有十八万人口的居民，分布在大半建立于可以避风的海岸屈曲的那些小村中。他们大多数以食鱼为生，他们的粮食大部分仰赖于台湾本岛的供给。

在法军进攻前，澎湖的防御情况是这样的：马公要塞，分为北炮台及与其相对的南炮台、四角屿炮台、测天岛炮台、渔翁岛炮台，大概装备有新式大炮十余门①。

早在第二次基隆之战前，孤拔就有夺取澎湖的想法。等到法军在台湾被困于基隆，无法扩大战果，孤拔遂力主改占澎湖，以为久守之计。得到法国政府的同意后，3月28日，法军派出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分队，分乘六艘战舰，一艘运输舰，前去攻打澎湖。卡诺写道：出征的大队指定为朗治大队。构成这大队的第二联队的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和第三十中队，每一中队的定员各为一百人，系由其他两个大队中仍还健壮的兵员挑选补足，共四百余人。加上各舰原有的海军陆战队，总数达900人。29日，上午7时，法舰“巴雅”号、“凯旋”号、“杜沙福”号驶进澎湖港。清军的四角屿炮台、随后是其他炮台，在将近2000米的距离相继向法舰开火，法舰马上给予还击。经过半个小时的炮战，法舰没受丝毫损失，而守军各炮台却渐渐缓和了炮火。到8点钟，测天岛停止射击，南炮台及四角屿炮台都已撤退，四角屿的守军泅水逃走。只有北炮台及C、D炮台抵抗较为顽强。法舰集中火力轰

①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本节另处所引卡诺资料均出自此书，就不一一注明了。

击，到9点半，将其轰毁。接着，法舰逐个轰毁各个炮台。下午5点钟，法军在圆顶湾登陆，“登陆运动不曾遭遇任何困难便完成了，敌人不曾在任何地方出现”。夜间，法军还破坏了封锁马公港的栅闸，赶走守军，占领了马公港。30日，登陆法军开始向岛上其地方出击。“中国人用来召集部队的号角，不久便在东南方响起来；三百五十名乃至四百名武装的中国人从X村和Y村以及Kisamboue村出来，在平原上集合着。第二十五中队的若干发排枪，未能阻止敌人将队伍编成并从一些高低不平的道路来迎击纵队。他们在我们前面展开并发出了最初徐缓但却逐渐加强的射击。第二十六中队在第二十五中队的左翼展开，同时第二十七中队则在它的右翼展开。这两中队对敌人采取一种钩形攻击的队式。”法军的大炮向清军开火，清军的射击变得非常强烈。法军的两名兵士被击中，其中一人重伤。法军发起冲锋，清军被迫后退。这时，法舰Vipere号赶来参战，用炮火轰击清军，清军只得放弃第二道阵地，遗留下大约五十具死尸。下午，法舰继续轰击清军阵地，清军再次被迫撤退，法军顺利地占据了清军的阵地。

第二天，法军继续向清军阵地进攻，他们虽然遇到一些小抵抗，但法军的大炮轰击使得对方很快就放弃了抵抗，法军占领了马公。卡诺写道：在3月30日和31日的军事行动中，我军战死者4人，负伤者1人。我方的那些军舰在轰击的时候曾有1人阵亡，1人负伤，以致我方损失总数为5人阵亡和12人负伤。敌人方面的损失为300～400人战死，且有同样多的负伤者，其中有好几名将校，总司令却逃跑了。与此同时，法军还派人占领了渔翁岛和灯塔。

事后，据澎湖副将周善初、通判郑膺杰禀报此役经过称：

二月十二日（3月28日），法五舰进泊乌嵌洋面，当饬各营严备。十三日黎明，两舰由西屿直攻妈宫，一舰中炮退去。续添三舰攻新城炮台，营官梁璟夫力御两时许，台渐轰坏，法放舢板图占新城及金龟头。周善初督率德义后营管带梁岳英扎炮台后之深沟，压岸抵御。舢板驶回，敌复以三舰攻四角山、蛇山，四舰攻金龟头外之露天圆炮台；台逼受敌，亦被击塌。周善初复调德义中营管带关镇岳、绥靖前营管带冯楚灿、绥靖副中营管带陈得胜分扼较场、乌嵌山、观音亭等处，郑膺杰仍督水军协同德义后营帮带刘灿莹，由红毛城抄击，相持竟日，互有伤亡。是晚初更，法船迭用火炮对轰。我军蛇伏避锐，彼即放舢板十余号漫海而来。梁岳英、冯楚灿、梁璟夫各督炮勇，登将塌炮台整顿，击沉舢板一号，鏖战良久，法船复施放各样炮弹，天明始息。周善初仍督同梁岳英等扼据深沟，郑膺杰分扼妈宫街后及红毛城。十四日（30日）早，法三船猛攻四角山、蛇山土台，旋即坍塌。两山既失，小按山遂不能守。周善初等督率各军，扼守金龟头、新城后一带，与法军力战一昼夜。是日卯刻，敌益猛攻新城、金龟头各台，旋被轰毁，即放舢板十余号肉薄来攻。当经梁岳英击退，毙逆无算，并击焚一舢板。该逆乃分布四舰，二舰直进妈宫港内，二舰泊观音亭港口，三面夹攻，各军势不能支，退扎厅署东之东卫山。该逆又以莳里无炮台，于十三日（29日）分调舢板约四五百人，乘夜来袭。经陈得胜设伏击退，伤毙数十名。十四日，法两舰驶进珠母水，复用舢板装兵七八百人意图登岸。复经陈得胜、关镇岳分道攻剿，梁岳英复派帮带刘灿莹驰由上路夹击。自辰至午，

法逆阵亡百余名，败回原船。我军追至海岸，被法舰轰毙六名，带伤二十余名。此十三、十四两昼夜妈宫、莳里、珠母水等处获胜之实在情形也。

十五日（31日）辰刻，法六舰泊珠母水等处，分四路登岸。陈得胜时扎大城山，当率所部由中路迎敌。周善初亲率绥靖后营帮带单锦春，参将陈尚志，并冯楚灿全队，由大城山进发，梁岳英、关镇岳一由东卫迎剿，一由大城山西冲出。无如敌械精良，弹密如雨，大城山四面平坦，敌以各种火器横冲直击，所向披靡。关镇岳愤甚，率哨长朱朝安、苏德奋勇直前，击毙法逆多名，朱朝安、苏德力战阵亡，关镇岳腿受重伤，陈得胜左腕右腿亦受弹伤，梁岳英驰突枪弹中，奋不顾身，枪毙法酋一人，帮带刘灿莹督队在后，践尸直登，甚为勇敢。是时梁璟夫部勇由西溪进攻，周善初见敌势凶悍，急挥军摧其中坚，郑膺杰督各军由湖东抄出，右营都司郑渔、举人郭鹗翔等分带果毅军及团练由湖西港底抄出，血战四时，以军火用罄，收队回营。计阵亡弁勇三百余名，带伤近四百名。法逆乘胜调九舰进踞乌嵌、双头跨各岗，修立土垒，安配大炮，对大城山、东卫各营轰击，飞弹雨堕，东石等处粮台、军装各局亦难存立。诸将以死伤过多，商请退驻北山之中墩，后又再退湾贝。[1]

战后，清政府派吴宏洛收回澎湖，并了解澎湖失守情形，由杨岳斌领衔、实际由刘铭传定稿的奏报，则将澎湖守将作战情况说得一塌糊涂：

---

[1] 《中法战争》(6)，第503～504页。

二月十二日，有法船六只泊在珠水、乌坎、开边海面，该六船内分一大船泊近里澳，三船驶至妈宫西屿，二船至观音亭后，齐开大炮，纵横轰击。统领前路各军管带绥靖后营代理澎湖水师副将闽浙尽先补用副将周善初、管带练军果营澎湖右营都司郑渔，出队抵御，各炮台亦开炮还击。经法兵将四角山、新城、蛇山头、金龟头、观音亭等处各炮台及妈宫协署、军装局等处营房街道一律轰击倒坏，周善初等抵敌不住，退往大城北而去。十四日早，敌将先日泊在莳里奥大船一只驶至近岸，用小划渡兵三百余人登岸来扑珠母水澳。管带绥靖副中营尽先副将陈得胜率队出迎，相持未久，即退往大城北而去，敌亦未追。十五日早，法兵约有八九百名，复由双头跨地方登岸，径至大城山下。周善初率管带绥靖前营台湾镇标中营守备冯楚灿队伍接仗时许，势不能支，陈得胜带队来援，手腿受伤，即退往本溪乡。周善初又调管带德义中营候补同知关镇岳、管带德义后营候补通判梁岳英带队来援，前后零星不齐，又无督率，不能抵御。关镇岳为飞子所伤，周善初、冯楚灿、梁岳英、郑渔等一齐退往北山赤嵌一带，澎湖遂尔失守。澎湖通判郑膺杰曾通报练募水勇四百名防守要口，及至法人攻澎三日，不闻其勇抵御何处，地方失守，咎有应得。①

要求将周善初、郑膺杰、梁岳英、郑渔、冯楚灿一并革职，关镇岳、陈得胜免予处分。

《申报》报道了此役的经过："本月十一日，法人调集兵轮

① 《中法战争》(6)，第519～520页。

十艘猛扑西屿炮台，开炮百余门。炮台亦即开炮还击，未几，药弹告尽，兵勇伤亡大半，管带台州勇营之某副因亦阵亡，炮台遂被法人毁坏。十二日，法人移犯妈宫，澎湖厅协皆驻妈宫地方。周复庵参戎闻警即带兵扼守炮台，测定法船，轰击猛战。至十三日，亦因弹药皆尽，后无援兵，以致败退。幸有渔船数十艘在彼，兵勇数百人得以登船，逃回台湾。尚有千余人退往别岛暂驻，余尽阵亡。"① 《申报》又指出，澎湖守军这样不堪一击，也有其内部原因："去年法人起衅，澎湖添募勇丁，地方滋扰，早已民不聊生。继又添募潮勇两营，而百姓受害更甚。此次交战，起自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潮勇忽溃，纷纭四出抢劫杀人，纵火烧屋，种种不法，直与狂寇相同。周协与郑分府正在督兵扼守炮台，一闻是耗，心胆俱寒。法人遂乘势登岸，内港船只多被败兵夺去，亦有由商民雇用者，纷纷扰扰，奔避不遑，衣物银钱尽皆抛弃。"② 由于守军并未认真抵抗，所以双方死伤数目也不成比例。"是役也，据法人言，法兵被击毙者三人，伤者约十一二人，而华兵则死伤共有六百人之多。"③

法军占领澎湖后，看到澎湖外护周密，内港宽阔，就想长期占据下去，准备大兴土木，建设军港。但很快就传来法军在谅山惨败的消息。3 月 29 日，法国政府一度要求孤拔放弃大规模经营澎湖，而只留下少量军舰和陆军在澎湖，却要抽调海陆军主力去援助越南。由于不久后两国就签订了和约，于是在 4 月 10 日，孤拔又接到命令，停止撤退，继续经营基隆和澎

① 《申报》影印本，第 26 册，第 535 页。
② 《申报》影印本，第 26 册，第 541 页。
③ 《申报》影印本，第 26 册，第 519 页。

湖阵地。但在永久性和约成立之前，“该提督可对中国和中立国船舶保留检查的权利，且可继续拿捕违禁品”。

在这以后发生的事情，较重要的一件大概要算澎湖法军与“平安”轮的外籍船长相勾结，捕获“平安”轮装运的杨岳斌所部乾军七百余名清军官兵。关于此事，据卡诺的说法，“平安”轮的船长是个英国人，曾向孤拔投效，后又到“平安”轮当船长，帮助中国大陆向台湾运送兵员、金钱、武器和弹药。“在攻占澎湖岛之前不久，提督收到了（船长）的一通密电，报告他已和‘平安’轮的名义的业主进行谈判。这位冒失的业主在取得船长的同意后，应允以某种代价，在可以使人信以为被捕的情况下交出该船。”4 月 11 日，澎湖法军果然捕获“平安”轮，该船载有 750 名中国军官和兵士及 3 名高级官员，还有 10 万两银子。

第二件是孤拔病死。“两个月前，提督曾经患过严重的赤痢，而胆汁的发作更使病情复杂，跟着又发生厉害的贫血症。”6 月 11 日，这个侵略中国和越南的急先锋，终于死在远离法国几千里的异国荒岛上。

不过，这些都是中法签订和约以后的事情，对于战争的结局已没有什么影响了。等到《中法和约》正式签订后，法军只得按约将澎湖交还中国。

第九章

牵敌战越牺牲多

一　困扰援越桂军的内外矛盾

从闰五月初一、二日的观音桥之战，到八月中旬的船头之战，其间相隔了一百多天。在大战前夕，援越桂军能有这么一段休整时间，对于整顿军队和加强战备，应该是十分宝贵的。但是，由于封建统治制度的黑暗腐败以及无时无地无不存在的派系倾轧的官场恶习，这段时间却成了援越桂军各种矛盾酝酿和爆发的时期。

矛盾的根源有来自清政府最高统治集团的。

对于潘鼎新本人来说，进行观音桥之战完全是被动的，并不符合他的初衷。但是，由于朝旨严饬援越桂军不许后退，而法军又欺人太甚，援越桂军则义愤难抑，结果就激成了这场战斗。这场战斗的规模虽然有限，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却很严重，导致了中法矛盾的重新激化以及重开战事。这就使得因为新掌大权而起初气壮如牛、态度强硬的醇亲王奕譞感到不安了，并很快就发展成对潘鼎新的严重不满，认为他把事情办坏了。闰五月十五日（7月7日），李鸿章把醇亲王态度改变的消息电告潘鼎新："省三自京回云，醇邸面言，当日尊处若先

照约略退，再电奏亦无妨，可知内意非必主战。"[①] 对此消息，潘鼎新半信半疑地于廿三日（15日）复电称："前旨不准稍退示弱，决战遏其凶锋，疏虞难当重咎。事后又传旨命奖续有战功优奖。今十一日旨，复有扑犯接仗之谕，与省三所传大相径庭。"[②] 廿四日（16日），李鸿章复电告知其中内幕："前旨不准退扎，上意负气，亦不料胜仗后予以口实。今法责言正急，我辈当弥缝前事，不肯任咎。"[③] 就是说，清政府在观音桥战前的强硬态度只是一种"不准对敌示弱"的姿态，并没有大规模作战、长时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观音桥战后，马上把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在清政府面前，清政府和战两难，未免迁怒于潘鼎新。不管李鸿章关于醇亲王改变态度的消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清政府的意旨，却是潘鼎新圣眷渐衰的标志。

清政府对待潘鼎新态度的变化，加上李鸿章被申饬、张树声被革职，表示淮系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这很快就为各省敏感的官员所察觉，他们趁机落井投石，刁难潘鼎新以及援越桂军。以至潘鼎新曾于十月二十三日（12月10日）万分委屈地奏称："在各省或私议谅山一役再起衅端，讵知当日情事，实有万难退让之势。"[④] 这种情况充分反映在清政府不顾大战在即，纵容乃至支持各省扣减援越桂军的协饷一事上。

事情是从潘鼎新三个月前还在那里当巡抚的湖南省开始的。观音桥战后不久，潘鼎新就发现各省协饷供应不上，其中就有湖南省，于是在闰五月初十日（7月2日）电告清政府：

① 《中法战争》(4)，第155页。
② 《中法战争》(4)，第160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61页。
④ 《中法战争》(6)，第171页。

"饷仅得广东七万，现发尽，最近湖南亦不来，军储久乏。"[①]其实，湖南这时已上奏清政府，要求批准停拨苏元春一军的月饷，清政府同意了这一要求，于六月初十日（7月31日）有旨："即著潘鼎新匀兑拨给苏元春留粤各营月饷，以资周转。"[②]先例既开，自然会有仿效者，各省遂援湖南为例，不顾前敌形势如何严重，程度不同地拖延应拨广西的协饷。

等到潘鼎新得悉清政府批准湖南停拨苏元春军月饷，已是七月中法宣战以后的事了。这时潘鼎新奉命进军作战，重任在肩，但军费却被扣减，这不是拿他为难吗？所以他很快就作出反应，电告清政府："苏饷奏停，军心颇惑。"[③]清政府装聋作哑，不作正面答复。潘鼎新便连连复电清政府，告知援越桂军缺饷的严重情况："现正与法人接战，情形甚迫，若粤饷一缺，即成徒手。"[④]

看到潘鼎新如此紧迫，加以中国已向法国宣战，清政府才慢慢重视起来，指示户部查明各省关协拨援越桂军饷项情况。八月，户部向清政府报告：自五月起至十二月底止，由各省关月协援越桂军银共4万两。现除已解外，湖北尚欠银4．9万两，湖南尚欠银4．9万两，江苏尚欠银3．45万两，江西尚欠银3．9万两，江海关尚欠银3．6万两，闽海关尚欠银2．5万两，四川月协银4000两，全未报解。而由各省关指拨云南饷银100万两内匀拨广西银30万两，现除已解外，江西尚欠银5万两，广东尚欠银2万两，粤海关尚欠银2万两，四川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八，第10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一八七，第619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一八九，第661页。
④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337页。

匀拨银 2 万两，湖北匀拨银 3 万两，均未报解。两项相加，共欠拨银约 40 万两，占应拨银 60 万两的一半强。考虑到时间才过一半，问题还不算很严重。所以，清政府给各省发去一道语气和缓的催饷谕旨："关外军情万紧，而核计分解之数多不过数万两，倘不如数批解，贻误军情，厥咎甚重。"这样的一纸谕旨，当然不会有多大作用。

然而，不知是各省关欺瞒户部，抑或是户部欺瞒清政府，或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援越桂军实际领用的各省协饷，完全不似户部上述报告那样充裕。大概在八月间，潘鼎新有奏给清政府详陈缺饷情况：粤西地方瘠苦，筹饷维艰，本省厘税，每月仅解边饷 23900 两，此外全恃各省协济。前抚臣徐延旭奏准部拨各省协饷 4 万两，截至本年腊月为止。臣接任后，蒙恩饬部拨款 30 万，并奏留湖南京饷 10 万，现已五月矣。查淮湘各军及遵旨裁并粤西左右各营出征关外者，现尚有 37 营，合计按月饷项暨转运粮械、购办军需，不下十余万两。军饷万紧，左支右绌，实属无可设措。再四思维，惟有沥情奏恳天恩，饬部指拨内地省分实在有著之款，每月加拨银四五万两，合之前拨之四万，及本省之二万数千两，庶足敷月需十万余两之数，从此军士得资饱腾，益将踊跃前驱[①]。细审文中语气，似乎各省关月协四万两之款并未实际收到。如果说此奏尚且语言含糊的话，那么潘鼎新九月初十日（10 月 28 日）的电报就把话讲得很清楚了："敌悍枪精，我军虽胜，持久难继。月饷仅厘金二万四千，协饷仅四万，解者寥寥。非求实款，恐致饥溃。"[②]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 416 页。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3520 页。

就是说，所谓各省关月协援越桂军饷项四万两完全是一张空头支票，实际上是“解者寥寥”，无济实事。九月十三日（10月31日），熟知内情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有电帮潘鼎新说话，并从战略的高度提醒清政府：“窃谓争台惟有争越，内地增百营不如关外增十营，内地用饷百万，不如关外用饷十万。仰恳敕催云、桂两省协饷，桂责湘垫，云责川垫，再由他省拨还，或可稍速。”[①]

这样，清政府才真正了解援越桂军的缺饷情况，认真考虑解决办法。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 继续催促各省关及时筹拨应协援越桂军月饷四万两。如九月有旨：“据张之洞电奏潘鼎新、岑毓英均苦无饷等语。关外军情万紧，饷项岂可稍缺，致误戎机。湖南、四川相距较近，所有该省拨协云南、广西军饷即赶紧如数拨解，不准迟延。”[②] 严旨如此，各省才陆续拨济应协银两，但也不能完全如数拨给。

2. 增加部分省份的协拨饷数。如户部于九月十七日（11月4日）奏称：“臣等公同商酌，拟令该省（指广西）由两税、厂税各项下，每月筹拨银一万两。再令广东、湖南、江西，无论何款，每省每月拨银一万两，共加给月饷银四万两，均自本年九月为始。”但直到战事结束，广西催饷委员仅“领到江西十年地丁、厘金、京饷改拨银一万两”，又加拨上年九月份月饷银一万两[③]，共二万两，只为应拨六万两的三分之一。

3. 命湖南等省先行筹借大批饷银解赴广西。九月下旬，

① 《中法战争》(6)，第19～20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一九三，第741页。
③ 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政府有旨：现在关外各军需饷尤殷，著“卞宝第、彭祖贤、庞际云，先行措借大批解赴广西，均由票商借垫，准其酌给息银三四厘，该督抚等即遴委妥员赶速解往，俾济急需，毋任稍有缺乏，致滋贻误”[①]。接奉清政府的严旨后，庞际云的态度才积极起来。据十月二十二日（12月9日）军机处奏呈庞际云片，他不但按月划拨应协广西军饷七千两，而且答应拨给户部新增月协一万两之数，并一次大批筹解五万两前往。湖广督抚也奏称：以八厘利息陆续借到银三万两，于十月二十二日发交广西催饷委员领解赴粤。

4．由张之洞借洋款以充军饷。当前敌需饷甚急时，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表现十分积极，不断为清政府出谋划策。六月二十六日（8月16日），他密电总理衙门建议向宝源、汇丰借银百万，以备不虞。九月廿六日（11月13日），他建议清政府可否敕北洋速借洋款400万，助各省饷，各海关认还。三十日（17日），又有电自请借洋款之任：“窃又思得一策。朝廷若允借款，由各海关认还，粤可向汇丰再借百万两，济云、桂各半，当分批速解，较北洋借他省拨尤近便。”[②] 十月初三日（20日），清政府批复允行。然而，借洋款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张之洞先是托李鸿章饬盛宣怀在天津与英商大东公司借五十万零五千英镑，约合白银二百万两。十二月，大东公司正式表态不肯借银，改与汇丰议定再借五十万镑，这样一耽搁，已经无助于潘鼎新的需要了。十二月二十七日（1885年2月11日），岑毓英曾奏报清政府：两广督臣张之洞筹借商款，许分给滇、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一九四，第759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电奏，卷一，第12～13页。

桂两军各四十万，刘永福二十万。又因洋商屡次刁难，只先交三十万，分给滇、桂两军各十万，刘永福五万，余留办军火。“广东所分借款银十万两，约计来年二月始到营”[1]。照此类推，则分给援越桂军的十万两，也要二月前后才能到营领用，而这已是桂军谅山溃败以后的事情，无补于战事了。

综上所述，在观音桥战后，清政府因为迁怒潘鼎新，因而在拨饷问题上有意为难援越桂军，致使出现“协饷罕解”的怪现象。船头之战后，清政府虽然改变了态度，采取多种措施筹拨大批饷项给广西，但是，鉴于筹措、拨发、运解、发放、实领等各道手续都需要时间，所以均不能赶及前敌需要，援越桂军缺饷的情况没能及时改变。

矛盾也来自潘鼎新那派系众多的部下。

六月廿二日（8月12日），张之洞致函唐景崧，告诉他有人写信攻讦潘鼎新：

现据有人禀称：月前观音桥连捷，法夷经此大创，坐失机会，致彼族得以养锐整兵，狡谋再犯。据报船头兵轮已陆续驶至，俟我前敌退出险要，即尾缀袭取谅山，近逼南关，势加吃紧。又徐前部院移交各路防军，左计十四营半，右计二十八营，中计十四营，后路亦不下十营，自裁撤归并，现存五分之一。遣散太急，只图省费，不率旧章，无论勇数多寡，欠饷久暂，将弁功罪，部众强弱，一律用威，仅给千金，驱之使去，吞声饮泣，郁极思逞。谅防九营，悉数裁撤。刻计关外游勇何止万人，无计聊生，必甘心而为盗，万一敌人用为前导，其患尤不可胜言！自

① 《中法战争》(6)，第289～290页。

太平、龙州、镇安毗连越之芃葑、牧马等处，内外数百里，伏莽煽结，滋蔓已深，大军朝归，乱党夕作，有断然者。又关外各军苦于转糈，病者多，故者亦不少，楚军为尤甚。其故因戴粮而渡，暑蒸湿结，瘴发疫流，枕藉道途，伤心惨目。倘乘胜前进百里，地方高敞，水土平和，可免疾，可就粮，足资战守。奉谕一面退兵备战，部曲痛心疾首。一旦敌势掩至，既无可恃之险，又杂以病勇扶携，难民号泣，安能必其不我躛也。以上节节可虑。各员将间有因事禀陈，无不累牍连篇，痛加诃斥。渐至旧部灰心，宾僚结舌，王藩司楚师十营，力请咨回江南；新调杨提督、方提督两军，代统左路镇南桂军赵道等皆欲告退。此三员受知甚深，相随日久，尚有危不自安之势。两广全局攸关，连日敌情愈急，军事愈繁，揭帖讹言丛起，越南官民携眷潜进关内者相率于道，附边内外，人心皇皇，诚堪痛惜等语。[①]

这封密禀长达六百余字，内容归结起来，只是反复指责潘鼎新三件事：1. 没有乘胜挥军前进；2. 裁撤北宁溃军不当；3. 没有处理好与诸将的关系。这些指责是否符合事实？密禀的作者有什么目的呢？在致唐景崧的信中，张之洞没有揭示密禀出自何人手笔，但是，我们可以试作考证。

这封密禀字数不多，但是内容重复，段落不清，可见作者虽有文才但不很高；文中尊称王德榜为王藩司，杨玉科、方友升为提督，赵济川为赵道，可见作者是职衔不很高的官场中人；从文中所述边关情况来看，作者了解边军情况但又不参预

① 《中法战争》(4)，第437～438页。

机密；文中内容真假杂糅，深文周纳，可见作者是个告密攻讦的老手；而最重要的线索，是密禀所涉及的内容和所使用的手法，与《请缨日记》有关章节相似，可见作者是与唐景崧关系密切的人。

《请缨日记》是怎样描述潘鼎新的呢？

关于指责潘鼎新没有乘胜挥军推进一事。我们知道，唐景崧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中进士后，沉沦京师十五年，仅仅从庶吉士升为候补主事，都是一些不足为道的芝麻绿豆小官，而且看不到有飞黄腾达的机会。中法衅起，他万里请缨入越，其中固然有抗御外侮的大目标，但又何尝没有寻求个人出路的小算盘。但是，他说越、援刘、助桂的努力都在法军的进攻下——失败，抗御外侮已谈不上，个人升官进阶也没有希望。然而，唐景崧并不就此甘心认输，还幻想创造奇迹。因此，在北宁溃败之后，群情沮丧之时，他却异想天开地提出要向前推进，转败为胜，以挽回局面。

《请缨日记》记称，早在潘鼎新到任前，他就已经在活动诸将帅进攻法军了，但诸将帅反应冷淡：四月中旬，启晓帅，请探得法人在北宁不甚设备，可挑精锐走僻径先袭新省，该处有山可据，有粮可食，距北宁城 70 里，可就近图之（这与密禀中所谓的“倘乘胜前进百里，地方高敞，水土平和，可免疾，可就粮”何其相似）。再以楚军出扎船头，进规三江口，两面夹攻，北宁易复。然而，他的这个想法提出后，应者寥寥：晓帅韪其计，而以交替在即，不思再举。方棣生观察亟欲行之，约明日同往南关会商于王方伯。四月十九日（5 月 13 日），会王方伯于方观察营中。棣生商往规北宁之计，朗青言且稳扎，俟潘琴帅到关再议。

五月初六日（5月30日），病中的唐景崧在龙州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潘鼎新，然而，《请缨日记》关于这次见面只有轻描淡写的两行字："强起谒潘琴帅，略问边事，余即称病请假调理，琴帅允之。"显然，这是极度失望之下的草草记述。按照唐景崧的为人行事，他不会在谒见潘鼎新时不重提收复北宁的建议，也许是遭到潘鼎新的婉言拒绝，丧气之余，只得用"略问边事"四字概括一切。

又记：闰五月初四（6月26日）、初五日（27日），前敌黄、李、陈诸营，迭驰书请军火、请粮。余亟启琴帅，乃批"多事"！两请不允。至此，唐景崧对潘鼎新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挥师进取已表明了不满情绪[①]。

其实，潘鼎新没有采纳唐景崧收复北宁的建议完全是遵旨行事。早在他到任视事之前，清政府就在四月十五日（5月9日）有旨给他："法人在津与李鸿章讲解，略有端倪，广西防军著潘鼎新督饬扼扎原处，进止机宜听候谕旨，仍随时侦探儆备，毋稍疏懈。"[②]既然朝旨明令"扼扎原处"，潘鼎新当然不会轻易采纳唐景崧的建议，违旨进取了。

观音桥之战后，初闻捷音，清政府曾有乘胜进取之意，于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有旨，要潘鼎新务与岑毓英迅速会商，合力进兵，为规复北宁地步，先将此意知会岑毓英，预为筹备。但是，由于法方反应强硬，到了第二天，清政府又改变了主意，先是指示潘鼎新按兵不动，不必前进，以免借口。初十日（7月2日），清政府又有旨，要潘鼎新不进反退，将

① 《中法战争》（2），第137～140页。

② 《中法战争》（5），第349页。

前扎观音桥等地的桂军撤回谅山，可见不能苛责潘鼎新没有乘胜进取。甚至张之洞对密禀的这一条也很不以为然，批复道："查撤兵一节，系属遵旨办理，粮艰瘴病，乃由地势使然，并非措置不宜之故。"①

关于指责潘鼎新裁撤溃军不当。

《请缨日记》记称：五月二十六日（6月19日）后，时关外前敌营务，琴帅派提督万重暄代办，左右两军纷纷撤散，欠饷多不给清。闰五月初一二等日，桂军大败法人于观音桥。北宁失后，粤军负无用名，至是琴帅始给饷，得不裁撤。闰五月初十日，请撤销亲兵营，截至本月十五日止，允之。亲兵两月欠饷，幸蒙全给，他营所未有也②。字里行间，暗示潘鼎新克扣北宁清军军饷。

其实，裁撤溃军一事，早在潘鼎新到任之前，就在三月间由徐延旭札委唐景崧总理前敌营务时，着手进行此事。如何裁撤，两人已有计划。三月初，唐景崧禀告徐延旭，认为陈朝纲、周炳林、叶逢春、李逢桢四营，曾守涌球要地，未败先逃，必治以重法，始能作士气而儆人心。因徐延旭询问"将弁中可用不可用者"，唐景崧在三月初九日（4月4日）禀称："于德富、甘乃斌诚实少锐气，绥南四营营官皆极平常，雷永贞尤不可用，尚国瑞、贾文贵皆不得力。"③ 显然都在裁撤之列，连陈周叶李共十三营。徐延旭采纳了唐景崧的建议，于十八日（13日）檄撤周炳林、叶逢春、贾文贵、张金泰、陈世

① 《中法战争》(4)，第438页。
② 《中法战争》(2)，第139～141页。
③ 《中法战争》(2)，第125页。

华各营，官勇俱销[①]。与此同时，“已革道员赵沃所带右路粤勇，自北宁退后，经徐延旭檄饬挑留六营，其余尽行遣撤，该营月饷均发至二月为止”[②]。即须裁撤十营。可见，在潘鼎新到任前，徐延旭等已准备将溃军裁撤二十余营。

潘鼎新在受命之始，清政府就一再指示他“认真整顿”、“实力整顿”北宁溃军。三月廿日（4月15日），潘鼎新向清政府转呈王德榜的禀报：粤西五十余营，自北宁败后，有妇女者四处逃散，全不归伍；无妇女者，只归得十余营，兵勇四出掠取民食。该军弁勇有家室者居半，吸食洋烟者居半，闻警先携妇女逃走，致使军械饷银概以资敌[③]。清政府览奏后，于四月初有旨：“徐延旭所统各营毫无纪律，殊堪痛恨！此等溃败兵勇，即收集整顿，亦难得力。潘鼎新到防后，俟新军毕集，即著将该勇营严行裁汰。”[④] 五月初一日又有旨指示潘鼎新：“懔遵迭次谕旨，将徐延旭所部各营，分别撤留，竭力整顿。”[⑤]

但是，张树声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上奏指出：潘鼎新前述关于桂军情形的奏报，“第据王德榜当日传闻之词”，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他认为，在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莠民作乱的严重时刻，不应急于大量裁撤桂军：“裁汰关外营勇，若操之过急，流入内地，与思恩匪党勾结为患，益难措手。臣并函商潘鼎新，俟匪势稍平，仿照曩岁李鸿章在

① 《中法战争》（2），第130页。
② 《中法战争》（5），第581页。
③ 《中法战争》（5），第315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一八一，第521页。
⑤ 《中法战争》（5），第374页。

上海办理薛焕溃军旧例，愿留者严定录用之格，愿归者宽给遣散之资，庶留者不致虚縻，归者无伤流落，期于内外之事，均免疏虞，以副圣主再三诫饬经武整军之至意。”[①] 于是清政府又改变主意，两次有旨指示潘鼎新参考张树声的意见办理：“此项溃勇若裁撤太急，必致勾结为患，转滋事端，应如何陆续裁撤，或酌给口粮，咨送回籍之处，著潘鼎新妥为办理。”[②]“（裁军）若操之过蹙，诚恐流入内地，勾结滋事。著张树声、潘鼎新随时会商，宽给遣散之资，将各营次第撤留，妥为办理。”[③]

开始，潘鼎新惑于王德榜的过甚之辞，曾有全裁溃军之意，但又顾虑边防无兵。当他与李鸿章函商此事时，五月初二日（5月26日），李鸿章复函也劝他审慎从事：“尊意力主全撤，又以亲军未集，正气未充，一时难于措手，想见审慎踌躇。鄙人前电商逐渐抽撤，亦是此意。”[④] 四月十一日（5月11日），李鸿章致电张树声谈及此事称：“琴意以溃勇万难再用，但全以新易旧，旧勇必生他变。似易将而挑留旧勇，拊循整顿兼施为宜。”[⑤] 潘鼎新到任视事后，随带的苏元春等部即被派往思恩助剿莫梦弼，以至他于五月初九日（6月2日）到谅山巡视时，“所调各军，尚未到防”。然而局势很快就严重起来，“未及旬日，警报迭至”。自谅山至镇南关及关内之幕府数十里，处处空虚，地段太长，兵力不敷分布，正是需要用人之

① 《中法战争》(5)，第377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一八三，第534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一八三，第560页。
④ 《李鸿章致潘鼎新信札》，第4685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二，第12页。

际，大概也无暇顾及裁撤之事。观音桥一战的胜利，使他感到桂军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所以，对于裁撤溃军一事，更觉得难以下手。清政府曾于七月有旨给他："广西巡抚潘鼎新奏裁汰勇营为难情形，得旨该抚惟当随事秉公核实办理，以副委任，毋庸意存顾忌。"[①]

六七月间，潘鼎新在奏报惩治北宁溃败将弁时，顺便声称："从前溃败之勇，业已先后遣撤二十余营。"[②] 这主要是参照徐延旭、唐景崧的裁撤方案而行，他所拟惩治各将的罪名都较轻，其中自有保全使用之意。但清政府的批复却加重了这些将弁的罪名和处理。其中潘鼎新奏请革职的周炳林等六将，均改为发配，拟革的李应光等十弁，改为不准留营。而按照当时兵制，营官既去，营勇亦散，这样一来，不裁亦裁，就不由潘鼎新作主了。这就是裁撤溃军的概况，其中如有不当，也不能完全归咎潘鼎新。

至于裁撤溃勇发饷不足一事也与相似。据《请缨日记》载，唐景崧因奉徐延旭裁撤溃勇之命，也接触到发饷问题，曾指出：按照惯例，营官大多扣发士卒的军饷，因此，被裁撤各军的欠饷应由前任营官负责解决，与接任者并无直接关系。"去一营官（士卒）犹群起遮留，索取经手未给之饷，而新接营官，又往往不管旧欠。""在平日无事时，营官新旧替接，原有调停，不过迟以时日。"在潘鼎新到任前，徐延旭急于裁撤溃勇，已造成了许多问题：三月十八日（4 月 13 日），晓帅于点验各军后，扣饷太甚，众论哗然，以至人心惶惑，日夕嚣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一九〇，第 678 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 1788 页。

然。三月廿一日（16 日），奉撤周、叶、张、覃之文，但勇丁未领旧饷，多不肯离本营而遽人他营，事极掣肘[1]。

潘鼎新到任后，裁撤溃勇一事基本是遵照前任意见和朝廷旨意办理，欠饷主要由被撤营官负责，他不过尽调停之责。八月廿五日（10 月 13 日），潘鼎新奏报清政府：徐延旭曾饬赵沃将所统 16 营挑留六营，裁撤十营，遣资“实用银一万一千余两”，可见所谓的“仅给千金，驱之使去”，乃赵沃等人所为。潘鼎新到任后，根据清政府关于“愿归者宽给遣散之资”的指示，在军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设法在前任营官之外，增给遣资。战后，因有人奏参“潘鼎新抵粤，旧时营勇全数裁撤，而欠饷或三四月，或五六月，每营仅与银千两，令其自散，军士大哗”。清政府要广西护抚李秉衡查复。李秉衡“一面遴派委员，接见属吏，逐一查访，详稽案牍，考证人言”后，复奏此事称：“臣查潘鼎新到龙州之初，旧时营勇并未全数裁撤，要皆汰弱留强，归并足额，曾经奏明遣散二十余营，既非足额，又非原人，势难补算前任欠饷，且亦实在无款可筹，只能分给遣资，每营大小不一，或给二千数百金，或给一千数百金不等。询据苏元春面称，上年六月，潘鼎新商请该提督臣将已革道员赵沃原带右路防军十六营，饬派副将马盛治前往遣撤，经赵沃解缴银一万一千五百两，又龙州收放局一次解银四千九百五十一两，二次解银三千六百两，综计二万五十一两，均经散给清讫。复询据补用道赵济川面称，上年六月，奉派遣散固边右、固边中、克字等三营，共发过实银三千三百两。另试用知府魏绥先遣散固边副前、固边副中、捷字等三

① 《中法战争》（2），第 127～133 页。

营，所发银数亦同。是潘鼎新原奏之言，尚非假饰。”[①]

综上所述，可见潘鼎新没有将防线向前推进及裁撤溃军等作法基本是遵旨行事，主要责任并不在他的身上。可是，告密信的作者却把一切责任都归咎到潘鼎新的身上，其随意虚捏、罗织人罪的作伪手法是很明显的。而这种随意作伪的作法在《请缨日记》中有关潘鼎新的记载里也是经常使用的。如其五月日记有“本月二十四日（6月17日）有旨，津约议定，三月后撤兵。琴帅因和议已成，故于军事不甚措意，盖至是而中外兵氛若有结束焉”条[②]，则是作伪的典型。

《中法简明和约》是在四月十七日（5月11日）由李鸿章和福禄诺在天津画押订定的。十九日（13日），李鸿章曾通知张树声：“法约五条已画押定议，彼将退兵。望转电琴轩，杨玉科、方友升、潘鼎立新募各队宜酌减少。”[③] 但并未提到有旨令桂军撤回事。在五月十二日（6月5日）致张树声的电报中，李鸿章又再次提及此事：“十七定约调回边界云云，虽由敝处钞约咨行云、桂，似无另饬调回之旨。”[④] 而清政府正式有旨令各军照约调回关内是在闰五月廿四日（7月16日）：“现在已将届期，所有第二款北圻各防营调回边界一节，应即如约照行。著岑毓英、潘鼎新将保胜、谅山各处防营撤回滇、粤关内驻扎，并于一月内全数撤竣，以昭大信。钦此。”[⑤] 显然，唐景崧是把闰五月廿四日的朝旨记成五月廿四日了。

① 《中法战争》(6)，第531页。
② 《中法战争》(2)，第139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48页。
④ 《中法战争》(4)，第150页。
⑤ 《中法战争》(5)，第416页。

这是不是无意误记呢？只要联系下文，就可知唐景崧这样做，是为了引出“琴帅因和议已成，故于军事不甚措意，盖至是中外兵氛若有结束焉”的下文。其实，这也是明显的作伪。因为五月廿四日前后，正是法兵扬言巡边，逼近观音桥，战事一触即发的紧张时刻。从五月十九日（6 月 12 日）起，潘鼎新就向清政府频频报警，而清政府也频频有旨指示潘鼎新备战迎敌。接着，很快就爆发了闰五月初一、初二日的观音桥之战。可见，在这段时间，前敌气氛十分紧张，潘鼎新更是忙于筹措军事，何来“于军事不甚措意，中外兵氛若有结束焉”等事。唐景崧所记纯为作伪。

既然告密信的内容、手法与《请缨日记》的有关部分大同小异，可见，这封信即使不是出自唐景崧主笔、授意或示意，也是受了唐景崧的很大影响而写成的。那么，在唐景崧身边有没有符合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各种特点的人呢？查张佩纶所撰《涧于集》，其中提到有个名叫唐镜沅的州判，常有密禀向各大员报告前敌情况。这个人的见识很低，“殆迂琐之士”，但却胆大妄为，随意褒贬人物，以至唐景崧也不能脱过：“唐主事景崧，本非知兵之选。惟该州判前禀，则称唐主事在阵前督率，而此禀又诋其无调度驾驭之才，两人同族，引绳批根，此非人情，疑有他故。”[1] 且喜真假杂糅，危言耸听，“因唐镜沅之言，而疑刘永福之殃民，黄、赵两军之无纪。则是前敌之越官不可信，越军不可信，我之文武亦不可信，其势骤难全行更置，岂不令其人人自危，予敌以间？殆非所以鼓军士之气而安

① 《中法战争》(4)，第 418 页。

反侧之心”。[①]

唐镜沅是个什么人呢?《请缨日记》曾这样介绍他:“芷庵名镜沅,受业先大夫门下,以副榜举考廉方正,用直隶州州判,分发广东,儿辈受业,同邑至交也。”[②] 光绪八年底,他就一直追随唐景崧赴越说刘助桂。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十日(6月3日)因病入关,与唐景崧同寓(这也是张之洞接到告讦信前后)[③]。唐景崧于七月成立景军四营时,以其总理后路。这个人小有文才,微受官衔,长期活动在前敌,与唐景崧关系密切,喜欢告密攻讦他人,因而具备写密禀所必备的各种条件。假如对于多年交情,生死与共的唐景崧,唐镜沅尚且随意告密攻讦,那么,根据道听途说的传闻之辞(多是来自唐景崧的意见)来攻讦潘鼎新,在唐镜沅来说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因此,我们可以考定,张之洞所收到的密禀,应该是唐镜沅在唐景崧的影响下写成的。

那么,唐景崧和唐镜沅为什么要攻讦潘鼎新呢?这就要涉及到前面未及深论的关于潘鼎新与诸将不和的问题。密禀曾罗列了与潘鼎新有矛盾的将领名字,其实并不完整,遗漏了王洪顺、方长华等人,还有唐景崧,这可能是密禀的作者作贼心虚,有意回避了。关于不和的原因,密禀认为是由于潘鼎新对于诸将的禀陈,“无不累牍连篇,痛加诃斥”。这可能也是随意虚捏、夸大失实的说法。因为《请缨日记》曾记载了潘鼎新对唐景崧两次禀陈的批复,一次是唐景崧在观音桥战后极力为前敌请拨粮械,实质上是企图再次实现他的乘胜前扎的主张。而

① 《中法战争》(4),第419页。
② 《中法战争》(2),第49页。
③ 《中法战争》(2),第141页。

潘鼎新这时正等候清政府对于观音桥一役的评价，可能也预料不妙，所以对加强前敌并不感兴趣，因而批复两字：“多事！”另一次是唐景崧“念余系奏请留营之员，今将告归，应请琴帅附奏”。潘鼎新没有同意，但也只批回八字：“病愈仍可销差趋公”，并无“累牍连篇，痛加诃斥”的事情。以此类推，则潘鼎新对待其他将领也不会刻薄到那里去。

造成潘鼎新和一些将领矛盾的真正原因有两个。

一是少数将领由于不适应越南北圻恶劣的气候环境而欲打退堂鼓，但遭到了潘鼎新的拒绝。潘鼎新和杨玉科、王德榜、方友升、赵济川的矛盾可能因此而起。

原来，潘鼎新到任不久，随带幕僚将弁勇丁因水土不服，或病或故，以至“员弁求去，幕府一空。由于瘴故者多，人皆视为畏途，不愿久留”[①]。但潘鼎新只准文员辞去，却不允武将告假，曾奏称：“边军艰苦，人皆视为畏途，疆臣用人之难，十倍于内地。……臣自到防数月，旧日幕僚病亡假旋，星散殆尽；然文事简略，尚无损于军政。惟前敌将弁既经投效来营，予以带兵差使，非奉斥退，即不得任意去留，致开规避取巧之渐。”[②] 这样做自然会妨碍一些人。如杨玉科就曾告病乞假而未获准，杨汝翼所撰《杨武愍公讨法夷死事节略》一文就提到：“时瘴疫流行，兵卒死亡过半，公亦染患甚重，乞假入关就医，未蒙允许。”[③] 方友升军亦有类似情形，潘鼎新曾电告清政府：“方友升军二千，殁者千五百。”[④] 方友升如真有去

① 《中法战争》(6)，第532页。
② 《中法战争》(6)，第170页。
③ 《中法战争》(3)，第83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三，第5页。

意，则可能因此之故。

至于王德榜的求去，情况则比较复杂。王德榜曾有函与人谈及与潘鼎新不和的原因："弟自到越时，不恋提督之权，愿归巡抚节制，岂有不遵调度之理？然有不合意见之处，去年委散粤勇，每营只给银一千，即散遣关外。鄙见既虑为越藩滋患，增其盗伙；又防为法人所用，添其兵力，请足路费，遣之归农，力陈不允，未敢遵行。奉旨会查赵沃，欲罚其人银再议，弟以该革道同黄桂兰带勇失律，黄桂兰既畏罪自尽，赵沃应否末减，查核所递亲供，证以营弁讯吐情节，奏明请旨办理。若先取银归饷，易涉嫌疑，力陈又不允，弟遂不复过问。因此怪弟不肯相助，遇事掣肘。"①

王德榜在这里所说的恐非全是事实。因为裁撤溃军每营发饷一千两，是徐延旭、赵沃经手的事情，潘鼎新不过是循例接办，并不负直接责任。至于要赵沃罚银一事，潘鼎新也是不同意的，曾有奏称：赵沃"业经奏明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免治其罪，即不应再令罚款。虽饷项万分支绌，亦非区区万金所能补助。臣已批饬后路粮台迅速筹款，照数发还，以存体制"②。可见并非不采纳王德榜的意见。实际上，王德榜的求去，主要对战事有畏难情绪。他曾有信告人称："兹则越国以鄙远，东道凋残，就地为粮，每有无从购办之处。加以蜮工于射，虎虐于伥，轻性命于鸿毛，垫暴露于马足，事皆身经目睹，惨不忍言。幸为言之各帅之前，俾知出关将士之苦，独此为极也。方棣生观察才识闳远，谈兵审敌，处己待人，弟所深佩；乃彼去

---

① 《中法战争》(2)，第605页。

② 《中法战争》(5)，第581页。

我留，不无怅惘。刻下营中僚佐纷纷告退，弟深虞孤立，兼蹈危机，欲罢不能，奈何为计？”① 王德榜的求去可能就是因此而生。

潘鼎新与诸将不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有人争夺观音桥胜仗的战功。

观音桥之战后，清政府有旨奖赏有功将弁，按照当时的官场惯例，前敌稍为沾边的人都很容易以各种理由而列名保单得到奖赏晋升。但是，由于清政府实际上并不满意这一仗，奖赏是很勉强的，曾有旨严诫潘鼎新“当秉公保奖，切勿含糊冒滥，致干咎戾”②。这就使了解内情的潘鼎新作难了，他对下既不敢明言枢廷的不满，对上又不敢像以往那样虚报滥保，只得严格控制保奖名单，以便上下敷衍。孰料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一些不明就里的将官产生误解，结果就闹出一场后果严重的争功风波。

在这场风波中，有些将弁是赤膊上阵，理直气壮地争功讨赏的。如黄玉贤，“当观音桥获胜后，黄玉贤禀请发给赏号，潘鼎新批饬不发”。不久，黄玉贤积劳瘴故，有流言谓潘鼎新“临战悬赏，战后辄骗。去岁五月观音桥之战，骗赏银七千余两，统将黄玉贤受逼而死”。后经李秉衡等查明，“不闻有因骗赏银受逼而死之说”③。又如王洪顺，“观音桥之役，王提督洪顺有功，潘抚不赏，故士卒皆无战心”④。对法宣战后，王洪顺托病告假，不赴前敌，安居后路，造成极坏影响，被潘鼎新

---

① 《中法战争》(2)，第567～568页。

② 《中法战争》(5)，第560页。

③ 《中法战争》(6)，第532页。

④ 肖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第137页。

奏劾："查有统带镇南等营王洪顺，初由观音桥撤队入关，并无一言请退；及闻信出师，旋即托病乞假，现尚安居龙州。旋有镇南营营官李定胜，亦由观音桥请病，径回龙州，近日相率告病者尚不乏人。"要求将王洪顺、李定胜"一并革职，勒令仍赴前敌效力自赎，如再不知奋勉，即遵奉前旨，照退缩不前例，在军前正法"①。

方长华也闹得很凶。《请缨日记》载："时方棣生与琴帅龃龉，撤销威远军。"但未谈具体情况。张之洞则奏称："驻扎龙州之统领威远军候选道方长华，因所部疾病较多，东西饷章未能划一，经广西抚臣潘鼎新电商裁撤。"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观音桥之战时，方长华与潘鼎新、王德榜均在谅山商筹调度，仅做了一些"派弁相地安设地雷炸爆，并拨勇员送子药、米粮以壮士气"等后路事务，并未亲临前敌作战，因此，潘鼎新保奖时就没有列他的名字。但是，方长华却认为自己有功，应得保奖，于是八方活动，纠缠不休。潘鼎新指出："前敌所解首级、生擒并夺获法人一切器物，据该营官等禀称，实系送至方长华营内，并无虚冒。……惟不肖营员捏报冒功，道路传闻，电文错误，遂至以伪乱真，诚所不免，至见之奏牍。"② "彼八处捏报，遂以伪乱真。香帅饬方长华擅妄，故撤之。"③ 可见，方长华被撤的真正原因是争功闹事。

唐景崧当时无职无权，没有争功讨赏的资本，但他却认为观音桥之战的功劳主要是他的："余入越以来，愧无补救，虽激劝刘团屡捷，不敢自以为功也。惟北宁陷后，全军败溃，谅

① 《中法战争》(6)，第170页。
② 《中法战争》(5)，第560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98页。

山震惊，以楚、粤新来生力军，尚不肯居前敌。余以赤手受任于乱军之际，无饷、无粮、无战守具，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殚力支持，联络士心，撑柱危局。寇在百里，而两月有余，幸不敢犯前敌；此一捷也，未尝非数十旬鼓舞抚循之所致。而当时因病未在行间，后来者其到防所不过旬日，乃侈然各据以为功，不亦异乎！"① 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后却进行一连串活动。如窜改《请缨日记》上的有关记载，为自己脸上贴金，恶意诬蔑潘鼎新等。他于三月初五日（3 月 31 日）记观音桥防务，文末却加一句："自此以后，无甚变置矣。"② 暗指到观音桥之战时，防务仍是他当初的布置。然而三月初五日他又怎会知道三个月后的事呢？这不是伪造历史以自吹自擂吗？联想他硬把清政府闰五月廿四日的撤兵谕旨改为五月廿四日发出，以此来攻击潘鼎新更是伪造历史的一篇奇文，其目的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用心并不光明。我怀疑攻讦潘鼎新的告密信与他有关系，根据亦在于此。唐景崧还准备脱离桂军另寻出路，这个念头他早在三月闻知徐延旭倒台时已有了，但一直迁延不去。观音桥之战后，知道自己在保单上没名后，他的去意始定，闰五月初十日，"慨然有归田之志"。到七月，终于在张之洞的支持下，率新成立的景军离桂赴滇而去。唐景崧的离去，对广西前敌的损失是很大的，因为唐景崧入越留桂时间长，与越南抗法军民及桂军将弁勇丁均有联络，对于侦探敌情，鼓励将士，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离去后，潘鼎新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情报官员，以至不能正确判断敌情，影响了以后的战事。

① 《中法战争》(2)，第 140 页。
② 《中法战争》(2)，第 121 页。

综上所述，可见观音桥之战后，由于清政府的态度改变，从而激化了广西前敌的内外矛盾，以至饷项不供，将帅矛盾，影响士气，对以后的战事发生了消极的作用。

二　牵敌战越牺牲多

观音桥之战后，法国政府认为《中法简明条款》的草签已解决侵占全越的问题，现在是向中国讹诈和勒索巨款的时候了。当孤拔舰队驶赴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武力威胁时，清政府曾命令天津、上海、山东、浙江、台湾、福建、广东等地戒备，但终因海防力量虚弱，而未能避免基隆、马尾被袭的厄运。为了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六月十八日（8 月 8 日），清政府采纳陈宝琛的建议，欲派滇、粤、桂三省官军入越攻击北圻法军，以"牵制敌势"，"出奇制胜"[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讨论，最后形成七月初三日（23 日）电旨所称的战略方针："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②] 但是，由于粤军无力进扰越南的广安，数万援越滇军又被数百法军吸引在宣光一隅，于是牵制侵越法军的任务便主要落在援越桂军的头上。

在对法宣战的同时，清政府有旨指示潘鼎新："务即督率所部，星驰前进，相机筹办。"[③] 接旨后，尽管援越桂军仍存在许多困难，潘鼎新本人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但为了抗法大局，他仍振作精神，将前敌各军作了统一的调整和部署，准备对法作战：原守观音桥的左路桂军八营裁并为六营，因统领黄

---

① 《中法战争》(5) 第 474 页。
② 《中法战争》(5) 第 511 页。
③ 《中法战争》(5) 第 521 页。

玉贤积劳瘁故，改隶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合其原统四营共十营约5000人，由谷松、坚老向船头一路进发；记名提督王洪顺告病辞差，所统桂军四营改隶贵州安义镇总兵周寿昌，合其原统黔勇一营共五营；杨玉科因病滞留谅山，所部广武军三营改由奏调副将蒋宗汉率领，加以记名提督方友升所部二营（原为四营，病故1000人，仅余两营），三部合共十营4000余人，由屯梅、观音桥一路前进，与苏元春军分为东西两路，互相犄角，自为战守；王德榜一军因病亡约3500人，暂驻龙州等待募新军到后，再合原驻牧马、新街一带，本隶右路，裁并后改隶副将马盛治统领的桂军四营，配以唐景崧改编方长华所部粤军而成的景军四营，共20营约10000人，由牧马、高平规取太原，藉分敌势；潘鼎新自率新到的淮军五营、道员赵济川一营共六营约3000人，在谅山整理操练，以备两路策应，并防那阳分窜之路。此外，为了加强桂军的力量，潘鼎新还向清政府提出派张树声酌带粤勇赶赴广西后路，及将前敌各营统交岑毓英节制调遣，以便与滇军密切联络，配合作战的两条建议，但都未获批准。

在法军方面，当法舰袭攻基隆时，法国政府也准备在北圻采取行动。六月二十二日（8月16日），法国议院通过海军殖民部追加3.8亿法郎用于东京的法案。七月十九日（9月8日），法国政府任命波里也代替米乐任东京远征军总司令，并于三天后通知波里也：已有约3000的援军于上月从法国起程赴东京，“不久将到达您处的援兵，将使您有力量重新采取强有力的行动，重要的是应尽快地消除由于北黎事件造成的后果”。但是，由于援越桂军的急速进军，迫使波里也不待援军到达即匆促应战，于八月初八日（9月27日）报告法国政府：

许多华军向谅山进发，他们的给养、军需和军火都很充足，在季风未形成之前，应该在这方面扩大我们的行动，迅速把华军驱逐出东京边境。得到法国政府的允准后，波里也命令第二旅旅长尼格里率全旅分两路迎敌：向郎甲一路是由尼格里率领的旅部主力约 3000 余人，向船头一路是由端尼埃上校率领的一个团约 1000 余人。

八月十二日（9 月 30 日），清政府有旨令滇粤两军合力进规北圻。十四日（10 月 2 日），苏元春所部在陆岸与法军侦察部队遭遇，双方发生了小战斗。潘鼎新奏报战斗经过：十四日辰刻，苏元春率军至陆岸县对岸，见两岸炮台之下，泊有鬼板四只，随饬中营管带游击陈桂林率右、后、中三哨直扑炮台，前、左两哨攻击鬼板；又令前、后两营伏于下游，以杜法船逃窜。陈桂林率三哨队伍力夺炮台，前、左两哨继至船后，彼此枪炮齐施。陈桂林奋身直前，被炮伤左手及腹旁穿过，军士愤极，一拥而上，斩杀殆尽。法军即弃炮台回船，合力死拒两时之久，法船已有损坏，遂放棹下驶。前、后两营各率勇丁自下游截出，以抬枪、快炮连击法军。南岸鬼板亦被我军轰击，欲与北岸鬼板同遁，抚标左营已经夺获炮台，即以其炮回击。陆岸下游远泊之鬼板驶来救援，被镇南各营拦头迎剿，当毁鬼板一艘，法军计无所施，顺流败去①。波里也也向法国政府报告这次作战经过："马苏"号、"火枪"号、"大斧"号三艘炮舰在陆岸侦察纵队行动路线时，与 4000 华军进行了战斗。"马苏"号舰长战死，海军 21 人和陆军 10 人负伤。

二十日（10 月 8 日），郎甲清军与法军相遇开战。潘鼎新

① 《中法战争》(5) 第 622 页。

奏报战斗经过：统带抚标亲兵等营记名提督方友升、安义镇总兵周寿昌，由观音桥各出行队，在屯牙、郎甲一带相机游击。二十日辰刻，法军约 2000 余人乘雾来犯，突围方友升行营，镇南副中营营官副将王绍斌争先冲阵，下马抢夺敌军炸炮，被击阵亡。方友升遂率广武前营游击衔都司黄立均，后营副将衔参将胡延庆极力堵剿，自辰至未，鏖战四时之久。方友升右手腕被炮击穿，犹复左手持刀杀贼多名。黄立均、胡延庆身先士卒，力竭阵亡，哨弁勇丁同时阵亡者 300 余名[①]。据茹费理电告巴德诺的清军伤亡数字则更多：尼格里将军在郎甲与中国军队作战获得一大胜利，仅中央角面堡处，中国人死者 640 人[②]。据波里也的报告：法军阵亡 21 人，伤 58 人，尼格里也负轻伤。

事后，《春冰室野乘·甲申越南战事杂记》指出，郎甲清军所以遭到惨败，是由于误信法军间谍和各军协作不好所致：先是越南教民送豕羊犒军，报法人且至。方提督友升谓之曰："我军装未齐，营垒未固，不能速战。"越民遂去，不二日而法兵大至矣。方友升不知教民皆法军间谍，遽纳之人，且以实语之，故及于败。又指出当激战时，周提督者闻敌至，率 2500 人骇而奔。方友升被创，怨周提督之不相救也。周亦惧诛，吞金而死[③]。法人黎贡德在所撰《远征谅山》中谈及此战时，指出清军曾对法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法军充分发挥炮兵火力的作用，终于瓦解了没有炮兵的清军的多次反击而取得胜利。

① 《中法战争》(5)，第 624 页。
② 《中法战争》(7)，第 265 页。
③ 《中法战争》(3)，第 119 页。

船头方向的战斗进行的时间则较长。

八月十八日（6 日），苏元春所部与法军前锋遭遇开战，由于法军人数较少（据波里也 10 月 8 日的电报仅为约 700 人），因而在优势清军面前只有挨打的份。潘鼎新奏报作战经过：苏元春与总兵陈嘉分兵两路进攻，法军亦分两路抵拒。哨长邵士友、李明德被炮穿胸阵亡，抚标右营管带邱福光、哨长蒋全昌首先陷阵，炮炸头颅，立时毙命。前营管带吴廷汉、帮带李纯五、苏玉标亦被炮伤左膀、右腿等处，陈嘉亦伤胸前、肩头两处，仍裹创力战，弁勇死伤 50 余人[①]。又有电称：十四、十八、十九等日，苏军伤亡将弁 80 余[②]。波里也则向法国政府报告法军伤亡数字：死 4 人，其中有外籍军团的上尉迭，伤 21 人，其中有步兵少尉巴达衣。

二十一日（9 日），双方又进行了激战。法军虽然投入了全部兵力九个连约 1000 人，但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清军进攻下，作战仍十分被动。《远征谅山》写道：端尼埃上校看到中国军这样奋不顾身地激烈作战，看见在自己面前的大量军兵，又有众多来自官丘各堡的敌军增援部队，乃命令各军不再前进，只求保护本日初时所攻取的阵地。他的队伍虽则很为勇敢，但在数量上显然不许他们再往前进，以强力夺取船头大堡前面的所有战壕。只是由于得知法军已在郎甲取胜，很快会有援军到来，船头法军才在付出死 21 人，包括一名上尉，伤 92 人，包括上尉和中尉各一人的代价，保住了阵地[③]。

二十二日（10 日），船头法军得到郎甲法军的支援，实力

① 《中法战争》(5)，第 623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206 页。
③ 《中法战争》(3)，第 397～400 页。

增强，但桂军仍英勇作战：陈嘉分带抚标左营、镇南右、后等营出伏所掘地濠以待，又镇南前、左、先锋等营伏于河边土墙。当法军进攻时，陈嘉亲率前营管带都司黄云高等齐率奋勇，从中截入，越沟追杀。苏元春飞饬抚标前后两营，各率所部直攻进河小岭以分敌势，又令中、后两营齐带三哨协同粤勇一哨，驰赴船头力助镇南各营。苏元春、陈嘉各亲燃过山炮，向法军遥击，营哨勇丁莫不以一当百，飞身入阵，短兵相接。黄云高率该营右哨弁黄士佳直前，斩获三画法目二名、法兵一名，陈世华亦斩获法兵二名①。不过桂军损失也很大，八月廿六日（14 日），潘鼎新电告清政府："苏军虽胜而伤亡多，恐难持久。"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四日（6 月 16 日），御史唐椿森奏称："十八日，贼犯船头，苏元春接仗，营官阵亡者三，受伤者五，兵勇死者千计。"② 波里也则向法国政府报告对船头清军的印象：我认为华军勇敢非凡，与我们作战的华军装备有毛瑟步枪，还有远程大炮，并以欧洲方式操练。看到他们的敏捷和技巧，我相信这些军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

战后，潘鼎新于九月初六日（24 日）向清政府为苏元春和陈嘉请功：苏元春谋勇出众，血性过人，每战必先，三军用命，诚如圣谕以孤军当劲敌，允称强将。其部将总兵陈嘉忠勇素著，艰苦不渝，尤为武将之所难能。惟有仰恳天恩，俯准将头品顶戴世袭云骑尉提督苏元春，优加奖赏，以励众心；记名总兵陈嘉，拟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并赏穿黄马褂③。

① 《中法战争》(5)，第 623～624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485 页。

③ 《中法战争》(5)，第 625 页。

九日（27日），潘鼎新又奏请让苏元春会办军务，十一日（29日），清政府有旨："苏元春力战屡捷，奋勇可嘉，著派该提督帮办潘鼎新军务。"①

九月廿九日（11月18日），清政府有旨奖赏作战出力的将弁：

署提督苏元春身先士卒，勇略冠群，深堪嘉尚，加恩赏给骑都尉世职，并赏给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个，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以示优奖；总兵陈嘉亦能奋勇当先，卓著战绩，自应一体加恩，著赏给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个，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仍照所请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并赏穿黄马褂；其单开尤为出力之副将苏元瑞著免补副将，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并赏加提督衔，赏给一品封典；拟保副将游击李应章，著仍以副将留于广东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赏换花翎；游击陈桂林著免补参将、游击，以副将改留两广尽先补用，并赏换讷恩登额巴图鲁名号；蒋全春以游击改留两广尽先补用，并赏给敏勇巴图鲁名号；参将李群著免补参将，以副将留于广西尽先补用；张宗培等均著赏加副将衔；游击莫大生著以本班无论题推缺出尽先即补，并赏换花翎，赏给敢勇巴图鲁名号；陈显道著以本班留于广西，无论题推缺出尽先即补，并赏换花翎；拟保游击黄云高著免补游击，以参将留于广东尽先补用，并赏换刚安巴图鲁名号；都司彭清章著免补都司，以

① 《中法战争》(6)，第11页。

游击尽先补用；苏玉标等均著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苏玉标并赏加副将衔，吴廷汉并赏加参将衔、赏换花翎；拟保守备陈世华著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给绰勇巴图鲁名号；守备陈福隆著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军功梁锡荣著免补把总、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赏戴花翎；黄士佳著免补外委、把总，以千总尽先拔补，并赏戴蓝翎；同知潘培楷著以本班仍留广东归候补班前补用，并赏换花翎；县丞吴世芳著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并赏戴蓝翎；从九品陈翰书著免补本班，以主簿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尽先补用，并赏加五品衔；巡检周杭著免补本班，以府经历归候补班前补用；生员周志道著以巡检分发省分归候补班前补用，并赏给六品蓝翎。

慈禧太后也发去内帑银3000两，赏给此次尤为出力兵勇。

清政府还从优议恤观音桥、郎甲、船头诸役中阵亡的副将黄政德、邱福光、陈义新、刘得胜、张大寿、刘玉贵；副将衔参将胡延庆、参将王绍斌、肖有明、黄世昌、石启官、张兴宽；参将衔游击肖宝臣、游击李纯五、吴少怀；游击衔都司黄立均、都司任有锡、李逢桢、吴述元、周同芳；从九品黄汝霖，守备黄效忠、杨承祥，千总苏元璧、蒋全昌、李得胜；把总班有兴、李明德、杨春村、唐国广、叶亚吉、梁正辉；外委曹正亮、六品军功劳国丰等34名。并瘴故之提督聂桂荣，总兵陈东海、汤文千，副将韩孟堂、苏长清，副将衔参将张佩兰、参将简崇修，游击衔都司陈玉鸣等八名。[1]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443～444页。

郎甲、船头之战，是中国对法正式宣战后援越桂军与法军的首次作战，虽然战事最终以清军的败撤而结束，但援越桂军的英勇作战却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打破了“法军四千人即可扰中国七省”的神话，有力地延缓了法军进兵谅山的日程，回击了法国侵略者以战争来讹诈和勒索中国的阴谋。船头战后，法国政府认为仅以波里也手中所掌握的一旅4000人兵力不足以进占谅山，被迫命令法军不要再向前进，如要“继续作战，尚须等待非洲调来军队”。以至使得迫切渴望在谈判桌上讹诈和勒索中国的巴德诺，多次沮丧地致函茹费理叹息：“我可以推断，在下月以前不能占领谅山，这个新停顿的时间，当然不利于恢复商议。”① “如果不占据谅山而能使中国政府受严重影响，则我将引以为奇。”② 2．阻滞了孤拔舰队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行动。在郎甲、船头战斗进行的同时，孤拔舰队发起了进攻沪尾的战斗，但被守军迎头痛击，大败而回。八月二十三日（10月12日）巴德诺要求茹费理给孤拔派来援军，以便占据台湾，再北上骚扰直隶等地。但是，兵力拮据的法国政府只能全力增援波里也，却无法顾及孤拔了，海军殖民部长致函茹费理称：援助孤拔将会分散我们的兵力，削弱我们在东京的力量，而我们相反正应在东京进行强有力的行动。巴德诺闻悉此讯后，曾惊呼：“我闻孤拔提督要求的三千名援军已被拒绝，并闻政府已抛弃其占据沪尾的意思。”③ “孤拔海军提督甚至连他在九月间计算可用的上陆军队也没有了，

① 《中法战争》(7)，第278页。
② 《中法战争》(7)，第268页。
③ 《中法战争》(7)，第284页。

他向北直隶行动原来可用的舰队也减少很多。"[1] 3. 桂军的进击，加上台湾守军的沪尾获胜，滇军的进围宣光，迫使嚣张一时的法国侵略者打消了向中国勒索赔款的念头。据日意格九月间向驻法公使许景澄报告：茹费理曾向他表示："似法廷知中国必不允偿，已于巴使说帖中，将偿款作罢论。"[2] 从这三点来看，广西军队对于中法战争是有贡献的。

不过，在战后总结时，潘鼎新还是冷静地看出中法两军的差距及援越桂军存在的困难。1. 法军的战斗力远远强过包括苏元春所部在内的援越清军的战斗力。他曾有电称：法兵每战不过千余，枪炮之利，我军四、五千当之犹觉吃力。苏真健将，若法再加兵，支持不易。方、周退守观音桥，其材力去苏远甚[3]。张之洞也有电称：桂军皆血战，火器不敌，故虽胜而多损[4]。2. 桂军分兵把口的战术有误。潘鼎新奏称："谅平隘口较多，处处可通关内。守隘则分兵，兵分则力弱，弱则战守不能兼备，安望制其死命？即如前次船头之役，酣战五日之久，若另有大枝劲旅，或挠其旁，或抄其后，必可一鼓歼除。奈粤西兵单饷缺，力不从心。"[5] 3. 后勤问题严重削弱了桂军的战斗力。"瘴染少兵、道阻少械，地瘠少粮，三难内地所无。"[6] 加上缺饷，局势不容乐观。

对于潘鼎新提出的问题，清政府给予了重视，除了催促各省给广西前敌筹拨饷械外，还根据潘鼎新的请求于九月给广西

① 《中法战争》(7)，第291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489页。
③ 《中法战争》(4)，第206页。
④ 《张文襄公全集·电奏》，卷一，第10页。
⑤ 《中法战争》(6)，第171页。
⑥ 《中法战争》(4)，第206页。

增拨了援军："据潘鼎新电称，法寇力图谅山，牧马等处空虚，无饷添募等语。著卞宝第于魏纲等所募新勇酌派四五营，遴选得力统将迅速带往广西关外，交潘鼎新调遣，饷项仍由鄂省筹拨。该营未到以前，如急须添营，潘鼎新即酌募土人应用。"[①]张之洞也因潘鼎新要求广东"出偏师助桂军腾出兵力攻西路"，于九月二十二日（11月9日）答复派冯子材部赴援；十月十一日（28日），又电奏清政府，更增派王孝祺一军出关助战；十一月十四（12月1日），又因冯子材固请，张之洞允其再增募八营，共18营9000人。魏纲、冯子材、王孝祺三军共31营15500人，为数不少，可惜军行迟缓，以至赶不及即将来临的大战。

倒是广西前敌各将自己设法添募兵勇以迎接未来的战事。其中，苏元春新募三营，又因周寿昌病故，所统黔勇一营、桂军四营改隶苏部，加上苏军原有十营，共为18营约9000人，仍当船头一路；这时，杨玉科病体小愈，即委员往滇、黔招募精壮，于十一月先后到营，加以方友升也派员回湖南招募一千余人到来，合共12营约6000人，由杨玉科统领驻扎观音桥一路；王德榜派员回湖南招募的勇营也已陆续到来，共十营5000人，防守那阳一路，警戒郎甲、船头之敌绕路犯谅山；副将马盛治仍率六营3000人，驻扎太原之新街，俟宣光得手，即与滇军会攻太原；潘鼎新自率淮军六营3000人驻守谅山，以备策应各路。

这时，陆续得到援军的波里也也急于进军谅山。因为1884年11月底，法国政府批给6000万法郎的战争拨款。12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423页。

月 31 日，法国政府向他发出命令，要他发起进攻，占领谅山，夺取法军尚未占领的东京领土。1885 年 1 月 3 日，波里也致函法国驻顺化公使李梅：现在，我最为关心的是阻止中国军队的入侵，并将中国大量部署在沿海至红河两岸包括整个红河三角洲在内的正规军、非正规军驱出东京境内。可惜，由于有利于作战的季节业已大大提前，我不得不立即行动，而无法等待业已通知我的各路援军的到来，特别是将于 1 月 5 日离开法国的五千新兵。在此种情形下，我将率领几乎所有的兵力开赴前线。法国政府对于波里也此行寄予极大的希望，1 月 7 日，茹费理致电瓦定敦称："我们想，现今中国肯听从的惟一谈判者是波里也将军。"①

十月底，潘鼎新从探报中得知法军正在加紧调兵遣将，又接到岑毓英函咨，谓云军进攻宣光，属即督饬各营进剿，以分敌势。遂与苏元春熟商：法人骤添新军，其势益横，不如趁其初到，先挫其锐，较易得手。廿八日（12 月 15 日），派苏元瑞等率毅新中、右、前及副前、副中、副后六营，副将李应章、参将黄云高等率镇南前、左、右、先锋四营，于是晚四更时，分兵两路，一至法军来路左傍里许深林内埋伏，一至右傍里许僻涧中设伏。令提督陈嘉带同淮部安义等营、毅新左营、镇南中、后两营，于二十九日（16 日）辰刻自坚老老营直出平内。法军正在纸作社前列队，突见陈嘉兵到，迎前接仗，枪炮如雨。正在酣战之际，苏元瑞、黄云高等两路伏兵乘势齐出，各勇奋勇截杀，三面夹击，短兵相接，阵斩法官三画一名，二画二名，一画一名，法兵首级 11 颗，教民首级二颗。

① 《中法战争》(7)，第 286 页。

镇南中营管带彭清章、毅新副中营帮带覃志成等飞身入阵，击伤五画法官落马，覃志成登被炮伤小腹，彭清章亦被炮穿左肩，受伤勇丁 41 名，法军退入纸作村坚守，挨至傍晚，众军始收队[①]。波里也则报告此战称：华军骚扰船头东北七公里的大集市，我驻船头的卫戍部队立即派遣一个小分队前去迎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法军阵亡 15 人，伤 19 人，另有安南士兵一名阵亡，三人受伤。显然，这是一次小战斗。

但是，潘鼎新在奏报战况时，却谎称法军“伤亡一百八十余名”[②]，清政府信以为真，于十二月有旨奖恤作战出力人员及阵亡将弁：记名提督贵州安义镇总兵陈嘉，虽据声称不敢再邀奖叙，惟迭著战功，深堪嘉尚，加恩著赏穿黄马褂；游击彭清章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都司张开成著免补都司，以游击改留广西尽先补用；千总文正贵、把总关骏杰、梁秀春三员，均著免补千把，以守备尽先补用；军功张华书著免补外委、把总，以千总尽先拔补，并赏戴蓝翎；亲军营营官知县沈茂政著免补本班，以同知、直隶州知州仍留广西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毅新营营官典史刘荣琚著免补本班，以县丞、主簿仍留广西归候补班补用。其阵亡之副将苏玉标、都司陈福隆、把总张元鸿、顾玉芳，均著交部照阵亡例从优议恤。慈禧太后并发去内帑银 5000 两赏给尤为出力兵勇[③]。

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自从于光绪十年二月率领楚军十营 5000 人出关以来，未及与法兵作战，即因水土不服而瘴故将

---

① 《中法战争》(6)，第 206～207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207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 1880～1883 页。

士近半，闰五月底撤军入关后，他便遣员回湖南招募 2300 人前来。可能由于等待新兵到来的缘故，所以当中法开战，各军纷纷出动时，他虽已奉命会合马盛治、唐景崧两军从新街、牧马进取太原，但却一直滞留龙州而不动身。当郎甲、船头先后开战，前敌紧急时，他仍慢条斯理地函复潘鼎新的催促：楚军仍未能启程，以免与唐景崧等军“同行拥挤，稍缓时日”。连一向袒护他的张之洞也觉得太不像话，于九月十二日（10 月 30 日）致函潘鼎新：“朗卿宿将重兵，然成军年余，糜饷五十余万，从未一战。今抗尊檄迁延，来禀饰词防龙州后路。请转告朗卿，如再诿避，洞即劾之，勿罪。”[①]

王德榜的行为也引起了清政府的反感。九月十二日，他的老上司左宗棠曾奏请清政府：“可否仰恳天恩，准将王德榜帮办越南军务。”[②] 但清政府不予理会，反而将帮办一职给了资望远逊的苏元春。碰了钉子的左宗棠有函沉痛地告诫王德榜：随征二十余年，任事勇往，夸为楚将之冠。此次奏派赴越，任事不及从前，切勿有初鲜终，负我期望。现在朝命主战，务要尽心竭力，有机即图，不可畏难，不可轻率。倘真不如从前出力，贻举者羞，不待他人列参，我先劾之[③]。

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王德榜于九月奉命防守那阳一路后，态度才变得积极起来，率军从那阳、板山、福胜一路前进，十一月初进扎板峒。这里是三叉路口，一面距船头 70 里，一通海防，一通广安，均二百余里。王德榜初意本拟由东潮直捣海防，倾其巢穴，一则出其不意，二则藉分贼势。但因苏元春军

① 《中法战争》(4)，第 453～454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19 页。
③ 《中法战争》(2)，第 606 页。

尚未攻克船头，后路不无可虞，遂禀潘鼎新，欲助苏军收复船头，然后再趋东潮。潘鼎新复函同意他先助苏军收复船头，然后分兵进取。并提醒他敌悍器精，谆属稳扎稳战，切勿轻率失机。又因苏元春来函询问，如果进兵有期，彼当立刻拔队同进，王德榜遂与苏元春约会分道并进，攻取船头的日期。但当王德榜留两营仍驻板峒，自率八营于十一（12月27日）、十七（1885年月1月2日）等日先后进扎离船头30里的丰谷、梅苏一带后，苏元春却通知他：新募三营粮械不齐，须暂缓十日方能拔进。未待王德榜采取措施应付这种突然的变化，正在整装待发进军谅山锐气正盛的法军已侦知楚军孤军深入，于十八日（3日）由尼格里率第二旅的主力前来攻打。战斗进行了两天，王德榜临机策应，仗剑督战，用手枪击敌，躬率将士英勇迎战，多次击退法军。但是法军炮火猛烈，"无如我军营垒新筑，泥土松薄，而正左、副左、正后、副后营垒被其开花炮轰坏，弟犹督率将士凭濠固守。相持至酉，军火告乏，不得已回驻板峒营中"。后又退至距那阳80里的车里[①]。

事后，王德榜呈报伤亡将士情形称：花翎总兵黄喜光、花翎参将左廷秀、谭家瑞、王德永、蒋玉堂、黄祖富、左占元，已革花翎参将柳臣玖、花翎游击陶德玉、聂章寿、王得才，花翎都司王天喜、陈双发、赵步云、谭连升、胡克胜、田玉贵，蓝翎守备邱正亮、邓青云，蓝翎千总谢廷兰、张玉魁、阳大德、胡士英、李德武，蓝翎把总肖荣、王成吉，蓝翎外委刘云汉、谢会昌，六品军功黎占元、唐复兴、谭心明，以上33员

① 《中法战争》(3)，第289页。

均系力战阵亡，并阵亡勇丁 423 名[①]。但未提及伤员数目。后来他曾有函告人：此战“将士伤亡近千”[②]。而波里也向法国政府报告，则称此战清军遗尸 600 首，法军仅阵亡 19 人，伤 66 人。

事后总结，关于此战失败原因如下：

1. 法军炮火猛烈难挡。王德榜函告友人称：当激战时，法军推开花炮数十尊向我营轰击，营官有当之糜碎者二员，哨弁勇丁伤亡亦多，新筑营垒均被开花炮轰坏[③]。潘鼎新亦报称：“营墙帐房均被炸炮轰毁，将士伤亡亦多。”[④]

2. 王军装备窳劣，缺乏新式大炮和后膛枪。早在潘鼎新到任之初，就于五月二十二日（6 月 15 日）电告清政府：“王、方及渠处皆无大炮，守隘守营均不得力。”[⑤] 既败之后，潘鼎新又于十一月廿日（1 月 5 日）电告清政府：“王军无后门枪，平时贪刻骄忮，有取败之道。”[⑥] 后来，张之洞为王德榜辩解，也有电称：王军“并无后门枪”[⑦]。王德榜则自称：当装备新式枪炮的法军来攻时，他只能靠一些落后武器抵挡，“是役非赖多增劈山炮、抬炮、抬枪，各队药饱子群，几不可救，危哉！”[⑧] 武器优劣相差如此悬殊，安能不败！

3. 各军行动不够协调，不能配合作战。战后，潘鼎新曾

---

① 《中法战争》(6)，第 345 页。
② 《中法战争》(2)，第 578 页。
③ 《中法战争》(2)，第 575 页。
④ 《中法战争》(6)，第 267 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
⑥ 《中法战争》(6)，第 226 页。
⑦ 《中法战争》(6)，第 374 页。
⑧ 《中法战争》(2)，第 575 页。

奏称：当法军进攻丰谷时，“是日苏元春闻信由谷松出队，次日至坑下左近，法兵恐其乘虚袭后，亦随即撤回船头，未敢穷追”[1]。但王德榜仍误会苏元春见死不救：“致弟进陷丰谷，苦战两日夜，离苏营只四十里，请援不应。”[2] “此似有心误我”[3]，二将从而不和。《清史稿·王德榜传》称：“战丰谷，败，苏元春不往援，德榜衔之；以故元春败于谷松，亦不往救。”

丰谷之战暴露了援越桂军的部署和弱点，使法军得以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即以少数兵力牵制车里及观音桥两军，而集中主力进攻谷松清军，然后直驱谅山。十二月十四日（2月1日），法军组织了进攻谅山的远征军，由以下部队和部门组成：

第一旅：旅长，约翰尼奈利。

骑兵：下士一名，兵士五名。

步兵：海军陆战队的二个营（步兵第一团），指挥官，郎比内、马衣亚。阿尔及利亚土著步兵二个营（步兵第二团），指挥官，米比埃、哥摩亚。东京土著步兵团第二团一个营，指挥官，东诺。

炮兵：炮兵大队司令员，列夫拉。第三炮兵中队，指挥官，路塞尔。第四炮兵中队，指挥官，罗北。第五炮兵中队，指挥官，北利可。

野战医院一个排：负责医生，德里若。

第二旅：旅长，尼格里。

骑兵：下士一名，兵士五名。

---

① 《中法战争》(6)，第267页。
② 《中法战争》(2)，第604页。
③ 《中法战争》(2)，第575页。

步兵：第三团的三个营：第二十三营，指挥官，（?）。第一一一营，指挥官，浮尔。第一四三营，指挥官，法列。外籍步兵团的二个营，指挥官，寿非。土著步兵第一团一个营，指挥官，约拿·德拉加。非洲轻步兵营的参谋部和二个连，指挥官，薛威埃。

炮兵：炮兵大队，指挥官，特都夫维。第一炮兵中队，指挥官，马丁。第十二团第十一炮兵中队，指挥官，游提。第十二团第十二炮兵中队，指挥官，萨克雪。

野战医院一个排，负责军医，朱贝。

此外，还有少数未编人各旅的骑兵、炮兵、宪兵、工兵等人员。这部分主力部队的具体人数虽未查明，但据说在进行谅山战役过程中伤亡约 400 余人，病弱约 500 余人，合共 1000 人左右①。随后调第一旅赴援宣光，据说为 3500 人，如果第二旅人数与第一旅约略相等亦为 3500 人，则法军主力总数应为 8000 人左右。

对于严重的敌情和法军的主攻方向，潘鼎新似乎并不了解，因而仍旧奉行分兵把口、分头作战的战术，而没有及时收缩兵力。并错误地把王德榜所扎车里一路看成防御的重点，不但援以自己所率淮军二营，并拟以冯子材所部前往驻扎，以厚兵力。十二月二十一日（2 月 5 日），他报告敌情和自己的部署称："据冯军探称：近日法兵负固船头，分扎坑下，多拖车炮，督夫修路，海阳、北宁、河内法兵概行调出，拟三路进攻谅山：一由观音桥，一由谷松，一由坑下，并犯那阳等语。查观音桥、谷松有杨、董、苏等军扼要，地势险，似无虞；惟坑

① 《中法战争》(3)，第 423 页。

下仅有王藩司军，新挫恐怯，可否将冯军左右八营并扎那阳或车里，为王军声援？”[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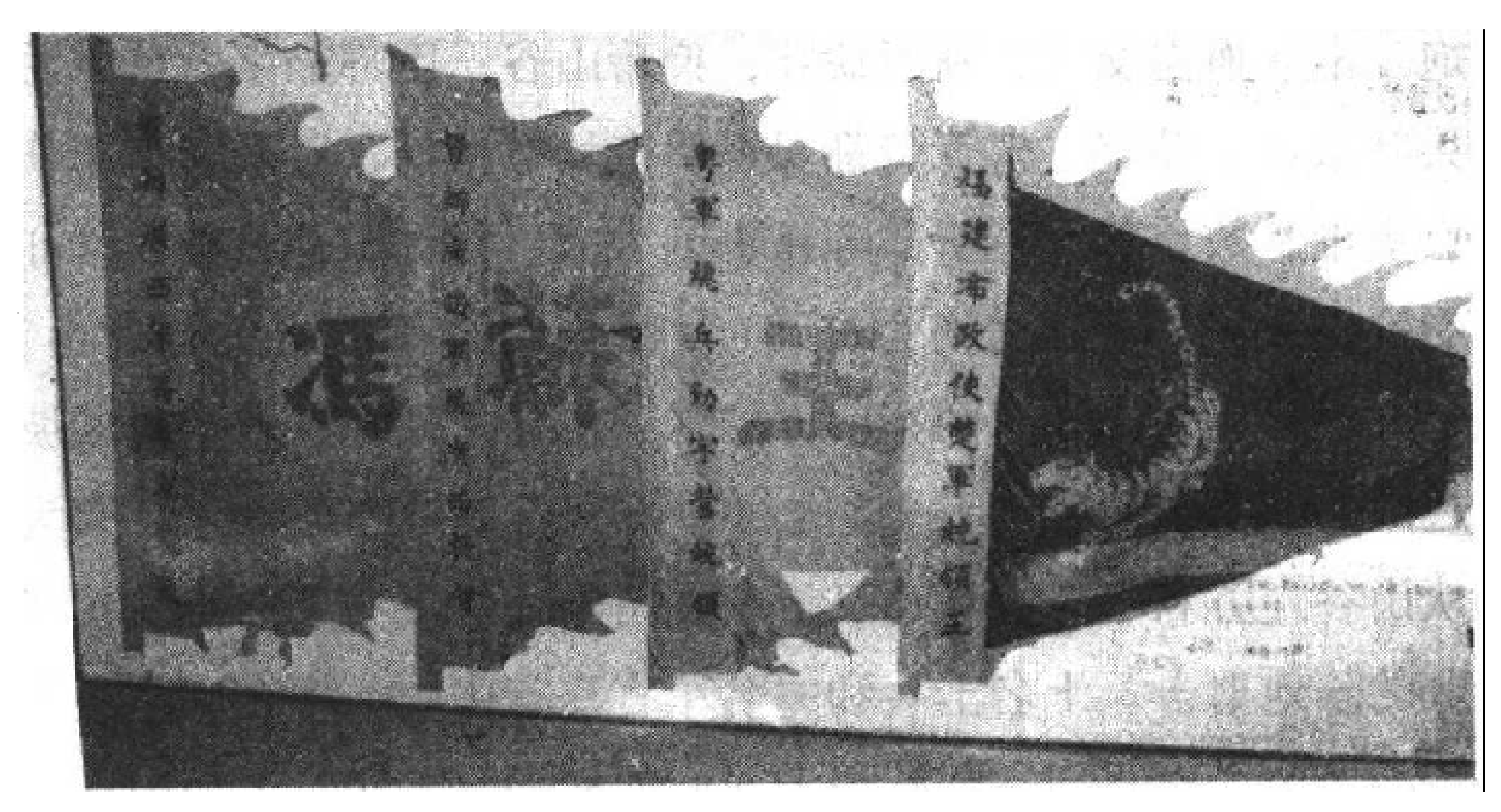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九日（2月3日），法军主力由船头、陆岸一路向谅山进发。二十日（4日），先头部队与苏元春的前锋陈嘉所部六营遭遇，展开战斗。在激战中，“陈嘉受创昏倒，左右掖之去”[2]。率部退至谷松，在距谅山120里处与大队会合，法军也伤亡90人。潘鼎新闻报，知道谷松危急，忙派驻守屯梅的董履高率淮军龙字营前往救援。二十一日（5日），法军倾尽全力向苏元春部发起攻击，先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清军营垒，然后再以步兵包抄前进。激战中，淮将刘思河被飞炮炸首，登时阵亡；董履高左腿亦被枪弹击断，伤势甚重。苏元春看到营墙均被轰毁，士卒伤亡过多，只得于二十二日（6日）率军退扎威坡。法军以伤亡182人的代价，占领了谷松。

苏军退至威坡后，潘鼎新亲率亲兵及总兵叶家祥所部淮勇五营前去救援，并飞调杨玉科、王德榜两军分路抄击，又催冯子材部出关会剿。但因法兵曾派少数兵力佯攻车里、观音桥，以牵制王、杨两军。故王德榜只派提督杨文彪率四营赴援，在半路截击了一支法军运输队后，即留札福胜，不再前进。而当法军骚扰观音桥时，据杨汝翼的《杨武愍公讨法夷死事节略》记载，守军“幸先分兵设伏截剿，公亲率大队迎敌，伤毙悍贼多名，伏兵亦出三路环攻，毙贼数十。贼势不支，退踞高岗，以利炮环护。我军未能逼近交锋，乃分占山岭，以枪炮相持。至晚，贼退后，忽报谷松一路官军先锋营垒失利。当即留兵守

① 《中法战争》（4），第224页。
② 《中法战争》（4），第510页。

桥，亲率精锐黑夜往援。途间屡遇伏贼，皆为我军击散。惟阴云微雨，月色昏暗，追至谷松，始知此路各营垒先已为贼轰陷，官军亦退守谅山。贼复进犯屯梅、五台等处，欲夺我中路粮储，不意我军陡至，始伏林间，不敢下犯。当与驻屯梅将领妥筹守御之策。忽传贼乘隙来攻观音桥之报，遂留一军助守屯梅，公率精锐驰回观音桥督剿，连战皆捷，始将中路守固。嗣因屯梅之军往顾谅山，仅余前留助屯梅一军在彼，贼大股来犯，几至奔溃。闻报，即分兵驰往援应，互有伤亡，贼众旋却旋进"[①]。就这样，杨玉科一军为敌牵制纠缠，也不能赴援。

至于冯子材、王孝祺两军，早在二十一日张之洞就有电命令王孝祺速挑四营赴谅山之东，择要屯扎助战。二十五日（9日），又电令冯子材：前敌甚急，八营援谅甚是。那阳到谅 90 里，今日当可到，务须激励诸军一战[②]。二十八日（12 日）并



中法战争时，冯子材、苏元春、王孝琪、王德榜军旗

① 《中法战争》(3)，第 83~84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459 页。

有严令：谅防急，王镇即刻亲身率队驰援，不准刻延。冯军门速饬八营抄袭，勿误。如谅山见贼而两军未接仗，两君之责也[①]。但是，两军均未能遵令而行，赴援谅山，以至谅山失守后，张之洞曾有电严责冯子材：谅山不守，何以贵部八营并未赶到抄击？实堪惊异愤急！何以上对朝廷？且亦何以对桂军？[②]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六日（3月2日），冯子材复电称："送来电均码数未悉。"[③] 原来是译电出了纰漏，所以不能遵令而行。

四路援军都因故耽搁，潘鼎新、苏元春只得指挥孤军竭力抵御法军。二十八日，法军对威坡发起了总攻，双方的炮兵进行了激烈的炮战，双方的步兵也反复展开包围和反包围的鏖战。潘鼎新曾奏报战事激烈情况：各军奋力抵御，每发排枪一次，法逆前队大半颠踣，二队仍践尸蜂拥而上，连环迭进，枪炮互击，血肉交飞，断脰缺肢，狼藉山谷。臣部鼎字营统带总兵叶家祥、鼎字左营管带都司饶明奎均被枪伤，其哨官勇丁伤亡更难悉数。苏元春所部陈嘉裹创力战，复受炮伤，苏元瑞亦受枪伤，其营哨官之伤亡亦多[④]。法人黎贡德的《远征谅山》一文也详尽地描述了两军所作的殊死搏斗。如他这样描写威坡之战的一个场面："但进攻的我军情形还是一样地危急，因为从山谷左方和右方的高地又重新发出炮火，集中地向被我军夺取的阵地射击。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嘉宁中尉差不多即刻丧失了战斗力。军官们立即整理士兵们的秩序，并指定要与中国军

---

① 《中法战争》(4)，第461页。
② 《中法战争》(4)，第463页。
③ 《中法战争》(4)，第464页。
④ 《中法战争》(6)，第343页。

相抗的各小队，于是两军间打起激烈的枪火。”而在谅山之战中，当早晨大雾浓密，法军大炮无法瞄准射击时，“中国军以为我们已不愿作战，奋力地进击，他们沿山谷的两边前来，要包围我们，并发出很激烈的枪火，子弹从各方面飞来，即在后面的队伍亦受到一些损失。……许多子弹射入空中，一直打到第二旅部所在地，所以我们军中，甚至未加入战斗的部队，欲想找到安全的躲避处，亦几不可能。总司令的传令官波桑少尉就是这样子被击毙在波里也将军旁边，同时，相距没有数步，杜歇炮兵中尉亦受了伤。在前头展开的部队，当然受到远为重大的损失，旅部炮兵指挥、炮队队长列夫拉就在约翰尼奈利上校旁边中弹，立即毙命”①。只是在大雾消散后，法军炮兵才能正确地轰击清军，再配以步兵的包抄进击，这才粉碎了清军的抵抗。这时，潘鼎新“料独力难支，如株守谅山，仅恃淮苏两部之数千疲卒撑持，该逆如从后路包裹，则南关粮道断绝，大局更属可危。不得以与苏元春熟商，于二十九日（13 日）将谅山房屋焚毁，分勒部卒回扎谅山界之巴坪、文渊州一带，以顾南关根本”②。事后，潘鼎新电告清政府伤亡情况：“日是，统将陈嘉、苏元瑞、淮将董履高、叶家祥同时受伤，营员弁勇伤亡千余。”③ 在谷松、威坡之战同时阵亡的还有尽先补用都司罗益胜，尽先拔补千总胡齐喜，六品军功尽先拔补外委雷逢春、邹兴隆、周学景、何吉祥、梁国安，六品军功刘光瑶、江永朝、梁昌富等十员弁。波里也则报告此战称：当天上午 10 时，士兵与敌人接触，越来越多的敌人占据着极为有利

① 《中法战争》(3)，第 409～415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343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232～233 页。

的阵地，这些阵地上筑有数个坚固的、配齐火炮的堡垒。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寸土必争，一直到下午 4 时。最后，我们对几个主要的阵地发起了卓有成效的冲锋，从而结束了这场战斗。此战我方阵亡 39 人，负伤 220 人。此外，战死的还有土著步兵 17 人，东京步兵 1 人。伤员中有土著步兵 101 人，东京步兵 8 人，伤亡共计 386 人。

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7 日），法军侦察队至巴坪，为清军击退。初五日（19 日），杨玉科率所部 12 营，由观音桥斜出屯梅，至文渊与潘鼎新等会合。杨玉科目击时事艰危，毅然以守关自任。初六日（20 日），潘鼎新檄杨玉科守文渊以卫镇南关，陈嘉率曾经伤亡而未及补充整顿的六营助守，苏元春率余部驻守关右以为犄角，潘鼎新自率淮部各营以为援应。也许由于误信张之洞所谓“法意在全占越境，断不轻入华界”的说法，因而潘鼎新不但没有及时将王德榜、马盛治等军收缩至镇南关一带，反而以各种借口将已赴关助援的冯子材、王孝祺两军遣走，从而失去了挽回局势的最后机会。

这时，虽然波里也已率法军第一旅西援宣光，但尼格里在休整几天后，仍率第二旅三千余人于初九日（23 日）乘胜直扑镇南关。杨玉科闻报，一面函请潘鼎新发兵援应，一面率军亲临前敌迎战。《远征谅山》一文描述了桂军顽强抵抗法军的场面：“中国军得到极多的增援，以很激烈的炮火向罗北炮队射击，该炮队的情势不久便危急起来……中国炮手以海军第四甲炮队为目标，且能相当快地射击，不过他们的炮弹没有一颗爆发。”[①] 激战中，分统广武军三营的记名提督徐联魁被炮重

① 《中法战争》(3)，第 427～428 页。

伤，统带广武中营的游击衔补用都司刘映丰被炮重伤阵亡，杨玉科的左右亦大半带伤，但他仍奋不顾身地策马往来，亲督将士向前力战，誓必灭此以申天讨。不意正酣战间，忽被炮弹贯穿左耳底，立即昏晕坠马。移时稍苏，谓左右曰："我一死不足以报国。汝等须努力同心，痛歼逆夷，早为国家除患，我虽死目亦瞑矣！"言讫而没①。同时阵亡的还有头品顶戴记名提督余洪胜、副将衔尽先补用参将周开泰、尽先补用游击周志刚、游击衔尽先补用都司潘耀东、都司衔补用守备杨芬、高钧云、守备衔拔补千总张桂林、罗兴顺、蒋庆先、吴志忠、拔补千总张家海、符志雄、李时荣、郭占魁、尽先千总四川阜和协左营外委卢鸣孝、六品军功拔补外委杨明祉、蓝翎五品军功吴茂轩、六品军功李开利、梁喜华、黄其方、阮亚生等21员弁。诸军看到主将阵亡，遂无斗志而溃。

苏元春部将提督衔记名总兵孙得胜正率所部在文渊附近与法军鏖战，被敌枪子伤左臂，部下弁勇拥之暂退。因见广武军失利，又复怒马陷阵，奋勇杀敌，卒以力竭中炮殒命；相随死者有部将尽先补用副将沈桂开、副将衔留黔补用参将苏玉龄、尽先补用游击陈刚等三员及勇丁数十人。就这样，桂军的抵抗终因法军炮火猛烈而崩溃了。法军以死9人，伤46人的代价占领了镇南关，停留两天后撤离。临走时，法军用炸药轰毁镇南关关门及周围的建筑，并在残瓦废墟上竖立一根柱子，用中国字写着："尊重条约较以边境门关保护国家更为安全，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清军返回后，拆掉法军留下的柱子，另竖一根柱子答复法军："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

① 《中法战争》(3)，第85页。

门户！”① 表达了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和报仇雪耻的决心。

二月，清政府根据潘鼎新的奏请，优恤在谷松、谅山、镇南关诸役中阵亡的将弁杨玉科、刘思河、刘映丰及游击衔都司黄正寅、邓宴材、杜光海、守备罗云高、千总俞谏臣、蔡德胜、孙其昌、把总谢士和、六品军功万国发等员②。五月，又给杨玉科“赐祭一坛，加恩予谥，并将事迹宣付史馆立传”③。五月，苏元春又请清政府优恤余洪胜、孙洪胜、记名总兵孙得胜等二十余员弁。

三 败挫之后谈原因

谅山、镇南关失事的噩耗传布后，清政府上下震动，纷纷追究败挫的原因。在正月初九日镇南关失守之时，潘鼎新曾拟电稿，把败挫原因归咎于冯子材、王德榜两军没有及时援应，于十一日（2月10日）报告清政府：“新左肘受伤，杨军溃散，冯子材、王德榜二十八营飞催不至，掣肘万分，惟一死以报国恩。”④ 清政府览奏后，于十三日有旨责问冯王二人：“冯子材、王德榜经潘鼎新飞催不至，可恨已极！著张之洞、潘鼎新传旨严催援剿，倘再玩延，即照军法从事。”⑤ 潘鼎新在光绪十四年病死后，李鸿章于同年九月十三日（10月17日）奏上《潘鼎新请祀昭忠祠折》，即据此电而为潘鼎新开脱，并误引伸到谅山之役：“迨十年十二月间谅山之役，法人尽锐以全

① 《中法战争》(3)，第530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1909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1949页。
④ 《中法战争》(4)，第233页。
⑤ 《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一，第35页。

力来攻，该故抚督淮桂两军奋死搏战，援军近接飞催不前，独以孤军撑柱强敌，身受重伤，力竭退师。失事之先，该故抚电奏亦有掣肘万分，惟有死报之语，张之洞电奏，亦有可谓力战，特敌太猛之语，盖所处之地实属万难，众论同声，非由饰说。"[①] 后来，潘鼎新的儿子编辑出版《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时，即据李鸿章的讹言，将镇南关失守与谅山挫败混为一谈，在跋文中反复提及："是年冬，法以全力注我，先中丞公独以孤军支柱强敌，鏖战十昼夜，援师近接飞催不前，十二月二十九日，致有谅山之退。……而推究致失之由，实缘东军近接有恃不前，故掣于内。"[②]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大概在发出十一日的电报后，潘鼎新才看到李鸿章于初九日的来电，提醒他在遇到败挫时不要诿过他人，而要设法团结诸将："闻弟不得众心，怨谤四起，若有蜚语入告，祸将不测。务望忍忿虚衷，引疚自责，开诚布公，诸将一体看待，庶可联络布置，逐渐挽回。"[③] 潘鼎新才慢慢冷静下来，在廿七日（3月13日）的奏折中改变了口气，开脱冯、王二将的责任："谅山之役，若非药尽援绝，断不轻议退守；文渊之役，若非统将阵亡，断不致任其阑入。苏元春等实因血战力竭暂退，并非退缩不前；王德榜分防在百余里外，一时赴援不及；冯子材、王孝祺新军初到，粮械不齐，均属情有可原。"[④] 二月初八日（3月24日），清政府有旨查询："究竟该两军因何奉调不到？"著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三，第32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4689～4690页。

③ 《中法战争》(4)，第231页。

④ 《中法战争》(6)，第344页。

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等秉公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1]。三月廿四日（5月9日），李秉衡等复奏："南关告急，因王德榜远在百余里外，未及立时赶到。冯子材新军初到，粮械不齐，均属情有可原。"[2] 基本推翻了潘鼎新关于冯子材等飞催不至的说法。

当事各人的说法也与潘鼎新所说不同。如冯子材、王德榜认为战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潘鼎新调度无方，指挥不力。王德榜曾多次有电报信函述及其在谅山、镇南关等役时的行踪甚详。如有两函告人称：十二月廿三（2月7日）、四（8日）等日，连奉琴帅札调弟军由那阳回顾谅山。廿五日（9日）连奉飞函，饬扎距谅30里之牛墟，而飞函又来，以冯军有八营相助，不必拔营，如果谅山有警，可乘虚捣船头[3]。敝军廿九日（13日）到禄州，是日谅已失，即奉香帅谕同冯军守顾东路。时琴帅不知何往，遂于初二日（16日）具禀差弁于龙州、凭祥、幕府、海村一带探请帅示，为敌势所隔，不得踪迹。延至初十日（24日）始奉回谕，在东路会合冯军相机雕办。十一日（25）奉谕抽三成队与诸军袭剿，又戌刻奉续谕南关官军获胜，饬拔队回援，以壮声势等因。当与冯军门商妥，于十二（26日）、三（27日）两日先后开差，十五日（3月1日）早抵宁明，方知镇南关初九日不守。南关之失守也初九，弟于十一得初九函调，安能于未调之先预知其不守而往援耶？板陇至南关，计程二百余里，事前既不调往以备守，临事又不坚守以待

① 《中法战争》(6)，第360页。
② 《中法战争》(6)，第445页。
③ 《中法战争》(2)，第578页。

援，事后复不回合以兜击，而徒诿过于人，问心岂能无愧？[1]

正月十九日（5日），冯子材致电张之洞辩白此事：琴帅奏材飞催不至，甚诬。……材闻谅失关危，飞调派站八营回关固守，材初一（2月15日）率中军左营由龙赴关，初三（17日）至。琴帅以守关无须萃军，面饬仍顾东路。时八营已抵宁明界，复同各营初十仍至派站。十一关警，则十二兼程赴援，十五抵凭祥[2]。后在奏报镇南关大捷时亦称：先是，正月十一日，敝帮办于派站军次，接准西抚部院缄请回军助剿[3]。

王孝祺则于正月初二日（16日）电称：二十九（13日），祺至凭祥，闻谅山失。三十日（14日）亲率七成队至南关，琴帅已退关上。关无粮，琴帅令退守凭祥[4]。

综上所述，王德榜之未援谅山，是因为潘鼎新于廿七日要他乘虚捣船头之故。后又因与潘鼎新失去联系，迟至正月十一日始接到告急函，已是镇南关失守后的事了。至于冯子材、王孝祺二将已率军到关，却被潘鼎新遣回。可知，无论是潘鼎新自己，抑或李秉衡、苏元春等同时人，抑或冯子材、王德榜、王孝祺等当事人，都否认有冯王二军“飞催不至”之事。潘鼎新这样说，即使不是有意“诿过于人”，也是“当事机吃紧之时，或不免有措词过激之处”，并不符合事实。

由于潘鼎新曾企图把败挫责任诿过于冯子材和王德榜，当他们得知此事后，遂起而反击，把败挫原因归咎于潘鼎新的指挥无方，号令屡更。早在李鸿章看到王德榜十二月廿八日（12

① 《中法战争》(2)，第600～601页。
② 《中法战争》(4)，第464页。
③ 《中法战争》(3)，第91页。
④ 《中法战争》(4)，第463页。

日）报告关于潘鼎新调动他的电文时，便从中看到王德榜的话中含意，于正月初一日去电告诫潘鼎新："事急，尤须驾驭联络，务得众心，共出死力，号令不可屡更！"① 既败之后，王德榜就干脆把话挑明："窃思去腊谅山之失，正琴帅举棋不定，征调屡更之时，敝军方疲于奔命之不暇，何能赴谅山见敌即败之援？"②

冯子材也有电历数潘鼎新措置失当之处：去年十二月二十二（6日），谷松鏖战，诸军请遁码，缓日始给，以致子药告竭，败回威坡。二十七（11日），法来犯，尚可战，因琴帅撤龙字等五营回谅，二十八（12日），法再来，军单遂溃；是夜，琴帅退回南关。二十九午，谅失，众怨沸腾，又怨饷缓给。闻琴帅恐关受攻，初五（19日）先退幕府20里，初九又退凭祥20里，复宵遁海村60里。征调已属纷更，退回更滋摇惑③。应该指出，冯子材在这里所说的有许多是传闻失实，断章取义的片面之辞。如潘鼎新廿九日尚在谅山与苏元春商量焚营退守事，何至廿八日即退南关？正月初九日镇南关之战时，潘鼎新督战受伤，又何以初五日先退幕府，初九日又遁海村？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知道清政府不满观音桥之战而对潘鼎新落井下石；或与李鸿章勾心斗角而排挤潘鼎新？抑或偏袒徐延旭而迁怒潘鼎新），两广总督张之洞到任伊始，就似乎对潘鼎新没有好感。他在接到攻讦潘鼎新的告密信后，即于六月二十二日批转唐景崧监视潘鼎新："贵主政在彼年余，见闻较确，上项各情是否属实，请即明查暗访，飞速据实密封函复，以资

① 《中法战争》(4)，第228页。
② 《中法战争》(2)，第600页。
③ 《中法战争》(4)，第464页。

参考。本署部堂必不宣扬，切勿含糊迁就，是为至要。"[①] 在潘鼎新身边布置这样一个密探，说明张之洞的居心叵测，不怀好意。

在对法宣战前敌需人之际，身为顶头上司的张之洞，不是尽力加强桂军的力量，反而亲自出面帮助一些重要将官脱离潘鼎新。如唐景崧本为位微言轻的吏部候补主事，万里请缨来桂后，得到徐延旭的信用，而逐渐得获提拔。徐延旭被逮问后，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惯例，唐景崧曾唯恐在潘鼎新手下不被重用，于三月二十日（4 月 17 日）已萌去意："今者新来督师，必别有一番位置，不如早自卸肩。"[②] 实际上仍希冀得到潘鼎新的留用，故迁延三、四个月而不去，而潘鼎新也再三予以挽留和优遇。但张之洞却于七月初硬插一手，让唐景崧成立景军，脱离广西改行千里赴云南参战，从而使潘鼎新在开战前夕失去一个熟悉边情的助手和二千士兵。九月，张之洞又欲调骁将杨玉科到广东任职，要不是潘鼎新予以拒绝，又会失去一个得力将官。九月十三日（10 月 31 日），张之洞借为援越桂军筹饷之机电奏清政府："潘以瘴兼急而病，洞前闻人颇有议之者，详察其情，实因饷绌，诸事力求撙节所致。此乃边臣苦况，请代奏恳恩速议。"[③] 此电表面上是为潘鼎新说话，实际上是向清政府攻讦潘鼎新。

谅山失事之初，开始张之洞也为潘鼎新说情，致电清政府："谅事甚紧，苏提等军可谓力战，特敌猛耳，不惟非冯、

① 《中法战争》（4），第 438 页。
② 《中法战争》（2），第 132 页。
③ 《中法战争》（6），第 20 页。

王咎，亦非桂军之咎。关外恐难支，为潘帅急，并为大局忧。"[①] 但当他知道潘鼎新电告清政府有人"掣肘万分"时，认为是影射自己，于是态度遂变，于正月十五日（3 月 1 日）致电清政府，一面为自己辩白，一面将战败责任归咎于潘鼎新的指挥无方：谷松急，潘三日十调，屡更改，先远敌，继近扎，中远捣，又回援，奔驰不及。洞竭粤东全省之力以助桂，济饷、济械、济兵，饬听潘调，似无人掣肘。潘因寇炽，惧重谴，惶恐焦急，故如此措词，或可原。朝廷宽大，令戴罪图功，仰见圣明，若责之急则无措。窃谓潘此时宜责己恕人，方能同心持危。若老将寒心，忿兵一逞，后难维持。潘处艰危，洞力望补救，不肯苛责。惟边事重大道远，以后潘奏，求朝廷详察虚实[②]。二月初六日，又电奏请求撤换潘鼎新：潘不善驾驭诸将，才力竭蹶，调度未能裕如，桂军断难再振，则已显然。仰恳朝廷速简知兵大员督办关内广西军务，移潘他处，既维大局，兼可保全潘抚，不然边事日坏，益重潘咎[③]。清政府纳奏，于初八日有旨撤换潘鼎新："关外官军十二月及本年正月间迭次挫失，巡抚潘鼎新身为统帅，虽经亲临前敌并受枪伤，惟未能策励诸军，力图堵御，实属调度无方，潘鼎新著即行革职。"改由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广西巡抚著李秉衡暂行护理[④]，这就把失败责任完全推在潘鼎新身上。

其实，潘鼎新到任以来，在奏调兵将、整顿溃军、更新装备、拔擢苏元春、陈嘉等后起之秀方面是做了不少事情，从而

① 《中法战争》(4)，第 230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327～328 页。
③ 《中法战争》(6)，第 358 页。
④ 《光绪朝东华录》，第 1905 页。

使得原来在徐延旭、黄桂兰等人手下不足一战的援越桂军，提高了战斗力，能在观音桥、船头、纸作社诸役中有所表现，与法军打了一些硬仗，使法军付出死伤近千人的代价，对牵制和打击法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抗法战争的有功之臣。因此，张之洞把潘鼎新说得一无是处是言过其实的。张之洞断言不撤换潘鼎新则桂军断难振作，但镇南关—谅山大捷的事实否定了张之洞的这一说法。由于通讯的落后，清政府撤潘鼎新的朝旨传到他本人手中的时候，已是桂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潘鼎新仍以广西巡抚督办军务的最高统帅身份，参予和组织了这一震动中外的战役。事实证明，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潘鼎新个人的去留。

那么，造成援越桂军在谅山、镇南关溃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法军人数多炮火猛。前面我们说过，进行谅山一役的法军多达两个旅约 8000 人，这是法国在中法战争投入一次战斗中动用的最大数目。只要联想到宣光法军只有 600 人就可以牵制云南万余清军，孤拔只有 1000 海军陆战队，即可搅得中国东南沿海各口惶惶不可终日，就可想象到援越桂军所受的巨大压力了。其次，这 8000 法军装备优良，配备了六个炮兵中队，在作战时采取比较先进的战术，即先以炮兵的轰击粉碎清军的抵抗，再以步兵的包抄冲锋去占领阵地。从两国的军事水平差距来看，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将领包括李鸿章、左宗棠等率领那一支军队在一次战斗中能抗衡这么多法军。因此，广西军队的失败，首先归于客观原因：法军太强大了。

第二是指导全局的清政府在战略上的失误。对法宣战后，

清政府未能正确判断法军的主攻方向，分兵设防，被动挨打。它拒绝了潘鼎新于光绪十年六月底提出的由张树声率领粤军前赴广西作桂军后援及滇、桂两省官军统一由岑毓英节制调遣的建议，特别是坐视云南万余军队被600法军牵制于宣光一隅，而不能有力地驰援广西，广东军队也不能从广安一路牵制敌军，都是一些战略失策。其次是对广西前敌支援不力，特别是一度停止和延缓对广西的协拨饷需，造成了消极后果。由于军费不足，户部还否定了徐延旭将桂军勇丁月饷由二两四钱增为三两的做法，“查与历次销案不符，行令仍遵成章办理”，影响了桂军的战斗力。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8月30日），李秉衡、苏元春曾联衔上奏指出这一点：查桂军饷制，本视他省为轻，使与他军驻非一地，统非一人，犹可无虑相形。即如往年桂军出关悉征土匪，用防营支防饷，勉支犹易。其后虽有客军，而饷出邻省，军自为统，亦尚无辞。追前抚臣潘鼎新随带湘军来粤，续又调募淮勇多营，同一统帅、同一地方，而湘、淮饷厚，始相形见绌，不无烦言。前者观音桥、船头、纸作社等战，桂军尚能奋往。其后拒敌谷松、威坡，兼旬苦战，卒以力弱不支，还屯边隘。每谓效命不后于湘、淮，营章独绌于桂饷，因之益多觖望。[1] 由此可见，谅山、镇南关溃败与此有关。

第三才是潘鼎新的指挥才能问题。

首先，潘鼎新毕竟是从落后的清军中成长的旧式将领，军事素质较低，致使他不能完全适应与法军的作战。他同清政府一样，始终不能正确掌握敌情，不了解敌军人数多寡及选择何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740～741页。

处作主攻方向、敌我强弱对比情况如何。而是根据不准确的情报，盲目猜测，主观判断。从他的多次部署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决策失误，措施不力，以至影响战局的胜负。如八月间以每路5000人的单薄兵力分船头、郎甲两路推进，结果被法军分头迎击，各个击破；接着，又允许王德榜、苏元春两军分路合击船头法军，再次被法军分头迎击，轻易击溃王德榜军；谅山之战前，他于十二月十五日（1月30日）奏报清政府，侈言苏元春军可以抵挡法军进攻："法若径扑谷松、车里，则各军营垒已定，粮械勉力经营，苦战苦守，必能支持。"[1] 二十一日（2月6日）又电称："观音桥、谷松有杨、董、苏等军扼要，地势险、似无虞。"反而担心不是法军主攻方向的王德榜一路，为其匆忙调兵增援[2]。谅山败后，潘鼎新以为法军不会进攻镇南关，因而轻率地拒绝冯子材、王孝祺两军帮助守关的正确建议，以至一错再错，终于不可收拾。

其次，是采取的战术有误，即始终是分兵把口，平均用力，不能及时集中以形成一支有力的打击力量。当时前敌有苏元春18营、杨玉科12营、王德榜10营、马盛治六营、潘鼎新自领六营共约52营约2．5万余人（董履高所部情况不详），加以冯子材、王孝祺两军共26营，将近80营四万人，恰为法军的五倍，占有优势，如果能有效地节制调遣，未始不可与法军争个高下。但潘鼎新却分兵把守五六处，少者二三千，多者亦不足万人，人为地变整体上的优势为局部上的劣势，结果被法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尤其是镇南关一战，由于不了解法

① 《中法战争》(6)，第267页。
② 《中法战争》(4)，第224页。

军已撤出一半兵力去援救宣光，我军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以至战前既不能及时集中兵力对敌，战时又不能坚守待援，反而轻易败撤，放过一次歼敌机会，实为可惜。

再次是不够了解近代战争规律，不能适应近代战争。自从西式大炮问世后，能否正确使用和发挥炮兵的威力，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关键。法军自拿破仑时代起即已熟练掌握步炮配合的战术，注意最大限度地发挥炮兵的作用。在与桂军作战时，法军一般先集中炮兵火力轰击桂军阵地，得手后再继以步兵冲锋。因此，要抗衡法军，桂军就要考虑怎样发挥己方炮兵的力量和避开敌军炮兵的杀伤。在潘鼎新赴任之始，李鸿章就多次提醒他要吸取镇压太平军时的经验，建立和训练炮兵队伍。但是，不知是这些新式大炮没有运到抑或是别的原因，潘鼎新始终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炮营，仅有的少量火炮亦散落各军，不能形成集中有力的打击力量，以至在作战中，被法军的大炮轰击而败。

最后，由于无谓的派系畛域之见，使潘鼎新轻视友军，不能很好地团结诸将及发挥他们的长处。如将勇将杨玉科长期闲置不用；认为王德榜军无后门枪，有取败之道，不能平等相待；对冯子材等粤军更是视为一种负担，从而不能很好地发挥这些友军的作用，自断臂助。不但彭玉麟、张之洞抨击他“不善驾驭诸将”，甚至连一向偏袒他的李鸿章，也在事后告诉潘鼎新的儿子：“苏非大将才，习气尤重，公独嗜之，同人皆为诧怪！”①

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作为清军本身，也存在不少弱

①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4687 页。

点，主要有：

1. 装备窳劣落后。王德榜军无后门枪和新式大炮，前已述及，即以被称为“精锐之师”的苏元春军的装备也远远不能适应近代战争。后来，冯子材军克复谅山，缴获各种炮 30 余尊，炮子近 4000 颗。张之洞接到捷报后，即断为谅山溃败时苏元春军丢弃之物，经询问冯子材。答复称：“所获巨炮、军火虽多，皆不合用，现存谅山法匪炮局内，或有江南两字，或无字，未知系法人所弃，抑系我军所遗，难辨认。”① 装备如此落后，怎能与法军抗衡呢？

2. 机动性差。如苏元春军在谷松、威坡等地拒敌十日，其间，王德榜军一度移近谅山 30 里的牛墟；杨玉科军虽在观音桥，距谅山 150 里，亦不过三日路程，而均不能赴援相救，可见机动性太差，难以协同作战。

综上所述，可知援越桂军的再次败挫，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潘鼎新等将帅个人才干品质的优劣，而应该看成是落后的中国军队对抗先进的法国军队的必然结果。但是，广西边军以自己的沉重牺牲，牵制了侵华法军的主力，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法斗争，对于转移侵华法军的战略重心，挫败法方的勒索巨额赔款的阴谋，贡献很大，因而虽败犹荣，值得肯定，而不能因败挫而全盘否定和抹煞。

四　宣光之战

当援越桂军在东线与侵越法军浴血奋战时，黑旗军和滇军也在西线与宣光法军进行激战。

---

① 《中法战争》(3)，第 97 页。

北宁之役战败后，刘永福率黑旗军先是随桂军溃退至太原。二月二十五日（3月22日），法军追至太原，桂军不战而溃，刘永福遂率黑旗军退回兴化。三月中旬，又随滇军退出兴化。

这次驰援北宁无功而返，给黑旗军带来了不少困难：

首先是人员和枪枝有一定的损失，主要是在退却途中发生兵勇拖枪逃跑事件。二月二十日（3月17日），刘永福禀报徐延旭："伏查此次职员所部各营弁勇多生畏惧，竟夹带十三、十七等响及二籮后膛洋枪、噏枪等逃走甚众。"[①] 四月二十二日（5月16日），岑毓英也奏报清政府："嗣因北宁、太原相继失守，刘团溃退，军火军装失落颇多。"[②] 等回到兴化，出发前的四千余人，已减员到三千七百余人，少了三百余人，将近十分之一。

其次是由于桂军溃败，原来由广西拨给黑旗军的饷需面临断绝来源的危险，黑旗军的军饷供给就更困难了。三月二十日（4月15日），岑毓英奏报清政府："刘永福所部十二营，除由滇按月助银五千两外，其不足之饷，皆仰赖粤省由恩赏银十万两内发给开支。一月以来，道路梗阻，不能请领，军心涣散。"[③] 黑旗军将士有相当时间靠食粥度日。

最后是刘永福与黄守忠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分裂在即。黑旗军随滇军退出兴化后，即一分为二，由刘永福率吴凤典等二千余人驻守文盘州、大滩等地，黄守忠等则带一千六百余人防守河阳、宣光等地，而且刘永福还拒绝分给黄守忠部饷需。闰

① 《中法战争》(2)，第409页。
② 《岑襄勤（毓英）公遗集》。
③ 《岑襄勤（毓英）公遗集》。

五月十三日（7月5日），岑毓英奏报清政府："刘永福人虽骁勇，而智虑短浅，且赋性悭吝，刻薄寡恩，所部颇有怨望。即如黄守忠一股共一千六百余人，原归其部下，自三月以来，即未分给饷银。臣恐其散而为匪，又另发银二千两，借资羁縻。"① 张之洞看到这份奏折后，有电向唐景崧了解事情的内幕，九月二十二日（11月9日），唐景崧复函叙述了刘永福与黄守忠矛盾和分裂经过：

初，刘永福之就抚于越南也，得黄守忠率旅来归，军势益壮，二人遂成患难之交。而黄才不及刘，其心较刘为诚，故甘处其下，为刘之前营，其士卒一千有奇，自取粮饷于越官，军装亦自制。维时永福所部仅左右两营约七八百人，较黄为少。黄虽依刘，已有独树一帜之势。永福倚赖之、牢笼之，守忠无路可归，遂相与安之。而越饷最薄，不足以养所部，永福征保胜税厘，守忠则在宣化之河阳取利于盐，各就所入添补军需。此刘团一军向来之情形也。

去岁，山西不守，越饷遂无，永福月得滇饷五千两，聊足支持。守忠因家资荡散于山西城内，河阳盐利因下游船阻，所入已微，其一军遂皇皇觅食。嗣岑宫保出关，为刘团编立十二营，并黄军在内，以守忠督带四营，乃力辞乞解兵柄，并欲率小队依景崧。左右再三劝慰，且穷诘其所以然，则云该军粮饷向皆取给越官，为数甚薄，即有不足，力能赔垫。今改照滇军营制，其数已巨，又须仰给于刘提督。设提督不能如数以给，而营制昭然，士卒按章索

① 《岑襄勤（毓英）公遗集》。

饷，已又无力赔垫，岂非贻累无穷？景崧知其意而勉留之。

本年，北宁失守，刘团折归兴化，继返保胜，守忠仍率所部分往河阳觅食民间，其情形不问可悉。而永福当是时之不能兼顾守忠，亦限于力之无可如何，盖有不得不分之势。第永福多疑善忌，驾驭殊难，财入彼手，欲其分济守忠，万不能期其痛快。若我另济守忠，彼必又生疑忌，守忠转皇然不安，此今年彦帅弹章之所由来也。在永福隐衷，决不肯舍守忠而令其分，更不愿守忠之别开门面，枭雄器识，固不能以圣贤之道义相绳矣。①

在这封信中，唐景崧知道张之洞不了解情况，因而只向他叙说了刘永福与黄守忠的矛盾的一些表面现象，却隐瞒了这些矛盾所以会不断加剧以至最终酿成分裂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唐景崧的挑拨离间所造成的。黄守忠当初依附刘永福的时候，刘永福的势力还不很大，而且从一开始，黄守忠就保持了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两人同心同德，并肩作战，率领3000黑旗军将士，克服种种困难挫折，力歼黄崇英、安邺、李扬才、李维业，两次打败波滑，在战火中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友谊。如果不是由于唐景崧在山西时对黄守忠的拉拢和挑拨，区区缺饷小事绝不会酿成两人的分裂。

可以说，自北宁溃败后，刘永福遇到十几年来未遇到过的困难，以至差点溃不成军。岑毓英指出："刘永福一军退回保胜后，军无固志，势将溃散。"② 黑旗军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和

① 《中法战争》(2)，第152～154页。

② 《岑襄勤(毓英)公遗集》。

发挥作用，就要看清政府态度如何了。

七月初三日，法舰在马尾偷袭我福州舰队，清军损失惨重。七月初四日（8月24日），两广总督张之洞根据清政府提出的“战越牵敌”策，电奏强调“图越以用刘为实济”。七月初六日（26日），清政府毅然对法宣战。在宣战诏书上，即宣布授予刘永福官职：“刘永福虽抱忠怀，而越南昧于知人，未加拔擢。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收为我用，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①] 清政府用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宣布刘永福和黑旗军的来归，本身就是对刘永福和黑旗军抗法业绩的高度评价和热情表彰。

八月初五日（9月23日），清政府有旨：“刘永福部将黄守忠等打仗奋勇，著岑毓英传知该提督，于具折谢恩时，从优酌保官员，该督代奏候旨。”九月初二日（10月20日），岑毓英代呈上刘永福所开请求奖恤的黑旗军将士名单：

> 都司职衔黄守忠、卢玉珍，守备职衔吴凤典，蓝翎补用千总刘安南，六品军功朱冰清、黄宝珠、邓遇霖、胡昆山、廖发秀、刘肇荣、叶成林、梁有才、吴凤新、苏瑞芳、刘秀均、韦有才、张吉士、黄利贞、刘肇巩、吴世勋、何俊秀、刘开华、练忠和、魏名高、韦高魁、吴蔚文、李德仁；勇目黄俊、黄邦儒、刘成德、陈鸿光、刘肇光、廖凤、刘启元、吴佐桓、文连胜、刘文谦。以上三十七员名，连年打仗，迭有斩获，屡带重伤，颇著勋劳。黄守忠拟请以游击补用，该四员均请赏戴花翎，刘安南并请

---

① 《中法战争》(5)，第518页。

赏加都司衔；军功朱冰清等十四名（按，此处似应为二十四名），拟请以千总补用，并赏戴五品蓝翎；勇目黄邦儒等九名，拟请以把总补用，并赏戴六品蓝翎。

同知职衔刘成良、黄棕盛、刘奇谦，六品衔梁茂林，贡生李唐、黄焕中，生员刘肇谟、刘肇经、刘明光，监生刘肇章、温玉藏，文童刘肇棠、刘成章、刘成业。以上十四员名，或办营务文案，或分带勇营冲锋，久历行间，不避锋镝。刘成良等三员，拟请以通判归部选用，并请赏给五品顶戴花翎。梁茂林等十一名，拟请以府经历、县丞归部选用，并请赏给六品顶戴蓝翎。

武监生杨著恩，哨弁何承文、陆天球、黄荣标、陈英茂、何正辉、邓仕吉、曾朱福、黄云清，以上九名，灭贼自矢，奋不顾身，拟请赏给官职，交部从优议恤，并入祀各该原籍昭忠祠，以慰忠魂。①

接到刘永福的呈折后，九月，清政府先是有旨赏给刘永福军饷银五万两。同月，有旨奖恤刘永福和黑旗军将士：

该提督前在越南带勇剿平各股匪徒，本年复与敌人接仗，迭次获胜。所部弁勇随同该提督转战多年，均属著有劳绩，自应优予鼓励，以昭激劝。所有单开之都司职衔黄守忠，著以游击补用；都司职衔卢玉珍、守备职衔吴凤典，均著以都司补用；千总刘安南著以守备补用；黄守忠、卢玉珍、吴凤典并赏戴花翎，刘安南并赏加都司衔，赏戴花翎；军功朱冰清等，均著以千总补用，并赏给五品顶戴蓝翎；军目黄俊芳等，均著以把总补用，并赏给六品

①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2313～2314页。

顶戴蓝翎；同知刘成良等，均著以通判选用，并赏给五品顶戴花翎；六品衔梁茂林等，均著以府经历、县丞选用，并赏给六品顶戴蓝翎。

其阵亡武监生杨著恩，著照把总例从优议恤；哨弁何承文等，均著照外委阵亡例从优议恤；余着照所议。慈禧太后并著发去内帑银五千两，赏给刘永福所部尤为出力兵勇。[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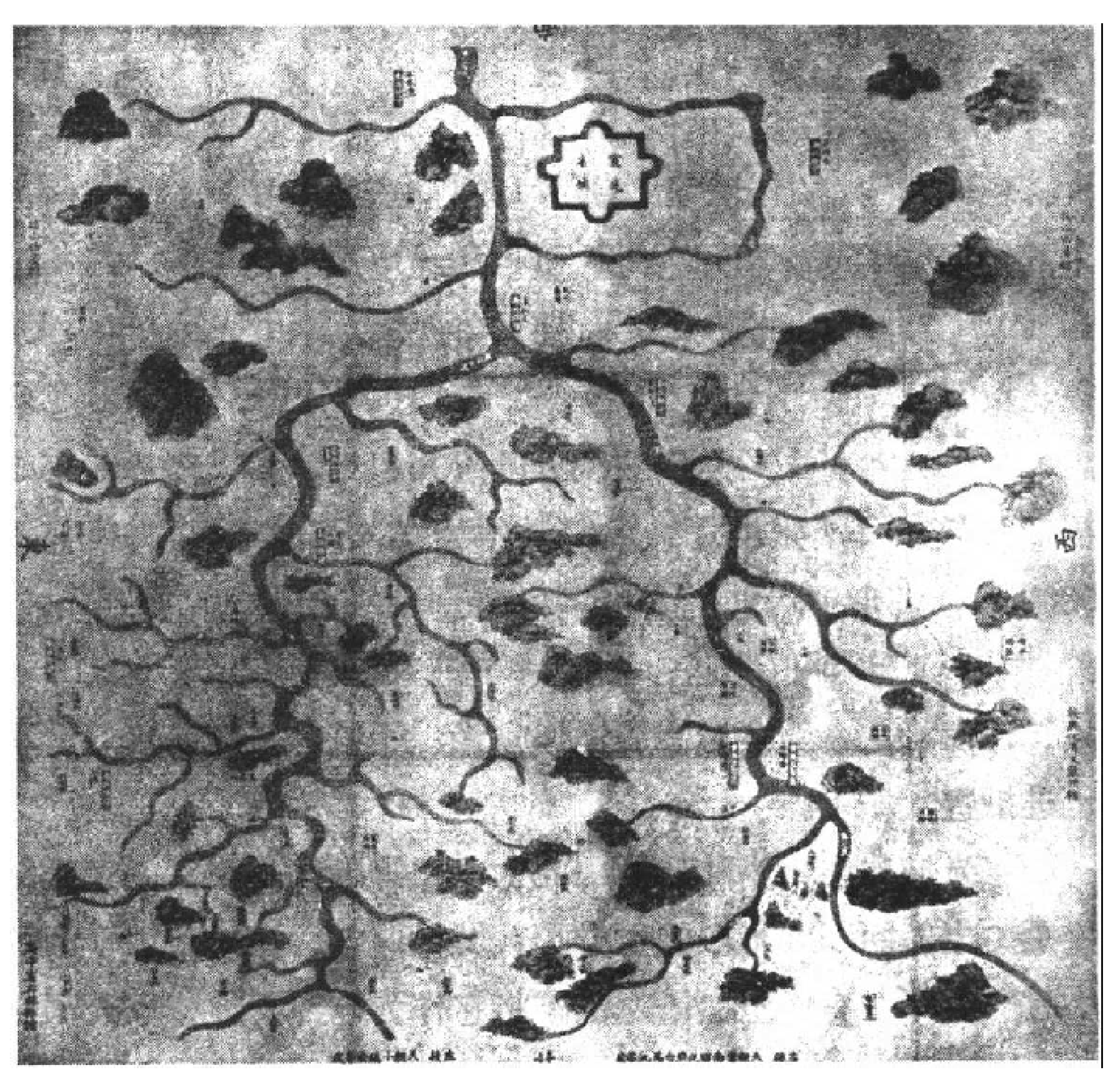
清政府这次奖恤黑旗军大小将弁60员名，已包括黑旗军中的各级将弁。这样，刘永福及黑旗军便被正式纳入抗法清军行列之中。

清政府对法宣战后，迭次指示岑毓英拨给黑旗军饷银军火，务使足用，传知刘永福赶紧督军前进。岑毓英遵旨拨解三个月饷银共15000两并少量后膛枪和逼码给黑旗军。八月初七日（9月25日），岑毓英乘小船下文盘州，途中先后传见刘永福、黄守忠、吴凤典，催令于初十日移营分道前进，由黄守忠、吴凤典各带三营从山路绕赴陆安州，出馆司关之后；刘永福带四营并滇军张世荣、谢有功等五营沿江直下，两路共约6000人，夹击馆司关；滇军覃修纲部则继进接应。驻守馆司关只是一支法国小部队，得悉清军的大队来攻，知道众寡不敌，连夜将炮台营垒焚毁后撤回宣光。于是，跟踪前进的清军也进抵宣光城下。

宣光城建在一座陡峭的山丘上，山脚下便是明江。宣光城堡是一个每面300米长的正方形，城堡前方，在一条已干涸的小河的对岸，有一座宝塔，法军将它作为前沿阵地，安设了一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1831～1832页。

个哨所，用一条炮火不能及的深战壕沟通城堡与哨所的联系。在明江上停泊着法军的舰艇，有战壕沟通江岸和城堡的联系。显然，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阵地。在北宁战败后，黑旗军分出黄守忠部驻守河阳、宣光等地。由于这时黄守忠部因败而愤，加上饷项匮乏，于是在宣光城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情，引起越南官民的反感，个别越奸遂趁机勾结法军来袭取宣光。五月二十日（6月13日），张树声向总理衙门转呈被派往越南侦探军情的外委陈廷威的报告，内称：黄守忠以前者山西之失，因为越人进教者背君父而通寇仇，甘为内应；北宁之失，亦为越人临



清军绘制宣光附近形势图

阵反戈以通法人；三次兴化伏兵，陷困法人，又为彼辈通漏消息，以致大功小就。黄守忠之怀恨在心者，盖已久矣。但屡为刘永福所诫，不能自逞。今者刘永福以自兴化失后，恐法人暗用乡导引至宣光，猝由河阳一路捷径，袭攻保胜，故分黄守忠统兵一路，嘱其自当一面，拒守河阳以护保胜。黄守忠自从分兵之后，即统其全部以人宣光，严厉对待亲法的越南官民，即华人在此为商者，亦遭其残暴，略有余资，即行勒索。刘永福闻知，即命部下营官吴凤典前往劝止，亦不能从，随即回营禀知刘永福，亦无法可施也[1]。这就激化了矛盾，亲法的越南官员对黄守忠极端不满，遂去勾结法军来攻打宣光，赶走黄守忠。越南史书关于此事记称：光绪十年三月，“原刘团领兵黄守忠，率兵二千自兴化退回，人该省城，横执巡抚黄相协安置安平府，尽掠仓储官项册籍载去，通判阮忠会为所射毙，按察使严念经假病，布政使黎文缘潜回河内。至是，法官商派兵船搭坐文缘驶往，入住该城，复催来念仍旧职。”[2] 关于黄守忠在宣光与法兵作战的经过，刘永福曾禀报岑毓英：“探闻法人于四月下旬往攻宣光，经黄守忠击败，生擒法人二名。嗣因法人驶兵轮八艘，直抵宣光城外，黄守忠因城内受敌，恐难抵御，于初八日退扎距城六十里之山竜地方驻守。”[3] 法军司令米乐于1884年6月3日报告法国海军部攻占宣光的经过称：位于明江的宣光城已落入我们手中，我于6月1日下午五时进人城中。该城曾由黑旗军及中国溃散的军队把守，敌人的抵抗力很薄弱，我仍派了两个营五艘炮舰从海陆两面进攻。宣光易

① 《中法战争》(5)，第387～389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二，第13页。
③ 《岑襄勤（毓英）公遗集》。

守难攻，黄守忠却不能作一日守，将兵争重地拱手让敌，这就暴露他拥兵自重及战斗力下降的事实，从而影响了今后的战斗。在占领宣光后，法军留了多少兵驻守呢？这是个在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龙永行先生在他的论文中多次提到："宣光守军有一万名"[①]，但他没有提供这个数字的来源。张树声所呈前述陈廷威的探报中，曾提到法军派出二千余名士兵去宣光剿逐黄守忠，但未续报守宣光者是否即为这2000人。在法人斯特凡·杜穆兰所撰《宣光之战》一文称：守宣光仅是"小分队"，11月19日前往换防的法军"为数仅七百人"[②]，最高指挥官仅为营长。宣光解围后，波里也颁发的嘉奖令称："在一个四面受围的小城里以六百之众与数倍之敌作战。"[③] 这个数字和《请缨日记》所摘引东京新闻纸所称："镇守宣光之法兵六百人"[④] 相一致。从以后的整个作战经过来看，宣光法军对于清军的进攻是守多攻少，可见其人数也极有限。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宣光法军只有六七百人左右。

黑旗军没有大炮，枪械也不好，正如张之洞所说的："刘无精械，洞解济颇多，或桂截，或冯截，或未到。"[⑤] 而协同作战的滇军的武器装备也好不到那里去，岑毓英曾报告清政府：总数逾万的滇军大多使用前膛枪，后膛枪只有二千多杆，大炮则仅有南北洋大臣发来的格林炮和滇省仿造的开花铜炮数十位，皆不能击远[⑥]。何况这些武器还不是全部拨给攻打宣光

---

① 转引自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所《东南亚》，1985年第1期。

② 《中法战争》(5)，第80页。

③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三集。

④ 《中法战争》(2)，第206页。

⑤ 《中法战争》(6)，第375页。

⑥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716页。

的滇军，所以，这两部分军队都不利于攻城。守城的法军军事素质较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主要是坚守待援，只在条件有利时才偶尔出击。清军无奈，只得在宣光城外添扎营垒，四面围困，主要的是围点打援。但这样一来，入越滇军的主力就被几百法军牵制在宣光，无法与桂军会合与法军主力作战，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严重的失策。

关于黑旗军和滇军在到达宣光之初与法军援兵作战的情况，刘永福曾有过四次报告：从八月下旬至十月初二日（11月1日），共作战十次。前三次的战况不详，只说："法援兵至，三次来战，连获小胜，官军只阵亡哨长一名，勇丁三十余名。"[①] 时间约在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之间。

九月中下旬作战五次：十七日（11月4日），敌人从陆上来援宣光，遭到黑旗军和滇军的伏击，截杀及落水淹毙者不计其数外，生擒法兵两名，解请讯办。十八日（5日），法军从水上来援，黑旗军和滇军拦阻不及，被对方冲入宣光助守[②]。二十一日（8日），法军又从水路来，遭到黑旗军和滇军伏击，砍获首级六颗，夺获木船三只。二十三日（10日），又擒敌四名，获船四只。二十五日（12日），黑旗军和滇军再次伏击从水路来援的法军，获船七只，杀毙生擒法匪1名，教匪11名外，还割取首级22颗，耳记十副。事后岑毓英赏给黑旗军银1000两。官军在此役中阵亡18人，带伤63人[③]。在这五次战斗中，关于杀伤法军的数目，除去用淹毙、杀毙等颇多虚词外，真正能生擒、斩首级、割取耳记者仅60人次，而清军的

① 《中法战争》(6)，第174～175页。
② 《中法战争》(6)，第80页。
③ 《中法战争》(6)，第129页。

伤亡亦相当，可见战果不算很大。

十月初一（18 日）、二日（19 日），黑旗军出动了黄守忠、吴凤典两部六营二千余人，加上滇军五营约二千五百人，与从水路来援宣光的法军作战两次，刘永福报告称："十月初一日，有法夷、教匪二千余人，驶大兵轮五艘，拖带东京船十数只，装粮米军火，由下游运来。游击张世荣暨参将谢有功、陆海涵，都司杨春标协同都司吴凤典、千总朱冰清等，挑带奋勇于河边左域一带埋伏，游击黄守忠带队伏于对河之同章地方。贼船上驶，官军两岸夹击，毙贼多名。匪等枪炮对击，自辰至酉，不能冲过，遂退下十数里湾泊。至初二日辰刻，敌轮复冲到左域附近，连放开花炮数十炮，即有法夷带黑鬼数百蜂拥登岸，官军于地营内施放枪炮，击倒百余人。正相持间，忽有法夷雇来广东匪党数百，带领黑鬼约共千余，由陆路抄至官军后面，各将弁分途迎敌，毙贼四五十人，阵亡哨弁侬正英并兵勇二十余名，刘永福部下得力营官千总朱冰清足亦带枪伤，军势稍却；匪等遂乘势并归轮船，冲到城边，人城助守。"[①]

在法方的著述里，也提到了这两天的战斗，但在法军的出兵和伤亡人数等方面，与刘永福的上述报告有很大的不同。法人加尔新所撰《在侵略东京时期》一文，称法方在这两次战斗中仅出动"三艘强大的炮舰，六百名步兵"，而登陆夹击黑旗军和滇军的仅为法军两个中队，伤亡人数也只有 33 名[②]。波里也向法国海军部报告此役法军的伤亡人数：我方有 8 人死亡，伤员 25 人[③]。这些资料来源不同，但记载相同，有一定

① 《中法战争》(6)，第 149 页。

② 《中法战争》(3)，第 514～520 页。

③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1957。

的参考价值。

黑旗军和滇军以超过4000之众，设伏阻击为数仅止六百余的法军援兵，既不能给敌兵以重大的杀伤，也不能阻止法军入援宣光，因此，在《请缨日记》中，唐景崧干脆称黑旗军和滇军是打了败仗："初二日，法轮驶来五艘，云军安边五营与黄守忠、吴凤典截战于下游，自卯至午，抵敌不住，却避于山，营官朱冰清受伤。""因闻初二日，云军、刘军俱在下游失利。"

为什么黑旗军和滇军在十月初二日的作战会失利呢？除了枪械不精、斗志衰退等原因外，也与刘永福和黄守忠的矛盾不断加深有关。据唐景崧记称：十月初二日的战败，刘永福主要归咎于黄守忠的作战不力，以至差点要把黄守忠抓起来：十月十七日（12月4日），"张盛高等偕守忠往见渊亭，渊亭席上责守忠初二日之战不力，守忠负气出，渊亭喝亲兵捉之，经张盛高等劝止；守忠回营，愤欲卸甲。余函责之，兼函劝渊亭。今接守忠书，悔罪语切，尚可嘉也"[①]。

十月初，唐景崧奉张之洞之命，率领景军四营从广西来到，协助黑旗军、滇军攻打宣光。中旬，唐景崧派600人赴中门总，协助黄守忠部防守。十一月初五日（21日），宣光法军出动偷袭驻守在同安总的吴凤典部。吴凤典刚刚率军来此驻扎，阵地尚未巩固，形势十分危急。刘永福闻讯，赶忙从连山总率兵来救。唐景崧部下营官谈敬德闻警，也率百余人往援，并约邻近的黄守忠同去，但遭到黄守忠的拒绝，"押令黄守忠

① 《中法战争》(2)，第156～157页。

哨官带队同行，时守忠扎我军侧，恐敌来攻，不敢离营”[①]。在刘永福、吴凤典、谈敬德的协同作战下，法军被击退了。事后，刘永福向岑毓英禀称：“初五日卯刻，大雾弥漫，贼忽大股出城，直扑刘永福部将吴凤典营盘。永福与吴凤典督队由中路迎敌，五品卿衔主事唐景崧同部将谈敬德等，约会黄守忠带队攻其左，张世荣及参将谢有功、陆海涵等带滇军攻其右，三面夹攻，自辰至未，枪炮毙贼甚众。贼以开花炮、格林炮一面拒敌，一面拖尸而走。官军乘胜追逐，直抵城边，始行收队。查点各军，共阵亡二十三名，带伤七十名。”[②] 波里也则向法国海军部报告此役法军的伤亡情况称：宣光的守卫部队于12月21日出击，华军弃尸三百具，我军负重伤七人，轻伤一人[③]。两相比较，还是清军吃亏大些。事后，清政府于十一月十五日奉慈禧太后懿旨：著发去内帑银5000两，赏给此次尤为出力兵勇。岑毓英将这笔赏银分赏给唐景崧各营2000两，刘永福各营1500两，滇军各营1500两。

十一月初九日（25日），滇军记名总兵丁槐率3000滇军赶到宣光城外。十八日（1885年1月3日），唐景崧与丁槐往会刘永福商议军事。当时，岑毓英主张三支军队同扎左育截河打援，不必费力攻城。但因唐景崧和丁槐皆与刘永福有矛盾（当初黑旗军从山西退扎兴化时，曾与丁槐所率滇军共扎，从而产生了矛盾），感到难以共事，唐景崧遂上书岑毓英，提出三军不能共扎左育的六条理由：

景崧与丁镇，初并不愿刘提督独往截河，专任其难

① 《中法战争》(2)，第160页。

② 《中法战争》(2)，第217页。

③ 法国海军部档案BB—4，1957。

也。曾约其合力同逼宣城；而刘提督谓奉有明谕，派伊堵河，以崧与丁镇攻城，理应遵办。数日后，刘提督忽然变计，乃有三军并扎左育之谋。而崧体察情形，再四筹划，不可有六。

初谓丁与刘尚可调停也。继察刘之于丁，怨毒若不可解，逼处则祸立生。丁镇纵能含容，而部卒岂尽能忍让；一朝激斗，必有伤折，宫保何以处之？其不可一也。刘军人心不固，迥异曩时，一溃则各军胆寒，相率而败，无可救药，其不可二也。功不可争，而过不可诿。十月初二日小挫，滇将、刘将彼此交推，罚既难施，而不和之机愈甚，其不可三也。堵河无炮，无论铁轮上驶矣，即民船亦非手枪所能击毁。堵河之说，有名无实，其不可四也。助人者必先自立于不败之地，崧部与丁军粮道皆在三江口，距敌巢近而距左育转远。不顾根本，致败可虞，其不可五也。若分军半扎中门，半扎左育，接递粮饷药弹，而首尾隔五十里，敌巢居我首尾之中，恐被阻遏。且兵分则两处皆单，其不可六也。崧军尚可依刘，曾与之商，如景军往扎左育，后路粮难，彼能调动越民，倘肯代雇夫役，或代办糗粮即可合扎，据复不能。崧求之且不能，何论于丁？崧不可往，丁更何术可往？崧与刘交深而与丁交浅，夫岂有左右之见存，而公道在人，不得论交情之厚薄。窃以为宫保此际，惟责令崧与丁镇誓取宣光，不必问其为堵为攻，自力筹所以取之之法。若虑刘军独处兵单，不如令其稳扎连山，遥为犄角，置彼于不败之地，尤为稳著。[1]

---

① 《中法战争》(2)，第162～163页。

岑毓英为唐景崧说动，改变了主意，于十一月二十日（5日）奏称：由丁槐和唐景崧两军扎营攻城，刘永福率黑旗军堵河截援。后来，由于刘永福禀称：所部人少，恐难堵截。岑毓英又于二十八日（13日）派记名提督何秀林统带3600人，前往协助刘永福堵河截援。但何秀林率军到达宣光后，见滇军和景军攻城吃紧，遂移军助战，仍由黑旗军独任堵河。这样兵分力单，就酿成日后攻城不克、堵河不住的失败结局。

黑旗军于十二月初六日（21日）移营往扎左育，担负堵河任务。开始，由于法军正集中全力在东线作战，意图再次击退援越桂军，因而无暇顾及宣光守军，更不能派出多少援军，所以，黑旗军只进行了一些小战斗：如十二月初十日（25日），刘永福报告：夺获法军小船一只，竹舟五只，杀贼十余人。十一日（26日），刘永福率黄守忠沿河堵截援贼，获竹舟二，板船一。

与此同时，担负攻城任务的滇军和景军，在缺乏攻城利器大炮的不利情况下，仍积极设法攻城。十二月初八日（23日），唐景崧与丁槐商议，由丁槐部主攻宣光南门，景军则攻东门以牵制法军。

十一日，清军如约攻城。唐景崧记载战况称：

景军管带谈敬德，字克昌，湖南沅江县人，年甫三十，由军功擢参将衔游击，英挺好胜。临战前，唐景崧传诸将密授方略。因谈敬德表示愿首扑东门，戒之曰："东门三歧埔地狭近城，又紧邻大河，不易进兵，汝进勿猛；伏队半里外，俟丁军起击南寨，敌必启东门往援，大队过尽，汝始尾击；已命谢莅国夜渡河立山巅，瞰敌出，即麾旗，汝不见旗，不可进也。"座上睨克昌，视其神若不在

舍。退语吴鼎卿曰："此子太锐，恐终不利。虽然，猛将不当前敌，何爱之为。"克昌退，自秣马于军壁下，呼其哨官文蔚林曰："来，吾语汝。明日战必恶，吾当效命报统领。不幸死，汝乡人也，其负吾骨归。吾无妻子，死不足忧。"饮酒至五鼓，率亲兵五人策马先行。抵东城下，后队未至。时丁军袭南寨，乘敌不觉入据之，纵火；敌开东门往救。谈敬德见南门火，曰："丁军得手矣！"鸣角骤进。时敌正齐队，犹未出城，睹我军有夺城势，恐我军遂薄其城也，乃不救南门，启门以大队专击谈敬德军，城上、山巅、城外船中，枪炮齐举，猛不可当。我军三面受敌，王宝华继至，与敬德伏岸力战。战三刻，谈敬德腿中弹，坐地。前营王定奄曰："汝退，吾兼押汝队接战。"敬德曰："统领亲督阵，何敢退！汝其力战！"王定庵挥刀奋进，弹穿腿过，再扑又伤，痛不可支，亲兵曳回。而敬德旋被炸弹轰裂胯下，殁于阵。正酣斗间，余与文案吴鼎卿至前营。甫下马，左营哨官丘启标报管带卢贵攻炮台中枪腿折扛回，续报王宝华伤扛回，血如注，臂腿两伤。宝华呼曰："谈管带亦伤矣！"当是时，枪炮震天，我军不退，敌亦未却，死亡相当。旋报敬德阵亡。丁统领遣弁驰请我军切不可退，因已得南寨，立掘地营，恐军撤则敌必救南门，丁军门据寨不住。而我军四将已亡一人，重伤二人，后营张金泰在炮台后为敌枪截击不能撤，东门两营无主将，哨官邹全鸿、刘清泰亦受伤扶回。乃躬自督战三时许，天将雨，将士饥乏，稍退三百步，坐林下小憩。时敌犹未入城，不敢骤撤，恐其突前扑我营垒也。法兵、教民、客匪见我军四面围攻，有仓皇乘竹舟遁者，多为我军

击沉。未刻，敌入城，城仍不闭，我军即列队林下，由营送饭，不敢收队。余回右营，痛哭敬德，亲视含殓。是日我军阵亡百余人，敌亦大挫夺气。据说，是日毙法酋五画一名，四画二名，歼虏五百人。

以后的两天，清军继续攻城，但战果不大。于是丁槐建议用“滚草法”攻夺城外炮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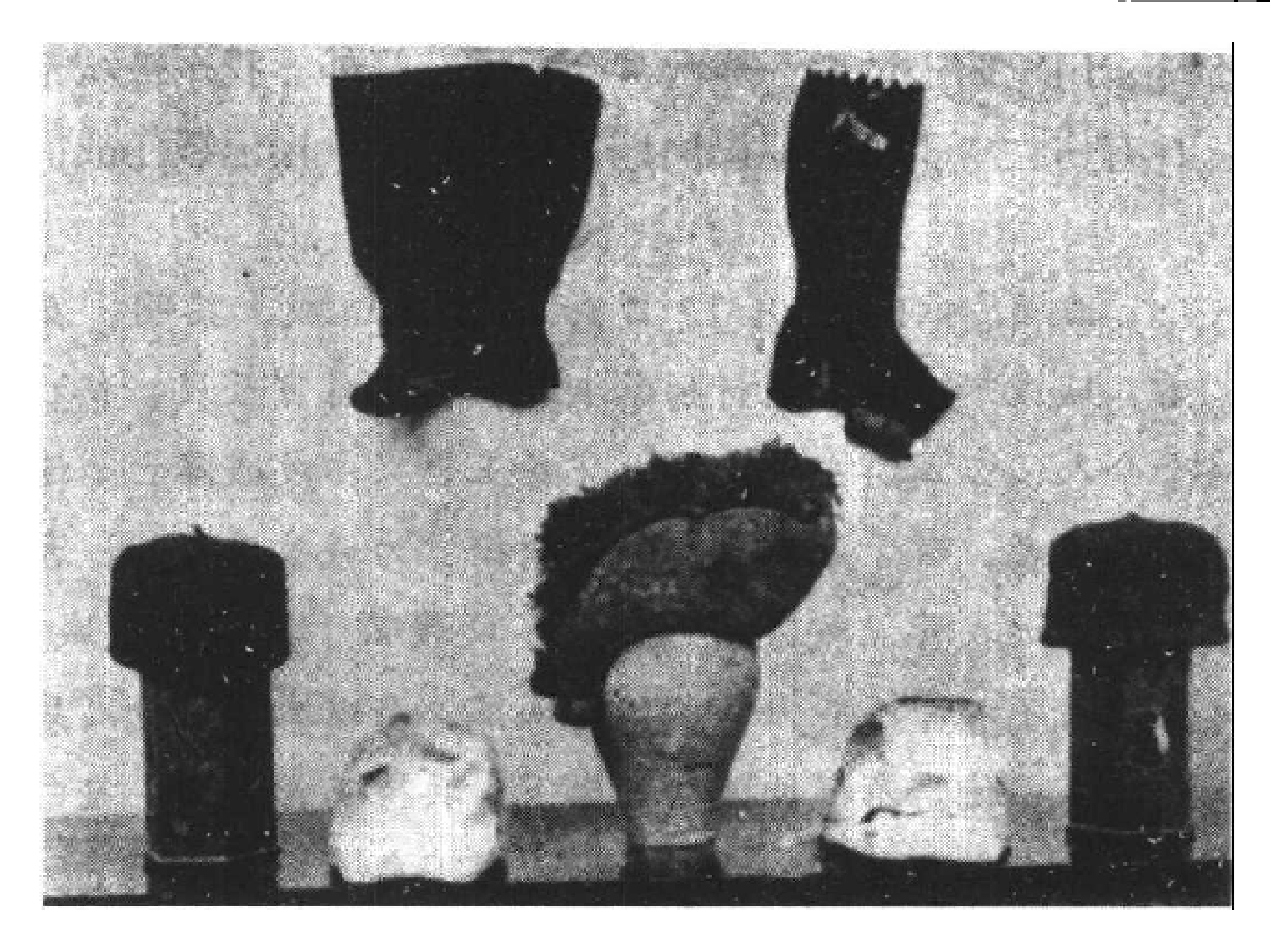
办法是度离炮台数百丈，潜挖土为垛，可蔽数人，即伏垛下开壕。掘壕渐长，容人递多，人行壕中，可避枪炮。乃缚草把长三尺，计数万束，滚掷而进。草把墙立，人不受枪，草压炮台，即可立破，滇人谓之“滚草龙”。于是丁、何两军任挖壕，景军任缚草。三鼓，唐与吴鼎卿单骑走西城下，往会丁统领，噤声坐地，离炮台二百丈，督队开壕送草。五鼓，壕成，长二百丈，我军负草壕行，敌悄无声。天明回营，调队备攻。第二天，继续滚草，日夕不绝。十五日辰刻，积草离炮台数丈，将及矣。余伏兵东门，防虏出援，又伏兵炮台侧。午刻，台内法兵骤出，飞奔东门，城上枪炮齐下；丁军哨官都司何天发搴旗抢登台上，中炮，血肉腾空。两军追击逸虏，枯草为红。有自东门乘小舟遁者，均为我军击沉。生擒法人、西贡鬼、教匪、客匪二百余人，释去教民数十人，令数人入城招降，散其党羽，余二百人缚跪诛之，祭我死士。城外敌垒至是一律荡平。

以后，清军逼近宣光城南西北三面而垒，仅东门一面临河，未能合围，但河为黑旗军扼阻，舟楫不通。法人用玻璃瓶子藏求救洋文，上插小旗，写“拾送端雄法国大营者赏二十元”。付水流下，为防河刘军拾得。此后，滇军、粤军均据城

外土岭，用枪俯击城中，毙敌甚众，瘗东门外。我军被城枪还击，日有伤亡。丁军又建议用地雷轰城，唐景崧记载作战情形称：

二十八日（2月12日），云军地道成，黎明，发一雷，城未动。景军用竹梯草捆攻北城，自寅至辰，伤亡三十余人，云军游击何天祥，守备王世兴亦攻城阵亡。连日寒雨苦甚，敌于城市土岭掘窟树栅，为城破死拒计；客匪调离不近我营，防勾结也。我军攻城必于黑夜往伏城下，天明攻不入即不能撤回，仍伏城根，而以城外据岭之兵然枪击堞，使虏不得凭堞俯击城下，兵待夜始撤回。盖白昼虏能见我大队开行，则山巅枪炮齐下矣。战士伏城下，送饭尝被击，每以布裹饭掷而前。后因粮少食粥，不能掷，辄饿竟日。二十九日（13日），丁军又发地雷，城崩数丈，虏死拒。丁军遂跨缺口掘地据之。我军攻北城，颇损士卒。丁军发地雷在西南，每约我军于雷发时攻其北城以制敌救缺口，惟发雷须待天明方窥见缺口所在，以便扑攻。我军竹梯、草捆攻城，利在黑夜，使敌莫测。故待雷发始肉搏奋攻，伤亡辄众。

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八日（22日），辰刻，丁军又轰地雷，城崩丈许，法兵奔救。景军据岭上然枪截击，倒毙无数。丁军再发一雷，去初轰之地不远，城再崩，砖石乱飞，压毙法虏十余人。景军先于五鼓积草北城下，至是众军践草而上，法兵拼死力拒，枪炮齐发，杀声震山。余与丁统领押队督攻，誓不准退，而伤卒纷纷曳下，惨不可言，不得已撤兵。此次系右营哨官赖朝荣、邹全鸿自请奋攻，不克，摘去顶戴。谅山既失，又闻敌援将至，急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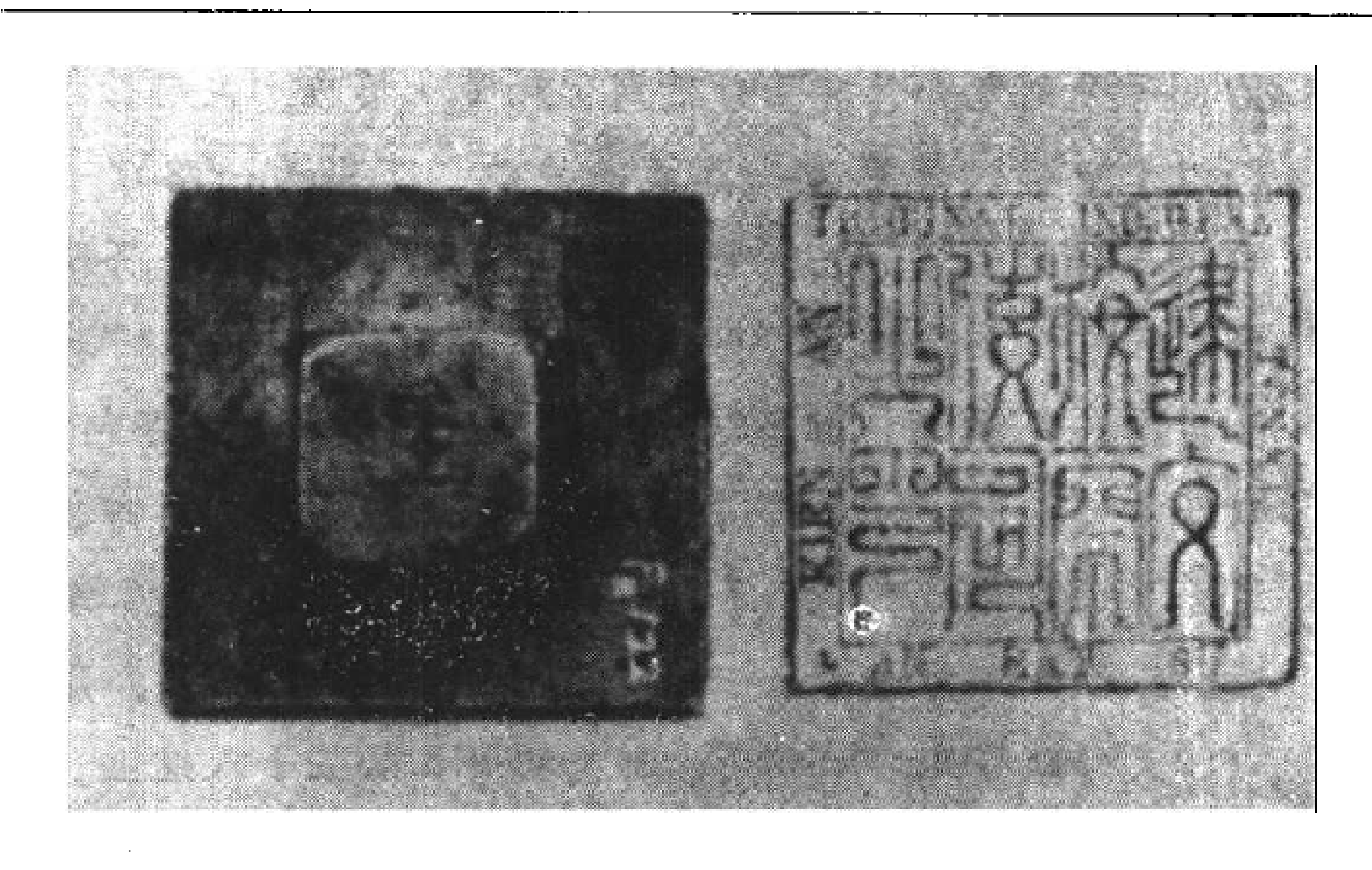
为光绪十年冬，宣光之战清军所掳获者

拔，以致损我多士；归坐帐中，叹息不已。本日已令赖朝荣、邹全鸿在城之西北角土阜扎一小垒，距城二丈，赏银四百两。垒在阜背，掘堑伏兵以避敌枪，准备我军进攻缺口，即据阜巅用枪截击奔救之敌兵，盖此时与敌虽隔一城，竟可交枪而战。彦帅派弁运到大开花炮二尊，轰毁洋楼数座，赏云军四千两，景军二千两犒师。

正月初九日（23日），赖朝荣、邹全鸿皆福建人，二人皆好大言，又性暴，是时军中猛锐无逾二将者。被谴愧奋，相约往观雷轰之缺口，请挑队奋攻。余乃约丁统领行地道中，往窥缺口，商进兵之路。每于濠浅处，必鞠躬以行，昂首即受枪；然地道中亦有中弹者，听命而已。赖、邹就本哨拣得头等先锋三十人，二等先锋五十人，署状，首夺缺口得城，头等一人赏三百两，二等一人赏二百两，预给印票，各先赏番银一元，刑牲煮酒，燃炮祭旗，又派

右营管带刘九如、前营帮带刘仁柏带队接应，左后营攻北门以掣敌势。景军为一路攻一缺口，丁军为一路攻一缺口。三鼓，余与丁统领坐所夺南门炮台下，四鼓，齐队传令，五鼓，乘暗进攻。而头等勇丁请于赖、邹曰："我等死勇愿一见统领，且各乞十金。"余笑问打仗携银何为？众叩首曰："先登必凶，愿一见白镪而死。"奖慰再四，立遣差官回坐营，飞取三百金。往旋十里，适遇野兽，绕道行，银至而东方渐白，三十人裹银负枪，骤驰去，奔缺口，大呼跃登城。赖朝荣、邹全鸿督二队五十人继上。敌枪已密，不能冲进，大队更不能前。先是，丁军约我军齐伏城下，发号一鼓并进。而我头队不及待发号，猛枪登城，死二十四人，生还六人，邹全鸿两伤。余闻信，神魂沮丧。问尸何在，众曰：不见尸，当死城中矣。

初十日（24 日）辰刻，龙州飞报，法兵已及艽封窥牧马，我军后路将断。彦帅函令相机撤师，勿拼孤注。适奉廷旨，严饬攻拔，且不肯功弃垂成。于是函约丁、何，本夕再攻，传令奋勇者报名，勇丁敢带队押队者给军功牌。差官伍义廷愿带队，亲兵什长姚纪昌、覃启发愿押队，尚少一人带队，乃再派赖朝荣选得头队先锋五十人，二队先锋一百五十人，大队五百人在后接应，赏格如前，仍各先赏酒肉银一元。带队押队官八元，列队营门，面加奖励。语队长曰："不得城，勿见我！"赖朝荣本不欲往，众激之行，知必死，托子于我。约定，我军攻一缺口，何军发地雷亦任攻一缺口。俟雷发，三路齐进。我军分攻西北门，部署毕，余至丁统领营，仍与坐炮楼下。云楼四鼓至，各军齐队。五鼓，地雷发声殷殷，而城未动。三路兵



云南省博物馆藏，皆光绪十年冬，宣光之战，清军所掳获者。图系铜印一颗，中央篆文为“建安按察使司之印”，四周为法文：上端“Tribunal Indigene”，为“土著地方法庭”之意，即按察使司之意译。下端“An Sat Su”为按察司之音译，左端“Kien An”为“建安”音译，右端“Ton Kin”为东京音译。按察使司为掌理刑名机并。建安在海防之南，为东京区之一省。越南官司印信而附法文，可知其为傀儡政权之物。

奔缺口，城中枪炮齐鸣。余与衡三、云楼督队于炮台下。法虏死拒缺口，我军再进再却，有已登城而坠陨者，有喋血于城下者，后队人密，城枪乱下，被伤尤众，赖朝荣、伍义廷、姚纪昌俱阵亡，覃启发受伤，丁、何两军亦多伤亡。队长四人，亡三伤一，勇丁更不计数。顿足痛憾，洒泪归营。

十二日（26日），挑队再攻，参将邓有忠、什长汪鼎臣带队，什长覃启发、赵全红押队。置酒营门，延之上坐，勉以此次志在必克，以李文忠、刘仁柏、刘玉贵带领大队在后接应。丁、何新得赏项，所挑奋勇俱畀现银，朱额为志，退后者斩。余三鼓至丁营，何军再发地雷，四鼓

齐队，地雷发，城微崩，飞石毙我军数人。赵全红腰伤，仍分三路扑攻缺口，城枪络绎，忽远忽近。我军兼攻北门，呼声震天，丁军后队以为得手，亟呼守营军齐进，而头队在前，力攻不入。战至十三日（27 日）卯刻，不得不退。大队拥挤地道中，余令箭不得前。邓有忠、刘玉贵、汪鼎臣、覃启发均已伤，不敢退。立久，伤人愈多，邓、覃伤尤重，辰刻始撤下。①

滇军、景军虽然杀敌心切，但运用的战术落后，以至连攻宣光多日，最后以损兵折将，毫无所得收场，不能不令人感叹！

与此同时，担负截击法军援兵的刘永福，于正月十六（3 月 2 日）、十七（3 日）两日率黑旗军在左育与来援法军展开激战。关于这两天的战斗，在《历史草》里有着详细的叙述：

刘永福拾获宣光守敌向外飘送的求救信后，知道不久将有大队法兵来援，即想设计胜他。四处踏看地势，见该处一边大山下，沿河水一边，有大茅坡，横直数里，茅草丛生，为入宣光必经之路，刘永福想起一个用火攻之法，埋药炸其全军。于是派人向岑毓英领来两万斤炸药，装箱埋伏。探报法兵五千人马飞赶，前敌已到。刘永福即下令出仗，只见法兵排山倒海而来，势甚猛烈。刘永福即派数百人，在先锋前寨引击。看看法兵已到寨前，大攻一阵，佯为输仗败走。法兵那时正欢天喜地，以为得胜，数千人马一拥而进，皆站立于埋药之间，两军互相攻击，忽然一声轰天大响，火药飞爆，势如崩山陷地。炸毙法兵二三千人；又被火箭击射，死者数百。尚余数百残兵，皆是焦头

① 《中法战争》(2)，第 171～176 页。

烂额，无一完全肌肤手足之人，其伤甚重，皆是爬鞠而行，或不能行，尽被刘永福人马追出斩之。是役也，大获胜捷，夺获军械无算，刘永福自千百战斗以来，未有如此之大胜捷也。

河内法国全权大臣，探得大队人马已全被黑旗军炸灭，吓到魂不附体。然怒气到极，登时即调派第二队人马五千，火速前往攻击。黑旗军因子弹不足而败退。[①]

刘永福则对邓承修称：

永福知法援将至，密装火筒药数百管，埋在左育大茅山，引法军交锋，战且退，俟法军入，一炬发药，火燃不可收，毙三千人。[②]

上述记载有几处讹误。

1. 所说左育之役法军共派万人来攻可能夸大。1885 年 2 月 19 日，波里也向法国海军殖民部报告准备派赴解救宣光之围的法军人数："宣光渐渐被围，18 日，配备一组四门膛线山炮的八百人兵力，作为首批援军被派往河内。我令第一旅（三千五百人，二组八十毫米的山炮）强行军，以便能在 22 日于红河登船，而不在河内停留，以消灭云南之敌。"[③]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唐景崧电告张之洞："援虏三千已到左育厩。"[④] 徐善福所撰《刘永福援越抗法的光辉历程》一文也称："3 月 3 日，约翰尼奈利将军率兵三千前来解围。"[⑤] 据此，可

① 《中法战争》(1)，第 279～280 页。

② 肖德浩、吴国强编：《邓承恩勘界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4 页。

③ 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1966。

④ 《中法战争》(4)，第 466 页。

⑤ 《中法战争论文集》第一集。

知进攻左育的法军仅三四千人，而非一万人。

2. 黑旗军消灭的法军人数也没有5000那么多。波里也向法国海军殖民部报告此役法军的损失为："我方约有361人丧失战斗力"[①]。二月十五日（3月31日），张之洞向清政府转呈河内西人所传的一个消息："左育之战，法营自报死法兵士四百六十七名，官二十五，黑兵、越匪不在内，河内医伤院不能容，谓自东京开仗以来，罕有如此次救宣一战之难。"[②] 徐善福则根据法方资料写道："此仗法军死七十六人，其中有二十一名军官，伤三百八十七人。"[③] 综上所述，可见左育一战，黑旗军毙伤法军人数最多也不到500人，只是《历史草》所说数目的十分之一。

3. 左育之役并非黑旗军千百战斗以来从未有的胜捷，而是黑旗军战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败挫。正月二十五日（3月11日），岑毓英向清政府奏称：

> 闻知法军援兵将犯左育，岑毓英屡嘱刘永福安雷，并饬何秀林拨所部一千人交马维祺率往助战。十六日早，贼在端雄分为两股，一股攻左育先锋营，一股攻对河同章先锋营；每股约计三四千人。刘永福连战屡却，即发地雷，毙贼甚多，乘势掩杀，贼败退，斩首百数十级，生擒真法人一名。黄守忠守对河同章，不遵调度，不安地雷，被贼攻破。贼据对河高山，用开花炮、格林炮连环横击，刘团不耐苦，所扎地营不能如滇军坚固，伤亡千人，日暮遂溃。何秀林所派马维祺、李章等一千人扎守地营，贼不能

① 法国海军部档案BB—4，1966。

② 《中法战争》(6)，第375页。

③ 《中法战争论文集》第一集。

破。十七日天明，何秀林仍饬刘团回扎旧垒，至午，贼来又溃。[①]

《请缨日记》关于此役记称：

忽报法兵大队援宣光，犯左育，已与刘军接仗。刘军地雷轰毙百余人，枪毙百余人，敌犹未退。旋报刘军已溃，渊亭走浪泊，探闻法兵冲破吴凤典、李唐营，黄守忠扎对岸，与法兵大队所隔，不能抄救，左育已失。[②]

1885年3月29日的《申报》报道此战说：

西历三月初二日，法人瞥见黑旗驻于一处，离宣光约六英里，该处河道有山阻隔，炮船不能飞渡。陆军炮兵亦难前进，且筑有小炮台八座，皆有坑可通者，前有竹栅以护之，黑旗之人皆在坑中。法兵屯扎一处与之接战，连战四阵，皆为黑旗击退。至第五阵，法兵奋力而入，惟山谷险阻，不辨东西，及深入时，又见炮台，一行黑旗伏兵暗坑中，将刀石药包等物乱掷于法兵之前，法兵死伤无算。是日下午始攻第二座炮台，至夜间，华官率众欲围法兵，随被法兵击退。据法军所报，驰赴救援之军，死者四百六十七人，内有员弁十五名，所募之越军，其死伤不在数内。查法人自东京开战以来，其死伤兵数以宣光之役为最。

黑旗军为何会遭到如此败挫呢？刘永福主要归咎于黄守忠的作战不力。正月十八日（4日），他致函唐景崧：“恕守忠包抄不力，坐视不救，禀请彦帅参劾。”[③] 岑毓英据此于正月二

① 《中法战争》(6)，第333页。
② 《中法战争》(2)，第178～179页。
③ 《中法战争》(2)，第178～179页。

十五日奏报清政府："臣惟攻城以断贼援为要著，而记名提督刘永福以此自任；今因其部将黄守忠首先失营，遂致全局震动。查刘永福力战一日，杀贼颇多，并杀获五画、一画法酋各一名，解验衣帽，功过尚足相抵。惟花翎补用游击黄守忠，事前不遵调度，安置地雷，临阵首先失营败走，不顾统带，相应请旨即行革职，由臣详细讯质。"①

刘永福是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下组织左育之战的：当时来攻的法军约有 4000 人，装备着新式洋枪洋炮；而刘永福直接指挥下的黑旗军仅只 2000 人，枪炮弹药都严重不足。在这种明显的劣势之下，仍使来犯的法军遭到近 500 人的重大伤亡，从而创下了黑旗军抗法业绩中最辉煌的一页，打出了黑旗军的军威，打得法国侵略者丧魂失魄。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8 月 9 日），张之洞向清政府奏称："该提督近年部众稍离，由于越乱商阻，税失饷缺。今正左育之挫，由于我之重兵俱在宣光，不能分兵往援，该军血战两日，遂不能支。然其勇猛威名，久播四裔。本年三月委员到越，与法酋勃里也及大小兵官言及，畏忌之情，形诸词色。亲见法兵船上所悬画图，皆绘刘永福历次击败法兵战状，粤省及外埠各国洋人，谈及该提督，无不敬服称赞。"②

清军虽然在宣光一役中没有取胜，但毕竟和法军作了决死战斗。因而，构成了抗法战争惨烈的一幕，是中法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大概由于援越桂军取得镇南关大捷的缘故，法军从西线后撤，岑毓英于二月间曾向清政府报告：滇军于正

① 《中法战争》(6)，第 334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524 页。

月二十三日（3月9日），收复缅旺府和清山、清水两县，二月二十日（4月5日）收复广威府，二十三（8日）、四（9日）等日收复不拔县，并在临洮等地大败法军。战后，清政府给在宣光等地作战出力的将士加官晋爵，于光绪十一年五月十五日（6月27日）有旨：

岑毓英调度有方，著加赏一云骑尉世职并交部从优议叙；总兵何秀林著交部照一等军功从优议叙；丁槐著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缺出请旨简放，并赏换哈希巴图鲁名号；提督刘永福著赏给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并赏给三代一品封典；杨国发、吴永安、刘兴，均著交部从优议叙；总兵雷应山著赏换噶尔萨巴图鲁名号，并赏给三代一品封典；黄河洲著赏加提督衔，并赏换芬琛巴图鲁名号；副将何秀峰著赏加提督衔，并赏给三代一品封典；李章著赏给都隆额巴图鲁名号，并赏戴花翎；李福兴、杨发贵均著赏加总兵衔；李福兴并赏换齐木沁巴图鲁名号，杨发贵并赏换喀勒崇伊巴图鲁名号；参将马维骥等八员均著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马维骥并赏给博多欢巴图鲁名号，莫逢春并赏给喀勒春巴图鲁名号，陆鸣皋并赏给富隆阿巴图鲁名号，谢有功并赏给穆特本巴图鲁名号，陆海涵并赏给谋勇巴图鲁名号，李成兴并赏换富呢雅罕巴图鲁名号，杨万才并赏换法福凌阿巴图鲁名号，马中及并赏换花翎，包于莲著赏给强勇巴图鲁名号，并赏戴花翎；柳秉象等二员均著补缺后以副将升用，并赏给三品封典；游击张世荣著免升参将，以副将留于云南尽先补用，并赏给绰勒欢巴图鲁名号；张文举等五员均著免补免升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张文举并赏给直勇巴图鲁名号，董义、孙绍并赏戴花翎，

董义并赏给果勇巴图鲁名号，梁松生并赏给精勇巴图鲁名号，马连发并赏给健勇巴图鲁名号；张翥等二员均著俟补缺后以参将升用；张翥并赏给二品封典，王大长并赏给励勇巴图鲁名号，加副将衔；汪永著赏换花翎并加副将衔；都司朱明新等九员均著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朱明新并赏给精济巴图鲁名号，何儒珍并赏给乌勒布苏巴图鲁名号，朱明新并赏带花翎，马超鸿并赏给苏听巴图鲁名号；沙怀珠等五员均著赏加副将衔；沙怀珠并赏给绥勇巴图鲁名号，彭永寿并赏给利勇巴图鲁名号，赏换花翎；守备杨春标等十二员均著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杨春标等二员并赏加副将衔，杨春标并赏给济勇巴图鲁名号，王世雄并赏给侃勇巴图鲁名号；马白珍等三员并赏加副将衔；刘美并赏戴花翎，黄自新并赏给硕勇巴图鲁名号；孙自美等六员并赏加游击衔，赏戴花翎；千总王天禄等二十一员均著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并加游击衔，赏戴花翎；把总马富春等二十六员均著免补把总，以千总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赏戴蓝翎；卫千总职衔莫若璜，著以千总尽先补用并赏给五品顶戴蓝翎；外委何缙宗等六员均著免外委把总，以千总尽先补用并赏给五品顶戴蓝翎。

道员陈席珍著留于云南，遇有道员缺出尽先题补；知府张胜严著免补知府，以道员仍归原省补用；丁彦著赏加三品衔；同知覃克振著仍以本班前先补用，俟补缺后以知府用，并赏加三品衔；张邦彦等二员均著免补本班，以知府留于云南补用；夏声曦著仍以本班留于云南，归候补班遇缺前先补用，俟补缺送部引见；潘德继著赏加知府衔；李树人等三员并著赏戴花翎；知县秦定基著以本班仍留原

省前先补用，补缺后以同知用，并赏戴花翎；直隶州州判李春霖著免补本班，以知州仍留原省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知县杜嗣音等二员，均著以知县分发省分归候补班前先补用并加同知衔；县丞端木鸿均著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给五品顶戴蓝翎；通判周行广著免补本班，以同知仍留原省前先补用，并赏换花翎；刘成良著免选本班，以知州留于云南尽先补用；知县徐凤池著免补本班，以知州改留云南前先补用；州判胡景春著免补州判、知县，以同知分发省分尽先补用，并加知府衔；州同韩光文著免补本班，以知州仍留原省前先补用；州判杨肇基著免补本班，以知州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换花翎；朱德瑄等三员均著免补本班，以州同仍留云南补用，并赏戴蓝翎；县丞柏升著免补本班，以州同仍留原省补用，并赏戴蓝翎；知县李建鼎著注销知县，改以教谕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前选用，并加五品衔；教谕李士贤著以本班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并加五品衔；训导覃廷献著免选本班，以知县分发省分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赏戴蓝翎；巡检李实蕃著免补本班，以州判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从九品吴荣春著免选本班，以州判留于云南前先补用，并加五品衔，赏戴蓝翎；杜宝等六员，均著免选本班，以州判分省前先补用，并加知州衔；周文盛著免选本班，以知县不论双单月选用；六品衔李桂林著免补本班，以府经历留于云南补用，并赏戴蓝翎；州吏目祝尔耆著以本班改留云南尽先补用；知州衔何沛霖著以盐课大使分发省分留于归班前先补用，祝尔耆等二员并赏戴蓝翎；贡生王运恒著以教谕不论双单月尽先前选用；生员王炳南等七

员均著以训导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并赏加国子监典籍衔；杨岱瞻著以县丞留于云南前先补用；杜景春等三员均著以州吏目留于云南补用；李正荣等二员均著以县丞分发省分前先补用；杨岱瞻等六员并赏戴蓝翎；参将王宝华等均著免补参将，以副将遇缺尽先补用；王宝华并赏加总兵衔，赏给额腾依巴图鲁名号；张金泰并赏给执勇巴图鲁名号；刘九如并赏加总兵衔；邹全鸿著以副将仍留原省尽先补用；都司卢贵著免补都司，以游击遇缺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赏给励勇巴图鲁名号；游击刘泰清等二员均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都司邹培著免补都司，以游击仍留原标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副将魏云胜著免补副将，以总兵记名简放；守备齐鸿昌等二员，均著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教谕吴懋勋著免补本班，以知县分发省分补用，并加五品衔，赏换花翎；童生萧彤寿著以从九品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并赏加六品衔，赏戴蓝翎；记名总兵云南武定营参将覃修纲著开参将缺，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并赏给三代一品封典；副将陆春涵著赏加提督衔，并赏给绰欢巴图鲁名号；参将李世兴等三员均著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李世兴并赏给肃勇巴图鲁名号，颜云芳并赏给赫勇巴图鲁名号；卢得志著赏给卓勇巴图鲁名号；游击梁禹福等三员均著免补游击，以参将留于云南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梁禹福并赏给敷勇巴图鲁名号；都司梁世龙著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赏换花翎；守备袁用和等六员均著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袁用和等五员并著赏戴花翎，袁用和并加副将衔；韦金笔

等二员并加参将衔；千总莫矜智等二员均著免补千总、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莫矜智并加游击衔，赏戴花翎；谢嘉德并赏换花翎；韦高魁等七员均著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罗翠华等七员均著以守备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并赏戴花翎；黄昆等十一员均著以守备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赏戴蓝翎；军功汤宗政等八员均著以千总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赏戴花翎；把总罗学成等五十五员均著以千总尽先补用，并赏给五品顶戴蓝翎；知府杨景修著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黄金树等二员均著赏加盐运使衔；知县王绩威著免补知县，以同知直隶州知州仍留云南归候补班前先补用，俟补缺后送部引见，并赏加知府衔；知州江海清著仍以知州归候补班前先补用，并赏加运同衔；知县周济泰著免补本班，以同知直隶州知州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先补用，俟补缺后送部引见，并赏加知府衔；江海清等二员并赏戴花翎；史建中著俟补缺后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前先补用，并赏加四品衔，先换顶戴；韩再兰著仍以知县归候补班前先补用，俟补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补用，并赏加四品衔，先换顶戴；胡景贤著以本班仍分发省分归候补班前先补用，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前先补用；韩再兰等二员并赏戴花翎；傅恩荣著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归候补班遇缺前先补用，并赏加知府衔，赏给四品封典；杨增芳著免补本班以知州留于广东归候补班前先补用，并赏加运同衔，赏换花翎；州判周政著免选本班，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归候补前先补用；布政使经历白秀云著免补本班，以知州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先补用；周政等二员并赏戴花翎；州判华世熙著免补本班，以

知州仍归原省前先补用，并赏加运同衔；县丞黄如钰著免补县丞、知县，以知州仍留原省归候补班遇缺前先补用；华世熙等二员并赏换花翎；盐课大使孙遐年著免补本班，以知县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加知州衔；从九品李钟辰著免选从九品，免升县丞，以知县分发省分归候补班遇缺前先补用，并赏加知州衔；陈虞昌著免选本班，免升县丞，以州判仍归原省前先补用，并赏加五品衔，赏戴花翎；吏目朱德爵等二员均著免补本班，以盐课大使仍留云南归候补班遇缺前先补用；朱德爵并赏给五品顶戴花翎；从九品职衔秦发庆等二员均著以盐大使留于云南归候补班遇缺前先补用，秦发庆并赏给五品顶戴蓝翎，邓璞文并赏加五品衔；县丞李登云著以州同仍留原省前先补用，并赏加知州衔，赏戴花翎；生员戚勋等三员均著以训导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并赏加国子监典籍衔；从九品农嘉祥等三员均著以盐课大使留于云南前先补用，并赏加六品衔，赏戴蓝翎；生员张兆桂等三员均著以县丞留于云南前先补用，并赏给六品顶戴蓝翎；龙觐光等九员均著以县丞分发省分补用，并赏给六品顶戴蓝翎；童生韦国泰等二员均著以巡检留于云南归候补班前先补用；韦国隆著以州吏目留于云南归候补班前先补用，韦国泰等三员并赏给六品顶戴蓝翎；文廷瓒著以巡检留于云南前先补用，并赏戴蓝翎；前云南藩司刚毅著交部从优议叙；唐景崧著赏戴花翎并交军机处存记，候旨简用；汤聘珍、岑毓宝均著交军机处存记，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①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1952～1957页。

第十章

镇南关大捷

一 清政府起用冯子材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1818年生于广东（现属广西）钦州。早年投入军营，曾参与镇压太平军，将兵万余踞守镇江六年。积功赐勇号色尔固楞巴图鲁、赏穿黄马褂、授骑都尉世职、擢广西提督。在广西任职期间，曾三次率军入越助剿。后因受官场排挤和张佩纶的弹劾，于光绪九年六月告病回归钦州。

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5日），国子监司业潘衍桐上奏《请饬冯子材办理高廉等处乡团片》称：广州省城屯有重兵，惟高廉雷琼一带，为法夷由越南窥伺粤东必经之路，守备尚觉空虚。臣见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戎略夙娴，精力尚健，闻与西抚徐延旭意见龃龉，引疾告归。但该提督素有战功，且籍隶钦州，沿海情形最为谙悉，或统旧部，或募新团，号召不难立应，可否敕下彭玉麟与该提督商办高廉雷琼等郡乡团，以资策应，于边防实有裨益。当天，清政府有旨给张树声：冯子材前因患病，开缺回籍，现在已否病痊，精力何如，着令其办理高廉雷琼等处乡团是否相宜，著张树声酌度情形奏明办理[①]。十二月初六日（1月3日），山西巡抚张之洞条陈战

①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45页。

守事宜，在未见到潘衍桐上述奏折的情况下，针对法军扬言侵犯广东一事而有防粤一策，其中也建议将好勇敢斗的粤民组成乡团配合兵勇作战，“可否特命彭玉麟、吴大徵督办广东团练，而择粤绅之有才望者佐之”①。清政府纳奏，命广东督抚妥议具奏。光绪十年正月廿八日（2月24日），彭玉麟、张树声等复奏，认为：“以精练之营勇为正兵，以各乡之联团为援应，未必竟不足恃。”准备选择有才望的粤绅募练乡团。在谈及主持广东西路高廉雷琼各属团练人选时，就提到冯子材的名字。二月十四日（3月11日），因有法军欲犯琼州的流言，二人又奏称：添募水陆勇营筹防廉琼，“与奏派办理西路团练冯子材等联络布防，遥作声势”。奏上后，清政府批复：“西路团练并令冯子材实力办理，俾壮声援。”② 然而，当冯子材真正着手督办团练时，却发现由于自己有职无权，因而指挥不灵。他在七月十三日（9月2日）曾有函谈到此事：自奉派起团以来，迄今虽已数月，无如各该州县有催罔应。现计禀报成团尚未挑拣者虽有九州县，而此九州县内又仅有钦州一团，经子材督挑500名，近已练有成效，然亦仅可守备本境，其余16州县均尚未据禀前来。子材以告病在籍人员，思欲亲身往催。奈经费别无所出，不过具备文行而已③。但是，这件事却成为冯子材能够重新得到起用的契机。

北宁之战败挫后，二月十九日（3月16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奏请起用冯子材协助张树声统率淮军出驻南宁一带，督办广西后路：“前广西提督冯子材莅粤西十余年，功勋宿著，

① 《中法战争》(5)，第270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二，第3～5页。
③ 《中法战争》(3)，第88页。

熟悉边情，徒与徐延旭龃龉，遂甘废弃。可否饬令该员招募旧部，随同张树声协理后路防务。该员志行侃直，必能竭忠荩虑，无负厚恩。”可能是这份奏折打动了清政府，觉得可以重新起用冯子材援越抗法，于廿九日（26 日）有旨，赋予冯子材比协助张树声更重要的任务：“冯子材边情较熟，著传知该提督速赴关外，接统黄桂兰所部，毋稍迟延。”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此旨隐含清政府让冯子



指挥镇南关之役的老将冯子材

材复任广西提督的意思。然而，当张树声在三月初将此旨传知冯子材，却遭到冯子材于三月十七日（4 月 12 日）复函的委婉拒绝：“惟前提督于去年因病告假开缺，回籍调理，现在病体未痊，乘马足软，剿办难以支持。兹经西省徐抚院才高智广，新任黄军门韬略勇谋，两员能以办理。该法匪既众，兵勇单薄，势难取胜，恳请转奏添兵加饷，照楚军粮饷章程，祈为知会徐、黄两员，督兵进剿法匪，定必一战成功，以省靡费。”[1] 当冯子

① 《中法战争》(3)，第 87 页。

材撰写这封复函时，黄桂兰已畏罪自杀，徐延旭则有旨逮治，而冯子材表面上虽极力地吹捧他们，骨子里实际上包含着辛辣的讽刺。

国难当头，前敌需人，何以冯子材却拒绝接统广西边军，抗御敌寇呢？这还要从冯子材与张树声、张佩纶、徐延旭、黄桂兰、赵沃等人的矛盾说起。

早在北宁溃败的十多年前，当冯子材尚任广西提督、二次率军入越助剿时，就于同治十年奏劾徐延旭："广西署太平府知府兼理龙州同知徐延旭，将回籍降人驱逐出关，致使受抚之周仲汶等，仍附苏帼汉等，复在越南滋扰。且纵勇通贼，抢掠夷人财物，虚开勇额，冒领饷糈；该员于所属境内私设厘卡船埠，每年所获，不下万金，其幕友包揽土官，贩卖人畜分肥，徐延旭亦明知故纵，并滥保官亲家丁等情事。"[1] 但是，当清政府将弹章批转时任广西巡抚的刘长佑查复时，早就欲排挤冯子材以安插其私人的刘长佑却昧心为徐延旭辩护，复奏称：徐延旭历任要地，防剿有功，遵查被参各款，均无实据。得旨："徐延旭既查无营私舞弊等情，著无庸议。"[2] 冯子材因而与刘长佑龃龉，"遽思引疾"。同治十二年，刘长佑上奏，攻讦冯子材："果于任事，暗于察言，左右有乱听闻。"遴委赵沃、徐延旭等人接替冯子材办理边防[3]。从此，冯子材就与徐延旭结怨。

光绪四年冬，清将李扬才反叛入越，赵沃追剿失利，清政府有旨命冯子材率兵出关追剿。冯子材出关后，即与广西巡抚杨重雅联衔奏参赵沃："先后禀报擒获李四，疑有杀降冒功情

① 《清穆宗实录》。
② 《清穆宗实录》。
③ 《中法战争》(1)，第65页。

弊，陈佐邦系逃出自投之人，赵沃所部党敏宣、李云梯禀报攻克买市、新街及北泮、白通州，皆有虚捏。”清政府纳奏，将赵沃革职，毋庸留营，并命接任广西巡抚张树声查奏。张树声这时正欲排挤冯子材，以便腾出职位安置他带来的淮将黄桂兰，因而在复奏时为赵沃说好话：“臣函询前抚臣张凯嵩、刘长佑、涂宗瀛，皆称赵沃朴诚廉洁，晓畅戎机，为西省道府中不可多得之员。”并称经派黄桂兰调查后，冯子材等所参赵沃各款并无其事，要求仍将赵沃留营效力，否定了冯子材的参劾[①]。清政府纳奏，有旨：“已革道员赵沃被参各节，既据该抚查明，功过尚足相抵，且平日朴诚廉洁，晓畅戎机，自可稍从宽宥，赵沃著准其留于广西军营效力，以观后效。”[②] 但冯子材不甘罢休，曾有奏申辩。清政府却左袒张树声，有旨：“道员赵沃前经降旨革职查办，嗣经张树声查明，该革员功过尚足相抵，已有旨准其留营效力。朝廷于臣下是非功罪自有权衡，该提督无事哓哓渎辩为也。”[③] 这样一来，冯子材又与张树声、黄桂兰、赵沃结下仇怨。光绪五年底班师入关后，冯子材卸统边军，张树声遂致命黄桂兰接统。从此，“冯军门卧病不能视事”。光绪九年四月十八日，对徐延旭抱有好感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上奏《制敌安边先谋将帅折》，其中有“请易广西文武大员”一条，就提到：“提督冯子材老病骄满，不戢其军，虽有前功，宜令退位。”[④] 为徐延旭执掌广西边军扫清障碍。五月，徐延旭以广西布政使之职督师关外，军权大过

---

① 《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卷二，第 17～20 页。
② 《清穆宗实录》。
③ 《清穆宗实录》。
④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 368 页。

没有督师名义的实缺广西提督，冯子材不愿受其节制调遣，又怕恋栈惹祸，遂告病引退。

综上所述，可见冯子材实际是被张树声、张佩纶、徐延旭、黄桂兰等人排挤去职的，虽然这种排挤最后造成他们自己的彻底垮台，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当这几个人仍在台上的时候，冯子材怎能贸然出山接统边军呢？这是他拒绝张树声的苦衷。不过，冯子材这样做还是明智的，因为李鸿章知道清政府准备起用冯子材后，于三月初二日（3 月 28 日）去函潘鼎新贬低冯子材："廷旨起用冯萃鸾，年已七旬，前在镇江仅能守，嗣往越南剿土匪有声，然非法人敌也。"[1] 张树声则对冯子材还宿怨未消，他在传旨冯子材接统边军的同时，于三月初五日（31 日）去电李鸿章诋毁冯子材："奉旨起冯萃亭接统其（指黄桂兰）军，昨致总署函，言冯未必出，出亦无益。"李鸿章当天复电，表示赞同："鄙见亦谓冯不胜任。"[2] 张佩纶也在此时连连致函李鸿章，要李鸿章出面阻挠冯子材复出："冯萃亭乃铁香所荐，鄙不谓然，此应由公荐淮将助之，用东人为抚而将为淮，用淮人为抚而将为粤，不但兵杂而将亦杂矣。内已气馁，无求逞之理。""粤西提督急须出群之材，若公书缓至，属之大树（指冯子材），文武不和，又蹈徐、黄覆辙矣。至盼至盼。"[3]如果冯子材此时出山，还不知会遇到些什么麻烦呢。

只有当这些对头一一垮台后，冯子材才逐渐活跃起来。

中法重新起衅后，法军从海路胁逼台湾、福建，陆路又有

①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第 5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143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371 页

反击滇、桂军队之意。各处告急，清政府频频下旨抽调粤东将帅如彭玉麟、张树声等前往赴援。新署两广总督张之洞不愿他们调往，曾多方推托，但强敌压境，广东一兵不出，一将不遣也不是办法，于是想起派冯子材代表广东率军赴援的办法。光绪十年六月廿一日（8月11日），他有函探问冯子材还能否率兵出征："钦州民团自得宏才指麾，谅已日形精整，意拟请阁下速将团练密加部勒，营哨官分别派定，一遇事机紧迫，即将精健练勇酌带二三营，配给军火，取径疾趋，袭彼广安、海防，广张声势，多设疑兵，以为牵制之计。"七月十三日（9月2日），冯子材复函张之洞，认为各州县练勇只可用作声援，不能使之越境御敌；兹欲袭广安牵制法夷，此等团勇实不可恃。况以数营练勇前往袭取，设该法夷一闻警信，既不得志于闽，必然迁怒于粤，立起大队反戈而回，此数营不独非其所敌，且虑乘势轶人，则廉郡海口反受其累。冯子材建议："为今之计，与其暗袭牵制，侥幸于目前，何如挞伐大张，以杜欲壑于日后。"并自告奋勇，请缨出征："子材所患之疾已愈八九，如蒙我大公祖垂爱，任以军旅之事，即请奏明，将现在关外尚未遣散之粤勇一并调至谅山、海阳交界之宣安州，并由子材就近募勇，连关外粤军共足一万五千人，均交子材统带调遣，应胥粮饷概照楚军章程给发，所有广安、海阳两夷省均请大公祖责成子材以克复之，并请将应制枪炮及子药在于折内声明，由天津、上海、苏州各机器局划明分制，及军装等项飞解来钦，俾得迅速进剿……既可以寒贼胆，又足以固藩封，且使法夷不敢再窥两粤、滇南边境，一劳永逸，似为全策。"① 然

① 《中法战争》(3)，第88～90页。

而，与徐延旭关系密切的张之洞此时并未真正赏识冯子材，反而认为冯子材的建议和要求是大言轻敌，实办不到。后来复函冯子材称："惟需三十营之多，大举南征，实非粤省之力所能。"① 不过，张之洞却了解到冯子材已经病愈，可以率兵出征了。

八月，援越桂军与法军在船头、郎甲交战，战后，潘鼎新以兵少饷匮告急，并请求广东出偏师助桂军。经过彭玉麟赴钦州与冯子材商议率兵赴越援剿事宜后，九月廿二日（11 月 9 日），张之洞复电潘鼎新："欲属冯军门子材募十营，由钦州经上思州入越境，出那阳，规广安。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惟此举是否有益?"② 大概潘鼎新同意了，张之洞以答复冯子材七月十三日的来函为名，于十月初七日（24 日）致函他。函中首先赞誉冯子材请缨出征之举，然后提出：兹拟请麾下以十营出关，取道龙州，直指那阳，进规广安。务祈速募精选，于文到 20 日内即行部署启程，以操胜算。饷械即到，必不逾期，军火极力筹办，约计抬枪 500 杆，士乃打枪 1000 枝，大吉枪 2000 枝，劈山炮及后膛洋炮数尊，连响洋枪约有百件，配足子药③。

与冯子材同时奉派援桂的还有广西右江镇总兵王孝祺所部八营。十月十一日（28 日），彭玉麟、张之洞联衔电奏清政府："今由广东出军两枝赴越协剿，派在籍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募十营，由钦赴龙出关，攻广安一路，以图海防；派本任广西

① 《中法战争》(4)，第 521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458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521～522 页。

右江镇王孝祺统粤省抽出防军八营，由梧赴龙出关，攻船头一路，以助苏提。”① 王孝祺，安徽合肥人。早年投入淮军，隶张树声麾下，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过程中，积功至记名提督、赐勇号博奇巴图鲁、赐头品秩。光绪六年，随张树声到广东，历署潮州镇、碣石镇总兵。光绪九年，实授广西右江镇总兵。张之洞曾评价他：“威重不浮，谋勇素著。”部下有骁将潘瀛等。但王孝祺的地位仍远不及冯子材。这表现在待遇上，王孝祺与唐景崧一样，每月仅领公费银 400 两，而冯子材则多至 600 两；在和潘鼎新的关系上，王孝祺须“听西抚院潘节制”，而冯子材遇事只“与西抚院潘商酌办理”②。

但是，冯子材对于张之洞的上述部署并不完全满意。一是嫌自己统兵太少。在接奉率军十营出征的命令后，曾致函彭玉麟，力陈出疆征讨，兵力须厚，“冯萃亭军门致雪帅书，意甚不满，至少亦须二十营”③。张之洞无法，只得允许他增募八营，于十一月十四日（12 月 30 日）致函冯子材：“十营为数略少，以饷绌故。兹复竭力图维，勉筹八营之饷，以厚军力；九千之精锐，胜于十万之横磨矣。”④ 二是嫌广东拨给军械太少，尤其是缺少军中利器新式大炮。冯军增募八营后，张之洞拨给的枪械计有抬枪增至 800 杆，拟从向外国订购的毛瑟枪中给 1000 杆。并根据冯子材的要求，于十二月初四日（1 月 19 日）电奏清政府：“冯子材大队仓猝出关，有枪无炮，不能攻坚及远。粤无行仗炮，张前督带来有限，除王孝祺带赴越外，

① 《中法战争》(6)，第 154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439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526 页。
④ 《中法战争》(4)，第 522 页。

余已分发难收回。金陵局制各炮利行队，拟请敕南洋借拨三十尊，他洋炮亦可，速运粤发冯军。"① 初六日（21日）有旨令南洋大臣曾国荃移缓就急，速照数运粤。接旨后，张之洞于初七日去函通知冯子材："其他精械尽力拨解，勿以缺乏为念。"

但是，张之洞是太乐观了，因为迟到此时再从数千里外的南京调运枪炮前往已赶不及战事需要了，冯子材只得自己设法解决。办法有二，一是练大刀队。据《冯子材传》载："子材军入桂，人心稍定，惟火器旧械仅得荷哈开士洋枪及抬枪、大吉枪三种，以之敌毛瑟、开花之枪必无胜算，非恃短刃肉搏不为功。子材乃赶铸大刀八百柄，编壮士大刀队，阅月练习有成。"他还创制了用油瓶装火药，在瓶嘴用香炭引爆的土炸弹"先锋煲"。二是根据张之洞的指示："军火不足，先借拨解刘、唐械济急。"冯子材曾截留广东拨解给刘永福、唐景崧的部分枪械，但数量很有限。因为张之洞拨给刘永福的枪械仅后门枪2000枝、士乃得枪1000枝。而这3000枝枪亦非全部落入冯子材军中，冯军仅得部分而已。因此，冯军枪械欠缺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张之洞所强调的："冯军止有枪，并无炮。"② 这就严重影响了萃军的战斗力。以致张之洞在十一月廿九日（2月13日）向清政府电奏冯、王两军的情况时，对冯军只作了很低的评价："王军老营械足，举动素稳；冯军新集械缺，剽悍轻敌，大约王军宜锐进，冯军宜缓发。"③

然而，不管别人的评价如何及将会面临何种困难，杀敌心切的老将冯子材仍斗志昂扬，英姿勃发地着手募军出征：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494页。
② 《中法战争》(4)，第525页。
③ 《中法战争》(6)，第236页。

冯子材的募军方法是：先选用旧日的得力部属如副将冯兆金、游击杨瑞山等为督带，再由各督带挑选各营的管带哨弁，“营官哨弁，则必遴选官卑职小，年富力强辈充之。职卑者升官心切，非舍命杀敌无以超尘出众；年富力强者心雄胆壮，勇往直前，不甘落后，是以每战克敌，常操胜算，本皆得力于职小年壮辈耳。”①

招兵方法则有二：一是将已组织的团练改编成军；二是札委各营哨员弁到钦州属下各县乡树旗招兵，旗上大书：“国家有难，应募者速来。”借以发动兄弟、叔侄、亲戚、乡邻投军。由于冯子材在当地威信很高，得到民众的信任，很快就形成一股投军报国的热潮。仅用15天时间，就在钦州招募萃军十营，后又增募八营，共18营。

冯子材将前募十营编成中左右三军。中军辖左右两营，左营由他的三子同知冯相荣管带，右营由他的五子同知冯相华管带。右军辖中前左右四营，督带为副将冯兆金并兼统中营，左营由守备冯骅管带，右营由千总陶烈武管带，前营由守备陈之瑞管带。左军亦辖中前左右四营，督带为参将梁振基兼统中营，左营由把总黄万桂管带，右营及前营管带不详。又将后募八营编为前、后两军。前军辖中前左右四营，督带为游击杨瑞山兼统中营，左营由都司刘积璠管带，右营由知县刘汝奇管带，前营管带不详。后军亦辖中前左右四营，督带为都司麦凤标兼统中营，左营由都司冯绍珠管带，左营由把总梁有才管带，前营由千总陈荣坤管带。张之洞并派委署廉州府知府黄杰为萃军营务处，又因冯子材有函指调一些官佐，遂饬有司札委

① 《钦州文史》第5期。

正佐三四员前赴钦州，以资差遣，其中有知县蔡简梁、守备陈才业二员。冯子材自己也选用一些文员随军，如补用道都启模以及黄辅成等，同往前敌筹划赞助。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7日），冯子材率前募十营誓师出征。临行前先行辞祖之祭，即训示家人："万一军有不利，百粤非复我有，亟率我眷属奉香火驰归江南祖籍，永为中国民，免奴外族也。"显然，此时冯子材已抱定以死报国，马革裹尸的悲壮志愿。

萃军纪律严明，"每拔队之先，派员预往前途熬煮粥饭，以待大队士兵打尖得以充饥，故于沿途买卖均无纠纷。每日营宿，先经管带勘踏地势，规定距离，各哨官方依规定地方督促各兵夫，一面向外挖水沟，一面向内筑土墙，撑搭帐篷，然后造饭住宿。翌日五更饭饱，拆收帐篷，到队点名起程"[①]。沿途还张贴安民告示严禁官兵扰民。如在龙州有告示："各路大军，露营住宿，禁入民村，禁住民房。全体官兵，严禁夜出，白天入街，须持手令。如违令者，军法不赦，一律严处，斩首示众。"在凭祥又有告示："拦路抢劫者斩，强奸妇女者斩，偷牛偷猪者斩，拐带人口者斩。"[②]

十一月十八日（1885年1月3日），萃军行抵上思；十二月初五日（20日），抵达龙州。由于"募军未足，装械未齐"，没能赶及参与谅山之役。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三日（2月17日），被败耗震惊了的冯子材率军匆忙赶到镇南关，准备参加保卫祖国南大门的战斗，却被"屡电不以冯军为得力"的潘鼎

① 《钦州文史》第5期。

② 《钦州文史》第5期。

新冷漠地拒绝了："守关无须萃军"[1]。不久，潘鼎新将会为他作出这个关系到一生令名的愚蠢决定而后悔终身。当冯子材因受到冷遇而率军怏怏撤离镇南关时，就在这同一天，清政府作出了也许是它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的最英明决定："冯子材著帮办广西关外军务，所统各营亦归潘鼎新调派。该抚暨该帮办等务当和衷协力，迅速图功。倘各军不遵调度，即严参治罪。"[2]

广西抗法前敌转败为胜的契机出现了。

二 敌我双方的战前准备

谅山败溃后，屡遭挫折的援越桂军虽然不像北宁挫败后那样溃不成军，无法收拾，但也是士气低落，将帅消沉，尤其是身为前敌统帅的潘鼎新更是显得手忙脚乱，措置失宜。他依然无法正确地判断敌情，搞不清楚法军的主攻方向，而是错误地断定法军已将攻击目标转向云南方向："法进扎扣柱，拟由艽葑进窥牧马，两面夹攻，欲尽取越境。"[3] 并认为法军如再进攻桂军，突破口将会选在艽葑：法军"极意经营，规划全越，为久据侵扰之计，并分股前趋扣波、艽葑，希图西通太原，北窥内地。艽葑一水可达龙州，闻欲伐竹结筏，顺流下窜，绕截关前诸军之后，居心狡狠，防不胜防，后路人心颇为震动"[4]。为此，潘鼎新将大部分兵力调往艽葑防守，包括苏元春部十八营、方友升部两营、马盛治部六营、鄂军魏刚部四营、淮军两

① 《中法战争》(4)，第464页。
② 《中法战争》(6)，第295页。
③ 《中法战争》(4)，第238页。
④ 《中法战争》(6)，第393页。

营、冯子材部五、六营，合共38营约二万人。即使如此部署，潘鼎新仍担心法军势大，桂军抵敌不住，于正月廿七日（3月13日）电告清政府："冯军、苏军分往艽葑扼扎，不知能否堵御?"事实证明潘鼎新的判断错误，担心多余，因为法军此时尚无力大举进犯，艽葑方向只有法军的小股侦察部队试图佯攻，牵制清军，桂军大部队一到，即已退走。三月廿四日（5月8日），苏元春关于此事奏称："法人退出南关以后，仍踞文渊，该处右通长定府治艽葑，为去牧马、高平要道。节据探报，艽葑已有敌踪，如由水路顺流而下，即可窥伺龙州。前抚臣潘鼎新方驻海村，约会帮办军务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分拨萃字五营扼扎扣波，免为敌据，并属臣元春督军出击。即于是月二十八日（3月14日）亲率提督陈嘉、方友升、副将陈桂林所部镇南、亲军、毅新各营驰赴艽葑。三十日（16日），将抵该墟，敌已闻风先遁，教匪犹聚扣波，萃军先于二十七日（13日）掩至进击，夺其大象一只。"①四月初二日（5月15日），张之洞等亦奏报此事称："越人密报法将出扣波，袭艽葑，攻牧马，绕出南关以北，且断唐景崧、马盛治两军归路。苏元春率军暨魏刚军趋艽葑以待，冯子材遣五营扼扣波以邀之。二十七日，法数十骑率教匪至艽葑，官军先在，惊走。扼扣波之冯军突出奋击，败遁，获其驮军火大象一，擒匪党二。二月初二日（3月18日），法又争扣波，遇冯军，脱洋衣、洋帽挂林木，而窜艽葑一即长定府。法以越官长定府知府给已，杀其子，遂无西犯意。"②

① 《中法战争》（6），第438页。
② 《中法战争》（6），第454～455。

显然，如果继续任由潘鼎新这样瞎指挥、胡折腾，则不会有即将来临的镇南关大捷，中法战争的结局又将不同。在这个严重时刻，老将冯子材充当了“挽狂澜于既倒，定胜负于俄顷”的关键人物。他在张之洞、李秉衡的支持下，影响和争取潘鼎新、苏元春等将帅，为即将来临的决战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

1. 改变全军的战略思想，变消极防御为积极进攻。到达前沿伊始，冯子材的处境也很困难：“敝部各营未集，他军呼应不灵。”但是，丰富的军事经验使他意识到援越桂军实力犹存，事尚可为，继续消极防御，以待敌攻，以至被动挨打并不是办法，而应该争取主动，扬长避短，调动敌人，智胜敌寇。当时，前敌诸将帅的战略思想并不统一，“冯请进剿，苏请暂缓，新拟俟鲍军到齐，云军大举，再乘势并进，敌势既分，庶易得手”[①]。为了改变这种纷乱情况，统一思想，冯子材以身作则，自告奋勇，亲率萃、勤两军担负进攻敌军的重任。他于正月十八日（3 月 4 日）通过李秉衡禀报张之洞：窃谓用众不如用谋，法枪炮利，用谋自可制胜。文渊紧接南关，必先战方可见谅，幸有机可乘。已暗中布置，拟独用敝部，克期进战。张之洞支持他的主张，并去电帮助说服潘鼎新：“冯军自请攻文渊，既云有机可乘，自应许之。”[②] 但是既然允许，就不会只让萃军孤军出击，而必然会影响全局部署。我们看到，自从冯子材提出主动出击的建议后，潘鼎新的战略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从正月廿四日的消极待援变成廿七日的出兵艽葑迎敌，再

① 《中法战争》(4)，第 237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468～469 页。

变为二月初的回军镇南关一带，以配合冯军的出击。其中出兵芄葑虽然是一种失误，但却表现了主动击敌的姿态。这种战略思想的根本改变，对于调动全军协同作战有很大的意义。

2. 争取到灵活机动、便宜行事的自主权。在正月初三日任命冯子材帮办军务时，清政府就指示他"归潘鼎新调派"；镇南关失事后，因潘鼎新奏称冯子材等"飞催不至"，清政府曾有旨严责冯子材。十四日（2 月 28 日），张之洞有电，令冯子材"遵旨援剿，听潘调度"。但是，由于潘鼎新在开始时并未能立刻接受冯子材出击文渊的主张，因此，冯军如要主动出击，就不能严格地"听潘调度"。为此，冯子材于十八日的电报，就要求给予他一定的灵活机动、便宜行事的自主权：奉旨进剿，须与琴帅商办，无奈军情顷刻变动，必待缄商，不免坐失机宜，现密商琴师，嗣后事机可否便宜行事，免延误。对此，张之洞也给予有力的支持，只是嘱咐冯子材要同时注意尊重潘鼎新："贵军距琴帅营甚远，兵机瞬变，函商必误，自是至理。但此层宜向琴帅恺切陈明方可，想无不允。进兵时，须预将大略密达琴帅。"[①] 大概是由于不久前曾再三强调冯子材须听潘调度，张之洞不便直接出面说服潘鼎新满足冯子材的要求，但还是通过向李秉衡表态的方式间接地向潘鼎新施影响："冯军既愿以本部克期进战，甚好，自应听其相机下手，往返函商必误事机，琴帅必已允许。"[②] 虽然我们现在还找不到潘鼎新对此事如何处理的资料，但以情理推测，因为冯子材的要求侵犯到他的指挥权和统帅权威，他不会十分高兴。但是，张

① 《中法战争》(4)，第 468～469 页。

② 《中法战争》(4)，第 468 页。

之洞既已表态，自己对未来的战事又实无把握，因此，虽然内心可能有所不满（这表现在他后来极力主张冯军回援钦廉一事上），也不便出面反对，只好采取缄默的态度，不作明确表示：战胜了有我一分功劳，失败了我不负责任。也许正是由他这种不明确的态度，促成张之洞等后来要求撤换他。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不出面反对，就意味着默许，也算是一种支持。冯子材正是由于争得这种自主权，才能及时在关前隘修复长墙，以及出击文渊诱敌，从而为取得镇南关大捷创造条件。不过，《清史稿·王孝祺传》载："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孝祺曰：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秉衡称善。"说冯子材取得指挥全军的权力，则恐非事实。

3. 及时收缩兵力，形成有力的打击力量，集中对敌。由于出防艽葑的缘故，前敌兵力分散，关前隘一线守军只剩下一万多人，未能形成绝对的优势，因此，将出防艽葑的主力调回，是打败法军的关键步骤。在苏元春等人事后的奏报中，把率军回扎一事说成是他和冯子材两人决定并实施的：击退艽葑的小股法军后，"臣与冯子材虑其一战即退，必有狡谋，保无麇聚文渊，别图侵突，因即商同回顾关内，仍前分扎关前隘、幕府塘一带，以重根本"[①]。从而只字不提潘鼎新在内中所起的作用。其实，苏、冯等军出防艽葑是执行潘鼎新的命令而去，现在这样大的一支部队的移动回扎，当然也需要请示潘鼎新同意，因此，苏元春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冯子材等人的电报中，则认为此事是征得潘鼎新同意后进行的。二月初一日（3月17日），冯子材就"函商琴帅并致苏提，如艽葑已无

① 《中法战争》(6)，第438页。

贼踪，请苏军迅速回兵，以重南关一路”①。在张之洞等人的奏报也提及：“冯子材请于潘鼎新，调苏军还中路。”潘鼎新则因此时恰好张之洞等频频催促冯子材率军回防钦廉，以为成行在即，同意将苏军从艽葑调回关前隘接防②。《克复谅山大略》一文也指出，“冯言于潘抚，召苏元春回中路”③。可见潘鼎新在此事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苏元春等军的及时回防，于是在关前隘一带，便集中了桂军的主要兵力，计有：冯子材率萃军左右中三军共十营，驻守离镇南关十里的关前隘，王孝祺率勤军八营屯于其后半里许，以为犄角；苏元春毅新军、陈嘉镇南军共合18营，俱屯幕府，在关前隘之后五里；蒋宗汉广武军十营、方友升两营俱屯凭祥，在幕府后30里；潘鼎新率鼎军四营屯海村，在幕府后60里；魏刚鄂军四营屯艾瓦，马盛治六营防艽葑，冯军六营仍驻扣波，俱在关西百里外；王德榜定边军十营扎油隘，在关外东30里。总计将近80营四万人，对法军占有绝对优势，保证决战的胜利。

4. 增饷悬赏，振作士气。士兵是军队的主体，要想打胜仗，光有将帅的积极性还不行，还要调动士兵的积极性，上下同心，团结对敌。如何使败挫后低落的士气重新振作起来，这是摆在桂军将帅面前的一件大事。

二月初二日（18日），冯子材致电张之洞提到：初一日，“琴帅到王镇勤营，并亲到长墙营垒踏看。材往晤谈，商及进

① 《中法战争》（4），第475页。
② 《中法战争》（6），第454～456页。
③ 《中法战争》（3），第79页。

取，琴帅云士气未复，琴帅即回"[①]。由于电文简洁，冯子材只谈到潘鼎新提出"士气未复"的问题，而没有进而谈及他将采取的对策：是消极地借此而反对出击法军呢？抑或是积极地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从而振作士气，为出击法军作好准备呢？但是，在事后张之洞等人的奏报中，出于攻击和贬低潘鼎新的私心，肆意窜改和歪曲冯电的原意，变成：初二日后，冯子材"决计先发制敌，群议多不欲战，潘鼎新以士气未复止之，冯子材力争，率王孝祺军于初五（21 日）夜出关袭敌"[②]。其实，按照冯电，是潘鼎新到长墙踏看时，冯子材往晤商谈出击事，则与谈者仅他们二人，何来"群议"？潘鼎新在谈话中仅提出"士气未复"的问题，又何来"止之"事？

根据李秉衡、苏元春联衔于七月二十二日（8 月 31 日）的奏报[③]，我们知道，正是在潘鼎新向冯子材提出"士气未复"问题的前后，他已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振作士气了。

当时，由于战事扩大及伤亡病故的原因，前敌各军从当地招募了不少广西人充当兵勇，以至占了总兵力中的相当大的比例。如苏元春从湖南带来的湘军原数不过 1800 余人，经过八个月的征战，阵亡及病故当不在少数，但却扩充为 18 营 9000 人，其中大部分即为原桂军士卒及从当地人中添募的；蒋宗汉所率广武军原仅三营 1500 人，经过长期征战伤亡及病故，现扩为十营 5000 人，其中从当地招募也不会是少数；其他各军，如新募成军的冯子材所部估计也会有不少广西人在内。而按照当时营制，从广西本省招募当兵的，月饷只有二两四钱，而湘

① 《中法战争》(4)，第 475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455 页。

③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 740～742 页。

淮粤各军勇丁月饷则为四两二钱，厚薄悬殊，成为影响士气的重要因素，“各军因饷章不一，勇丁战守同此艰辛，往往有所借口”。

为了在决战前夕振作士气，在二月前后，潘鼎新不及奏明清政府，就毅然采取“减营增饷”的重要措施。苏元春等奏称：敌势方张，尤虑兵心涣散，潘鼎新目击情形，因商同臣元春，就各军汰弱留强，减营增饷，核实归并共成46营，自本年二月初一日起，均照淮军营制，每名月给四两二钱，期于饷归一律，无所借口。维时臣秉衡督办后路事宜，奉章照办，传知各营，莫不感颂皇仁，共图奋勉。惟当谅山、关门失挫，大局岌岌可危，审机度势，若不立予变通，几于不可收拾。乃自加饷以后，桂军皆争先恐后，万众一心，未几即有关前隘大捷，旋经克复文渊、谅山，连下威坡、山庄、谷松等坚垒，一转移间，军事转钝为利，未始非饷归一律之明效。可见这一措施作用很大。在此之前，潘鼎新、苏元春率带援越桂军已近八阅月，却从未想到过这个办法。联想当年冯子材守镇江时也用过“减营增饷”的办法来提高士气，那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时，前敌将帅还悬重赏以激励士气。这虽然是旧军队常用的办法，但在当时这个主意最先是由张之洞提出来的，即攻克谅山悬赏三万，而冯子材加以发挥，因为要进攻谅山必先进攻文渊，进攻文渊也应该悬给重赏以鼓励士气：“接香帅来电，能复谅山赏银三万。今文渊非重地，但开办始，若不许重赏，不足鼓励将来，现允给大赏。”张之洞支持了这个建议，分别去电潘鼎新和李秉衡：“发轫之始，悬赏励士，无所不

可。”“如获大胜，准赏。”[①] 后来，在作战的重要关头，统将们都以悬赏作为激励士气的重要手段。苏元春事后奏称：“查关前隘之捷，各军赏银二万两，楚军赏银一万两，系臣元春及冯子材、王德榜于临阵时许给；克复文渊赏银一万两，系冯子材许给；均经照数提发。又克复谅山省各军赏银三万两，系督臣原定之数，亦由东省转运照数解交。另有生俘斩馘法目、法兵功赏银两，均经查验明确，分别等差，按名发给，综计为数亦不下二万两。臣等随时散给，宣布皇仁，将士感激涕零，莫不欢如挟纩。”[②]

此外，冯子材还利用他当年人越援剿时的关系，发动边境中越民众支援作战。彭玉麟后来奏称：“冯子材三次出关，讨平越乱，恩威并著。此次统军赴龙，桂、越军民闻其至，若得慈母，称为冯青天。其军纪律最好，凡关外越人受法匪游勇之害者，关内民人受各军骚扰之害者，咸来赴诉；冯子材亦视若子弟，恻然矜闵，为之抚恤示禁，告诫诸军。越官、越民争为耳目，敌人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其军出关后，扶老携幼，箪食壶浆，来相犒问，愿供办军米，响导先驱，助官军剿除法人，长为天朝赤子。”[③]

通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就为援越桂军日后取得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条件。在其中，我们看到冯子材的重要作用。

与桂军的调兵遣将、秣马厉兵的紧张备战相比，法军的情况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早在攻下谅山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三十日（2月14日），

① 《中法战争》(4)，第468～469页。
② 《中法战争》(6)，第442页。
③ 《中法战争》(6)，第459页。

波里也在筹划增援宣光的同时，就有电建议法国政府考虑攻取龙州作质押品：如果政府欲于广西获得质押的话，占领龙州则是可能的，该处为中国军队的军事基地，与河内同等重要。大概得到法国政府的同意，也受尼格里顺利攻破镇南关一事的影响，正月廿六日（3月12日），已经击退滇军和黑旗军，为宣光法军解围后，波里也便把进攻龙州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向法国政府报告了他的计划：中国军队集中于龙州前沿阵地，据侦察人员报告，其兵力达四万人，俟全部援军（甚至有可能还要等候骡马）到达后，我便向中国的这个州府进击。五天后，他又向法国政府报告了更详尽的计划：我的计划是利用业已开始的第一次河水上涨之机，将云南军队从上游赶走，并将占领一个牢固的阵地，然后增援尼格里将军，以便在某一公路有可能通车，供给因而得到保证时，或第一批600头骡子抵达时，与他挥师顺流而下，直捣龙州。为使谅山在夏季获得安定，摧毁广西军队的军事基地，势在必行。自龙州起便可通航湛江，因此可能顺流而下驶向广州。我始终认为，只要带着足够的运输工具，尽管路途遥远，还是有可能到达该地的。

自从孤拔舰队在8月初袭击基隆以来，经过将近八个月的作战，由于各地清军的节节抵抗，侵华法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迟缓，没有达到它迫使中国屈服，从而勒索巨额赔款的目的。3月初，智穷力蹙的茹费理政府在和金登干谈判时只得作出巨大的让步，愿意彻底放弃一直要求的赔款，准备在《中法简明条款》的基础上和中国议和。就在等待清政府表态的前夕，受到波里也进攻龙州计划的蛊惑，法国政府指示东京远征军进攻龙州，企图拿下这个新的质押点，以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正月三十日（3月16日），波里也将法国政府的意图电告尼格里：

"部长通知我，正与中国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似乎是严肃有诚意的。他认为若能对龙州有所动作，派北非骑兵前去，将大有裨益。他要我尽可能在这方面做一下。我答复他，由于给养运输的困难，目前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你明天的行动能给中国军队以新的教训。你看一看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他们相信我们不久就要向龙州进攻。"同时，波里也还许诺给尼格里派去大批援军。由于相信尼格里一定会出击龙州，所以在第二天，波里也就冒冒失失地致电法国政府：虽然谅山法军的力量还不足以向龙州挺进，但我仍要求尼格里对此要塞施加威胁，使敌人形成一种害怕我军继续向前挺进的心理。

但是，尼格里格却认为很难满足波里也的要求。原来，当第一旅赴援宣光时，只带走隶属该旅的海军陆战队及阿尔及利亚步兵团，而给尼格里留下了东京土著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连，这就使第二旅的总兵力增加到四千余人。然而，尼格里这时管辖的地域却扩大了很多，除了文渊、谅山外，还有谷松、船头、郎甲、谅江以及互相之间的驿站，这就需要分兵前去把守。虽然尼格里尽量派东京土著步兵团去执行这些任务，但也多少要配给一些法国士兵。如防守谷松的警卫队，除了东京土著步兵的一个连外，还有非洲轻步兵营一个连、路塞尔炮兵连等；留守谅山也需要非洲轻步兵一个连和一个炮兵连。这样一来，尼格里手头掌握的机动兵力就只有二千多人了。在接到波里也出击龙州指示的前后，尼格里曾亲自到镇南关去用两天时间侦察桂军的阵地，他看到冯子材所部布防的关前隘阵地和驻在油隘的王德榜部的阵地，发现桂军人数众多，阵地强大、广阔，防守坚固，仅靠他手下的几千法军去进攻，"这将是真正陷入一种罗网之中"。因此，他深知自己手头兵力单薄而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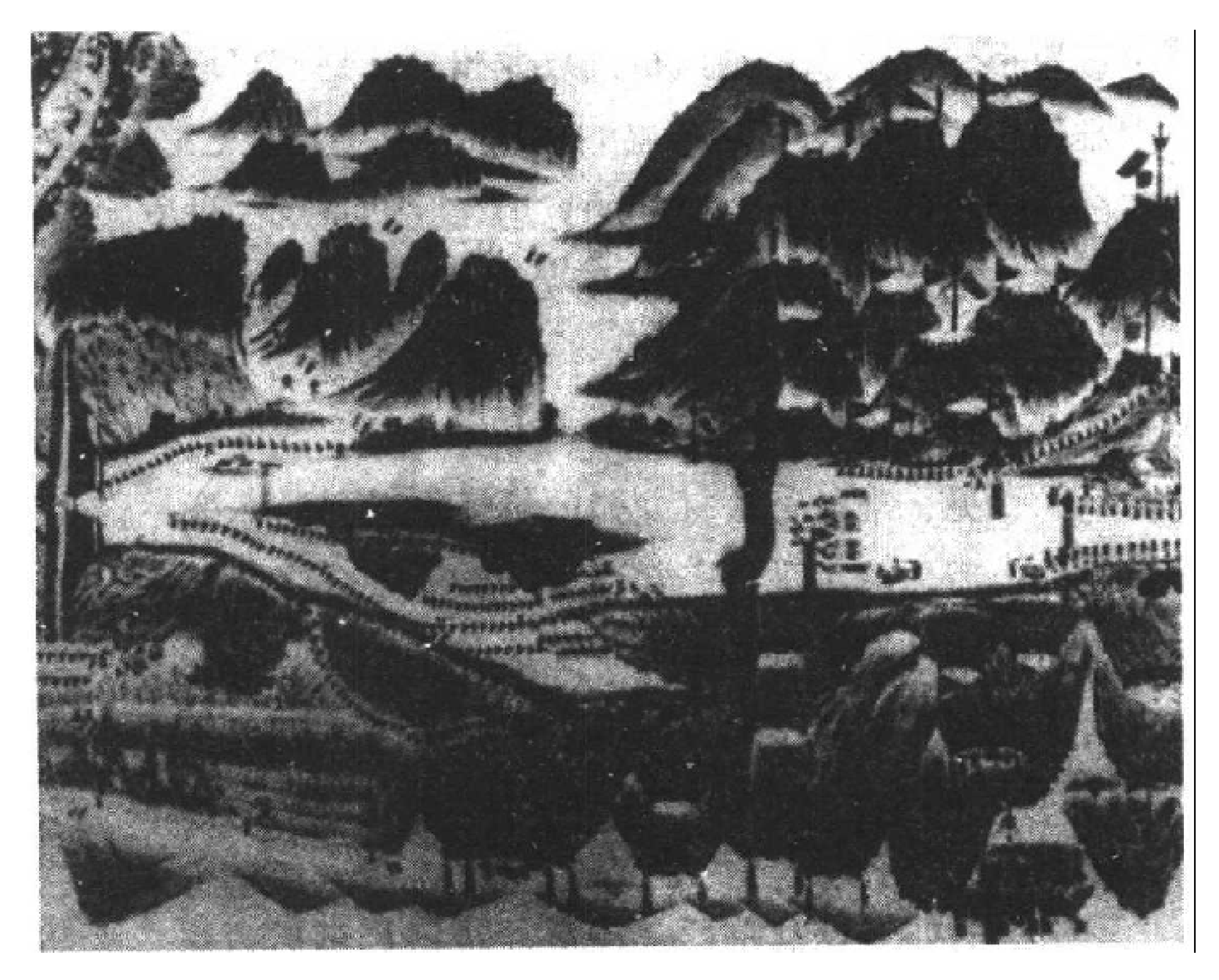
复电波里也，冷静地拒绝执行进攻龙州的计划：攻取龙州比谅山困难得多，如果没有两个旅的援军，这个计划太庞大了些。倘若部长定要威胁龙州，照我的意思，我们是玩一种危险的把戏。我的结论是，在我们现刻所处的地位，我们不应当取攻势。"在这种情况中，未得有增援军而采取攻势将是错误的。无论拿哪一种理由，现刻不能冒险招致失败。"波里也接受了尼格里的意见，准备把攻打龙州的事情推迟到他率第一旅从宣光返回谅山后再着手进行。在这时候，他完全忽视了尼格里来电中的一个后果严重的担心："如果他们进攻，我们便反攻，跟踪追入他们的一个阵地，在击溃他们后，随即回来。"①

三 镇南关大捷

尼格里的如意算盘是固守待援，待援兵到后再进攻龙州。可是，冯子材像看穿了他的心思，就以主动出击文渊的行动，打破了他的计划。

文渊距镇南关约十余里，是越南的一个州，那里并无城池，法军派有两个排在那里驻守，分散驻扎在三个炮垒里。冯子材曾报告于二月初五（3月21日）、六日（22日）率军出击文渊的经过说："……思为先发制人之策，初五日二更，当派萃字中、左、右三军各出五六队，并约勤军后应，知会楚军自由村隘会击。是夜四鼓，我军驰抵文渊，讵法于两旁高山伏贼数千，岭顶又筑三垒。我军弁勇奋不顾身，立破其二，惟石山高顶一垒坚甚未破。伏贼四起，枪炮雨密，萃、勤两军愈战愈厉。初六卯后，并分队由山后而上，贼始骇散。因天晚军饥，

① 《中法战争》(3)，第434～439页。



冯子材率卒勤两军驻关前隘，筑长墙扼敌。
敌由文渊三路进犯关前隘。

各暂收队，相机再取，夺获法匪枪械极多。是日，苏军亦来应援。先是，初五日，敝帮办派弁持令飞赴扣波督催萃字前军速来会剿。该军奉调，于是日辰刻亦由扣波进攻文渊之西，自辰至午，击毙法匪无数。亟欲进取，缘路远军疲，始行收队。楚军午后始到山顶，未能接战。"[1] 王孝祺也禀报张之洞称："初五夜，祺奉冯帮办令调八营七成队会破文渊。二鼓，祺派卑营务处潘镇先率四营同进，四鼓后，又亲率四营前去接应。黎明，经南关外两旁高山，遇夷伏兵数千，枪弹如雨，军不能进，祺坐马伤。各营受重伤者三十五人，又阵亡哨弁一、亲兵正勇十，枪毙该夷匪亦约百余。自本日卯初战至未刻，该夷坚

① 《中法战争》(3)，第 92 页。

拒要隘，将我前后截断，军饥疲甚，乃悬千金重赏，令所部新前、新正、副三营，各率精锐，由后山攻夺山顶，夷败退。”①

在这里，冯子材、王孝祺等称与清军作战的文渊法军有“数千”、“法匪无数”，可能过分夸大了清军的战果，因为此战在法方笔下，却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黎贡德在《法军谅山惨败》一书中写道：三月二十二日，早晨两点半左右，清军袭击了约有法军一连人驻守的同登（即文渊），战斗至四点半左右方才停止。“事实是中国军向我们的前哨进行夜袭。一个纵队从关隘大路，另一纵队则由油隘路前来。行进同登时，大约为避开我军的防地，后一路敌军下至河床，沿河前行。在一个时候，因为夜色沉黑，一个中国兵，定然是因想晓得自己的确在什么地方，燃了一枝洋火。但是，一队二十三团的四人组成的、由法尔贡排长指挥的哥萨克式的骑兵哨兵曾离开大哨，就驻在河的旁边。敌人纵队行动的声响使我们士兵警戒，洋火发出的光亮使他们看见敌人，他们即放出一枪。中国军见自己为我军所发觉，立即开始对同登攻击，他们这时距同登只不过五百公尺左右。我们的大哨加以回击。当初次枪声发生时，驻在村镇房子中的我们的士兵……明白这是敌人的攻击，于是十分镇静地走去据守围墙上所穿的炮眼垛口。中国军被这面的枪火和大哨的枪火挡住，不能前进；他们不久便退却，在地上丢下几具死尸而去。……在天亮的时候，一队相当多的敌军攻击在悬崖高处担任大哨的二十三团的法夫尔中尉的一排人，想将他们包围。中尉派出一队人，守卫很受敌人威胁的退却线。他们一直坚持防卫战，至九点，差不多没

① 《中法战争》(4)，第478页。

有弹药了，又看见敌人渐次逼近，乃向西边的堡垒退却，十一点左右到达该堡。”①

按照这些叙述，则清军所遇到的只是两个排法军的抵抗，那么，无论作战进行得如何，都不会十分激烈，更不会有“死伤极多”等情形出现。苏元春与冯子材有争功之心，在三月二十四日奏报军情时，就用低调描述了这次战斗：“冯子材料其必来图我，不如先发制人，一面分告王孝祺及臣元春戒备策应，一面挑派精锐，于初五日晚往袭文渊。四更，既入其栅，敌伏不动，而于两旁高岭先筑数营，环炮下击。勤军哨长蓝翎守备王金可中炮阵亡，萃、勤两部勇丁死伤尤伙，比及天明收队。初六日，复与接仗，相持至暮，互有伤亡。”② 彭玉麟等对冯子材的态度较好，但在四月初二日（5 月 15 日）的奏报中，也未过分渲染此事：冯子材“率王孝祺军于初五夜出关袭敌，山有贼垒三，安巨炮。我军已入街心，自五鼓战至初六日午刻，贼益盛。王孝祺马中炮毙，易骑战，率死士由山后攀崖而上，破其二垒，毙贼甚多。我军伤亡亦多。未刻，我军饥疲乃还。”③ 清军似乎并未占多少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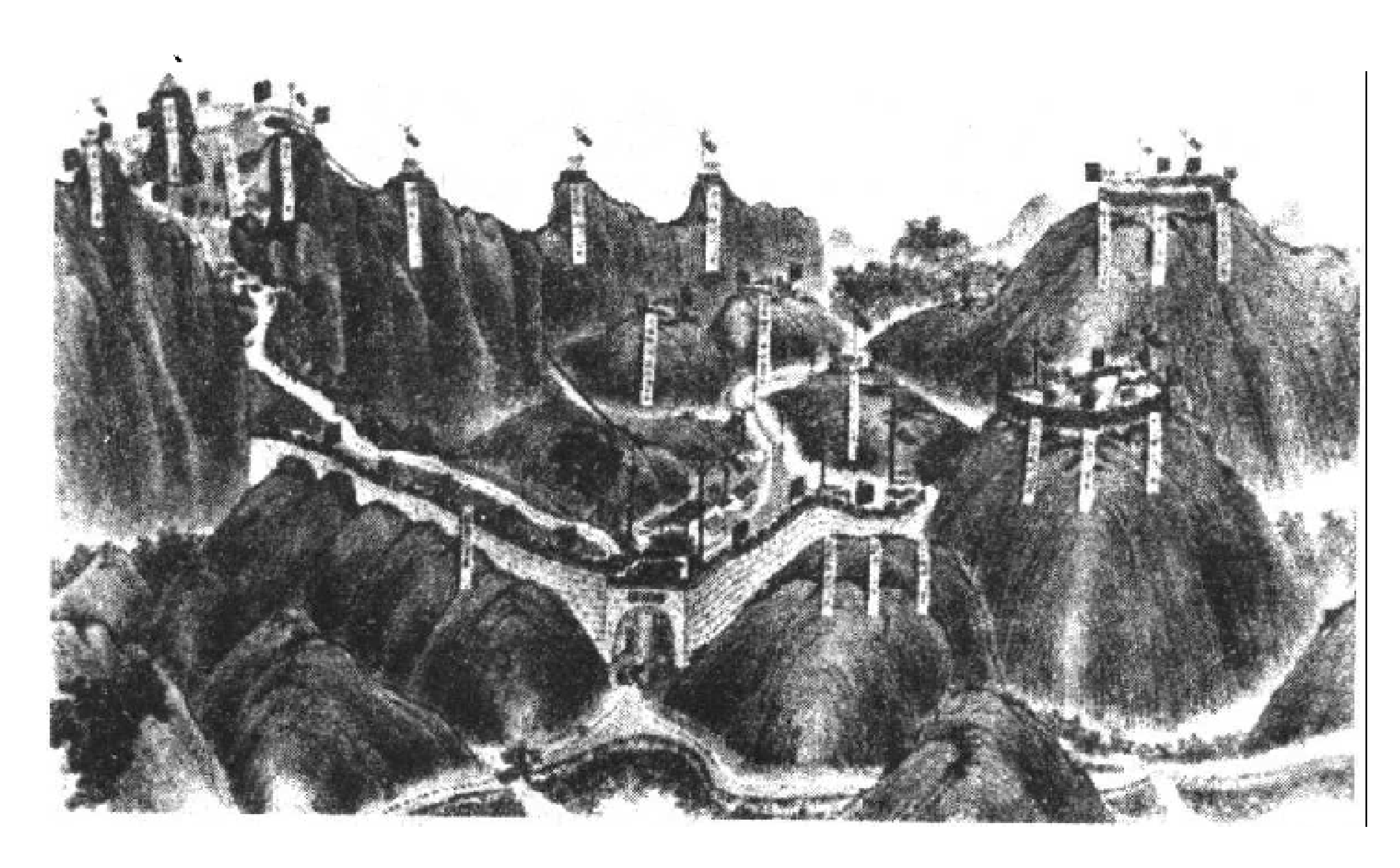
自己的手下败将居然敢来偷袭，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尼格里的自尊心；而清军以数千之众，日夜攻打只有法军两个排据守的堡垒，却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以致败退而去，暴露了清军的战斗力是十分薄弱的，这又增长了尼格里蔑视对方的心理，从而使他抛弃了原来的冷静态度，突然决定改变“固守待援”的计划，而匆忙召集军队，准备出发攻打清军。黎贡德写

① 《中法战争》(3)，第 441－442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438 页。
③ 《中法战争》(6)，第 455 页。

道："爱尔明加中校将以上的事件（即清军夜袭文渊）报告尼格里将军，将军指示军队带六天的军食，准备好在第一次号令下时立即出发。"经过一番努力后，尼格里集中了除了部署在文渊的二三团主力以及作为后备队、数达千人的外国人编成队第三营外，"一四三团共有四百四十人的一个营、一一一团共三百三十七人的一个营、外国人编成队共三百七十人的第二营所组成，总数为一千一百三十七名步兵，再加上萨克雪炮队。将全部的后备兵计算在内，全军的总数为二千一百三十七人及十尊大炮"。这点兵力与他将要交锋的清军相比，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中国军队"数量上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他们所占据的阵地是十分坚固的，有十分好的工事，所以，只为着使我们士兵出现在龙州大路上的简单欲望，决不是使尼格里将军决定牺牲士兵冒险作战的充分理由"。那么，尼格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黎贡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尼格里将军带了这么少的人马，怎样去做这样可怕的冒险事呢？在数天前，他不是用一种不受理的理由去答复政府表示要他向前进攻的希望吗？"对此，黎贡德自己回答称：是清军的主动袭击文渊的行动改变了整个事态，这意味着清军准备主动进攻。"但情势刚刚改变了，他已不是事态的主人，而是被逼居于被动的地位了。"①冯子材的诱兵计取得极大的成功。

冯子材知道，在袭击文渊以后，法军决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也做好了迎敌的准备。关前隘地形奇特险要，中间是一条宽不到两丈的狭窄土路，两边高山夹峙。西边的山叫凤尾山，东边的山叫大青山，都有二三十丈高，山上云雾缭绕，树木繁茂。

① 《中法战争》(3)，第442～444页。



镇南关清军布防图

凤尾山向南逐渐倾斜，低到接近平地的地方叫龙门关，与镇南关西边峡口的右辅山遥遥相对。大青山也向南倾斜，连接由五个小山峰组成的小青山，小青山再向南延伸，与镇南关东边的马鞍山相连。东西两边的高山还延伸出一些低矮的丘陵，横七竖八地起伏着，成为关前隘的一道道屏障，称为横坡岭。东西高岭之间是一个狭长的山谷，宽二三里，长四五里，到处是未开垦的荒地，藤萝蔓生，八角树长满了整个山谷，只有几户山民零零落落地散居其间。小青山和凤尾山从东西两面各伸下一条横岗，互相连接，横截山谷，形成一个山隘，叫做隘口。一月间冯子材指挥萃军将士在隘口筑起一道长约里，以土石紧密固砌的长墙，横过山谷，截断关道。长墙高七尺，底厚丈余，上面满布雉堞，以供士兵向外观察和射击之用。长墙向外一面开有若干棚门，以便军士进出，取名为先锋棚，墙外还挖有一条四尺宽、五尺深的堑壕，是预防法军攀爬长墙而设。在长墙

的后面约一里处，又筑有一条与长墙平行的简陋土墙，土墙上开有一些栅门通向后方，军士进出均凭腰牌令箭，取名叫栏冈栅。守军则驻在两墙之间，里面除设有营帐、仓库外，为了避免法军炮火的杀伤，冯子材还要将士挖了二三百个地垒，即在地下四尺深处挖一条条坑道，坑道宽六尺，深五尺，曲折成形，每距六尺开一垛口以供出入，两个垛口之中酌留原土以作间隔，高与地平。战时，每垛约驻兵十人，如法军放炮，则士兵躲入坑道内，炮火过后再出守雉堞。由于坑道深藏地下，即使炮弹落下也难炸透伤人，就是偶尔落入坑道中，因为坑道曲折，又有垛口相隔，伤亡的只是一垛人，而不会伤及他垛。

冯子材亲率萃军九营分扎长墙一带，勤军八营分扎萃军之后，各营相距不过半里，形势极为联络。大营即驻在墙内半山，距墙不及 20 丈。从文渊回来后，冯子材加强了防御，派出一支军队去防守关前隘前面的横坡岭，“查南关二里许左手之横坡岭，正法匪入犯必由之路。初六收队后，即派督带萃字左军各营副将衔尽先补用参将梁振基、管带萃字左军左营拔补把总黄万桂，各率所部筑垒扼扎，以当前敌”[①]。

二月初七日（3 月 23 日）早晨，尼格里率领法军出发，于 8 时半到达空无一卒的镇南关。这时，晨雾弥漫，不易看清前面的东西，“尼格里将军命令部队在关口后面整体结队，等待他作侦察，给军兵以指示。东京冲锋兵即停在关门边，较向前推进的骑兵，不久即与敌人接触。敌军的哨兵开头乱放阵枪退却了，继则穷途反噬。我们的两名下级军官，曾进至一公里远，为敌人所追逼，不得不半路折回。其中一人的马受了伤，

① 《中法战争》(3)，第 92 页。

落在稻田的泥淖中，骑兵没有办法，只得丢了马，自行逃命"[1]。冯子材关于此战则称："初七辰刻，垒尚未成，贼遽来攻，法弁三骑先，大队在后。我军击毙其二，并夺获洋马一匹。"[2]

法军的先头部队虽然遭到打击，但战斗并未因而立刻开始，因为大雾未散，不利于开展军事行动。法军只是趁此机会，把后备队调到镇南关来。10 点半钟，大雾开始消散，尼格里指挥法军进攻清军阵地。他命令由法列指挥的一四三团的三个连，担负攻打大小青山清军阵地的任务。他们采取的仍是法军的传统战术：即先炮轰对方阵地，然后才由步兵发起冲锋去夺取对方阵地。依靠这种战术，一四三团虽然很顺利就赶走了路上的一些清军，但在继续向小青山上的第一二号堡垒发动进攻时，却遇到了麻烦："地势的种种困难及这一连串的行动，使他的攻击迟延了很久。所以外国人编成队的第二营反占先了，这营将兵攀登与大路相接的斜坡，因而由最短的路径，接近了敌人这个阵地。"到下午两点，法军占领了第一二号堡垒。尼格里闻知后，赶到二号堡垒，并调炮兵前来堡中，又派出一四三团的一营追赶溃退的清军，部署进攻第三号堡垒。当法军执行这些命令时，才发现他们面临的是十分复杂的地形："从他抵达的地点上看，则该地地势和敌军的营寨了如指掌，四面坡度很陡峭的山峰耸立，从某些地方看来，这些山头似是组成连续不断的山脊，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因为有很低的山隘把它们分开来，如果炮兵要前进，必须先爬上山头，直至峰顶，然

① 《中法战争》(3)，第 445 页。

② 《中法战争》(3)，第 92 页。

后再降入山底，而山底又茂草丛生，阻碍前进。”尼格里的意图，是由一四三团夺取大小青山的清军阵地后，再居高临下地从背后袭击相距约三里的长墙。然而，当法军费用尽力气攻下三号堡垒后，天色已晚，无法再战斗下去，一四三团遂在新占领的阵地扎营过夜。

与此同时，尼格里命令一一一团从大路前进，先攻取横坡岭的清军阵地，然后建立一个可以轰击长墙主阵地的炮兵阵地，与一四三团配合，从正面进攻长墙清军阵地。一一一团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后才夺取横坡岭阵地，逼近了长墙，但却无法找到适合的炮兵阵地。这时，“黑夜袭来，一一一团适在有林木的洼地中，浮尔司令认为军事行动已完全终结，因为战斗渐渐向前面及右翼远开了，所以他决定爬上山谷右边的斜坡，以便与旅部主力会合。这种行动让大路空无人守，对于明天战事的结局发生严重的后果”。

按照尼格里的计划，在一四三团和一一一团的这些作战成功后，尼格里“便将令据守山谷谷底的一一一团，从正面攻击那道巨大战壕，同时大堡的一四三团也从背后进攻大战壕，使敌人无法坚守。敌军壕营的其他堡垒，至少在山谷右边的那些堡垒，因极临近有林木的大圆丘，是以必须急速攻夺”。但是，这天的战斗并未达到尼格里的预期目的。在进行这些战斗时，法军仅战死 4 人，伤 25 人。据法方记载，当法军进攻大小青山及长墙时，驻守油隘的王德榜部曾出动前来援救，“油隘的中国军出现在我军的右侧。他们人数很多，从阵地走出，拥蔽诸山脊，从离我们队伍二千五百公尺的地方，发出很激烈的炮火，他们向青空中射击，当然没有生出什么结果。末后，在五点半左右，一队人数颇多的敌军沿同登大路向前推进。寿非司

令命令他的第四连加入阵线，填补第三连和第二连间的空隙。那时，第三连驻扎镇南关上的堡垒，第二连在油隘大路所通过的第一个山隘上布阵。五点左右，这第四连对着距一千公尺和一千二百公尺的地方，发出密集的枪火，立即阻止了敌军的移动。尼格里将军从他所在的地点上望，看见敌方的行动，让萨克雪炮队以榴弹向敌人射击，他命令罗北上尉带了一组炮队，向原路回来，归寿非司令使用，……六点半左右，中国军为我方的密集枪火及萨克雪炮队所阻挡，转回他们的营地去了”。不过，法军注意到油隘清军行动上的一个变化：和以往清军战败即逃的作风相异，“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天朝的军兵并没有逃走，他们转回原来的阵地，他们在阵地据守对我方有严重的不便：把旅部所有的后备兵吃住不能移动了”。[①]

冯子材关于这天的战斗则是这样奏报的：

该匪立分三路来犯我军，敝帮办饬令各营及王镇勤军一面出队分击，一面飞调扣波之萃前、后两军，又知会署广西提督苏元春、统领楚军王藩司各出队伍，或自后接应，或在前包抄，或从旁截剿。萃、勤各营齐出长墙，分投迎战，枪炮环施，毙匪数百，我军俱有伤亡，管带萃字右军前营补用守备陈之瑞被贼枪伤。未刻后，苏军赶到，适法匪分股绕上长墙东岭，苏军亦上岭拒敌。法大股又逼长墙，势如潮涌，声震山谷。敝帮办与苏提军、王镇当即会商，立悬重赏，指挥奋击。由巳及申，枪炮愈厉，战至初更，法始收队，我军更番食饭，连夜登山，据墙扼守，

① 《中法战争》(3)，第445～451页。

严阵以待，未敢歇息。[1]

彭玉麟等则奏称：

初七日，法果悉起谅山之众，并力入关，直扑关前隘长墙，攻广军营垒。冯子材告诸军曰："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王孝祺以淮军为龙州人所垢病，诸军多轻之，愤甚，皆誓与长墙俱死。法以开花炮队循东西两岭进，向下轰击，以枪队扑中路。法谓越人皆冯内应，自以真法兵居前，黑兵次之，西贡洋匪又次之，教匪客匪在后。炮声震天，远闻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鸣，枪弹积阵前厚者至寸许。我军殊死战，伤亡多。东岭新筑五垒未成，为敌攻踞其三。王孝祺自率小队抄敌后仰攻，敌稍却。战至申刻，苏元春援军至，合力拒战，诸军竟日不食，至夜仍未收队。是日，王德榜自油隘出军夹击，据文渊之对山，与战鏖斗数时，互有伤亡。遇贼运军火、干粮之驮马无数，逐之，皆返走，法粮械遂不得入关。[2]

潘鼎新、苏元春则对冯子材的贡献估计不足，因而，在他们的奏报中，有意无意地夸大萃军的困境，而渲染苏元春率队及时援救的功劳。潘鼎新二月二十七日（4月12日）奏称：

初七日辰刻，法分三支进犯，以两支攻冯军左手横坡岭炮台，以一支直犯关前隘。冯子材、王孝祺各出军分击，一面飞调驻扣波之杨瑞山、麦凤标拔队前来协剿。苏元春得报，亲督陈嘉、蒋宗汉、方友升各军所部，驰往援应。该逆势甚凶猛，将冯军所筑横坡岭炮台四座夺踞其

① 《中法战争》(3)，第92～93页。
② 《中法战争》(6)，第455页。

三，居高临下，燃炮对击，冯军几于不支。苏元春督队登山，抢入第四座炮台；该逆拼命猛扑，苏军抵死不退，游击吴芳儒中炮阵亡，勇丁伤亡百余人。冯军凭壕扼守，萃字右军前营管带守备陈之瑞受伤，仍不少却。法逆大股紧逼长墙，势如潮涌，枪炮声震山谷。苏元春、冯子材、王孝祺合力往来指麾，更番攻战不息，至晚，法始收队。料次日必有恶战，相率露宿，连夜补修营墙，严防以待，飞商王德榜设法抄击。①

在这里，王德榜军出击一事被抹杀了。后来，张之洞曾致函冯子材批评潘鼎新此奏的偏颇：

西省所奏最怪谬者，在冯军失去炮垒三座，他军夺回一条。然此潘前院初次电奏之语……鄙人当时阅潘此电，深为不平。夫冯军只有枪，并无炮，既无炮，何有台？不过法匪大队初来，先锋乍筑未成之三垒为贼所踞，此大战所常有。西电必欲先坐东军以失台，归功于西军之复台，未免挟私虚诞。②

苏元春在三月二十四日奏称：

初七，（敌）大股直扑关前，萃军先锋炮垒新筑未成，遽为所夺，凶焰甚张。及臣赶到，督军合力抵御，歼其党众不少，我军损折亦多。维时前福建藩司王德榜统领定边楚军，从由隘来助，行距文渊八九里，侦知萃军先锋营失，立即挥队折回，向南关一带抄截。提督张春发翻过山坳，见南关道有法众数千，骡马二三百匹，驮有军火，即

① 《中法战争》(6)，第394页。
② 《中法战争》(4)，第525页。

时带队冲击。其众接战，遂驱驮运退后。王德榜督饬各营奋勇直前，毙敌无数。而敌攻关前隘诸营愈猛，至夜方休。冯子材戒饬将弁，严阵以待。臣亦预调提督蒋宗汉广武军及方友升亲军各营齐至。[①]

尽管这一天的作战结果并不如所预料那样成功，但法军毕竟攻占了原由清军踞守的大小青山的三座堡垒，只要再攻下一个或两个清军堡垒，法军就可以居高临下地威胁清军的长墙工事，摧毁或攻占长墙就是轻易的事情。到那时，法军又可以重演追着清军的后面前进、不断攻占地方的喜剧。面对着如此辉煌的前景，使得骄狂自大的尼格里忽视了清军的一个重大行动，即源源不绝的援军正从后面开上来，并迅速加强各防御阵地，从而形成了对法军的绝对优势。这样，当天清军作战稍处下风的情形，倒成了吸引法军继续攻击的绝妙诱饵。尼格里反而指示法军，第二天仍照原定计划两路夹攻长墙。

夜间，作战了一天的法军疲劳极了，都忙着找地方休息。而法军的运输队却活跃在同登到镇南关的大路上，为的是要把翌日法军进攻所需弹药运到各出击点。但是，由于法军宿营地点的变动未能及时通知运输队，所以，法军运输队作了很大的努力都不能完成任务。

由一位副官带领，输送军火向前出发。这位副官走了很久，总是希望得碰到一一一团的队伍，但是，在上面说过，这团部队离开了大路上二号堡垒去了，以致大路完全无人据守。在某一个时候，副官觉得自己走得太远了，向原路折回镇南关，他把输送的军火放在那里，继则于午夜

① 《中法战争》(6)，第438～439页。

到达同登。杜宾上尉于是认为兵马都过度疲劳了，不能随即转回谅山，乃将转回谅山的日期延至明天早晨，不幸，这样一来，军火就不能及时运输至战场上了。……在最前线突进的一四三团的三连人没有弹药了，他们派出向二号堡垒领取的搬运人员，由海军陆地炮兵的嘉尔顿上尉率领，从这里向大路上指定军火应当放下的地点去。经过很久的找寻后，这位军官终于获悉，军火是放在镇南关口，搬运工人当然定要向那边去领取。所以他们差不多走了整夜，直至早晨五点，他们才回到原地来。这件意外事故的第一结果，便是迟误了一四三团的向前进军，因为子弹的分配需要相当的时间。[①]

与法军的紧张备战相应，清军也没有闲着。据郁启模《冯宫保事迹纪实》一书载称，冯子材和苏元春曾就防务问题有过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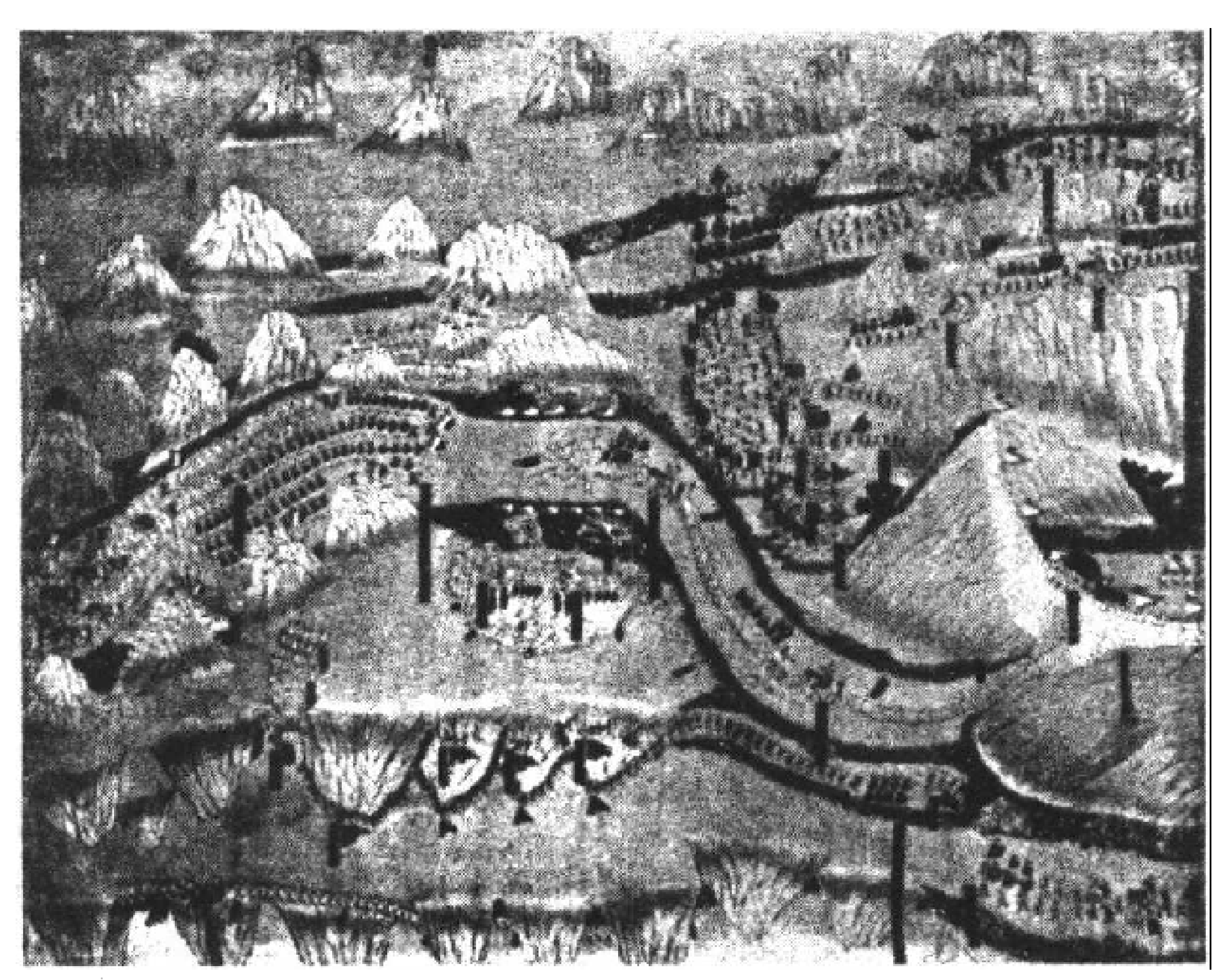
是夜，公在长墙上督军防守。三更后，苏子熙军门到来相议，从容谓公曰："我军子药将尽，倘使再战一日，势必不支，有败无胜。不如乘此黑夜，敌人不来，两军不妨暂退。公守凭祥之西，我守凭祥之东，再图恢复。"公曰："贼与我相距不过二里，我退彼必追来，有此长墙尚不固守，凭祥东西岂能拒贼？再有败退，不独左江一带均为贼有，即粤西全省恐亦不免震动，既无以对朝廷，更何颜立于人世？若谓子药欠缺，我已飞差赶解，不久可到。今我誓守此墙，决不舍之而去，倘有不讳，此地即我之终身矣！君既畏贼，请即自去，无乱军心。"左右闻公此言，

① 《中法战争》(3)，第451～452页。

莫不感动，且有泣而下者。苏军门见公如此，不觉大悟，亦愿相从杀贼，不敢另生他念，遂相与坐待天明。[1]

冯相钊所撰《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写道：

是夜战地严紧，先君逆料明日敌必增兵踞东岭，施炮下击。乘夜令千里马持檄，飞调驻扣波革字前军督带杨瑞山、后军督带麦凤标率其部，准于初八日，准到东岭外进攻法军之后，俾解东岭之危。又函调王德榜自油隘绕出镇南关，截击法兵辎重，并扼敌归路。是夜，先君露宿于长墙，三更时，苏元春来晤谈日间战事，乃从容云：我军子药将尽，将士伤亡，若待明天再战，或有不支，恐难得胜。不如乘此夜色，敌不觉，何妨暂退。老人家守凭祥之



抗法将领苏元春主持绘制的关前隘大败法军图

① 转引自《钦州文史》(5)，第278页。

西，我守凭祥之东，再图恢复。先君谓：敌与我相距强得二里，我兵退步，岂无知之？长墙尚不固守，岂他处便可战守？若云子药不足，我已飞令军火局蔡其铭解来，不久自到。但敌枪锐我枪钝，势难以钝争胜，莫若因陋就简，以大刀、钢镖、火药煲齐起冲杀，直捷痛快，胜算可操。况我帝胄，同怀不甘受辱之心，时欲杀却番奴为快，有如此奋发之士气，我辈秉握军权，正可因势利导，善以用之，区区法颅，不足一斩。昨经悬示赏格，获法兵首级一颗，赏银一百两；一画法酋首级一颗，赏银百五十两；二画赏二百两，三画赏三百两，四画赏六百两，五画赏一千两，按级升官。重赏之下，当有勇夫，无有不大胜。我已饬独当中路之督带冯兆金、管带冯桦等，明日接战，须待杨、麦督带两军已至东岭外击敌时，便以退为进，随战随却，诱敌入我阵地，合围杀之，自有胜法。惟东岭敌人大炮足为我患，明日务须聚群力夺其大炮，驱之下山，自可无虑。倘或战败，此长墙即我报国之地也，早已嘱知两小儿矣。如老哥不以为然，请自去之，此间乃军法地，幸而勿扰乱军心。元春闻言便云：老前辈既以身许国，晚生当随左右，尽力杀贼。遂相与坐守长墙，而待天明。[1]

虽然这两段记载相似，但我们却怀疑其真实性。第一，是这两段记载仍有详略不同的差别，说明其中有相当大的随意性；第二，是其中一些说法并不符合逻辑，如苏元春是在初七日的作战将近尾声时才赶达关前隘的，随军应该带有相当多的弹药，而不应有子药将尽的顾虑；第三，是当时清军阵地聚集

---

① 转引自《钦州文史》(5)，第304页。

了全军的主力，对法军已形成了绝对的优势，与法军曾多次交手的苏元春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更不应该有畏敌情绪；第四，据苏元春记称，他率军赴援关前隘时，广西巡抚潘鼎新也随军前往，是否撤军之类大事，应该首先请示潘鼎新才是，而不该是两个副手的私下商议决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奏牍都没有类似的记载。所以，这些记载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初八日天明，决战开始了。尼格里仍然采取两路分进合击的战术。其中，他命令爱尔明加中校应带一四三团和东京冲锋兵，乘浓雾遮复山野的机会，攀登大山顶，要不为敌人看见而突如其来地落在防守大堡的敌军阵上。早晨7点钟，爱尔明加率军出发。"他并不一直向大堡进攻，他绕道由东边挨向前去，他想在这方面找出一条路径，但找不出来。他到了一处洼地的边上，如果他要达到目的地，就必须经过这洼地；但这处洼地的斜坡是十分峻峭，实在是不可能走下去。他试了几次，但都不成功。他于是停下来。浓雾不许他从大堡的关系上去明了他所在的地点。他乃打定主意从原路回去，试作直接的攻击。他将他努力的企图不能成功，报告将军；但因为地势的难行使交通十分困难，所以将军获得这件意外消息的时候已经过迟了"①。

而当爱尔明加带着他的士兵在大山中转圈时，急于取胜的尼格里却误会他已经偷袭成功了，"尼格里将军一自早晨起，因未曾听到大山头方面发出一响枪声，所以他以为爱尔明加中校所要走过的地方只有一千二百公尺，必有充分时间夺取大

① 《中法战争》(3)，第452页。

堡，并已是无抵抗地进入大堡了。中国军像他们在多次的情况中所做的一样，定是已利用黑夜撤出了大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继续实行他拟定的作战计划，那现在便要夺取山谷下面的敌军阵地了。他下令要炮兵对这群防御工事开火，以便利一一一团队伍的攻击”。

但是，由于大雾和所处地势不利等原因，法军炮兵对长墙的轰炸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可惜，我们炮兵只看到防御工事的一半，只有一些榴弹得以命中。此外，炮兵的阵地高，不能不对目标作俯瞰射击，因而给敌人较少的危害。所以防守军并不受炮击的损失。他们对于据守左边山脊的多数中国军亦加以射击，但不能阻止敌人的移动”。炮击过后，据说尼格里这时又犯了一个判断上的错误，即把清军增援大清山的军队误认为是爱尔明加所率法军在完全占领大小青山后，正按原定计划向长墙背后绕袭，因而急忙命令一一一团向长墙发起进攻。“接到命令时，浮尔司令布置好进攻的准备。但他很感到，在墙垣后面，有众多的敌军，他们的士气因看到我们的炮火无力未能命中他们，而更加旺盛。他手下只有二百四十人，要冲进一座五百多公尺的防御工事，又要对抗一千多的中国军，敌人占住左边的山脊，又可以从侧面攻击他；后则他只有单独一连与敌人相周旋。所以这次的进攻是坚苦的，但现在没有迟疑徘徊的余地，因为要援助爱尔明加中校。他没有等待快跑前来的波埃希连，并决定进攻目标如下：威狄埃连（第二连）攻阵地的中央，嘉宁连（第一连）攻右边的堡垒，马雅连则留作后备。前锋的两连跳跃地前进，并利用地形的阻碍物作掩护。他们直抵岩石尖突的前面。他们在那里停留一刻，暂作休息，因为他们这时有了掩护，不受战壕枪火的损害，而且直到目前.

这方面的枪火亦并不激烈；波埃希连这时前来相会。一一一团已向前急冲了，不幸已不可能让他们停住。”①

这时，尼格里才得知他所寄予厚望的爱尔明加除了浪费时间外，并未完成交给他的作战任务。结果，就只有一一一团在单独进攻数量庞大的敌人，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惨败就不可避免。要援救一一一团的惟一办法，就是一四三团迅速夺取早应夺取的大青山最后的大堡，为此，尼格里调炮队前去加强爱尔明加的兵力。爱尔明加虽然作了努力，但劳而无功，得到加强的守军顽强地顶住了法军的进攻。另外，尼格里还把他手上所能动用的兵力前去援助一一一团，还在一一一团可能撤退的路上安排了接应的部队。

一一一团的法兵仍然认为一四三团已顺利地夺取了大青山的制高点，并正从后面绕攻清军，战事将按尼格里的计划进行，以致把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清军误认为是配合他们作战的一四三团，“所以定要不顾一切牺牲夺取这道战壕，与他们会师”。于是，浮尔司令将部下的四个连兵力分为两部分，两个连对付侧翼和背后的敌军，自己亲率另外两个连向长墙发起冲锋。“士兵们把军袋放在地下，拔出刺刀，在敌人猛烈炮火之下，英勇地直抵敌人防壕的下面”②。

只要想到法军面对的是严阵以待、几达二三万人的清兵，那么，这三四百法军的冲锋进攻意味着什么，就很容易得出结论来。战后，各统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场决战。冯子材主要谈萃军的作战情况称：

① 《中法战争》(3)，第453～454页。
② 《中法战争》(3)，第456页。

初八辰刻，萃、苏、勤三军复分队前往开仗。正大战间，适敝帮办添调扣波之前、后两军内管带萃字后军前营拔补千总陈荣坤带队先到，管带前军左营都司刘积璠次之，管带后军右营都司冯绍珠又次之，其督带萃字前军杨游击瑞山、督带萃字后军麦都司凤标亦由摩沙陆续抄截而来，统领楚军王藩司亦自隘夹击而至。大战数时，均有擒斩。午后，法匪分路猛扑我军，所用炸炮不下千计，山岳震动，风云变色。又另股匪仍登左手高岭，苏军御之。又分一股以犯我军右岭，当经督带萃字右军各营补用副将冯绍金、管带萃字右军左营补用守备冯桦、管带萃字右军右营拔补千总陶烈武、分带勤军总兵潘瀛，各率劲勇，由上击下，毙贼甚伙。法仍未退，其大股迳扑长墙者，经敝帮办往来墙上，亲自督率员弁，指挥奋击，愈战愈奋，各弁勇等跳出墙外，纵横荡决。萃字前后两军陈千总，刘、冯二都司等，又复自外击剿，二面夹击，毙匪千余，擒斩数百，并夺取枪炮、干饼不计其数，追至关外，入夜方行收队。[1]

苏元春则从强调自己的指挥功劳的角度奏称：

初八清晨，敌分三股来攻，每股二三千众。臣与冯子材力守长墙，派陈嘉、蒋宗汉、方友升、陈桂林、王孝祺各率所部，分应左右两路。法人炸炮动以千计，声震山谷，子如雨落。诸军奋呼迎敌，不避凶锋，敌多坚拒。突有悍党拼命抢濠，直欲冲入长墙。臣与冯子材立悬重赏，激励将士，指挥奋击。我军勇气百倍，争欲立功，勤军哨

① 《中法战争》(3)，第93页。

长花翎都司刘治鳌、许炳煊首先陷阵，击中法目数名。正在割取首级，刘治鳌忽为炸炮中脑，许炳煊忽为枪子穿胸，登时殒命。诸军气愤填胸，无不一以当百，纵横荡决。敌势不支。于是臣与冯子材亲督各军，大开营栅，一拥而出。敌众中枪纷纷倒地，自相践踏，死尸山积，余皆败溃。我军从后追奔，杨瑞山督带五营适由扣波调回，抄出摩沙，沿途拦截，综计歼毙千余，擒斩数百，夺取枪炮干粮无算。陈嘉督军左岭，正与炮台踞众力战，王德榜从甫谷横出其后，敌势遂分。陈嘉亟饬各营争抢山顶炮台，蒋宗汉、陈桂林及副将李应章等身先士卒，一鼓而上，夺回先锋炮垒。王孝祺击败右路一股，亦与左路并力夺台。综计阵斩三画及一二画法目首级二十余颗，法教各党三百余颗。各军乘胜追出关外，敌仍退入文渊，时已二更，即行收队。是日，王德榜所部楚军将近南关，遇敌驮运军火骡马，张春发等督队拦击，毙敌甚多，夺获骡马五十余匹。其前队知军火已无接济，移枪回击楚军，张春发督军力拒，提督杨文彪、肖得龙、吴次汉，副将周文斌等，并力协助，游击王荣胜、守备欧福升持枪步战，敌尤惮之。各将弁奋不顾身，争先夺回失垒，游击冯兴贤欲夺他营，甫近墙边，被炮击中左膀，负伤退回，其垒遂为镇南营所得。王德榜督军进剿，直至文渊。①

苏元春又在战后作《中法战图》呈报清政府，其中在《法攻关前隘我军战胜大捷六图总说》中写道：

初八日清晨，敌分三股来犯，每股二三千众。潘巡抚

① 《中法战争》(6)，第439～440页。

亦率亲军各营来。提元春与冯子材力守长墙，派陈嘉、蒋宗汉、方友升、陈桂林、王孝祺各率所部分应左右两路。法人炸炮一排千响，声震山谷，子如雨落。诸军奋呼迎敌，不避凶锋，敌亦坚拒。突有二三画法目带众拼命抢濠，直欲冲入长墙。元春与冯子材立悬重赏，激励将士，奋勇直前，无不以一当百，纵横荡决。敌渐不支，于是元春与冯子材督军大开栅门，黄云高、冯相荣等带队一拥而出。法众中枪，纷纷倒地，自相践踏，死尸遍野，余皆败溃。当饬各军从后追杀。冯子材调回杨瑞山、麦凤标由摩沙抄出击敌。勤字营统领王孝祺、萃军右军冯兆金自关右高岭会同抄下截击。勤军营务处潘瀛分击左路一股，计歼毙千余，擒斩数百，夺取枪炮干粮无算。陈嘉督军左岭，各营管带正与法众拼力死斗，振臂一呼，递次第夺回萃军所失三垒。蒋宗汉、陈桂林、李应章等身先士卒，尤为勇敢不挠。维时王德榜督饬分统张春发、杨文彪带队从关左高岭横击，毙敌甚多，夺获骡马五十余匹，随饬各军乘胜追出关外。……各军亦伤亡四五百人。其第一图的标题即为：潘巡抚、苏提督出队往援关前隘。[①]

彭玉麟等则大力渲染援桂粤军的战功，于四月初二日奏称：

初八日清晨，复大战。贼来益众，炮益紧。冯子材居中，苏元春助之，王孝祺当右，陈嘉、蒋宗汉当左—左路即东岭，敌炮最猛。冯子材与诸统领约，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复于各路设卡，以截杀逃者。冯子

① 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

材、王孝祺各刃退卒数十人。贼势狂悍致死，已薄长墙，或已越入。冯子材年将七旬，短衣草履，持矛大呼，跃出长墙，率其两子冯相荣、冯相华搏战，将士齐开栅门涌出。诸军睹冯子材如此，无不感奋。关外游勇客民千余，闻冯子材亲出阵，皆自来助战，伺便随处狙击；冯军扣波五营，自关外西路来夹击其背。于是诸军合力死斗，短兵火器杂进。王孝祺部将潘瀛率选锋袒臂裸体冲入敌阵，故所部勤军伤亡最多。陈嘉争东岭三垒，蒋宗汉继之，七上七下，陈嘉受四伤不退。至酉末，王孝祺已将西路贼击败，亲率军由西岭抄敌后，与陈嘉等合击；而王德榜之军亦自关外夹击东岭之背，遂将三垒全数夺回。是日，王德榜自清晨出军甫谷待敌，援贼至，率队冲之，贼截为二，援贼因回枪击德榜军。我军奋击大胜，部将张春发、肖德龙战最勇，毙法酋、法匪甚多，余众败走，获其骡马五十余匹，所驮皆枪炮弹、面饼、洋银之属。德榜遂自外夹击东岭，夺还三垒。法鏖战两日，弹码已尽，而后队军火被截，惶惧无措，顷刻间炮声顿息，遂大溃。我军任意斩杀，贼翻崖越涧而窜。教匪路熟先逸，法兵多歼。此战所毙真法兵、黑兵千余，法酋数十，客匪教匪数百，逐出关十里而还。是日，冯子材、王孝祺身畔屡有开花炮子坠落未炸。①

王孝祺则多次电告张之洞，谈勤军作战情形：

初七辰初，法逆在南关架炮，渐进关前隘，有众万余。祺会冯军迎击，枪弹落地寸余。午后，直扑我军新筑

① 《中法战争》(6)，第455～456。

长城山顶，贼炮无虚发。战至酉中，冯军未整，苏军甫至，祺亲冒火弹，带奋勇小队百人由僻径穿敌后，令卑部各营分三面仰攻，枪毙敌约数百。山顶敌见，开炮接应，力不支，退下。戌初，仍同冯、苏两军接战，敌益奋力猛攻，卑部八营未收队，当夜查阵亡弁勇百余，受重伤者数十。初八晨，敌逼幕府前二里。祺奋不顾身，率部堵御。长城外数里，四山皆敌，燃炮轰天。彼此鏖战三点钟之久，突有真法鬼千百余人当冲直犯，将次闯入长城。祺当派卑部新前、右、新正三营，挑选精锐，力遏凶锋。阵斩一画一、二画二、三画八、西贡匪数十，枪毙无算。夺获枪械、衣物甚伙。此战阵亡哨弁二，勇数十，受伤弁勇亦多。……本日自晨至申，卑部各营每枪打三百余码，枪热如炼，间有轰开无用者。长城东首高山头九，连日敌夺去三，午后卑部两营与王、苏二军合力进攻，数得数失。酉末，祺亲自抄敌后路，各军齐上，全数夺回。山坳余虏仍坚拒，经各军猛力勇进，伤其头目，退出南关。①

二月二十七日，潘鼎新站在指挥全局的角度奏称此战：

初八日，法果复分三大支来犯。冯子材分队与王孝祺应其右，陈嘉、蒋宗汉应其左，苏元春、冯子材居中，凭墙扼守。分布甫定，法遂猛扑。该逆惯技，前队枪炮密排，队如山立，连环迭进，任我军枪炮齐击，伤亡不顾，仍步步紧逼，每致退挫。是日法由左路进者，经陈嘉等伏壕力御，法不能前。由右路进者，经王孝祺、冯绍金等奋击，法虽受创，仍未少却。益以开花炸炮，向中路长壕轰

① 《中法战争》(4)，第478～479页。

击，自巳至申，连绵不绝，尘土蔽天，枪炮子弹积寸许，势甚岌岌。各军静伏壕内，该逆瞥见卡内寂若无人，疑我军皆已溃退，猛力直上。将近壕前，各勇觑准，齐放排枪，法前敌骤倒。正相惊骇，苏元春、冯子材重悬赏格，乘其慌乱，突开卡门，大呼一拥而出。苏部陈桂林、杨昌魁、黄云高由内杀出，冯部冯绍珠、刘积璠、陈荣坤自外夹击，法遂大奔，阵斩法酋三画、二画、一画十余名，法兵百余名，教匪千余名。其攻左右路者，被陈嘉、蒋宗汉、李应章、冯绍金等乘势压下，阵斩三画等法酋数名，法兵数十名。当法逆围攻关前吃紧之际，王德榜自油隘率军抄击贼后，行至甬谷，见关前隘一带山岭贼甚众，另有一股抄至幕府对山。当派提督肖得龙等向文渊一路迎剿，提督杨文彪、总兵邹耀堂等助援，冯军提督张春发、吴次汉等邀截援贼军火，王德榜自率三营策应。张春发行近南关，适遇援贼数百解运军火骡马。张春发率勇冲入，将贼队冲为两段，毙贼多名，夺获骡马五十余匹，军火无算。逆党犹回顾死战，又被张春发斩馘多名。维时，苏、冯两军正将中路之贼击退，乘势悬赏攻取冯军昨日所失之炮垒。王德榜亦率军至，登将炮垒三座夺回。①

我们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奏折，一方面想从各方面反映战事情况，另一方面也可考校诸多奏报中，哪个比较真实，哪个水分太多。总的说来，在大胜之后，清军的捷报都不免夸大杀敌数目，称杀敌数百数千等，内中，似乎潘鼎新所奏较有节制。

---

① 《中法战争》(6)，第394～3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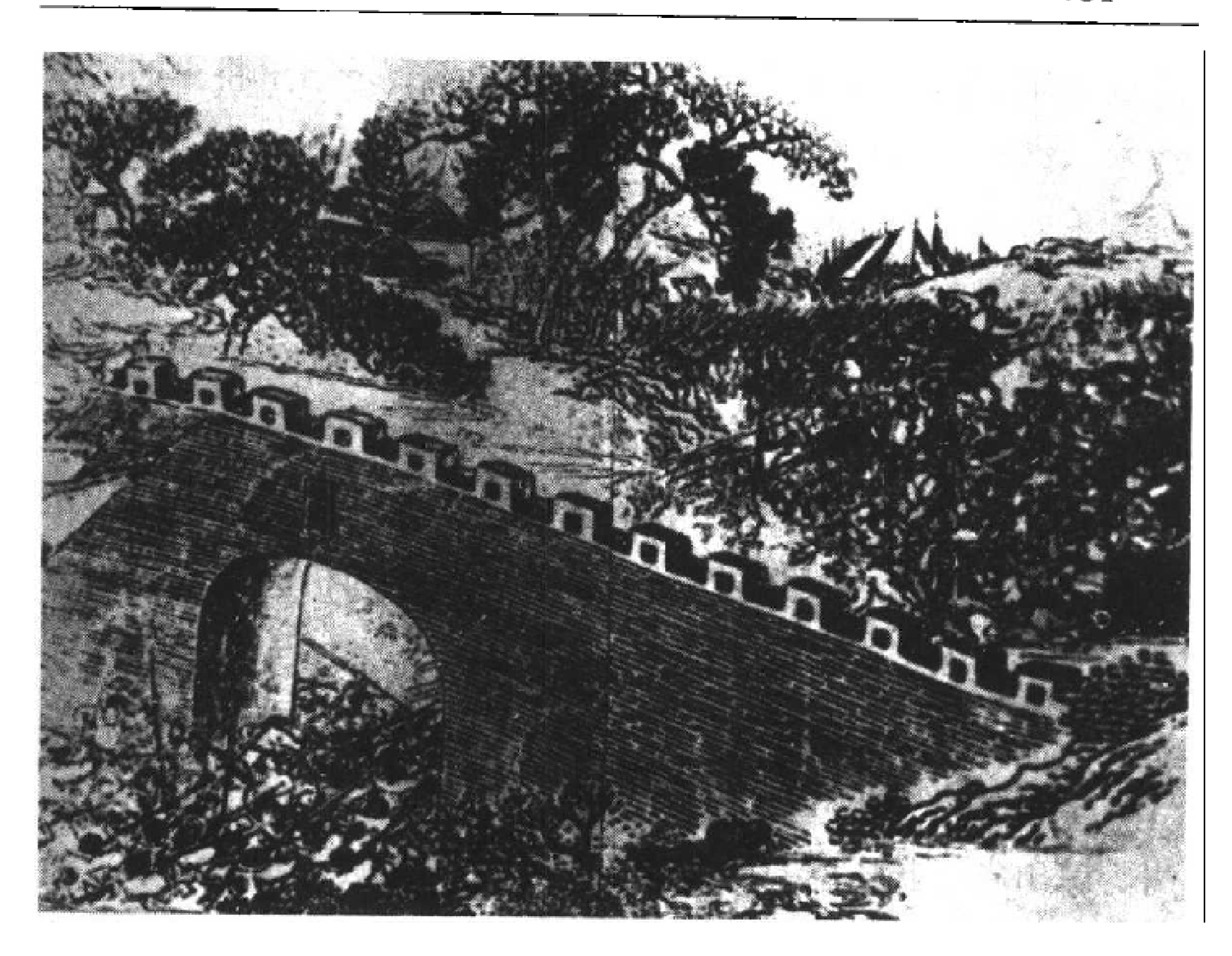
后来，彭玉麟等总结战胜的原因说：

在前敌亲见战事者，佥言法二次犯关，非有生力大军难遽言战；非冯子材创筑长墙与王孝祺合军死守，则诸军无所依倚，更无战守之法，当初六、七广军苦战两日之后，非苏元春军往援，陈嘉、蒋宗汉力拒东岭，则冯军亦将不支；非王孝祺军迭次肉搏陷阵，横冲敌坚，则冯、苏诸军亦不能取胜；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则亦不能如此大溃；然非冯子材之素得人心，忠勇奋发，镇边安民，戢掠收溃，设险倡战，料敌情，散贼党，广援应，则法亦不至如此摧破瓦解，惶骇远遁；故诸将皆有功，而尤以该帮办为功首。然非李秉衡之廉劲公诚，坚镇龙州，力持危局，上匡抚臣，下调诸将，吊死恤伤，多方慰劳，以抚残军，苦心撙节，悉力供赏，以励勇士，粮饷军火，不分主客，随宜接济，则诸将亦不能成功。该护抚臣之支拄挽回，其功不细。[1]

不过，在清方这些奏折中，对于法军的死伤情况，都夸大过甚。据法方记载，当一一一团向长墙发起进攻而遭到反击时，他们就已发觉自己做错了，因而很快就向不远处的一个小树林退去，但已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军官四名死亡，一名受伤；士兵二十七人死亡，五十七人受伤，总数八十九人丧失了战斗力。"相当于进攻的总兵力的五分一强[2]。与此同时，在大青山方向作战的一四三团也受到清兵的反击，狼狈地撤退了。两路法军在撤退时，得到原来停留在镇南关上的后备兵力

① 《中法战争》(6)，第458页。

② 《中法战争》(3)，第457页。



镇南关法军被歼图

的掩护，终于摆脱了清军的追击。“罗北炮队小组仍在镇南关的阵地，当一群一群的敌军进入我们放弃了的一号、二号堡垒时，开炮射击。当他们要下到大路上来，冲入我们的右翼时，炮队继续发射榴弹，打击敌人。末后，黑夜来临，尼格里将军带了最后的部队抵达镇南关。中国军仍然跟踪追来，但为布置在大路两旁的外国人编成队第二营的援军密集枪火所阻截，他们于是后退约两公里左右，战事便停止了。”① 这天作战，法军“总共死七十人，其中军官七人，伤一百八十八人，其中军官六人”。伤亡总数 258 人，为总兵力的十分一强。根本没有中方报告所说的成千上百那么多。法国人承认：“中国军派出

① 《中法战争》(3)，第463页。

这么多的队伍，不管我们士兵的勇敢，不管尼格里将军的巧妙战术，终于把我们打败。我们上面说过，在这两天内，某些军官所犯的错误，当然对于后来多少有不良的结果，但是，即使他们不犯这些错误，最后结果亦殆可决定是一样。”这次挫败对法军的打击是十分重大的，以致当他们狼狈撤退路过文渊时，也惊慌地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中，留在同登是很危险的，因为同登不可能防守了。”由于害怕驻在由隘和镇南关的清军随时会追来，“尼格里将军乃乘这暂时休止的机会，向谅山方面撤退，在谅山等待敌人的攻击”①。

关于此时清军的动向，潘鼎新、苏元春都记称为潘鼎新指挥清军乘胜出关追击。苏元春在《中法战图》的《克复文渊州、谅山省、长庆府，并攻破各处法垒，敌败船头、郎甲，请款罢兵，拔队入关八图总说》中写道：“关前隘主客大捷后，潘巡抚以法众受此大创，正可及时规取文渊。”因而待诸军休整一天后，于初十日（3月26日）乘胜挥师出关追击②。冯子材奏称为自己自作主张率军出关追击：

初十日巳刻，接据探报，南关法匪因关前坳被创，心胆俱裂，其山头各贼垒均已退入文渊街，一夜数惊等情。敝帮办以该法逆等畏威震惧，有机可乘，当即知会王镇孝祺统率勤军随同进剿；并知会王藩司德榜派拔楚勇，由小路抄截而来。敝帮办随拔萃字中军左营并中军右营左哨及前军前、中、左、右四营，右军前、中、左、右四营将弁、勇丁及随营员弁，即于初十日午刻径出南关，追剿法

---

① 《中法战争》(3)，第464～466页。

② 原件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

匪。该逆大股闻我兵到，倾巢齐出，奋力拒战。我兵见法教各匪人数不少，因分路四面环攻，枪炮雨密。该匪股内有红衣红裤法酋立马阵前，督令该逆等施放枪炮数十轮，我军并无伤损。各营将士见此情景，士气愈壮，前军左营弁勇挥刀直进，阵斩教匪一名，同时红衣红裤贼酋又被乱枪击中，扑跌马下。逆党恐其尸身为我所得，立即扛抬退去，余匪不支，纷纷返顾，觅路潜逃。未刻，敝帮办指挥大队，直前涌入文渊街，立将该州克复，王镇勤军、苏军门、楚军先后继至。敝帮办仍派弁兵分路追击，十一日（27日）攻至界牌……①

关于清军攻打文渊的情况，苏元春、彭玉麟等的奏报也有类似冯子材的说法。都启模甚至说："初十日巳刻，（冯子材）复带萃军及苏勤各营出关追剿，军抵文渊，法匪二千余名出栅抗拒"云云②，则夸大过甚。而在潘鼎新二月二十七日的奏报中，却指出清军没有经过作战即已夺取文渊："十一日，冯子材、王孝祺及分统广武军已革知县詹霖率队进攻文渊。逆党瞥见旗帜，相率窜退，冯、王等军遂入文渊，苏元春继至。"③这种说法和前引法方的记载相比较为可信，即法军自镇南关败退后，匆忙将全军撤回谅山及其附近，只留下一些骑兵在文渊一带巡逻，当清军向文渊进发时，不可能遇到什么抵抗。所以，冯子材奏称如何攻打文渊云云，是不符合事实的。

清军继续前进，在谅山外围的驱驴又和法军打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

① 《中法战争》(3)，第94页。
② 转引自《钦州文史》(5)，第279页。
③ 《中法战争》(6)，第395页。

谅山的北面有一条小河绕城流过，河的南面即谅山城，北面就是驱骡城。法军主力早就部署在驱骡城，准备迎战清军。黎贡德写道：当清军逼近驱骡时，

在这时候，旅部全都拿起武器。将军想将中国军引诱前来攻击驱驴堡垒，把他的旅部部队配置在一座斜坡很平缓的圆丘上。驱驴城即建筑在这座圆丘南面的斜坡中腰。丘顶为中国军的旧堡，我们保留着它，并用暗道和它连系起来。斜坡面向敌人，下临稻田；稻田在这季节不仅光着，而且很可以行走。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一所很好的射击场。我们的队伍开头这样配置：右边，对着东北方，寿非营展开，从驱驴至东方堡垒，作弓圆形，带两连半人在第一线，一排人作炮队的支援军，拉贡比连作后备，多列盎中尉的一排人亦加入这一线作战。作我军防御阵线中央部分的两座堡垒和一道战壕，由非洲营第三连及费罗地连（狄格营第二连）据守。左边石洞堡和一座往西一点的圆丘由非洲营第三连把守。这道步兵线的第一队后备兵是由狄格营与东京冲锋兵组成的。他们结集在驱驴的最前房屋面前，在一个地裂痕的后面。一一一团的一营（浮尔司令）被派带萨克雪炮队的一组炮兵（拉图袁组）到 Mai－pha 据守在淇江溪谷中的 Bac－Viay 大路出口。抗拒中国军在 Tien－Yea 路上看来可能有的军事行动。二三团第三连和第四连，带两组罗北炮队，据守谅山上面的官道山隘，这支队伍要侧卫我军阵线的左翼。旅部的全体后备员，由一四三团的一营和二三团的两连人组成，集合在驱驴南边。二三团的一连（第二连）驻扎控制桥头的土筑防御工事内。我们的炮兵分配如下：两组罗北炮队在驱驴的

神塔附近，可以射击平原，需要时可以打到谅山的桥头；萨克雪炮队在A地的三尊大炮，配置在寿非营的各连中间；在驱驴堡垒中，克虏伯制和瓦瓦索（Vasseur）制大炮，由马丁炮队的一组炮兵使用。最后一支炮队，由炮口装弹的四公分口径的大炮组成；集合在谅山驻地的广场上，归薛威埃司令指挥，负责与老弱兵员的“城堡班”共同防守城垣碉堡。[①]

当法军忙于部署时，清军已经前来攻打。开始，早有准备的法军窥准清军的间隙，派出军队前去迎敌，一度将清军逼退。法军记称：“中国军号发出多次声响，调集队伍，整个在第一线的敌军都向后退却，遗弃一大堆死尸在战场上，至少有一千二百人。”而法军据说才死3人，伤37人，失踪4人。共44人丧失了战斗力，“损失比较地不大”[②]。潘鼎新奏报此役称：

探得该逆仍踞驱骡墟，坚筑营墙，为久持计。恐其再来扑犯，宜乘其喘息未定，再加痛剿，则谅山亦不难克复，遂约各军十二日（28日）同进巴坪会攻。至期，法复率党万人来犯巴坪，另股二千余人乘雾往袭王德榜板泥之营。苏、冯各军分三路迎击，该逆亦分三路接仗。中路之贼直抵界排，势甚凶猛，持两时之久。左右伏兵齐出，冯子材、苏元春跃马入阵，将士蜂拥而前，法队奔溃，退入驱骡垒中。犯板泥之贼，经王德榜分队包抄贼后路，枪炮横击，贼始败退；乘势追击，攻夺先锋垒两座，直逼驱

① 《中法战争》(3)，第469～471页。
② 《中法战争》(3)，第474～475页。

骒北街。[1]

苏元春奏称：

十一日黎明，楚军进至板泥，距（驱骒）墟十余里。敌欺其孤军深入，猝由大路悉众来扑，张春发、刘（杨）文彪、肖得龙等，各率队伍，分别迎抄，敌遂大败，夺其营垒二座，我军进逼驱骒，法众凭壕死守。副将石成玉等奋勇先登，枪伤却走，环攻不下，收队回营。十二日清晨，臣等进次巴坪，筑营未定，法先来犯，当经商定分头迎击：臣督毅新、镇南、广武亲军等营出中左二路，冯子材督萃军、勤军等营出中右二路。中路甫及界牌，遇敌接仗，击毙其党甚多。左右两军已抄敌后，其众自相惊乱，王德榜已攻取东边三垒，我军遂薄驱骒；敌营如虎负隅，急切未能遽下。因复熟筹方略，激励戎行，饬令戮力图功，务须灭此朝食。陈嘉、蒋宗汉、方友升、陈桂林及提督和述廷等，同率奋勇，大呼猛扑，排墙互进，殊死不退，始将其垒攻克，夺获开花炮八尊，军火无算。各军追进墟街，敌复回拒，游击陈国亮，守备林作亨、蒋得贵，千总吴芳儒，均为炮子穿胸阵亡，游击陈显道亦受重伤。[2]

在冯子材关于驱骒之战的报告中，亦承认清军作战的不甚顺利：

讵本月十二日，我苏、朗、萃、勤各军，方次第拔队征进，营垒未备，贼遽突然直犯，枪炮并发，驰风骤雨；

① 《中法战争》(6)，第395～396页。
② 《中法战争》(6)，第4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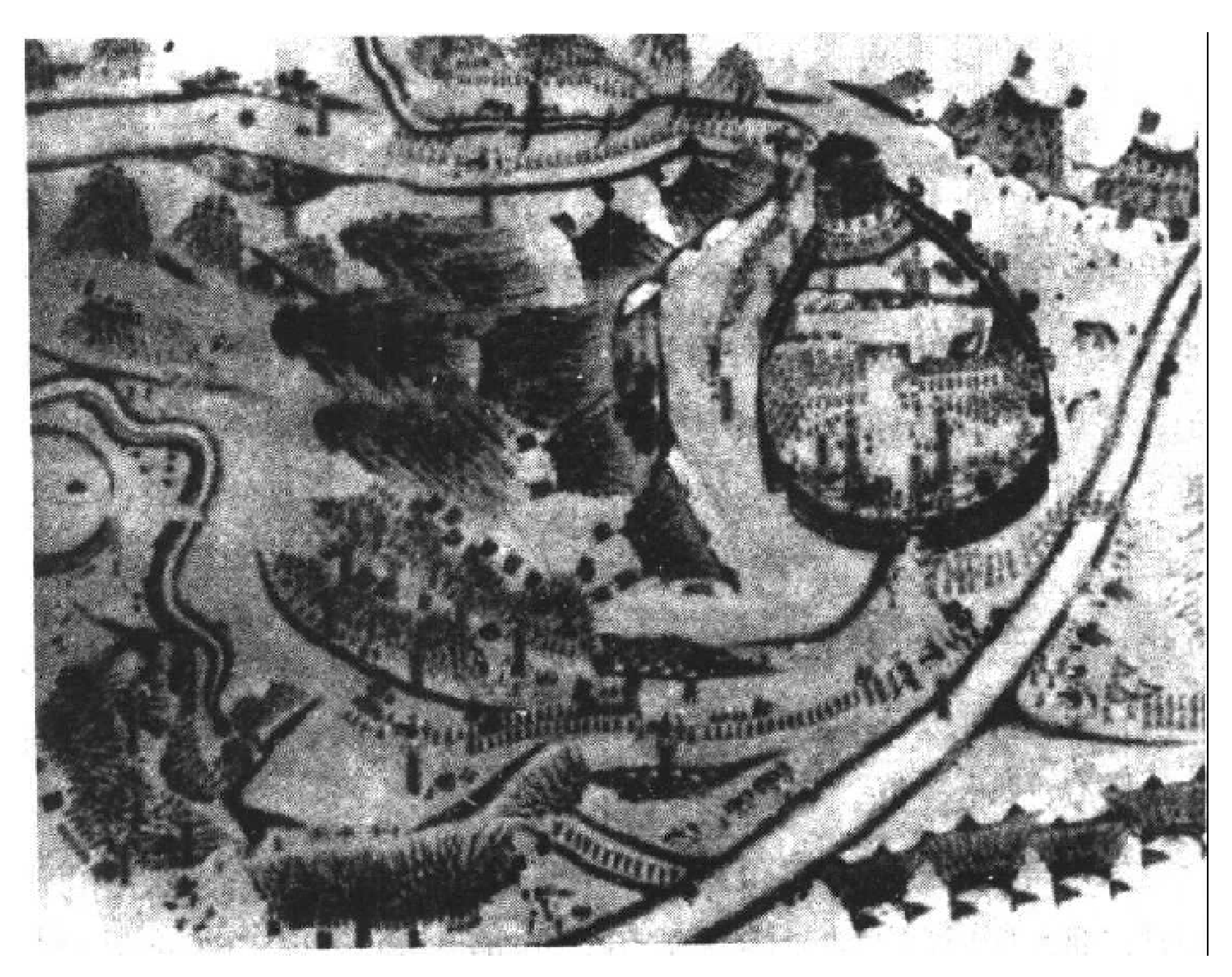
我各军因日前大胜，士气奋潇，亦即分队迎击。自辰至申，虽未全获大胜，然亦略有斩获。

虽然初战如此，但清军的锐气丝毫未减，冯子材等还决定派兵奇袭谅山："惟贼之精锐及枪炮等多聚于谅山省城，其焰尚未衰熄；且谅城为越南距边要省，若不急先攻取，实难成破竹之势。敝帮办详加体察，该匪连日败溃，慑我军威，心胆已寒，与其明攻多损士卒，不如暗取更易见功。因先于十一日与苏军门、王镇军密商，以正兵明攻驱驴，出奇兵暗取谅山。"为此，冯子材命督带萃字前军补用游击杨瑞山率带所部，密授机宜，绕道而进，乘夜渡河，十二日黄昏时候，由小路抄至谅山，散伏城外各处，不动声色①。

当清军作着上述的布置时，他们并不知道，在十二日的作战中，他们已经取得了中法战争期间最大的战果，即重伤了法军旅长尼格里。黎贡德记称："三点十五分，中国军的进攻已经被我军击退，尼格里将军从西边的堡垒出来，向阵线的右翼前进。他刚走了几步，一弹打中了他的胸部，受了很重的伤。他倒下，不管他的精力坚强，他的创伤非常厉害。没法，只得让人把他抬至离开战场的谅山。他要人通知他手下阶级最高的军官爱尔明加中校担任军事的指挥。我们在随后的战事叙述中，看到尼格里将军的受伤对于全军是很大的不幸。"②

爱尔明加原来负责指挥法军在前敌与清军作战，他虽然顶住了清军的攻势，但是也觉得继续作战下去，法军可能不会占到什么便宜，反而会有被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的清军围歼的危

① 《中法战争》(3)，第95～96页。
② 《中法战争》(3)，第473～474页。



各军克复谅山省会，分营防守，法军败退
谷松、屯梅，华军跟踪追剿。

险。他后来当着几位将官说："我从没有想到中国军有这么坚强的组织，打得这么好。现在谁都不能怀疑这事了，我们自后在谅山十分危急了！阵地再不能保守了。"① 黎贡德记录了他决定率军撤离谅山的经过：爱尔明加从前沿回到受伤的尼格里身边，接受了对全旅的指挥权，而他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法军撤出谅山，为此，他电告法军总司令："尼格里将军受重伤，本人担任纵队的指挥。将利用黑夜分成两纵队退至 Dong—Song 和屯梅。"他并将这个决定告诉尼格里：中国军在驱驴前面仍然出现很多的部队，我们又要受敌人前后的进攻了，他现

① 《中法战争》(3)，第 503～504 页。

在决定撤出谅山。对于他的决定，尼格里虽然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法军并未战败，以为没有撤退的必要。但爱尔明加坚持了他的决定，已失去指挥权的尼格里虽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也只得听之任之了。爱尔明加“为避免接到不撤出谅山的命令，他派人于晚六点将电报线割断，没有事先通知总司令”。法军的撤退是十分狼狈的，为了行动方便，爱尔明加甚至命令法军将13万银元、一些大炮及炮弹都丢到河里去。后来，法军总司令知道此事后，曾去电责备爱尔明加：“我不懂得，你没有敌人的追赶，为什么这样疲劳你的队伍；你是旅部的司令，你以为撤出谅山一事你可以自专自主……”[①] 但已无补于事了，因为法军已撤到离谅山150里的屯梅了。

由于法军在此之前已退出谅山，因此，清军将帅绘声绘色描述经过激战才占领谅山的说法，就是夸大了的。如潘鼎新称：

> 十三日（29日），各军会商分队进取。王德榜自左路抄袭，黎明，头队抵驱驪法垒，法党千余先已列阵相待。陈嘉按兵不动，俟蒋宗汉、方友升队至，分列雁翅，一齐鼓勇前上，法队炸炮、通码如飞蝗，各勇队伍不动，亦以枪炮互施。正相持间，王、冯两队赶至，王德榜亦由左路抄袭而来，逆势益蹙。陈嘉等于炮子丛中，冒险冲入，蒋宗汉、方友升左右夹攻，呼声震天，法党纷纷弃垒败窜，夺获开花炮四尊，洋马数匹，追入驱驪墟中。逆党仍回身反斗，游击陈国亮、守备林作亨均被通码洞胸，登时阵亡。各军不动，冒死跟追，逆党凫水而逃，中枪落水死者

① 《中法战争》(3)，第476～483页。

无数，垒贼幸免者仅二三百人。城中法逆隔岸欲向前拼救，见我军势盛，气沮不前，即将浮桥折毁。各勇涉浅争渡，城贼与败党逃入城中。各军返抵城根，逆党开北门败窜，苏元春、冯子材等先后入城，遂于十三日巳刻将谅山省城克复。

各军跟追到三台，复截杀逃贼无算，夺获田鸡铜炮四尊，开花炸炮六尊等。后来，清军还将“其饷银抛弃河内者均被军民捞获，连日于深林密箐中搜捕败贼，日有擒献。现生擒五画及一画等八人”[1]。冯子材则奏称：

> 是夜五更，匪等因连日鏖战，又恃其城高贼众，略无顾忌，且不虞我军业已过河，多已熟睡。该督带等乘其不备，伏兵四起，号鼓一举，枪炮齐鸣。匪等梦中惊觉，排立城上，不知我军多少，枪炮下击，有如密雨。我军全无畏惧，抵死力攻，时将天明，尚未得手。杨督带瑞山，刘管带汝奇怒发如雷，指挥弁勇，愈击愈奋。该匪见我军威，料不能守，纷纷退避。该督带、管带督率各营员弁、勇丁，蚁附而上，劈开城门，兵刃交下。匪等错愕奔窜，我军随后追赶，擒斩极多。十三日辰刻，立将谅山省城攻克。余匪均向北宁一带逃遁，我军仍分队伍，极力追剿，直至二十余里之外，贼已去远，始行收队而回。是役也，总计毙贼不下千余，擒斩五画法弁以下又几一百余众，所获巨炮、铅码不计其数；查点我军，伤亡无几。[2]

显然就不是事实了。

① 《中法战争》(6)，第396页。
② 《中法战争》(3)，第96页。

攻占谅山后，冯子材认为："谅城攻克后，该法匪等倍形胆怯，利于速追，勿任延息，以收破竹之效。"于是随派管带萃字后军左营拔补把总梁有才、管带萃字后军右营补用都司冯绍珠，各率所部，跟踪追剿，不准延缓。又派管带前军左营补用都司潘积璠，带领该营随后策应梁有才等。于十三日夜三鼓，梁有才与冯绍珠从所率两营中各挑先锋队伍，由梁有才亲自率领，由大路征进，其余兵士则由冯绍珠率领，由小路进逼。同时又派越南江清社头目黄儒禄带其社民协力夹攻。十四日（30日），在长庆府与法军遭遇，该匪见左营勇到，尚欲整队相拒，不虞冯管带、黄儒禄两路勇练同时抄到。该匪腹背受敌，昏夜交兵，不知我兵多少，大众惊惶，踉跄逃遁，自相践踏及被我军荡决，死伤不计其数，十四夜立将长庆府收复。并乘胜追击，十五日（15日）又克复观音桥。据说，是役"生擒五画法酋一名，教匪一名，阵斩三画法酋及法兵首级各一颗"[1]。黎贡德也记载了这场小型的遭遇战称："下午两点左右，敌军的斥候沿 Dong—Song 大路前来，与我军大哨互相枪击了一些时候。中国军看见山谷为我军所挡住，乃据守一座离我们阵地约二公里远的的旧堡垒，继则向我军的右翼行动，前来攻击自早晨即由外国人编成队的两连占据的防舍和掩蔽战壕。我炮兵队（路塞尔队）于是开炮，寿非营第二连亦放枪……枪声至五点半左右终了，寿非营一共有三人受伤。"[2] 苏元春则奏称：攻克谅山后，"派陈嘉率镇南各营六成行队，并挑毅新七营奋勇，会同王德榜楚军四营、道员魏纲鄂军四营，

① 《中法战争》(3)，第98页。

② 《中法战争》(3)，第489页。

赴谷松一路追剿。冯子材派萃军前后三营赴屯梅一路追剿。都司冯绍珠、把总梁有才率队于十四日遇敌接仗，由五台而至屯梅，敌皆败溃。屯梅为长庆府治，当夜克复，生擒五画法目一名，教匪一名，其众归并谷松。我军次日又复进攻观音桥，破其巢垒，阵斩五画法目及法兵首级各一。十五日，陈嘉、王德榜及已革提督王洪顺等，扫荡而前，亦将威坡、山庄、谷松等处巢垒悉行攻拔，生擒法目二画两名，一画一名，法兵十余名，教匪二十余名，斩级三十余颗。"[①] 十四、五日，冯子材、王孝祺二军进抵屯梅、观音桥，王德榜、魏纲、陈嘉进至谷松，法犹分股抵拒。我军勇气百倍，均经先后攻克。冯军进军拉木，逼攻郎甲，王孝祺进军贵门关。

这时，受到清军胜利的鼓舞，李扬才之弟在北宁来报：官军破郎甲，彼即率众内应。冯子材各许官赏，分给旗榜，并许给赏十万两，保三品官。河内、海阳、太原等处皆密受约信，纷纷畔法。张之洞已令莫善喜一军由钦州袭广安，唐景崧一军亦由牧马进规太原。冯子材并不断报告张之洞："自克谅后，客教离散，法匪屡惊，稳守不如速战，令钦军袭广安，令麦凤标等逼郎甲，约苏军牵制船头，拟廿五（4 月 10 日）亲往攻北宁，密布内应，河内亦有布置，郎琳一拔，北宁自溃，并以巨金约定西贡内应。"[②] "材拟二十九（14 日）率兵进，先取郎甲，后规宁、太。倘可得该两省，……材率全部直捣海阳。"[③] 苏元春部则进攻船头。但未及实行，中法议和已定，有旨令前敌各军撤回国境，事遂未果。

① 《中法战争》(6)，第 441 页。
② 《中法战争》(6)，第 422 页。
③ 《中法战争》(4)，第 48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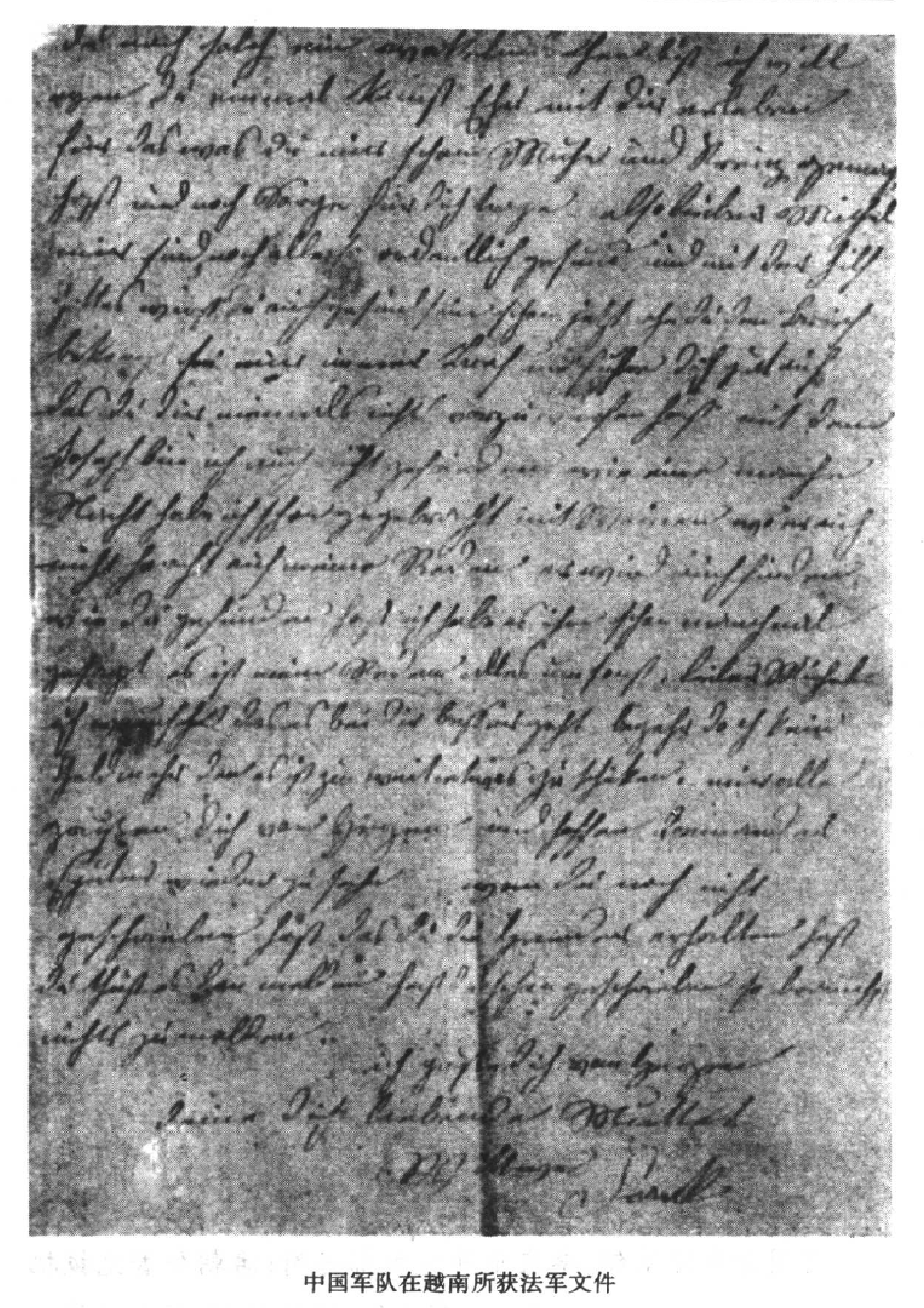
当时人们曾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清政府不是这样快与法议和，而由援越清军追击下去，则可能会把法军赶出越南。其实，这种看法太乐观了些。因为镇南关大捷的取得，特别是后来的乘胜追击，完全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事前援越桂军并未为此作有必要的物质准备。追击下去，势必拉长战线，分散兵力，后勤供给也会十分困难。而法军一方面是收缩兵力，防御力量增强，另方面又源源不绝地得到大批的援军。因此，继续作战下去，清军全胜的这种一边倒局面能否保持下去，还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乘胜收兵，未尝不是一种好结局。

五月十五日，清政府有旨奖赏镇南关作战尤为出力人员：

苏元春著加恩由骑都尉世职改为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再赏给额尔德蒙额巴图鲁名号；冯子材著赏加太子少保衔，并由骑都尉世职改为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王孝祺著赏给云骑尉世职，并交部从优议叙；王德榜著开复原官原衔翎支勇号，并赏给白玉搬指一个，白玉翎管一支，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总兵陈嘉著赏给头品顶戴，云骑尉世职，并赏给白玉搬指一个，白玉翎管一支，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蒋宗汉着赏给头品顶戴，并赏给白玉搬指一个，白玉翎管一支，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方友升着赏给云骑尉世职，并白玉搬指一个，白玉翎管一支，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张春发着赏给三代正一品封典，并交部从优议叙；张之洞著赏戴花翎，李秉衡著交部从优议叙。所有单开之提督杨文彪等均赏穿黄马褂；刘先胥著赏给头品顶戴并应得封典，邵升堂著赏换西林巴图鲁名号，胡定坤著赏换倭协春巴图鲁名号，吴次汉著赏给齐新巴图鲁名号，并改留广东差遣委用；

总兵潘瀛等均著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缺出请旨简放；潘瀛并赏给优勇巴图鲁名号，张寿安著赏换那尔挥巴图鲁名号，刘士旺并赏给御勇巴图鲁名号，邹耀堂著遇有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副将马盛治著以本班改留两广，无论题推缺出尽先补用，俟补缺后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并赏穿黄马褂；陈桂林等均著俟补缺后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简放；陈桂林并赏加提督衔，赏穿黄马褂；杨昌魁并赏换年长阿巴图鲁名号，赏给应得封典，仍以副将留于原省无论题推缺出尽先补用；冯兆金等均著免补副将，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冯兆金并赏换爱兴阿巴图鲁名号，兰本材并赏给猷勇巴图鲁名号，周文斌并赏给伟勇巴图鲁名号；李应章著仍留广东无论题推缺出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赏换强谦巴图鲁名号，李群著留于广西无论题推缺出尽先补用，并赏给卓勇巴图鲁名号；参将栗万和等均著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简放；栗万和并赏给桓勇巴图鲁名号，陈兆兴并赏给顺勇巴图鲁名号；黄云高等均著免补参将，以副将仍留原省无论题推缺出尽先补用；黄云高并赏加总兵衔，梁效贤并赏换花翎，赏给克勇巴图鲁名号；陈光明等均著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陈光明并赏给壮勇巴图鲁名号，范尔庆并赏给固勇巴图鲁名号，黄有元并赏给冠勇巴图鲁名号；游击杨瑞山著免补游击、参将、副将各班，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并赏给策勇巴图鲁名号；袁学祥著免补游击、参将，仍留广东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给尚勇巴图鲁名号；刘应棠等均著免补游击、参将，以副将遇缺尽先即补；刘应棠并赏给劲勇巴图鲁名号，王荣胜并赏给懋勇巴图鲁名号，冯兴贤并赏给资勇巴图鲁名号，李庆云著免补游击，以副将遇缺题补；蒋太富

等均著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蒋太富并赏加副将衔，赏给猛勇巴图鲁名号，韦和炳并赏加副将衔，陈显道著赏加副将衔，并赏给札布东阿巴图鲁名号；都司冯邵珠著免补都司、游击、参将各班，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给豪勇巴图鲁名号，刘积璠等均着免补都司、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刘积璠并赏给绩勇巴图鲁名号，麦凤标并赏给协勇巴图鲁名号，沈革龄等二员并赏换花翎；陈世华等均著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陈世华等三员并赏加副将衔，赏换花翎；章得禄等四员并赏换花翎，段耀元并赏加副将衔，傅建勋等二员并分别留于广东、广西补用；守备王孝良等均著免补都司、守备、游击各班，以参将留于广东尽先补用；王孝良并赏换花翎，赏给力勇巴图鲁名号，叶华良并赏加副将衔，王世评并赏换花翎；陈之瑞等均著免补都司、守备，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陈之瑞仍留于原标补用；黄秀玲等均著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黄秀玲等三员并赏戴花翎，彭俊至等二员并赏换花翎；千总朱锡康等均著免拔千总，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朱锡康等三员并赏戴花翎，李荣彪等二员并赏换花翎，朱锡康留于广西，遇有提推缺出尽先补用；叶华良等均著免拔千总；叶华良并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许超元等均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赏换花翎；利贵升著免拔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把总杨树勋著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成江志等均著免补千总、把总，以守备尽先补用；杨树勋等二员并赏戴花翎，玉启光等二员并赏换花翎，李庆华并赏加都司衔；潘朝登著免拔把总，以千总尽先拔补并赏加守备衔，赏换花翎；黄彪等均著免拔把总、外委，以千总尽先拔补并赏戴蓝翎。



中国军队在越南所获法军文件

甲、原文（德文）

du noch solch ein wakelmänchen bist ich will wen du einmal komst Ehre mit dier erleben für das was du mier schon Mühe and Storung gemacht hast und noch Sorge für dich trage also lieber Michel wir sind noch alle so ordentlich gesund und mit der hilf Gottes wirst du auch gesund sein schon jetzt ehe du den Brief bekommst sei nur immer braf und fuhre dich gut auf das du dir niemals nichts vorzuwerefen hast mit dem Joseph bin ich auch nicht zufrieden wie eine manch Nacht habe ich schon zugebracht mit träinen wo er auch nicht horcht auf meiner Reden er wird auch finden wie du gefunden hast ich habe es ihm schon manchmal gesagt es ist meiner Reden alles umsonst lieber Michel ich wünsche das es bei die besser geht beghr doch kein Geld mehr den es ist zuweit etwas zu schicken, wir alle grüssen dich von Herzen und hoffen einander später zu wieder zu sehen wen du noch nicht geschrieben hast das du die Hemder erhalten hast du tust es dan melden hast du schon geschrieben so brauchst nichts zu melden.

ich grüsse dich von Herzen
deine dich liebende Mutter
Wittwe
Frank.

乙、說明

這是一位德國寡婦寫給她在法軍中服役的兒子的信。從德文的錯誤等等去看，她大概是文化程度較低的婦女。

……〔我希望〕你已不再是這麼一位心志不堅定的孩子了。

我期望，如果你一旦回家，我得因你的成就而感到驕傲。你曾給我痛苦和困難，我迄今仍在爲你焦慮。你的成就將使我在這方面獲得補償。

好的，親愛的邁可，我們大家還都健康。由於上帝的幫助，你也將老是健康。

就是在接到這封信以前〔這句原文如此，不甚合理〕你也要恆常正直。你行爲要端方，庶可永遠無需自責。

我對約瑟也是不滿意的。多少夜晚，我是流着眼淚過的。

他既然不按照我的話行動，他必將經歷你一切的遭遇。

我有時候這樣告訴他，但是我的努力結果都落了空。

親愛的邁可，我希望你能更好些。

請別要錢，因爲地方太遠，一切東西都不好寄。

我們大家最熱切地問候你，並希望將來能再見面。

你末後一次的信如果沒說已收到了襯衫，請在下一封信提一提。如果前信已經說明，就不必再提了。〔這句原文構造奇僻〕

我寄給你最親愛的問候
真正愛你的母親
寡婦 佛蘭克

道员魏纲著赏给奭勇巴图鲁名号；张桂林著赏加布政使衔，以道员遇缺尽先题奏；知府陈嘉绩著免补本班，以道员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补用，并俟补缺后再行送部引见；同知潘培楷著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补用，并俟补缺后以道员用；冯相荣著免补本班，以知府留于广西归候补班前尽先补用，并赏加三品衔；知县刘汝奇著免补知县、同知，以知府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赏给裕勇巴图鲁名号；同知冯相华著免补本班，以知府分发省分归候补班前补用；府经历沈宝光著免选本班，以知县留于广西归候补班前尽先补用，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用，先换顶戴；直隶州州判唐镜沅著免补本班，以知州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补用，并赏戴蓝翎；县丞包怀邦等均著免选本班，以知县分发省分补用；包怀邦并赏加五品衔，尹佑易并归候补班前补用；训导李肇同著以训导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并赏加内阁中书衔，赏戴蓝翎；生员方凤元著以训导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并赏戴蓝翎；府经历蔡其铭著免补本班，以知县归于广东尽先补用，并赏加同知衔，赏换花翎；已革提督王洪顺、已革副将李定胜，随同大军打仗，奋勇争先，尚知愧勉，均著开复原官，并赏还顶戴翎枝勇号。慈禧太后并赏给苏元春所部尤为出力兵勇内帑银五千两，赏给冯子材、王孝祺、王德榜所部尤为出力兵勇共五千两。①

从这些赏赐情况来看，广西提督苏元春被列为首功，而冯子材则屈居其后，这是不公平的。可见在战胜之后，清军内部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1957～1960页。

出现了争功现象。为此，张之洞在三月十九日（5月3日）曾去电责问李秉衡："自南关失守，内地动摇，大局将坏，恃冯萃亭一人安根本，镇游勇，扼关前，散贼党，首倡出关击贼，身先陷阵，转败为功。阁下屡电盛称冯之功不容于口，关外各员探禀电报亦无不推冯为首功。乃此次覆奏不曰冯苏而曰苏冯何也？且于冯并不专下一语，愿示其故？"① 至六月十七日（7月28日）又有电责问李秉衡："冯军都启模随萃帅最久，筹划赞助，亲在前敌。黄辅成首斩二画，军中呼为头功。梁有才擒五画、三画各一。王军王寿民身在前敌，不避危险，为勤军最出力文员。此四员优奖似不为过，闻随折案已请保而被删，此次汇保万万不可删减。"②

而在这些有功不赏人员中，最受委屈的是前广西巡抚潘鼎新。我们在谈到决战前夕的筹备时，曾指出了潘鼎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没有他的支持，冯子材就无法筹划战事，而他在决战前夕毅然采取"减营增饷"措施，对提高参战桂军的士气，夺取决战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潘鼎新还亲自参加指挥决战：在关前隘危急时，是他和苏元春一道带兵前去增援；他参预了部署出关追击的战事，而且一直随军前进，直至进入谅山，总计在决战和追击的重要时刻，他有八天都和军队在一起。因此，潘鼎新也是镇南关大捷的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但是，由于清政府在此之前已经将他撤职，所以，在战胜之后，也无人敢再提及他的功劳。当众人在欢庆胜利时，潘鼎新却灰溜溜地奉旨率领被遣撤的淮军返乡。为此，

① 《中法战争》(4)，第497～498页。

② 《中法战争》(4)，第510页。

《申报》曾刊载都下述闻称："广西抚潘鼎新因肇事端致中法失和而未获赏赐。"[1] 光绪十四年，潘鼎新郁郁病殁于家。九月十二日，李鸿章上奏《潘鼎新请祀昭忠祠折》，向朝廷申诉潘鼎新参预组织和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的功劳："谅山失陷之时，朝廷鉴其危苦，有戴罪图功之温谕，有各军悉归调遣之严旨。该故抚乃能仰奉天威，部勒众将，规复故地，誓死为期，遂于二月间，迭有镇南关连日之大捷。该故抚亲自督师出关追剿，再战再胜，又于二月十三日克复谅山，乘胜进扎观音桥，攻取谷松，方拟进攻船头各处，旋于途次接奉革职之命，既解兵柄，然后折回。"

苏元春则在所撰并上奏给清政府收藏的《中法战图》中，多次指出潘鼎新在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除了在各次具体战役提到潘鼎新外，还在总论中指出："然非张（之洞）总督通筹全局，顾念兼圻，多拨劲军，宽筹饷械；潘巡抚竭力行间，支持危局，亦未能奏功若此之速。"台湾学者黄嘉谟在检阅《李文忠公尺牍》中复致苏元春的函稿，发现自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间，李鸿章共有五函与苏元春谈及如何奏请清政府褒扬潘鼎新的抗法功劳，以及在镇南关为潘鼎新建立专祠等事。如其中光绪十五年正月初十日的函称：专弁到津，奉九月朔来书并图三分，发题展视，赫然殊观。尤可及者，处处归重前帅，功罪分明，从群疑丛谤之余，见战苦功高之迹。琴帅有知，当瞑目矣。即当转呈成邸，上献紫宸。琴帅南关再出，转败为功，诚如尊论，不容淹没。事在罢职之后，扼于群议，未得自言，境过时平，是非已有定论。执事笃旧府之风

① 《申报》影印本，第27卷、第96页。

义，慰边城之哀思，似应商请粤西抚军在南关奏建专祠，足报荩烈而彰公道。此事可能并无结果，但说明潘鼎新的抗法功劳是客观存在，不能抹杀的，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①]。

中国军队为什么会取得震动中外的镇南关大捷的呢？

毫无疑问，功劳首先应归于冯子材的天才筹划和指挥。在援越桂军新遭巨挫之际，如果没有冯子材的力挽狂澜，坚持主张主动击敌，亲率萃、勤二军布防关前隘，并身先士卒实施诱敌战术的话，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因此就把所有的功劳全部算在萃、勤二军身上也不恰当，因为萃、勤二军的装备太差，特别是萃军有枪无炮，因而并不能完全压制法军。决战的胜利是依靠全体广西边军的浴血奋战而取得的，其中也有潘鼎新、苏元春等将帅和士卒的功劳。因此，镇南关大捷可以被看成是全体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法国侵略者的结果，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胜利。

反之，法军的惨败，表面看来，与尼格里的轻敌冒进、爱尔明加的畏敌狂退的战术失误有一定的关系。假如当时尼格里坚持等待驰援宣光的第一旅撤回，再合兵出击；而爱尔明加在接替尼格里指挥后不是仓惶撤离谅山，而是组织有力的抵御的话，清军是否能那样顺利地取得一连串的胜利，甚至兵不血刃即收复军事重镇谅山，那还是个值得存疑的问题。但法军毕竟出现了这许多的失误，总起来看，这些失误其实是法国侵略政策在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下逐渐丧失人心的表现。尼格里开始多次拒绝上司要他出击的要求，但最终还是中了冯子材的

① 参阅拙作《潘鼎新和镇南关大捷》一文，载《广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诱兵之计，贸然出击，表面的理由是要雪文渊被袭之耻，但内心中是否也有早日结束与清兵的战事的念头呢？这种念头在他后来没有坚决反对撤出谅山一事上完全反映了出来。至于爱尔明加不顾一切地要撤离谅山，而众多的法军也毫不犹疑地追随他做这件被视为军人耻辱的事情，更说明法军自上而下的厌战情绪。正是这种厌战情绪，使得法军一遭败挫即无意再战；更反映在巴黎人民及议员要求茹费理辞职的喧哗声中。侵略中国和长期作战毕竟是当时的法国国力所不能胜任的事情，纠缠下去，结果必定是法国的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从这点来看，法军在谅山和基隆的失败是必然的事情。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谈，有一段时间，国内学术界出现一股贬低镇南关大捷历史意义的思潮，即认为当时法军的战略重心放在中国的沿海，而不是越南，更何况这一仗是在中法和议已经达成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胜利的取得并没有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对此，我们曾撰文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是：当中法因“观音桥事件”重新起衅之始，法军确实是将它的战略重心放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以实现它“夺取质押物，勒索赔款”的企图。但是，清政府实施的“战越牵敌”策，却使法军的如意算盘破产，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越南殖民地不再丢失，法军不得不将战略重心转移回越南。我们不否认镇南关大捷是在中法和议已经达成的情况下取得的。但是，只要回想起在此之前中法曾经两度达成协议（即李鸿章和宝海协议及李鸿章和福禄诺协议），可是只要情况有变，法方总是单方面违约和撕毁协议。这次，中法虽然再次达成协议，我们却看到，法国政府一面同中国代表金登干谈判，一面又由军方指示尼格里再次进攻援越桂军。因此，假如此役不是清军而是法军取胜的话，法方

会不会再次撕毁协议，而重新向中国提出苛刻的条件呢？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从这点来看，我们不能低估镇南关大捷的重大历史意义①。

四 赫德和中法和约

在中法战争期间，自中法起衅以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蓄心积虑想要插手其间，以扩大他在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

赫德是英国人，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接触的多是各国来华贸易的富商巨贾，也和各国尤其是英国政要关系密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比中国官吏有着更多的了解，对于资本主义法国开拓海外市场的迫切性、疯狂性和长期性有着本能的体会和认识。由于海关收入关系到中国的财政收入，他又算是中国的职官，因而对中国的事情也有发言权。当清政府决心过问法越矛盾之始，赫德便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赫德是个洋人，“血浓于水”，当他处理中外纠纷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外国的立场上，维护外国的利益；但他又是中国的官员，所以口头上也标榜希望中国少吃亏。他在中国日久，看到许多封建朝廷的腐败和军队的无能，因此认为中国在军事方面难以与资本主义强国相抗，所以多主张中国对外妥协。但他没能深入中国人的心灵中去，所以他不了解中国人抵抗外敌的意志、决心和智慧，难以想象在中华民族中将会产生出诸如冯子材、刘铭传等一大批的反帝爱国民族英雄。

赫德干预中法纠纷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北宁战前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赫德深知中越封建宗藩关系的松

① 参阅拙作《试论镇南关大捷的历史意义》一文，载《学术论坛》1994年第6期。

弛和虚弱，估计清政府不会为了维持这种徒有虚名的关系作出重大的民族牺牲，因而竭力劝阻清政府卷入到法越矛盾中去。在发生“观音桥事件”，中法重新起衅后为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赫德基本是站在法国一边，加入到胁迫中国答应给法国赔款的大合唱中去，但这违背了清政府“不允偿款”的既定原则，所以，尽管赫德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上窜下跳，一会儿扮红脸，一会儿扮白脸，但终于徒劳无功。第三阶段即是他利用法舰扣押中国海关“飞虎”船的机会，通过他派驻伦敦的中国海关办事处的税务司金登干与茹费理搭上了钩，从而取得了绕过李鸿章等权臣，代表中国与法国谈判的权力，最终促成“中法和约”的签订。

在第一阶段中，早在光绪七年十月清政府讨论对待法越纠纷的策略时，十一月二十七日（1882 年 1 月 16 日），赫德就向总理衙门抄送华英日报论越事译文；光绪八年底李鸿章与宝海会谈期间，当法国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召回宝海时，他曾去电金登干，了解“法国为什么召回宝海？法内阁是否已否决宝李协议？”①

光绪九年三月十二日（4 月 18 日），赫德致函总理衙门，指出中国在卷入法越矛盾漩涡前，应该拿定主意：或管其事，或不管其事。并详细比较了两种态度的利弊：如不管其事，则越南不过系中国属国，只有按期进贡的具文，而并无他项实际的裨益，则任听法国所为而不管其事。至管其事一层，越南国仍作中国属国，若与中国之国政国事或体制等事有何项甚大关系，不管其事致有受损，则不得不管其事，以尽防损取益之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5 页。

道，惟如此管其事，越南事即我事，扰越南即扰我，越南尽力防御，我亦须尽力防御，越南如何吃亏，我亦应如是吃亏[①]。

十五日（21日）又致函总理衙门，提醒清政府："越南一事或管或不管，实应内外四面周密筹及，不然易受害也。"[②]

五月初七日（6月11日），赫德向总理衙门转报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金登干关于法国不欲与中国开衅的来电时，顺便提出中国处理此事应持的方针。

十七日（21日），他致函总理衙门，详论中法越南关系，并代拟七条办法。文中开章明义就谈："法国侵其（指越南）疆域，中国闻其事而未及与其事。"接着大谈中国应该承认法国侵占越南的既成事实，其所拟七条办法要旨也在此[③]。

八月十二日（9月12日），他将所知法越新订和约呈递给总理衙门，其实也是示意清政府承认法国征服越南的既成事实[④]。

当他得知清政府决定介入法越矛盾之中时，就于十月十二日（11月11日）给总理衙门上了一份千余字的长篇节略，极力夸大中国介入法越矛盾的严重后果，恫吓清政府：若中国以为越南之事于国计有重大关系，以致法国在彼动兵，中国不得不派兵交战防害，应知中国一动手，并非在越南交战，反系在北京城根了事。法国得到一攻向中国之机会，除水师兵船在沿海作事外，法国所派之陆路兵，必一直往北京。缘占踞他处，中国何事不答应；占据北京，中国何事都答应之故。而按中国

---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318～319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324～325页。
③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404～406页。
④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505页。

当时的军事设备，真的与法国开战，则胜算不大，“若法国只派一二万兵前来，如此设备，大局似可谓有把握。惟法国若派有四五万兵前来，备防各术，难得实效”[①]。

光绪十年三月，赫德得知李鸿章准备和福禄诺谈判中法和约，“欲知道法政府的真正要求，以便借此暗中控制法海军的计划”[②]。又于三月廿日（4月26日）去电金登干，告知他：李福谈判一事，清政府对他封锁消息，“官方尚守秘密”，他在北京无从探知其中底蕴，也无法插手。为了不失去这个干预中国外交事务机会，他要金登干“立刻暗向巴黎示意，并探询茹费理究竟接受什么办法，说明每一需要订定的条款的一般意图。如果法国首先坦白说明要什么，而不提赔款，显可在此地设法”。从而能凌驾清政府，操纵谈判的进程。第二天金登干复电，要求赫德明确他的意图：“您的意思是否授权令我暗见茹费理?”如果是的话，他将遵令前往巴黎，在那里等候赫德的进一步指示[③]。由于感到对下一步行动缺少把握，赫德复电金登干，表示他并非想破坏李福谈判，“我不一定要推翻这谈判，因为它可能取得和平”。指示金登干：“在巴黎应谨慎”，不要轻易露出真面目。果然，就在这天，李福已经达成协议，不无沮丧的赫德只好通知金登干：“目前你可暂停活动。”[④]

从这一阶段赫德的活动来看，虽然其中不无为法国侵略者张目的嫌疑，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为中国设想的成份在内，不能一概否定。

---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1)，第650～653页。

②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45页。

③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44页。

④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45页。

在第二阶段中，当中法因“观音桥事件”重起冲突后，赫德就不失时机地掺入中法交涉之中。闰五月初九日（7月1日），他以向总理衙门转达与谢满禄会晤情形的方式，站在法方的立场上，加入到胁迫清政府答应向法国赔款的大合唱中，大谈特谈“据谢云，确系中国理短”。“闻谢言，福总兵约于闰五月十三日（5日）可到法国，法廷一问详细，必将著水师官来华动手，那时便难办了”。初十日，总理衙门奉旨：认为“观音桥事件”的责任在法方，中国不能向法国赔款，“著该衙门传知赫德，均仍按前日照会之意办理，勿得逾此范围”①。

赫德并不甘心就此被摒弃于事外，稍后，他得知身负与中国谈判责任的新任法国驻华公使巴德来到上海，便私自跑去与巴见面。闰五月二十四日（16日），他派税务司贺壁理回北京，向总理衙门报告他与巴交涉的情况。他先谈巴德诺的意见，强调有孤拔海军舰队作后盾的巴德诺的目的主要是向中国索偿：两次会晤巴大臣，伊云：中国若允于京报内明降谕旨，饬将驻扎北圻兵勇立刻调回粤、滇所辖界内，并允赔偿法国一切军需等费，则本大臣愿在上海会同中国特派全权大臣商订条约。并云：中国若不允照行，则古军门按照本国末议（即哀的味敦）之文，占据中国某处地段为质，除于他处动兵外，俟将法军逐日加增各费，扫数交清，及中、法交涉事宜，全行议妥，始将所占之地退还。兹续为论议，亦属无裨，中国只立订允与不允而已。末了，赫德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巴大臣甚惜此事，颇具礼貌，而坚持不移。且古军门在上海，现已备齐，以便于本月二十七日（19日）起手办理。兹特剀切陈明，

① 《中法战争》(5)，第400～401页。

现时若不依允，则此后法国需索定属有增无减。"[1] 从末尾的这些建议来看，赫德其实是站在法方的立场上，来威胁中国答应赔付偿款。所以，总署大臣周德润为此奏称："赫德来署，臣察其人甚狡猾，语多恫喝，断不可委办要件。"[2]

不过，清政府还是部分采纳了赫德的意见，当天即颁旨召回进至北圻的援越各军，同时派两江总督曾国荃等前往上海与巴德诺谈判，要赫德辅助商办一切。要求法方在未定议以前，不得开衅。

但是，赫德在和巴德诺的会晤中，却擅自代表中方答应给法国赔款。7月14日，巴德诺电告茹费理："赫德先生今晨来看我，告诉我依照他所接到，来自北京的意见，总督将受权商决赔偿问题一事，殆可一定。据此假设，他问我法国可同意减少多少。我答说：如果我们获得迅速解决，则两亿三年付清，我们或可认为满意。"[3] 赫德于闰五月二十六日（18日）电告总理衙门："现又三次会晤巴大臣，伊末云本国已发末议（即哀的味敦）之文，内载各节，本国不能议改等语。故思赔偿军费一层，虽终不能请他国议论，而偿数多寡，似可请有约各国参订，或有裨益。"[4] 同日又电："祈贵衙门照会谢署大臣，一请转致巴大臣，恳将末议所订期限展缓七日；一允于意外之事，愿略偿经费、恤费为理。"并强调若不如此办理，则交战不免也[5]，这就等于是帮法国向中国催迫赔款。

---

① 《中法战争》(5)，第417～418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20页。
③ 《中法战争》(7)，第232页。
④ 《中法战争》(5)，第418～419页。
⑤ 《中法战争》(5)，第419页。

这时，总理衙门已命上海道邵友濂直接与巴德诺交涉，并于二十七日将此事转知赫德，赫德为此大为不满，表示："渠经理此事颇费苦心，若他人掺评无益，嘱友濂不必与巴使谈。"[①] 他于同日致电总理衙门，重提法方勒索赔款一事以恐吓中方："此事仅偿款一节难办。兹特复明偿款万不能免，而名目可不拘定。"[②] 由于赫德在这个电报中赤裸裸地要清政府答应给法国赔款，清政府十分反感，于二十八日（20 日）复电，不要他在中法双方之间周旋，命他返回北京："昨来电仍言赔费，难办。中国事本理直。……若总税务司不能据理代争，致法人强中国以必不能从之事，一旦开衅，该税务司平日声名必因此顿减。……该税司调处，极见用费苦心，倘难就绪，可先回京。"[③] 接获此电后，赫德虽已十分无趣，但仍硬着头皮顶下去，于是就抬出巴德诺来为自己装面子，二十九日（21 日）复电总理衙门："巴大臣甚讲求不相失和，而除允偿一层，别无免却失和之法。故至六月初十日（31 日），若尚未允行，则古军门必于十一日（8 月 1 日）起手办理。兹总税务司拟待至十一日，若此事未妥，即便回京。"[④]

六月初三日（7 月 24 日），赫德为偿款事向总署电递节略：至偿款一节，据总税务司意见，法国实属不公，且为数亦属过巨，中国原应不认赔偿。惜至此地步，非可论理，只能论力。此时之力，惟法国有之。现偿银四千万两，较之迟延一载，增至四万万两，而无法不予，为愈多多。故思莫若此时予

① 《中法战争》(5)，第 420 页。
② 《中法战争》(5)，第 421 页。
③ 《中法战争》(5)，第 428 页。
④ 《中法战争》(5)，第 432 页。

偿为惬[①]。初四日（25日），曾国荃到上海。他先让邵友濂找赫德商议与巴德诺谈判事宜。赫德向邵友濂称："巴意江督来必见，惟不言款，则公事难商。"[②] 后来曾巴谈判失败，曾国荃归咎于赫德，于十二日（8月2日）电告清政府："本午罗丰禄晤巴，剖析续约传误之故，并得赫德播弄之情，巴气稍折。"[③] 并要求清政府将赫德召回。清政府遂于十三日（3日）电知赫德回京。

但赫德依然赖在上海与各方斡旋，时时以法方即将开战来恐吓清政府。十三日，他告诉曾国荃："法公司船悉开出口，恐将在江圻（动手）。"[④] 当晚，他通过德璀琳告知李鸿章："巴接法廷电，或战或和，听巴酌办。赫尚欲此事就款。"[⑤] 赫德既有此作用，十四日（4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为赫德说情，要求将他仍留上海帮忙：沪议停后，苏绅电称：此事误于赫不与议，求鸿饬赫语巴商转圜策，因令罗丰禄促赫往商。昨晚德璀琳接赫电云：巴意不提兵费，限十年内岁给百万以为边界经费，即夕复准可免决裂。赫虽胆怯，无坏意，似勿亟调回[⑥]。总理衙门并未采纳李鸿章的意见，没有答应给法方边防经费，并坚持要赫德回京。于十五日（5日）去电李鸿章和邵友濂："赫虽无坏意，胆怯究恐误事。沪议猝难就绪，一旦开衅，各口税务先须设法，是以本署前电催赫来京商榷，别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94～95页。
② 《中法战争》(2)，第439页。
③ 《中法战争》(5)，第459页。
④ 《中法战争》(5)，第461页。
⑤ 《中法战争》(4)，第176页。
⑥ 《中法战争》(4)，第175页。

无他意。望再电速其北来。”不允赫德继续留在上海[①]。

巴德诺曾电告茹费理谈对与赫德背后交易的情况：

自我到上海以来，陆续与我往来的谈判人员，其间惟赫德一人，得与作郑重的商谈。这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为使帝国政府免因与法国决裂遭受毁灭性的后果，想法子找到一个双方均可接受的办法。他尤其坚决主张，必须先找到一个可使北京朝廷承认法国要求的公式。我看这样双方当不难取得谅解。我对赫德说：向中国要求赔偿的数目，起初可能显得高些。法国目的乃用该款抵偿它无可否认地因为谅山事件，在现今与将来，所要担负的巨额费用。我已向全权代表们说明过，这些非常的开支，其目标总而言之，乃在保证东京的安全，清除跳梁的土匪，一言以蔽之，即建立一个局面，使两邻邦开拓各获利益的商务关系。如是，倘中国分担费用，乃甚可赞同者；为便利（问题的）解决起见，我们法国可承担最大部分，比方说三分之二。我们估计，因目前的困难所将引起现今及将来的负担为二亿半。中国如分担八千万，我必尽力使我政府接受这个办法。无论如何，这似乎是获致协议的一个基础了。

赫德答应去考虑一下。八月三日，他又来见我，并依据我们以前的谈话，做了一个解决的计划，交我考虑。内容即中国答应在边疆利益捐输的名义下，十年内每年担负付给八百万法郎。他要求法国维持其安南进贡，作为交换。在我们与安南订立诸新约以前，越廷每二年进贡一次

① 《中法战争》(5)，第468页。

与中国皇朝。据赫德的说法，这不过是一种仪式而已。我回答赫德说，关于进贡一节，我不可能赞同他的提议，因为此项提议，等于间接否认我们的保护权。但是我让他知道，照他所提的公式，八千万分十年付给，有接受的可能。他答应与全权代表们协商后，给我回话。[①]

可见，此时的赫德已完全是法国的代理人了，清政府不让他过问中法谈判是对的。

赫德并没有遵命北上，还是留在上海插手中法谈判。此间，赫曾建议中、法各请一国调处。但为法方拒绝，后又建议邀请三国调停。但均无结果。十七日（7日），陈宝琛电告总理衙门："赫奉调后，尚出力。"[②] 罗丰禄则向李鸿章报告赫德转达巴德诺的一个信息：将要求中国赔款的数目减至"四百万"[③]。赫德也遣税务司贺璧理到总理衙门，要中国赔款给法国，"有四百万之数即可了结"。开始，总理衙门并不同意这个要求。但十五日发生了第一次基隆之战。战后，先是法方传播基隆失守消息，并借此向中方勒索巨额赔款。李鸿章也一时慌了手脚，于十九日（9日）去电上海：要赫德去问巴德诺"四百万可了之说，能再减若干，作何名目，妥酌电示"[④]。赫德没有直接答复李鸿章，却命贺璧理再去总理衙门，转达他十八日的一份电报："内称法国之事，因议院诸人均信福禄诺续约三条之说为真，佥谓中国违约，是以张此大口，向中国索偿。现在张口不能合口，只要中国与以下台地步，便可了事。"而

① 《中法战争》(7)，第241～242页。
② 《中法战争》(5)，第472页。
③ 《中法战争》(4)，第178页。
④ 《中法战争》(4)，第180页。

所谓让法国下台的办法，即是“前拟给银四百万两，惟恐有伤国体。现拟作为谅山士卒抚恤银两，……若用起兵来，所伤实多，不如就此完案为妥”。然而，未待总理衙门答复，晚间十一点，贺璧理又到总理衙门称：顷接总税务司来电，内称基隆现被法人轰没炮台，占据煤矿。总税务司面见法国巴使，据云前议四百万恤款，中国不允；现在情形不同，改恤款为边界经费，加至一千万两。如果中国立刻允准，仍分十年清还，每年一百万两，仍可了结，基隆亦即退回中国，法不占据。如不肯允，定要轰夺船厂并福州省，再驶船北来索款。到那时候，台湾地方即归法国，是不退还的了云云。“据总税司看来，不如趁此了结为妥”[①]。但清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赫德一直延宕至二十八日（18 日），看到自己实在无法插手，才怏怏地乘船先到天津，然后进京。

中法重开战端后，赫德仍与各方保持密切联系，一有机会就掺予其间。

自清政府于七月初六日对法宣战后，一方面，刘铭传率领台北清军在沪尾大败侵台法军，另一方面是滇、桂官军，陆续进入越南北圻，与侵越法军作战。这样一来，就威胁到法军对越南北圻的殖民统治，法国殖民当局好不容易取得的侵略成果面临重新丢失的可能。对于局势的这种变化，赫德仍不放过各种机会，甚至不惜泡制各种理由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九月间，法国驻津领事林椿秉承法国政府的意旨，提出中法谈判的新条件，通过赫德和德璀琳转达给总理衙门。九月初九日（10 月 27 日），赫德偕同德璀琳赴总理衙门，耸人听闻地称：“目下

① 《中法战争》(5)，第 483～485 页。

遥想台北一带，恐已被法人进踞，而铭军余存之兵勇退入内山矣。复闻法国来华之兵舰将及四十多号，内有铁甲九艘，上等大铁甲一艘，吃水浅之兵舰十四艘。一国之师船聚集如此之多，恐前此中华海面得未曾有。并且税司得有确电，知法京首相裴礼已定议，法军在华不可旷日持久，须急速办理：第一，系谋占台南北全郡，并毁各炮台营盘，兼使铭军腹背受敌，难出重围。第二，系派新兵往东京，将西北两路华军竭力抵御，以进攻中国边疆。现得法国官电言，法军与北路华军在长江交仗，法军已夺炮台，计歼华军三千余人，并有法军潜往华军之后以截其归路。第三，系得台地立埠后，煤斤、食物俱全，冬间再扰沿海、沿江各炮台一切。”因此，逼迫清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新条款：“但云如果稍有不合，仍必踞台打仗。照税司之意，至多议到如此条款，已是极好。一、系中国如将北圻各军调回边界，法国则饬在华各水军不再进扰沿海各处。二、系中国再批准天津简明条约，并照第三款会议通商详细条款。三、法军在淡水、基隆暂不撤回，以俟津约办妥后，再行退出。至法国虽驻淡水、基隆，而该处地方官仍照旧办事，有自主之权。四、兵费一事，法国可以不索，亦可勿庸载在章约。第法国要在淡水、基隆暂管煤矿、海关若干年。”

赫德在末后再次威胁清政府，对于这些新条款“倘仍坚拒，诚恐台地全失，非数千万不能赎回。不特中国沿海七省之屏障，一旦恐有不测，从此无安枕之时，兼且各国必谓中国自知理短，畏人论断也”[①]。

当天总理衙门没有立即答复他们，九月十一日（29 日），

① 《中法战争》(6)，第 5～6 页。

赫德再次偕德璀琳来总理衙门，追问答复情形。结果，由于赫德提出的四条距离清政府的期望太远，特别是第四款允许法国暂管基隆煤矿、淡水海关若干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因而遭到总理衙门的明确拒绝："你前日所说四条，惟第四条将基隆租与法国，有伤国体，恐办不动。"赫德知道这是因为清政府听到清兵取得"沪尾大捷"后改变了态度，为了自己体面下台，居然抛出一套谬论来恐吓对方："倘法人大败，势更不妥。缘法人向来是此脾气，败了越要战，反致不肯和。"这就变成法方战胜中国固然要赔款，法国打败了中国也要让予经济利益的荒谬逻辑。但总理衙门没有因此而被吓住，反而针锋相对地答以："中国亦不能相让，亦不怕他，虽打仗无把握，亦要打到底。"①

十四日（11月1日），赫德致函总理衙门，仍胁迫中国答应他提出的让法国暂管基隆的办法："据闻法国亦有下台之难处在，若不少为推让，则法国亦即难于自止。……惟目下在法国之势已皆备齐之时，中国则仍在设备之时，以是较之，则不若乘此以息事，实为得机。"②

十七日（4日），赫德独自一人到总理衙门云，催问对德璀琳所拟四条办法的答复，在又遭到拒绝后，他根据法方意图致函总理衙门，提出新的两条："若不准照四条之办法了事，可否照后开之两条商办：一、一面由法国饬在华各水军不再进扰，一面由两国将津约案照原意另行妥议办理；一、一面由中国将新约各节办妥，并将北圻各兵调回边界内，一面由法国将

① 《中法战争》(6)，第16～18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400页。

基隆、淡水各兵调回。至法国可否允从照办，自难预言。"①这已不含中国让予法国经济利益的条款，但清政府也没有答应。最后，赫德才承认其实法国的立场已经后退到只求履行津约即可："法相茹斐礼对人说，现若仍照津约办理，即可了事。"但总理衙门仍强硬地加以拒绝："开仗后，津约已作废纸。你此节略内，批准津约一语，恐仍难行。"②

二十日（7日），仍不死心的赫德致函总理衙门论中法和约条件的分歧，希望探到中国拟议的议和条件：德璀琳所拟"四条，若中国决意不从，则中法两国所争之事，仍系无法可了也。则不妨由中国将中国可允之办法，转述于法国，即凭此办法酌商，如此能否成事则难预知也"③。

二十三日（10日），清政府提出新的议和条件八条：一、津约本已作为废纸。今既修好，仍准商议，惟界务、商务尚须酌改，总期彼此有益。二、滇、粤边外中国驻兵，业已多年，将来勘定南界，由谅山至保胜一带划一直线，华兵驻守，以此为限。三、线界之外，法越通商听其自便；线界之内，中国择地设关及一切通商事宜，将来派员详细定议，总期于两国均有裨益。四、环球与国只能通商立约，不能预其内政。嗣后法国在越南通商，亦不干预其政令。至越南照旧贡献于中国，法国不得阻止，以合至理。五、法国应派公正大臣与中国驻英曾大臣，或文移详议，或同来中国商办。六、中法文字不同，翻译恐涉歧误。此次立约，中国应以中国文字为主，法国应派通晓中国文字之员，详慎翻译，并令书押，以昭慎重。七、现既议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405页。
② 《中法战争》(6)，第95～96页。
③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413页。

和，中国入越之兵，暂扎不进，法军退出基隆，泊船待议；俟和议就绪，两国定期撤兵。至台湾封口之说，有碍各国商务，应由法国自行撤去。倘以占据基隆为要挟之计，和议即难开办。八、两国构兵，中国既费巨款，复添备保护在华法人之费，业经数月。马江之战，法人先期攻我水师，致损华船多只，理应计数索偿。今已弃怨修好，中国亦可免索此项巨款。倘法国有不允之条，应先赔中国以上各费，再明定和战之局[①]。对于这个新八条，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评论说："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提案"[②]。当中国政府将这八条递交给英国调处，十月初二日（11 月 19 日）就得到答复："中法意相差太远，不能调停。"[③]

十月十四日（12 月 1 日），赫德向总理衙门递送谈中法和战的节略，仍想胁迫中国答应法国所拟的四条："中国兹应于两项办法中择一办法，一则主和，即照法国上月所开之四条了事；一则主战，即战到底也。若拟主和，应速即持定主见速行，缘日内恐其又变前言也。若拟主战，则或胜或败，必俟至其临时始得见实；若胜则不知须费帑饷若干，时日若干，以致人命若干，乃得到底谓为胜；若败则不可复问矣。"[④]

二十二日（9 日），赫德又致函总理衙门，探问中国可以允准的议和条件，这次，除了津约之外，他已不敢再提损害中国利益的新条款了，反而提出有利于中国的条款："兹请问津约五条之外，法国若允从另添后开之条，可否由中国复行批准

① 《中法战争》(6)，第 102～104 页。
② 《中法战争》(7)，第 280 页。
③ 《中法战争》(6)，第 141 页。
④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 461 页。

津约，或照津约字义复议简明条约之处。

一、中法两国拟定将以上第一条南界字样，改为由谅山至保胜之南划一直线为界。并将第四条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改为有越南照旧进贡与否，由越南自行作主之意在内。又将末条以法文为正字样，改为应由两国各按其本国字样办理，若有不同之处，则凭备之英文为正。”① 但是，这时中法两国军队在越南及台湾激战正酣，双方都在等待作战的胜负结果，所以谈判没能进行下去，赫德白忙了一场。

从这一阶段的表现来看，赫德的帝国主义劣根性大发作，公然充当法国侵略者的帮凶，千方百计出面胁迫中国答应给法国赔款，至少也要给予一定的经济利益作补偿。要不是清政府看透了他的用心，坚决予以拒绝的话，赫德就会帮助法国实现了它的侵略愿望。

在第三阶段，这段时间发生侵台法军扣押中国海关巡船“飞虎”号一事，为赫德提供了一个直接与法国政府联系的机会。

当时，法国海军已经宣布封锁台湾海面，但由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却不把它当作很大的事情，负责在台湾海面供应各灯塔给养的海关巡船“飞虎”号，仍像往常一样来往台湾海面执行日常工作。不知是否出于对中国海关因战争爆发而想解雇法籍雇员一事的报复，侵台法军悍然扣押了“飞虎”号。事发后，光绪十年十一月廿二日（1885 年 1 月 7 日），赫德去电金登干解释此事的曲折及解决办法，要金登干到巴黎找茹费理交涉。

---

① 《中法战争资料续编》(2)，第 472 页。

但既会见到茹费理，赫德就想到，不如就此顺便过问中法谈判情况，看看能不能插手其间，操纵谈判过程。因此，第二天，赫德又去电金登干，叫他以清政府代表的身份与茹费理联系：

> 如果灯塔供应船之事，能使你与茹费理会晤，你应趁机利用，向他解释说，我主张和平，曾多方试图解决，我已劝导总理衙门说出中国的真正目的，接受英国的调停，并同意附加条款等等。我这样做，是为了谈判能以继续，希望最后成功。你可以私人名义为了和平，婉询他对附加条款的意见。他是否已完全舍弃这办法？如果是的，可以这样进行：中国提案内既有法国不能接受的，而法国去年10月的四点提案内又有中国不能接受的，是否可以容许调和，即中国放弃边境线，法国放弃第（4）点关于淡水关税和基隆煤矿等等。我已使总理衙门让到现在地步，如法国能应允，相信必可在此地设法获得接受，但在茹费理先生能暗自保证同意以前，我尚在犹豫。一个初步协议将是必需的，可授权你先签字，协议包括：(1) 中国同意批准津约，法国同意解除台湾封锁；(2) 中国同意商订商务条约，法国同意在条约签订时，撤退基隆军队等；(3) 北圻中法军队各自保持现在地位不动，直至商订撤兵日期为止。如茹费理能接受，我就有办法安排。[1]

金登干于廿四日（9日）回电告知他从他人那里探听到的消息称："茹费理一心想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再谈判……明日我将赴巴黎，如果茹费理并不想真正解决，我们一露口风，也许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8～69页。

反倒惹起他的贪欲。"[1] 到廿六日（11 日），金登干已有好消息相告："茹费理订星期日晚私人会晤。"[2]

开始，他们谈判的内容主要还是"飞虎"号被扣事，但赫德指示金登干设法往中法和谈上引。到十二月初二日（17 日），赫德明确指示金登干与茹费理谈中法谈判事：

在这时候，照下面进行：总税务司与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深悉谈判内情，并愿推动和平解决，因此，总税务司希望法总理能准许向他探问是否可以接受附加专条？如不能接受，第 178 电所提出的调和办法是否可行？如调和办法也不行，那么，什么是法国的最低条件？向他说明现在既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与茹费理先生直接接触，而总税务司可与中国最高当局直接联系，如能得到关于以上各点的确实意见，或可能使活动成功，如法国要在现阶段和平解决，这就是最合适的机会。总税务司是中国的官吏，自然要求能有对中国最好的解决方法，但也渴望推动任何可能的方法。你要慎重，并把我所发各电书面摘要供给茹费理；向他解释说，我这样做，虽不是奉命的，但也不是私自进行的。[3]

十二月初九日（24 日），金登干与茹费理会晤。第二天，他将会晤情况电告赫德：

茹说：附加条款与津约矛盾，津约不提宗主权是有意的，"威望体面"字样决不能解释为含有宗主权的意思。至中国所要的边界地带，那也正是法国所要的，所以附加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69 页。
②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69 页。
③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70 页。

条款完全不能接受。将来法国在北圻取得军事胜利之后，中国自会变更条件。我当即提出调和办法。茹说，这种办法从来没有人向他提过，这是他所听到的惟一合理办法。……（他）只能对直接来自总理衙门的提案表示意见，附加条款是不能接受的，但对新的提案，如能在星期日以前正式收到，将予考虑。①

得到这样的答复后，赫德可能和清政府中的掌权人物联系后，于十五日（31 日）答复金登干，中国仍坚持在所提八条的基础上谈判。于是，双方开始了长期的讨价还价的艰难过程。不久，赫德逐渐取得清政府的完全信任，从而把对法谈判的权力交给了他。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七日（2 月 21 日），赫德电告金登干："目前的谈判，完全在我手里，我要求保守秘密，并不受干预，我自守机密，总理衙门也如此，皇帝已有旨，令津、沪、闽、粤各方停止谈判，以免妨碍我的行动。"② 而茹费理对于赫德也十分欣赏，他让金登干转达他的看法："我对赫德爵士给我的希望，感觉满意。我同意只通过一个惟一的居间人，即他自己，并对每一件事保持极度的秘密，直到我们能恢复公开谈判为止。"③

其间，由于发生了侵越法军大败援越桂军并攻进镇南关及击退围攻宣光的滇军等事件，于是中国的立场逐渐改变，最后也同意在津约的基础上与法国和解。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赫德电告金登干："中国政府真诚希望和平，批准津约，宣布媾和。商订详细条约并切实履行的谕旨，将为全国所遵从。"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71 页。
②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72 页。
③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81～82 页。

同日，他还让金登干向茹费理转达由总理衙门领衔王大臣于御前会议后，让他转递给法国有关中国方面的议和条件称："皇帝批准以下四款方案：第一款：中国方面允准 1884 年 5 月天津草约，法国方面允在津约规定外别无要求；第二款：双方同意尽命令能发出和收到的速度在各处停止敌对行动，法国应允停止台湾封锁；第三款：法国应允派公使北上，即到天津或北京，商订详细条约，双方规定撤兵日期；第四款：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二品衔，法国荣誉军团骑士金登干受命为专使代中国与法方所派代表签订本草约，作为初步协议或（谈判）起点。"[①] 这些条件已与法国的要求基本一致。

虽然两方的底牌已经摊开，但真正达成协议仍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和修订过程。而且，在一切基本谈妥时，法国陆军部长却命令尼格里于二月初七日再次进攻镇南关，结果被中国军队打得大败，损兵折将，于十三日被迫退出谅山。消息传到巴黎，茹费理内阁因之倒台，但侵台法军却在两天后占领澎湖。之后，是等候法国新内阁成立的时期，所以一直延至二月十九日（4 月 4 日）下午 4 时，法国总统才命法方代表毕乐与金登干签订了《中法停战条款》，又称《中法初步协定》，共三款：

第一款：中国允将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五月十一号所订天津条约批准，法国亦惟愿完全实行此项条约，别无他种目的。

第二款：中、法两国允俟必须之命令能颁布及奉到后即行停战，法国允将台湾封港事宜撤除。

第三款：法国允派大臣一员至天津或北京商定所订条约之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83 页。

细目，然后再由两国订立撤兵日期。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四月四号订于巴黎。[1]

从而结束了中法战争。

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中，赫德明白再扮演法国的帮凶于事无补，只得老老实实地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与法国谈判，当然，主要是由于战场上的形势变幻，最后使得双方以履行津约为基础达成了和约，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赫德的努力，事情也许会有更多的曲折，从这一点来说，赫德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　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中法战争之前四十余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最多时出动军舰约四十艘，军队万余人，纵横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天津等地。战争从1840年开始，到1842年结束，中国战败，被迫与英、法、美等国订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元等条款；约二十余年前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先是占领广东，接着攻占天津和北京。战争从1858年开始，到1860年结束，中国又遭惨败，连经营了一百多年、收藏极多珍宝的圆明园也被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丧失了许多权益。在中法战争之后的十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只进行了约八个月，日本陆军在我国东北地区横冲直撞，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日本海军则在消灭中国

① 《中法战争》(7)，第420页。

最强大的北洋舰队后，占领了旅顺、威海卫等海军基地。被打得大败的中国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包括割让台湾、赔款银 2.3 亿两等苛刻条款。再过五年，则是八国联军侵华。在这次战争中，天津和北京再次被占，全国许多地方被侵略者蹂躏，中国被迫与入侵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银 4.5 亿两，加上利息和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约达到十亿两白银，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国家还是这些国家，军队还是这些军队，但中法战争与其他四次对外战争的结果却完全不同，那么，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原因是很多的，主要有两点：

1. 中枢了解敌情，制定正确决策。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刚与西方列强作战，对外国的情况缺乏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制定适当的对策。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举棋不定，忽战忽和，弄得前敌将帅和士兵也无所适从，不能激起杀敌热情，自然难以取胜。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较日本在军事上本来占有优势，但清政府却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军事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军事力量，严重轻敌，在备战不足时即仓促出战，人为地将全局的优势变为局部的劣势；而稍遭败挫，则又怯战求和，严重地挫伤了前敌将士的抵抗意志，以至大部分军队在战争中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无法挽回败局。日本军队只付出二千多人的伤亡即已打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取得巨大的侵略利益。至于与八国（实为十一国）联军开战，则完全是被迫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方面，战败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却通过各种途径，较多地了解到法国的情况。主要是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步兵得三千人，厘饷

得五万两"[1]，却能在越南长期抗法，斩将搴旗，屡建功勋；以及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多次报告法国情况："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剥肤噬脐之侮。法人内怯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2] 知道经过普法战争惨败的法国，国力削弱，已非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样强悍，要跨海万里来侵略经过二十余年洋务运动、国防力量有所增强的中国，可能不易占得便宜。最后得出诸如张佩纶奏折所说的："中国诚贫，法亦不富，中国诚弱，法亦不强"的结论[3]。这种对敌人较为正确的了解，为清政府制定坚决抵抗，不轻易向法国的勒索讹诈屈服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清政府及前敌将士的抵抗意志比较坚定，即使遇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或对方外交上的威胁恫吓，也不轻易动摇，不让法国勒索巨额赔款的阴谋得逞，这是中法战争取得不败结果的保证。

2. 文韬武略，发挥极致。战争的决策虽然是由中枢政府决定的，但具体实施则由前敌将士来进行。国家的方针大略决定以后，能否实施还要看文武官员和前敌将士文韬武略的发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除了林则徐守广东、邓廷桢守福建、僧格林沁守大沽打过一些胜仗外，其他文官武将似乎都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以致前线败报频传，局部的一两次胜利无法挽回全局的失败。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海陆各军的装备远较中法战争时优良，却只有在聂士成指挥的摩天岭保卫战中打败了来攻的日军，别的无论是在中枢决策的文臣，或是在前敌作

① 《中法战争》(4)，第341页。
② 《中法战争》(4)，第257页。
③ 《中法战争》(5)，第162页。

战的海陆将士，也没有多少可以称道之处。各军虽然不乏为国捐躯的壮烈之士，却是打败仗的人多，能够杀敌致果的人少。而且诸军一败之后，即不能复振，陆军除了平壤一战抵抗较为激烈外，余下的则是从朝鲜退过鸭绿江，再从九连城、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旅顺、威海卫一路狂退，说不上是进行了真正的作战；北洋舰队主力则从汉江退到黄海，在黄海一战败后，再退旅顺、威海卫，只知龟缩海港，避战保船，把杀敌保国的责任置于脑后，直到全军覆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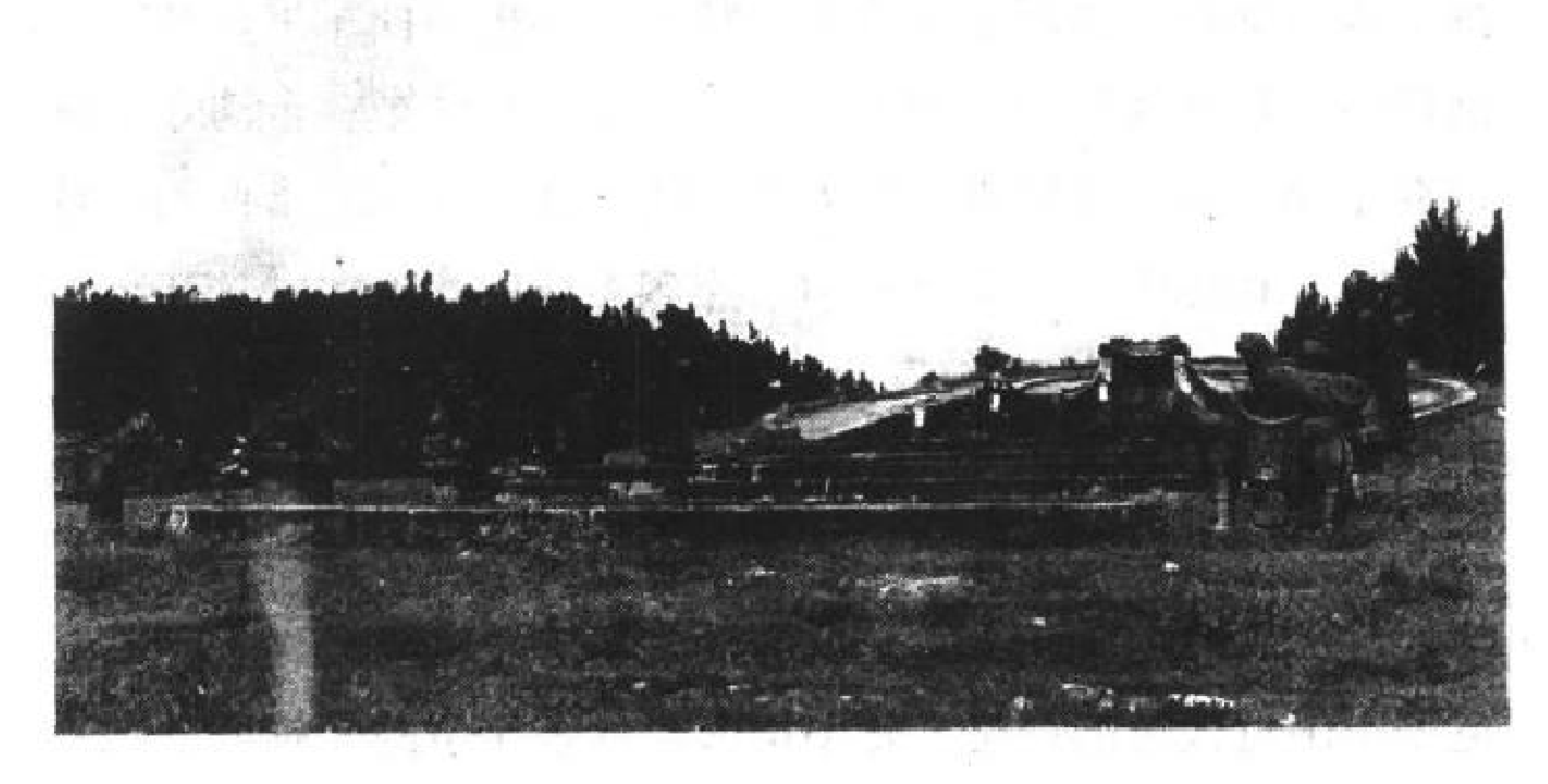


冯子材晚年书写的一幅中堂“天地正气”。赠买山县关孝达先生。

在中法战争的抗法卫国阶段，这种情况却有了根本的改观。在这个阶段中，无论是清政府的中枢决策或是前敌将帅的韬略，尽多可圈可点之处。其中枢决策方面，首先是不因前敌的一时败挫而动摇其抵抗决心，始终咬紧牙关，顶住了各种军事和外交的压力，不向法国的讹诈赔款阴谋低头，这对鼓舞全国军民的抵抗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马江战败后，毅然对法宣战，这个极具魄力的举动，不但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外侵的意志和心声，也

是亚洲各国反帝斗争的创举；其次是在法军集中兵力围攻台湾的紧要时刻，制定了“战越牵敌”的战略决策，命令援越各军主动攻击侵占越南北圻的法军，不惜以重大牺牲，牵制住侵越法军不能调援侵台法军，迫使法国将战略重心从中国的台湾转移到越南北圻，极大地减轻了国内的战争压力；特别是在中法重新起衅之初，任命淮军宿将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成为台湾抗法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一着；又在“战越牵敌”的关键时刻，任命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为冯子材组织和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条件，终于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

前敌将帅和士卒的聪明才智在这次战争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首先是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将士，团结越南抗法军民，坚持在越南北圻长期抗法，取得阵斩安邺、力歼李维业、两败波滑、左育轰敌等辉煌战绩，狠狠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阻滞了法国侵略和吞并越南、进而染指我国西南边疆的进程；其次是刘铭传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卫台北，先后取得第一次基隆



冯子材墓，位于钦州市沙埠镇泥桥村

之战、沪尾之战的胜利，为挫败法国“踞台为质，勒索巨款”的阴谋奠定了基础；并巧妙地施行“弃基保沪”策，放弃基隆让法军占领，却在基隆外围与法军展开长期的争夺战，从而把本来可以给中国沿海各地带来极大危害的孤拔舰队困于基隆一隅约八个月，使之进退维谷，无所作为，为粉碎法军侵华企图做出重要的贡献；至于冯子材指挥取得的镇南关大捷，更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侵战争的一次光辉的战例。当时冯子材麾下的萃军18营9000人是新募而成，既少训练，装备亦差，尤其是缺乏攻敌利器西式大炮；而协助萃军作战的友军则是屡战屡败的援越桂军。冯子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华，勉励和团结友军联合作战，调动敌军在不利的条件下决战，变我军的劣势为优势，终于在关前隘大败来犯法军，并乘胜追击，收复文渊、谅山等失地，迫使法国主战的茹费理内阁下台，不得不与中国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中法和约》，奏响了中国人民反帝战争的凯歌。在中法战争的整个作战过程中，虽然中国军队战败的时候较多，但在抗法卫国阶段，却是屡蹶屡起，屡败屡战，没有那种一溃即不复成军的情况。如援越桂军虽在北宁一战惨败，但在随后而来的观音桥一战却痛惩法军；台湾守军刚放弃基隆，马上又取得沪尾大捷；潘鼎新、苏元春指挥的援越桂军虽然在郎甲、船头、谅山、文渊等战中吃了大亏，甚至丢掉了镇南关，但完成了“战越牵敌”的战略任务；当冯子材振臂一呼，他们又积极协助，并肩作战，终于取得了镇南关大捷。这些情况在其他四次反抗外侵战争中却很少见到。

综上所述，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抵抗外侵的最高成就，创造了中国近代史的奇迹，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典范。

中法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

来看：

1. 政治上改变了中国的政局。

①最终确立慈禧太后的独裁统治。光绪十年二月，由于援越桂军在北宁一战遭到惨败，清政府追究主持中枢的军机处的责任。早就对领班军机大臣奕訢不满的慈禧太后趁机与醇亲王奕譞等酝酿一场政变，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撤换了以奕訢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换上了更加听话的新军机处。这件事使慈禧太后去掉了一个惟一能够与她分庭抗礼的政敌，开创了慈禧太后独裁统治的时期，严重地影响晚清历史的发展。不过，就中法战争而言，新的军机处对法态度比较强硬，当中法因“观音桥事件”重新起衅后，清政府顶住了法国勒索赔款的讹诈，坚持抗法战争，对于争取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果断地启用休致在家的刘铭传和冯子材到重要的军事指挥岗位，为取得台湾保卫战和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条件；再次，长期流亡于越南的刘永福和黑旗军早就有回归中国的要求，但旧的军机处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新的军机处顶住了李鸿章、岑毓英等大臣的反对意见，在对法宣战的同时，毅然宣布给刘永福授官，接纳黑旗军进入清军抗法队伍，最终解决了这个久拖不决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它对中法战争还是有贡献的。

②清流派的解体。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以张佩纶为首的一批“清流派”言官御史，经常上奏弹劾权臣，议论朝政，一些文武大员的升降黜退都系于他们的笔锋，这在封建社会里本是常见现象，到不足为奇。但他们不知适当收敛，以致书生谈兵，干预军政，利用朝廷的信任，褒贬进退前敌将帅，就不完全适当了，有时甚至起到了消极作用。如张佩纶青睐素不知兵

的徐延旭，力荐他可胜任督师广西关外边军；却憎恶能征善战的广西提督冯子材，因而上奏举荐徐延旭为广西巡抚，却逼迫冯子材称病开缺，终至酿成北宁一战的惨败，“清流派”主将张佩纶、陈宝琛因而遭到严谴。张佩纶还极力反对清政府重新起用冯子材，这更是极其错误的。事后，清政府对于言官御史干扰军政，特别是随意进退前敌将帅的建议，采取了抑制冷落的态度，在甲午战争期间，就基本没有出现过这种反常的现象。

2．经济上开始借用外债支持战争。

清政府对法宣战后，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汇丰银行借款以充军饷，成了中国政府利用外债支持对外战争的滥觞。后来，在甲午战争开始，清政府就想方设法向外国银行借款以支持对日战争。再往后，借用外债支持内外战争便成了历届旧政府的惯例，为了偿还这些债务，必然会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3．军事上影响了海陆军对外战争的战略战术。

①比较认真对待对外战争。在援越抗法之始，清政府并不十分重视，只是派当时国内军事水平比较低下、甚至没有攻敌利器西式大炮的广西边军担当抗法重任，拨给的经费不到60万两银子，其结果就是北宁惨败，损害了国威和军威。而在筹备甲午战争之始，清政府派出的主力军队是配足西式大炮、战斗力最强的淮军，一次就拨给300万两经费，并在挑选主帅、集中舰队等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与当年的援越桂军自不可比拟。虽然清军在战争中仍然是以惨败而告结束，但这只能归因于他们面对的敌人更强大了，而不能说清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了进步。

②对海军建设和战略战术的影响。⑴加强海军建设。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因海军力量薄弱，深受法国海军挟制之苦。战后，清政府对海军建设比过去更为重视，以至在甲午战争前夕就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当时全国四支舰队的总吨位约八万吨，其中，北洋舰队一支即已拥有大小舰只约四万吨，而日本全国舰队总吨位仅约六万吨，整体实力不及中国。⑵集中全国海军力量的问题。在中法战争中，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国荃因为看到中法海军的巨大差距，坚决拒绝执行清政府关于集中全国的弱舰去马江对抗法军的强舰的命令。但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张佩纶却狂妄固执，自以为是地贬低法国侵华海军的威力，愚蠢地调集福建水师的弱舰与孤拔所率法军强舰同扎相持，结果在马江一战中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但是，地方官员这样拒绝中央政府集中舰队力量对外作战命令的做法，却为后来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以致在甲午战争开始时，李鸿章提出调动全国海军力量以加强北洋舰队的主张，却得不到其他三支舰队的支持，北洋舰队只勉强留下广东舰队的“广甲”、“广乙”两小舰；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损失严重，急待补充和加强，但无论是清政府的谕旨或是李鸿章以私情告求，南洋、福建、广东的督抚都以种种借口，拒绝派遣自己辖下的军舰前往援助，结果，中国海军变全局的优势为局部的劣势，以致北洋舰队越战越弱，最后全军覆灭。⑶马江之战的惨败以及南洋舰队五舰援台的失败，也许成为中国军舰不敢轻易出洋与敌舰搏战的理由，致使过后的十年中很少这方面的训练。期间，虽然每隔几年清政府都要集中全国的舰队会操，其中就有阵势操练的一项内容。但从后来的甲午海战情况看，那些操练只是流于形式，没有从实战的角度来严格要求。导致北

洋舰队在黄海海战的队形混乱，不成阵势，最后被日舰各个击破，损兵折将。后来更只知“避战保船”，不管战事如何需要海军作战，却长期龟缩旅顺、威海等海港，宁愿被日军逐渐消灭，也不再出战。(4)南洋三舰和镇海岸炮相配合，终于击退来犯法舰的战例，使得清政府将军舰与岸炮配合作战，作为保护海军基地和军舰的一种重要战术。在刘公岛、旅顺口等重要海军基地，都加强了港口后路的陆上防御，配置了相当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也许又成为中国海军不愿出海与敌搏战的又一条理由，是北洋舰队最后困守刘公岛的滥觞，虽然难免全军覆灭，但其中的学习痕迹却是十分明显的。

③及时加强台湾防务。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明末清初，曾一度为荷兰殖民者侵占，后被郑成功率兵收复。清康熙年间，清政府统一台湾，并在岛上设兵驻守。但由于兵力单薄，进入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觊觎台湾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尤其以 1874 年日本出兵侵扰台湾为最严重。台湾限于自身条件，驻军有限，难以独力抗御外敌。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在中法衅起之始，清政府就及时调兵遣将，拨械济饷援助台湾防务，终于挫败法军占据台湾为质，向中国勒索巨款的阴谋，成为两岸合作，共抗外敌的光辉典范。战后，台湾建省，军事力量大为增强。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在中日衅起之始，即着意加强台湾防务，派遣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等率军援台。可惜为德不终，过早割让台湾给日本，并断绝对台湾抗日军民的接济，使得台湾抗日战争终告失败。

4. 外交上出现了新变化。

①改变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孤立的局面。在中法战争爆发

前，中国虽然已经派遣外交使节出国，但未能很快扭转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孤立状态。期间曾因修改《里瓦基亚条约》而与沙俄进行外交交涉，也因琉球被灭及朝鲜被侵而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这些交涉都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和介入。这种情况在中法战争时期有了根本的改变。由于中法战争旷日持久，而且双方势均力敌，从而给各种外交斡旋留下充分的空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管其性质如何，刀兵相向总是暂时的，最终都要通过外交斗争来解决问题。无论是战前的酝酿、战中的谈判、战后的签约，都需要外交的折冲。中法战争从酝酿到结束，时间跨度很长，如果从曾纪泽于光绪六年（1880 年）过问法越矛盾算起，到光绪十一年（1885 年）签订和执行《中法简明和约》止，前后约有五年。在这五年中，中国打破了过去孤立在国际外交舞台之外的情形，开始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各国外交官和政府周旋。在中国国内，先后有李鸿章、总理衙门与法驻华公使宝海、脱利古、署理公使谢满禄的交涉，有曾国荃在上海与法公使巴德诺的谈判，其中又掺杂了李鸿章在天津与福禄诺、法驻津领事林椿、利士比的副官日格密的交涉、总理衙门在北京要求英、美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税务司德璀琳在京、津、沪、港与各方斡旋的活动、刘铭传在台北与利士比、刘璈在台南与驻台英领事的口信函件往来、薛福成在镇江与英国领事、刘麒祥在上海为保护法国侨民与俄国领事的照会、越南陪臣赴天津、广东请援等；在国外，则有中国驻法使臣曾纪泽、李凤苞在巴黎与法国外交部、在伦敦与英国外交部、法、德等国驻英使臣以及英国报纸的交涉、有曾纪泽在彼得堡与法国驻俄公使商犀的会晤、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

司金登干在伦敦、巴黎与伦道尔、茹费理的周旋，还有唐廷庚、唐景崧的暗访越都顺化会晤越南大臣等；此外，英、德、美、俄、日本等国政府的外交使节也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希望插手其间或混水摸鱼。真是场面纷纭，错综复杂。各式各样的人物纷纷登台表演，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其中，法方代表脱利古、巴德诺狂妄自大，横蛮无理；宝海、福禄诺则外强中干，貌似委屈而内藏机锋；茹费理力不从心、色厉内荏；而中方代表虽然有的表现不尽如意，但基本能坚持宗旨，据理力争，在法国武力威胁下并不轻易屈服让步，留下不少可圈可点的案例。李鸿章圆滑老练，曾纪泽血气方刚，张佩纶锋芒毕露，赫德左右逢源，都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一出出的精彩表演，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给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的国际关系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甲午战争期间，在衅起之始，清政府就企图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及早介入，借助列强的外交压力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到了在战场上无力招架的时候，清政府更四出乞求美、英、法、俄、德等列强诸国的外交调停，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还演出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幕。

②形成以战争解决藩属国被侵的处理模式。在中法战争爆发前，曾发生过法国侵略越南南圻、日本并吞琉球和出兵侵扰朝鲜，迫签《江华条约》等事，这些都威胁到中国的藩属国，那么，清政府如今对待这些问题呢？其中，李鸿章就认为按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保护这些藩属国，因此，主张不必为争藩属国“朝贡”的虚名，而冒与强国开战的风险；但曾纪泽出使法国后，却在没有清政府训令的情况下，擅自过问法越纠纷，并很快就建议清政府出兵慑敌，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外交

交涉演变为武装冲突。自此以后，宁冒战争风险也要出兵干预，就成了清政府处理藩属国被侵事件的模式，以致甲午日朝矛盾乍起，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兵援朝，掉入日本的战争圈套，而以惨败告终，被迫对日签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5. 思想上树立起刘永福、冯子材、刘铭传等爱国英雄的形象。

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也涌现了像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僧格林沁等英勇抵抗外敌的官员将帅，但由于这两次战争都是以中国惨败而告结束，因此，上述人物在时人眼里褒贬不一，并未能为全国人民树立起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爱国英雄榜样（他们的显赫影响更多的是解放后才形成的）。至于甲午战争中的邓世昌、左宝贵，及抵抗八国联军入侵的聂士成，虽有殉国之烈，却无胜敌之绩。战败而死，当然不及战胜而活更令人钦佩。而在中法战争中，先是刘永福率黑旗军在越南坚持长期的抗法战争，屡败法军，勋绩显著；刘铭传卓越地领导了台湾抗法战争，为粉碎法国勒索赔款的阴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冯子材组织和指挥的镇南关大捷，重创法国侵略者，打出了国威和军威，创造了中国近代反对外侵战争不以战败结束的奇迹，从而为广大民众树立了英勇抗敌的反帝爱国英雄形象。刘永福、冯子材、刘铭传等人成了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爱国英雄榜样，他们的事迹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培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以往，学术界在谈到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加深的

过程时，把中法战争算作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知道，法国侵略者吞并越南，有进而染指我国西南边疆的野心，而清政府不能击退法军，保全越南，从而使法国得以逼近我国的南大门，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边疆危机是加深了。但我们从整个战争过程中可以看到，在“观音桥事件”发生，中法重新起衅开战后，假如中国不是在台湾及越南北圻等地节节抵挡住法军的攻势，并取得沪尾、镇南关等胜利，从而争得与法国签订不赔款不割地的和约，而是处处给法国打败的话，则我国可能就要赔给法国巨额偿款，台湾全岛或最少是基隆海关、煤矿就会落入法国手中。从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说是中法战争有力地遏止了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加深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不可绕越和忽视的组成部分。不弄清中法战争的情况，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就会出现断裂，许多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将被掩盖而模糊不清，不利于我们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性。我们希望通过本书，对中法战争史的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以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共同将中法战争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附 录

中法战争大事记

清同治元年（1862 年）

越南与法国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嘉定、定祥、边和三省给法国。

同治六年（1867 年）

法军夺取越南永隆、安江、河仙三省。合前踞三省建立“交趾支那”，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刘永福率黑旗军进入越南。

同治七年（1868 年）

刘永福被越南政府承认为宣光团首。旋因歼灭盘文义，受封为百户。

同治八年（1869 年）

黑旗军入驻保胜。

同治九年（1870 年）

清军第一次应邀入越援剿。黑旗军出兵助剿。

同治十年（1871 年）

清军第二次应邀入越援剿。

同治十一年（1872年）

援越清军撤回，但应邀留军越境。

同治十二年（1873年）

十月，安邺攻破河内。

十一月，黑旗军阵斩安邺。

同治十三年（1874年）

二月，越法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

八月，越南政府正式允许黑旗军在保胜设关抽税。

十月，越南政府著刘永福权充三宣副提督。

光绪元年（1875年）

二月，清军第三次应邀入越援剿。

四月，法国驻华临时代办罗淑亚向总理衙门致送《法越和平同盟条约》。

六月，恭亲王奕䜣复函罗淑亚，内称："至交趾即越南，本系中国属国。"

十月，援越清军撤回，但应邀留兵越境。

光绪四年（1878年）

七月，二十七日，曾纪泽充任驻英法公使。

八月，李扬才反叛入越。清军第四次应邀入越援剿。

法国政府阴谋出兵北圻。

十月，初六日，授曾纪泽太常寺少卿。

二十八日，曾纪泽从上海启程。

十二月，十二日，曾纪泽行抵巴黎。

光绪五年（1879 年）

二月，越南政府实授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

十一月，曾纪泽与法国外交部交涉法国侵越事宜。

光绪六年（1880 年）

六月，初六日，法驻华公使宝海到任。

光绪七年（1881 年）

六月，法国政府拨款作出兵北圻的经费。

八月，曾纪泽致函总理衙门，主张中国出动海军威慑侵越法军。

十月，十五日，总理衙门奏请清政府讨论应付越南局势。

二十一日，刘永福回国省墓。

十一月，二十四日，广西巡抚庆裕命留越桂军统领黄桂兰妥办防法事宜。

光绪八年（1882 年）

一月，刘永福在上思平福与王敬邦晤谈。清政府擢升徐延旭为广西布政使。

三月，李维业攻占河内。刘永福返越，途中与黄桂兰谈联合抗法事宜。这是黑旗军与清军联合抗法的开始。援越桂军进扎北宁。清政府再次讨论援越抗法事。

二十四日，唐炯授云南布政使。

四月，援越桂军分为左右两路，黄桂兰为左路统领，赵沃为右路统领。

五月，初二日，命云贵总督刘长佑著道员沈寿榕带兵出境。

初七日，著岑毓英署理云贵总督。

十九日，清政府命徐延旭出关督师。

七月，沈寿榕出关至宣光省安平府。

八月，唐景崧请缨入越。

九月，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致函清政府询问中国军队入越事。

十月，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宝海达成《李宝协议》三款。

十二月，唐景崧到越都与越南大臣晤谈。

光绪九年（1883年）

一月，法国政府否定《李宝协议》，并撤消宝海的驻华公使职务。

二月，二十五日，清政府有旨准徐延旭专折奏事。

三月，初九日，唐景崧在山西会晤刘永福。

四月，十三日，刘永福力歼李维业。清政府命徐延旭出关督师。

十五日，徐延旭在龙州与黄桂兰、赵沃商量防法时，确定“以保守北宁为自固藩篱之至计，以暗助刘军为维系藩情之要着”的方针。

十八日，张佩纶奏劾冯子材，冯子材告病开缺回籍。

五月，初二日，徐延旭赴北宁布防。

六月，廿九日，黄桂兰任广西提督。

七月，初六日，曾纪泽会晤法外长沙梅拉库，法方扬言要与中国交战。法军攻占越都顺化，越南政府投降。

十三日，黑旗军与法军战于怀德，法军败撤。

八月初，黑旗军与法军战于丹凤，法军败撤。

九月，滇军、桂军欲撤离山西。黑旗军布防山西。法军扬言进攻山西、北宁、兴化；并试图招降刘永福，为刘永福严辞拒绝，

初九日，清政府任命徐延旭为广西巡抚，下令援越清军抵抗法军，并命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募兵前赴广西。

二十二日，赏黑旗军银十万两。

十月，十三、四日，援越桂军和越南义勇再次进攻海阳，均败撤。

二十九日，清政府命滇军入越，进扎山西助战。

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黑旗军与法军战于山西，黑旗军败撤兴化。

光绪十年（1884 年）

一月，滇军进至兴化，黑旗军奉命驰援北宁。

二月，十五日，法军进攻北宁，桂军败撤谅山。徐延旭、唐炯被革职拿问，清政府命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并改组军机处。

二十九日，有旨起用冯子材接统黄桂兰军，冯子材托病推辞。

三月，十二至十四日，法军占领兴化，滇军、黑旗军退扎大滩一带。

十八日，法舰骚扰基隆。

福禄诺与德璀琳在香港会面。

四月，初四日，清政府以许景澄代替曾纪泽为驻法公使。

十二日，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法军占领宣光。

十七日，李、福草签《中法天津简明条款》。

十四日，命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务、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务，均准其专折奏事。

二十三日，福禄诺向李鸿章提出限期撤兵要求，遭拒绝。

二十八日，清政府撤张树声职，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

闰五月，初一、二日清军与法军战于观音桥，法军败撤。

初四日，命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

初六日，法国署理驻华公使谢满禄向中国照会索赔。

初九日，法使巴德诺到沪。赫德赴总署谈法方索赔事。

十一日，张佩纶到达福州。

十三日，孤拔率舰到沪。法首相茹费理约见陈季同谈对华索赔事。

十四日，茹费理与署法使李凤苞辩索赔事。刘铭传从天津起程赴台湾。

十五日，著漕运总督杨昌浚率部援闽。

十九日，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

二十七日，张佩纶赴马尾布防。

六月，初七日，曾国荃与巴德诺谈判。

十五日，法军第一次进攻基隆，法军败撤。

二十一日，张之洞函询冯子材能否出征。

七月，初三日，中法战于福建马江，福建舰队全军覆灭。

初六日，清政府下旨对法宣战，并接纳黑旗军入清军序列。

十三日，冯子材复函张之洞，愿意率军出征。

八月，十三日，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清军撤回台北。

十四日，桂军与法军战于陆岸。

十八日—二十二日，桂军与法军战于船头、郎甲，桂军败撤。

二十日，法军进攻沪尾，法军败撤。清军与法军战于宣光城外。

九月，十一日，清政府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

十四日，曹志忠率军夜袭基隆，败撤。清军与法军战于宣光城外。

十月，初一、二日，滇军、黑旗军与法军战于左育。清军败绩。桂军与法军战于纸作社。

初七日，张之洞命冯子材募军十营前赴广西。

二十五日，基隆法军进攻鸟嘴峰清军，法军败撤。

十一月初五日，宣光法军袭击黑旗军，黑旗军败撤。

十一日，冯子材在钦州誓师出征。

十八日，王德榜部楚军与法军战于丰谷，楚军败撤。

二十五日，基隆法军进攻清军，法军败撤。

十二月，初九日至十三日，基隆法军进攻清军，攻占月眉山阵地。

十一日起，清军进攻宣光城，历时一个月，清军败撤。

下旬，法军与清军战于谅山等地，清军败撤，退回国境。张佩纶被革职。

光绪十一年（1885年）

一月，初三日，清政府任命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

初九日，法军攻占镇南关，两天后撤离。中旬，冯子材率萃、勤二

军扼扎关前隘。

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基隆法军进攻月眉山，清军败撤。

二月，初五日，冯子材率军夜袭文渊。

初六日，潘鼎新被革职，由广西按察使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关外军务。

初七、八日，法军进攻关前隘，法军败绩。

十一日，冯子材率军出关收复文渊。

十二日，清军与法军战于驱骡，法军旅长尼格里受重伤。

十三日，清军收复谅山。与此同时，法军攻占澎湖。茹费理内阁倒台。

十五日，滇军报称攻缅旺，收复清山、清水两县。

十九日，中法签订《中法停战条款》。

二十日，滇军报称收复广威府、不拔县。